

尘封的历史书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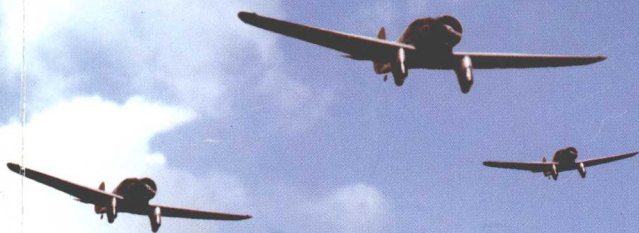
Sisters of Heaven

飞天名媛

中国第一代女飞行家三人传

[加] 帕蒂·哥莉 (Patti Gully) 著

张朝霞 译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Sisters of Heaven

飞天名媛

中国第一代女飞行家三人传

[加] 帕蒂·哥莉 (Patti Gully) 著

张朝霞 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合同登记号：图字 19—2010—046 号
Copyright © 2008 Patti Gully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y Long Rive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飞天名媛：中国第一代女飞行家三人传 / (加) 哥
莉 (Gully, P.) 著；张朝霞译. — 广州：花城出版社，
2012. 1

书名原文：Sisters of Heaven
ISBN 978-7-5360-6341-9

I. ①飞… II. ①哥… ②张… III. ①颜雅清 (1912~1940) — 传记②李霞卿 (1912~1988) — 传记③郑汉英 (1915~1943) — 传记 IV. ①K82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76841号

出版人：詹秀敏
责任编辑：林宋瑜 揭莉琳
技术编辑：易平
装帧设计：林露茜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23 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20 开
印 张 22 1 插页
字 数 360,000 字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目录 contents

地图目录 1

译者序 1

前言 1

第一章

颜雅清：心灵之生

1. 引子 11
2. 开明世家 13
3. 苏联的新生活 31
4. 性奴役与国联 44
5. 抗战爆发 55
6. 对华援助 71
7. 5月坠机事故 82
8. 美国医药援华会对华援助 95
9. 返回远东 105
10. “全人类时代的到来” 116
11. 约翰·吉福德·梅尔 125
12. 尾声 137

第二章

李霞卿：天骄传奇

14. 序言 143
15. 革命世家 145
16. 荧屏之星 156
17. “难道飞行不是高于一切的事情吗？” 169
18. 学成归国 183
19. 回归新世界 206
20. 南美募捐之旅 234
21. 空中救护服务队与美国援华联合会 243
22. 二次南美行 264
23. 魂留蓝天 270

第三章

郑汉英：鹰击长空

24. 引子 281
25. 显赫世家 283
26. 中国铁翼 294
27. 不羁的罗曼史 320
28. 扬名温哥华 329
29. 初试登台 345
30. 环加飞行募捐演讲 363
31. 如花凋零 379
32. 尾声 384

附录

1. 颜雅清参与国际联盟 (League of Nations) 会议情况, 如以下会议纪要所述 389
 - 第一委员会 (第五次会议), 1935 年 9 月 19 日 389
 - 第五委员会 (第四次会议), 1937 年 9 月 18 日 391
 - 第五委员会 (第八次会议), 1937 年 9 月 25 日 392
2. 李旦旦 (李霞卿) 参演的民新公司影片 394

大事年表 395

参考文献 406

致谢 421

前 言

东汉末年，朝政腐败，再加上连年灾荒，民不聊生。刘备有意拯救百姓，张飞、关羽又愿与刘备共同干一番事业。三人情投意合，选定张飞庄后那花开正盛的桃园，备下乌牛白马祭礼等项，三人焚香再拜而说誓曰：“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这就是著名的“桃园三结义”。尽管这是源自小说《三国演义》里面的故事，但是刘关张的忠肝义胆、报国安邦之志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时光飞逝到了20世纪，这是一个血腥的世纪，中华上下五千年，没有一个时代像20世纪这样内忧外困、战争连绵。1937年7月7日，日军悍然发动“七七事变”（亦称“卢沟桥事变”），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抗日战争爆发。凭借着先进的武器装备以及中国军队的防务空虚，日军很快攻陷了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的许多城市和地区。在财力匮乏、补给不足，国家主权面临丧失的危急关头，三位女性挺身而出，报效国家。她们就像桃园结义三姐妹，虽然来自不同的家族，有着不同的背景，但是她们心中都怀有一个崇高的理想——竭尽所能，拯救国家于水火。她们家世显赫，她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她们美丽婉约……她们是为抗战而在美洲各地进行募捐飞行演讲的女飞行员。她们是颜雅清、李霞

卿、郑汉英^①。

在那个中国女子连开车都不敢想像的年代，在来自同样阶层的许多富家小姐们还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时候，这三位航空先驱姐妹以翱翔蓝天来践行自己爱国护邦之宏图伟愿。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先生深知航空在军事上的重要性，曾言：“飞机一物，自是大利于行军”，在致南洋革命同志函中提到“飞机为近世军用最大的利器”。为充实国家军事力量以击溃军阀，孙中山先生一直大力倡导“航空救国”。颜雅清、李霞卿和郑汉英也坚信航空救国，她们以非凡的胆识和勇气，以搏击长空之壮举书写着“抗日救国，匹妇有责”的英勇诗篇。为此，她们义无反顾，甚至不惜牺牲生命。

起初，她们决意投效空军，请求驾驶战斗机上天杀敌，但是未获国民政府同意。壮志未酬，报国无门，她们备感沮丧，但是很快她们想到了报效国家的其他途径。残酷的战争造成伤兵难民无数，数以千万计的伤兵和难民需要救护和安置，而此时，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掀起了赈济祖国伤兵难民的运动。不约而同地，颜雅清、李霞卿和郑汉英决定以一个令世人惊叹的飞天之举来表达自己的拳拳爱国之心。为赈济受难的同胞，为祖国筹集所需的物资，她们准备独自驾机在海外进行抗战募捐飞行演讲。她们将以这样一种气贯长虹的方式让更多的海外民众了解发生在遥远中国的野蛮侵略，向西方世界展示中国人民保卫祖国的英勇气概和坚强决心。

虽然有着共同的信念，但是这三位女子气质性格迥异：颜雅清，富有爱国热情，历练通达，聪慧机敏，是一位为理想不懈奋斗的浪漫的理想主义者；李霞卿，来自一个富有革命传统的富商家庭，俏皮可爱，胆识过人，欲以一己之躯报效祖国；郑汉英，家世显赫，女权主义者，内敛稳重，体质素弱但心如磐石，意志坚定，勇于进取。她们的搏击蓝天之举放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是卓尔超凡的，但是在那个中国女子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裹脚依然盛行

^① 颜雅清、李霞卿、郑汉英，外媒多称 Hilda Yan Yaqing (Yen Ya-tsing)、Lee Ya-ching、Jessie Zheng Hanying (Cheng Han-yin)。——译注

的年代，其敢于冲破传统的勇气，其浩然无畏的飞天之志，其殷殷爱国情拳拳赤子心，尤其令人称道并永远值得我们缅怀。李霞卿曾对一位对其飞行动机颇感兴趣的西方人士如是说道：“我到这里来，就是想让世人知道，中国女性不但能在地面上走，而且能在天上飞。”

她们并非中国最早的女飞行员。1920年代，少数几位中国“新女性”就已经飞上蓝天，另外还有个别在美国获得飞行执照，但是选择在海外进行飞行募捐演讲来参与抗日救亡运动的飞天女英雄仅有她们三个。与那些航空女先驱相同的是，她们个个技艺超群，她们的成长、她们的人生，无不叫人称奇。

颜雅清出生于上海，乃名门之后，其家族中不乏声名显赫、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仁人志士。其父颜福庆博士，中国现代医学的伟大先驱，耶鲁大学第一位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亚洲人，曾不遗余力将现代西方医学技术引进中国，抗战期间曾出任武汉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其伯父颜惠庆，著名外交家，曾五任北洋军阀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国务总理或代总理，南京政府成立后，先后任驻英大使、驻苏大使、国际联盟大会中方首席代表。1935年，颜雅清作为中国派出的唯一女代表出席了在日内瓦召开的国联大会，从而当始了她报效国家的公职生涯。抗战爆发后，颜雅清在纽约学习飞行技术，取得飞行执照后，她开始了在美国的抗战募捐飞行之旅。1939年5月1日，颜雅清驾机在阿拉巴马州发生飞行事故，她不得不就此搁浅原定的环美飞行计划。伤愈后，颜雅清又积极投身到抗战救亡的运动中。联合国成立后，颜雅清作为派驻纽约的中方联络官，继续为中国人民的利益奔走呼号。尽管颜雅清勇气过人，并且在抗战中作出了杰出贡献，但遗憾的是，其事迹在中国并不为人所知。

李霞卿出身于广东革命家庭，其父李应生、叔父李沛基都曾是追随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党人，1911年10月，兄弟俩在黄兴的指挥下，炸死了刚到广州赴任的清政府凤山将军。受家庭环境影响，李霞卿从小就有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14岁时，还在读中学的李霞卿以艺名李旦旦初登银幕，凭着出色的表演很快便成为20年代上海滩最走红的电影明星之一。后来因为机缘巧合，李霞卿迷恋上了飞

行，她逐渐意识到，飞翔能够帮助她实现报效国家的理想。完成在瑞士和美国的飞行学习后，李霞卿回到了祖国，被誉为“中国第一位女飞行员”。为了唤起同胞对航空事业的关注，李霞卿于1935年—1936年间飞翔在祖国的万里长空，创造了当时中国女子国内长途飞行的最新纪录。抗战爆发后，李霞卿被国民政府派往美国，在美洲际飞300多个城市，为抗战募捐倾尽全力。李霞卿的募捐活动获得了极大成功，她也因为独自驾机万里飞行的英勇壮举而被世人广泛关注。在本书介绍的三位女飞行家中，李霞卿是被当今中国人所了解并推崇的唯一一位，她的英雄事迹在北京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内也有介绍。40年代初，有报道称28岁的李霞卿在一次募捐飞行表演中不幸罹难，不过这是误传，抗战胜利后，李霞卿曾经回到上海，后来又在香港定居多年，1960年中从香港迁居美国，1998年辞世，享年86岁。

郑汉英也出自革命世家。她的姑姑郑毓秀是民国时期著名社会活动家、资产阶级女革命家和女权运动鼓吹者，中国第一位女博士、第一位女律师、第一个女立法会委员，曾参与起草民法，是中国历史上响当当的人物。受姑姑的影响，少时的郑汉英就有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像她的姑姑当年一样，青春年少的她也远渡重洋，进入法国巴黎大学的前身索邦大学（University of the Sorbonne）攻读法学专业并获得法律博士学位。抗战爆发前，郑汉英一直活跃在外交圈。抗战爆发后，心系祖国、胸怀报国之志的郑汉英赴香港远东飞行训练学校——英国皇家空军（Royal Air Force）认可的一家飞行学校——学习飞行，1938年，她成为香港第一位获得飞行执照的中国女飞行家。蒋介石对她的飞行技术十分欣赏，将她招至麾下，郑汉英因此成为中国空军史上第一个女官——飞行中尉。效力空军的郑汉英于1940年被派往加拿大任中国外交部代表，她也因此成为第一个派到加拿大任公职的中国女子。郑汉英不辱使命，为了赈济祖国的难民和孤儿，她于1942年冬搭乘商务飞机作横贯加拿大东西部的募捐演讲而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1943年9月，郑汉英在温哥华身染肺结核不治，年仅28岁。这朵航空奇葩在人生最

辉煌之际、在未竟航空报国之志时不幸陨落，令人扼腕。郑汉英在加拿大享有盛名，她去世的消息刊登在当地各报纸的头版，加拿大皇家空军也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她的灵柩覆盖着国民党党旗，由荣誉卫队抬着，通过几个街区到墓园安葬。让人唏嘘的是，郑汉英这位把自己短暂而华美的一生都奉献给祖国解放事业的航空女英雄，如今却被国人所遗忘。

抗战募捐飞行要取得成功，她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让更多的国人和同胞关注航空和飞行。这不是件易事。第一位飞上中国蓝天的是法国人雷内·环龙（René Vallon）。1911年2月25日，飞行家环龙应邀来上海进行他的中国飞行处女秀，当时沪上万人空巷，外滩一带更是挤得水泄不通，大家争睹会在天上飞的新奇玩意儿。首次飞行大获成功，环龙也因此名声大噪。几个月后，环龙再次应邀到上海作商业性飞行表演，只是这次他酿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起空难：5月6日，他驾驶的“山麻式”（Sommer）双翼机在空中盘旋时发生故障，为了不伤及无辜，他试图将飞机迫降到跑马场的中央，但结果机毁人亡。当时跑马场正在进行一场赛马会，当环龙的尸体被运走、飞机残骸被清理后，乐队继续演奏，跑马场的比赛接着进行。由于这次事故，中国人一下子对飞行这一疯狂的危险游戏失去了兴趣，飞行再次成为中国人巷议的话题那是几年以后的事情。其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野心毕现，而中国虽然空域极其广阔，适合发展航空事业，但是当时莫说空中交通，许多地方就连铁路和公路都不通。直到1930年代，普通老百姓才逐渐开始接受航空器超强的机动能力，而女子飞天之举无疑对民众更多地了解和接受发展航空事业的重要性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宋美龄夫人极力推崇飞行器的重要性。30年代初，她就开始经常陪同蒋介石乘私人飞机巡访全国各地，包括一些除了飞机只能坐轿子颠簸很长时间才能到达的偏远山区。蒋夫人曾回忆一次这样的经历，那次他们飞抵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据她回忆说，他们就好像进入了一个返古地区，感觉时光倒流。山区妇女的衣着打扮

以及发式都还是她祖母那一辈的。正因为如此，那些女人们好奇地盯着眼前这位时髦的蒋夫人，好像她是天外来客一般。当地的官吏乡绅们看到蒋委员长也在人群中，他们的惊讶变成了敬慕，而此时他们已经准备为党国效忠了，因为再没有什么方式比这种面对面的接触更能赢得人心的了。

有了这样的经历，宋美龄开始对空中旅行情有独钟。作为女权运动的鼓吹者，宋美龄自然十分欣慰地得知颜雅清、李霞卿和郑汉英这三位女性的惊世飞天之举。她与这三位女飞鹰相识，给她们以鼓励，并对她们在海外进行的抗战募捐飞行予以大力支持，从而为募捐飞行取得成功奠定了基础。

不过，尽管这三位女飞行家为抗战募捐倾尽全力，但是她们所筹集的大笔善款是否真正用到了伤兵、难民和孤儿身上就不得而知。有可能存在这种情况，至少是一开始时，她们进行抗战募捐的动机很单纯，期望值也很高，所募集到的款项直接派发给了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但是随着战争的推进，国民政府财政收支入不敷出，同时法币的大量发行引发恶性通货膨胀，物资匮乏，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国内用来赈济伤兵难民的资金很快就被通胀消耗一空，虽然海外募集到的巨额资金不断驰援国内，但是一些无良的赈济官员也禁不住诱惑，将这些美元在黑市上进行兑换，为个人牟取暴利。这种盗用善款的不法行为在当时相当普遍，到后来竟然发展到公开抢夺美国援华资金的地步（章末注1）。美国作家、史学家斯特林·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在他1985年出版的《宋家王朝》（*The Soong Dynasty*）一书中指出，宋氏家族的有些人应对这种肆无忌惮盗用援华资金的丑恶行径负主要责任。西格雷夫在书中不无讽刺地说：“宋氏家族同时扮演着大臣、侍女和买办的角色。他们既是金融政策的制定者、分类账户的管理者，还是洋行的大买办，另外哪些人是敌人、哪些人是不法之徒都由他们说了算。美国要干的事情就是对华提供援助。美国人掏了钱，作为回报，他们只要感觉做了善事就行了。”（章末注2）。

三位女飞行家的义举是不是就打了折扣，抑或者更糟糕的是，虽然她们不遗余力地抗战募捐，但实际上最终为那些投机倒把、牟取暴利者作了嫁衣呢。如果她们的辛苦所得最后果真被那些不顾百姓死活的有钱人中饱私囊，那么她们也只是受了蒙骗，毕竟她们为了抗战救亡、为了救助同胞于水火，她们不遗余力，置个人生死于度外。

谈到个人生活，这三位女性称得上洁身自好，无可指摘。曝光她们的风流韵事也许可以在当时博取卖点和看头，但是这样的负面新闻从未在媒体上出现过。抗战时期，战争成了人们生活的中心，战火纷飞、生灵涂炭之下，人们哪里还有闲心去关心那些风花雪月的桃色新闻呢？而战争到了相持阶段，宣传英雄事迹以鼓舞民众士气更显得十分必要。所以，虽然这三位女飞行家享有盛名，人前风光，但是她们的孤独寂寞、她们的情感世界却鲜为人知。在不少公众眼里，她们都是单身的新女性，但实际上，她们各有自己的感情生活，她们也生儿育女为人母，她们之所以能成为一代航空女杰，正是因为她们身上独立自主、坚定不移、顽强不息的可贵品质，也正是这些品质最终导致她们现实婚姻生活的解体。与传统的中国女性不同，她们没有选择相夫教子，而是毅然为国效命，为此，她们舍弃了个人的小家，离开了尚待哺育的孩子。长时间在外奔波，她们很少见到自己的骨肉。虽然那时候中国上层社会的女性不亲自养育孩子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像这样的聚少离多却是不多见的。也许她们的“离经叛道”可以归结为她们受西方文化和教育的影响至深，西方文化和教育的浸淫固然培养了她们的进步思想，但同时似乎也成为了困扰她们的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

她们虽生在国内，但大部分时间在海外生活，不可避免地，她们的生活西化了，不过，当她们决意过一种宁静淡泊的生活时，她们依旧保持着中国人的本色，在她们西化和现代的表象之下，是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和传统。东西方文化和思想的冲突让她们的心灵常有一种撕裂感，她们个人生活中所经历的许多矛盾和冲突可能就

与这种二元性有关。她们没有恪守所谓的传统妇道，而是为了理想矢志不渝，并为此不惜离开丈夫和孩子，她们的这一举动显然与中国传统的家庭观格格不入。这三位勇敢的女性冲破传统而获得了自由，但是她们也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面对世人的不解，家人的疏离，她们只能默默忍受，因为她们知道自古忠孝两难全，为国尽忠是儒家所强调的，也是她们所崇尚的目标，为此，她们不惜牺牲一切。

从纽约到新奥尔良，从温哥华到瓦尔帕莱索^①，从旧金山到盐湖城，这三朵航空姐妹花飞越了数百座城市，吸引了无数的人关心和支持她们祖国的抗战事业。她们带给我们的是为了崇高的理想和目标而不懈努力、勇于奋斗和拼搏的故事。她们在通往理想的道路上历经坎坷，她们在前行的过程中有快乐也有悲伤，经历成功也遭遇死亡，但是她们从来没有放弃。她们就像桃园结义的三兄弟，没有辜负她们报效国家的神圣誓言。

飞天名媛

注释

1 Sterling Seagrave, *The Soong Dynasty* (New York: Harper& Row, 1985), 387.

2 同上, 315 页。



第一章

颜雅清：心灵之生

yan ya qing

背景就是文明意识、正义感以及谦卑自持。而意志力就是面对危险、偏见和灾难不低头、不妥协的胆识、勇气和力量。二者结合起来就足以说明一位优雅女子是如何出落得柔韧兼具的了。

——哈珀·李 (Harper Lee), 《杀死一只知更鸟》
(*To Kill a Mockingbird*)^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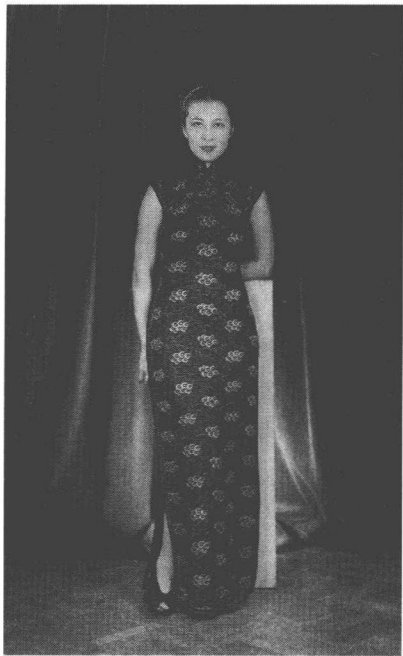
^① 《杀死一只知更鸟》(*To Kill a Mockingbird*) 是美国女作家哈珀·李的自传体小说, 也是她的第一本和唯一一本著作。小说于1960年出版, 1961年获得普利策奖, 1962年就被搬上银幕。——译注

1. 引子

1936年，当颜雅清宣布为了祖国的航空事业而学习驾驶飞机的时候，她的亲人和朋友中很少有为这个疯狂的决定感到惊讶的，因为他们对这个无拘无束——有人会称“怪异”——的年轻女子的出人意料之举早就习以为常了。天资聪颖、生性活泼的她似乎永远都在追求某种能够充实她人生的东西，而发扬人性的光辉并为此矢志不移才有可能让她梦想成真。

静默时，她的脸上偶尔会掠过一丝哀愁，那是对失望的浪漫感伤，她的眼睛里写满了倦怠，但是那对清亮的眸子分明会说话，一个懒洋洋却勾魂的眼神对男人充满了诱惑。倾慕她的男人众多。可是当她笑起来时——她很爱笑——你会发现她像变了一个人，她的笑声爽朗，笑起来有两个深深的酒窝，她的热情和直爽极富感染力，她也因此结交了不少知心朋友。交际广泛的颜雅清善于从朋友那里获取知识和给养，而朋友们也对她的开朗聪慧大加赞赏。按说，颜雅清系出名门，而且凡事精明过人，她应该会有一般名门千金的那种傲气和霸道，但是她却没有，她有的是大家闺秀的知书达理，不仅于此，她有某种使命感，她对劳苦大众的那种责任感根植于心，而这种责任感在许多方面主导着她的生活。

颜雅清胸怀坦荡、富有主见、性情开朗，她对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的不懈追索让她走出了一条异于常人之路。她不止一次面临人生的重大抉择，而她的抉择不仅牵动着那些深爱她的人的心，而且还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情感创痛（颜雅清先后两次离异，这对她



颜雅清身着旗袍在上海留影。

的前夫、孩子们以及孩子们后来组建的家庭都是个沉重的打击)。我们有理由相信，成为一位女飞行家、代表祖国飞上蓝天的梦想是她所有梦想中最不同寻常，也是最冒险的一个。如果她的亲人们早知道他们对她飞行安全的担忧有朝一日会变成现实，那么他们当时可能会更极力劝阻她打消那个念头。不过就算是那样结果也不会有所不同，颜雅清是个决断的人，她决定了的事情，是没有人能够拦得住的，既然她相信只有航空才能救国，那么谁也别想阻拦她实现这一理想。

2. 开明世家

颜雅清出身名门，其家族中有不少赫赫有名的人物。颜氏这一脉其祖先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鲁国著名学者、思想家颜回（公元前521年—前481年）。颜回师从孔子，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他学识渊博，素以德行著称，历代文人学士和统治者对他无不推崇有加，尊奉其为颜子。颜回通过自己讲学授徒，传授儒学六经；通过协助孔子整理古代典籍，逐渐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形成了儒家的一个宗派——颜氏之儒。颜回本人声名卓著，其后人也绝非等闲之辈。颜回身后的大约2000年后，他的一个直系世孙在福建厦门出生了，这就是颜雅清的曾祖父颜清源。1850年代，也就是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当时还是个孩子的颜清源为躲避战乱移居上海，并在那里成家立业。从此，颜氏这一脉与上海这座大都市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在那里开枝散叶、繁衍生息。颜清源有两个儿子，名叫颜永京和颜如松，做父亲的一直给孩子们灌输良好教育的重要性。在父亲的谆谆教诲下，兄弟俩后来双双赴美留学。

1854年，颜永京和颜如松（后者即颜雅清的祖父）一同进入美国俄亥俄州的凯尼恩学院（Kenyon College）学习，回国之前，他们还与学校为数不多的中国留学生以及其他所有学生一道代表北方联邦政府参加了美国南北战争。经过战争的洗礼和西方文化的熏陶，两个年轻人成为了虔诚的基督徒，兄弟俩于1861年毕业，次年回国。回国后他们成家立室，生儿育女，并成为中国基督教圣公会的牧师。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颜如松突染伤寒过世。他留下五个孩子——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而他们年纪尚幼，所幸的是，孩子们的伯父颜永京在他们一家人悲痛危难之际伸出了援手，担负起了养育他们的重任。尽管颜永京自己也有四子一女^①，但是他对弟弟的骨肉视如己出疼爱有加。

对过继的孩子们来说，伯父颜永京是一位优秀的导师。他热心公益，崇尚西学，致力于将西方的知识引进中国，是上海最早的教会学校圣约翰书院（St. John's College，后改名圣约翰大学，现华东政法大学）的创办人之一。1879年，他协助施约瑟主教创办圣约翰书院，积极筹募资金，为书院的建设呕心沥血。1881年，颜永京任书院院长，主持院务兼授数学、心理学等课程。在教学过程中，颜永京曾先后翻译出版过《肄业要览》、《心灵学》、《知识五门》等书，特别是《心灵学》^②一书是中国第一部汉译的西方心理学著作，因而他被视为将西方心理学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1886年，颜永京任圣公会虹口救主堂牧师，1894年，颜永京受中国禁烟总会派遣，出国宣传，1898年在美国病逝。

颜雅清的父亲颜福庆，在兄弟姐妹五人中排行第二，8岁时，父亲过世，他过继给伯父颜永京。幼年丧父、母亲多病的他少年时代就立志学医。在伯父的资助下，他先后就读于上海圣约翰中学和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颜永京曾希望儿子颜惠庆学医，但颜惠庆志不在此，颜永京未了的心愿在嗣子颜福庆身上实现。1903年，颜福庆以优异的成绩从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毕业，成为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本土西医。颜福庆看到最底层中国百姓的疾苦，希望走一条为普通民众服务的医学现代化道路。毕业第二年，他报名赴南非多本金矿担任矿医，为在那里开矿的华工治病年余。虽然工作条件极其恶劣，

^① 颜永京有四子一女，长子锡庆，次子志庆，四子惠庆（中华民国政府总理、外交家），幼子德庆（铁道专家），女儿庆莲，另有一子早夭。——译注

^② 《心灵学》，译自美国牧师、心理学家约瑟·海文（Joseph Haven）1857年版的《心灵哲学：智、情、意》（*Mental Philosophy: Including the Intellect, Sensibilities and Will*），1889年由上海益智书会出版，虽然译作只出版了上半部，但该书为中国第一部汉译的西方心理学著作，在中国近代心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译注

但是他不辞劳苦，富有责任心和爱心，深受矿工们的尊敬，回国时矿工们集体赠送给他一枚金质纪念章。尽管圣约翰大学医学院三年的医学教育让颜福庆学会了诊断和治疗术，但是在南非的医疗实践让他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医学知识还不够扎实，自己的医术水平和见识与自己救治社会和民众的理想相去甚远，他决定去美国进一步深造。

从南非回国后没多久，颜福庆娶了受过教育的女子曹秀英为妻。在新婚妻子的支持下，他作出了改变一生的重大决定：去耶鲁大学医学院攻读医学博士。耶鲁大学医学院录取了他。1906年，颜福庆进入耶鲁大学医学院插入二年级班。颜福庆入学后没多久，他的第一个孩子在上海江湾区降生了，是个女儿，那一天大概是阳历1906年1月17日（章末注1）。由于这时颜福庆还在美国求学，他们给这个女儿取名雅清，其中的“雅”字是耶鲁英语名称第一个音节“Ya”的汉语谐音。父亲取这个字是希望自己能从耶鲁这座著名学府顺利毕业。小雅清还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仪式，取洋文名希尔达（Hilda），即“保护者”或“女战士”之意。

颜雅清出生之时正值清朝末年，到5岁时，她还是大清王朝的一个小子民。不过，对于女儿的命运，父母高瞻远瞩。没错，她是中国人，但她也是世界的公民，在父母看来，没有什么信条、宗教或种族上的界线可以阻碍女儿的志向和追求。他们祈祷女儿长大以后成为一个关注公众利益、服务人类、服务社会的有用之人。

事实上，颜雅清正是出生在一个注重高等教育、崇尚西学、讲求勤奋、精忠报国的开明世家，所有的家族成员均以此为训，颜雅清自然也不例外。她一定会实现父母对她的祈愿，并像她的母亲一样，成为一个勤劳善良、个性爽朗的人。她将从敬爱的父亲那里汲取知识，并成为他的好朋友、好伙伴。她将追随着父亲的足迹，奔赴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和天地。

在耶鲁的四年（1906—1909），是颜福庆一生中最清苦的日子。初到美国，仍过不了专业医学英语的难关，纽黑文（New Haven）

酷冷的天气和漫长的雪季也让他无法适应。虽有奖学金，但昂贵的学费还是使他的经济一度陷入困境。他不止一次几乎放弃，但是作为美国最著名学府的一名医学生，颜福庆深知机会来之不易，他更明白他的祖国和家人正盼着他学成归来。颜福庆努力学习，刻苦钻研，1909年，他终于如愿以偿，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成为耶鲁大学第一位获得医学博士的亚洲人。颜福庆严谨治学的态度和优异的学业成绩让耶鲁大学十分欣赏，该校邀请他留校任教，但是被婉拒，因为报效祖国是他一生的梦想。为了掌握更多今后有用的医学知识，耶鲁毕业后，颜福庆又来到英国利物浦热带病学院研读，并在短期内获得了热带病学学位证书。在此期间，颜福庆还考察了柏林、巴黎和维也纳的医院系统，为其今后在中国创办医学教育和医疗机构积累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1910年，颜福庆回到了梦萦魂牵的祖国。经过几年的勤学苦读，此时的颜福庆已经深谙诊疗、传染病和医院的管理运作，这位踌躇满志的年轻人只待回国大展宏图了。

事实上，颜氏兄弟都先后接受了西方教育，回国时都是清一色的西式打扮：身穿三件套西服，头戴礼帽（章末注2）。这让来接船的亲戚朋友吃惊不小，更惹眼的是，他们把在国外留学时骑的自行车也一同带回来了。那时候，自行车在中国还十分稀罕，颜氏兄弟自然也就成为宣传推广这个后来成为中国最流行的交通工具最早的一批人了。



所以，颜雅清从小在一个中西合璧的家庭环境中长大。在父辈的影响下，小小年纪的她就深信生为人杰的道理，而她也因为处处优异而在家里成为众星捧月的人物。其父颜福庆回国后积极投身医学教育事业，先后创办了长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湖南医科大学前身）、第四中山大学医

学院（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即原上海医科大学前身）等医学教育机构。抗战期间，这位德高望重的医学教育家、公共卫生学家应国民政府之邀离开医学院赴武汉就任卫生署署长。颜雅清的伯父颜惠庆也是一代风云人物。这位中国 20 世纪的著名外交家，曾五任北洋军阀政府和民国政府国务总理或代总理，南京政府成立后，先后任驻美公使、驻苏大使。颜雅清的另一位伯父颜德庆，为中国著名铁道专家。颜德庆早年随胞兄颜惠庆一同前往美国留学，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州的理海大学（Lehigh University），主修铁道工程学，1901 年获工程硕士学位，1940 年获理海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02 年回国后，先后担任粤汉铁路、京张铁路工程师，川汉铁路副总工程师、代理总工程师，对中国早期的铁路桥梁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在中国近代铁路史上有着非常显著的地位。

无怪乎，颜惠庆、颜德庆、颜福庆被誉为“颜氏三杰”。除了在各自的领域建树卓越外，三兄弟还积极参与各项社会活动，为解决百姓疾苦而奔走呼号。父辈们献身国家、服务人民的伟大情怀深深感染着颜雅清，耳濡目染的她从小便培养了报效国家、奉献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1910 年，颜福庆学成归国之初，接受了美国耶鲁大学雅礼会^①（Yale-in-China）的聘请，在湖南长沙雅礼医院任外科医师。他的家人随同前往长沙，在接下来的近 20 年里，颜福庆一直在长沙积极拓展祖国的医学教育事业。湖南被誉为“鱼米之乡”，而长沙位于湘江之滨，自古以来就是中南地区最重要的商贸中心城市。但是作为省长公署所在地的长沙当时还非常保守，外城有城墙围着，可以想象要将西方医学技术引进闭关锁国的中国是多么的艰辛。颜福庆充分发挥他高超的公关和协调能力，并成功借助湖南士绅的力量力

^① 1901 年 2 月，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有一部分校友成立了旨在推进中美文化交流的雅礼会（Yale-in-China）。雅礼会成立后，即派人到中国实地考察办学的可行性，经过一番调查研究，雅礼会决定在长沙兴办学校。1906 年 11 月，应雅礼会之邀来华主持这一工作的美国医生胡美（E. H. Hume）在长沙正式开办了湖南第一家西医院——雅礼医院。——译注

排众议，终于于1914年玉成了美国雅礼会与湖南省政府之间的合作，中国第一所中外合作的医学院——长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由此诞生。“湘”是湖南的简称，“雅”是雅礼会英语名称第一个音节“Ya”的汉语谐音。两字合在一起，反映了中美合作办学的意愿。作为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第一任校长，颜福庆在推进中国西医学的发展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不到十年，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后来更名为湘雅医科大学，继而更名为湘雅医学院）发展成为中国一流的医学院校，享有“南湘雅，北协和”之誉，在中国医学和医学教育界传为佳话。

1910年底，中国东三省爆发震惊世界的淋巴腺鼠疫（俗称“黑死病”），鼠疫旋即通过铁路线传染到河北、山东等地继而威胁到华中地区。1911年，颜福庆代表湘雅医院参与防疫，主要负责京汉铁路湖北段的防疫工作。由于防疫措施得力，瘟疫得到有效控制，颜福庆成功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性命。1911年秋，完成防疫任务的颜福庆回到长沙，当时满清政府已近土崩瓦解，一场革命风暴即将来临。不少革命党人也齐聚长沙，准备发动起义。10月22日，辛亥长沙起义打响，新军先后攻破各城门并占领了巡抚衙门。长沙起义成功后，当即成立了新政权。长沙起义巩固了首义地区的胜利成果，极大地推动了其他省份的起义和独立，加速了满清王朝在全国范围的覆灭。在这场大革命中，颜福庆的医术再次得到了充分展现，他积极救治伤员，协助红十字会开展工作。

当父亲在战场上救死扶伤的时候，颜雅清在母亲的保护下平安无事。中华民国成立时，颜雅清只有6岁，一个小孩子哪里懂得这个世界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但是十年后，她就会成为在新世界里成长起来的新青年中的佼佼者，不仅如此，她还要为了争取更大的自由去拼搏。

颜家香火延续，雅清有了弟弟我清、瑞清和妹妹湘清。妹妹出生时，其父颜福庆正忙于筹建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姐姐名字中的“雅”和妹妹名字中的“湘”正好组成“湘雅”，可见父亲对湘雅——他人生中创办的第一所医学院——之情深。

颜福庆在医疗工作中深感预防医学的重要，决心从临床医学转向公共卫生学。1916年，颜福庆携家人再度赴美，进入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攻读，获公共卫生学证书。漫长的旅行给小雅清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是一次成长之旅，也是一次影响她一生的重要之旅。那时候的她并不知道她在未来还要经历许多这样的旅行，包括至少两次乘船环球旅行，以及飞越五大洲的许多地方。这次远行点燃了小雅清对旅行和冒险的渴望。更让人激动的是他们要抵达的目的地——美国！——一个她向往已久的国度。

抵达美国东海岸后，雅清的父母把她送进了纽约州东南部城市拉伊（Rye）的拉伊学校（Rye Seminary），这是一所私立贵族女子寄宿学校。当时的拉伊虽只是个约有四千人口的小镇，但悠久的历史、富有特色的殖民建筑以及古老的橡树让这个小镇颇具时尚色彩。雅清的父母决定让她在这所学校就读可能是出于综合考虑而非单单因其环境幽雅，因为该校除了注重学生学业外，还提供一流的社区服务和人性关怀。另外，父母选择这所学校可能也是出于以下考虑：该校至少有两位来自上海的中国学生，女儿在这里不会孤单，必要时还有同胞相助。（章末注3）

颜福庆不到一年就拿到了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证书，一家人回到国内。回国后，颜雅清被父母送到当时位于汉口路上的著名贵族教会女校上海中西女中^①（Mc Tyeire School）寄宿就读。中西女中是美国卫理公会在沪创办的一所著名的教会女子中学，其英文名称“Mc Tyeire School”得名于南方卫理公会的墨梯（Holland Mc Tyeire）主教。学校倡导通识教育和贵族教育，前6任校长均为美国人，早期教材除了语文外均使用英文教科书，主要招收富家女子入学。中西女中最重要的一个宣传推广者就是宋家王朝的缔造者宋嘉树，他早年在美国田纳西州的神学院范德堡大学深造时，墨梯主教任该校校长，宋嘉树毕业时还被墨梯主教授予见习牧师一职。宋

^① 中西女中（McTyeire School），1892年创办时位于汉口路西藏路口，1917年迁入沪西忆定盘路（今江苏路155号），1930年改名私立中西女子中学。——译注

嘉树先后把他的三个女儿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送到这所学校就读。作为近代上海最著名的女子学校，中西女中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女性。

颜雅清的聪颖以及她的社会意识在中西女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掘，而学校对基督教教义的宣扬也与她骨子里信奉的儒家仁爱之道不谋而合。

不过，1921年，颜雅清不得不离开中西女中随父再次赴美。这一年，由中华医学董事会资助，颜福庆偕夫人曹秀英、长女颜雅清赴美进修眼科。颜福庆在哈佛医学院学习，而家人们被安置在纽黑文，父亲进修期间，颜雅清报名上了瓦纳中学^①（Walnut Hill School）的暑期课程。瓦纳中学位于波士顿西郊的纳题克（Natick）小镇，是美国顶尖的艺术类高中。尽管这所学校学术水平一流，但颜雅清并不满足，经过在中西女中的刻苦学习，她积累了更多的自信，对未来的人生路有了更远大的规划。

在没有知会父母的情况下，这位早熟的女孩不声不响地参加了史密斯女子学院（Smith College）的入学考试。史密斯女子学院位于麻省的北安普顿市（Northampton），是美国最大、最负盛名的私立女子文科院校，创建于1871年。颜雅清在入学考试中取得了优异成绩，1922年秋，史密斯女子学院录取她为文化交流学生。时年颜雅清只有16岁，是该校创建以来录取的年纪最小的中国女生。颜雅清主修历史，学制四年，她很快就融入了学校，像其他众多有抱负、有才华的女生一样，为着自己的理想和目标而孜孜以求。

一年级时，颜雅清申请加入学校的戏剧协会。该协会可是名声在外，排演的戏剧在校内表演不说，而且还在北安普顿市剧院公演，而该剧院每年公演的戏剧不过才两部。这些公开的表演无疑给史密斯学院增色不少，因为要保证演出的水平和质量，所以能够入选协会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候选者首先要进行笔试，然后参加面试，展示其在表演、服装设计、戏剧编剧以及宣传策划等方面的才



艺。虽然年纪小，但是颜雅清凭着自己出色的才艺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顺利成为戏剧协会的一员。（章末注4）有意无意中，颜雅清做了一件挑战自我的事情，她的这种勇于尝试、敢于挑战自我的精神为她今后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异彩埋下了精彩的伏笔。

除了获取知识，颜雅清还深受学校一直崇尚的女权主义理想的浸淫。史密斯女子学院的创办者很早就认识到，女子受教育的程度与世界秩序和社会公平的改善有着直接的联系。该校自创建以来，一直以培养社会精英，为社会培育大量的、有用的女性人才为己任。颜雅清早在就读中西女中时就受到这些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而此时，她对这些思想理解和感悟得更加深刻了。正是这种追求女性自由解放的理想推动着颜雅清在不远的将来为了国人的利益而去尝试冒险和挑战。

1924年，颜雅清的父亲完成了在哈佛的进修准备回国，雅清不得不提前结束在史密斯女子学院的学习。这一次，颜福庆也没有立即归国，而是带着家人远赴欧洲，对欧洲的医学教育情况进行考察。当父亲在各国首都的医学院进行考察时，雅清也尽情领略当地的风土人情。

颜雅清一家人终于回到了在长沙的家。回国后，颜福庆将他学到的新知识、新思想运用到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教学管理中。回国后的颜雅清急于完成大学学业，她马不停蹄地注册进入雅礼会在长沙创办的雅礼大学进行学习。（章末注5）怎奈当时中国政局动荡，雅礼大学的学习环境与史密斯女子学院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一直到1925年6月毕业，颜雅清也因被无情卷入政治风波和学潮而不得安宁。

就在颜雅清临近毕业前，上海公共租界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中共迅速组织了上海全市的罢工、罢市、罢课，一时风潮影响到湖南，激进的学生们立刻行动起来。湘雅的学生也在6月初罢课两天，作为响应。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由来已久，而“五卅惨案”的发生将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推向高潮，并最终引发了北伐战争。在这场反帝运动中，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

等要求深入人心，成为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向往。1926年7月，北伐军进攻长沙。长沙城内人心浮动，长沙的学生联合会召开紧急会议，表决以何种行动声援北伐。表决的结果，除了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代表外，一致同意应擒贼先擒王，处罚洋人就要惩治其中的要人，洋人中声望越高的则应惩办越重。根据这一精神，学生联合会当场决定，长沙的头号惩治对象是湘雅医院的院长胡美！要连夜将他抓住，在黎明时分枪决！

努力在湖南工作了20年的胡美，此时命悬一线！幸亏颜雅清得知了消息，她及时通知了胡美。

美国医生爱德华·休姆（Edward H. Hume），1905年接受雅礼会的邀请，漂洋过海来到长沙，开始了他“创办一所新型的医科大学”的事业。他给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名字“胡美”，从此以此名为中国人所知。1906年11月，他在长沙市小西门西牌楼正式开办了湖南第一家西医医院——雅礼医院，后又于1911年11月在雅礼医院开办了湖南省最早的护士职业学校——雅礼护病学校。从雅礼医院共事到共同创办湘雅医学专门学校，胡美与颜福庆并肩奋斗多年。在胡美眼中，老同事的女儿是“一个很迷人的女孩，学校里最有天分的学生之一”，她还是一个非常值得依赖的人。在千钧一发之际，雅清前来报信，胡美对她的话深信不疑，明白自己的处境十分危险。由于颜雅清报信及时，加上颜福庆的帮助，胡美得以采取紧急措施，将湘雅所有外籍教师、医生严密保护起来。第二天，他还将学生的家长们请到学校来，劝说学生们放弃围攻湘雅捉拿外籍人士的计划。这才将事态暂时控制住。（章末注6）

在回忆录中，胡美博士描述了此次学生闹事后仅一周举行的毕业典礼。他回忆道：“在我颁发毕业证时，我一眼就望见了那位前来向我报信的漂亮小女生。当她鞠躬并从我手中接过毕业证时，一丝笑意漾起在她的脸上。”（章末注7）

值得一提的是，颜雅清大学毕业时只有19岁。她获得了心理学学士学位，仅用3年时间就读完了4年的大学课程。颜雅清成绩优异，心理学获6个学分，社会学、化学和生理学各3个学分。她

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湘雅医院的住院处兼职，她学以致用，如她所说，是在“下班或午饭时间所做的一份小小的义工”（章末注8）。她发现，她很享受助人的快乐。

不过，在她开始工作后没多久，长沙的政治形势恶化，所有的外籍人士纷纷撤离长沙。十多年来与外国人合作办学行医，颜福庆与外国人的交情自不必说，出于安全考虑，他也带着妻儿逃离长沙，去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在协和医学院任副院长期间，颜福庆深感外国人把持学校大权的弊端，决心要创办一所由中国人自己办的医学院。于是，协和一年聘期未到，颜福庆就回到了故乡上海，全身心投入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上海医科大学前身）^①的建设。

对颜雅清来说，她很高兴回到上海这个富有活力的大城市，她的许多朋友，不管是外国圈子的，还是中国圈子的，都热忱地欢迎她的归来。此时的她，已经接受了国内外的良好教育，无论学识还是谈吐举止，都堪称大家风范了。每次露面，都见她一身简洁优雅的打扮，虽然久居国外，但她依旧对旗袍情有独钟，那一身旗袍裹在身上，更勾勒出她曼妙的身材，烘托出她典雅而时尚的气质。有时她会佩戴一些首饰，通常是珠宝玉器之类，但有时她也会什么饰物也不戴。她天生丽质，不需要那些东西来装扮。在上海这个美女如云的城市，她是个公认的美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多少男人为她倾倒沉迷！她秀外而慧中，其聪颖才情和魄力胆识更是女中翘楚，令人激赏。

但是，在沉着冷静的外表和雍雅的气度下，是她内在的激情和一颗不安于现状的心。她渴望继承家族的优良传统，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不过，她随后做了一件其他同龄女子所做的事：她嫁人了。

^① 颜福庆于1927年10月组建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并任第一任院长。1928年，医学院先后改名为江苏大学医学院、中央大学医学院，1932年9月改为独立学院，称国立上海医学院，1952年改名为上海第一医学院，1985年5月改为现名上海医科大学。——译注

1927年6月2日，颜雅清的婚礼盛大举行，新郎名叫陈炳章，是孔祥熙的英文秘书。这是一桩包办婚姻，父亲颜福庆认为，陈炳章各方面条件优越，是颜家的乘龙佳婿。

陈炳章，1899年10月22日出生，祖籍厦门，学养深厚，成就不凡。192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政治学专业，获文学学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1923年赴美深造。

1924年，获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之后，作为普林斯顿研究员又留校学习了一年。1925年，获耶鲁大学史德林奖学金（Sterling Scholarship），进入该校攻读。在耶鲁期间，曾任美国中国学生联谊会会长。1927年，陈炳章学成归国，任上海国立暨南大学政治系主任兼教授，后兼任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英语副教授。不仅如此，1928年—1931年，他还担任英文报刊《密勒氏评论报》（China Weekly Review）^①和《中国评论周报》（The China Critic）^②的特约编辑。

陈炳章乃一介文人，温文尔雅，谨言慎行。颜福庆认为，这些



颜雅清小照，摄于40年代。

飞天名媛

1927年6月2日

① 《密勒氏评论报》，美国人在上海办的具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色彩的英文周报。1917年6月创刊，创办人为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驻远东记者密勒（T. F. Millard），原英文刊名为 Millard's Review，1919年，《密勒氏评论报》由美国人鲍威尔（John Bill Powell）接管，改名为 China Weekly Review，但中文刊名仍为《密勒氏评论报》。——译注

② 《中国评论周报》（The China Critic），民国时期归国留学生主持的具有国际影响的英文杂志，创刊于1928年5月31日，由张歆海、桂中樞、潘光旦、陈钦仁等人发起。——译注

品性与女儿风风火火的个性非常互补。另外更重要的是，陈炳章是孔祥熙面前的红人，而颜福庆为了谋求自己理想的实现，自然也需要巴结孔祥熙这位政要。陈炳章本人对这桩婚事也十分满意，毕竟颜家在上海声名显赫，这对发展自己的事业大有裨益，而且颜家小姐美丽聪慧，气质高雅，才学不疏，实乃理想的良妻美眷。

在颜福庆的安排下，陈炳章与颜雅清很快成了婚，才子配佳人，一时成为上海滩上的佳话，小两口也成了上海社交界的名人。陈炳章为妻子的才貌双冠而沾沾自喜，而颜雅清也看好丈夫日后的飞黄腾达，并对他的成熟稳健欣赏有加。

颜雅清善于交际，是当时名震上海的英籍犹太富商维克多·沙逊爵士（Sir Victor Sassoon）的座上宾。沙逊在上海产业庞大，在外滩兴建多栋高楼大厦，其中最著名的是沙逊大厦（现和平饭店北楼），为当地上海的著名地标。沙逊还经常举办豪华聚会，邀请沪上名流及其夫人参加。传统上，中国人无论其社会地位多么尊贵，也很难进入外国人的上流社交圈，可能是因为沙逊本人是流亡贵族之故，他乐善好施，经常主动发起由中外名流参加的豪华聚会，所以，到1930年代初，种族间的社会融合在上海已经变得稀松平常了。陈炳章夫妇经常获邀出席这样的聚会。沙逊的搞怪是出了名的，他经常会搞些主题派对，让朋友们尽兴而归。有那么一次，他要求来宾打扮成学童出席，并告知席间会玩些小孩子们玩的游戏，比如说，手牵手、围着玫瑰丛绕圈子，还有抢椅子之类。让宾客们意想不到的，沙逊本人一副校长的威严打扮出场，头上戴着个学士帽，手中拿着根白桦树藤，然后用那根藤条鞭打那些淘气的“孩子”，逮谁打谁。那天晚上，颜雅清穿了一套学生装，外戴一顶漂亮的学生帽。不知那天晚上她有没有挨“校长”的打，但是据说她的那身打扮非常娇俏可爱。

陈炳章满腹经纶，能言善辩，文字功夫了得且富有政治头脑。1928年，他参与了《中国评论周报》（*The China Critic*）——一份由民国时期归国留学生主持的英文杂志——的创办，并担任特约编辑。与此同时，他还在美国人在沪经办的英文周报——《密勒氏评

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担任特约编辑。在担任两大英文报刊特约编辑期间,他因撰写多篇有关国家财税方面的学术、评论文章而名声大噪。此后,陈炳章官运亨通,仕途顺遂。1929年—1932年,历任广东、河北、江苏、安徽与山东各地的国家税务局稽查员;1932年—1933年,任国家税务行政管理局稽查员。1933年始,担任孔祥熙的私人秘书,并随孔转辗国民政府财政部、中央银行等要害部门,一时风光无限,仕途无量。

而此时,颜雅清也没有闲着。1928年7月18日,上海市气温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不少卖苦力的劳工因酷暑而昏倒街头。就在这种闷热难耐的天气中,颜雅清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孩子,一个男孩。夫妻俩给小宝宝取英文名威廉(William),中文名国伟。

在丈夫平步青云之时,颜雅清也参加了几个女界社团组织,包括全国儿童福利会以及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章末注9)女子社团在当时还是个新生事物,最初由生活在上海的外国女性所发起创立。受传统礼俗影响,中国女子婚后主要是操持家务、相夫教子,很少再抛头露面,参与社会活动。不过,随着女界知识分子、女中豪杰的涌现,到1920年代,一大批上海新女性突破传统,加入女子社团,用自己的知识服务社会。这些社团经常组织募捐活动,所募集款项用来创办女学、救助孤儿以及支援革命事业。颜雅清曾参与这些活动的召集工作,并代表所在社团,给医院捐赠床位,向当地学校捐赠课桌椅,造福成百上千学童。

颜雅清还曾担任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of Shanghai)干事。1930年代,女青年会因积极开办女工夜校,为社会最底层的妇女提供受教育的机会而引领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风潮。不过,女青年会的开明之举也招致了保守派的抵制,他们批判女青年会是激进主义的温床,其试图唤醒那些受压迫女性的自尊和自我意识的举动是有罪的。正因为如此,保守派怀疑女青年会是借夜校之名搞共产主义运动。虽然女青年会最初以传道方式教识字,到后来教《千字课》识字为主,并非传授红色思想,但是确实有一些在夜校读过书的女工加入了共产党并成为工人运动

中的骨干，江青，毛泽东的第三任妻子，曾在该会开办的一所夜校里任教员。（章末注10）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江青后来成了“四人帮”的头头，而颜雅清的父亲颜福庆，这位德高望重的中国西医泰斗，在“文革”期间被打成牛鬼蛇神，最终含冤去世。对于外界的质疑和责难，颜雅清不予理会。她像父辈们一样，对任何政治团体都不感兴趣，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她所关心的是服务社会，造福人民。

在儿子出生大约四年后，陈炳章夫妇迎来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女儿国凤，这一天是1932年4月10日。之后没多久，陈炳章出任财政部长孔祥熙的私人秘书。孔祥熙何许人也？四大家族孔家的代表人物，因与蒋介石结为连襟而权倾一时。能给这位“皇亲国戚”当秘书，自然是风头无两，令人艳羡（章末注11）。



颜雅清全家福。后排左起：儿子陈国伟、弟弟颜瑞清、妹妹颜湘清、颜雅清、弟弟颜我清；前排左起：母亲曹秀英、父亲颜福庆、女儿陈国凤。

颜雅清身边的男人们，包括她的父亲、伯父，还有她的丈夫，都是干大事的人。当丈夫在财政部履职以谋求更大发展时，父亲颜福庆已经因成功创办中国人自己的大学医学院——上海医学院——而名冠中华（章末注12）。就在同期，1933年1月，伯父颜惠庆被

任命为驻苏大使，成为外交界一言九鼎的人物。中苏于1929年7月因张学良武力接管中东铁路而断交，断交致两国边境发生武装冲突。1932年2月，颜惠庆作为中国首席代表出席国际裁军会议，并以裁军会议为掩护与苏联外长李维诺夫就两国复交展开秘密谈判。经过长达10个月的反复磋商，中苏两国正式复交。颜惠庆为中苏复交可谓立下了汗马功劳，国民政府亦对他的功绩予以大力褒扬。

在那段时间里，颜雅清忙忙碌碌，毫不清闲，除了操持家务，尽贤妻良母之职，她还积极参加女子社团的活动，活跃在上流社交界，日子虽然充实，但似乎没那么有意义，这让颜雅清心绪不宁。从小受家庭环境的影响，颜雅清聪慧而果敢，心性高远的她觉得自己可以做更大的事情，承担更多的责任。而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侵略中国东北，1932年，日军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侵略者的暴行激起了颜雅清心中强烈的憎恨和愤慨。一直心怀报国之志的她对进入外交圈产生了浓厚兴趣，当时，她的许多朋友都被派驻欧洲各国从事外交工作。颜雅清想，跻身外交界，她的理想和抱负就有望实现了。有伯父颜惠庆支持，她的这个愿望应该不难达成。

注释

1 颜雅清对自己的出生日期不以为然，当需要提供这一资料时，她给出的答案也是版本不同，前后不一的。据她的外孙说，颜在1960年代未曾提到，她翻阅了一本参考书，得知自己出生于阳历1月17日，此后她的家人就在那天为她庆生，一直到她去世。虽然她从未提起自己的出生年份，但她儿子在她的墓碑上刻上了“1904年”。颜雅清的死亡证明上写着她的出生日期是1905年11月29日。颜在不同场合习惯将自己的年龄少报5岁到10岁。

2 当时，颜家是中国唯一一个所有家庭成员都接受过国外教育的家庭。这也包括颜氏兄弟的妹妹颜庆莲。她曾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斯汤顿(Staunton)的弗吉尼亚女子学院(Virginia Female Institute)就读研究生课程，并于1904年左右毕业。

3 来自上海的两位女生分别是韩琼(Quong Han, 音译)和李永英



(Yong-hing Lee, 音译)。拉伊学校后来改名为拉伊日校 (Rye Country Day School)。巧合的是, 拉伊是日后与美国著名女飞行家艾米莉娅·埃尔哈特 (Amelia Earhart) 结为夫妻的乔治·帕特南 (George Putnam) 的出生地。颜雅清曾被誉为“中国的艾米莉娅·埃尔哈特”。

4 “Connecticut Girls Take Part in College Affairs”, *Hartford Courant*, March 19, 1923.

5 美国康涅狄格州政府准许雅礼大学授予毕业生学位。颜雅清回国后进入雅礼大学就读时机非常幸运, 因为该校自1922年才开始招收女生, 而3年后, 由于宿舍问题得不到解决, 学校不得不停止招收女生。直到1928年, 雅礼大学收到社会捐助建造了一栋女生宿舍之后才开始重新招收女生。1926年, 也就是颜雅清毕业后的次年, 雅礼大学因学生发起的反对教会学校一些做法的非宗教运动以及北伐革命军攻入长沙、不少外籍教师被驱逐而暂时停办。

6 Edward H. Hume, *Doctors East Doctors West: An American Physician's Life in China*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Inc., 1946), 265-266.

7 同上, 266页。到1927年, 鉴于时局动荡, 外籍人士处境日益危险, 所有的美国人撤离了雅礼和湖南。

8 参见1955年3月20日颜雅清写给纽黑文“雅礼会”(Yale-in-China) 档案秘书雷切尔·道德 (Rachel A. Dowd) 的信; 颜雅清1950年—1956年有关资料; 1901年—1975年“雅礼会”有关资料; 耶鲁大学图书馆手稿和档案部“雅礼会”有关史料。颜雅清在雅礼大学的老师分别是: 伍德布里奇·宾汉姆博士 (Dr. Woodbridge Bingham)、莱斯特·沃克先生 (Mr. C. Lester Walker)、系主任威廉·黑尔牧师 (Rev. William J. Hail)、丹尼尔·桑德福特先生 (Mr. Daniel S. Sandford)、肯尼思·罗斯博士 (Dr. Kenneth Rose)、弗朗西斯·哈金斯 (Francis S. Hutchins) 博士。参见耶鲁大学“雅礼会”行政秘书乔治·威尔 (George D. Vaill) 于1955年3月29日写给颜雅清的信。

9 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常被外界批评过于高调排外, 该机构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19年, 时任北洋军阀政府外交总长的王正廷 (后出任南京国民政府驻美大使) 为接待来华的某亲善使团而组织成立了一个妇女委员会。到了1930年代, 该联合会已发展成为一个改善社会福利、提升国民意识的激进组织。该机构与上海20来个中外妇女组织一道, 共同发起改善

民生的运动。抗战期间，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积极参与抗战救亡运动，救护伤兵，赈济难民。

10 1930年代中期，江青这位小有名气的影星迁居上海，并经人介绍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YWCA）开办的一个女工夜校里当教员，教授女工唱歌、表演和阅读。1934年，江青被怀疑是赤色分子而被捕，据说江被关押一个月后，由女青年会出面保释出狱。

11 孔祥熙一度被人们认为是那个时代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他与宋霭龄结为秦晋之好从而与孙中山、蒋介石成了连襟，从此在政坛商界呼风唤雨，权倾一时。尽管孔头脑聪慧，善于经营，但仍有人认为他不善理财，无法胜任财政部长一职，因此国民政府财政部可能由他的私人秘书陈炳章所把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战后，陈炳章对他的上司据说在一个虚报的公债项目中营私舞弊的行为展开个人调查，结果发现孔多处违规。这些情况虽有上报蒋介石，但由于蒋的庇护，孔家贪污蠹国的丑行一直未曾得到彻查和应有的惩处。

12 1932年，国立上海医学院遭日军炮火轰炸，部分校舍被毁，学生暂时迁至圣约翰大学上课，颜福庆再次从头开始，为重建校园而夜以继日地工作。当时政府为学校重建仅拨款16万元，而实际费用高达100万。颜福庆不辞劳苦，四处奔波，并最终解决了资金缺口问题。

飞天名媛

2024.11.27 10:10:15

3. 苏联的新生活

中苏关系曾一度恶化，1929年两国断交，到1932年复交，颜惠庆从中积极斡旋，做了大量工作，为此赢得了许多赞誉，但是长时间的艰苦谈判，颜惠庆也累倒了。

颜惠庆后来虽然身体康复，但是考虑到医生的建议，心生去意，而这期间中苏两国就商贸关系和互不侵犯的条约谈判因多方掣肘未获成功，颜不满南京当局对苏交涉不力去意已决，但请辞未获批准。当时中苏虽已复交，但两国关系仍未有重大改善，一些双边利益问题亟待解决，国民政府自然希望留住颜惠庆来稳定局面。1933年底，颜惠庆告病回天津休养，期间，曾两次南下谒蒋，蒋力劝其返苏，终于1935年2月启程续职。但是，事情的发展并非如人所愿。1930年代的苏联正遭受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食物短缺，重要物资匮乏，而斯大林为了铲除异己发动的“大清洗”运动更是给这个国家带来一场空前的政治浩劫。深夜可怕的敲门声，老朋友和熟人相继被捕入狱或处决，还有不知何时何地自己也成为刀下鬼的那种恐惧，笼罩在莫斯科，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虽然在苏外交人员享有豁免权，但是其生活还是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风波的影响。

情况更糟的是，1935年颜惠庆返苏续职时，不知何故颜的妻子没有陪同前往。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官，有妻子相携相伴、各司其职是十分重要的。而妻子未能随行显然也会令颜惠庆的这次履职更加煎熬。

1935年2月16日，颜惠庆乘火车从南京抵达上海，准备向亲人辞行，然后返苏。堂弟颜福庆和侄女颜雅清前来站台接站（章末注1）。一家人见面分外亲切。颜惠庆了解侄女的志向，他有一个重要的提议。他在苏的官邸需要一位女主人，而他知道雅清也有意投身外交圈。如果她能陪自己返苏，岂不两全齐美？他警告雅清说，这可不是举办宴会、招待宾客那么简单，在未来的一两年内，她要随时待命与他这位伯父外出公干。随后，伯父话锋一转，称如果她愿意接受挑战的话，这一经历将为她步入外交圈打下坚实的基础。另外，她有机会见到那些欧洲政要，这样的机会可是千载难逢的。颜惠庆要侄女第二天答复他。

次日，颜雅清宣布，她决定陪同伯父前往苏联。颜雅清决定离开丈夫和两个年幼的孩子那么长时间，这本身就说明了她的急切地想逃离她当时的生活。西伯利亚那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吸引着她，在她眼里，那就是自由的象征，她渴望自由，她不甘于当个家庭主妇，她不甘于平庸。当然，也有人反对她的这个决定，就连她的伯母，颜惠庆的妻子，也极力劝阻，但是最终，谁也没能说服倔强的雅清（章末注2）。随后，仅用三天，颜雅清就收拾妥当，准备启程。近代上海最早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North-China Daily News）曾就此刊登消息，称“颜雅清是第一位不以外交官夫人身份而入主大使馆的中国女子，作为中国驻苏‘第一夫人’，颜雅清女士定能以其一贯的出类拔萃和优雅魅力不负重任”。（章末注



From a portrait by Miss Davis Montagu Bell

MRS. F. T. CHEN

A prominent member of Sino-foreign circles, in Shanghai. Mrs. Chen, who is the daughter of Dr. and Mrs. F. C. Yen, left for Moscow in February with her uncle Dr. W. W. Yen, Chinese Ambassador to Moscow. Mrs. Chen is acting as official hostess to the Legation there.

1935年5月22日刊登在《字林西报》^①（North-China Daily News）上的颜雅清画像。

^① 《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原名《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创于1850年，1951年停刊，被称为是中国最早的、最有影响的一份英文报纸。——译注

3) 社会对颜雅清赴苏的赞誉和褒扬，从此可见一斑。

颜惠庆知道，此次远行，雅清的“出类拔萃和优雅魅力”对他十分必要。此次返任，他将携中国文化界访苏代表团随行，代表团一行40来人，为首的是京剧大师梅兰芳和影星胡蝶。

早在梅兰芳访苏前，很多苏联人，尤其是艺术家就对梅兰芳慕名已久。1935年二三月间，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邀请，梅兰芳率剧团演职人员一行约25人赴苏联演出。而同期，苏联为纪念其电影事业成立15周年，在莫斯科举行国际电影展览会，邀请各国选派电影代表团参加。胡蝶当时是中国最红的影星，自然是苏联影展大会邀请人选，其他几位中国电影界的代表也一同前往。（章末注4）这些中国文化界的精英们希望在苏联宣扬中国国粹，加强中苏两国的文化交流。

与这些文化界名流同行的还有一位大人物，这就是要返苏回任的颜惠庆大使。他将携私人医生、几名大使馆工作人员以及侄女颜雅清返回莫斯科。（章末注5）

1935年2月20日，颜雅清和伯父以及文化界访苏代表团一行登上了苏方专门派来迎接梅剧团的大轮“北方号”，专轮将驶往海參崴，然后换乘西伯利亚特快列车直达莫斯科。

启程的那一天，天气异常阴冷，女人们都裹上了毛皮大衣，虽然寒风凛冽，但是前来码头送行的各界民众多如潮涌，上海市方面甚至出动警察来维持秩序。前来送行的亲朋好友，包括颜雅清的丈夫和父母，把“北方号”的甲板挤得水泄不通，大家莫不期望代表团此行圆满成功。一阵寒暄话别之后，船准备起锚了，送客们赶紧下了船，挥手高喊着再见。大船驶离码头，颜雅清的新生活开始了。当船漫游在黄浦江上时，颜雅清有种恍惚之感，就在几天前，



影星胡蝶准备登船与颜惠庆大使及其侄女颜雅清赴苏（《电影画报》，第23期）。



《中国画报》(*China illustrated*) 创刊号,《中国画报》为驻日内瓦的中国国际图书馆(Bibliothèque Sino-Internationale)刊发的简讯,创刊号主要介绍了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以及影星胡蝶一行访苏的情况。

飞天名媛

Stories of hawthorn

她还盛装与丈夫在中国妇女会的舞会上翩翩起舞。

经过近一周的航行,“北方号”在雾霏茫茫中抵达苏联远东城市海参崴。此时大家已颇感疲惫,而海参崴的破败之相也让一行人心情有些沮丧,不过代表团受到热烈的欢迎。苏联国家乐剧协会特派专员、海参崴地方当局代表以及中国领事馆代表早已等候在码头。在之后的数天,中国代表团受到各方的盛情款待。代表团在海参崴逗留了几日,在这期间,颜雅清随伯父与当地领事官员走访了西伯利亚城市哈巴罗

夫斯克(Khabarovsk)和赤塔(Chita)。几天后,他们与访苏代表团一道登上了开往首都莫斯科的西伯利亚特快列车。(章末注6)

3月12日,列车驶进莫斯科的雅罗斯拉夫斯基车站。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代办吴南如前来接站,一起等候的还有大批苏联媒体记者。当中国代表团成员走下列车时,记者们蜂拥而上,镁光灯闪个不停,其场景之热烈着实令人难忘。梅兰芳是苏方媒体追逐的对象。为迎接梅兰芳的到来,苏方早前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造势,他被苏联新闻界称为“伟大的中国艺术的伟大代表”。写有“梅兰芳”几个大字的中国宣传画以及梅兰芳的戏装照片在莫斯科街头随处可见。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编印了介绍梅兰芳与中国戏剧的小册子,广为散发,几近莫斯科人手一份。犹如当年出访日本和美国时一样,当地掀起了一股“梅兰芳热”。

颜雅清和伯父坐上了豪华专车,驶往大使馆官邸。同年年初,另一位到访莫斯科的重要人物也享受了同样的礼遇,乘坐同一部

车。在描述乘车在街道上穿行时，他这样写道：“要照我们的标准来看，许多人都穿着清一色而且破旧的衣裳，看上去营养不良，个个面无笑容，只顾着低头走路。天气、街道还有路上的行人，这一切都显得是那么的灰暗和阴郁，而且永远都是一个样。”（章末注7）

颜雅清对于苏维埃首都的第一印象恐怕莫过如此，但是当她抵达她在苏联的家——中国大使馆——时，她又变得欢欣雀跃了。这是一栋颇为气派的建筑，前主人是大革命时逃离俄国的一位贵族。如今作为中国大使馆的这栋洋房坐落在一条景色怡人、绿树成荫的大街上，而且刚刚装葺一新。为了体现中国文化特色，使馆内部新近配备了一批具有中国艺术风格的高档物品，包括毛绒地毯、瓷器、灯具以及红木家具等。使馆内有几个厅房，非常适合举办大型宴会之用，其中一个客厅足以容纳160人。颜雅清和伯父都觉得这个厅是举办一场京剧演出的理想之地，主意打定后，搭建舞台的工作即着手展开。

颜雅清到达莫斯科整好一个星期后，期盼的时刻终于到来了，这一天她正式扮演了一回大使馆女主人的角色。她跟随在伯父左右，热情地招待前来观看表演的贵客。19日下午5点，梅兰芳的首场演出在大使馆的客厅里举行，前来观看的有政府要人、外交高官、苏联著名文学家、剧作家、电影导演以及新闻记者近两百人。颜雅清和伯父一一招呼客人落座并奉上茶点。木雕戏楼和绣花丝绸幕布令舞台布景赏心悦目，不过，梅兰芳和剧团的表演更让人耳目一新、拍案叫绝。

在大使馆上演的首场剧目《刺虎》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巨大成功，在苏维埃首都引起轰动，苏联的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梅兰芳华丽的舞台布景和戏装以及新奇的音乐和剧情，梅兰芳和中国京剧一时成为当地民众街谈巷议的话题。3月23日晚，梅兰芳的第一场正式演出在莫斯科高尔基大街的音乐堂隆重举行。这一天，音乐堂装饰一新，舞台两侧悬挂着中苏两国国旗，黄缎制成的幕布绣有“梅兰芳”三个大字，格外醒目。幕后是宫殿式的布景，华丽多彩。梅兰

芳和剧团人员在如雷鸣般的掌声中登台，上演了《汾河湾》、《嫁妹》、《青石山》、《刺虎》等剧目。每场戏结束后，他们都要在观众的欢呼声中数次谢幕才能下场。在此后的十多天，剧院场场爆满，一票难求。一大批戏剧界、文学界的巨头也前来观看演出，其中包括苏联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Prokofiev）、旅居苏联的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Brecht）、苏联文学巨匠高尔基以及被誉为“苏联电影艺术最卓越代表”的著名电影导演爱森斯坦（Eisenstein）。他们都盛赞梅兰芳的表演艺术，并将梅氏表演艺术和中国戏曲艺术自觉不自觉地融入到了其日后的艺术创作中。

在那些天，颜雅清和伯父以及各国外交官们坐在剧院的包厢里，无比自豪地欣赏着梅兰芳的每一场演出。每晚演出结束后，他们在大使馆摆宴设席招待各国外交官。正是在这些宴会上，在觥筹交错中，颜雅清扮演了一个合格的使馆女主人形象。她天生的交际能力在这种大场合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影星胡蝶也出席了这些宴会，并在宴会上展风采。尽管胡蝶并非票友，而且事实上她在苏联期间也没有公开表演，但是她多次在使馆的宴会上献唱，据称曲目还是梅兰芳在旅途中亲授。她有板有眼的架势，唬得那帮洋外交官们一愣一愣的。那段时间，莫斯科正举行国际电影展览会，胡蝶主演的影片也被列为放映单元。（章末注8）

3月底，梅剧团结束在莫斯科的演出，启程赴列宁格勒。颜雅清和伯父终于可以缓口气了，不过，他们几乎没有喘息的时间，因为两位大人物此时来到了莫斯科，准备与苏方展开高层会谈。他们就是英国掌玺大臣安东尼·艾登爵士（Sir Anthony Eden，后出任英国首相）以及法国外长皮埃尔·赖伐尔（Pierre Laval，后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和维希政府中三次出任总理，1945年被巴黎高等法院以叛国罪处死）。就在头一年的夏天，阿道夫·希特勒成为德国元首，上台后的希特勒采取了一系列重整军备的措施，公开违反凡尔赛和约，引起西方国家的强烈反应。此次，艾登爵士和赖伐尔正是代表各自国家的利益，与苏方领导人交换对战争形势的看法。两位政要在莫斯科逗留的一个月时间里，颜惠庆经常以私人身份邀请他们到

大使馆做客。颜大使喜欢高谈阔论，待客会友。他总是穿着剪裁讲究的英国粗花呢西服，戴着一副闪着光的角质架眼镜，嘴上叼个长烟斗。与贵客交谈时，他会时不时地用烟斗敲下桌面示意，而这时颜雅清就会款款地为客人倒上茶，奉上茶点，有时她也会插几句，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伯父与侄女配合默契，让客人宾至如归。

到了4月底，颜雅清和伯父稍微轻闲了点，于是他们一起游览了苏联的许多风景名胜，包括画廊、博物馆、剧院，以及许多古老的东正教教堂。当时，许多教堂已经关闭，但是他们依然为那些巧夺天工、浑厚雄伟的建筑赞叹不已。他们徜徉于古玩店，淘到了不少宝贝：没落贵族典当的装帧精美的古籍、圣像画、瓷器、珠宝、油画以及其他小装饰品。到了晚上，他们想闲也闲不住，因为各国使馆轮流做东举办宴会。颜氏二人特别喜欢到美国驻苏大使蒲立德（W. C. Bullitt）府上做客，蒲立德总是招待二人看最新上映的美国电影。颜惠庆是个影迷，在上海时，他每周至少两次光顾影院。

在没有接待任务或是获邀到苏方外交官府上做客时，颜雅清会向主人虚心求教学习他们的语言，很快她就掌握了俄语。这对她如虎添翼，除了使馆的工作，她因此有机会见到苏方政要，包括最高领导人斯大林。

也许颜雅清的外交才于是受了伯父颜惠庆的影响。作为一名世界外交史上的风云人物，没有比他更胜任的导师了。伯父崇尚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反对闭关锁国的思想，以及其高超的外交手腕和治国之术，都对雅清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对于国际政治形势，颜惠庆曾愤怒地指出，“他们一直以来都抱着瓜分世界的企图，”“在世界的某个地方，人们可以安居乐业，而在另一个地方，冲突和灾难却在肆虐。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些问题上已给人类以前车之鉴，但帝国主义的野心不死，伟大的民主政治已经倒向它的另一面，而真正的民主主义却再次沉睡了。”（章末注9）

颜雅清完全认同伯父的观点，对于国际形势，她的看法越来越成熟了。

1935年5月4日，颜雅清领到了作为使馆工作人员两个月的薪水。尽管物质上她什么也不缺，但是对于这份劳动所得她备感欣慰。之前，她也曾努力工作并且挣过钱，但是现在这份薪水更有价值和意义：她能够自食其力了。6月中，当颜惠庆将一份新的使馆人员名单提交给外交部时，这其中就有颜雅清的名字。从此，她不再只是使馆的女主人，而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外交官了。（章末注10）6月17日，使馆代办吴南如为表庆祝举办了一场宴会。使馆外交人员也借此机会给即将赴欧洲的颜雅清送行。颜雅清先与朋友在欧洲度假，然后赴日内瓦参加国联会议。

同年8月，颜惠庆收到外交部正式通知，责令其以中方首席代表身份出席9月9日至10月11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国联大会第16次常会。国际联盟于1920年正式宣告成立，其总部设在瑞士的日内瓦。自1920年6月29日中国加入国联以来，中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出席了历次会议。8月24日，颜雅清先期到达日内瓦，10天后，颜惠庆乘坐的列车也抵达了目的地。雅清前去接站，颜惠庆发现侄女一副兴高采烈、容光焕发的样子。颜雅清岂有不兴奋之理？作为历史上第一个旨在保障国际和平、促进国际合作的国际组织，她，一个狂热的理想主义者，如今有幸参与其中了。各国的会议代表陆续抵达，日内瓦湖畔聚集着他们的身影，不少代表身着民族服饰，整座城市因为他们的到来而显得生机盎然。国联盟约规定，通过集体安全、裁军、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措施，以保障会员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并规定对违背者实行经济制裁。这种奉行民主决议来推进全人类和平的做法正是颜雅清所梦想的。

在发给与会代表的通知中，中国代表团成员名单中就有“颜雅清女士”之名，其官衔是“技术顾问”（*conseiller technique*）。她也是中国代表团唯一的女性。她可不是来充当花瓶的，她将在大会分组会议上发表讲话。

9月19日，颜雅清在第一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作正式发言，第一委员会是国联的内设机构，其职权在于审理各国提出的一切司法

案件和议题。(章末注11)此次会议讨论世界范围内的妇女地位和权益问题，颜雅清就中国妇女权益发表了意见和看法，她如是说道：“中国是公认的文明古国，但同时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守旧的国家之一。”

在干练优雅、洋洋洒洒的发言中，颜雅清指出，关于中国陈腐守旧之说不尽正确、偏颇的。早在1927年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提出了保障妇女平等权利、提高妇女地位的倡议，根据倡议，有关法案已于五年前颁布实施。关于妇女平等权利的法案主要基于四个方面：性别平等、妇女拥有平等继承权、妇女享有婚姻自主权、男女同工同酬。颜雅清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欧美那些貌似更民主的国家其实并没有为他们的的女性公民提供有关的司法保障，因此，她本人向西方的男士们提出忠告。她警告说，请自觉自愿地、高高兴兴地从法律上落实妇女权益保障问题，否则，女人们将会夺取属于她们的权利。(章末注12)颜雅清还建议，国联应将妇女权益这一重要问题正式提上议事日程。她率直的发言成为远东媒体的要闻。

“让全世界的妇女享有半边天，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报纸援引颜雅清在会上的发言说，“应该马上行动以来，改变目前糟糕的状况。”(章末注13)

关于颜雅清第一次在分组会议上的讲话，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是，此次讲话表明，她认真学习并领会了一代女杰、著名律师郑毓秀的有关思想，郑毓秀是女权运动的鼓吹者，之前曾代表中方出席国联大会，作为南京国民政府民法起草委员会的一员，正是她起草了关于中国妇女平等权利的法案。(章末注14)二是，通过这次讲话，颜雅清在公开场合就热点难点问题发表演说的出色能力获得一致认可。作为首次出席国联大会并致辞的中国代表，颜雅清那富有见地的发言和独特的个人魅力，给与会代表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国联大会正式结束前，颜惠庆提前离会赴法兰克福出席另一个会议，这一次颜雅清没有随伯父前往，而是留下继续完成她在国联大会上的使命。10月6日，她随中方高级代表胡世泽一同出席了

国联全体大会。(章末注 15) 胡世泽风度翩翩，与颜雅清有不少共同之处。胡世泽与颜惠庆既是同事又是旧交，其青年时代在俄罗斯沙皇统治下度过，因而对社会主义的苏联政权和人民很有感情。胡世泽还能说一口流利的俄罗斯方言。胡世泽的女儿在关于他父亲的传记中曾回忆说，父亲精通俄语“有时也不好。有一次他和朋友颜惠庆在日内瓦的剧院看戏，听到坐在他们后排的一位俄罗斯女人对同伴小声说，‘我喜欢中国男人，但是这两位是我见过的最丑的两个。’父亲当然听懂了这句方言，待中场休息时，他见那个女人掏出一根烟便走上前帮忙点燃，然后很不客气地用地道的俄罗斯方言回敬了对方。”(章末注 16)

胡世泽是个喜欢和女人交际的男人，对于可爱的女士颇有鉴赏力；颜雅清能有机会与其共同出席国联全体大会，这可能也说明胡世泽对颜雅清出众的才貌十分欣赏。

颜雅清于 10 月底返苏，此时颜惠庆已回到莫斯科，雅清发现伯父心绪不佳。一段时间以来，颜惠庆对在苏联开展外交工作越来越感到无奈和厌倦。年初，他偕梅兰芳和胡蝶等组成的中国文化界代表团访苏，其目的也是试图通过民间外交途径改善两国关系，不料，苏联却公然向伪满出售中东铁路，两国关系再度紧张，颜惠庆虽多方奔走，但已回天乏术。此次以中方首席代表身份出席国联全体大会，各大国在处理意大利出兵侵占埃塞俄比亚问题上的自保与绥靖，令颜惠庆对国联外交彻底失望。他打定主意等到来年春天，也就是在他天命之年时请辞。离任前，他决定再去一次巴黎和伦敦，就有关政治问题与两国代表作最后一次协商。圣诞节过后没多久，颜惠庆乘火车前往英法两国，1936 年新年时，颜雅清也匆匆赶到伦敦与伯父会合。

因为这将是离任前的最后一次公务出访，颜惠庆和侄女决定好好欣赏一下伦敦的风景名胜。游览期间，雅清帮伯父买了张新地毯，另外，他们还参观了是年在伦敦伯灵顿宫 (Burlington House) 举办的一场规模宏大的中国艺术品展。此次展览会由英国皇家学会 (Royal Academy) 赞助，中国政府首度将故宫国宝运到伦敦展出，

让西方人大开眼界欣赏到中国艺术珍品的极致。

此次中国艺术品展在西方世界引起极大关注，参观者络绎不绝，中国艺术珍品成为伦敦街谈巷议的话题。祖国的文化艺术在欧洲产生强烈反响让伯父和侄女俩倍感骄傲和自豪。

这次旅行对颜雅清来说也是一次自省。离开丈夫在国外生活了近一年，她愈发感觉这段婚姻是该结束了。她深切地感受到，她正在做她人生中最有意义、最令人



颜雅清小照，摄于1940年代上海。

兴奋的事情，以前家庭主妇的生活是那么的无趣无味。不过，尽管中国已经出台了保障妇女平等权利的法案，即颜雅清在国联分组会议上提到的有关法案，但是在那个年代的中国，离婚依然不是件很寻常的事情，特别是由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女方提出离婚，更是会遭人非议。颜惠庆对此颇为忧心，但是他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1936年3月8日，他给陈炳章的老板孔祥熙去了一封信，估计提到了陈氏夫妇婚姻面临破裂的问题。次日，他又致信外交部，恳请给颜雅清在国联秘书处安排一个职位。

此时颜雅清也通知家里人，自己将在伦敦办理有关离婚手续。这让颜雅清的父亲和丈夫大为光火，两人合发了一封电报质问颜惠庆，但颜大使对这桩濒临破裂的婚姻已经无能为力了。确实，当他收到这封发自上海的电报时，侄女显然已在离婚通知书上签字了。（章末注17）

4月份时，颜惠庆的健康状况告急，他住进了位于柏林的一家疗养院。经诊断，他患的是“神经衰弱”，显然是由于过度劳累、

环境不健康以及长期的焦虑所致。这些焦虑可能就包括对侄女和侄女婿未来命运的担忧，虽说小两口婚姻出现危机，但是颜惠庆对他们还是非常喜爱和欣赏的。离开柏林后，他又取道意大利，在梅拉诺（Merano）的山间休养了一些时日，然后返回国内。1936年6月，颜惠庆返抵上海，从此结束职业外交官生涯。

注释

1 颜惠庆，《颜惠庆日记》（上海市档案馆译，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1935年2月16日。

2 1935年2月19日，颜惠庆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他的妻子表示反对颜雅清随他赴苏。颜妻作出这番表示还是颇为出人意料的，因为她本人曾随自己作外交官的哥哥赴法学习和生活，旅居法国的那几年，颜妻学会了用法语交流和阅读，而她的海外学习生活经历也是颜惠庆考虑与之结为百年之好的原因之一。参见《颜惠庆日记》（1935年2月19日）。

3 “Charming Hostess,” *North-China Daily News*, February 19, 1935.

4 在1935年2月的莫斯科电影节上，由联华影业公司监制、蔡楚生导演的《渔光曲》（1934）荣膺“荣誉奖”，这是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中国影片。Choi Kai-kwong & Law Kar（编导：蔡继光、罗卡）。*Lai Man-wai: Father of Hong Kong Cinema*.（《香港电影之父黎民伟》DVD，长篇纪录片）。Hong Kong: Dragon Ray Motion Pictures, Ltd.（龙光影业有限公司），2001.

5 与颜惠庆大使随行前往莫斯科的人员有：颜惠庆的私人医生焦湘宗博士，中国电影代表团、明星影片公司经理周剑云夫妇，戏剧教育家、梅剧团访苏总顾问兼总指导张彭春先生，剧作家、梅剧团副指导余上沅先生，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人员吴康（音译），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代办吴南如的夫人，中国驻苏联总领事徐曾年（Hsu Tseng-nien，音译）的夫人，中国驻海参崴总领事田关池（Tien Kwan-chi，音译）及夫人。“Group of Prominent Chinese Departs for Russia via Vladivostock,” *China Weekly Review*, February 23, 1935.

6 中国文化界代表团访苏期间，惊闻国内最著名的影星阮玲玉于1935年3月8日自杀身亡。阮玲玉之死震惊沪上，各界人士上10万之众前往吊唁。不过阮玲玉之死也成就了随中国文化界代表团访苏的胡蝶，使

其毫无争议地成为中国一代影后。

7 Anthony Eden, *The Eden Memories: Facing the Dictators* (London: Cassell, 1962), 145.

8 参加莫斯科国际电影展的有胡蝶主演的影片《姊妹花》(胡蝶在剧中一人分饰两角)。

9 Yen Hui-Ch'ing (颜惠庆). *East-West Kaleidoscope, 1877—1946: An Autobiography*. (New York: St. John's University Press, 1974), 212—213.

10 颜惠庆,《颜惠庆日记》,1935年5月4日。

11 国联大会第16次常会第一委员会主席为来自荷兰的林堡(M. J. Limburg),参加第一委员会的中方代表有:国联大会中国代表郭泰祺、梁龙(候补)、刘锜(候补)、颜雅清(候补)。League of Nations, Assembly, *Minutes of the First Committee* (Geneva, 1935), 6.

12 同上,33—34.

13 “Women's Voice; Madam Hilda Yen Chen's Speech at Geneva,” *Hong Kong Telegraph*, September 20, 1935.

14 郑毓秀是女飞行家郑汉英的姑姑,也是女飞行家李霞卿的前夫郑白峰的姑姑。

15 出席1935年国联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有首席代表颜惠庆(中国驻苏联大使)、郭泰祺(中国驻英国大使)、胡世泽(中国驻瑞士特使、全权公使),秘书长胡世泽;其他候补成员、副代表、顾问团专家等一众20余人。League of Nations, Assembly, *Records, Index* (Geneva, 1935).

16 Mona Yung-ning Hoo, *Painting the Shadows: The Extraordinary Life of Victor Hoo* (London: Eldridge & Co., 1998), 33.

17 颜惠庆,《颜惠庆日记》,1936年3月8日、9日、15日。

4. 性奴役与国联

上海这座以骄奢淫逸而闻名的城市在1936年那个酷热的夏天也没有消停之意，到处依旧是莺歌燕舞，灯红酒绿。就好像有先知告诉他们，战争的阴霾将近，派对即将散场似的，这座糜烂之城的人们纵情享乐，其热情可谓前所未有。到处都在举办家庭聚会，庆祝亲朋回家或者为他们送行。在凉风习习的晚上，身着薄纱、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们挽着她们的男伴，在散发着香水味的、月光皎洁的花园里漫步，而仆人们一路小跑跟在他们身后，手捧银质托盘不时贴心地奉上茶点。为华裔好莱坞女影星黄柳霜举办的派对称得上是那个夏天上海最高级、最奢华的聚会。黄柳霜当时在上海度假，为这位名媛举办一场宴会自然是那些达官贵人、社会名流们满心欢喜的。

颜雅清也于那个夏天回到了上海。她改掉了婚后的称谓，不再随夫姓。就好像有根魔棒在她面前一挥，把她的婚姻挥走了，她一下子又变回了那个活泼快乐的颜雅清小姐。焕然一新的颜雅清随后参加了一系列聚会活动，先是身着一件华丽的黄绿色旗袍出席了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举行的花园派对，继而与父亲一道现身某盲人慈善晚会。她还独自一人出席了胡适俱乐部的年度会员派对，那晚她光彩照人，引来回头者无数。除此以外，她还为著名学者、文学家林语堂及其家人组织了一场送别宴会。颜雅清的前夫陈炳章也不甘寂寞，聚会应酬不断。虽然酷热难当，但是有人仍看到他先是在市中心的新雅粤菜馆招待两位女性朋友，随后又在南京路的一家餐馆

参加一个聚会。还有人瞧见他在国际饭店的摩天厅跳舞。颜雅清则是出席了为安茹伯爵（Count René d'Anjou）举行的一场豪华生日派对。

仲夏时，颜雅清正式宣布她在政府里谋得了一份工作，准备即刻前往南京赴任。于是乎，朋友们又展开了新一轮的派对活动为她庆祝送行。虽然这次就职意味着她又要离开家人，但是至少这一次要离家近得多了。南京距上海乘火车不过几小时路程，这样一来，她星期五晚上坐卧铺，第二天早上就到上海了。如果她想快点的话，她还可以选择乘坐中国航空公司的班机，该公司最近开通了两个城市之间的航班，飞行距离只需一个半小时。父母对她即将在离家不远的地方任职也表示满意。颜雅清的父亲颜福庆此时正为中山医院和医学院新校址而不辞辛劳，四处奔走募集资金。

此时，颜惠庆请辞驻苏大使已获准，他从此结束职业外交官生涯，回到天津家中一边经营实业，一边忙慈善。国民政府行政院任命蒋廷黻继任驻苏大使。颜雅清因为曾在驻苏大使馆工作而获邀出席了为蒋廷黻夫妇举办的盛大送别宴会（陈炳章和影星黄柳霜也作为嘉宾出席了告别宴），几周后，颜雅清与其他人一道在外滩码头为新任驻苏大使一行送行。同是那艘“北方号”大轮，同是曾经赴苏的告别场景，只是此时物是人非，站在甲板上，颜雅清思忖着她曾经历的快乐和忧伤，感慨这一年半多以来她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为了自由，她不惜一切，与家人起冲突，与丈夫分道扬镳。如今，她开始了新生活，开启了新的事业，她学会了轻松地游走于欧洲各国，也获得了与世界政坛上的大人物们接触的机会。

她不知道的是，当她站在码头上挥手作别时，她的生活和情感会因当天下午的一场活动而再次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1936年10月31日，这一天是蒋介石50大寿，全国到处都在大张旗鼓举行庆祝活动。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军国主义觊觎中国之心昭然若揭，战争形势不容乐观，而到了1936年蒋委员长大寿之际时，日本大规模侵华战争更是迫在眉睫，一触

即发。组建一支有效的空军力量成为当务之急，而普通百姓也逐渐开始关注空军防务。抗战当前，并且正值委员长大寿，国民政府发起了全国性质的献金购买飞机的运动。上海民众捐款热情高涨，所筹集的款项用来购买了 10 架新款的美国柯蒂斯公司生产的霍克三式战斗机（Curtiss Hawk 111）。正式的飞机交接仪式将在委员长生日前一周举行，虽然委员长本人不能亲自到场，但是献机命名仪式将在广大上海民众的见证下举行。

活动当天，十几万人涌向龙华机场，观看“上海市民献机命名仪式”暨飞行表演。机场旁边搭建了一个观礼台，彩旗飘扬，上海的达官显贵、商贾名流们齐聚观礼台上，这其中就有颜雅清和她母亲。

当天下午飞行表演的一个重头戏就是被誉为中国第一位女飞行员李霞卿的花式表演。当时李霞卿从美国波音航空学校毕业归国不久，在之前的 3 月份她曾在龙华机场举行过一次飞行表演并引起轰动，这是她第二次飞行表演，又一次引起轰动。在场观看了李霞卿特技飞行表演的年轻人无不为其的英勇气概所倾倒，无不心潮澎湃地想像李霞卿那样英姿飒爽、气盖云天。当李霞卿一个俯冲飞过观礼台时，颜雅清也毫不例外地被这一项危险而刺激的空中竞技所折服。她更明白，一支强大的空中力量对中国抵御外敌是极其重要的。

表演活动一结束，颜雅清就面见了李霞卿。两个女人早已相识，并且发现彼此有不少共同之处。她们都曾旅居日内瓦（当时李霞卿的丈夫在国联任秘书），都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而且生的都是一男一女。更让人吃惊的是，她俩不约而同先后与丈夫离了婚。她们都十分英勇、富有激情并且意志坚定，只要祖国需要，她们随时愿意付出一己之躯。

经过一系列密切磋商，两人想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创办一个飞行社或协会，使国人更加关注航空飞行事业，同时鼓励年轻女性步入这一领域。凡有志于献身蓝天、成为飞行员者，无论男女，均可入会。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里，颜雅清和李霞卿继续完善方案。

创办飞行社的出发点虽好，但两人也很现实。她们明白，没有雄厚的资金和实力作后盾，她们的计划很难实现。（章末注1）

虽然颜雅清立志学习飞行，但是当时她的事业发展得非常顺利，无法抽身来实现这个志愿。1937年1月，在妹妹颜湘清宣布即将与上海实业大亨、爱国民族资本家刘鸿生的儿子刘念仁（Franklin Lieu）结婚后不久，颜雅清也宣布了一个重大消息。她兴奋地透露，国民政府派遣她到国联中国代表团的一个专家顾问团任职。国民政府早先决定，增加中方代表团中专家顾问的人数，主要涉及六大研究领域，其中包括公共卫生。（章末注2）颜雅清被派到该专家顾问团任职，专门负责调查妇女儿童的非法定买卖问题。1920年代以来，国联一直致力于消除白人奴隶制度，但是奴隶贸易依然是个非常严峻的国际问题，特别是在远东地区，能够担此重任，颜雅清自然兴奋异常。在此之前，她曾在国际基督教女青年会（YWCA）和全国儿童福利会工作（后者为儿童慈善团体，总部设在上海胶州路），对有关妇女儿童问题比较了解。鉴于她在相关领域丰富的工作经验以及国际上的人脉资源，她是该职位最合适的人选。颜雅清估计，这次任命她又要离家一年。（章末注3）

为了不喧宾夺主，抢了妹妹婚嫁的风头，颜雅清在临行前才向家里人宣布这一消息。由于离沪在即，她不得不回绝一大帮朋友拟为她举行告别派对的好意。不过，她还是很高兴地参加了一位家里的老熟人——意大利“厄曼诺·卡罗图”（Ermanno Carlotto）号浅水炮舰舰长杰纳罗·西帕（Genaro Cioppa）——为她在炮舰上举办的私人庆祝午宴。在炮舰上举办宴会本来就非同寻常，更何况正值枯水季节，这艘满是武器装备的大船停泊在码头是多么显眼。（章末注4）与颜雅清一同出席午宴的还有她的朋友，上海著名时装设计师张倩英，其父是“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的张静江。

1月中旬，在一帮前来码头送行的朋友的祝福中，颜雅清登上了“芝巴德”（Tjibadak）号商船，这是一艘由爪哇驶往日本，途中经行中国的轮船，像上次赴苏联一样，这艘满载着颜雅清的希望

和梦想的大船再一次鸣响汽笛，沿着黄浦江上溯。上海当地一家报纸还专门就颜雅清此次赴任发表短评，称赞她具备成功者所需的一切素质。文章这样写道，“颜雅清小姐以其独特的个性和魅力，颠覆了智慧与美貌不可兼得之古理。没有谁比她更能胜任‘女大使’一职的了。”（章末注5）

再次奔赴自己所熟悉的那座城市日内瓦，再次踏上漂洋过海的漫长旅程，颜雅清此次神清气爽，怡然自得。这一次，她不仅能好好享受旅行的乐趣，而且还可以憧憬即将开始的新工作——俟抵达目的地，她差不多要即刻赶赴爪哇万隆（Bandoeng）出席国联的一个重要会议。根据1936年10月10日的一项决议，荷兰政府定于1937年2月2日至15日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西部城市万隆主办“东方国家中央政府关于打击贩卖妇女儿童会议”。（章末注6）参加此次会议的均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外交官员和代表，而颜雅清本人以中国政府派出的专家顾问和全国儿童福利会私人代表的双重身份出席。（章末注7）

颜雅清和同事们预订了万隆豪华型四星级酒店 Grand Preanger Hotel，这家酒店地理位置优越，坐落在该市的商务和金融区中心。酒店绿树环绕，棕榈成荫。不过，他们无法安享这异域风情的闲适，因为工作任务缠身。尽管中国当时已经宣布卖淫非法，但是在公共租界，卖淫嫖娼依然有禁不止，贩卖妇女儿童依旧盛行，而且已经渗透到非租界地区。在2月4日的讲话中，颜雅清提出，国联有必要任命一位联络官，就贩卖妇女儿童问题协调中国与这些租界地区的关系。为阐明问题的严重性，她还在次日提交了一份书面报告，以具体的数字说明在那些租界地非法买卖妇女和儿童的形势极其严峻。她表示，舞蹈学校、按摩院、土耳其浴室，甚至职业介绍所，都成了众所周知的卖淫场所，许多年轻女子被迫出卖肉体来维持生计。（章末注8）颜雅清在报告中特别提到，那些大量涌入中国的俄罗斯难民，有相当一部分沦为白奴。这些女人中的大部分注定要过堕落的一生，疾病缠身，英年早逝，但是，正如颜雅清所观察到的，这一悲剧并非不可避免。她指出，只要给这些人受教育或

者从事小买卖谋生的机会，她们就能够摆脱受奴役的命运。颜雅清敦促国联投资创办职业学校，成立救济站，提供商业贷款，以帮助这些不幸的年轻女子跳出火坑，走出困境。

到会议结束时，代表们已经收集了一长串动议清单，其中包括一个在中国设立一个专门的国联机构的建议，该机构的职能是“定期接收各国有关色情贩卖妇女儿童问题情况的报告，及时掌握有关动态。”（章末注9）关于这一专设机构的组织及运作，颜雅清很有可能作为主要倡议人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不过遗憾的是，会议结束后仅5个月，抗日战争爆发，大多数提案被束之高阁。

会议结束后，颜雅清与一同出席会议的同事——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秘书珍妮·贝莉·帕金斯（Jeanne Bayly Perkins）小姐——共游了巴厘岛。（章末注10）两人因为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工作而结识并成为朋友，紧张的会议之后，她们决定给自己放个假，轻松一下心情。她们先是遍游了巴厘岛，然后经水路和陆路开始了她们的欧亚非之旅。她们先是乘船抵达了斯里兰卡的首都科隆博（Colombo），然后来到印度大陆并在那里搭乘火车，开始了为期两周的火车之行，火车一路由东向西，沿途的每一处景点都留下了她们的足迹。到达终点站孟买时，两个女人登上了一艘向西驶往也门亚丁湾的船，船沿红海上溯，经苏伊士运河抵达开罗，在那里她们参观了恢弘壮观的金字塔。随后，她们启程赴地中海文明古国巴勒斯坦和希腊。

两人在意大利分道扬镳，帕金斯小姐乘船回美国，而颜雅清继续在意大利逗留，在那里她拜访了不少在外交界工作的意大利友人。颜雅清一向心怀世界，而这次漫长的旅行让她更是眼界大开，更增强了她对异国文化的热爱。（章末注11）她游览了西南部港市那不勒斯，沿海路上车水马龙，熙熙攘攘，马车、豪华轿车拥挤着踟蹰而行。在海边的露天市场上，龙虾物美价廉。在市里，邻近的维苏威火山山顶上升腾而起的白色蒸汽云清晰可见，这多少让人有些担心，而正是这种潜藏着危险的大自然的壮丽景色像磁石一样吸引着

颜雅清，让她看得如醉如痴。这座火山在1930年代活动极其频繁，但是在一位向导的陪同下，颜雅清大着胆子登上了离火山口很近的地方。几十年后，当颜雅清的小孙子在学校里进行一项有关火山的研究项目时，她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当年登上维苏威火山时那温馨的一幕：在快攀爬到山顶时，向导捡起一块温热的火山石，然后用一枚里拉硬币将岩石按压成一个烟灰缸，并将之作为礼物送给了她。

为调查了解意大利的儿童福利状况，颜雅清在罗马逗留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她一直没有忘记她的航空救国梦。正是在这段繁忙的时间里，她在利托里亚（Littoria）的机场上了平生头一堂正式的飞行课程。虽然在飞行教练布莱奥迪（Briondi）先生的指导下，颜雅清的飞行理论知识和飞行技巧还处在相对初级的水平，但是她会在罗马久留，这就让她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单飞驾机训练并考取飞行执照。意大利的飞行学习经验将为她不久后赴美进行深造打下良好的基础。

1937年4月，颜雅清暂居日内瓦，在妇女和儿童福利委员会的年度会议上作了报告，并特别提到万隆会议的有关决议。在这次会议上，妇女和儿童福利委员会进行了重组，成立了一个附属的常设委员会。中国派到该常设委员会的代表是颜雅清的朋友，也是她伯父颜惠庆的同事兼旧交胡世泽。胡世泽虽然文质彬彬，但却是外交界的老手，深谙国联事务。他总是以长辈的身份指导年轻同事如何规避国际政治中潜在的雷区。

不过，就在颜雅清在国外工作顺意之时，她的家人却在为她的终身大事而忧心。听说颜雅清有意再婚，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让父亲颜福庆不知所措，他连忙致电堂兄颜惠庆来家中商议此事。颜惠庆闻讯立即前往。当天晚上回到家，颜惠庆在他的日记中提及此事，不过没有谈到具体内容，日记中也没有提到准新郎的名字。结婚之事似乎是颜雅清一厢情愿。“事情很奇怪，”颜惠庆在日记中如是写道。（章末注12）不过，到最后什么事也没发生，也算没有枉费大家忧心一场。

而就在此事的一个月后，颜雅清和前夫陈炳章因工作关系共处了几周。乔治六世加冕礼定于1937年5月12日在伦敦举行，两人作为中国祝贺使团成员前往观礼。陈炳章担任使团秘书。除了观礼外，两人还有其他任务，即为颜雅清提出的中国经济重建五年计划寻求海外财政援助，而该计划陈炳章也参与其中。

中国此次派出的祝贺使团阵容庞大，为首的是陈炳章的顶头上司、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使团成员中还有23位权贵政要。（章末注13）为表示对此次观礼活动的重视，国民政府还在使团出发前对使团成员进行嘉奖，以彰显其尊贵身份。时任中央银行秘书的陈炳章也被授予五等中华民国采玉大勋章（Order of Brilliant Jade, Fifth Class）。

使团成员一到伦敦，就与来自其他国家的祝贺使团成员汇集一处，作为中国代表团非正式成员之一，颜雅清这次也受命前往英国，参加许多与加冕礼相关的特别庆祝活动。其中一项活动就是出席在白金汉宫举行的招待会，在这次华彩霓裳的招待会上，颜雅清穿了一件她的好朋友、著名时装设计师张倩英为她专门设计的旗袍。

尽管实际上只有十名中国使团成员可以获准进入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观看加冕礼，但是其他成员可在教堂外观看加冕礼时的盛大游行。（章末注14）幸运的是，他们所在的看台有顶篷遮阳，而且位置极佳，正对着白金汉宫，所以，没有正式观礼场合上的约束，他们更惬意、更自在。那天，天色有些灰蒙蒙的，颜雅清和其他使团成员们站在覆盖着英国国旗的看台上，目视着当新国王和王后坐在那辆金碧辉煌的马车上，从白金汉宫驶往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时游行开始的壮观场景。看完游行，使团成员们回到酒店，欢聚一堂，聆听电台有关加冕礼的实况转播。当听到加冕仪式接近尾声时，他们又赶紧跑回之前所在的看台，正好赶上看见加冕后的国王夫妇乘坐那辆镀金马车返回白金汉宫。

中国使团的成员们被眼前那童话般的、富丽堂皇的游行场景以及英国民众的热情所感染着，他们也像旁人一样欢呼雀跃呼喊。从

四面八方赶来观看游行的数百万民众有礼有序的举止也给使团成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是一次难忘的经历，颜雅清将永远铭记那一天的华彩辉煌，庆幸自己亲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注释

1 上海《玲珑》女性杂志，no. 291，(1937)，1908.

2 “Men and Events: To Facilitate Research…” *China Weekly Review*, September 12, 1936.

3 宋美龄是第一位在外国人主持的中国儿童劳工会 (Chinese Child Labor Commission) 工作的中国女性。该机构与国际联盟的国际劳工办有着密切联系。

4 “卡罗图号”1920年代初在上海建造，是意大利驻华海军部署在天津的两艘炮舰之一，也是意大利首艘驶往重庆的军舰。在颜雅清出席舰长杰纳罗·西帕为其在炮舰上举办的私人庆祝午宴的6年后，即1943年意大利战局失利后，自沉于黄浦江，以免日军俘获。后被日军打捞修复，更名“鸣海”，编入日本海军。二战后，由中国海军接收，改名“江鲲”舰。解放战争末期被人民解放军接管，并长期在人民海军服役，具体舰名不详。

5 “Two Women Attend Conference,” *North-China Daily News*, January 14, 1937.

6 此次会议的4个月后，也就是1937年6月21日，美国著名女飞行家艾米莉亚·埃尔哈特 (Amelia Earhart) 驾机飞抵爪哇万隆——这是她环球飞行中的一站。埃尔哈特在万隆歇息了3天后继续她的飞行计划。然而，不到两周后，她在飞越太平洋期间神秘失踪，被认为已殉难。

7 出席这次会议的其他中国代表团成员有：中国驻荷印巴达维亚 (印度首都雅加达的旧称) 总领事宋发祥及夫人，北京香山慈幼院的吴光菊 (Kwang Jui Wu, 音译) 小姐，前北洋政府总理、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会长熊希龄及夫人等。会议时间自2月2日至15日。Association for Moral and Social Hygiene in India (印度道德与社会卫生联合会). *Notes on the Conference of Central Authorities in Far-Eastern Countries Convened by the League of Nations, at Bandoeng, Java, in February, 1937.* (Delhi: Delhi Printing Works, May 1937); *North-China Herald*, March 10, 1937, p. 412.

8 1937年2月5日，颜雅清在东方国家中央政府关于打击贩卖妇女儿童会议第四次会议上提交了以下数据：

- 据估计，租界大约有50所日韩妓院，大多位于虹口区。
- 据法国的一个调查报告称，法租界内没有一家外国妓院，但有证据表明，法租界内卖淫活动猖獗。
- 公共租界的外国妓女人数约为1000人，可能一半是斯拉夫人。

• 法国当局估计，在法租界从事卖淫活动的暗娼有270人，其中大部分人都有父母，但她们的父母因为没有固定职业或者收入低下难以养活她们，所以这些女子不得不依靠出卖肉体为生。

• 公共租界有31家执照经营的舞厅，法租界有18家注册并被监管的舞厅，但是根据一些独立调查人员所作的调查结果显示，在上海营业的舞厅实际上近百所。

• 专业舞娘人数估计在2300人到5000人。在这2300名舞娘中，中国人估计约占96%，其他的来自俄罗斯、葡萄牙、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国，此外还有欧亚混血人和犹太人。在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女人，因为之前普遍认为，大多数专业舞娘为俄罗斯人。

- 关于这些舞娘从事卖淫活动的情况，有两种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约50%的外国舞娘从事卖淫活动，而中国舞娘的这一比例为65%—70%。

——另一种意见认为，不管是中国舞娘还是外国舞娘，偶尔或经常从事卖淫活动的人数比例至少达到60%。

League of Nations, Traffic in Women and Children, Conference of Central Authorities in Eastern Counties, Bandoeng (Java), February 2nd to 13th, 1937. (“东方国家中央政府关于打击贩卖妇女儿童会议”，荷兰政府于1937年2月2日至15日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西部城市万隆举办。) *Minutes of Meetings. IV. Social*, 1937, iv, 10 (Geneva: December 1937), 33-34.

9 印度道德与社会卫生联合会，第14页。

10 当“东方国家中央政府关于打击贩卖妇女儿童会议”召开之时，颜雅清的舅舅、著名学者及政治家曹云祥于1937年2月8日病逝于上海，享年56岁。他在生前曾多次向颜雅清宣扬巴哈伊教，但始终未获外甥女认同。

11 当颜雅清结束其在欧洲的公干时，她已经游历了除芬兰、西班牙

和葡萄牙外的欧洲诸国。

12 颜惠庆，《颜惠庆日记》，1937年4月11日。

13 中国赴英庆祝乔治六世加冕典礼友好访问团于1937年4月2日乘坐意大利豪华客轮“维多利亚号”从上海启程前往伦敦。在参加加冕礼的大约三周后，孔祥熙率陈炳章、郭秉文、杨光注等人前往瑞士日内瓦，出席在那里召开的国联行政院第97次会议。1937年6月9日，孔祥熙一行离开法国前往德国。1937年6月11日，孔祥熙一行会见了德国的第二号人物、四年计划的负责人赫尔曼·戈林（Hermann Goering，戈林担任四年经济计划之目的是将德国之经济、生产体系调整至战争状态，以配合纳粹党对外发动战争的战略进程，戈林在这段时期因掌德国经济的管控大权而被称为“德国的经济沙皇”）。6月13日，孔祥熙一行与阿道夫·希特勒在其位于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的山顶别墅共进午餐。6月16日，孔祥熙一行搭乘英国“玛丽皇后号”前往美国继续访问，在美期间，他们将会见美国政界及商界领袖。7月14日，一行人搭乘“诺曼底号”再次回访英国，并于7月19日抵达英格兰南部城市、多塞特郡首府多尔彻斯特（Dorchester）。孔祥熙一行在欧洲和日内瓦一直逗留到9月底，10月才结束行程回到国内。“Dr. H. H. Kung Honored in Belgium and Germany, Leaves Europe for U. S. A.,” and “Hitler Receives Dr. Kung, and Presents him with an Autographed Photo,” *China Weekly Review*, June 19, 1937; “Dr. Kung Arrives in London From U. S. : Hopes for Peace in China,” *China Weekly Review*, July 24, 1937.

14 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参加观礼的中国使团成员有：中华民国特使、首席代表孔祥熙，副代表、海军上将陈绍宽，秘书长翁文灏，参赞曾宗骥、张福运、郭秉文。此外获邀观礼的还有陆海空三军武官以及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Dr. H. H. Kung Represents China at the British Coronation,” *China Weekly Review*, May 15, 1937.

5. 抗战爆发

1937年7月7日，驻华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抗日战争爆发。这场被西方国家多称为第二次中日战争（甲午战争被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的战事，主战场在中国内地，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事之前与期间，两国军队鏖战八年，以中国的胜利而告终。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日矛盾激化，国民政府从此加强国防战备，但终因力量悬殊，国民党部队不敌装备精良的日军而节节败退，日军长驱直入占领大半个中国。

虽然中国以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自居（当时人口约为4.5亿），并自诩“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但是中国军队装备简陋，军人训练无素。国民政府军事上处于劣势，特别是对日本空军毫无抵御能力。根据国民政府内政部的有关数据，抗战初期，中国空军在编飞机仅200架，而日军飞机总数在500架左右。后来才发现以上数据并不属实：日军实际飞机总量大概在800到1000架之间，而中国空军能够作战的飞机只有100余架。（章末注1）

虽然战争已经打响，但是颜家依然喜事频传。抗战爆发的一周后，颜雅清的妹妹湘清与夫婿刘念仁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校园里的教堂——圣约翰堂——举行了隆重的婚礼。（章末注2）此时战火还未蔓延到上海，这对新人的婚礼极尽奢华，其气派说是上海滩20世纪举行的最后的盛大私人派对恐怕也不为过。前来参加婚礼的嘉

宾人数众多，整个教堂被挤得满满的，迟来的人只好站在教堂门外的草地边上。教堂的走廊和中殿上，到处点缀着五彩的鲜花，花香四溢，沁人心脾。教堂外，摆满了观礼来宾赠送的硕大花篮。新娘挽着父亲的手臂款款而入，身着一件张倩英为她专门设计的华贵礼服。（章末注3）两个身着绿色花童礼服的小女孩，跟在新娘身后，挽着银质的篮子，在新娘走过的路上不断撒下芬芳的玫瑰花瓣。其中一位花童就是颜雅清的女儿陈国凤。

为了招待前来参加女儿婚礼的三千名来宾，颜福庆博士在上海新亚大酒店大摆宴席。新婚夫妇接待来宾所在的宴会厅里密密麻麻地悬挂着写有祝福人名字的红绸旗。在这些祝福的人中，不乏如雷贯耳的人物，包括蒋介石夫妇、孔祥熙夫妇、宋子文夫妇，以及成百上千外交界、医学界、金融界的首脑人物。颜雅清因在欧洲进行有关妇女儿童福利的调研而未能参加妹妹的婚礼。

仅仅三周后，即8月9日，依然沉浸在婚礼喜庆中的人们就被突如其来的战争阴云所笼罩。这一天，驻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率士兵斋藤要藏，驾军强行冲击虹桥军用机场，被机场卫兵击毙。事件发生后，上海当局当即与日方交涉，要求以外交方式解决。但日军无理要求中国军队撤离上海、拆除军事设施，同时，向上海增派军队。8月13日，日军便以租界和停泊在黄浦江中的日舰为基地，对上海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上海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在上海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开始了历时3个月之久的淞沪抗战。此时，远在数千里之外的欧洲的颜雅清，从报纸上读到发生在家乡的战事，那令人触目惊心的轰炸和残杀，让她感到无助和恐惧。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有一种强烈的报效祖国的冲动，航空救国的念头再一次出现在她的脑海。

1937年8月14日发生的难以置信的事件更增强了颜雅清航空救国的信念。8月14日晨，中国空军发起首战。中国空军轰炸的一个重点是停泊在日本领事馆外、黄浦江苏州河口北首的日本第三舰队的旗舰“出云号”。几番轰炸后，“出云号”未下沉，但估计被中方炮弹击中，船舱受重伤，向下游开去。为追击这艘“出云号”，

首日出战的中国空军也上演了一幕不幸的误炸事件。空军飞近上海市郊，突然从 5000 米高空降低到 1000 米以下，瞄准失度，一枚 1000 磅重炸弹落在大世界门口，恰好是行人聚集处，闯下了滔天大祸，炸死无辜平民 1700 余人，炸伤人数更多。此次误炸事件凸显了中国空军的战斗能力低下。

与此同时，在日内瓦，国联中国代表团在为保卫祖国、保卫和平而紧张忙碌着。颜雅清也在忙着定于 1937 年 9 月 13 日至 10 月 6 日召开的国联大会第 18 次常会的筹备工作。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派出了由卓越的外交家、时任驻法大使顾维钧为首的代表团，其人数是历年国联会议中国代表团人数之最。顾维钧将代表中国在国联呼吁制裁日本侵略。形势更为危急的是，就在大会开幕的同一天，日军向上海发动新一轮空袭，上海江湾的市中心区——一个凝聚着光荣与梦想的地方，一个新近建成的市中心区——惨遭轰炸。消息让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们心情沉重、义愤填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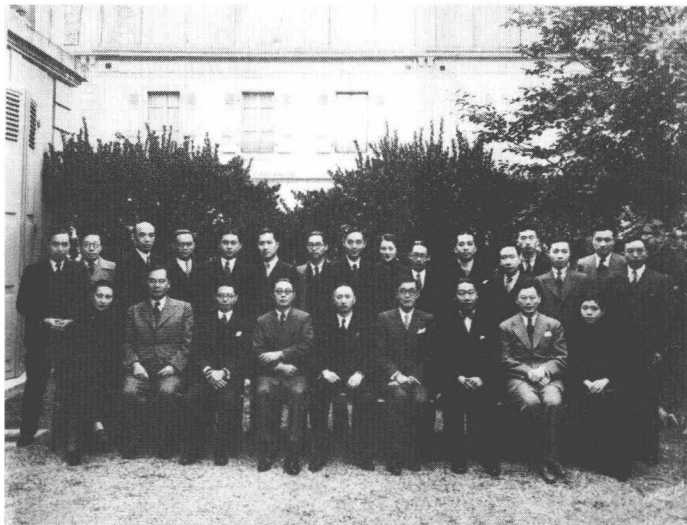
颜雅清也强忍着心中的悲愤和焦虑，认真履行自己作为一名国联代表的特殊使命。在国联一次有关妇女地位的分会讨论中，她再次代表广大女同胞发出了强烈呼吁。国联当时正在考虑修订其盟约，颜雅清及其他四个国家的代表们联合起来，强烈要求盟约修订的内容要涵盖男女享有同等的选举权这一项。有报道说，由颜雅清等人组成的这个团队对上述问题的贡献可谓“杰出”。（章末注 4）

随后，颜雅清又参加了另一个主题为人道主义问题的分会会议，颜雅清在会议上作了发言，介绍了她所了解的世界范围内的性奴役情况。（章末注 5）9 月 18 日，颜雅清在万隆会议上提出的建议案上签字，这项建议案特别提出在中国设立一个专门的国联机构，来应对性奴役和色情贩卖妇女儿童问题，颜雅清提议该机构设置在上海。（章末注 6）

遗憾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该机构的设立显得越来越渺茫。来自中国的消息大多非常不乐观。尽管如此，颜雅清和其他许多人都对国联挽救危局抱有希望，特别是当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在国联大会上发表讲话，严厉谴责日本的军国主义暴行，呼吁制裁日本侵略

时，大家更是信心满怀。颜雅清和大约 20 来位同仁出席了这次会议，以期国联能对中国的形势给予最大可能的关注和支持。这次国联会议，从 10 月 5 日至 6 日，历时两天，会议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国联最终同意取消自 1927 年开始对中国实施的武器禁运。这一重大胜利意味着国民政府出于加强战备防御需要可从国外采购飞行和其他军需品。

试图通过国联会议制裁日本的另一线希望寄托在 1937 年 11 月召开的国联专题会议上。是年 11 月 3 日至 24 日，根据国联决议，讨论中日冲突的专题国际会议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与会者主要是中、美、英、法、意、比、葡、荷等《九国公约》签字国及其他有关国家。但遗憾的是，由于中日双方都未宣称开战，所以国联在认定日本的侵略行为上缺乏法律依据，而且这一技术难题还引起了其他的麻烦。一位观察员曾这样描述国联所面临的两难局面：“如果国联作出制裁日本的决议，那么它必须就战事冲突进行调查并提交一份报告，而这样做的前提是日本已经承认发动了侵略。在这份报告中，日本要向中国宣战，而其他国家得能看出交战国利



出席国际联盟于 1937 年 11 月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九国公约缔约国会议的中方代表。前排左起：颜雅清、梁龙、金问泗、郭秦祺、顾维钧、钱泰、胡世泽、杨光注，其他未知。

益，因为这次冲突不同于发生在西班牙的内战，而是一场国际争端。所谓的交战国利益，就是指日本可以拦截、搜索中国船只，切断中国的一切供给。”（章末注7）

参加此次会议的代表们无意让中国失望，但是他们也不愿让世界卷入另一场战争，于是会议最终未对日本采取任何制裁。此外，国联曾召集会议，就解决两国冲突展开谈判，但日本拒绝派代表参加，会谈流产。

这一结局无疑将中国置于无助的境地，对中国来说，指望国联会议制裁日本的幻想最终破灭。甚至在会议期间，日军仍在上海烧杀抢掠，而意大利也于11月加入了《反共产国际协定》（1936年11月德日先行签署），标志着德、意、日三国轴心正式形成。这样一来，意大利也成为了中国人民的敌人，这对颜雅清来说是件很痛苦的事，因为她有很多意大利朋友，而且她也非常热爱这个地中海国家。她不禁回想起就在一年前，意大利“厄曼诺·卡罗图”号浅水炮舰舰长杰纳罗·西帕为她在炮舰上举办的那次浪漫温馨的告别派对。难以置信的是，他和她其他的意大利好友现在竟然成了敌人。

上海沦陷后，颜雅清的家人大部分逃往香港避难。她的伯父颜惠庆也随着成千上万的难民逃向香港，他曾在自传中描述了这一时期的香港难民潮：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大清皇帝将这块土地割让给英国的時候，他就预料到了这块弹丸之地将在百年之后成为其子民躲避战争的避难之所！”（章末注8）

时值晚秋，颜雅清也决定开始新的征程。1937年12月，她乘汽船离开欧洲赴美，抵达纽约。一段时间以来，她一直与在香港的家人保持联系，她告诉他们一个吃惊的消息：她准备赴美进修并考取美国飞行执照。她还雄心勃勃地告诉他们，学成后她准备驾机归国，效力疆场。颜雅清的家人可能以前就听说过她的宏伟志愿，但是依然对她的爱国情怀和雄心壮志既自豪又担忧。家人将她的想法



颜雅清在罗斯福空军基地（Roosevelt Field）留影，摄于1938年11月。

公之于众。美国媒体也对这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女子的撼世之举表示出极大兴趣，当地不少报纸都刊登了颜雅清身着飞行服、仰望蓝天的那张照片。兜兜转转，颜雅清费尽周折才证实她对飞行事业的兴趣和热爱是正确之举。

“在中国开展这样的飞行培训十分必要”，颜雅清说道。“我们承担着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章末注9）

而这种保家卫国的责任变得越来越艰巨。日军长驱直入，很快占领了大半个中国，面对上海战事的失利，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一座位于西南腹地的山城。这个决定并非一时冲动，实际上，淞沪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就策划迁都。1937年12月，也就是国民政府发表迁都重庆宣言后不到一个月，南京沦陷，之后日军对手无寸铁的南京民众进行了长达6周惨绝人寰的大规模屠杀。

1938年新年伊始，中国大地满目疮痍，不过令颜雅清兴奋的是，这一年她将开始在美国的飞行学习。1月29日，即农历中国虎年开始的两天前，美国航空贸易局为颜雅清颁发了编号为40165的学生飞行员资格证。（章末注10）在申请表上，颜雅清的体重一栏写的是130磅（在之后一年的紧张学习中，她的体重锐减了10磅），脚穿高跟鞋的身高为67英寸。在出生年份一栏写的是1910年，颜雅清习惯将自己的年龄小报几岁。

颜雅清选择在东方首屈一指的飞行学校——沙菲尔飞行学校（Safair Flying Service）——学习飞行，该校当时在纽约长滩米尼奥拉的罗斯福机场（后改建为罗斯福购物中心）的B飞行棚区授课飞行。（章末注11）如果颜雅清想从周围的环境中获取一些灵感，那么她算是来对了地方。罗斯福机场当时是美国最具规模和最繁忙

的民用机场，见证了许多飞行史上的第一次，包括查理·林白（Charles Lindbergh）1927年5月20日早上7时52分，从这里单独驾驶“圣路易精神号”起飞跨越大西洋，经过23小时安抵巴黎。这次飞行壮举无疑对颜雅清起到了巨大的激励作用。沙菲尔的私人飞行员课程费用为700多美元，课程承诺新学员接受总共40小时的飞行训练，其中包括大约20小时或更长时间的单飞训练或教练同机飞行训练。训练课程还包括翻筋斗、俯冲、水平8字、上下横8字、陌生野地着陆、跃升转弯半滚倒转等飞行特技。看着这些吓人的课程安排，颜雅清庆幸自己在意大利接受过飞行基础训练。她还要求为自己增设军事飞行指导。在这一点上，她是满怀希望自己学成归国后，能够成为中国空军的一名飞行教官，甚至是空军战斗机飞行员。如果祖国召唤她，她时刻准备着驾机飞上蓝天，将炸弹投向敌人。

“为什么不呢？”她要求道。“女人也能像男人一样熟练驾驶飞机……我不富有，但是我们拥有一个家。这个家被毁了。就连树木也被烧毁殆尽。但是感谢上帝，中国还有一个各阶层效忠的团结的中央政府。”（章末注12）



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1936年—1938年在任）在双橡园^①（Twin Oaks）图书馆留影。

颜雅清被一种报效祖国和人民的强烈欲望驱使着，在那段时间，她像着了魔一样发奋学习，在接下来的11个月的时间里，她不辞劳苦，往返于纽约和首都华盛顿之间。颜雅清师从经验丰富的飞行教练赫伯特（O. P. Herbert），在罗斯福机场完成一系列细目飞行课程后，她将能够独自驾机往返于纽约和华盛顿两地（章末注13）。颜雅清当时住在华盛顿的双橡园（Twin Oaks），即中国驻美大使馆官邸。

颜雅清与时任驻美大使王正廷一家人很快成为了好朋友，包括与王的两个女儿。双橡园位于首都华盛顿，为维多利亚风格建筑，舒适

^① 双橡园（Twin Oaks），是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古迹建筑，中华民国政府国有财产，于1937年至1978年间，作为九任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的官邸。——译注

闲逸，曾属于著名物理学家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的妻子的家族祖产，后被中华民国政府购得，于1937年至1978年间，作为九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官邸。这座官邸最吸引颜雅清的地方就是它内设的图书馆，一个硕大的房间，鲜花到处都是，花香四溢，沁人心脾，房间里摆放着舒适的安乐椅，椅子罩有蕾丝罩子，上面还放上了加厚的软垫，更重要的是，那顶到天花板的书架上，摆满了精心编目的各种书籍，琳琅满目，令人爱不释手。

作为各国大使馆和外交使团的所在地，首都华盛顿不禁让人回想起国联总部日内瓦的政治和社会氛围，不过，这个城市有其独特的魅力。在这里，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议员们与各国大使及职业外交官们你方唱罢我登场，争相举办着各种豪华宴会和庆祝活动。各种聚会和派对就如同家常便饭，天天不断，而各府邸官邸的女主人也在绞尽脑汁、使出浑身解数来吸引更多的尊贵客人，如果能有幸邀请到美国第一夫人或是副总统夫人来参加聚会，那就真是蓬荜生辉、光耀门庭了。

虽然这种狂欢活动接连不断，但是能够进入华盛顿那令人艳羡的上流社交圈却绝非易事，不过，对颜雅清来说，这不是什么问题和障碍。她于1938年1月抵达华盛顿，仅仅一个月后，当地的报纸《华盛顿邮报》就有报道说，颜雅清小姐“无论去到哪里都是焦点人物”（章末注14）。她之所以魅力四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对战乱中的祖国的那一份情怀，是因为她致力于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员以报效国家的这一伟大志向。因而，在美国首都举办的那些奢华的午宴和晚餐会，鲜有不把颜雅清列为贵宾邀请出席的（章末注15）。

华盛顿的居民惊奇地发现，这位漂亮的中国女飞行员不仅仅是一位为了祖国的解放事业而奔走的可爱的活广告，她还肩负着另外的重要使命。颜雅清此次赴美，除了学习飞行之外，还将到美国劳工部取经，学习先进的社会福利管理办法。在劳工部儿童福利部门的凯瑟琳·兰鲁特（Katherine F. Lenroot）小姐的带领下，颜雅清

认真开展调研工作，了解能够让儿童在性格形成时期接受最好的生理照料和情感关怀的方式方法，她的调研结果将提交给中国政府的有关方面予以考虑。华盛顿社交界的名媛们无不为了颜雅清对工作的投入以及她对该领域的深刻了解而折服。当她们知道颜雅清这位练达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为人母时，她们同样吃惊不小。因为尽管颜雅清对儿童福利问题关心备至，但是她本人并没有怎么花工夫去养育她自己的孩子。虽然这多少有点讽刺意味，但是她似乎对此并不在意。或者毋宁说，她认为自己的调研很有趣味，卓有成效。

“我已经开始研究美国儿童福利部门的情况，”她解释说，“然后再转到妇女福利保障部门，我发现在这两个部门开展调研都很有意思，我想多花几个月的时间多了解这两个部门的经验和做法。”（章末注16）

颜雅清将自己的精力投身于改进广大妇女儿童福利事业，她似乎是在有意无意地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弥补她本人在母性方面的缺失。

颜雅清在上海和莫斯科成功举办无数盛大聚会的丰富经验让她成为中国驻美大使馆最受欢迎的客人，她总是向王正廷大使夫妇提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协助他们在官邸内举办各种社交聚会。1938年2月的一个大雪纷飞的下午，大使和他的两个女儿招待来美为中国难民募捐的南京总教区总主教于斌（章末注17）。当时，颜雅清也在接待现场，她站在于主教一旁，帮助王正廷大使夫妇招待来宾，很快宴会活动就达到高潮。出席招待会的有来自西班牙、南非、苏联、多米尼加、智利和保加利亚等国的代表。当夜幕降临，鹅毛大雪飘飘洒洒之时，到中国大使馆的路变得越来越难行，但是依然有来宾陆续乘兴而来。突然间，大雪造成电力中断，大使馆内一下子漆黑一片，不过顷刻间，客人们就恢复了热烈的攀谈。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颜雅清镇定自若，吩咐服务生们点上了高脚台的蜡烛，客人们继续畅谈，尽情享受烛光宴会的温馨以及主人的盛情款待。

当华盛顿社交界了解到颜雅清曾有在欧洲外交使团的工作经历，并且曾在国联大会上发表讲话而一举成名后，许多华盛顿的组织和个人纷纷请求她给一些特殊的利益集团发表演说。她曾经对切维·切斯女子俱乐部（Chevy Chase Women's Club）的成员以及美国国立法学院的女生发表演讲，在演讲中，她大声朗读着日本军人首相田中义一于1927年上呈给天皇的《田中奏折》（Tanaka Memorial）的部分内容，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企图称霸世界的野心，讲到这段时，台下的听众无不全神贯注、聚精会神。颜雅清控诉道，在印度，甚至美国的一些团体和组织，支持日本称霸世界的计划，他们采取卑鄙的手段，笼络收买少数有色人种同他们联合起来，对抗他们的白人压迫者。颜雅清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对墨西哥的覬覦表明，看似发生在遥远的远东的战火很快就会危及美国的和平与安定。

1938年5月16日，美国和平与民主同盟（American League for Peace and Democracy）在华盛顿的里亚尔托剧院（Rialto Theatre）举行集会，商讨和平与安全问题，共有1500人参加了这次集会。代表中国出席这次集会的颜雅清以一种异常坚定的口吻对集会人员说：“如果中国想要维持其民主原则，想要求民族生存，那她就必须为此进行坚持不懈和英勇无畏的抗争。”（章末注18）与她一同站在台上发表演说的是一位来自日本的和平主义者松井春（Haru Matsui），她无所畏惧地公开谴责她的祖国对中国犯下的侵略罪行。这两位女性共同宣布，她们计划进行环美飞行并在各大城市进行演讲，以推动美国社会对日本进行抵制。（章末注19）

颜雅清还在空闲之余参加了一次专为赈济中国难民而举办的时装秀，在这次时装秀中，颜雅清客串了一回模特。当她身着一袭白缎子旗袍、一条雪白貂皮披肩笼住削肩出场亮相时，引发台下的一阵骚动。次日，颜雅清的靓照就出现在美国各大报纸的头版。（章末注20）过了一个月，有关她的新闻报道又出现在各报端，这一次她是出席在华盛顿的国会乡村俱乐部举行的某大型聚会。美国副总统约翰·南斯·加纳的夫人也出席了这次聚会，但是只有女飞行

员颜雅清小姐最为抢镜，那天，她戴了一顶芥末黄色的帽子，身披一条银狐毛披肩，兰质蕙心，风姿绰约。

单是看看颜雅清排得满满的日程，就可以知道她的知名度有多高。尽管请她发表演说的邀约数量急剧增加，但是她每次演讲都不乏新鲜素材，而那些最新的统计数据都来自她的父亲。

“目前中国的食品供给处于危险的低水平，”她在演讲中警告说，“在某些地区仅够再维持六个星期的时间。”她还指出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困苦。“成千上万难民无衣可穿、无家可归，不管富人还是穷人皆是如此。”（章末注 21）

颜雅清一方面在努力争取美国社会对祖国难民的同情和援助，另一方面向当地妇女宣扬抵制日货，敦促其拒绝购买日本生产的丝织品。“穿着莱尔线^①织物一小会儿，就是一种风格。”她不无讽刺地说。当时曾有那么一句流行的笑话，说的是“穿着莱尔线长筒袜的女孩会怎么样？”回答倒很干脆，“不会怎么样。”

置身于这些繁忙的事物中，很难想像颜雅清怎么有时间来进行飞行训练。参加那些公开演说已经让她应接不暇，更不消说全身心投入飞行学习了。有一次，就在同一天的下午，因为先要参加一个电台采访，之后出席有关世界和平的一个重要会议，她不得不在最后一刻取消了本来作为贵宾出席的第三场活动。但是，邀请依然像雪片一样飞来。1938年5月底时，为表达对华盛顿诸多个人和组织的感谢之情，颜雅清决定在五月花酒店举办一场大型招待会。那天，她身穿一件微微发亮的象牙色真丝旗袍，旗袍上别着芳香四溢的栀子花。她站在入口处，亭亭玉立，风姿绰约，一一招呼受邀前来的200位客人。来宾包括参众两院的资深议员以及外交使团和武装部队的高级代表，此外，受邀的贵宾还有赞助她进行环美飞行演讲的中国之友会（Friends of China）会员。会员中有一位颇有影响力的人物，那就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亨利·加博·洛吉（Henry Cabot Lodge）的夫人（章末注 22）。

① 莱尔线，一种光滑坚韧的棉线，用来织袜子、手套等。——译注

除了在华盛顿接受电台采访和发表公开演讲，以争取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同情和援助，颜雅清还在纽约的几家服务性机构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天主教东星会（Order of the Eastern Star）和美国女大学生俱乐部（American branch of the University Women's Club）。她选择支持的另外一家更相关的社团是纽约中国妇女救济会（Chinese Women's Relief Association of New York）。救济会总部设在纽约东 57 号大街 5 号，1937 年 9 月，救济会在纽约开展了一系列为赈济国难同胞的募捐筹款活动，活动吸引了大批华人能人志士参与其中。（章末注 23）1938 年 2 月，救济会组织了一场中国艺术珍品展，这些艺术品全部为美国妇女个人收藏。救济会深知颜雅清的组织能力，于当年 4 月选举她任救济会副主席。救济会的几位负责人都是她在上海结识的老朋友，其中包括艺术家、前驻美大使施肇基的女儿施美美（Mai-Mai Sze，又名施蕴珍），美国医药援华会（American Bureau of Medical Aid to China, ABMAC）创始人之一、纽约著名华人医生许肇堆的夫人。后来，颜雅清投身大量时间和精力协助美国医药援华会开展工作。

回到远东，战争在继续，中国在遭受蹂躏，颜雅清的家人在肩负着不少抗日救亡责任的同时，也非常牵挂远在他乡的雅清。1938 年 3 月初，颜雅清的伯父颜惠庆专程来到堂弟家，与之谈起雅清，次日，他又致信雅清的父亲表达对她的忧虑。（章末注 24）两兄弟担心什么呢？是对雅清忙碌的社交生活放心不下，还是他们担心雅清学习飞行会遇到什么危险，或者更准确地说，雅清在平时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的情况下去学习飞行会不会有什么巨大的隐患呢？有可能他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雅清学习飞行不会有什么出息。雅清可是出了名的臭司机（雅清的孙子曾回忆说，他父母从不让他坐雅清开的车），所以自然有理由相信她的飞行技术也不会好到哪里去。（章末注 25）

战争期间，颜雅清一直与家人保持联系，4 月份时，伯父颜惠庆在他的日记中提到侄女有了新的追求者。（章末注 26）遗憾的是，日记中并未提及此人姓甚名谁。颜雅清对于飞行的激情和热爱

让她比以往更加英姿飒爽、风采迷人。

1938年秋，颜雅清的对外通信地址依然留的是驻美大使馆官邸双橡园，但实际上，由于要学习飞行，她大部分时间住在艾德菲大学花园市校区的14街109号。该住址离罗斯福机场不过一英里半的距离，但是距纽约和华盛顿灯红酒绿的社交生活相去甚远。在这里，可以听见罗斯福机场飞机起降的声音，而就在飞行课程开始前的几分钟，还看得到飞机从头顶飞过。为了实现自己的飞行梦想，颜雅清拒绝诱惑，潜心学习，刻苦钻研。

所有的努力和坚持终于有了回报。1938年11月10日，颜雅清从私人飞行员飞行学校（Private Ground School）毕业了，5天后，她又拿到了沙菲尔飞行学校的私人飞行员执照，此前，颜雅清曾在沙菲尔学习飞行。颜雅清不仅通过了飞行考试，而且成绩优秀。《民航条例》和《导航及气象》这两门课程的成绩分别为80分和90分。到课程结束时，颜雅清已经至少乘坐或驾驶两架不同型号的飞机，一是教练机，二是柯蒂斯—莱特公司的色当（Curtiss-Wright Sedan）机完成了25小时的教练同机飞行训练以及21小时的单飞驾机训练。美国当地传媒对颜雅清学成毕业颇为关注，多家报纸在其社会版刊登了她戴着头盔及护目镜的一张照片。颜雅清实现了她的奋斗目标，而今的她已经是一个羽翼丰满、时刻准备着报效祖国的飞行员了。

注释

1 China Ministry of Information（国民政府宣传部）. *China Handbook: 1937—1943*（NY: Macmillan, 1943）, 333. 陈纳德将军表示，能够用于作战的飞机仅91架。Claire Lee Chennault, *The Way of a Fighter: The Memoirs of Claire Lee Chennault*, ed. by Robert Hotz（NY: G. P. Putnam's Sons, 1949）, 38.

2 新郎刘念仁是上海实业大亨、慈善家刘鸿生的儿子，而新娘刚从上海大学毕业。

3 张倩英是著名富商、外交官张静江的女儿。张静江与前妻姚蕙育有五女，人称“五朵金花”，她们均出生在巴黎，张倩英是家中的幺女。

她富有艺术气质，是上海滩著名的时装设计师。张出生于1910年，与颜家两姐妹及女飞行家李霞卿都是闺中密友，因此，颜湘清大婚时邀请她设计婚礼礼服。1936年，张倩英在上海国际饭店开设了自己的设计工作室“青衣”。当上海名媛和著名美籍华裔女影星黄柳霜纷纷穿上她设计的精美服装时，她的生意开始如日中天。1938年，被誉为“中国第一位专业时装设计师”的张倩英前往纽约，并在那里开设了自己的服装公司，为首位在纽约开业的中国时装设计师。1946年，张倩英与新加坡华侨、被誉为“中国生理学之父”的林可胜结为伉俪。抗战期间，林可胜领导医疗系统投身救国事业。日军进攻上海时，他领导了红十字医疗队参与救援。

4 “Equal Status Clauses Sought by Organization Delegate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November 3, 1937.

5 参加国联大会第18次常会第五委员会的中国代表有：钱泰、胡世泽、刘锴、陈定、颜雅清。

6 League of Nations, Assembly, *Minutes of the Fifth Committee* (Geneva, 1937), 23. 颜雅清也在1937年9月25日召开的第八次会议上作了简短发言。

7 Freda White, “China and Spain Ask for Judgment,” *Headway* (October 1937), 191.

8 Yen Hui-Ch'ing (颜惠庆). *East-West Kaleidoscope*, 258.

9 “Chinese Woman Flies Plan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December 30, 1937.

10 颜雅清的身体素质条件也被认为达到参加商业飞行执照培训的标准。

11 当时，罗斯福机场是美国最繁忙的机场之一。二战期间，它被用作军用机场。机场于1951年关闭，旧址后改建为购物中心。

12 “China Needs Medical and Food Supplies,” *Lima News* [Lima, OH], April 29, 1938.

13 赫伯特 (O. P. Hebert) 是沙菲尔飞行学校的校长，以前曾是柯蒂斯—莱特飞机制造公司的代理。此前他至少带过一名中国学员——来自纽约的李卡 (Kar Lee, 音译)。李在赫伯特的指导下，专攻飞行特技。抗战爆发后不久，李卡卖掉了自己的飞机，回到祖国，加入中国空军。

14 Hope Ridings Miller, “Mmes. McNary, Tydings Entertain With ‘At

Home': Miss Hilda Yen with Miss Wang."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11, 1938.

15 1938年1月20日，颜雅清出席了由中国驻美大使馆举办的一次茶会，这是颜初入首都社交圈。在这次茶会上，颜雅清结识了美国驻南京大使馆二秘约翰·霍尔·帕克斯顿（John Hall Paxton）。之前，他在美国军舰“帕内号”（Panay）上遭日机攻击受伤未愈，所以出席茶会时仍拄着拐杖，步履蹒跚。1937年12月12日，长江上为西方难民船只护航的美国军舰“帕内号”被日本轰炸机击沉，这是美国在二战中损失的第一艘战舰，但日本很快平息了该事件，称这是一起意外。在圣诞前夜，日本方面向美国总统罗斯福递交了一份正式的道歉书，而美方出于对日绥靖政策接受了日方的道歉。

16 同上。

17 1946年，于斌（1901—1978）成为南京总教区总主教，1969年4月28日，教宗保禄六世任命于斌总主教为第二位华人枢机，5月19日在梵蒂冈举行加冠典礼，于斌在新祝圣的枢机中名列首位。二战期间，于斌主教赴美，积极开展活动，争取美援，拓展华人在美的生存空间。当时，他身兼数职，南京总教区总主教、国民政府救济委员会特使、上海慈善联合会代表、中国天主教抗战救济会发起人之一兼会长。

18 "1500 Unite Here in Mass Peace Plea," *Washington Post*, May 17, 1938.

19 当松井小姐（真名石垣绫子，Ayako Ishigaki）与颜雅清并肩站在讲台上，呼吁美国民众对她的祖国进行抵制之时，美国国务院官员非常担心她的人身安全，为她提供贴身保护，以防不测。1940年，松井小姐撰写了一部十分畅销的自传——《涌动之流：我的两个世界》（*Restless Wave: An Autobiography*）

20 "Chinese War Refugees to Get \$5000 From Benefit Function," *Washington Post*, March 1, 1938.

21 "China Needs Medical...", *Lima News*, April 29, 1938.

22 如果没有中国之友会的帮助，颜雅清和李霞卿在1939年的联合环美飞行募捐计划是不可能实现的。中国之友会华盛顿分会的其他执行委员还有：查尔斯·L·麦克纳里夫人（Mrs. Charles L. McNary）、汉密尔顿·费斯夫人（Mrs. Hamilton Fish）、索尔·布鲁姆夫人（Mrs. Sol Bloom）、

拉尔夫·布鲁斯特夫人 (Mrs. Ralph Brewster)、乔治·巴涅特夫人 (Mrs. George Barnett)、罗伯特·伍兹·布利斯夫人 (Mrs. Robert Woods Bliss)、威廉·L·布里斯夫人 (Mrs. William L Breese)、马克·布里斯托尔夫人 (Mrs. Mark Bristol)、弗雷德里克·布鲁克夫人 (Mrs. Frederick Brooke)。其他成员还有：德怀特·戴维斯夫人 (Mrs. Dwight Davis)、约翰·艾伦·多尔蒂夫人 (Mrs. John Allan Dougherty)、鲁弗斯·马瑟夫人 (Mrs. Rufus Mather)、梅森·久利克夫人 (Mrs. Mason Gulick)、乔治·索普夫人 (Mrs. George Thorpe)、吉福德·平肖夫人 (Mrs. Gifford Pinchot) 以及亚瑟·林兰夫人 (Mrs. Arthur Ringland)。

23 纽约中国妇女救济会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战时委员会——中国平民救济妇女委员会 (Women's Committee for Civilian Relief in China)，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宠惠的夫人朱学勤任该委员会会长。

24 颜惠庆，《颜惠庆日记》，1938年3月1日至2日。

25 侨居美国新泽西州伯克利—海茨 (Berkeley Heights, NJ) 的颜雅清的孙子陈克文 (Ronald K. Chen) 于2002年7月9日致本书作者的电子邮件。

26 颜惠庆，《颜惠庆日记》，1938年4月1日。

6. 对华援助

时值1939年，在日军加紧侵华的形势下，中国的难民以及救济问题变得愈发严峻。战争造成数百万人无家可归，疾病和饥荒肆虐。颜雅清的家人始终站在第一线开展抗战救护工作。1937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犯上海，中国守军浴血抗战，颜雅清的父亲颜福庆博士奋起发动学校的广大师生和医务人员组织医疗救护队，并任上海市救护委员会主任委员以及中国红十字会负责人，奔赴抗日的前方、后方，为伤病员服务。由于颜福庆在抗战救亡中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以及在战时救死扶伤方面的丰富经验，1938年，他被调至武汉，任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

在战争时期，这可不是个美差，但是颜福庆兢兢业业的工作作风、丰富的战时医护管理经验无人能与项背，很难想像该职位有第二个人选。而他的堂兄颜惠庆自辞去驻苏大使一职后，回到天津家中一边经营实业，一边忙慈善。“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举家南迁上海，在“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主持上海的难民救济与伤兵救护工作，并出任上海国际红十字会主席。作为老牌外交家，颜惠庆在各国政府内拥有广泛的人脉关系和资源，这为抗战最艰苦时有效开展慈善救济工作提供了坚实的保障。（章末注1）值得注意的是，兄弟俩在抗战最艰苦卓绝的时候同时担任国家最重要的医疗和救济机构的负责人，为抗战救亡、赈济同胞呕心沥血。

1938年4月，上海国际救济委员会成立，颜惠庆出任主席。救济委员会的职责是救助战区难民，并帮助他们在当地尚未受战争影

响的工厂企业安置就业。这种战时安置后来演变成著名的抗战内迁运动，大批平民、学校、厂矿、企业由东至西内迁。而数百万人的内迁需要在沿途建立许多造价不菲的中转站和医院。同时，在大西迁开始前，需派员就可能的安置地区进行考察，此外，还要保证安置地区资金到位，以确保难民尽快安居乐业。

当然，许多人并没有那么幸运。接二连三的空袭和入侵造成大量平民死亡，受伤者更是不计其数。对这些伤员的救护需要大笔资金支持和一个庞大的专门机构来进行。然而，事实证明，一场人为的洪灾对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绝不亚于日本侵略者。为了阻止日军西进，1938年6月，国民党军队悍然掘开郑州花园口大堤，使黄河水奔腾直泻，夺淮入海，人为地制造了一场震惊世界、惨绝人寰的大浩劫、大灾难。顿时，上百万人死于洪水，五百万人流亡无家可归。需要派发到洪灾地区的救济物资之巨可想而知。1937年8月，专项救济款为3万美元，而仅仅一年后，这个数字就暴增到345万美元，而且还是杯水车薪。（章末注2）

在基础设施受到严重破坏，国家财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中国只有一条渠道来筹集赈济资金，那就是海外捐款。颜雅清此时身在国外，有不少有影响力的朋友，完全有条件来帮助募集这些宝贵的资金。作为上海国际救济委员会下属的重要机构之一的上海战时难民救济会帮助救济那些内迁的难民。救济会在美国的首席代表为天主教南京总教区总主教于斌，而颜雅清如今已与之非常熟识，两人曾在华盛顿的许多重要社团一起共事。于斌主教非常认可颜雅清所具备的超凡魅力和演讲天赋，他极力劝说颜雅清发挥个人所长，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争取各国人民大力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而对颜雅清来说，她根本不需要别人来劝说，她深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理。本着对救济会宗旨的了解以及对于斌主教的信赖，颜雅清同意为救济会效力。很快，她与著名女飞行家李霞卿一道，共同开展募捐活动。

1938年10月底，被誉为“中国第一位女飞行员”的李霞卿抵达旧金山，当时颜雅清的飞行培训接近尾声。1939年新年伊始，李

霞卿飞抵纽约与颜雅清会面，两人在一起商讨了一个周密的、雄心勃勃的筹款计划。两位女性决定，各驾一架轻型飞机，作环美募捐飞行。计划总飞行里程 15000 多英里，耗时数月。虽然飞行艰苦且危险异常，但是，她们的飞行壮举将大大有助于宣传中国人民因为战争所遭受的苦难，有助于更多地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援助。

别的暂且不说，最重要的是，如果这次长途环美飞行能够让美国停止向日本出售燃料、钢铁等用来制造侵华武器的原材料，那么她们俩也会认为这次冒险是值得的、成功的。她们还可以借此警告美国，正如颜雅清之前曾警告过的那样，日本军国主义绝不会满足于只将远东作为其军事目标，其他太平洋沿岸的国家，包括美国，有朝一日都不可避免会落入法西斯的铁蹄之下。重庆国民政府已多次派使团赴美，以争取美国社会的支持和援助，但是收效甚微。颜雅清和李霞卿满怀信心地希望，通过这种巡回飞行的方式来唤起更多美国民众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关切。

她们这一宏图伟愿需要周密的计划和安排，难度不小。首先，她们需要获得美国政府的飞行许可，其次，她们还需要美国国务院为其免费提供环美飞行所用的飞机，所幸的是，这些都如愿以偿。美国著名女飞行家杰奎琳·科克兰（Jacqueline Cochran）从中斡旋，玉成此事。

颜雅清和李霞卿两人就像部署战斗的将军一样，对环美募捐飞行进行认真细致的规划。她们起草了整个行程的航线，确定了要飞抵的城市，配上了导航图，并计算了一口气安全飞行的距离。她们还预计到达和离开各大城市的时间，并与各地的中国救济组织取得联系（到此时，中国的救济机构几乎遍布美国各城市），在她们抵达前做好演讲礼堂的预订和听众的组织工作。由于李霞卿飞行经验更为丰富，1936 年曾在国内作了从上海到湛江、北平到成都的两次长途飞行，所以此次她将承担更艰巨的飞行任务，她的足迹几乎遍布美国各州，总飞行距离超过万里，历时半年左右，到次年 6 月中旬才结束。颜雅清的飞行距离相对较短，总长 6500 英里左右，主要集中在美国东部地区，虽然里程较短，但是要飞抵的城市更多。

颜雅清估计完成此次募捐飞行任务回到纽约的时间为1939年7月底。

两人各自准备了不少派发媒体的宣传海报。在海报中，李霞卿被称为“中国第一位女飞行员”，而颜雅清也被誉为“中国的艾米莉娅·埃尔哈特（Amelia Earhart）^①”（将颜雅清比作艾米莉娅·埃尔哈特可能有点不太恰当，因为后者于1937年尝试全球首次环球飞行时，在飞越太平洋期间神秘失踪，被认为已殉难。）为了确保此次募捐飞行和演讲活动取得圆满成功，两人还争取了几位美国知名人士的赞助和支持。赞助此次募捐飞行的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包括美国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之子小西奥多·罗斯福中校（Col. Theodore Roosevelt Jr.）及其夫人、著名残障教育家海伦·凯勒、美国邮政部部长詹姆斯·法利女士（James Farley）、美容界女强人伊丽莎白·雅顿（Elizabeth Arden）、演员、导演兼剧作家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Douglas Fairbanks）、女作家范妮·赫斯特（Fanny Hurst）、知名记者威廉·艾伦·怀特（William Allen White）和约翰·基兰（John Kieran）、著名女飞行家杰奎琳·科克兰、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宠惠的夫人朱学勤、时任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的夫人黄蕙兰等。

因为此次飞行的主要目的是征求募捐、赈济中国难民，所以两位德高望重的牧师的支持和参与也让此次活动更有号召力和公信力，一是南京总教区总主教于斌，二是天主教本笃会神父、天主教激进派联盟（Catholic Radical Alliance）创始者、天主教北平辅仁大学首任校长乔治·贝瑞·奥图尔（George Barry O'Toole）。抗日战争时期，于斌在重庆主持难民救济工作，任战时难民救济会会长，而奥图尔神父任救济会书记兼司库。颜雅清和李霞卿两人并不直接接受捐款，而是出于安全考虑请那些同情和支持中国的人将款项直接汇给当时在首都华盛顿的奥图尔神父，而后者也会承诺将所有捐款

^① 艾米莉娅·埃尔哈特（Amelia Earhart），美国著名女飞行家，世界上第一个独自驾驶飞机穿越太平洋的女飞行员。——译注

直接转汇给重庆的难民救济会。

颜雅清和李霞卿成功地获得了此次募捐飞行所需的两架单翼机，一架来自堪萨斯州的飞机制造商沃尔特—比奇（Walter Beech），另一架来自波特菲尔德飞机公司（Porterfield Aircraft Corporation）。这次募捐飞行两人分飞不同的线路，但最后一站都定在纽约。选择纽约作为终点站是有所考虑的，第20届世界博览会，也是二战前的最后一次博览会，定于1939年在纽约举办。

1939年3月23日清晨，颜雅清和李霞卿兴高采烈地到达了纽约的弗洛伊德·班尼特机场（Floyd Bennett Field）。一切准备就绪，她们伟大的环美募捐飞行之旅就要开始了。而此时，到位的飞机只有一架，即史汀生·瑞连特 Stinson Reliant SR-9B（NC-17174）型号的单翼机。这架赞助给李霞卿使用的飞机停在停机坪上，刚刚漆涂了带黄边的红色机身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发光，像是一条火龙。这架名为“新中国精神号”的单翼轻型机的外部涂装非常大胆前卫，飞机的舱门和机翼都涂上了鲜亮的颜色，反映了满怀爱国热情的两位中国现代女性为抗日救国而开展的一场伟大冒险之旅的大无畏精神和勇气。



颜雅清（左）与李霞卿（右）开始援华飞行之旅的首日在美国费城的卡姆登机场（Camden Airport）留影，背景为她们驾驶的史汀生 Stinson NC-17174 型飞机，摄于1939年3月。

相比刚刚学成毕业的颜雅清，李霞卿的飞行经验自然要丰富得多，在只有一架飞机到位的情况下，为表示对飞行伙伴的尊重和信任，李霞卿请颜雅清驾机而自己坐在副驾驶位。为了抗战募捐四处奔波，加上对家乡亲人的忧思，颜雅清如今清瘦了不少。对这第一站的飞行，两人并没有刻意装扮而是一身便装，李霞卿身着裤装，外加一件中长外套，颜雅清则

是一身平时穿的飞行服——带毛领的短夹克、头盔、丝头巾、风镜。颜雅清加大油门，飞机在跑道上开始滑跑，继而腾空而起飞上蓝天。她们的冒险之旅开始了。

她们的第一站是费城，飞行距离不过一百英里，很快她们就安全抵达了目的地。她们飞过了市中心，又飞过了特拉华河（Delaware），最后降落在费城附近的卡姆登（Camden）机场。在机场早有媒体记者守候，见两位女英雄步出舱门，记者们蜂拥而上，镁光灯闪个不停，而救济会的代表也上前献上鲜花，以表达敬意和欢迎之情。

次日，两人同机飞往首都华盛顿，即战时难民救济会的总部所在地，也是颜雅清再熟悉不过的地方。当她打开减速挡板准备降落时，从空中依稀可见前来接机的欢迎人群里于斌主教那高大的身影。救济委员会里的每个人为了抗日救亡都不遗余力，而颜雅清和李霞卿这两个女人将这种爱国之情和拳拳之心演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水平，于斌主教亲自赶到机场迎候，对她们的大无畏气概和报效祖国的献身精神深表自豪和欣慰。当她们步出舱门时，欢迎的人们为两人戴上了玫瑰花环，两人站在“新中国精神号”旁摆定姿势，会心地微笑着，供新闻记者拍照。吸引媒体的关注，以便让更多的民众了解她们的意图，是两人飞行任务的重要一部分，不过，两人对于聚集的镁光灯还不太适应。在强烈的镁光灯下，在新闻媒体的包围中，两个女人时刻谨记着她们所代表的3000万苦难的同胞。



颜雅清在费城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

当天晚上，于斌主教在华盛顿联合火车站（Union Station）附近的中国红灯笼饭店设宴庆祝颜雅清和李霞卿的募捐飞行初战告捷。于斌主教乃黑龙江兰西人，祖籍山东，外表高大英俊，颇有口



罗斯科·特纳上校 (Capt. Roscoe Turner) 将波特菲尔德 Porterfield 35W 型“新中国精神号”飞机交与颜雅清。

才和组织策划能力，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都很有知名度。1937年，抗战爆发，于斌随政府西迁重庆，担任国民参政会议员，主持难民救济工作，又发起百辆救护车运动。抗战期间，他曾先后八次前往欧美国，到处发表演说，争取国际上的同情和援助。曾三次面见美国总统罗斯福，中国得到的第一批美援就是于斌的功劳。当时，于斌主教代表战时难民救济会在美国各地演讲以征求募捐。出于对颜雅清和李霞卿环美募捐飞行的重视和关切，此次于斌专程从外地赶回首都，为两位女英雄接风洗尘。庆功宴上，主宾兴致盎然，场面热烈。作为“新中国精神号”的飞行员，颜雅清成了当晚的焦点人物。出席宴会的嘉宾包括负责此次募捐飞行的财务主管贝瑞·奥图尔神父、双橡园大使馆官员、知名海外华人代表以及当地新闻记者。

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颜雅清和李霞卿继续同机飞行至周边的城市进行募捐演说，直至颜雅清自己的座机终于到位。1939年4月3日，这架将由颜雅清专用的轻型单翼机由美国王牌飞行员罗斯科·特纳上校（Colonel Roscoe Tuerner）专程驾驶飞到华盛顿机场。罗斯科·特纳曾三次赢得美国国家航空赛汤姆森锦标赛并捧得汤姆森杯，美国国会于1952年向他颁发优异飞行十字勋章，以表彰他对航空飞行事业的贡献。正是这位英勇无敌、声名赫赫的飞行员将“新中国精神号”移交给颜雅清。那天，他一身标志性的装束——看起来很像空军飞行服——头戴尖顶帽，身穿一件碎牛皮的军用防水短外套，将飞机缓缓降落在华盛顿机场。由这位大名鼎鼎的飞行员亲自驾机并将其移交给颜雅清本身就是新闻猛料，交接仪式获得了广泛关注，各大媒体纷纷进行了报道。在各大媒体的闪光灯下，一身优雅装束的颜雅清从时尚的毛披肩下伸出玉臂，与这位退伍老兵亲切握手。当天，颜雅清穿了一件长及脚踝的旗袍，东方女性的独特美展现得淋漓尽致，一览无遗，而她脚下的高跟鞋无疑也在高声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她虽来自古老的中国，但同时也是一位融入西方世界的现代女性。

这架移交给颜雅清的座机为波特菲尔德 Porterfield 35-W 型、可搭载两名乘客的高翼单翼机。（章末注3）罗斯科·特纳当时刚刚被任命为波特菲尔德飞机制造公司的副总裁，虽然这款飞机乃三年前所造，但是作为飞机设计制造爱好者的罗斯科·特纳很有可能参与了该款飞机的设计制造。（章末注4）波特菲尔德飞机制造公司将这架轻型单翼机赞助给颜雅清募捐飞行，自然也是一个活广告，为公司宣传推广增色不少。这架单翼机与李霞卿的座架一样，血红色的外部涂装，名字也叫“新中国精神号”（Spirit of New China），连这几个字喷绘得都一样，在机身两侧，这几个粗体英文字横着从舱门到机翼铺展开。同样地，在这架波特菲尔德飞机的头部，喷绘有交叉着的中美两国国旗。（章末注5）

不过，两架座机的相同之处也就这些。从性能上说，李霞卿的那架史汀生发动机更大更强劲，因而飞行距离要比这架波特菲尔德





准备起飞的颜雅清，摄于1939年4月。

远得多，几乎可以达到两倍。而实际上，在后来的募捐飞行中，颜雅清不止一次遇险也是因为自己座架的发动机性能欠佳。

不过，在刚开始的时候，颜雅清对这架飞机还是非常满意的，在她独自驾机的第一天，晨曦破晓，天气温煦，天公作美，祝她一行顺利。这天，颜雅清一身飞行员装束——风镜、头盔以及白色飞行套装——在座架前摆定姿势供媒体拍照，之后她登上机舱，拉杆而起飞向蓝天。接下来的几周都是远距离飞行和募捐演讲活动，其足迹遍布加州瑞奇蒙市（Richmond）、北卡罗莱纳州罗列（Raleigh）、哥伦比亚（Columbia）、佐治亚州萨凡纳（Savannah）、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Jacksonville）等地。“中国的艾米莉娅·埃尔哈特”自信地降落在目的地城市，用流利的英语发表抗战募捐演讲，在谈到中国游击队与日本侵略者巧妙周旋、英勇打击敌人时，颜雅清的神情尤为慷慨激昂。

根据天气状况以及募捐演讲的情况，颜雅清一般会在每个城市

呆到两到三天，然后飞往下一站。飞行安全是最重要的考虑，所以休息好、保持良好的体力是非常重要的，但在有时，一天内有几场公开演讲，而且晚上还要出席某个宴会并演讲，这种必要的充足休息就成了奢望。由于座机性能欠佳也让她感到焦虑和心烦。这架波特菲尔德轻型单翼机其油箱容量为 18 加仑，其满载时足够飞行 300 英里的航程，但是由于发动机有些小故障——有可能是汽化器调整不当——她每次对飞行距离都格外谨慎。正如她在定期写给于斌主教的一份报告中说，机械问题已经逼着她好几次迫降，而这种恼人的状况无疑也对她驾机的自信心产生了负面影响。

颜雅清开始飞往美国南部地区，在阿拉巴马州境内飞行时不幸发生事故。4 月 27 日星期四的下午，她平安抵达了阿拉巴马州的莫比尔 (Mobile)，像往常一样，颜雅清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经过连轴转的飞行，她终于能够在一个地方歇上几天，而且还不是呆在冷冰冰的宾馆，而是住在当地知名华人 Tom Chin 夫妇舒适温馨的家里。

闻讯赶来的莫比尔当地民众把 Tom Chin 的家围了个水泄不通，而颜雅清也热情地回应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民众，据说，当时的场面十分热烈，颜雅清以其大度和优雅以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颜雅清向聚集的民众发表演说，向他们警告日本法西斯的狼子野心，警告日本侵略行

径将对阿拉巴马州的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她对聚精会神的听众解释说，阿拉巴马州是美国重要的棉花产地，而日本纱厂一直以来十分依赖美国和巴西产的棉花，如今，日本侵略中国也意味着今后日本

Itinerary of Miss Hilda Yen

April:

- 15, Richmond
- 16, Raleigh, N. C.
- 20, Columbia, Lancaster, S. C.
- 22, Savannah
- 23, Jacksonville
- 24, New Orleans

May:

- 1, Birmingham
- 3, Atlanta
- 5, Chattanooga
- 12, ~~Atlanta~~ City,
- 16, Tulsa Okla.
- 18, Kansas City
- 21, Omaha
- 22, Des Moines
- 24, Minneapolis
- St. Paul
- 27, Milwaukee
- 28, Chicago.

June:

- 6, St. Louis
- 9, Louisville
- 11, Cincinnati
- 14, Indianapolis
- 16, Toledo
- 18, St. Louis
- 22, Cleveland
- 25, Columbus, " Va.
- 28, Charleston, " Va.

July:

- 1, Pittsburgh
- 2, ~~St. Louis~~
- 3, Rochester
- 11, Albany,
- 14, Manchester, N. H.
- 18, Boston
- 21, Providence,
- 24, New York,
- 25, New Haven
- 31, New York.

颜雅清总长 6500 英里的飞行计划，1939 年春。

飞天名媛
wandering in heaven

将从中国这个产棉大国攫取原材料。

注释

1 抗战期间，颜惠庆作为国民政府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积极投身抗战救亡运动。*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eds. Howard Boorman & Richard C. Howard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 IV: 52a.

2 *Chinese Year Book*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37/38, 663.

3 该机型号 NC-20706，系列号 324。该机翼展为 32 英尺，飞行距离为 340 英里。参见 aerofiles.com 有关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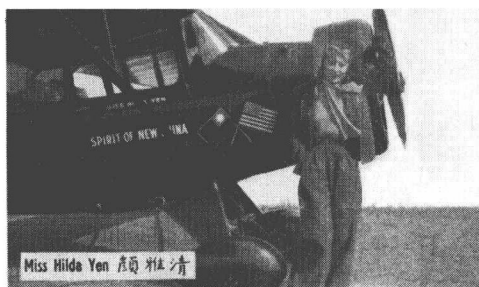
4 在开始环美飞行时，颜雅清向媒体宣布这架飞机是“波特菲尔德—特纳”（Portfield-Turner）机。关于该机型的详细资料，参见“Portfield-Turner 2-place 50 hp Model 50,” *Aero Digest*, July 1939, 117.

5 两架飞机名字相同，且李霞卿和颜雅清名字的拼写有些类似，这可能是中国媒体将两人混为一谈，把她们误认为是同一个人的原因。

7. 5月坠机事故

圆满完成在莫比尔的任务后，颜雅清计划着飞往下一站伯明翰。1939年5月1日星期一的早晨，天气晴朗，微风送爽，预示着这又是一个阳光明媚、温暖和煦的一天。总而言之，这天的天气条件很理想。颜雅清从莫比尔的贝茨机场（Bates Field）起飞，目的地是东北方向的伯明翰，当天下午她要出席在那里举行的一个宴会并发表演讲。不过遗憾的是，她最终未能如约而至。

虽然颜雅清按照既定的线路飞行，但还是偏离了方向，所以当她意识到燃油不足时心里开始发慌（章末注1）。再想到她所在的乡村地区没有什么飞机维修设施，而且她不得不又一次迫降更加剧了这种忧虑和不安。她没有想到博一把，一口气飞到伯明翰，而是决定先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Montgomery）——也就是位于出发点莫比尔和目的地伯明翰



POST CARD

Girl Pilot on Mercy Flight Over U. S. A.
To Seek Funds for Chinese Civilian
Refugees.

PLACER
STAMP
HERE

为纪念颜雅清抗战募捐飞行而公开发行的明信片。

之间的一个城市——降落以补给燃油。为了减少燃油损耗，颜雅清尝试低空飞行，但是这一招却遭至灾祸，显然由于飞行高度不够导

致她无法辨明蒙哥马利所在的具体位置。等飞过大约 10 英里后，颜雅清才意识到错误。从飞机上往下望去，是乡村的一座大农舍，为了避免更大的错误和损失，颜雅清决定先行迫降，打听好蒙哥马利所在的方向再说。这座农舍边上有一大片绿色的田地，从东至西沿展开，占地不小，农舍四周用山梅花灌木丛围着。颜雅清估计那块地大约有 1000 英尺长，应该足以安全迫降和重新起飞。

颜雅清从空中看到的这个农场属于美国知名政客乔·钱伯里斯（Joe Chambliss）家族的物业，该农场位于阿拉巴马州普拉特维（Prattville）南一英里处，正好位于蒙哥马利的西北部，这里是一片农牧区，居民大约 2500 人。一位黑人农场女工正好看见颜雅清降落，因为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地见过飞机，她吓得跑回农舍去叫钱伯里斯夫人。女主人似乎对这位不速之客的到来并不感到吃惊，当颜雅清跳出机舱，两个女人简短地交流了几句，然后钱伯里斯夫人向颜雅清指了指蒙哥马利市机场所在的方位。

与钱伯里斯夫人交谈时，飞机并没有熄火，由于油料已不足，颜雅清一得知蒙哥马利的方位便马上跳进机舱，准备滑行起飞。她开始在跑道上加速。田边长的燕麦只有 1 英尺高，但是当颜雅清继续向前加速滑行的时候，她吃惊地发现田中间长的谷物足足有 3 英尺高。这些长得过高的谷物缠绕着飞机的轮子，拖拽着飞机的腹部。当颜雅清醒醒地意识到在飞机滑行到田头时无法将速度提高到一定的水平，她放弃了起飞，将飞机慢慢地驶回了出发点。

颜雅清突然意识到，如果起飞速度不够，她将被一直困在那里。她越发感到焦虑，这种担心和焦虑自募捐飞行以来经常折磨着她，而现在更是变得无以复加。

时间在流逝，燃油也将耗尽，颜雅清决定冒险再作一次起飞。她凝望着远处田头那长得高高的已经成熟的山梅花木丛。灌木丛中段有处空隙，大约 10 英尺到 15 英尺，这可能是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如果起飞速度足以让她升空，那么在一起飞后她可以尝试通过稍微侧倾机翼的方式脱离困境，也就是将一侧机翼稍稍侧斜探进这处空隙，这样另一侧机翼就可以翘起，高过灌木丛，从而减少灌木

丛对飞机的阻力，使飞机有足够的升力升空。如果掌握一定的特技并且运气够好的话，颜雅清应该可以摆脱困境，按计划继续飞行。她决定一试。这是她第二次尝试起飞，一开始她就铆足了劲，以最高的速度向田头驰去。当她感觉升力足够时，她拉杆一跃而起。

然而，这只维持了不到一秒钟的时间。



1939年5月1日颜雅清在美国阿拉巴马普拉特维发生飞行事故，图为飞机损毁照片。颜雅清发生飞行事故的消息立刻成为世界各大媒体报道的重要新闻。

由于无法快速爬升或者说飞行速度依然不够，一侧机翼刚好扫着正开着花的山梅花丛篱笆，旋即，“新中国精神号”一头向地面栽落下来。只听“砰”的一声巨响，飞机垂直坠落在一片林地附近，螺旋桨深深地扎进了地里。飞机坠地时所产生的强大冲击力驱使颜雅清猛地向前撞到了仪表盘上，顿时，飞机后部的重量和载荷全压在她背上。随后，是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唯一能够听见的声音就是燃油泄漏的滋滋声。燃油释放出的难闻气味让颜雅清从昏迷中清醒了过来，她慢慢恢复了知觉，意识到自己还活着，但是被困在了机舱里。

碰巧，两位当地的年轻小伙，乔·安德鲁斯（Joe Andrews）和泰克西·诺斯沃西（Taxi Nosworthy）当时正开着一辆小货车从田边

经过，看见颜雅清的座机倒栽葱插进田里。见状，他们赶紧下车跑向出事现场。

“我并没有看到飞机坠落的过程，”安德鲁斯事后对记者说，“但是我们肯定是在事故发生后的几分钟内就赶到了现场。燃油当时正在往外泄漏，我想飞机随时可能爆炸。”

虽然情形十分危险，但是两个年轻人并不畏惧。安德鲁斯继续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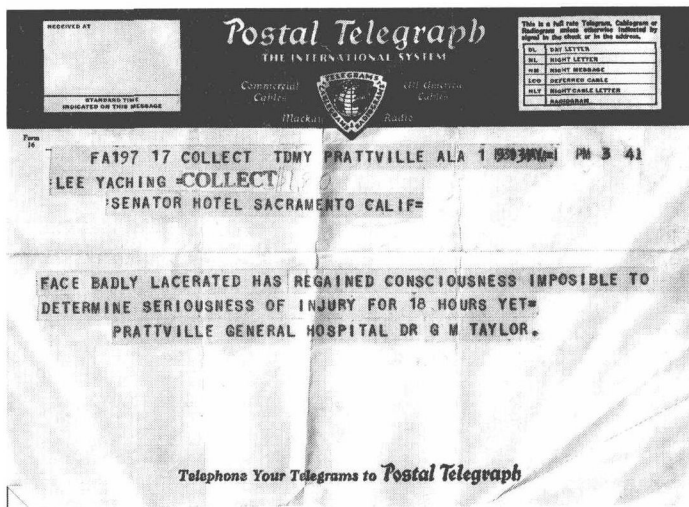
“我跑到飞机跟前，发现那位小姐正在奋力试图用左手打开舱门。装有降落伞的重箱子从后面压住了她的右臂，让那只胳膊动弹不得。我迅速打开舱门，移开箱子，试图把她弄出来。最后我不得不解开她身上的降落伞才达此目的。”

两个年轻小伙尽可能轻轻地、稳妥地将颜雅清从飞机里抬出来，因为担心飞机发生爆炸，两人抬着颜雅清迅速离开事故现场，来到他们的小货车前。注意到颜雅清好像没有受重伤，他们总算终于松了一口气。

“泰克西和我将她抬到卡车上，”安德鲁斯回忆道。“她当时头晕目眩，不过还算清醒，特别嘱咐我们把她的皮夹子还有其他一些东西找到并拿回来。我们照办了。当驱车送她去医院时，这位爱美的小姐不停地调整货车的后视镜，看看自己破相了没有。”（章末注2）

这不足为怪。飞机坠地造成的巨大冲击力让颜雅清猛地向前撞到了仪表盘上，由于力度过大，那张娇俏的脸把玻璃的仪表盘都撞碎了，上面溅满了血。两个年轻人迅速把受伤的颜雅清送到了普拉特维总医院，当时颜雅清已经陷入昏迷状态。医院的医生乔治·泰勒（George Taylor）给颜雅清作了初步诊断，其结果是脑震荡和面部擦伤，但是她的鼻子是否骨折还有待进一步检查，另外她是否有更严重的内伤也要等X光片结果出来之后才能知晓。

关于中国女飞行员坠机的消息在小镇上迅速传播开来，当地人纷纷跑到坠机地点一探究竟。新闻媒体也迅速赶到事发现场对目击者进行采访。与此同时，泰勒医生也将颜雅清坠机的消息通知了华



普拉特维总医院的医生发给李霞卿的有关颜雅清伤情的电报。

华盛顿的有关部门，中国大使馆官员马上将这一震惊的消息通过媒体向全美和海外发布。

普拉特维小镇一下子成了国际媒体关注的中心，在短短的几个小时里，普拉特维总医院接到了来自纽约、旧金山、首都华盛顿以及美国其他大城市的 50 多个关于询问颜雅清伤情的电报和电话。泰勒医生无法对这些关切的电报和电话作一一回复，不过，他还是抽时间给颜雅清的飞行伙伴李霞卿发去了一份电报，当时李霞卿正在加州中部的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进行飞行和演讲，无论从私人还是工作的角度，她都对这次事故深表关切。

“面部严重擦伤，”泰勒医生在电报中说，“已恢复知觉，事发已经 18 个小时，但仍未能确定伤势。”

值得一提的是，事发后仅数小时，颜雅清的父亲在国内就听说了这一不幸的消息。因为一开始的消息说颜雅清伤势严重，所以心急火燎的父母马上给普拉特维打了一个电话。当时虽然还没有铺设跨太平洋海底光缆，但是中美之间已经可以通过几年前铺设的海外无线电话的线路进行越洋通话。在噼噼啪啪的嘈杂声的干扰中，颜福庆直接与泰勒医生通话，而后者也尽力安抚这位焦急的父亲的情绪，向他保证说他女儿的伤势不会有生命危险。

事实上，颜雅清本人对这次事故所带来的新闻效应也颇有些为难，一方面，她不愿意以这种病态示人，而另一方面，她又不得不履行她所担负的责任和使命。所以，当她恢复意识的那个下午，她就准许新闻记者进入她的病房，对她进行拍照和采访，这一出乎寻常的举动就连媒体也吃了一惊。据《蒙哥马利广告报》（Montgomery Advertiser）报道说，当时多家媒体一拥而入她的病房，对她一阵猛拍，其状不啻于一场折磨。该报推测，颜雅清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在媒体面前公开亮相，是“因为她意识到这可能对她的使命有所帮助”。不过，还有一种可能似乎更站得住脚，那就是颜雅清还处于半清醒状态，她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

在飞机坠地的那可怕的几秒钟内，颜雅清一定想到了死，但是，当她恢复意识接受采访时她显然已经忘记了那最后时刻的恐惧：

“坠机？坠机？”颜雅清侧身躺在病床上，鼻子和嘴上缠着厚厚的绷带，神志恍惚地问道。“我真笨。我可怜的人民。我必须为他们而工作。我坠机了吗？我必须为我的人民而工作。我不想罢手。”

当摄影记者你争我抢地抓拍病榻上的颜雅清的照片时，她那一头乌黑的鬈发还有那染红的指甲与那雪白的床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得知她的座机受损并不严重、而她本人也无大碍时，她表现得越发的冷静。她不顾自己的病体，义愤填膺地阐述了自己对这起事故的看法。

“如果日本没有侵略中国，”她义正严词地说，“这起事故就不会发生。”（章末注3）

第二天，关于颜雅清坠机的消息登上了美国各大报纸的头版。《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的报道颇为生动，“颜雅清的‘新中国精神号’坠机，她也受了重伤，这位美丽的中国女飞行员今晚恢复了意识，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说：‘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我愿意慷慨赴死。’”《华盛顿邮报》在头版折叠线上方的醒目处刊登了颜雅清以前照的一帧照片。而加拿大的一家报纸也刊登了受损飞机的照片。“慈善飞行宣告结束，”《维多利亚日

报》(Victoria Daily Colonist) 也戚戚艾艾地宣布道。(章末注 4)

塞翁失马，焉知祸福。一开始，战时难民救济会的成员们还担心颜雅清的伤势状况，而后来，他们吃惊地发现，坠机事故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宣传效果。相比在天上飞，躺在普拉特维总医院的病床上的颜雅清为抗战募捐所作的贡献更大、更多。

尽管颜雅清的伤势并无大碍，但是她在中国的家人依然十分担忧。颜雅清的伯父颜惠庆专门给华盛顿发了一封电报，并很快收到了中国驻美大使馆关于他侄女颜雅清坠机情况及事态发展的回电。而在重庆国民政府任职的颜雅清的前夫陈炳章也从相关渠道获悉了她的情况，他将所有获悉的有关颜雅清的情况一五一十、无论巨细都拍电报告知颜的家人。他们得知，在坠机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一辆救护车将颜雅清转送到了蒙哥马利市附近的圣玛格丽特医院 (St. Margaret's Hospital)，一家规模较大的、拥有 X 光机设备的医疗机构。(章末注 5)

颜雅清一转到圣玛格丽特医院，阿拉巴马州州长弗兰克·默里·迪克逊 (Frank M. Dixon) 就马上赶到医院表示慰问。这位曾在一战中效力空军部队并因伤而失去一条腿的受勋老兵对颜雅清英勇无畏的精神表示敬意。随后，阿拉巴马州的社会名流们纷纷前来医院探望颜雅清，而且所有人都表示将向难民救济会捐赠数额不小的捐款，以表达对中国人民的敬意和良好祝愿。中国驻美大使馆武官、飞行员郭泰川 (音译) 也代表大使馆第一时间从首都飞抵阿拉巴马。他很欣慰地看到颜雅清神清气爽，状态颇佳。(章末注 6)

于斌主教的秘书西德尼·李 (Sidney Li) 也赶到蒙哥马利探望颜雅清，他甚至还专程飞往坠机现场进行勘察。再次回到医院时，他向颜雅清表示同意她当时的决定，从空中望去，那块田确实看起来是周边地区内可作为迫降点的最佳选择。他向颜雅清传达了孔祥熙的问候，孔对颜雅清和李霞卿在美进行募捐飞行所取得的成绩表示赞许。

与此同时，颜雅清作了 X 光检查，确认没有严重内伤。医院的

一位医生向媒体证实，尽管发生坠机事故且当事人头部受创，但是她心理健全无损，而且表现得非常坚强。这位医生还透露说，颜雅清“心态积极乐观，富有幽默感，顽强地与伤痛抗争”。

一位富有教养的中国女子出现在美国南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区，而且是以这种方式到访，无疑是一石激起千层浪，颜雅清一下子成了当地媒体津津乐道的话题。在此之前，远东的战争似乎离他们遥不可及、非常虚幻，而现在阿拉巴马人突然意识到战争已经打到了他们的家门口。



颜雅清在阿拉巴马发生飞行事故后，该州最大城市伯明翰的地方报纸刊登了反映中国抗战的漫画[《伯明翰时代先驱报》(Birmingham Age Herald)，1939年5月3日]。

《伯明翰新闻报》(Birmingham News)以一种务实的口吻发表评论说，颜雅清的“不幸坠机事故应该激发美国人以一种更坚决的态度支持她所为之奋斗的中国的抗战事业。”《伯明翰时代先驱报》(Birmingham Age-Herald)的社论颇为抒情，称特殊情况导致了“一位中国女子为了和平而在阿拉巴马州上空飞翔并坠落在那个地方，”社论称这起事故纯粹是因为事发地的燕麦和山梅花树生长过于繁茂所致，这起事故虽小，但其背后的寓意不容小视：“为了和平而浴血奋战的军队，为了和平而不惜一己之躯的孤身女飞行员，这本身就说明了一种令人忧虑的世界局势，”该报编辑思忖道，“恐怖和牺牲将席卷全球，无处不在。”(章末注7)

漫画家甚至也参与了进来，其中一幅漫画将中国绘成了一个威武的士兵，面对一个个头矮小却咆哮狂暴的日本军官，士兵为了保卫家园挺身而出。另外一幅漫画画的是颜雅清低空飞过阿拉巴马的一条公路，公路的指示牌上用箭头标示着蒙哥马利所在的方向，这样颜雅清就不会再迷失方向了。

在一片纷纷扰扰中，颜雅清静静地躺在病床上，思忖着这次能够奇迹般地脱险。她在医院住了10天，这也是她近些年因故而被迫处于休整状态最长的一段时间，这让她有足够的时间回顾她走过的人生路以及她的奋斗目标。她在想，自己能够逃出生天、没有受重伤是否另有其因？这次事故是不是激励她更深刻地思考人生意义的一次机会？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颜雅清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远非是表面的。

1939年5月11日，颜雅清从圣玛格丽特医院出院。医院的医护人员都舍不得她离开，但是此时的颜雅清心像插上了翅膀，迫不及待地想离开这家住了10天的医院，第二天，她动身前往首都华盛顿，临行前，她告诉阿拉巴马的新朋友们说，可以通过奥图尔神父联系到她。像往常一样，她的离去又在当地引起一番轰动，前来送行的粉丝和祝福者络绎不绝。看上去颜雅清在最近一段时间没有具体的活动安排和计划，而医生叮嘱她再卧床休息两个星期，在康复的这段时间，她将住在中国驻美大使馆。此时的双橡园已经换了新主人，颜雅清家的老朋友、中国最著名的文人胡适大使正等待着她的到来，而那间收藏颇丰、富有魔力的图书馆也在召唤着她。（章末注8）

当颜雅清在华盛顿休养时，蒙哥马利机场的机械师修理好了她的座机。她在离开蒙哥马利前曾许诺说，她大概会在5月底待“新中国精神号”修理好之后就回来，她说到做到，座机修复后她回到了蒙哥马利。她先是回到圣玛格丽特医院做了一番检查，检查结果非常乐观，她已经完全康复，其身体状况允许她开始新一轮的巡回演讲活动。

坠机事故让颜雅清成了蒙哥马利的名人，这次颜雅清重返蒙市，当地

报纸上刊登的有关颜雅清发生飞行事故的漫画 [《蒙哥马利广告报》(Montgomery Advertiser), 1939年5月10日]。

It Must Be Very Disappointing



人无不欢欣雀跃，无不争相一睹其芳容、亲耳聆听其慷慨陈词，而颜雅清对蒙哥马利市民的盛情也是求之不得。她的募捐飞行赞助者中有一位就出生在阿拉巴马州，这就是著名残障教育家海伦·凯勒，能够得到该州最受尊敬的人物的支持，也保证了她不管去该州的哪个地方都会受到热烈的欢迎。她的日程被排得满满的。5月23日星期一，颜雅清在蒙哥马利市政厅播放了一部有关中国抗战的影片。次日，她在某扶轮社（Rotary Club）的午宴上发表题为“远东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演讲，当天晚上，她又在市礼堂作了专题讲座。星期三，她又在交流俱乐部（Exchange Club）再次播放了那部有关中国抗战的影片。

鉴于颜雅清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任干事期间所作的杰出贡献，蒙哥马利基督教女青年会在其女子会所专门为颜雅清举办了一场茶话会。在那间摆满了春花的大会议室里，颜雅清向济济一堂的数百位女嘉宾介绍了她的同胞正面临的苦难与困境。像往常一样，她费心地向听众强调，中日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是日本的军国主义者而非日本人民。中国与之抗战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及其狼子野心，而非日本民族，她还表示，希望有朝一日中日关系能够恢复正常化。

在没有其他安排的空闲时间里，颜雅清给粉丝写回信。圣玛格丽特医院向她转交了一大堆信件，在她回华盛顿休养期间，向其表达慰问和钦佩之情的信件像雪片一样从美国各地寄往蒙哥马利。许多来信者向她索要照片，而她也乐于相送，但不是免费的。有英文签名的照片她收取1美元，用中文签名再加收1美元，所有签赠照片的收益将捐赠给那些难民同胞。颜雅清承认，她的签名照开的价似乎有点高，但这是出于人道主义援助的考虑，因为两美元可以让一条生命维持两个月的时间（章末注9）。

颜雅清又回来了，她利用坠机事故所带来的超高人气进行巡回演讲募捐，成效斐然。她继续未完成美国南部之行，只是她没有像以前那样独自驾机而是乘车而去。是她因为坠机事故没了自信、害怕再次飞上蓝天？还是她的家人成功说服了她放弃这一危险的运

动，理由是用其他不那么冒险的方式一样也可以报效国家？或许也许这次事故后，她经过理性而慎重的思考，决定放弃她一度认为的做一位女飞行员是她的宿命，或许她将这次事故当作一个警醒和暗示，即她的天职可能不像她所想像的那样狭隘和局限，而她为了和平和正义所作的一切努力也可能变得更出于精神上的需要而非政治上的原因。



颜雅清（左二）与完成飞行计划的李霞卿（左三）合影留念，1939年6月摄，右一为干斌主教。

结束了美国南部之行，颜雅清回到了纽约。1939年6月15日，李霞卿胜利完成了她的环美万里飞行回到纽约。颜雅清前往机场迎候。两人再次相见可谓悲喜交集。颜雅清很遗憾自己未能完成原定的飞行计划，但是看到李霞卿平安归来也颇感欣慰，两人通过共同的努力实现了预期的目标，为中国争取抗战援助作出了巨大贡献。

8月中旬时，颜雅清逃离了纽约的炎热与喧嚣，在美国东北部缅因州的海滨胜地，一个名叫东北港（Northeast Harbor）的小镇享受了难得的一个假期。在那里，她接受了缅因州州长刘易斯·巴洛（Lewis O. Barrows）的邀请，作为特邀嘉宾出席美国最著名的航空

会议之一的缅因航空会议（Maine Aero Rendezvous）。这是一次主要由知名女飞行员参加的会议，巴洛州长认为，只有颜雅清小姐列席会议，这次活动才堪称完美。全美各大媒体对颜雅清的坠机事故进行了广泛报道，她一时成为了美国民众心目中的女英雄。此次会议的主办方估计，有这位英勇的中国女飞行员到会，定会吸引广大媒体和民众的关注。颜雅清不愿错过这一为祖国摇旗呐喊的大好机会，她欣然接受了邀请，乘机飞往缅因州首府奥古斯塔（Augusta），航空会议定于1939年8月26日至27日在那里举行。正如主办方所预计的，会场内，人头涌涌，气氛沸腾。而作为号召人物的“中国的艾米莉娅·埃尔哈特”也不失时机地进行抗战宣传。在此次活动中，颜雅清成了媒体追逐的对象，无论是出席宴会还是与美国著名飞行员劳拉·英格斯（Laura Ingalls）亲切握手，都有摄影记者尾随拍照。此外，颜雅清还接受了新闻媒体的采访，向记者们解释了为祖国而呼吁奔走的原始动机。

“我不受雇于任何人，”她表示，“但是我的祖国正遭受的苦难深深地触动着我，如果在海外奔走呼号能为国家和同胞做些什么，那么我当竭尽所能。”（章末注10）

这就是颜雅清的使命宣言，它解释了她的动力源泉，也说明了她的出发点和动机。她是一位行动主义者，受心灵的支配，遵从上帝的旨意和自己的良知。

几天后，颜雅清再次踏上征程，飞往俄亥俄州的克里夫兰，与她同行的还有李霞卿以及中国驻美大使馆武官郭泰川。他们三人代表中国出席了全美最著名的航空展——全国航空赛（National Air Races），活动结束后，他们各自离开，颜雅清回到缅因州小镇东北港继续度假。

注释

1 显然，在离开莫比尔前，颜雅清没有给飞机加油。除非发生机械故障或是对机上实载燃油量计算错误，否则在油箱满载的情况下，燃油足以保证飞机飞行约340英里，而莫比尔至伯明翰的空中距离仅216英里。

2 “Aerial Tour for China Lands Pilot in Hospital,” *Montgomery Advertiser*, May 2, 1939.

3 同上。她因撞伤较深而缝合数针。一篇较早报道这一事故的文章称，颜雅清的鼻子严重受伤，两颗牙齿断裂。“Chinese Aviatrix Hurt in Plane Crash,” *Dunkirk [NY] Evening Observer*, May 2, 1939. 颜雅清的孙子回忆她至少有一颗假牙，可能就是这次事故造成的。

4 “Chinese Mercy Flyer Crashes,”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May 2, 1939; “Hilda Yen Injured as Plane Crashes,” *Washington Post*, May 2, 1939; “End of Goodwill Tour,” *Victoria Daily Colonist*, May 21, 1939. 有关颜雅清发生飞行事故的消息传到国内时，媒体报道均出现失实。美国人在上海办的英文周报《密勒氏评论报》(*China Weekly Review*)于1939年5月6日报道称，颜雅清在这起事故中身受重伤，而港版《大公报》1939年5月8日的报道更是张冠李戴，将李霞卿说成是这次事故的受害者。

5 颜惠庆，《颜惠庆日记》，1939年5月1日至8日。

6 “Gov. Dixon Visits Injured Aviatrix: Pretty Chinese Girl Showing Rapid Recovery,” *Birmingham Age-Herald*, May 3, 1939.

7 “Miss Yen’s Crash: a Dramatic Reminder of Her Mission,” *Birmingham News*, May 3, 1939; “A Chinese Girl,” *Birmingham Age-Herald*, May 3, 1939.

8 胡适于1938年—1942年出任中国驻美大使，1942年9月，突然辞去大使一职，由魏道明继任。魏道明是女权运动的鼓吹者、著名律师郑毓秀的丈夫，女飞行家郑汉英的姑父。

9 中国平民救济联合会 (The United Council for Civilian Relief in China) 印刷了一份清单，列出了1美元在中国的价值：1美元，能购买足够治愈一名疟疾患者的奎宁；能防止50人感染霍乱；能防止50个人感染黑死病；能防止50个人感染伤寒；能为1000人一天的饮用水消毒；能为2000名烧伤病人提供足够的丹宁酸；能解决一名儿童一个月的口粮问题。中国平民救济联合会档案，本书作者收藏。

10 “Miss Yen Thinks Russo-German Pact Will Be ‘Helpful’ to China,” *Daily Kennebec Journal*, August 28, 1939.

8. 美国医药援华会对华援助

在二战爆发前的那几年，争取西方人同情和资金支持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机构十分寥寥，中国为抗战而寻求海外支持因此享有肥沃的土壤和空间。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各种各样的援华基金会如雨后春笋般在北美建立起来。颜雅清曾为之效力的战时难民救济会最终并入美国对华急救委员会，该委员会由美国知名女作家赛珍珠（Pearl S. Buck）与其丈夫沃尔什一道发起成立。赛珍珠夫妇的对华急救委员会逐渐与美国最具声望的慈善募捐机构之一的美国医药援华会（American Bureau for Medical Aid to China, ABMAC）联手为中国抗战实行人道主义救援。美国医药援华会由纽约著名华人医生许肇堆博士发起成立，许博士是纽约大学医学院实验外科实验室的负责人，一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和研究员。（章末注1）

许肇堆博士满怀仁爱之心，将一半的时间都倾注到了医药援华会的抗日救亡募捐活动。不少知名的医生及志愿者无私地向他提供帮助和支持，包括他的妻子，后者曾与颜雅清一道为中国妇女救济会工作。赞助颜雅清美国募捐飞行的美国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之子小西奥多·罗斯福中校曾任医药援华会会长。在医药援华会成立初期，罗斯福中校通过“一碗饭运动”为医药援华会募集到了大量资金。“一碗饭运动”是美国医药援华会为了购买药物和医疗设备支持中国的抗战，而在美国人民和旅美华侨中开展的一项捐款运动。顾名思义，即每人节省“一碗饭”的开支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自从1939年首倡以后每年举行一次，影响很大，特别

是在美加两国，吸引了广大民众积极参与。赛珍珠夫妇的对华急救委员会也开展了各种募捐活动，夫妇俩将募集到的资金转汇给美国医药援华会，由该会负责购买医药设备，这些医药设备经由滇缅公路从仰光运到中国内地。（章末注2）美国医药援华会董事会成员均由美国和华人知名人士担任，其中包括不少颜雅清的朋友：于斌主教、好莱坞华人女星黄柳霜、美国医生爱德华·休姆的妻子，休姆即胡美，当年与颜雅清的父亲颜福庆一同在长沙创建湘雅医学专门学校，10多年前，在北伐军打进长沙城时，颜雅清还救过胡美一命。（章末注3）

在对美国人民进行中国抗战募捐宣传时，美国医药援华会援引了大量的侵华事实和中方军民伤亡数据。时任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的颜福庆，也在重庆与政府其他部门一道，向世界各大通讯社定期报告中方军民伤亡的惨状。根据报送的最新数据显示，截止1939年5月，中国军方伤亡人数达100万，600万儿童沦为孤儿，5000万民众成为无家可归的难民。需要政府救济和援助的贫困难民总数达到1600万之巨。更糟糕的是，中国医护人员



美国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之子小西奥多·罗斯福中校（Col. Theodore Roosevelt Jr.）对颜雅清的抗战飞行给予财政支持并协调代表中国难民的“一碗饭运动”^①的各团体组织的活动。

BOWL OF RICE BALL



"Mei Yu Fan Chi!" — "We Have No Rice!"

1939年在纽约举行的“一碗饭运动”募捐活动的宣传封面，封面上饥饿的孩子由著名画家蒋兆和所绘。

^① “一碗饭运动”（Bowl of Rice Movement）由美国医药援华会等团体于1939年首倡。它每年举行一次，在美国人民和华侨中募集捐款，以购买医药和医疗设备，支援中国抗战。——译注

极其匮乏，超过4万万人口的大国竟然只有6000名医生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而这个数字仅占纽约执业医生人数的一半左右。颜福庆博士向全世界的医生发起呼吁，来华救助那些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章末注4）



颜雅清代表中国出席在美举行的高层外交会议，摄于40年代初。

颜雅清也参加了美国医药援华会的活动，她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演讲让美国人民和旅美华侨了解援华会的各项活动进展状况。作为时任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颜福庆之女，她的演讲更有公信力，各种公开演讲的邀约不断。7月，纽约广播电台 WJZ 将其作为“明日之女性”对她进行了专访。7月底，她又获邀出席由美国医药援华会为胡适大使举办的一次晚宴并在晚宴上致辞。在宴会上，颜雅清一如既往地宣称，中国人民虽然正经历着苦难，但是其抗击侵略者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10月，纽约基督教电台 WMCA 实况播送了颜雅清在某社交名流俱乐部午餐会上所作的题为“少年中国之精神”的演讲。11月，颜雅清又在世界妇女档案中心（World Center for Women's Archives）的年会上作为演讲嘉宾发表演说。

不过，在1939年9月初，颜雅清和同仁在美国开展的抗战募

捐因为德国闪击波兰而暂时受挫。作为波兰的盟国，两天后英国对德宣战，二战爆发。在之后的几个月的时间里，欧洲成为全世界的焦点，美国也因此陷入巨大的战争危机。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的抗日救亡成了次要的事情。不过，在当年举办的纽约世博会上，10月10日，即中华民国国庆日被定为“中国日”重新又吸引了美国民众对中国抗战的关注。这次“中国日”活动历时三个多星期，包括在全美600多个城市举行的一系列新的“一碗饭运动”以及其他宣传活动。

在一系列活动的影响下，美国民间支持中国抗战的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美国爵士单簧管大师阿蒂·肖 (Artie Shaw) 受命为《中华民国国歌》(又称《三民主义歌》) 专门创作一首管弦乐曲，而美国的学校也开展了主题为向中国提供援助之重要性的作文竞赛，获奖者将得到现金奖励。纽约唐人街张灯结彩，舞龙表演穿街走巷，爆竹声声，烟花灿烂。不过，这些特别的庆祝活动并未能驱散那个秋天笼罩在中华民族头顶的阴霾。战争在继续，形势在进一步恶化，中国孤立无援，缺乏盟国的援助和支持。

不过，对颜雅清来说，这些阴霾因为亲人的到来而被暂时驱散，10月28日，她的伯父颜惠庆抵达纽约。颜惠庆此次搭乘美国“哈里森总统号”轮船抵美，同行的还有他的女儿颜楠生及外甥女，两个晚辈都是来美留学的。自1936年辞去驻苏大使以来，颜惠庆一边经营实业，一边忙慈善。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又开始重新起用像颜惠庆这样的老牌外交家。这次颜惠庆以中国首席代表的公开身份出席11月下旬于美国弗吉尼亚海滨市 (Virginia Beach)

UNITED COUNCIL FOR
CIVILIAN RELIEF IN CHINA
NATIONAL COMMITTEE

COLONEL THEODORE ROUGHLEY, Jr., *National Chairman*
DR. JOSEPH D. MCGOLDRICK, *National Treasurer*
DR. DONALD D. VAN SYKKE, *Secretary*
DR. MAURICE WILLIAM, *Chairman Fund Committee*
DR. FRANK GO TUI
DR. FRANK L. MELENY
MR. BRUNO SCHWARTZ, *National Campaign Manager*

NEW YORK CITY
BOWL OF RICE BALL

Mrs. GWEN DEW, *Director of Ball*

PATRONS

MR. MYRON TAYLOR, *Honorary Chairman*
Archduke and Archduchess Leopold of Austria
Princess Pauline-Sofiane
Dr. Taroichi Ya, *General Counsel*
Dr. and Mrs. Frank Go Tui
Madame Alma Chapelle
Mr. and Mrs. James S. Cushman
Mrs. William H. Harkness, Jr.
Mr. and Mrs. Roy W. Howard
Mr. and Mrs. Robert Lehman
Mr. and Mrs. K. C. Li
Mr. and Mrs. Henry E. Luce
Mr. and Mrs. Clark Minor
Col. and Mrs. Theodore Roosevelt, Jr.
Mr. and Mrs. Bruno Schwarz
Dr. and Mrs. Lin Yutang

EXECUTIVE COMMITTEE

MISS TALLULAH BANKHEAD, *Chairman*
Mrs. F. H. Ampacher
Miss Louise Franklin Bache
Miss Anne Borchardt
Mrs. Richard Boardman
Miss Louise Branch
Miss Si-Lan Chen
Dr. and Mrs. Fern Chu
Miss Alice Ringwald
Miss Gertrude Green
Mr. William Griffin
Miss Melvina Hoffman
Mrs. Francis S. Howard
Carmen La Salle
Miss Ya-Ching Lee
Dr. and Mrs. Frank L. Meleeny
Mr. Harold C. Murray
Mr. and Mrs. Marsden J. Perry
Mrs. Edgerton Peterson
Miss Marjorie Riedman
Miss Len Siegel
Mr. Guy E. Sweeney
Mrs. Oscar Stevens
Mrs. William Johnson Taylor
Dr. and Mrs. Donald D. Van Slyke
Miss Elizabeth Waterbury
Miss Gladys Waresberg
Dr. and Mrs. Maurice William
Miss Cecelia Wyckoff
Miss Hilda Yen

颜雅清和李霞卿被列为1939年纽约“一碗饭运动”募捐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委员。

飞天名媛
sisters of heaven

举行的第六届太平洋国交讨论会^①。家人团聚自是欣喜异常，颜惠庆等三人看到颜雅清自半年前坠机事故后并没有落下什么后遗症而感到宽慰。颜雅清下唇中间往下延伸的那道伤疤依然清晰可见，不过，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这道疤痕反而更平添了她的美。三位亲人轮流向她讲述了此次美国之行的情况，因为欧洲战事爆发，他们的航程也被延误，其乘坐的那艘轮船也突然被军方暂时征用，船上所有人员一时被迫滞留在孟买。颜惠庆则充分利用这段空闲时间拜访了印度国大党的领导人以及印度政治家、印度独立运动领袖尼赫鲁先生（Nehru）。颜惠庆告诉雅清，与这些印度政界名人的沟通十分难忘。在印度滞留三周后，他们才得以搭上原来那艘船，继续赴美的航程。

第二天，颜雅清带两位堂妹表妹参观纽约世博会，此时世博会已近尾声。之后是万圣节前夕，她又邀请她们观看了一场时装秀的预演，颜雅清在这场时装秀中客串模特。这场名为“中国服装的古与今”的时装秀计划作为纽约市即将到来的一碗饭运动募捐舞会上的表演节目。舞会由中国平民救济联合会主办，主办方承诺将此次活动办成纽约各界名流参与的盛会。（章末注5）好莱坞著名影星塔露拉·班赫德（Tallulah Bankhead）任联合会会长，颜雅清和李霞卿任联合会执行委员。性情耿直的班赫德小姐是名副其实的阿拉巴马名门之后，其童年的大部分时间在蒙哥马利度过，其父为众议院议员，祖父是参议员，她和颜雅清有许多关于阿拉巴马的共同话题和美好回忆。两人都极力反对二战爆发前后美国孤立主义势力所倡导的保持中立、利用其独特的地理位置隔岸观火的态度。

不过，颜雅清和塔露拉无暇顾及政治，她们忙着筹备时装秀的各项事宜。自从远东爆发战事以来，“东方”风格就成为时尚，筹备方预计此次时装秀将取得圆满成功，但为了保险起见，他们邀请如今闻名遐迩的两位中国女飞行员颜雅清和李霞卿来客串表演。

^① 一战后，奉行“海权论”的美国人率先邀请太平洋区域沿岸各国成立“太平洋国际学会”（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25年7月成立），这是亚太地区非政府国际组织的先驱之一，在中国一度称之为“太平洋国交讨论会”。——译注

颜雅清和李霞卿在时装秀上要穿的几套传统服装非常合身，像是专为她们定做似的，这几套衣服属宋庆龄女士私人收藏，有明清宫廷服装，也有京剧戏服，不过，时装秀上要展示的其他一些现代装也非常抢眼。这些现代装由著名时装设计师张倩英所设计，张倩英是第一位在纽约开业的中国专业时装设计师，在时装界享有盛名，被誉为“上海的夏帕瑞丽（Schiaparelli）^①”。张倩英于1938年来到美国，在纽约经营一家服装设计店。她的设计多采用中国古老服装的式样，典雅华贵，在经营服装设计的同时，受其父亲影响，她对中国抗战十分关心，在美经常参加募捐活动。在这次时装秀上，有一件她设计的瘦身主妇家居装，软天鹅绒的质地，配上不少缎子的斜纹设计，别具一格，颜雅清穿着这件可爱的家居服和其他衣服出场亮相时，照相机对着她拍个不停。

为确保时装秀取得圆满成功，似乎整个纽约市都行动了起来。模特们穿的鞋子由以名贵珠宝首饰闻名的萨克斯第五大道精品百货店所提供，美国著名女飞行家杰奎琳·科克兰捐赠了一个用来抽彩出售的珠宝盒，著名影星凯瑟琳·赫本（Katharine Hepburn）则捐献了两张由她主演的大受欢迎的百老汇舞台剧《费城故事》（*Philadelphia Story*）的门票。最终，由奥地利大公利奥波德（Leopold）夫妇、波斯公主Farid-es-Sultaneh等人赞助的“一碗饭运动”取得巨大成功，而颜雅清和李霞卿的参与也被认为是功不可没。（章末注6）

11月底，颜雅清的私人飞行员执照过期，不过可能是因为过于忙碌她本人并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抗战募捐占用了她大量时间，而且她的生活中出现了另外一个男人，关于此人，史上只知其名叫“乔治”，显然，颜雅清与乔治过从甚密。此时，颜雅清的前夫陈炳章也来到纽约。此次他搭乘檀香山飞剪号（*Honolulu Clipper*）水上

^① 艾尔莎·夏帕瑞丽（Elsa Schiaparelli），意大利著名服装设计大师，其艺术家的修养加上意大利人的热情，给当时巴黎高级时装界盛行的“功能主义”注入了一泓清新的溪流，她使服装更具有艺术性，更具有现代艺术的魅力。如同可可·香奈儿（Coco Chanel）风靡20年代那样，夏帕瑞丽风靡了整个30年代。——译注

飞机从中国飞往旧金山，准备前往目的地——弗吉尼亚海滨市（Virginia Beach），与颜惠庆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一道参加在那里举行的第六届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章末注7）欧洲战事爆发导致赴美之行困难重重，中国代表团的部分成员也因故而未能成行，所以那些想尽办法到达美国的代表决定从美国本土物色合适人选参加会议。颜雅清因此有幸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了会议。此次会议的议题包括社会问题，而这正是颜雅清的专业领域。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议题就是讨论日军侵华对麻醉药在华贸易和消费的巨大影响，因为战争，麻醉药的用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章末注8）太平洋国交讨论会对与在美的中国救济机构建立联系也表示出了兴趣。

弗吉尼亚海滨市位于弗吉尼亚州，弗吉尼亚是英国在北美成功开辟的第一个殖民地，被誉为美国革命和民主的摇篮。颜惠庆本人也特别期待能在会议之余对此地进行观光游览。（章末注9）而颜雅清此次能与伯父一起参加会议机会实属难得，而上一次已经是多年以前的事了。他们预订了环境幽雅的骑士酒店（Cavalier Hotel），会议将在这里举行，他们发现，由于与会者人数不多，酒店的人住率并不高，其服务设施也显得十分空闲。日本拒绝派代表与会，而且由于欧洲战事吃紧，英、法、荷、意及苏联等国均未派代表出席。另外，旅游淡季也是导致人气不旺的一个原因。那些费尽周折来参加会议的代表在空荡荡的酒店里吃住和工作，十分的清静。低头不见抬头见，颜雅清和前夫陈炳章总有机会碰面，而伯父颜惠庆就在两人之间充当和事佬，两人相处气氛十分融洽，一直到12月初会议结束，两人计划共同驾车返回纽约。颜惠庆在一旁细心地观察着这对曾经的夫妻之间的沟通和交往，虽然两人不至于那么陌生，或者说两人的态度十分友好，但是颜惠庆在日记中写道，两人看起来并没有破镜重圆的意思。日记中他也提到了乔治，提到不知他的侄女是否会和他结婚。（章末注10）太平洋国交讨论会后，颜惠庆在美游历了一些地方，后来因为还有公务在身，滞留在加州瑞奇蒙市。颜雅清则和陈炳章一同驾车回到纽约，事实证明，两人并未因这次邂逅而再次牵手，而是继续各奔各的情感之旅。

注释

1 许肇堆博士 (1897—1984)，著名华人医生、医药研究科学家，战后，他回到祖国，为国家的科技发展积极奔走。许博士出生于福建晋江，童年时远赴菲律宾，并在菲律宾大学获得文学士和医学博士学位。1923年—1925年，许肇堆受美国崇仁医院之聘赴芝加哥，开始了他的美国行医生涯，此后长时间在美国医学界工作，后担任纽约大学医学院教授。此外，他还担任众多社会职务：美国科学促进会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美国药理学学会 (American Pharmacological Society) 会员，纽约医学学会 (NY Academy of Medicine)、纽约科学学会 (NY Academy of Science) 研究员。

2 到1941年，美国募集到的援华资金达80万美元，这些钱被用来购买抗战亟需的物资。虽然中国亟需的物资清单内容时有不同，但最紧缺的物资会定期通过泛美飞剪号水上飞机空送给美国医药援华会 (ABMAC)，而后者会尽快安排将有关物资运往中国。经滇缅公路运至重庆的主要物资包括：医疗救护车、黑死病疫苗、灭鼠药 (老鼠是鼠疫的主要传染源)。磺胺噻唑 (Sulfathiazole) 这一药物当时才研制出一年，因其疗效显著而被称为“神奇的子弹”。它也可用于治疗痢疾和败血症，因而需求量极大。参见美国医药援华会1941年2月12日的公开信 (打印文本)；美国医药援华会1940年12月至1941年6月有关资料；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希雷·G·马德图书馆美国援华联合会档案 (United Service to China Archives, Seeley G. Mudd Libra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inceton, NJ)。

3 休姆医生本人也全身心地投入到援华工作中，他在美国医药援华会身兼数职：援华会副司库、援华会组织委员会主席、援华会医疗委员会及需求发放委员会委员。

4 “More of Chungking Bombed,” *New York Times*, May 13, 1939; “American Missions Bombed,” *New York Times*, May 16, 1939.

5 中国平民救济联合会 (The United Council for Civilian Relief in China) 由3个著名的中国救济机构组成，即：许肇堆博士发起成立的美国医药援华会 (ABMAC)、小西奥多·罗斯福中校任会长的中国平民急救会以及王宠惠夫人朱学勤任会长的中国平民救济妇女委员会。颜雅清与这3个组织都有密切的联系。小西奥多·罗斯福中校后来担任联合会会长，监管

手下一大批帮助协调联合会救济事务的志愿者。为了更好地协调参加“一碗饭运动”的各方，联合会向北美各市市长、北美各委员会会长、报社记者及电台经理、宗教出版社的编辑、各地商会负责人、女子俱乐部负责人、男子俱乐部及团体的负责人以及电台评论员各发出了800、520、700、256、2089、375、288、15封倡议书。各社区接到通知说，“一碗饭运动”的各方可能通过晚宴、茶会、舞会、戏剧会或其他任何当地组织者觉得合适的活动开展募捐。首轮“一碗饭运动”于1938年发起，共募集178362.37美元，该运动募集的所有捐款将用于中国的抗战救济工作。中国平民救济联合会档案，本书作者收藏。

6 1939年11月9日，纽约“一碗饭运动”在位于曼哈顿第五大道61街的皮埃尔饭店（Hotel Pierre）举行。

7 “太平洋国际学会”（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在中国一度称之为“太平洋国交讨论会”）催生于1919的一项提议，当时太平洋区域沿岸各国的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的代表们提出，通过定期召开区域会议来促进一战后各国间的理解与合作。1923年5月31日，澳大利亚作为东道国举办的首届会议，但次年召开的会议拓宽了会议的范围，从而偏离了基督教青年会通过这一会议来加强太平洋沿岸各国团结合作的本意。1925年7月，真正意义上的首届太平洋国交讨论会在夏威夷召开，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韩国、日本、新西兰、菲律宾和美国派代表出席了会议。

在1939年于弗吉尼亚海濱市（Virginia Beach）召开的第六届太平洋国交讨论会上，亚当·范·特劳特·祖·索尔斯特（Adam von Trott zu Solst 1909—1944）作为德国观察员也出席了会议。尽管美国当局怀疑他是纳粹分子，但实际上范·特劳特参与了施陶芬伯格（von Stauffenburg）刺杀阿道夫·希特勒的阴谋行动。范·特劳特先是到了中国，然后前往美国，为其刺杀行动寻求外援，但最终一无所获回到德国。1944年，刺杀行动失败，他因参与刺杀而被处死。

8 马库斯·梅万（Markus Mervine），旅居天津的美国观察家，曾撰写一篇题为“天津的日租界及麻醉药品贸易”（Japanese Concession in Tientsin and the Narcotic Trade）的文章，该文刊载于由南京国际事务委员会发行的1937年2月11日的《情报公报》（Information Bulletin）上。该文披露，麻醉药品贸易实际上是日本实施的一项对华政策，日本试图借在华麻

醉药品贸易这一工具，以达到其蒙蔽和削弱中华民族意志的不可告人的目的。

9 中国代表都很高兴能有机会在这个历史名城参加会议，而颜雅清更是欣喜地得知，与会地点距怀特兄弟的首次试飞地斩魔山（Kill Devil Hill）仅 60 英里。1903 年，怀特兄弟在斩魔山成功地进行了人类历史上首次带有发动机的飞机试飞，颜雅清等赴弗吉尼亚海滨市参会之时，怀特兄弟首航试飞 36 周年纪念日刚过去数周。

10 颜惠庆，《颜惠庆日记》，1939 年 12 月 6 日。



9. 返回远东

尽管二战爆发给太平洋沿岸带来很多不安定因素，但是泛太平洋地区的交通并未中断。事实上，该地区的交通量因为战争反而增加了。包括宋美龄女士在内的几位中国高层，为了获得美国人的援助和支持，在抗战的那些年乘船或飞机频繁往返于两地之间。而许多回到故土的中国人，最终纷纷放弃了西方的安逸生活而选择留在满目疮痍、战火纷飞的祖国。

著名学者林语堂的一个女儿，当时只有十几岁，曾撰文讲述为何她和她的家人要那么急切地回到中国去，回到同胞中去。“他们在受苦受难，他们在进行抗争，而我们却在安享舒适的生活、在外国的土地上四处游走……无论如何我必须回去。”（章末注1）

回到同胞们中间，再次成为其中的一员也是一件令人快慰、无上荣光的事。“中国人的脸，中国人的形象，中国人的眼，还有中国人的头发！”她写道，“在过去几年，我见到的全是外国人，而现在我看到的全是自己的同胞，我看啊看，看个没完。”（章末注2）

1940年3月10日，颜雅清的伯父颜惠庆和前夫陈炳章也回到了国内。（章末注3）参加完第六届太平洋国交讨论会后，两人在美逗留了一段时间，但是后来两人也急切地想回国。陈炳章迫切想回国还另有其因。他开始了新的个人生活。在美逗留时，他与一位梁姓小姐喜结连理。陈炳章的这位新夫人也来自上海，也是一位时尚女性和社交名媛，与颜雅清十分熟识，两人都曾是上海中国妇女会的活跃分子。很有可能颜雅清向两人表达了祝福。不过最终，这

场婚姻还是以悲剧而告终，陈炳章夫妇俩回到重庆的几个个月后，陈妻就因为分娩生产而亡，一说是因为产褥热而去世。（章末注4）

1939年10月颜惠庆初抵美国时，就与颜雅清进行了一番长谈，希望她与他一道回国。最终，颜雅清同意了。她收拾妥当，搭乘从旧金山飞往马尼拉的泛美飞剪号（Pan-Am Clipper）水上飞机，到达马尼拉苏碧湾（Subic Bay）后，她取道香港，找到了湾仔活道42号3楼的一间公寓。当时，她的几位家人还在港岛躲避战乱，包括妹妹湘清和父亲颜福庆，此时，颜福庆已辞去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一职。（章末注5）尽管家人团聚令人十分快慰，但是颜雅清似乎对残酷的战争和自己的人生路深感忧虑。3月19日，颜惠庆在日记中记述了与颜福庆讨论了“雅清的事”，但是关于何事他未作具体说明。

虽说当时香港还算安定，但是由于难民大量涌入，这个弹丸小岛的人口一下子剧增到了150万，而其中不少人有着一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性，比如说整夜吵吵闹闹，另外来港避难的歌女们也是人数甚众。颜雅清并不喜欢这样的氛围，所以她的精神状态到了香港后而变得更好那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虽然港岛的生活看似乎和气闲，但是这与上海滩曾经有的那种国际化的大融合气氛完全不同。作为一个国际主义者，这一点是让颜雅清难以忍受的。颜惠庆曾对港岛的种族隔离作过一番探讨。

“也许这得归咎于英国人，”他表示，“因为英国人生性保守，不合群，而那些在租界地的英国人更是一副趾高气扬、高高在上的样子，所以他们与那些土生土长的‘岛民’难以融合就不足为怪了。”（章末注6）

还有令颜雅清和颜惠庆深感失望的是，香港租界拒绝了英国提出的在港岛建立总领事馆的请求，而其他大国均在港设有领事机构。英国人的这种傲慢态度显然过于短视和无礼，因为当1941年12月日军进犯香港时，英国人突然改变态度有求于中国。

颜雅清在港无所适从，闷闷不乐，因为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来源。在这期间，她所做的事情就是尽量照顾一同前来港岛避难的

她的两个孩子。1941年新年伊始，颜雅清的父亲和伯父再一次谈论了雅清如何在港自食其力这个棘手的问题。一个月后，颜雅清告诉伯父她已经找到了一份在海关学校任教员的工作，伯父很高兴，祝她工作顺利，但是到5月份时，颜惠庆从一位亲戚那里听说雅清正在看精神病医生。（章末注7）

尽管如此，那个夏天还是有点让大家兴奋的事情，香港的电影院播放了一部题为《美洲华侨一碗饭运动》的纪录片（章末注8）。这部纪录片讲述了在美义工为救济中国难民所做的工作，其中就有颜雅清和伯父参加在旧金山唐人街孙中山先生雕像前举行的一个仪式活动的片断。颜惠庆是个电影迷，估计他会很高兴地看到自己的光辉形象出现在荧屏上。

1941年11月底，颜雅清告诉家人说她已经决定离开香港，但与此同时，她又到小山上的防空洞踩点，以防日军空袭时有处可藏。几天后，日军果然进犯港岛，或许颜雅清为自己的先见之明而庆幸，不过在香港也有很多像她这样的先知先觉者，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有不少人已经预料到太平洋地区的紧张局势与日俱增，那种安逸祥和只是表面的、暂时的，迟早要被打破。一段时间以来，日本人要攻打香港之说就像悬挂在港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①，不少人为避战乱逃离香港，前往相对安全的澳门或内陆地区，而那些留下的人则对英国驻军保卫港岛的誓死决心抱有幻想。香港的驻军原为4个营，1941年10月又派去两个加拿大营。在日军进攻前，

^① 达摩克利斯之剑，此典故出于古希腊的一个历史故事：公元前四世纪西西里东部的叙拉古王迪奥尼修斯（公元前430—367）打击了贵族势力，建立了雅典式的民主政权，但遭到了贵族的不满和反对，这使他感到虽然权力很大，但地位却不可靠。有一次他向宠臣达摩克利斯谈了这个问题，并且用形象的办法向他表明自己的看法。他为了满足一下宠臣达摩克利斯的贪欲，把宫殿交托给他，并赋予他有完全的权力来实现自己的任何欲望。这个追求虚荣、热衷势利的达摩克利斯在大庆宴会时，抬头看到在自己的座位上方天花板下，沉甸甸地倒悬着一把锋利的长剑，剑柄只有一根马鬃系着，眼看就要掉在头上，吓得他离席而逃。这时迪奥尼修斯王便走出来说道：“（达摩克利斯头上）这把利剑就是每分钟都在威胁王上的危险象征，至于王上的幸福和安乐，只不过是外表的现象而已。”因此，人们用“达摩克利斯之剑”借比安逸祥和背后所存在的杀机和危险。——译注

岛上共有英国、印度和加拿大的地面部队约 1.2 万人，其海军部队只有 1 艘舰龄很老的驱逐舰、8 艘炮艇和若干巡逻艇。12 月 6 日，日本海军特混舰队长途奔袭，以舰载机偷袭了美军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就在当天晚上，颜雅清还在半岛酒店举行的英国皇家空军（Royal Air Force，简称 RAF）的一个募捐活动上献唱了几首歌曲。

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次日，罗斯福总统在国会大厦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和战争咨文，正式对日宣战。美国公众彻底放弃孤立主义，投入到对轴心国的战争中。中国对美国加入战争表示欢迎，这意味着中国人现在有了一位强大的、并肩作战的盟友。但是，12 月 8 日，也就是美国对日宣战的第二天，日军下令进攻香港。

颜雅清目睹了日军的来袭，日本空军的轰炸机一排排、一架接一架地呼啸着俯冲而至，然后就听见震耳欲聋、地动山摇的爆炸声。轰炸持续不断。大难临头，颜雅清首先想到的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同胞的安宁。她一路躲避着狂轰乱炸，赶到一个伤员急救站，为那些伤员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正是在那里，颜雅清度过了她有生以来的第一个不眠之夜，空袭还在继续，炮声依旧隆隆。她想到，如果在急救站的楼顶上悬挂一面红十字会旗敌人也许会发发善悲。想到这，她和其他人冒着生命危险爬到楼顶，插上了一面红十字会旗。但是，事与愿违，敌人并没有因此而发善心，那面象征着人道主义与怜悯仁慈的旗帜恰恰使她们成了显著的攻击目标。颜雅清为侵略者的这种卑鄙行径表示震惊和愤慨。日本偷袭珍珠港毕竟针对的是军事目标，而现在他们攻击的是香港急救站里受了伤的手无寸铁、毫无防范能力的妇女和儿童。

在接下来的两周被围攻的日子里，颜雅清像其他人一样东躲西藏。她先后在 5 个避难所避难，但都被一一摧毁，直到最后她不得不在一户法国人家走廊的角落里暂避。虽然寄人篱下，但终究是人在屋檐下，不至于露宿街头。

1941 年 12 月 25 日，香港守军指挥部挂起了白旗，香港在坚守了 17 天后宣告沦陷。

“我们投降后，”颜雅清凄凉地回忆道，“也经历了像巴丹那样的死亡行军^①，日本人的暴行令人发指。”（章末注9）

香港沦陷后，许多名人志士遭日军软禁，其中就包括颜雅清的伯父颜惠庆，他被软禁在半岛酒店（香港沦陷后更名为大东亚酒店）。（章末注10）

颜雅清后悔自己没能早一点离开香港。如今，她只能像其他人一样，被迫过着痛苦而屈辱的日子。日本统治者的卑劣之举令她义愤填膺。日军攻占香港时，港岛的供水系统遭到损坏，水管泄漏，但是香港沦陷后，日本人竟为那些流失的水向港人苛征水费。不仅如此，更多的不公平待遇接踵而至。为了以防不时之需，颜雅清私藏了2000港元，但就是这点财产最后也化为乌有，因为后来日军宣布，面额超过10港元的纸币统统作废。为控制香港的金融体系，掠夺港岛资源，日本滥发军票，日军占领香港后，即推出军票与港币一同流通。早期港币和军票的兑换率为二兑一。1942年7月24日起，贬值为四兑一。1943年6月1日起，日军禁止港币流通。

连绵不断的雨以及沦陷生活的压力使颜雅清的情绪十分低落，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她被关进了集中营。在美国进行抗战募捐演讲时，颜雅清曾无情地抨击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作为反日运动的活跃分子，她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身份一旦暴露性命将不保。她决定隐姓埋名来保护自己。这个曾经衣着光鲜的时尚女子现在只能穿着破破烂烂的衣裳。没过多久又出现了粮食短缺，她经历了难挨的饥饿，正如她所说的，一日三餐，饥肠辘辘。等到真有米饭送进集中营的时候，不是霉，就是长了虫。在那个严重饥荒的年代，人吃人的惨剧在香港时有发生。

就这样，颜雅清在集中营里熬过了八个月非人的生活，这时逃生的机会来了，她牢牢地抓住了它。曾经优雅迷人的颜雅清小姐，

^① 巴丹死亡行军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期间制造的暴行之一。1942年4月，在菲律宾巴丹半岛上的美菲联军向日军投降，投降人数约有78000人，这近8万人被强行押解到100公里外的战俘营，一路无食无水，沿路又遭日寇刺死、枪杀，死亡15000人之多，加上到达战俘营后受虐死亡的人数，共计约4万人。——译注

曾经名冠上海滩的俏佳人，曾经活跃在华盛顿和纽约社交圈的名人，而今饱受饥饿和绝望困苦的弱女子，穿着劳工的破衣服，偷偷越过边界，逃到了内陆。自此，她朝着重庆的方向开始了漫长而危机四伏的寻求自由之旅。

“我们跨过了罗湖桥，进入了自由的内陆区，在香港沦陷区，我们丧失了拥有感，但是，”她自豪地回忆道，“我们有坚贞不屈的气节，我们讲原则，我们热爱自由。”（章末注 11）

讲原则、爱自由一直是颜雅清非常珍视的人生态度，尽管她追寻自由的代价不菲，尽管她还要面对重庆饱受日机轰炸的危险，但是重获自由是美好的，这比其他什么都重要。她最终成了自由的人，在重庆这个战时首都安定下来。陈炳章也在重庆，时任中央银行经济研究部主任，工作之余，他还在社会重建委员会做义工。颜雅清自己也需要重建，在集中营和奔向自由的那段日子，她总共瘦了 43 磅，她的身体需要恢复，但是她的抗战热情不会消减。她开始为宋美龄工作，并成为这位中国第一夫人的得力助手之一。

日寇的野蛮暴行令颜雅清怒火中烧，肝胆欲裂。她心底的那种救国救民的思想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深刻而强烈。她清醒地认识到，苦难的中国需要外援，需要救助，而她本人如果在国外奔走呼号会比她留在国内更有价值和贡献。11 月，宋美龄离开重庆前往纽约，先是在“哥大长老会医院的哈克纳斯医疗中心”住院一个时期治病，借以观察美国朝野的动静，之后，也就是 1943 年 2 月，声称病已痊愈，转往白宫做客并正式开始了轰动全美的访问之旅。颜雅清也随宋美龄一同访美。她们乘坐美方派来的专机飞离了重庆，飞过了驼峰，经过印度一直向西飞行，然后飞越了大西洋，飞经南美再一路向北，最终到达目的地美国。

这一横贯半个世界的飞行之旅让颜雅清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那些让全世界卷入战火的事件。一想到国际联盟推行绥靖政策、消极对待法西斯扩张，她就不寒而栗，要知道，她曾寄希望于这个国际组织可以拯救世界。

“国联只是一个玩弄大国政治的场所，”颜雅清鄙夷地回忆说，

“国联自成立时起便由英、法等少数大国所控制，并成为大国手中的工具。这几个国家关起门来就可以决定国联的各项事宜，那些公开的会议不过是做给公众看的。”（章末注12）

现在，颜雅清只期望一个国家——美国——来主导局势。在之前旅居美国的日子，她认真地研究了该国的政治体系，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美国的安定繁荣得益于它的民主政府形式。二战爆发后，国联名存实亡。随着二战的结束和联合国的成立，国联于1946年4月18日通过决议宣告解散，其所有财产和档案移交给联合国。对于这个新成立的国际组织，如果单纯照搬照抄美国的政府形式也是行不通的。颜雅清想，如果自己有机会为了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而工作，她发誓一定会不遗余力，一定会为了自己的国家也走上同样的民主道路而鞠躬尽瘁。

经过跨越四大洲的长途飞行，颜雅清终于重新踏上了美国这片土地，这是她第四次来到美国，这一次她对这个世界最伟大的国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自从上次旅居美国以来，她亲眼目睹了许多命运的逆转，她也亲身经历了许多自己珍视的东西被摧毁、被剥夺。回到饱受战争之苦的祖国，颜雅清深深地感受到自由和正义被无情地践踏，不过让她吃惊的是，这次回到美国她也有不少同样的感受。美国向来奉行“欧洲第一”的政策，而把中国抗战的军事和经济需求放在次要的位置，颜雅清此次陪同蒋夫人一行访美就是为了要进一步争取美国的援助和支持。在香港集中营的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彻底改变了颜雅清，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愿意为了消除霸权与专治、为了建立永久的世界和平而不惜一己之躯。她热切地期盼着这些发自内心的理想能成为现实。

时任外交部长的宋子文，1940年中就在华盛顿担任着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委员会主任，经办接受美援物资事宜。1942年12月23日，重庆国民政府突然宣布：宋子文继任郭泰祺为外交部长，宋在华盛顿遥领任职，他在华盛顿一直呆到1943年，在这三年间，他一直往返于华盛顿与纽约两个城市之间。也许就是在1942年底到1943年间，颜雅清和宋子文走到了一起。宋子文是宋美龄的亲哥

哥，不过除了这层关系，他的权势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自身的努力。抗战爆发后，宋子文随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任中国银行董事会主任等职，拥有巨大经济实力，操纵着国民党的经济实权。而宋子文家族也与蒋介石、孔祥熙、陈果夫和陈立夫家族合称为 20 世纪上半叶控制中国政治、经济命脉的“四大家族”。他与颜雅清的关系走到哪一步，他们的关系维持了多久以及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均不得而知。宋子文比颜雅清年长 11 岁，他的妻子张乐怡也是一位大美人，出身富贵之家，曾与颜雅清一同担任上海中国妇女会的干事，（章末注 13）两人十分熟识。在他人眼里，宋子文文质彬彬、富有才华，这对颜雅清来说理应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由于工作的关系，两人经常在一起，互生情愫也算是正常的事。两人有着共同的世界观，坚信只有和平才能缔造世界新秩序，两人都为了争取更多的美援而积极游走，为了战后联合国的建立而四处游说。



宋子文画像，据传宋和颜雅清是情人关系 [《中国杂志》(China Journal), 1939 年 6 月]。

1942 年 12 月，颜雅清启程赴加拿大魁北克蒙特朗布朗 (Mont Tremblant)，出席在那里举行的第八届太平洋国交讨论会。在这次会议上，中国战后的环境问题成为主要议题。会议着重就外国租界地及治外法权、战后满洲里的地位以及中国争取和平的努力进行了讨论。作为一名反殖民主义、反租界地者，颜雅清带着一种特别的兴奋之情期待着参加这次会议。那时候，她尚未从香港集中营的折磨中完全康复，她的身体依然清瘦，面容依旧憔悴，作为现代战争的受害者，她本人就是一个活广告，没有什么比这更有说服力的了。

1943 年 1 月初，颜雅清回到华盛顿，帮助筹备美国著名黑人女低

音歌唱家玛丽安·安德森（Marian Anderson）的一场音乐会。音乐会将在宪法大厅（Constitution Hall）举行，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独唱音乐会。这位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女低音将成为第一位在宪法大厅演唱的黑人，而她争取到这一权利利用了差不多四年的时间，四年前，她的表演申请遭到大厅的所有者——美国革命女儿会（Daughter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的拒绝。（章末注 14）安德森小姐在宪法大厅的处女秀取得了巨大成功，演出当天座无虚席，美国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以及 3800 位粉丝聆听了她的演唱。安德森指示，将此次演唱会的收益捐赠给美国援华联合会（United China Relief）。一向对任何形式的不公平感到气愤的颜雅清，对事情的圆满解决表示欣慰，这位伟大的歌唱家对中国抗战事业的慷慨捐助更令人欣喜。

颜雅清在华盛顿逗留期间，住在环境幽雅的罗杰·史密斯酒店（Roger Smith Hotel），在这段时间里，她对航空飞行的兴趣显然又复苏了。她给美国民航管理局（Civil Aeronautics Administration，简称 CAA）驻当地的办事机构去了一个电话，询问有关其私人飞行员执照的续办问题。她的执照四年前就已过期，她想了解如何换发新证。美国民航管理局的一位官员寄给了她一份清单，清单上列明了诸多要求，她必须达到那些要求才能重新飞上蓝天，其中包括她必须重新通过一系列理论考试，还有就是要提交飞行日志以及近期的体检证明。当然，她还得再次参加飞行考试，而中国领事馆方面也需要提供一份证明，证实她是一位遵纪守法、遵守美国政府各项法律法规的中国公民。

不过，换发飞行执照的事最终不了了之。当美国民航局的信寄到酒店时，颜雅清已经离开了酒店，没有留下联络地址。为了中国的抗战事业，她再次踏上了游说之旅。从那以后，她继续在美国各地发表公开演说，争取美国民众对中国抗战事业的同情和支持，只是她没有再去过问换发飞行执照的事情，估计她没有再想到重归蓝天。（章末注 15）

这时，宋美龄已经结束了在哥大长老会医院哈克纳斯医疗中心

的治疗养病，准备开始她著名的征服美国之旅。1943年2月17日，她抵达华盛顿，罗斯福总统夫妇亲往车站迎接，待之以国宾之礼。2月18日，她在美国国会发表20分钟的演说，演说引起全场多次热烈的掌声，这次演讲也成为美国国会历史上最有名和最成功的演讲之一。随后，宋美龄访问美国和加拿大各大城市，每到一处，无不引起轰动，其一举一动都是当时媒体争相宣传、万人瞩目的事件。蒋夫人的这次美国之行促成了美国逐步确定扶蒋的方针，而美国民众对于这位自幼在美国接受教育、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东方美人更是倾倒不已。几乎一夜间，中国成了美国街谈巷议的话题，中国的旗袍和发型也一时成为美国民众追逐的时尚。

注释

1 Adet, Anor & Mei-mei Lin, *Dawn over Chungking* (New York: Da Capo Press, 1975, c1941), 1.

2 同上，第9页。

3 颜惠庆从旧金山乘船回国。

4 陈炳章后来梅开三度，但这次婚姻也以离婚而收场。

5 显然，颜福庆因健康原因于4月中旬辞去武汉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一职（“Health Administration Director Chosen,” *North-China Herald*, April 24, 1940），但是一个月后，颜福庆离港赴美“学习美国医院的组织及设备配备情况，以改进中国医院之水平”，参见1940年6月1日《密勒氏评论报》（*China Weekly Review*）。

6 同上。

7 颜惠庆，《颜惠庆日记》，1941年5月13日。

8 该纪录片中文片名《美洲华侨一碗饭运动》。

9 “World Leadership in U. S. Hands,” *Maryville Daily Forum*, February 18, 1944.

10 颜惠庆曾表示，负责软禁他的日本军官良心未泯，允许他外出散步，拜访朋友。日本方面曾试图说服颜惠庆效力大日本帝国，但颜拒不合作。正是在这段被软禁的日子里，颜惠庆将《中国古代短篇小说选》（*Stories of Old China*）翻译成英文。他希望这本书能够“让外国朋友更好地了解

中国人民”。1942年5月5日，颜惠庆重获自由，后来他发表意见称，自己对这一时期被软禁并未特别耿耿于怀。《中国古代短篇小说选》（*Stories of Old China*），颜惠庆译，香港商务印书馆，1974，前言部分。

11 “World Leadership in U. S. Hands,” *Maryville Daily Forum*. 5月，颜雅清的父亲颜福庆离港返沪，汪精卫力邀其入阁，但颜拒不与汪伪政府合作。汪精卫，曾经追随孙中山先生的辛亥斗士，因1940年3月投靠日本人而沦为汉奸，为国人所唾弃。为巩固政权，汪精卫力邀德高望重之士入其内阁。汪很清楚，如果有颜福庆的支持，这将代表无上荣光，而汪伪政府的合法性也就不容置疑。因此，汪精卫威逼利诱，软硬兼施，邀请颜出任其政府卫生署署长，被颜福庆坚拒。抗战后期，颜福庆兢兢业业、一心为民，在支持抗日、救死扶伤等方面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日本人低估了中国人民对卖国贼汪精卫的鄙夷和仇恨。汪精卫和他妻子的跪像摆放在大街小巷，任由路人向其发泄心中的怒火。

12 同上。

13 宋子文的夫人张乐怡，一位生于江西庐山的大家闺秀，英文名“Laura Chang”。她时尚优雅，品味不凡，曾被评为全球十大“最佳着装”女性之一，张知书达礼，端庄娴淑，被誉为中国的“亲善部长”。

14 对此，美国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以退出美国革命女儿会（*Daughter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简称DAR）表示抗议，并帮助安德森在林肯纪念碑下筹办了一场户外音乐会，这场音乐会吸引了七万五千人驻足观赏，另有百万人通过电台广播收听了这次表演。1944年，颜雅清的母校史密斯女子学院向安德森小姐授予音乐荣誉学位。

15 1943年2月，颜雅清作为演讲嘉宾，出席了在纽约公园大道和60街召开的基督教卫理公会女子服务会（*Women's Service Guild of Christ Methodist Church*）会议。她演讲的题目是“一个中国人眼中的世界大同”（*A Chinese Looks at World Unity*）。“To Talk on World Unity,”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4, 1943.

10. “全人类时代的到来”

1944 年对颜雅清来说是富有成效的一年，这一年，她在职业生涯和精神生活上都取得了双丰收。

飞天名媛
1944年3月25日

BAHA'I WORLD FAITH

"The well-being of mankind, its peace and security are unattainable unless and until its unity is firmly established . . . Soon will the present day Order be rolled up, and a new one spread out in its stead."—(Baha'u'llah.)

• free public lecture •

**"PEACE PLANS COMPARED" AND
"THE PRICE OF WORLD PEACE IS WORLD RELIGION"**

Speakers: HILDA YEN, student of international peace plans; attended League of Nations, Dumbarton Oaks, Bretton Woods and San Francisco Conferences. Flew for China, 1939; escaped to America, 1941—brilliant Baha'i speaker.

CARL SCHEFFLER, nationally known Baha'i lecturer with an outstanding record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 . . Director of The Evanston (Ill.) Academy of Fine Arts—recognized for training professional artists—eloquent and forceful speaker.

Date: Monday, March 25th, 8:15 P. M. **Brooklyn Academy of Music
36 Lafayette Avenue**

EVERYONE CORDIALLY INVITED

颜雅清还是一名热心的宗教传播者，图为 1946 年 3 月她为宣扬巴哈伊教^① (Bah á'i Faith) 而举行的免费公开讲座的宣传单。

是年 2 月，颜雅清赴美国西部作了一次短暂的旅行。她在加利福尼亚州和密苏里州的几所大学进行演讲，演讲中她谈到了中国的艰苦抗战，但更多的是提到中国关于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的倡议。她指出，一个全球团结的新时代即将来临，为此，一个代表全人类的国际联盟亟待建立。她认为，这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唯一的政府

^① 巴哈伊教，或称巴哈伊信仰 (Baha'i Faith)，创立于 1844 年，为全球成长最快速的独立性宗教之一。——译注

形式。她的这一思想与宗教组织团体——巴哈伊教（Bahá'í）——所宣扬的通过一个国际性的组织来改善国际关系的信仰不谋而合，渐渐地，颜雅清成为了该信仰的热心传播者。

颜雅清的祖父曾经是圣公会的牧师，而她从小在一个圣公会基督教的家庭里长大，但是自从在普拉特维坠机后，颜雅清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心灵的空虚。她在中国亲眼目睹的那些苦难更加剧了她的这种精神空虚感。她的舅舅曹云祥很早以前就跟她谈到过巴哈伊信仰，谈到该信仰给他带来的祥和宁静。颜雅清很爱她的舅舅，也非常尊重并敬仰他。他说的话不会有错。曹云祥，著名教育家、管理学家，早年曾在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求学，其后又赴英国伦敦大学进修经济学，毕业后就职于中国驻英使馆。1919年，回国任职于北洋政府外交部参事。1922年，曹云祥被外交部委任为清华学校校长，主持了清华学校改制为清华大学的工作。1923年，曹云祥和妻子皈依巴哈伊教。成为巴哈伊信徒后，曹云祥不遗余力地在中国推广这一教义。他翻译了一些巴哈伊经典，其中包括著名的《巴哈欧拉与新纪元》（*Bahá'u'lláh and New Era*），他还著书撰文介绍巴哈伊信仰，影响了许多中国人。信奉巴哈伊教所推崇的普世和平与人类一家原则的曹云祥曾十分希望他的外甥女也追随他的信仰，但是当时雅清年轻，并没有接受。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舅舅对于巴哈伊教的热心传播开始对颜雅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坠机事故发生后，她对宗教信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香港被日军围困的那段日子里，她深刻地体会到各阶层人民所遭受的贫困和饥饿之苦，这种经历让她深深地意识到，全人类是一体的，她欣喜地发现，实现人类“天下一家”和世界大同正是巴哈伊教的基本教旨。她的一些朋友，包括美国著名的奢侈品制造商、中国瓷器专家和进口商米尔德里德·莫塔赫德（Mildred Mottahedeh）都是该教的追随者，在他们的游说下，颜雅清参加了于1944年5月23日在美国伊利诺斯州的威尔梅特（Wilmette）举办的第36届美加巴哈伊教大会。这次庆祝巴哈伊教成立一百周年的盛会称得上是该教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为庆祝百年华

诞，各大洲兴建了许多辉煌壮丽的巴哈伊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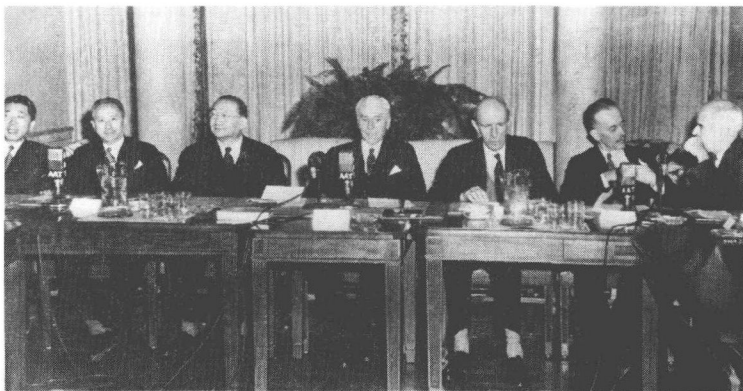
巴哈伊教有关人类一家的基本信条正是颜雅清所推崇的理想，她曾寄希望于国际联盟实现这一理想，而她在国联工作期间也曾为这一理想而努力奋斗。另外，她也十分认同巴哈伊教有关宗教同源的思想，认同该教提出的成立一个世界政府的必要性。巴哈伊教谴责任何形式的偏见，无论是宗教、种族、阶级或民族的。所以，当颜雅清在大会上看见白皮肤和黑皮肤的信徒深情相拥时，她相信这就是信徒们反对种族歧视最直观有力的证明。巴哈伊教主张消灭极端的贫困和富有，提倡以建立持久普遍的和平为全人类的最高目标，而这些对颜雅清来说更是意义非凡。在巴哈伊教教义的感召下，颜雅清也成为了其中的一分子。

从那以后，颜雅清有了自己的信仰，她不再精神空虚。二战后，她成了巴哈伊教的积极宣扬者，而且她还努力游说，使该教成为联合国认可的宗教组织。1948年3月，在联合国公共信息部任职的颜雅清通过努力，将巴哈伊国际社团（Bahá'í International Community）列入非政府组织名单。从此，巴哈伊作为联合国观察员参与联合国事务。巴哈伊国际社团在以色列海法世界正义院的指导下，还出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ECOSOC）、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会（UNIFEM）、联合国环境署（UNEP）等组织的顾问。巴哈伊在纽约和日内瓦的联合国机构内设有办公室，并且在联合国的地区特使和机构中拥有代表。从历史的观点来看，颜雅清对推动巴哈伊参与联合国事务作出了巨大贡献，并因此获得巴哈伊国际社团的广泛赞誉，她也得以与其舅舅曹云祥一样，成为在国际社会中推广巴哈伊教义最知名的中国先驱之一。（章末注1）

在巴哈伊思想的鼓舞和建立一个世界新秩序的希望的感召下，颜雅清以一种从未有过的激情投身到缔造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中来。到1944年中，国际事务似乎按照她个人预想的目标发展。战争即将结束，美、英、苏三国首脑先后三次举行会议，即著名的德

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就战后世界的安排、战后成立一个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组织——联合国——等问题进行了商讨。同盟国还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讨论战后世界新秩序及经济建设等问题。颜雅清有幸出席了其中的一个会议。

为恢复国际贸易的自由进行，1944年7月1日至20日，“联合国联盟国家国际货币基金会议”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华盛顿山大旅社举行，44个国家的代表们齐聚会议，商讨建立国际货币与金融交易的标准。颜雅清也出席了这次史称“布雷顿森林会议”（Bretton Woods Conference）的国际货币金融会议。财政部长孔祥熙率中国代表团与会，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小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主持会议，会议聚集了包括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等在内的一批知名经济学家。



中国代表出席于1944年9月29日在华盛顿附近举行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①（Dumbarton Oaks Conference）。左起：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行政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英国驻美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Lord Halifax）、英国副大臣爱德华·凯铎冈爵士（Sir Edward Cadogan）、美国副国务卿爱德华·斯戴迪纽斯（Edward Stettinius）。

1944年的另外一个重要会议是在华盛顿郊外的敦巴顿橡树园

^① 敦巴顿橡树园会议（Dumbarton Oaks Conference），美、英、苏三国代表于1944年8月至10月举行会议，商讨战后事务和筹建联合国等事宜。会议分两阶段召开，第一阶段从1944年8月1日至9月28日，由英、美、苏三国进行；第二阶段从9月29日至10月7日，由中、美、英三国代表进行会议。——译注

(Dumbarton Oaks)^① 举行的美、英、苏、中四国会议，会议商讨联合国的创立，磋商并拟订联合国机构组织的草案，包括安理会的功能和常任理事国的权力。国际联盟未能实现其保障国际和平与促进国际合作的宗旨，势必被一个新的国际组织所取代。作为管理世界新秩序的“四大警察”的美、英、苏、中派代表与会。颜雅清也以技术顾问的身份随中国官方代表团出席了这次会议。

然而，这个新的国际组织的建立一开始时并不顺利。苏联以尚未与日本开战为由，不愿与中国坐在一张会议上。实际上，苏联的真实意图是要排斥中国，苏方主张“世界警察”应由美、苏、英三国组成，中国无权列入。由于苏联代表的强烈抵触，最后会议只得采取开罗会议模式，即第一阶段为美、英、苏三国会议（1944年8月1日至9月28日）；第二阶段为美、英、中三国会议（9月29日至10月7日）。中国代表实际上未能参加关键的决策过程，而只是在美英苏三国作出决策之后才得以出席。出席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由驻英大使顾维钧、外交部次长胡世泽、驻美大使魏道明和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商震组成，顾维钧任首席代表。

敦巴顿橡树园会议虽然在常任理事国、安理会的否决权、创始会员国的资格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它通过的议案成为1945年旧金山会议拟订的《联合国宪章》的基础。1945年4月25日至6月26日，联合国制宪会议在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召开，46个国家的代表与会。中国代表团团长为代理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代表团成员包括中国共产党派出的董必武。6月26日，旧金山制宪会议圆满结束，《联合国宪章》正式签署。颜雅清再次作为技术顾问出席了这次盛会。几位在战后政治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的中方代表，均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录了这次会议的盛况以及他们对未来世界和平的憧憬。但是待会议圆满结束时，颜雅清却发现自己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兴奋不已。

^① 敦巴顿橡树园 (Dumbarton Oaks)，是一座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市郊的联邦式府第，建于1920年，现时为敦巴顿橡树园研究图书馆及馆藏库 (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译注

“他们在这次会议上的确解决了不少问题，但是，他们把上帝遗忘在了一边。”颜雅清不无伤感地回忆道，“不首先皈依上帝，我们就无法获得永久的和平。”（章末注2）

除了指出《联合国宪章》存在的思想贫乏的问题，颜雅清还坦陈了有损这一新的世界政府发挥有效作用的不少弊端。在香港沦陷的那段日子里，她无时无刻不梦想着有那么一天，她能够为了建立一个团结的世界而再次奉献一己之力。如今，她更迫切地希望联合国能够按照正确的轨道建设和发展。

颜雅清列举了《联合国宪章》存在的四大问题，并在宪章正式生效前发表公开演说，就这些不足之处予以批评。这四大问题是：主权原则的正式认可问题（她用了“国际怪物”一词来形容），在她看来，《联合国宪章》中的有关条款将极大损害各国之间的密切合作；联合国大会只是扮演了一个顾问的角色，并无立法权，从而削弱了大会应有的作用；国际托管制度问题；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问题，安理会就非程序问题投票表决时，只要一个大国不同意，决议就不能通过。

颜雅清表示，除这些程序上的问题会影响联合国发挥其实效之外，还有一个大问题不容忽视，那就是从《联合国宪章》中有关国际托管制度的条款可以明显看出，联合国对殖民主义抱着一种纵容和支持的态度，而这与联合国所倡导的支持广泛民主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她认为，殖民主义这种陈腐的统治形式在世界新秩序中毫无立足之地，她斥责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屈从于那些欧洲帝国主义列强，与其沆瀣一气，那些欧洲列强虽然向殖民地许以自治权，但并



1945年5月1日，中国代表团出席了由46个国家代表参加的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制宪会议。与会代表在旧金山大歌剧院济济一堂，各大媒体齐聚报道，观众挤满了上两层看台。

非殖民地所热切渴望的民族独立。她诘问道，如果美国是殖民主义的坚定拥护者，那么它又为什么要允许其保护国菲律宾在二战后独立呢？她还对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建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嗤之以鼻，在她看来，这些军事基地根本不足以对未来的敌对行动产生威慑作用。她预测到电子武器时代的来临，到那时，洲际导弹能够跨越各大洲之间，打到地球任何一个地方。以为建立军事基地就可以免于战争灾难的想法实在是可笑之极。（章末注3）颜雅清的演讲风格一向锋芒，而现在更是言辞犀利，分析深刻，入木三分。

尽管颜雅清对这个新的国际组织的构建有不少失望之处，但她依然把联合国的建立视为改善国际关系的一大契机。《联合国宪章》正式生效后，颜雅清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活跃分子参与了联合国的创立。其卓有成效的工作及爽朗的个性赢得了广泛关注，后来她被任命为联合国公共信息处（后更名为联合国公共信息部）联络官。由于工作的关系，她需要经常前往美国各地，对各大俱乐部和组织发表演说，宣扬联合国的作用及职能。曾经在国际联盟工作的经历给了她第一手宝贵资料，让她能够向听众清楚解释新旧两个国际组织之间的不同之处，联合国相比国际联盟有哪些优势。而此前，她多次出席有关联合国创建会议的经历也为她的演讲平添了不少权威性和公信力。在演讲团中，有颜雅清这样背景和经验丰富的人十分寥寥，因而她后来被推选为培训师，负责对演讲后备人员进行培训，作为联合国演讲团的主讲人之一，她有两年时间负责演讲后备人员的培训工作。

在业余时间，颜雅清积极宣扬巴哈伊教的和平济世主张。经历了战争的洗礼，和平成为万众期盼的主题，她的演讲因此吸引了众多好奇的听众。就在美国向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后的几天，颜雅清在密歇根州的格罗斯一波因特（Grosse Pointe）小镇举行的一个巴哈伊教集会上表示，人类不应借此机会庆祝这来之不易的和平，而是应该从中汲取教训，冷静反思。

“我们应该引以为耻，”颜雅清训诫听众说，“正是原子弹让我们了解了小小原子的巨大威力，让我们意识到，在这个地球上，人

类必须和谐共存，否则将自我毁灭。”（章末注4）

她还指出，尽管《联合国宪章》呼吁各成员国：“力行容恕，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从而提出了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和平共处的理想和原则，但是除非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社会、文化以及宗教的和谐共存，否则永久的和平将成为一句空话。她欣喜地宣称，这种普遍和谐可以通过践行巴哈伊教的教义来实现。

1947年2月，颜雅清的父亲颜福庆访美，父女俩久别重逢自然有说不完的话。雅清向父亲通报了这些年她所做的重要工作和取得的成绩。1945年4月，罗斯福总统逝世，是年12日，杜鲁门总统任命罗斯福总统的遗孀埃莉诺·罗斯福担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兼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作为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埃莉诺·罗斯福主持起草了《世界人权宣言》，这个历史文件获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好评。颜雅清有幸成为埃莉诺·罗斯福的一位助手而参与了这项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工作。之前在国际联盟的相关工作经验，为颜雅清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借鉴和参考，让她在这份重要文件的起草过程中游刃有余，富有成效。

在这一年接下来的时间里，颜雅清在全美各地巡回演讲，宣讲联合国职能和宗旨，在其他业余时间，她积极推广巴哈伊思想和教义。虽然面对的听众不同，但是她向他们发出了同样的呼吁：为了人类团结和世界大同而努力。二战刚刚结束，战争所带来的创痛还未治愈，未来核战争的威胁还普遍存在，颜雅清在演讲过程中，结识了不少对世界局势持相同看法的人，这些人受联合国大会的启发，也在自己的社团内开展各种宣讲活动，颜雅清经常作为主讲嘉宾获邀出席这些基层的学习活动。

注释

1 后来，颜雅清通过练习“超觉静坐”（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 TM）来获得某种宁静。超觉静坐简称TM功，为美籍印度瑜伽大师玛哈瑞诗（Maharishi Mahesh Yogi）改良的一种简易的瑜伽术，是以静为主的气

功锻炼方法。玛哈瑞诗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但是他发展起来的这种瑜伽术影响了数百万人，包括甲壳虫乐队也在1960年代末尊奉其为精神导师。超觉静坐是个简单、自然的心智技术，通过这种静修方式不仅可以获得身心的宁静，消除压力，而且还能够实现世界的和平。这些承诺如磁石般吸引着颜雅清，让她无法抗拒，同时它也吸引了这个时代许多希望从东方世界寻求精神指导的人。

2 “Peace Depends on Religion, Baha'is Told by Hilda Yen,” *Grosse Pointe News*, August 16, 1945.

3 “Chinese Diplomat Attacks ‘Loopholes’ in Charter,” *Lima News*, July 1, 1945. 在联合国成立的头五年左右的时间里，修订《联合国宪章》成为许多人关注的问题，但是朝鲜战争的爆发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

4 同上。



飞天名媛

sisters of heaven

11. 约翰·吉福德·梅尔

在洛克菲勒家族在纽约市曼哈顿区东河滨买下一块土地无条件地捐赠给联合国建造大楼之前，联合国的各个部门，包括颜雅清所在的公共信息部，都被临时安置在纽约成功湖的斯佩里陀螺仪公司（Sperry Gyroscope Company）大楼内。1948年，时任联合国公共信息部联络官的颜雅清在办公桌前拍了一张工作照。照片中，人到中年的颜雅清正在开启一封写给她的信件。只见她一身旗袍，坐在办公桌前，仪容庄重而整洁。她略施粉黛，下唇上依稀可见坠机事故留下的疤痕，此时的她已经恢复了体重，远不似在香港时那般消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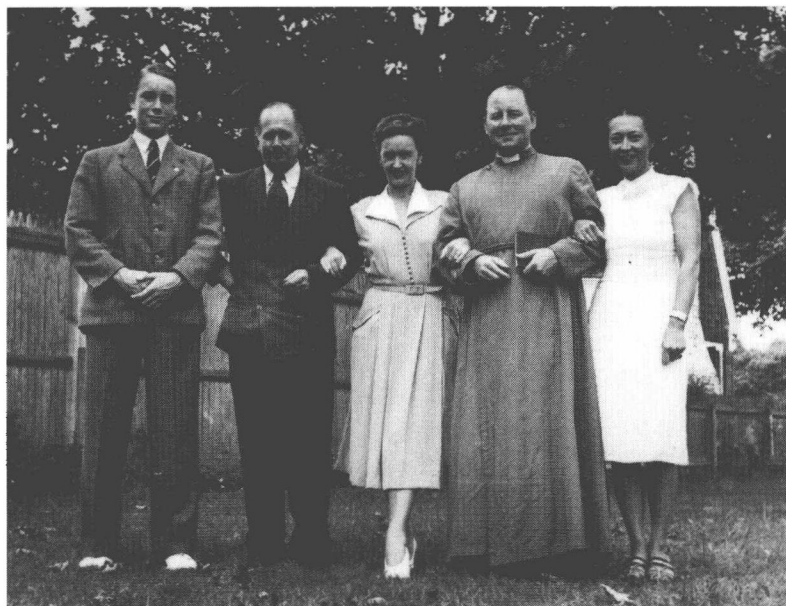
大约就在这段时间，颜雅清爱上了约翰·吉福德·梅尔（John



出任联合国公共信息部联络官的颜雅清，图为在纽约成功湖^①（Lake Success）她的联合国总部办公室里留影，摄于1948年左右。

^① 成功湖（Lake Success），位于美国纽约市东南部的长岛上，1946年—1951年为联合国总部所在地。——译注

Gifford Male), 一位来自新西兰惠灵顿的学者。约翰·梅尔于1946年左右出任联合国人权中心驻加拿大蒙特利尔办事处社会事务官, 后来升任联合国人权中心下属单位咨询服务处负责人。约翰·梅尔出生于1913年1月16日, 比颜雅清小8岁左右。与颜雅清一样, 约翰·梅尔聪慧俏皮, 擅长讲故事, 是个颇有魄力的男人, 两人有着共同的世界观。约翰曾参加二战, 在意大利和北美打过仗, 由于作战英勇曾被战地报道并被授予非洲之星勋章(章末注1)。1948年5月15日, 约翰与颜雅清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新卡纳(New Canaan)镇举行婚礼, 婚礼由一位太平绅士主持。两人都是第二次走进婚姻殿堂。(章末注2)



颜雅清(右一)和她的第二任丈夫约翰·梅尔(John Male, 左二)。

婚后不久, 颜雅清辞去了联合国秘书处的工作(根据规定, 在联合国工作的女性婚后得辞去工作), 当起了家庭主妇。约翰利用妻子这段难得清闲的时间带她去了他的故乡新西兰。

这对新婚夫妇每到一处, 都受到约翰的熟人和朋友的热情接待, 约翰把妻子介绍给他的朋友们, 而这位来自东方的新娘无疑给众人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新西兰著名抒情诗人亚瑟·莱克斯·杜加德·费尔本 (A. R. D Fairburn) ——朋友们其为莱克斯 (Rex) ——是约翰的密友 (章末注 3)。莱克斯·费尔本及其家人热情地欢迎这对夫妇的到来，数十年后，费尔本的孩子们依旧对这对夫妇的到访记忆犹新，颜雅清给他们留下的美好印象让他们永难忘怀。在他们的印象中，颜雅清优雅迷人，性格和善，与他们一家人很快打成一片。更让人难以忘怀的是，颜雅清还为他们一大家子准备了几样拿手的中国菜——费尔本的妻子对颜雅清亲自下厨帮忙尤为感激——她做的酱烧排骨等菜一直为这家人所津津乐道。(章末注 4)

约翰和颜雅清在纽约的寓所位于皇后区公园路村 (Parkway Village)，这是一片专为暂时在成功湖工作的联合国雇员新建的住宅区。来自世界各地的联合国雇员都住在这里，所以住宅区就像个微缩的全球社区，夫妻俩都非常喜欢这样的环境。安家后，颜雅清把儿子陈国伟接到美国念书，此时他已经是 20 岁的大小伙了。国伟入读了纽约布鲁克林理工学院 (Polytechnic Institute of Brooklyn, NY)，即后来的纽约科技大学 (Polytechnic University of New York)，平时，儿子住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宿舍，周末呆在母亲和继父那里。约翰与国伟此时在法律上已是继父与继子的关系，而国伟也正是因为这个理由才得以赴美留学的。

抗日战争结束后，第二次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到 1948 年，毛泽东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凯歌高奏，蒋介石的国民党军节节败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队实力快速缩减，国共内战大势已定。1949 年 4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展开渡江战役，突破长江防线，向全国进军。国共内战的形势变化让颜雅清惊恐不已。当她还在联合国任职时，她领过子女津贴，她的一对子女都由前夫陈炳章抚养，她把这笔钱寄给他们做生活费。但是当她失去在联合国的工作后，这笔津贴也就没有了。于是突然间，陈炳章也无力抚养他们的孩子。到 1948 年 12 月，国民政府法币崩溃，通货膨胀加剧和货币持续贬值让陈炳章的生活陷于拮据，他无力再支付儿子在美的留学费用。让颜雅清更为担心的是生活在战乱之中的 16 岁的女儿

国风。在约翰的情感和经济支持下，颜雅清决定想尽一切办法把女儿接到美国。1948年圣诞节前，她买好了机票，安排女儿从上海飞往纽约，小姑娘持有的是令人艳羡的联合国护照，这本通行证可以保证她在战乱时期的人身安全。护照上注明了继父约翰是其监护人。

陈国风于1948年平安夜抵达纽约。几周后，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北平，在随后的几个月时间里，中国的其他大城市“瓜熟蒂落般”落入解放军之手。面对这一切突如其来的变化，约翰·梅尔勇敢地承担了作为一位继父的责任，为了补贴家用，他向联合国申请了赡养子女专项津贴并获得批准。在丈夫的帮助和支持下，颜雅清终于承担起了养育子女的责任。国伟继续大学学业，主修工程学，而国风进入了纽约皇后区的牙买加高中（Jamaica High School）。

1949年5月，颜雅清再次上了报纸，不过这一次不同以往。报纸对首都华盛顿的一家法庭开庭审理颜雅清状告该区一位名叫诺曼·塞尔登伯格（Norman Seldenberg）的珠宝商一案进行了报道。（章末注5）颜雅清证实，1945年，她将三块经切割打磨的宝石交给塞尔登伯格先生，委托他重新加工。这三块宝石分别是一块价值6000美元的中国玉石，一块价值1125美元的星光蓝宝石，还有另一块价值495美元的蓝宝石。三块宝石重新加工完毕后放在店内，但不知何故却不见了。珠宝商承认其过失，但却辩称颜雅清漫天标价，借机敲诈。而负责对这几块宝石进行重新加工的那位工匠也出庭作证那几块石头最多值300美元。颜雅清则请了另一位珠宝商对那几块宝石的照片进行了研究鉴定，并向法庭提交了一份估价报告。作为原告证人，这位专家证实颜雅清的估价属实。陪审团成员讨论了一个半小时，最终裁决，被告赔偿颜雅清4870美元，外加6%的利息。

相比这条相当庸俗的新闻，报纸上的其他头条却是令人触目惊心，远东局势达到了沸点，得民心者得天下，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共产党即将迎来全中国的解放。

1949年底，国民党彻底溃败，统治中国22年的国民党政权垮

飞天名媛
sisters of heaven

台。蒋介石及其朋党退往台湾，另外一些人逃往香港或其他地方。不过，共产党上台对颜雅清家族来说并不是大难临头的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那些被认定为国民党党员或国民党的同情者都难逃牢狱之灾或一死，但颜家人因为总是超脱于政党政治之外而没有受到冲击。颜氏一家人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而献身的事迹有目共睹，颜氏三杰受世人尊重和推崇，所以他们有幸逃过了这场政治浩劫。

多年前，颜福庆在雅礼医院行医时，曾为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治过疟疾。当时，颜福庆应聘至雅礼医院不久，湖南农村闹起了疟疾。有一天，下着瓢泼大雨，四周冷清。突然，诊所来了个年轻人，身披蓑衣，头戴斗笠，背着患有疟疾的妻子前来就医。病人浑身湿透，生命危在旦夕。颜福庆见状，不顾雨水扰人，即扶病人上床抢救。在精心治疗下，病人很快好转，颜福庆还免收了所有的医疗费用。时间一晃几十年，到上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宴请全国知识界知名人士。宴席上，主席特地请颜福庆坐在自己身边。酒酣时，主席饶有兴致地谈及当年背夫人杨开慧求医的往事，频频称赞颜福庆救死扶伤的善举。毛泽东还表示，他本人也欠颜福庆一个人情，多年前他也曾找颜博士看过病。经提醒，颜福庆才回忆起在河南开诊时有位高大英武的年轻人来看病。而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由于颜福庆在医学事业上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他多次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颜雅清的伯父颜惠庆同样也受到了新中国的认可，对他一生为中国外交事业所作的贡献表示赞赏。1949年2月，受代总统李宗仁委托，73岁高龄的颜惠庆抱病率上海各界和平代表团赴北平与中国共产党商谈和平事宜，受到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接见。当时，南北陆路交通阻断，飞机成为唯一的选择，身患心脏病的颜惠庆对平生第一次坐飞机心存顾虑就不足为奇了。这次“敲门之旅”是颜惠庆晚年生活中最精彩的一幕，他通过此行结识了许多中共领导人，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等的称赞溢于言表，他也充分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政策。这一经历使他后来两次断然拒绝了蒋介石要

他前往台湾的“邀请”。上海解放后，主持上海临时救济委员会及中苏友好协会筹备等工作。新中国成立后，颜惠庆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等职。1950年5月25日，他病逝于上海，毛泽东和周恩来特电其家属致唁。对于伯父的辞世，颜雅清悲恸不已，她的脑海里不断浮现自己刚获自由独立时与伯父一同赴苏的情景，想起与伯父在欧洲各国相处共事、一同游历的日子，想起他为了拓展中国的生存空间是那么地殚精竭虑，想起他作为令人尊敬的师长教会了自己许多知识和本领，想起他为了她的个人幸福所付出的良苦用心。

在无事可做的间隙，颜雅清开始担心国内家人的健康和安全问题。国共内战以来，她与家人的通信联系被迫中断。她听说，父亲参加了上海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的组织领导工作，积极广泛地动员医药卫生人员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参加医疗手术队奔赴前线。虽然父亲当时已70高龄，但仍参加了慰问团亲赴东北慰问志愿军。

颜雅清终于收到了父亲的来信，父亲在信中宽慰她说，尽管他已经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长时间工作，但身体依然硬朗。父亲在信中承认，自己的记性也没有以前那样好，不过他说，人年纪大了这种情况很正常。他还说，自己的视力也在衰退，现在看书得常备着个放大镜。父亲虽然在极力安慰女儿，但他说的这些情况让颜雅清十分担忧。为了不让自己胡思乱想，她决定去找点有意义的事情来干。她想起年少时刚从雅礼大学毕业，在父亲的医院做义工的美好时光。她决定重拾那美好的日子。1951年，颜雅清申请入读纽约社工学院（New York School of Social Work）秋季班，但遗憾的是，她的申请未获批准，原因是她已经超过了35岁的入学年龄限制。

此时，颜雅清的一对儿女都在接受高等教育，家里只剩下她和约翰两人。儿子国伟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工程学，而女儿国凤则回到了中国学医（章末注6）。颜雅清也并非完全无所事事，作为巴哈伊联合国委员会的观察员，她依然在继续参与联合国的有关事

务。1951年8月，她和约翰随联合国代表团出席了在纽黑文举行的一次庆典活动。巧合的是，主持系列庆祝活动的是霍伊特·卡特林（Hoyt Caitlin），也就是差不多三年前为两人主婚的那位太平绅士。

在政见上，约翰和颜雅清同属中偏左，在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①当权期间，他们依然保持着这种政治倾向，其民主的生活方式，与之打交道的那些民主进步人士，都让他们成为联邦调查局调查的对象。约翰·梅尔起初并没有注意到自己被调查，直到他的一位同事被联邦调查局盘问两人之间的关系，而这位同事将此事透露给了约翰。联邦调查局人员向这位同事打探约翰是否是共党分子，他是否在约翰家里看到过马列违禁书籍。起初，约翰把他被调查的这件事当作一个笑话不以为然，他甚至还给老朋友、新西兰著名诗人莱克斯·费尔本写了一封信，信中自豪地宣布自己成了联邦调查局调查的对象，他觉得反传统的费尔本肯定会认为这件事很有趣。尽管如此，约翰依然感到了某种不安。他非常清楚那些对共产党进行政治迫害的人一手遮天，权力无边，所以他也请求莱克斯不要将此事张扬出去。（章末注7）

约翰喜欢大海，就在他和颜雅清结婚后不久，他用25美元买了一艘破旧的、长23英尺的救生艇。他把这艘救生艇重新整修，并乘坐它出海航行。纽约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以及在联合国工作的压力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而这艘破船让他暂时忘却了那些不愉快的事情。1954年，他和颜雅清在康涅狄格州的南诺沃克（South Nor-

① 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1938年—1969年美国国会众议院设立的反共、反民主机构。1938年5月26日，美国国会众议院设立临时性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以反共著称的得克萨斯州参议员M·戴斯担任主席，故又称戴斯委员会。参加调查的委员绝大多数都是右翼反共分子。它名义上是调查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及其他组织“违反美国利益”的“非美国的”活动，实际上是反共、反民主，迫害共产党、进步工会和团体及其他进步人士的工具。1945年该委员会成为众议院常设机构后，加紧对共产党、进步团体和人士的法西斯迫害活动。1969年2月18日，该委员会改名为国内安全委员会，限于调查国内共产主义活动。由于它30多年来臭名昭著的反民主历史，1975年1月被迫撤销。——译注

walk) 建了一栋房子，南诺沃克位于诺沃克河河口宽阔之处，是一处古老的海滨社区，社区创建于 17 世纪。南诺沃克坐落在纽约东北约 40 英里处，乘火车可以往返于两地之间，南诺沃克的宁静生活与纽约大都市的骚动喧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夫妻俩在南诺沃克建的房子远离尘嚣，可以俯瞰长岛海湾 (Long Island Sound)，颜雅清在房子前建了一个漂亮的花园，花园内种满了多年生植物，令这栋具有当代建筑风格的家宅更温馨漂亮，而侍弄花草很快成了颜雅清的一大爱好。

南诺沃克是托马斯·菲奇 (Thomas Fitch) 的出生地，美国独立战争前，托马斯·菲奇任英属殖民地康涅狄格州总督，但是这位争取民族独立的英雄被英国人谑称为“扬基佬笨蛋” (Yankee Doodle)。自约翰和颜雅清住进南诺沃克后，这两位分别来自新西兰和中国的侨民很快就成为了自豪的“康涅狄格州的扬基佬”。他们在这个宁静的海滨小镇过着闲适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也许是约翰为了找回他年少时在故乡新西兰过的那种悠闲而美好的生活 (当时新西兰全国的人口仅占上海的五分之一)。虽然那种田园生活与颜雅清所熟悉的大都市生活相去甚远，但是她在这种生活同样充满了激情和热爱。在空闲时间里，夫妇俩乘船沿着长岛海湾那蜿蜒曲折的海岸线游弋，探索和欣赏着那无尽的大自然美景。

1954 年秋，夫妇俩乘坐一艘帆船出海时遇到了飓风。9 月 30 日，他们登上了一艘名叫“卢奥” (Luau) 的帆船，同行的还有他们的朋友亨利·威尔科克斯 (Henry Willcox) 夫妇 (这对夫妇也因其“非美国的”活动而被联邦调查局调查)。一行四人在罗德岛 (Rhode Island) 的 Point Judith 海湾附近的地方起锚下水，准备在海上过夜。(章末注 8) 他们航行到了长岛海湾相对安全之所以北的地方，所以第二天凌晨海面刮起大风时，他们遇到了麻烦。约翰仔细地记录下了天气的变化情况。

早上 6 点半，气压计的读数为 29.70 英寸水柱，而且还在持续下降，岸上的喇叭里高喊着，“今天禁止出海捕鱼！”过后没多久，东北风开始在海面生成，气压读数继续下降，为防暴风雨来临，他

们抛下了锚链。早餐后，颜雅清拿出了她的水彩笔盒，想画一幅不同寻常光线下的 Tenants Harbor 湾的景色。但是没过多久，暴风雨就来了，海面能见度几乎为零。风越刮越大。到了上午 10 点半时，他们为了避开前面的一个障碍物不得不右满舵，原来岸上的一座房子被飓风刮到了海上，在满是泡沫的海面上快速朝他们袭来。而就在这时，惊涛骇浪几乎将他们的帆船吞噬。到 11 点半时，气压计的读数降到了最低水平——28.70 英寸水柱——虽然这时太阳已经冒出了头，但是那耀眼的光芒只是让他们更看清了眼前的一片惨状：他们周围漂浮的都是船只和房屋的残骸。风速达到每小时 90 英里至 105 英里，中午 12 时 45 分，帆船桅杆被风吹断，四个人神情高度紧张，赶紧穿上了救生衣。不过一小时后，气压迅速上升，阳光明媚，海面又恢复了平静。险情已过，四个人已是饥肠辘辘，他们最期望的就是亨利·威尔科克斯的妻子安妮塔下船后给他们做顿热腾腾的午餐。后来，约翰终于有空闲时间来记录下他和颜雅清所经历的那些难忘的事情。（章末注 9）

除了参加那些惊险刺激的休闲活动，颜雅清还会在业余时间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她对心理学依然兴趣浓厚，每周两次她会去离家不远的位于新镇（Newtown）的费尔菲尔德州立医院（Fairfield State Hospital）做义工，担任业余的职业治疗师。这是一家精神病院，红砖的建筑体现着殖民地风格，医院鼓励病人独立自主。与病人打交道并观察其病情好转让颜雅清很有满足感，她决定接受职业治疗方面的专业学习。此时，颜雅清年近 50 岁，她申请了哥伦比亚大学内外科医师学院（College of Surgeons and Physicians of Columbia University）1955 年秋季入学的某高级课程班。她希望这次能有好运，学校方面会接受她的申请。但是，她的入学申请再一次被拒，理由依旧是超龄：学校规定攻读治疗师的年龄上限为 35 岁。颜雅清虽然失望但并不气馁，她依旧满腔热情地在那家医院做义工。

与此同时，颜雅清也十分关注联合国的健康发展。她对这个国际组织成立以来的表现印象平平。她在《联合国宪章》正式生效前

的公开演讲之行中就已经指出联合国制宪存在的问题，而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所料。她不无灰心地指出，各成员国试图以退出联合国为要挟来摆布政策的做法使该组织的有效性受到了极大挑战。她认为，只有进一步修改完善《联合国宪章》才能阻止这种“胁迫和恐吓”，也只有这样，联合国才能真正履行它的使命。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颜雅清至少做了一次公开演讲。

约翰则继续规划着退休以后的生活。在 50 年代中期，他给新西兰的诗人朋友莱克斯·费尔本写了一封信，请他帮忙在海边找一块几英亩的土地，他希望和颜雅清退休后在那里过一种回归大自然的宁静生活。朋友之请难违，莱克斯四处寻觅，最后在北岛最北端附近发现了一处原来用作孤儿假日野营地的地方。这块地位于马胡兰基港（Mahurangi Harbor）中部半岛的西海岸，正在出售。约翰对故乡这处风景优美的地方十分满意，他毫不犹豫地花 2500 英镑买下了这处房产。正如莱克斯所描述的，那栋房子破破烂烂，里面有“一台破旧的脚踏式风琴，30 个床位，20 张床垫，两个烤炉，一个大保险柜，另外还有一条长 9 英尺的小舢板，”实在是没有什么可圈可点之处，不过莱克斯也认为没有必要把房子拆了重建，他觉得做些必要的翻修就可以了。（章末注 10）约翰采纳了他的建议，没有把房子拆了重建，而是做了些必要的修缮。从房子附近的高地可以俯瞰马胡兰基港，星罗棋布的岛屿尽收眼底，其景色之壮美令人叹为观止。

当约翰在计划着退休生活的时候，颜雅清依然不忘重归职场的梦想。她渴望能够找到一份不仅让她个人感到满足、而且还能服务于他人的职业。她兴奋地得知，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对学生入学年龄没有限制。尽管如此，该学院的招生简章里还是说明，超过 35 岁的申请者除非一直在从事图书馆工作或在进行知识的求索，否则不建议报读。颜雅清一生都在探索知识和真理，她决定试一试。她恳请耶鲁大学“雅礼会”的行政秘书乔治·威尔（George D. Vaill）为她写了一封推荐信。颜雅清之前申请入读哥伦比亚大学内外科医师学院时就是请威尔先生写的推荐信，他也十分乐意再

效劳一次。而这一次，为了能让颜雅清通过申请，他还特别美言了一番。

“说明以下这一点可能具有启发性，”威尔先生在写给该校招生办的推荐信中说，“梅尔夫人于1925年6月大学毕业，她只用了三年时间就完成了四年的本科学历教育，而她当时距20岁生日还差5个月。她的这一纪录在学术圈里还是不多见的。”（章末注11）

凭借着杰出的国际工作经验、优秀的学习成绩以及推荐人的大力推荐，颜雅清这一次终于如愿以偿。1956年秋，颜雅清拿到了入学通知书，成为图书馆学专业的一名学生。毕业后，她愉快地接受了纽约公共图书馆布鲁克林区分馆的一个职位。在图书馆里，颜雅清在语言和科学方面的才能几乎无人能及，而她对于国际事务的了解和洞察力更是高人一筹，毕竟她本人曾亲身积极参与过那些事情。

注释

1 1943年—1945年，约翰·梅尔在新西兰第一远征军第8增援部队野战炮兵部队服役，从列兵升至中士，负责野战情报收集工作。Beverley Simmons, “Keeper of the Curtains,” in *Fairburn and Friends*, ed. Dinah Holman and Christine Cole Catley (Dunedin, Cape Catley, 2004), 131, 134.

2 约翰·梅尔的首任妻子是梅布尔·沃尔顿 (Mabel Walton)，两人育有一子一女。

3 1957年，费尔本英年早逝，新西兰著名作家弗兰克·萨吉森 (Frank Sargeson) 盛赞他是“南半球出生的最不寻常的人之一”。

4 2005年8月，本书作者通过电子邮件多次联系费尔本的三个女儿——詹妮丝·费尔本 (Janis Fairburn)、黛娜·霍尔曼 (Dinah Holman)、科林·费尔本·贝斯 (Corin Fairburn Bass)。三人定居新西兰和澳大利亚。

5 “Lost Jewels’ Value Disputed in Court,” *Washington Post*, May 18, 1949.

6 颜雅清的儿子陈国伟获麻省理工学院 (MIT) 工程学学士学位，布鲁克林理工学院博士学位。而他的妹妹陈国凤在美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之后，回到国内研究传统中医，后来又回到美国，作了一名针灸师。当年她

的外祖父颜福庆将西方医术带回中国，而现在，她将东方医术传播到了西方。

7 Simmons, "Keeper of the Curtains," 134. 联邦调查局 (FBI) 对梅尔展开调查是基于一位前共产党员的证词，她“指证她曾听调查对象 (指梅尔) 自称为自由的激进主义者。她还说，他对自己的亲苏倾向非常公开，曾表示自己从来就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一个另类，一个自认为艺术家高人一等的人。证人表示，梅尔也并非始终站在共产党一方，有时也听见他抨击苏联。”联邦调查局的同一份报告还指出，“该证人指证梅尔娶了颜雅清为妻，后者是一名中国人，家境富裕，毕业于卫尔斯利女子学院 (Wellesley College)。证人还指证，最近梅尔和他妻子加入了一个国际宗教组织——巴哈伊教。”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约翰·吉福德·梅尔档案。美利坚合众国官方备忘录，纽约特工主管致 FBI 长官，1952 年 5 月 19 日。

8 亨利·威尔科克斯 (Henry Willcox) 夫妇都是所谓的美国“第一家庭”之后。亨利的祖先们乘坐英国“五月花”号船到达美国，他的清教徒祖先威廉·布拉德福德 (William Bradford) 曾任新英格兰在美首个殖民地的总督。亨利的妻子安妮塔是罗杰·威廉姆斯 (Roger Williams) 的后代，罗杰·威廉姆斯乃罗德岛州的创建人，人类一家理念的鼓吹者。二战后，亨利·威尔科克斯成为纽约州最大的房屋建造商，而安妮塔则是一名成功的杂志插图画家。但是，1952 年，夫妇俩因未经美国政府同意到访由共产党统治的新中国而令美国国务院不悦。鉴于他们的自由主义观 (以及丰厚的个人资产)，他们同情和支持麦卡锡主义 (McCarthyism, 指美国共和党参议员 J. R. McCarthy 于 1951 年—1954 年间发动的反共以及迫害民主进步力量的法西斯行径。——译注) 的受害者，积极宣扬其美国乃“自由之地”的理念。

9 新西兰奥克兰市立图书馆特藏部手稿和档案部约翰·吉福德·梅尔档案。

10 Simmons, "Keeper of the Curtains," 128.

11 参见耶鲁大学“雅礼会”行政秘书乔治·威尔 (George D. Vaill) 于 1956 年 7 月 10 日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学院的信；颜雅清 1950 年—1956 年有关资料。耶鲁大学“雅礼会”官方档案，1901 年—1975 年。

12. 尾声

—

约翰和颜雅清喜欢广交朋友，其中有不少是有着自由思想的民主进步人士。两人因为共同语言而结合在一起，婚后的头十年幸福而美满，但是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颜雅清那不安分、不甘于平庸的心又复活了。她爱上了另外一个男人。最终，她和约翰决定离婚，两人于1959年12月18日解除了婚姻关系。约翰此前也在寻找新的伴侣，在和颜雅清离婚的三天后，他娶了玛莎·凯瑟琳·温斯顿（Martha Catherine Winstone），她曾在《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杂志任职，是一位博览群书、才思敏捷的女士。5年后，约翰退休，一直渴望叶落归根的他带着凯瑟琳回到了新西兰。

颜雅清的第三段感情并不像约翰和凯瑟琳的那样长久。不过，也许是因为距离产生美的关系，她和第一任丈夫陈炳章一直保持着一种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一直陪伴他们终生。1960年代，陈炳章曾致信颜雅清，向这位前妻索要相片，他在信中表示，在他心里，她依然占据着特殊的位置。他们的孙子也回忆说，家里想方设法给陈炳章装了一部长途电话（在当时，装部长途电话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正如20多年前颜福庆给在普拉特维坠机的女儿打电话一样。），他清楚地记得祖父母在电话聊天时的喜悦之情。他当时还对祖父母为何离异感到奇怪，他还专门问了母亲这个问题。母亲回答说，估计是祖母年轻早熟而且喜欢外面的世界，所以两人出现了分歧，最后

祖母提出了离婚。(章末注1)

在颜雅清生命的最后那些年，年少时的气盛已经不再，她也因此得以过着更安定的生活。对于巴哈伊教，她也没有了曾经的狂热。作为炎黄子孙，她开始研究《易经》。她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1960年代，她因患乳腺癌而接受了乳房切除术。当时，给她治疗的医生都预计她活不过那一年，但是她以顽强的意志打破了这一可怕的预断。虽然自己的病情趋于稳定，但是颜雅清还是放不下心，她十分牵挂和担心在国内受到政治迫害的父亲。时值文化大革命期间，颜福庆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这位曾经的医学泰斗，一时沦为阶下囚，被无情打击，饱受屈辱。老迈的父亲受到迫害让颜雅清忧心不已。

此时，颜雅清自己也近花甲之年，她还在布鲁克林区的图书馆工作。1970年3月18日，颜雅清在沐浴时昏倒，不幸去世，享年64岁。验尸官裁定其死因为动脉硬化闭塞症所引起的心肌梗塞。她是家族中较早辞世的一位。噩耗传来，还在上海被迫害的父亲颜福庆悲痛欲绝。

颜雅清的追悼会在纽约曼哈顿的河滨教堂 (Riverside Church) 举行。全美最高的河滨教堂模仿始建于1145年的法国沙特乐大教堂，该教堂以精神信仰和进步主义政治相结合而著称，与颜雅清毕生追求全人类以及宗教的自由解放的精神非常吻合。她的遗体被安葬在纽约阿兹利 (Ardsley) 的芬克里夫墓园 (Ferncliff Cemetery)，这里也是许多名人的长眠之地，包括20年代好莱坞著名女星琼·克劳馥 (Joan Crawford) 以及美国第41任副总统纳尔逊·洛克菲勒 (Nelson Rockefeller)。更重要的是，这里也是颜雅清的许多同胞和故友的永久栖息地，宋美龄、宋子文、宋霭龄、孔祥熙等先后安葬于此。(章末注2) 远在异国他乡，颜雅清一直希望死后能与朋友们安葬在一起。

颜雅清的墓碑是块普普通通的青铜牌。在与约翰离婚后的11年里，颜雅清对外一直仍称自己为“梅尔夫人”，但是她去世后，儿子国伟决定碑文上的姓氏既不是“陈”，也不是“梅尔”，而就

是“颜雅清”。她的名字用英文和汉语镌刻着，反映了她东西融会的思想，也说明了她不依附于任何男人的独立精神。

颜雅清的一生，经历了许多政治和社会的风云变幻。她出生于清末，长在民国，亲历了二战，在越战期间旅居美国（章末注3）。风雨几十年，也让她亲身经历了从裹脚、祭祖到迷你裙、迷幻艺术所代表的文化习俗的变迁。她本人的精神之旅无异于一次浩瀚的航行，她去过不少地方，结交了形形色色的人，她的世界和视野因此而广阔，父亲和伯父是她最亲密的导师，他们给了她思想的启迪和不竭的追求自由和真理的动力。

纵观她的一生，虽然她看似一直在追索个人价值的实现，但是这种追求从未偏离她对全人类和谐友爱、四海一家的信仰的坚持。不公正是一种令人无法忍受的罪恶，人类应该消除这种不公正，而给予那些受苦受难的人民以同情和援助是一个伟大而光荣的事业，一个那些愿意为之献身的人所崇尚的事业。这些理想和信念就像北极星，指引着颜雅清前进的方向，特别是在中华民族处在水深火热的时候，在同胞亟需援助和支持的时候，指导着她以一位航空战士的英勇形象飞上蓝天。

二

1973年，颜雅清的第一任丈夫陈炳章去世，卒年74岁。

颜雅清的第二任丈夫约翰·梅尔退休后携妻子回到新西兰北岛的沃克沃思（Warkworth），开始了他一直向往的新生活（一种与他和颜雅清在康涅狄格州的南诺沃克过的相似的田园生活），在自家菜园种植蔬果，乘船出海捕鱼，生活自给自足，悠闲自得。不过，即使在退休后，他依然不忘使命，为了和平和人权问题继续奔走呼号。后来他与人共同成立了新西兰和平研究基金会（New Zealand Foundation for Peace Studies）并担任会长。作为一位艺术敏感的诗人，约翰于1989年出版了一本限量版诗集——《战争诗歌选集》（*Poems from a War*）——用这种文学形式记录了他在二战时的经历。他一直与颜雅清的家人保持通信联系。鉴于他对和平和人权运

动所作出的卓越贡献，2002年，他荣获英女王颁发的新西兰功勋勋章（the New Zealand Order of Merit）。次年，约翰·吉福德·梅尔去世，享年90岁。

颜福庆在女儿去世的几个月后也撒手人寰。1970年11月29日，为中国医学教育事业奉献了一生的一代医学巨匠含冤辞世，享年88岁。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上海市委、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为他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其骨灰安放在龙华烈士陵园“革命干部骨灰存放室”。上海医科大学（2000年与原复旦大学合并，更名为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为了纪念他对振兴民族医疗教育事业的赤仁之心与巨大贡献，于1997年上海医科大学建校70周年之时在校园内塑立了颜福庆全身雕像，并以他的名字为图书馆命名。如果颜雅清泉下有知，她一定会为父亲恢复名誉而感到欣慰。颜福庆一生关心人民的健康和疾苦，他热爱祖国，热爱科学，坚韧不拔，艰苦创业，其严谨治学的工作作风，其矢志不渝献身中国医学教育事业的精神，将永远受世人敬仰和爱戴。

注释

- 1 颜雅清的孙子陈克文于2002年7月12日致本书作者的电子邮件。
- 2 在与颜雅清相关的名人政要中，前夫陈炳章的老上司孔祥熙于1967年安葬于芬克里夫墓园，在颜雅清去世的次年，宋子文也安葬于此。多年后，该公墓亦成为顾维钧（1988）和宋美龄（2005）的长眠之所。
- 3 颜雅清于1960年代初加入美国籍，作为一名和平主义者，她坚决反对美国发起越南战争。





第二章

李霞卿：天骄传奇

li xia qing

我欲仁，斯仁至矣。

——孔子

14. 序言

从孩提时，李霞卿就知道自己与众不同。她出生于1912年4月16日，这一年正是民国元年，民国革故鼎新，将传统的夏历（阴历）改为阳历。小小年纪的李霞卿就知道中华民国是辛亥革命的果实，而自己的父亲李应生、叔父李沛基都曾是追随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党人。受家庭环境影响，李霞卿从小就有着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

李霞卿的祖母徐慕兰是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徐润之侄女，女革命家徐宗汉之胞姐。徐慕兰曾以“木兰”为名，鼓励两个儿子跟随自己的革命步伐。这两兄弟就是李霞卿的父亲李应生和叔父李沛基。还在襁褓中的时候，祖母就经常给她讲那些英勇的神话故事，像为了反抗压迫而神奇飞天的峨眉山飞天仙女的故事。小霞卿也希望着，自己有一天能长出双翅，飞上蓝天，惩恶扬善，济弱扶贫。她对这些故事异常神迷，有一天，她跑到院子里，爬到围着花园的几块大石头上。她想飞。她展开双臂，腾空跃起，但却重重地摔到了地上。她不服气，爬起来再跳，但还是摔了下来。她非常失望，但却对自己打气说这不过是暂时的挫败而已，她不会认输，终有一天，她一定会飞上天。

飞天的梦想一直伴随着她的成长。家庭的熏陶和耳濡目染，让李霞卿从小就立志成为一个有正义感和责任心、捍卫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人。14岁时，还在读中学的李霞卿以艺名李旦旦初登银幕，并一举成名。但是，电影明星并不是她的最终理想，也满足不了她报



影星李旦旦（李霞卿）14岁照。

效国家的愿望。在国家遭到外敌入侵的威胁之时，李霞卿梦寐以求的机会终于来了。她一直没有忘记儿时的飞天志愿，而在中华民族处在危难之际时，这种理想和愿望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对国家的忠诚和热爱激励着她通过飞天之举来践行自己的报国之志。国父孙中山先生一直大力倡导“航空救国”，这与李霞卿从小的飞天梦想不谋而合，她毅然决然选择了学习飞行。

翱翔蓝天将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与个人梦想的实现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李霞卿知道，飞翔能够唤起民众对航空事业的关注，能够为遭受外强侵略的祖国争得支持和援助，正是通过飞行募捐、号召民众支援抗日，李霞卿收获了巨大的满足感。她属于蓝天。只有展翅翱翔的时候，李霞卿才感觉自己是无比从容、身心超逸的。通过展示翻转、翻筋斗、俯冲等一系列飞行特技，李霞卿最终找到了一种力量和释放感。当她从上千英尺的高空垂直俯冲而下之时，当她在驾驶舱里感受着天旋地转之际，她知道，没有什么运动能比飞行更接近死神。

15. 革命世家

中国人民永远缅怀李霞卿家族涌现的、为推翻清王朝而前仆后继的革命志士。李霞卿的祖母徐慕兰为同盟会会员，为辛亥广州起义做了大量工作，在亲属中培养了许多革命志士。其胞妹徐宗汉为中国近代颇有声望的女革命家，同盟会会员，曾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协助黄兴领导革命。今天，在珠海博物馆内，竖立着徐慕兰、徐宗汉两人的全身蜡像，供世人瞻仰。李霞卿的叔父李沛基，于1911年10月炸死了清朝驻广州军队的头领凤山将军，为革命军攻占广州立下头功。

传记作家维多利亚·格莱丁（Victoria Glendinning）曾说过，“家族史是很难同化吸收的，但是对于一个家庭成员的成长至关重要……”李霞卿出身革命世家，自然对她的成长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个性的培养，价值观的塑造，都离不开她所在的家庭环境。

徐慕兰、徐宗汉姐妹出生于上海的一户富有的买办兼茶商家庭。两人是洋务运动著名代表人物、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徐润的侄女。良好的家世背景为姐妹两人的婚姻提供了绝好的条件。姐妹俩先后嫁给了广州巨富、两广督署洋务专员李庆春的两个儿子，姐妹又成妯娌，亲上加亲，一时传为佳话。（章末注1）

妹妹徐宗汉18岁妙龄嫁给李庆春次子李晋一为妻。李晋一自幼生长在广州，接受新思想，与孙中山同党陈少白过从甚密，与徐宗汉成婚本应琴瑟和谐，却不幸染病早逝，留下一子一女。徐宗汉青春守寡，遂以富家少奶奶身份出入革命党内，并与二姐徐佩瑶在

南洋执教期间正式加入同盟会，其间运送枪械、组织入会、协助广州起义，掩护在广州黄花岗起义中负伤的黄兴撤退疗伤，并与这位著名革命家患难之中结为连理，从此演绎了一段侠女与义士的美好姻缘。民国肇始，黄兴肩负重任，徐宗汉作为贤内助操持家务、救助伤员、抚养难童，侠肝义胆女中豪杰本色尽现。二次革命，再度反袁，黄兴有徐宗汉协助更是义无反顾。1916年，黄兴因伤病早逝，徐宗汉不仅承担了养育一大家子女的重任，而且继续以革命家的身份活跃在历史舞台上。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她负责组织“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参与领导上海妇女的爱国运动。国民党定都南京后，她筹创贫儿教养院，并将此当作自己毕生的事业。抗战期间，她赴美向华侨募捐，向东北义勇军捐赠，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在重庆与周恩来、邓颖超等来往，为八路军、新四军辩护，她以民国元老、黄兴夫人的身份，发挥了他人不能替代的作用。

姐姐徐慕兰嫁给了李晋一的哥哥李紫石，李庆春早年丧妻，李紫石又是纨绔子弟，大家庭故由长媳徐慕兰主持。李紫石并没有继承父亲的衣钵，他不喜经商，更无意投身革命，而是对唱戏情有独钟（据说，他有一副余音绕梁的好嗓子）。不过，戏子的身份终究未能为他赢得多少名誉，因而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什么印记。徐慕兰以长媳持家，温柔贤惠，慷慨好施，刚强而有主见，使上下皆服。同盟会创建不久，徐慕兰与小妹徐宗汉及二妹徐佩瑶均先后加入革命团体，被称为“同盟会徐氏三姐妹”。慕兰是李、徐两家组织革命活动的核心人物，也是广州女革命党人的中心人物。富家少奶奶的身份，加上谨言慎行，成为她参加革命活动最好的掩护。清宣统三年（1911）春广州起义前的准备工作、运输联络，输送及收藏盟约、秘密通讯、购买炸药，多由她和儿子经办。培养许多革命骨干，是徐慕兰对革命的重要贡献之一。她不仅动员、影响许多朋友参加革命，而且在自己的家庭里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其妹佩瑶、宗汉在她影响下参加同盟会；她的小姑李佩书、女仆黄悲汉（后成为她大媳妇）、邓慕芬（后参加广东女子北伐队）、男仆亚和，都

由于她的引导教育而走上革命的道路；（章末注2）两个儿子更成为勇敢的革命斗士，长子李应生、三子李沛基在辛亥黄花岗之役中勇敢承担纵火以乱清军耳目任务。时年仅17岁的李沛基参与策划暗杀清朝官吏的使命，将炸弹悬于广州府，成功炸毙清将凤山。

据李霞卿后来回忆说，祖母徐慕兰在广州以借开绣品店为名从事革命活动。店里配备了洋货缝纫机，对外称为那些弱女子提供培训和就业的机会（事实也是如此），而实际上是革命党人制造炸弹的秘密之所。脚踏缝纫机的声音掩盖了制造炸弹所发出的金属碰撞声。而秘密制造炸弹的正是徐慕兰的两个儿子李应生和李沛基。为了革命事业，母子三人不顾生命危险，积极地制造和运送炸弹武器。（章末注3）

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同盟会在中国各地及华侨中挑选160多名骨干，组成先锋队，在黄兴率领下举行起义。起义军从设在广州越华路小东营5号的指挥部等地出发，一举攻入清朝两广总督府，两广总督张鸣岐逃脱。当晚，清军组织大规模反扑，起义军与敌人进行了激烈战斗，终因寡不敌众，起义失败。起义失败后，黄兴在徐宗汉等人的掩护下逃往香港。未能逃出广州城的革命党人，不少惨遭敌人杀害，这次起义同盟会骨干会员牺牲百余人，有名可考者86人，同盟会会员潘达微冒死收殓烈士遗骸72具，丛葬于红花岗（后改名“黄花岗”，黄花即菊花，比喻节烈），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称这次起义为“黄花岗起义”。1918年，爱国人士和海外华侨为了纪念这次起义的死难烈士，捐资修建了黄花岗烈士陵园。在这次起义中，徐慕兰的两个儿子李应生、李沛基也积极参与其事，起义前，在香港摆华街机关负责全部炸药及军械的保藏运送工作，起义过程中参与放火，以乱清军耳目，起义失败后幸得以逃脱。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同盟会遭到清廷血腥镇压，大批革命党人被捕，不少惨遭敌人杀害。李霞卿的父亲李应生也因蒙上嫌疑而被捕，所幸他是清廷重臣李庆春孙子的这一身份救了他。当时，李应生的妻子亲临法庭聆听对丈夫的宣判。众所不知的是，她在衣服内

藏了一颗炸弹，准备如丈夫被处死就当庭引爆。命运的眷顾让这对夫妻在那个血雨腥风之日逃出生天。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一部分革命党人决定把目标转向长江流域，准备在以武汉为中心的两湖地区发动一次新的武装起义。通过革命党人的努力，终于在1911年（农历辛亥年）10月10日成功地发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武昌起义。起义的胜利，使清王朝走向覆灭。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黄兴等革命党人脱险逃到香港。眼见多次起义惨遭镇压，党人纷纷牺牲，拼命主义情绪和暗杀思想包围了许多革命党人。黄兴在港一再表示：“革命与暗杀二者相辅而行，其收效至丰且速。”“此时党人惟有行个人暗杀之事，否则无以对诸烈士。”在孙中山的资助下，黄兴组织了“东方暗杀团”，黄兴的姨甥李沛基及其兄李应生参加了“东方暗杀团”，并被派到广州筹设暗杀机关。暗杀团最初计划袭击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和两广总督张鸣岐，后获知清廷将调派凤山来粤出任广州将军，遂改而谋炸凤山。暗杀凤山的任务由李沛基、李应生作刺客，另一成员周之桢协助。暗杀团首先在南关仓前街（今北京南路东侧）9号顶手租下了一间旧铺屋，改名“成记”洋货店，挂起招牌佯装做生意，实质是活动据点。此间，革命党人在广州河南所开办的机器铸造店里，铸出了三枚生铁弹壳，再由李沛基和李应生弟兄两人在店铺后面装填炸药和安置引信，准备伺机行事。李应生在配制毒剂炸弹时因防范不够，被气体熏倒，配置炸弹的任务最终由李沛基一人完成。因炸弹过重，特制一斜板将炸弹置于屋檐下，系以长绳。

此时，武昌起义已半个月了，南国革命中心广州处处风声鹤唳，清廷官员个个胆战心惊。凤山害怕重蹈前任覆辙，迟迟不敢前来履职，经两广总督张鸣岐再三催促，才轻车简从悄悄起行，只带一妾一婢一姬二仆随侍身边，秘密南下香港，再转乘“璧号”军舰前往广州，其行动之保密，连张鸣岐也未通知。但凤山启程的消息还是被无孔不入的革命党的眼线在北京打听到了，按线报，凤山将

于10月25日早上抵达广州天字码头，黄兴迅速发电报通知广州方面做好准备。李沛基得到通知后，即按计划潜伏“成记”楼上。凤山从天字码头登岸后，故意避开长堤、归德门、四牌楼等大路，走稍为偏僻的仓前街。李沛基见众多护卫簇拥着凤山的绿呢大轿已来到洋货店门口，遂不失时机拉动绳索，三颗炸弹正好落在队伍中间，把凤山炸得血肉横飞，随从卫队及仆役被炸死炸伤20余人，路人亦有伤亡。成记洋货店及旁边的几家货店被震塌，李沛基也被震晕，后从瓦砾中爬出来从容离开。

凤山遇炸身亡的消息第二天就在广州各大报纸上刊出，广州百姓无不拍手称快，清吏则丧魂落魄，人人自危。空中落弹炸凤山是革命党人黄兴组织的“东方暗杀团”的一次完美的暗杀行动，李沛基也因此名震一时。中华民国成立后，政府以有功于民国的名义，派李沛基和李应生出洋留学。1911年11月9日，在武昌起义爆发的一个月后，广东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横空霹雳炸凤山”这一暗杀事件对广东的光复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大约四个月后，李霞卿出生。母亲给她取名“霞卿”，小名“旦旦”，“旦”与“炸弹”的“弹”谐音，因为霞卿的父母曾用她的婴儿车来运送炸弹。（章末注4）

民国成立后，李氏一家人的革命活动并没有停止。1912年，广州光复后，徐慕兰担任广东女子北伐队队长（广东女子北伐队被革命军誉为“今之木兰从军”），队员近百人，随广东北伐军北上，在徐州参加对张勋作战，十分勇敢。1912年4月，徐慕兰奉命率队调回广州，广东女子北伐队不久解散。其时，广东革命政府警察厅厅长陈景华（南屏人）创办女子教育院。徐慕兰被陈邀请担任女子教育院院长，院址设于芳村黄大仙祠堂，入院对象是社会上受虐的婢妾、从良的妓女和受苦难的女子，学员有800多人。学校教育在广东影响很大，被称为被压迫妇女的“慈航宝筏”。徐慕兰全力襄助，积极投身于这一反抗封建、解放妇女的教育工作。可惜不久陈景华被袁世凯杀害，女子教育院被迫解散。之后，徐慕兰仍致力于

收容、教育无业无家的孤儿贫女，付出其全部精力财力，乃至负债累累。民国11年（1922）病逝于上海。新中国成立后，徐慕兰及广东女子北伐队的事迹被记载于《广东革命史辞典》、《辛亥革命在广东》和珠海市的各类史志书籍中，以志纪念。

民国后，徐慕兰的两个妹妹徐宗汉和徐佩瑶也积极参与了贫儿教养工作。黄花岗起义前，徐宗汉率一批亲友，包括侄儿李应生、李沛基等人，在香港摆花街同盟会机关里制造炸弹，并将起义需用枪械弹药秘密运到广州河南的溪峡，同时以假装娶亲将武器运至城内分发给敢死队员，其机智英勇一时被传为美谈。民国成立后，徐宗汉随黄兴赴南京，参与筹建民国临时政府，主持创建南京贫儿教养院，从此把贫儿工作当作自己毕生的事业。

民国5年（1916）10月，黄兴在上海病逝，徐宗汉勉力抚育遗孤。民国8年（1919）“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徐宗汉为学生的爱国热情所激励，与上海博文女校校长李果等共同发起上海女界联合会，并为该会负责人之一，参与领导上海妇女投入火热的爱国运动。当刘清扬等代表天津各办联合会抵达上海、呼吁发起成立全国各界联合会时，复得徐宗汉热情支持，以上海各界联合会代表的身份参与全国各界联合会的筹备工作，并任全国各界联合会常务理事。她慷慨解囊，捐资给各爱国团体。孙中山先生对这场爱国民主运动也给予了积极的支持，通过徐宗汉转交捐款给全国各界联合会。“五四”运动后，许多青年为追求革命真理，纷纷赴法国勤工俭学，然苦无川资，徐宗汉也尽力予以资助，促其成行。

她既要支持爱国运动，又要资助青年出国，一年之后，家财耗尽，自己生活亦陷于困境，不得不变卖住屋。1931年，徐宗汉为了筹措贫儿教养院的经费，不顾自己体弱多病，远涉重洋，赴美国、墨西哥、巴西、古巴、秘鲁等地向华侨募捐（章末注5）。抗日战争爆发后，徐宗汉不顾年事已高和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于1938年初，亲自带领部分贫儿出国，到暹罗（今泰国）看望华侨，一面为贫儿募捐，一面宣传抗日救国，呼吁侨胞支持神圣的抗战事业。

1944年3月8日，恰逢国际妇女节这一天，这位被誉为“香山女

侠”的中国妇女界的斗士，因肝病咯血，怀着忧愤的心情，在重庆离开人世，终年68岁。

尽管李霞卿的这些家族成员在大革命中扮演了中流砥柱的角色，成为中国近代革命史上不可磨灭的人物，但是霞卿小时从未从他们的嘴里听说过他们的英勇故事。也许，回忆那段峥嵘的岁月是一种痛苦，长大后，李霞卿才从别人那里了解到自己先辈的丰功伟绩，将那些支离破碎的历史记忆拼凑在一起。虽然他们不愿谈及自己，但总是会给小霞卿眉飞色舞地讲述他们祖先的故事。

据说，很久以前，李氏家族权倾一时，家族中有不少成员在清廷任高官，其中一位是殿前御医，皇帝一时病人膏肓，这位御医妙手回春，皇上龙颜大悦，特赐黑玉石玉佩一块。这块玉佩上刻着毒蛇和蝙蝠，在中国传统医学典籍中，蛇和蝙蝠是最具自愈能力的动物，这块御赐的玉佩成了李家的传家宝。李霞卿小时候还摸过这块玉佩，心想着自己的先祖曾是何等的荣耀。（章末注6）后来，李家先祖在皇上面前失宠，为避灾祸，先祖辞官，收拾一应细软，带着家人远走他乡。与之同行的还有他们先人的灵柩，放在马车上，一路南行。就这样，生者和死人开始了一次漫长的旅行，一路上，他们见到了许多从未见过的景象，而那吱吱呀呀浩浩荡荡的马车队途经乡野山村时，也让那些从未见过世面的乡下人吃惊不已。

这一大家人最后在广东扎下根来，他们在那里建起了豪华的宅院，家人、婢妾、仆役，上上下下几百号人，李霞卿的童年就是在那里度过的。没有人知道那里究竟住着多少人——它渐渐地变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小村子，不断繁衍生息着——而对小霞卿来说，那里就是一个快乐的天堂。其景色就像是蓝白色的瓷制茶具上绘制的景色一样，宽大的庭院，漂亮的花园，围种着含羞草的鱼池，躲在荷叶下避阴的锦鲤。登门造访的人穿过金漆的大门，被领进了宽敞明亮的会客厅，这是一间摆着彩绘花瓶以及黑檀木家具的大厢房。厢房里还摆着各种盆栽，墙上则挂着名人字画，大多是反映季节变迁的山水画。祭祖堂里点着一盏长明灯，以缅怀那些逝去的先人，

堂屋里，先人的牌位依次排开摆放着。这间祭祖堂是小霞卿在整个大宅院里最喜欢去的一个地方。她喜欢那里从来不熄灭灯火，从来没有阴暗，另外，缅怀祖先给了她一种宁静感，让她意识到自己有责任要为那些先人们做些什么。

由于家庭环境的关系，李霞卿差不多一出生就受到现代西方文明的洗礼。一岁的时候，她就随父母去了法国，当时她的父亲李应生在索邦大学（巴黎大学的前身）攻读化学与工程专业。在校期间，李应生开始了最早的对电镀板的研究。李应生是个富有生意头脑的年轻人，当时欧洲社会掀起了一股中国艺术品热，于是在业余时间，李应生经营起了古玩生意，将东方的古董卖到欧洲，收获颇丰。

举家回到中国后，李应生的妻子不幸患了肺结核。从此，她闭门不出，谢绝见人，连她的小女儿霞卿也很少见到她。李霞卿一直无比怀念那些少得可怜的见到母亲的日子，母亲在莲花厅幽居，只见日见消瘦的她躺在沙发椅上，周围摆放着鲜花和一尊观音像。霞卿4岁半的时候，母亲撒手人寰。在童年的记忆里，霞卿一直难以忘怀母亲僵硬的尸体躺在撒满白玫瑰的棺木里那可怕的一幕。（章末注7）

没过多久，李霞卿的祖父也患了重病。这位老人听信了医生的话，让儿子马上续弦来冲喜。为李应生选的这房妻子（也可能是小妾），既非他本人所选，也非他本人所好，但依旧沉浸在丧妻之痛中的李应生不敢违背生病的老父的意愿。根据老父的安排新人很快拜了堂，成了亲。但是，这场喧闹的仪式终究未能挽救老人家的性命，他还是驾鹤西去了。而如今，小霞卿有了一个不称职的继母，和她在一起，小霞卿总感到十分不自在。万分思念亡母的她对父亲产生了强烈的依恋感，任何人，只要是拦在她和她父亲之间，她就视之为仇敌。父亲成了她的精神寄托和主要照护者，而李应生也把女儿视为心头肉，疼爱有加。小霞卿从小天资聪慧，生性顽皮，骑马、驾车、游泳、舞蹈等无不精通，加上受到中西文化的熏陶，思

想开放，胆识过人。（章末注8）

幼年的李霞卿与祖父的那些小妾们生活在一起，这些女人成了她最早的导师。在耳濡目染中，小霞卿不经意地学会了如何打扮自己，如何展现女人的魅力，而这将是她日后成为公众人物的一大制胜法宝。更重要的是，那些侍妾们还教会她：女孩子家要持重，不要轻易流露情感。在一夫一妻多妾制的旧中国，这可算得上是至理名言。那些妻妾们也许背地里争风吃醋、机关算尽，但是表面上，她们会恪守这一箴言，保持一团和气，这样才能在一个屋檐下相安无事。小小年轻的李霞卿也从中悟出不少道理。

“中国女人从小被教导要含蓄持重，”李霞卿多年后发表意见说，“长期的历练和坚忍，让她们学会了在任何情况下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

尽管李霞卿的生活完全有别于那些侍妾，或者说她将成长为一位新女性，但小小年纪的她还是把那些恪守妇道的古训牢记在了心里。究其一生，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满怀爱国热情的李霞卿，她婉约而不轻浮，美丽而不俗艳。她的这种对情感的隐忍有时让她无法真实地表达个人的情感，关于这一点，就连她的孩子们也不能完全理解她，在孩子们眼里，他们的妈妈为了国家的利益整天东奔西走，她有时更像一部高速运转的机器而非一位慈爱的母亲。

父亲再婚后不久，李霞卿去了香港，在祖母徐慕兰的照看下生活并在那里接受教育。徐慕兰出生于富有的买办兼茶商家庭，幼年随父在上海私塾读书，从小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虽然韶华已逝，但她总是喜欢把自己精心梳洗打扮一番。小霞卿逢人便说，祖母是她认识的最有意思的女人。

“我们之间有一种亲情和纽带，这种亲情和纽带让我们很容易地跨越了代沟和彼此年龄之间的差距，”李霞卿幸福地回忆道，“我依然记得她穿着整洁的黑裤黑袄的样子，记得她给我们讲佛学佛法，记得她时不时会停下来抽一大口她的水烟的那个神态。”（章末注9）

李霞卿被送到香港的圣斯蒂芬教会学校接受早期教育，尽管这



作为电影明星的李霞卿，艺名李旦旦。

所学校教学质量上乘，但是霞卿在那里的日子并不开心。在学校里，她常常受到来自英国和美国的同学的欺负，这种被欺凌的经历让她在今后的一生中都致力于捍卫自己民族的利益。正如她后来所承认的，那些经历差不多使她对外国人产生了一种“永恒的抵触情绪”。

10岁时，李霞卿离开香港迁居上海，当时她的父亲已到上海发展，从事珠宝和银器生意。李霞卿进入了上海著名的贵族教会女校上海中西女中读书。

李霞卿天资聪颖，严格的学习难不倒她。14岁时，她已通晓唐诗三百首，并熟稔英语、法语，成为上海中西女中的“高材生”。不过，这一正常的学习生活却因为意外而画上了句号。因为机缘巧合，她成了一位电影明星。

注释

1 徐慕兰原名徐佩兰，而徐宗汉原名徐佩萱。她们的公公李庆春是广东海丰人，据传他曾担任清政府两广督署洋务专员这一要职。

2 这些人包括她的妹妹徐宗汉和徐佩瑶，弟弟徐绍秋（音译）和徐燊波（音译），以及小姑李佩书。

3 李霞卿的传记作者、曾任驻华记者的埃尔西·麦考密克·唐恩（Elsie McCormick Dunn）的传记手稿（无标题，未公开出版），第15页。

4 侨居加州赫克力斯的李霞卿之子郑柏士于2005年1月13日发给本书作者的传真打印稿。

5 10多年后，她的侄孙女李霞卿为抗战募捐也飞访了这些国家。

6 这块一直为族人议论的黑玉石玉佩乃一位李姓先祖母的随葬品，

它是在迁墓时发现的。李氏后人将它从墓穴中取出，代代相传。参见本书作者于2005年3月1日对李霞卿之子郑柏士的采访笔记。

7 旦旦的母亲虽身体羸弱，却胆识过人。她和婆婆徐慕兰经常冒着生命危险为革命者运送弹药，她们将弹药藏在夹棉外套下，以掩人耳目。一次，两人收到一个危险任务，要求她们共赴香港取一批货物，这批货物是款式一样的手表。手表上刻有“自由”二字，将分发给同盟会会员，作为一种身份标志。她们一路平安地携带着这批手表登上了回广州的轮船。船将到岸时，婆媳俩偷偷将手表藏在外衣下准备过海关，但是下船时，她们惊恐地发现每只手表都在滴答作响。两人似乎已经预见到接下来的搜查和牢狱之灾。就在这时，徐慕兰突然纵声大笑，跟身边的媳妇回忆起她们在香港那天下午见到的一个街头杂耍人的有趣表演。在当时，一位有地位、有身份的老夫人当众喧哗会被认为有辱身份，而她的媳妇也在旁大声附和更让路人侧目而视。他们哪里知道，这两个女人故意高声谈笑，意在掩盖会出卖她们的钟表的滴答声。这招果然奏效，她们成功地躲过搜查，过了海关。埃尔西·麦考密克·唐恩撰写的李霞卿传记手稿（无标题），第17—18页。

8 旦旦也并非全无玩伴。她有个同父异母的妹妹李碧琪，两姐妹感情甚笃，李碧琪一生都是姐姐的热心支持者。旦旦还有个异母兄弟，名叫李金城。

9 埃尔西·麦考密克·唐恩撰写的李霞卿传记手稿，第6页。

16. 荧屏之星



民新影片公司1927年出品的黑白无声影片《西厢记》剧照，左为李霞卿，右为林楚楚。

14岁时，李霞卿出演了由父亲创办的上海民新电影公司的第一部电影《玉洁冰清》，在里面演一个配角。结果一次也没拍过电影的李霞卿，一点也不晕镜头，表演十分成功。此片当时轰动整个上海滩，从此，李霞卿以艺名李旦旦声誉鹊起，又主演了十余部影片。凭着出色的表演，李旦旦很快便成为上海影坛一颗耀眼的新星，以至于1928年中秋，在“圆月繁星”群众评选活动中，这位年仅16岁的娇娇女，与胡蝶、王人美、周璇、王莹、高倩萍、

阮玲玉一起被誉为“星级七姐妹”。在20年代末期，她的剧照及生活照充斥于各报纸杂志。（章末注1）遗憾的是，现代观众已经鲜有机会去欣赏李旦旦在影片中的风采，她参演的电影目前只有一部《西厢记》尚存，荷兰电影档案馆发现了配有法语字幕的该片的拷贝。

李霞卿走上银幕与她的父亲有着直接的关系。1925年年底，香

港的电影人黎民伟来到上海，与李霞卿的父亲李应生一起创办了上海民新电影公司。黎民伟与李应生是在香港读中学时的同学，又同是孙中山同盟会的成员。黎民伟，早期电影开拓者，编剧、导演，中国电影先驱之一，有“中国电影之父”、“香港电影之父”之称。在中国电影界，黎民伟是第一个明确提出“电影救国”口号的人，他也是最早有意识、有计划地将正在进行的大革命全面记录在胶片上载入史册，为后人留下珍贵影像档案和第一手历史资料的艺术家。为表扬他的革命热情，孙中山先生曾亲手题写“天下为公”条幅相赠。1925年，黎民伟迁往上海，与昔日的革命友人李应生一起创办了上海民新电影公司。李应生对于电影事业夙抱提倡之志，因而作为大股东加入了民新公司，担任总经理兼董事会主席，负责公司财务与影片的运营以及各种商业联络，此外，他还担任了几部影片的监制和制片人。李应生乃有功于民国之人，与国民党交好，因而新公司的创立得到了当局的积极支持。加上他是沪上商界巨子，故登高一呼，大量资本立集，人才纷纷乐为所用，民新公司的发展一日千里，李应生也因此成为中国电影事业的奠基人。

李应生在电影事业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与杜月笙的交情甚笃。民新公司创立之初仍采取股份的形式在社会上集资，杜月笙、邹海滨、周之贞等人均参股民新。杜月笙，绰号“大耳杜”，旧中国上海的青帮老大，与黄金荣、张啸林并称“上海三大亨”之一，作为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垄断了法租界的鸦片提运。这位被称为上海皇帝的杜月笙连蒋介石也要敬他三分。事实上，上海滩凡是有利可图的生意，没有杜月笙不染指的。有一段时间，杜需要一位通法语的老实人担任他的翻译，李应生因此与之结识，李曾在索邦大学留学，说得一口流利的法语，加上头脑灵活，善解人意，很快成为杜月笙眼前的红人。（章末注2）据说，李应生在法租界开的珠宝店也是青帮贩卖鸦片的主要场所之一。（章末注3）另外，民新电影公司最早设在杜美路（今东湖路）38号的电影棚位于杜月笙的一栋私宅内，民新公司最早的几部电影就是在那里拍摄的。后来，李应生代表民新公司与杜月笙商讨转让此栋私宅，购

得此处物业后，李应生和女儿李霞卿搬进去入住。

李霞卿走上银幕绝属巧合。1926年春的一天，年仅14岁的李霞卿在片场闲逛，一眼被导演卜万苍相中。当时，民新公司正在拍摄成立以来的第一部电影《玉洁冰清》，剧组由一流的演员阵营组成。黎民伟的第二任妻子林楚楚扮演女一号，女二号由沪上最早的“电影皇后”张织云扮演，编剧欧阳予倩也在剧中扮演了一个角色。（章末注4）不过，电影中有个小配角（女二号的妹妹），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李霞卿的出现让导演眼前一亮，只见这位小姑娘梳着中分头，头发紧紧地拢在脑后，扎成了一个大辫子。齐眉的刘海，天真无邪的笑容。李霞卿当时还在上海中西女中读书，她不仅年龄与剧中人物吻合，当时也只有14岁，而性格也颇似剧中人，美丽活泼，仿佛这个角色就是编剧欧阳予倩为她量身定做，导演卜万苍也觉得这个角色非李霞卿莫属，当场拍板，而李霞卿对参演片中的角色也十分感兴趣。结果，从未拍过电影的李霞卿一点也不紧张，导演卜万苍、编剧欧阳予倩对她的本色表演特别满意。通过剧中人物来抒发自己压抑的情感，李霞卿也从中获得了满足。

14岁的李旦旦果然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玉洁冰清》上映后一炮打响，轰动沪上。连“电影皇后”胡蝶都在电台评论时惊呼道：“上海人大饱眼福，从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来了！”她预言李旦旦将很快取代林楚楚而成为新一代巨星。

从此，李旦旦踏上了星途。同年，她又在影片《和平之神》里与林楚楚合作，饰演一个重要配角。因为戏份不多，她的演技也难以得到发挥。直至1927年，李旦旦首次担纲任女主角，在《海角诗人》中饰演一位渔家女，被一个诗人热爱，又受到暴徒的陷害和企图霸占，她为了忠贞的爱情，从危岩上跳入大海，令观众动情。随后，李旦旦又连续主演了《天涯歌女》、《五女复仇》、《西厢记》、《木兰从军》、《再世姻缘》等影片，均有不俗的表现。《西厢记》根据中国家喻户晓的古典戏剧名著改编，反映了书生张君瑞（葛次江饰）和相国小姐崔莺莺（林楚楚饰）邂逅相遇、一见钟情，经红娘（李旦旦饰）的帮助，为争取婚姻自主，敢于冲破封建



礼教的禁锢而私下结合的爱情故事，表达了对封建婚姻制度的不满和反抗，以及对美好爱情理想的憧憬和追求。这部电影首次尝试天马行空特技摄影，是颇有电影感与实验性的早期默片名作。古装、爱情、喜剧和武侠类型的整合能力也使得该片让人不容忽视，它也是最早进入西方电影市场的中国电影。英法等国媒体（如《泰晤士报》）发表评论，高度评价此片。本片曾一度失传，后发现残本修复，得以再行面世。

李旦旦在欧阳予倩编导的《天涯歌女》里塑造了一位备受压迫又敢于反抗的女性形象，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在这部电影中，李旦旦饰演女艺人李凌霄，不肯嫁给劣绅，劣绅加以迫害，她为饥寒所迫，每天晚上抱着月琴在街头卖唱。最后倒在雪地里，不幸离世。李旦旦在剧中的出色演技受到观众赞赏，她的名字从此在中国银幕上闪闪发光。

代表李旦旦最高艺术成就的电影是《木兰从军》。《木兰从军》剧本是黎民伟、侯曜根据汉乐府诗《木兰辞》改编的，尽管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家喻户晓，不过可能是古装电影当时卖座的原因，《木兰从军》一片一开始便得到民新公司高层的支持，由制作部长黎民伟亲自率领摄制组，赴河南等地实地拍摄。侯曜既是编剧，又是导演。花木兰由李旦旦主演，其他演员有林楚楚、黄绍芬、梁梦痕等。1927年11月15日，《木兰从军》举行了简单的开拍仪式。连春节都没有准备在上海过，又马不停蹄地赶赴湖北、河南等外景地。这部电影拍摄历时一年多，剧组先后辗转7个省份，战严寒，斗酷暑，足迹遍及荒凉的沙漠和巍峨的长城。《木兰从军》一片的拍摄让李旦旦走南闯北，见识了许多地方，这种经历也许是她钟情于电影的一个主要原因。

1928年1月，《木兰从军》拍摄过半，剧组一行人员赴河南拍摄外景。这次远行给李旦旦的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那些从未到过的地方，从未见过的人，让15岁的李旦旦倍感新奇。演职人员乘船沿长江逆流而上，先是经过了由军阀控制的一些不安定的地区，然后到达湖北境内，他们在湖北下了船，转乘货运列车到达

湖北腹地进行拍摄。记得有一次，剧组一行不得不在一个堆满了棺材的祠堂里落脚。

之后，他们乘卡车赶赴河南，途中遇到了北伐军方振武将军，当时方将军正率部在河南一带讨伐旧军阀。黎民伟说服了方将军，让军中将士参与《木兰从军》中作战场面的拍摄。在方将军的鼎力支持下，影片在河南拍摄得很顺利。为了增强影片的真实感，黎民伟还拍摄了方的部队从前线作战归来伤痕累累、血光四溅的真实场景。

尽管这部影片投资不菲，但是这些钱并没有乱花在演职人员上。在拍摄期间，条件异常艰苦，但是演员们都非常尽力，不计较个人得失。特别是李旦旦，在剧组中年龄最小。在上海她是父亲身边的娇娇女，可是，在天寒地冻的北方，她把自己当成了坚强的花木兰。事实上，她对这次艰难的拍摄经历兴奋不已。勾着腰蹲坐在燃烧的篝火前，在雪地里吃着热腾腾的面条，借助森林之火拍摄夜景，以及与演职员们一起挤在一辆军用卡车的车厢里席地而卧，而车厢外是大雪呼号的场景，让她历历在目，终生难忘。这种乡野间的艰苦生活经历激起了李旦旦心中的一种浪漫情愫，她发现自己对陌生的地方和环境有着一种热爱，而这种热爱是毕生的。在拍摄过程中，李旦旦女扮男装，身着马裤，脚蹬长靴，雄赳赳气昂昂地行进在方振武将军的部队中，仿佛她就是他们中的一员。（章末注5）为了拍摄花木兰率领数百军马与匈奴鏖战，李旦旦骑马射箭，使枪弄棒，在冰天雪地里驰骋战马，有时被摔下马来，身上常常青紫一片，可她从不叫苦，导演对她赞赏有加。

为了演好花木兰，父亲李应生专门为女儿聘请了山东“城阳堂”的武术师，传授刀枪矛箭技法。李旦旦性格开朗，艺高胆大，敢作敢为。拍摄《木兰从军》期间，她制造了一起惊心动魄的事件。那是在南京朝阳门城楼拍摄的一场戏：胡人的飞霞公主想涣散汉军军心在城楼上吹胡笳，木兰在帐营中听到这种悲切的声音，惟恐引起士兵们的思乡之情，便独自骑马来城下窃听。当时，另一个导演高西屏正在城楼上指导演员准备拍这场戏。李旦旦化好妆骑马

在城下等候，见导演高西屏还在城楼上啰啰嗦嗦，便有些不耐烦，就在马上挽弓搭箭笑着说：“高导演，请你走开。否则，就要飞上一箭来！”高西屏还以为她开玩笑，就逗她说：“你真有木兰的本领，就请射上来。”一语未了，就听到“嗖”的一声，一箭已射在高西屏的右眼角上，幸亏用的是木头箭，箭头不是铁制的，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高西屏至少会右眼失明。而顽皮的旦旦，一开始在马上大笑不已。后来城头上的人告诉她，说高导演真是受伤很重，她才收起笑脸。为此，高导演休养了一个礼拜，才得康复。黎民伟1928年的日记也有记载：“正月二十一日，旦旦箭插高西屏导演之目”，指的就是这件事。（章末注6）

关于李旦旦的英勇神武还有一个故事。一天深夜，民新公司遭歹徒袭击，不但抢劫了存放几十万存款的保险箱，连会计也被用汽车绑架走了。李旦旦闻讯，纵马追去，歹徒们的车逃到外白渡口桥畔时被她截住。歹徒首领见对手单枪匹马，又是个小小女子，毫不在意。岂知李旦旦一连击倒两个歹徒，又趁匪首不备，将他推入黄浦江，然后在会计的配合下，打开车门，跳上驾驶室，火速驰往警局报案。

最后，歹徒被制服，抢劫的钱财也保住了。事后，李应生为表彰女儿——当然也是为了借机宣传——在《木兰从军》情节中，另加了一段“飞马追敌”的插曲（章末注7）。

尽管多方努力，但遗憾的是，《木兰从军》一片上映后票房并不十分理想。原因是在影片上映前，民新的竞争对手天一青年影片公司也拍摄上映了《花木兰从军》，胡蝶的堂妹胡珊在剧中扮演花木兰。胡珊版的《花木兰》虽属粗制之作，但毕竟先声夺人，抢走了民新版《木兰从军》的潜在观众。不过，那些看过李旦旦主演的《木兰从军》的观众无不为影片的精彩画面以及对细节的关注而赞叹。特别是，女主角的精彩演绎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法文《上海日报》（*Le Journal de Shanghai*）对李旦旦给予了高度评价，文章称，作为《木兰从军》一片的灵魂人物，年仅16岁的李旦旦展现了惊人的天分，她青春逼人，美貌绝伦。“如果你在路上偶遇

她，你可能只会把她当作一个小女孩，但是在银幕上，她是那样美丽优雅，那样活泼可爱，那样富有朝气和活力。”（章末注8）

《木兰从军》在上海云南路中央大戏院首映，首映礼上，李旦旦亲自登台，朗诵了《木兰辞》。（章末注9）

李旦旦成了名噪一时的影星。她赢得了同行的尊重，也赢得了影迷的喜爱，从而成为20世纪20年代沪上最走红的电影明星之一。但是她的个人生活又如何呢？在其他同龄的女孩大多待字闺中、接受传统教育的时候，李旦旦已经在新潮的电影事业中闯出了一片天地。像许多同龄人一样，李旦旦喜欢运动，特别钟情游泳和打网球，此外，她还喜欢跳舞，但是，与他人不同的是，她已经出落成了一位电影明星，她经常成为各大电影杂志的封面人物。为了宣传影片，小小年纪的李旦旦已经习惯了在公众面前亮相，习惯了应付媒体的追逐和采访。她的这种成年人的生活方式有可能成了她和她的同龄人之间的一种龃龉。她几乎整天泡在成年人中间，这就意味着她更加早熟。在众人眼里，她就是一位会开汽车、敢于脱下旗袍穿上长裤的新女性典型，她特立独行，思想活跃，不难想象，蜚声影坛，头顶着光环，使她隔离于原本属于她的那个少女的世界。

李应生对女儿的表演天分和所取得的成绩倍感自豪，但是歹徒抢劫事件影响颇大，他因此忧心忡忡，惟恐官匪一家，女儿要遭意外。也许他后悔当初不该在《木兰从军》一片中加了一段“飞马追敌”的插曲，也许他收到了危及女儿安全的恐吓信。另外，他也觉得拍电影荒废了女儿的学业，她应该像同龄的女子一样继续接受教育。也许最重要的是，李应生当时新娶了许盈盈，许乃民新公司的女演员，她和李旦旦曾共同出演《和平之神》。（章末注10）但是，李旦旦与这位继母并不和睦。总而言之，在拍摄完《木兰从军》后，李应生即嘱女儿李旦旦改回原名李霞卿，暂时息影银幕。

而此时，李应生和黎民伟也因对电影事业的经营理念不同而产生了分歧。这种矛盾与日俱增，最后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作为一

个商人，李应生关心的是投资收益，《西厢记》和《木兰从军》两部影片严重超支让他头疼不已。而黎民伟则是一个艺术家，是个有社会抱负的人，他主张拍片要负起“教化社会”的责任，视制作精良和作品上乘为第一要旨，而对于较低的回报道益并不以为然。黎民伟还是第一个明确提出“电影救国”口号的人，作为中国电影的先驱，他一直认为电影是“载道”的工具，通过电影这个媒介可以改变中国的态度，通过电影可以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对他来说，为了实现上述目标，钱财无关紧要。抱着功利态度的李应生自然无法接受这一思想，于是在1929年，李应生退出了民新公司。（章末注11）

李应生和黎民伟两人在比较友好的情况下分道扬镳（不管怎么说，李应生还是黎民伟儿子的干爹，而且李应生手头还持有黎民伟的房产抵押），所以李霞卿并没有因为父亲的退股而与同事们产生不和。事实上，在欧阳予倩、夏衍等建议下，李应生决定让女儿赴欧美研究考察西方电影艺术，以便为日后改良和开拓中国电影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章末注12）这种放眼世界、为拓展祖国的事业而寻求海外解决之道的理念从此渗透进了李霞卿的思想，使她有了一种更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黎民伟在1928年9月2日的日记中记载着，李霞卿搭乘法国邮轮离开上海，前往英国伦敦。（章末注13）从此，她开始了人生的新篇章。她的这段经历，后来被涂抹了一层浓重而浪漫的巾帼传奇色彩。而就在李霞卿出国不久，她的父亲李应生带着她主演的影片《海角诗人》、《西厢记》到欧洲求售，李霞卿因此陪着父亲去了欧洲许多国家。1928年夏，这两部影片在法国巴黎第一家艺术电影院“二八影棚”（Studio 28）公映，其中《西厢记》还使用了法语新片名《普吉玫瑰》（*La Rose de Pushui*），这是最早在西方公开放映的中国电影。（章末注14）两部影片的法语字幕有可能是李应生亲自翻译并添加上去的。之后，两部影片还在伦敦、日内瓦及柏林等欧洲各国的首都公映，受到广泛欢迎。（章末注15）特别是《西厢记》受到了西方媒体的高度评价。英国《泰晤士报》专门对此片

发表过评论，其中讲到：“……电影技术，虽尚幼稚，但因剧情幽丽，观客如同重读古国神话一样，全剧表演诚恳……片中无恐吓和剧烈的刺激，乃一很文静很清新而有礼貌的作品……”（章末注16）

在游学国外期间，李霞卿在英国的一家私立学校学习了近两年时间。她并没有放弃电影，而是往来于英、法、美等国之间，参观学习西方电影工业，结交了不少外国影星（包括伟大的喜剧大师查理·卓别林）。她曾在卓别林的一次私人宴会上担任“特别主持人”，她还与好莱坞超级巨星威廉·威尔同台合演过世界名剧《简·爱》。国内广大观众对李旦旦的去向十分关心，因此民新公司特为她拍摄了一部新闻片《李旦旦放洋赴英美纪念》，在各大城市影院轮流放映。尽管如此，李旦旦作为中国影星的时代还是终结了，争强好胜的她选择了更具挑战性的事业：扶摇青云，振翅翱翔。数年后，当她作为飞行家回到祖国的时候，一位记者问她是否会重返银幕。据说，当时李霞卿对这个问题的反应有些尴尬，她答了一句“请提都不要提这个问题”，似乎她对这一念头颇为恼火。（章末注17）

李霞卿学习飞行主要与她的婚姻有关。刚到国外时，她并没有想放弃电影，特别是她主演的电影在欧洲受欢迎的程度，她更想在电影方面大显身手。但她的父亲李应生却感到她孤身一人在国外，需要有人照顾，就劝她早点择婿结婚。这其中也牵系到民国奇女子郑毓秀。郑毓秀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出色的革命家和女权运动的鼓吹者。郑毓秀与李应生同为辛亥革命时期的战友，又是广东老乡，因此来往密切。郑毓秀早就认识李霞卿，也看过她主演的电影，特别欣赏她的才华，也非常喜欢这个美丽而活泼的女孩。得知李应生叫女儿择婿，郑毓秀便有意将自己的侄子郑白峰介绍给李旦旦认识。（章末注18）虽说当时中国上流社会的女子越来越西化，追求婚姻自由，但是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依旧盛行。

郑毓秀喜欢做媒，撮合了不少达官贵人间的姻缘，不过有几对

最终以婚姻破裂而收场，也不知道李霞卿和郑白峰这对新人当初是否有不祥之感。（章末注19）郑家对李霞卿十分满意，她家世显赫，受过良好的教育，年轻貌美而且富有，还是一位大牌电影明星。而李家也非常看好郑白峰。像其家族中其他许多杰出人物一样，郑白峰也是一位热血青年，当时在国际联盟任秘书，前途无量。郑也毕业于索邦大学，仪表堂堂，气度不凡，聪明睿智（章末注20）。郑李两家对这桩婚事都十分赞同。通过与“大耳杜”杜月笙的关系，李应生给他这位新女婿准备了一份不薄的嫁妆，其中包括一份占发行总量3%的上海市债券。值得称道的是，郑白峰拒绝了岳父的这一慷慨赠予，因为他不想因为接受这份礼物而与上海青帮扯上关系，从而影响他在外交部的仕途（章末注21）。

1929年，两个年轻人结了婚，李霞卿当时年仅17岁，而她的丈夫比她年长11岁左右。按照中国传统习俗，两人之间的年龄差距比较适宜，而另一方面，李霞卿比实际年龄成熟，生活的历练让她看上去全然不似懵懂无知的少女。一个是年轻有为的外交官，一个是知书达理、善于交际的富家名媛，真可谓天赐良缘。作为一名演员，李霞卿在社交场合上也同样收放自如，面对外交圈里没日没夜的宴会和社会活动，她表现得镇定自若，游刃有余。婚后，夫妻俩同赴欧洲度蜜月，然后在日内瓦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郑白峰搬离了原来的住所，与新婚妻子住进了他们的新家——威廉—法佛大街22号，这里位于日内瓦市中心，风景别致，可以俯瞰绿树成荫、花木扶疏的格朗日公园（Parc La Grange）。沿着威廉—法佛大街漫步没多远，就来到了著名的莱芒湖（Lac Léman，亦称日内瓦湖），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巨大的人工喷泉，那冲天而起的高大水柱，从湖面直射天际，蔚为壮观。安定下来后，郑白峰继续从事他在国联国际法庭秘书处的差事，而李霞卿则回国探亲逗留了几个月时间，之后她搭乘西伯利亚特快列车，横穿苏联、德国、法国、意大利，最后抵达日内瓦与丈夫团聚。

婚后，夫妻俩先后诞下一子一女。1931年9月1日，他们的儿子出生。夫妻俩给儿子取名郑柏士，“柏士”是英文名“Pax”的

谐音，在拉丁语里，“Pax”是“和平”之意，夫妻俩给儿子取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儿子出世时郑白峰一直忙于一项和约的谈判。1932年9月7日，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女儿郑木兰也在日内瓦降生。



李霞卿和出生仅15天的儿子郑柏士，刊登于著名时尚杂志《良友》^①第65期。

生儿育女后，作为郑太太的李霞卿似乎要和平常人一样，过一种安于贤妻良母的生活了。事实上，除了养儿育女，两人几乎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更糟糕的是，李霞卿很快对这种家庭生活产生了厌倦。丈

夫整天在外面忙忙碌碌，而李霞卿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她感觉百无聊赖。两个孩子有保姆带着，不必太操心，家里也请了人帮忙打扫，不必她去亲力亲为。于是，李霞卿经常和那些年龄相仿的邻居和女友闲聊拉家常以打发时间。

不过，必须承认的一点是，李霞卿和丈夫都是热血青年，他们满怀爱国热情，十分关注祖国的命运。所以，当儿子出生不到三个星期，日本悍然发动对中国东北的战争时，夫妻俩既感到震惊悲愤，又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万分忧心。

注释

1 当年有横格的“女星信纸”得以少量保存下来。每张信纸的页眉部分都印有1920年代著名女影星的头像，其中一位就是李霞卿。

2 参见本书作者于2005年3月1日对李霞卿之子郑柏士的采访笔记。

3 据马丁所述，李应生的珠宝店名叫“美珍华记”（Mei Zhen Hua Ji）。Brian G. Martin, *The Shanghai Green Gang: Politics and Organized Crime, 1919—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54. 李

① 《良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生活类大型画报，由出版家伍联德于1926年创办于上海。在一系列有效营销手段推动下，《良友》迅速成为风靡全球华人世界的杂志，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就有《良友》画报。——译注

应生对女儿宠溺万分，他把这一时期经手的一些名贵珠宝都给了女儿。

4 片名《玉洁冰清》（意为“像玉样纯洁，像冰样洁净”），英译也作 Pure and Noble。

5 Choi Kai-kwong & Law Kar（编导：蔡继光、罗卡）。*Lai Man-wai: Father of Hong Kong Cinema*。[《香港电影之父黎民伟》（DVD，长篇纪录片）。Hong Kong: Dragon Ray Motion Pictures, Ltd.（龙光影业有限公司），2001。剧组直到1928年2月底才结束《木兰从军》一片在外景地的艰苦拍摄，回到上海。

6 被射伤的是导演高西屏。*The Diary of Lai Man-wai*（《黎民伟日记》）。黎锡（Lai Sek）编订。Hong Kong: Hong Kong Film Archive（《香港电影资料馆》，2003），12。

7 袁小娟。“第一个跨出国门的女影星”。《人民政协报》，2001年7月27日。

8 “如果你在路上偶遇她，你可能只会把她当作一个小女孩，但是在银幕上，她是那样美丽优雅，那样活泼可爱，那样富有朝气和活力……”但是，这位影评人也对片长提出了异议（包括幕间的歌舞表演，《木兰从军》放映时间长达三个半小时），建议送往欧美影院展映时进行剪辑。

上述影评英译自法文《上海日报》（*Le Journal de Shanghai*）影评摘录：“一部值得称颂的中国电影：《木兰从军》，天才影星李旦旦小姐主演。”（“Un Admirable Film Chinois: Mu-Lin, amazoné chinoise, incarnée avec un talent prestigieux par Melle Li Dandan, ”）报纸剪报，具体日期不详，1928年左右。香港电影资料馆节目组的罗卡向本书作者提供了一份影评剪报的复印件。

9 《黎民伟日记》，第12页。

10 黎民伟在他的日记中写道：“1928年4月1日，李应生在上海麻阳路迎娶许盈盈。”《黎民伟日记》，第12页。

11 李应生对于公司财政状况的担忧都是有充分事实根据的。他退股后不久，黎民伟无力独自支撑公司的运作，为债务所迫，不得不向李应生借贷2000大洋。《黎民伟日记》，第12页。

12 袁小娟，“第一个跨出国门的女影星”。《人民政协报》，2001年7月27日。

13 同9。

14 “Avenue Pavilion: An All-Chinese Film,” *Times* (London), September 23, 1929. 没有证据显示李应生携《木兰从军》的胶片赴欧洲求售。

15 Jay Leyda, *Dianying: An Account of Films and the Film Audience in China*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72), 70. 侯曜执导的这两部电影另译为“*Le Poème du Bout du Monde*”（《海角诗人》）、“*La Rose Ressuscitée*”（《复活的玫瑰》），此片由李应生担任制片）。*Le Cinéma Chinois, sous la direction de Marie-Claire Quiquémelle et Jean-Loup Passek, textes de Geremie Barmé* (Paris: Center Georges Pompidou, 1985), 12. 抗日战争爆发后，侯曜编导了《血肉长城》、《最后关头》、《太平洋的风云》等抗日题材影片，后转至新加坡协助拍摄影片。新加坡被日军侵占后，他被指控为抗日分子，被扣上“摄制抗日影片”的罪名，惨遭杀害。《黎民伟日记》，第24页。

16 Jay Leyda, *Dianying: An Account of Films and the Film Audience in China*, 70.

17 “女飞行家：李霞卿访问记”，上海女性杂志《玲珑》291期（1937），1908—1903（页码从右到左）。2003年12月由谢鼎译成英文。

18 郑白峰原名郑玉柳（YuLau）。

19 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和胡世泽的婚姻都是郑毓秀撮合的，但是顾维钧最终与他美丽与富有的妻子黄蕙兰劳燕分飞。胡世泽和他的妻子虽未离婚，但并不幸福美满，据他们的女儿称，两人长期分居。Mona Yung-ning Hoo, *Painting the Shadows: The Extraordinary Life of Victor Hoo* (London: Eldridge & Co., 1998)。郑毓秀喜欢撮合这种权贵之间的“政治婚姻”，而她也有意识地通过这种成人之美来构建自己的社会关系网，与当事人建立一种牢不可破的特殊关系，以便在将来能为其所用。郑毓秀习惯利用人际关系为自己行方便，但有时也会越界，正如1931年，她因被控在其经手的案件中利用政治影响妨碍司法公正而被上海律师协会吊销律师资格。当时她在南京，其夫魏道明任南京特别市市长。

20 1920年代初，郑白峰在索邦大学读书时，曾关照过一位年轻而贫穷的中国留学生——邓小平。两人在有生之年一直保持书信往来，即使到1970年代末邓小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以后也未中止。

21 2006年3月30日，本书作者对时在得克萨斯州韦瑟福德（Weatherford）的李霞卿之子郑柏士进行了电话采访，参见采访记录。

17. “难道飞行不是高于一切的事情吗？”

1933年，一个偶然的機會，李霞卿观看了巴黎的飞行表演。在飞机拉起，呼啸着离开地面，直冲云霄的刹那，李霞卿浑身悸动。不是惧怕，不是震惊，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强烈刺激，人神交融的高度自由感，在那一瞬间向李霞卿袭来。飞机的魅力深深吸引着李霞卿，从此，她便与蓝天结下不解之缘。回到日内瓦后，李霞卿即报名参加日内瓦科因特林国际机场（l'Aéroport de Genève-Cointrin）进行的试飞。当她乘坐那架“摇摇晃晃”的作为一战剩余物资的双翼



航空先驱弗朗西斯·杜拉弗（François Durafour）驾驶着他的高德隆 Gaudron-G3（F-ABDO）型飞机，李霞卿可能就是乘坐这种摇摇晃晃的作战剩余物资首次飞上蓝天，这种机型空间小，乘客只能坐在飞行员和仪表盘之间的位置。

机——有可能是当地飞行员弗朗西斯·杜拉弗（François Durafour）拥有的一架法国高德隆（Gaudron）飞机——第一次飞上天空时，李霞卿还对自己的决定是否明智存有疑虑。但是，她抵制不住那种诱惑，很快再一次飞上了蓝天，这一次，她乘坐的是一架性能要好得多的虎蛾双翼机（章末注1）。翱翔在蓝天之上，李霞卿俯望下去，她被眼前的景色深深地震撼了。阿尔卑斯山连绵的山峰上一片银装素裹，白雪皑皑，最高峰勃朗峰（Mont-Blanc）是那样壮丽巍峨。远望去，日内瓦湖就像一颗璀璨的蓝宝石，熠熠生辉。当飞机向上攀升时，整个瑞士和意法边境的绚丽美景都尽收眼底。



1933年航拍的日内瓦机场，是年李霞卿开始学习飞行。照片左侧为日内瓦和阿尔卑斯山，右侧为汝拉山（Jura Mountains）。

这一经历令人难忘，使人顿悟。李霞卿突然意识到，她已经找到了她这一生要追求的事业。她要成为一位飞行家，回到祖国，唤起同胞对航空事业的关注。在她看来，只有飞行才能扬中华之威，只有飞行才能实现其报国之志。这一惊险刺激的运动不仅能满足她和许多像她一样的民众的愿望，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将成为加速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有利工具。一想到祖国的东北正在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李霞卿不禁感慨：只有拥有强大的空军、掌握制空权才能有效阻止和抵御外来的侵略。如果能唤起国人对航空事业的关注，那么她将像她的祖辈、父辈在辛亥革命中那样，做一件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事情。正如她后来对一位记者诘问道：“难道飞行不是高于一切的事情吗？”（章末注2）

飞天名媛
memoirs of a woman

持。回到瑞士后，她开始了系统的飞行学习。1933年10月，李霞卿考取了日内瓦科因特林飞行学校（Cointrin-Ecole d'Aviation）。学校位于市郊，面积不大，有三个飞机棚，距李霞卿的家仅半小时车程。（章末注3）

1934年春，这位飞行教练眼中“来自东方的美人”第一次单飞。之后，她对飞行的热情与日俱增，而且矢志不渝。天气恶劣无法飞行时，哪怕只来到机场，与心爱的飞机相伴，她也感到无比的满足。当天空阴霾散去，终于可以驾机翱翔蓝天时，那种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是无以言表的。

“那翻腾的云山云海，好似雪白的羊毛，”李霞卿解释说，“……你不禁对自己说，大自然实在是太壮美了。”

李霞卿还非常喜欢飞行带给她的那种血脉贲张、凌驾于一切之上的那种感觉。“就好像你在世界之巅，”她兴奋地说，“坐着一艘神奇的小船航行游弋，腾云驾雾，呼风唤雨，高居于碧霄之上，逍遥于九重天之外，远胜于《天方夜谭》中的那些梦境。”（章末注4）

李霞卿喜欢夜间飞行，特别是在夜晚飞过巴黎上空，在夜色的衬托下，这座美丽的城市就像黑天鹅绒上的一块钻石，熠熠生辉，那闪耀着灯火的凯旋门，在夜色下显得如此璀璨迷人。

“那几个月是我人生中最美妙的时光，”李霞卿后来回忆说，“飞行，梦想，感觉是那样的自由和无拘无束……一切都是那么好，感觉是那样地远离俗世，那样地接近天堂。”

李霞卿对于自由和远离俗世的渴望说明了一个问题，她的婚姻开始出现了裂痕。

然而，李霞卿选择飞行的决定并不是人人都能理解的。据说，当初她报考日内瓦科因特林飞行学校时，一位考官曾问她为什么想成为一名女飞行员。

“漂亮的女士，你如此美貌，为什么选择飞行？”考官问到。

李霞卿答道：“因为在一般人的观念里，飞行是男人的事，似乎与女人无缘，我就是想做女人不大做的事。”

考官接着问道：“据说在你们的国家，女人的脚都是残疾变形的？”

李霞卿坚定地答道：“我来到这里，就是让全世界知道，中国女性不但能在地上走，而且能在天上飞。”（章末注5）



李霞卿在“虎蛾” Tiger-Moth c/n 5041 型飞机前留影，此时李霞卿已加入日内瓦飞行俱乐部，摄于1934年。

对李霞卿来说，振翅蓝天并非只是个人的愿望和目标。长期以来，中国女性受歧视，社会地位低下。她就是想通过投身这一新潮而刺激的事业让国人以及外国人改变对中国女性的传统印象。李霞卿的刻苦努力终于有了回报。1934年8月6日，李霞卿以优异的成绩通过飞行和理论考试，拿到了瑞士航空俱乐部（Aéro-Club de Suisse）颁发的飞行执照（为一级飞行执照，号码为0586），成为世界上在日内瓦拿到飞行执照的第一位女性，而在整个瑞士拿到飞行执照的女性当时也不过10人。（章末注6）在中国航空界，李霞卿也是在瑞士取得飞行执照的第一人。从那以后，欧洲成了李霞卿的飞行训练基地。从日内瓦到维也纳，到伦敦，或到巴黎，每到一处，她都是那样引人注目，只见她优雅地步出驾驶舱，一身白色的飞行套装和高跟鞋显得她是那样地整洁素净，就好像刚从美容院出

来一样。

不过，当欧洲人正在为这位来自“东方的美人”而津津乐道时，李霞卿却深感自己在航空领域的知识欠缺，为了更好地实现其报国志，她决定去深造。当时世界上一流的航空学校当属位于美国加州奥克兰的波音航空学校（Boeing School of Aeronautics），这所学校以众多参加过一战的王牌飞行员组成的教官队伍而著称。在征得父亲的同意后，李霞卿报名投考该校的高级飞行课程。这所学校从不招收女学员，李霞卿是破格被这所飞行学校录取的，除了优异的考试成绩，更主要的是她的精诚所至，1935年1月，李霞卿正式成为这所飞行名校的一员。

1月9日，就在李霞卿乘船启程赴美之时，瑞士航空俱乐部将她的飞行执照升级为二级。这件事情起初还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因为第

二天，她收到一封来自瑞士邮政和交通部的信，信上简明扼要地说，因为她没有参加体检，所以飞行执照升级无效。但是，过了一些时日，当她和家人已经赴美并抵达中国驻美大使馆时，她又收到了一封来自瑞士航空俱乐部的秘书的短信，称瑞士邮政和交通部的那封信是场误会，她的飞行执照升级没有问题，所以李霞卿还是拿到了二级飞行执照。有了在日内瓦的飞行学习经验和取得的飞行证书，李霞卿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地憧憬着在美国波音航空学校的学习了。



1935年瑞士航空俱乐部（Aéro-Club de Suisse）颁发给李霞卿的Brevet II级飞行执照。李霞卿是第一位展翅飞上日内瓦蓝天的女飞行员。

波音航空学校当时是美国联合航空公司（United Airlines）下属的一个部门，只招收成绩优秀的全日制学生，主要培养运输航空专业人员。该校教官共有 18 人，大多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王牌战斗机飞行员，其他的也是经验丰富的曾经从事航空邮务或商业运输的飞行员，都是相关领域首屈一指的人物。学生使用的教练机都是最新款的，波音、史汀生、斯蒂尔曼（Stearman）教练机一应俱全。（章末注 7）其中最宝贝的一架教练机是福特三引擎飞机，该机使用三台大马力的黄蜂（Wasp）式引擎，是一架退役的大型运输客机。可想而知，在李霞卿学习仅四个月就被获准驾驶这架大飞机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一件事情，当时李霞卿和她的同学轮流驾驶这架飞行从奥克兰飞到芝加哥。

学校的地面理论训练课程也很多，其中包括天文导航、发动机构造、飞机机械系统、飞机仪表、飞机无线电系统、飞机装配与维修等。由于受过系统而严格的理论学习和飞行训练，波音航空学校的毕业生根本不愁找不到工作，实际上，在洲际客机上任职的机组人员有不少毕业自波音航空学校。

在李霞卿赴波音航空学校深造时，她的丈夫和两个幼儿也一同随行，不过，待李霞卿开始飞行学习训练时，丈夫就带着两个孩子回了中国。李霞卿在旧金山基督教女青年会找到了一处住所，基督教女青年在创办初期主要是为组织青年妇女参加宗教活动，为离家自立的职业妇女提供住处，救济贫困。（章末注 8）在李霞卿的 200 位同学中，她是唯一的女性，大家都叫她李霞卿小姐，在那帮男同学眼里，她是一个年轻可爱的女子，没有什么社会关系，非常要强。

虽然李霞卿争强好胜，能吃苦，但是波音航空学校近乎残酷的学习和飞行训练还是让她始料不及。在日内瓦科因特林飞行学校学习时，教官温文尔雅，有时甚至宠着她这位来自东方的佳人，而在波音航空学校，美国教官是铁面无私、冷酷无情的。李霞卿身材娇小，她得坐在一张厚厚的垫子上才能望到教练机的窗外，另外，飞

机座舱内的脚踏板上还得加装几块板，要不她够不着，尽管她是学员中唯一的女性而且看起来弱不禁风，但是教官并没有因此而手下留情，或许正是因为她是唯一的女学员，所以教官才更加严厉吧。在飞行训练过程中，她的每一个操作动作都会被教官质疑。她更加刻苦地学习和训练，但是教官对她仍不满意。

经过一个月的魔鬼训练，倔强的李霞卿也不禁有些气馁，她终于忍不住在教官面前流下了委屈的泪水。正如她从小受到的教育那样，含蓄隐忍的她很少在人前流露情感，但是这次，积累了多日的愤怒和委屈终于爆发了。教官对眼前发生的一幕吃了一惊，随后马上安慰李霞卿，称教官们对她进行严格的军事化训练实在是出于好意。从一开始，教官们就担心会宠坏她，于是他们决定决不怜香惜玉，而是更高标准、更严厉地要求她。听到这番话，李霞卿终于舒展了眉头。打那以后，她的训练进展得十分顺利。事后，李霞卿也非常欣赏教练们的做法：并不因为她是女人而给予她特殊的照顾和优待。

很快，李霞卿就学会了沉着冷静地拆卸和组装飞机引擎。而对于空气动力学、气象学、飞机设计和无线电话学，她也耳熟能详，如数家珍。李霞卿经历的一次最刺激的训练是顺利地完成了从加州奥克兰到内华达州里诺（Reno）的盲飞，飞行距离为181英里，其座舱完全遮蔽，只借助仪表指示飞行。

总的来说，李霞卿对波音航空学校的飞行课程的设置较为满意，但是让她感到遗憾的是，特技飞行训练并未列入核心课程。李霞卿立志学成归国，通过飞行表演来唤起民众对航空事业的关注，因此掌握飞行特技显得尤为重要。她向学校正式提出，为她增加飞行特技私人课程，让她高兴的是，学校同意了她的请求，并派经验丰富的飞行员莱罗依·格雷格（LeRoy B. Gregg）任她的私人教练。（章末注9）格雷格给了她很多指导，包括一些书本上没有的东西。

1935年5月15日，李霞卿与格雷格一同登上了飞机，准备在旧金山湾上空进行飞行特技训练。像往常一样，这天李霞卿穿着宽大的皮制飞行套装，在起飞前，她仔细检查了安全带。在特技飞行

中安全带如果松脱，将几无生还的可能。两人进了座舱，格雷格坐在前座，李霞卿坐后座。飞机起飞后在旧金山湾约 2200 英尺的高空飞行，这时教练格雷格示意李霞卿他准备开始横滚练习。随后，教练猛的一拉驾驶杆，机头昂然而起，向后扣去。这时，格雷格无意中望了一下后视镜，他被镜中的景象吓出了一身冷汗，只见李霞卿的半个身体悬在座舱外，她的手在奋力地抓着机身。随后让教练更惊恐的是，他看着李霞卿完全掉出了座舱。她的安全带断了！格雷格只瞟到了一眼李霞卿脚上穿的锃亮的飞行鞋，然后就不见了她的踪影。因为担心飞机突然翻转过来可能会碰到李霞卿，所以格雷格继续背朝下倒飞了片刻。随后，他翻转机身，恐惧地向周边望去，他害怕看到那可怕的一幕。

“我一直在祈祷，她知道该如何应对这种危急情况，”格雷格后来回忆说，“她从未跳过伞。我不知道她会怎么做。哪怕是最镇定的人第一次跳伞时也会紧张得不知所措。”（章末注 10）

在李霞卿座椅皮带断裂的那一刻，格雷格教练眼睁睁地看着她头朝下从座舱中飞了出去，以一种快得吓人的速度直直地向海面冲去。此时，格雷格虽然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但还是心存侥幸，希望李霞卿能够逃过一劫，他的祈祷在最后一刻得到了回应。

“当我看到她在离地面大约 800 英尺到 1000 英尺猛地拉动伞锁，降落伞‘砰’的一声张开时，我真想大声欢呼。”格雷格事后无比喜悦地说。

最初，李霞卿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故吓呆了，但强烈的求生欲望让她一下子镇定了下来。良好的心理素质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在急速下降过程中，她的手向背后抓去，克服着强大气流的冲击，拼尽了最后的力气，猛地拉动降落伞的伞锁。她甚至在那一刻还想起了降落伞公司在广告免责条款中的一句冷笑话：“如果降落伞不能正常打开，本公司承诺退款。”不过，打开降落伞后，李霞卿开始意识到这次降落不是在陆地而是在海面上，因此降落难度要大得多。就算她成功降落海面，也很可能被降落伞的索具缠住，或是因身上负重过大而被海浪吞噬。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海水凉，人

水后体温骤降也会有生命危险。

教练格雷格也意识到了这些致命的危险。他调转机头，以飞快的速度驶回机场并来了个顺风紧急着陆。取了救生设备后，格雷格马上上了飞机，飞往出事地点。而这时，大海茫茫，完全见不到李霞卿的影子。幸运的是，李霞卿坠入大海后挣脱了降落伞的绳索，降落伞被滚滚的海浪冲到了岸边，驻扎在旧金山湾以东阿拉米达县（Alameda）的美国海军预备队某基地的一位飞行员发现了这顶被海水浸泡得胀鼓鼓的降落伞。之后，海军预备队派出了一架洛宁 Loening OL-8 型水陆两用飞机和两名飞行员前往救援。

而就在此时，李霞卿在海面上奋力挣扎。坠入大海时，强风把她的降落伞吹到了一边，她庆幸自己没有被索具缠住，但是，她发现全皮的飞行服入水后变得笨重不堪。这套飞行服安有五处拉链，想在海里把它脱掉是不可能的。坠入大海后，李霞卿并没有感到恐惧，相反，她很享受这从未有过的冒险和刺激。在海里，李霞卿镇定自若，脚下不停地踩着水，不过，冰冷的海水让她意识到危险正在临近。虽然她的游泳技术好，但是她落水的位置距岸边还有半英里多的距离，而且湿重的飞行服也束缚了她的手脚。她甚至连教练格雷格就近扔下来的救生设备都没法够着。

“我不敢去够格雷格扔下来的救生设备，”李霞卿解释说，“身上太重，游不动。”（章末注 11）

她无计可施，只能尽力浮在海面上。为保持体温，她把双脚放在降落伞的垫子上，尽可能地抬离海面。她头朝上，身体后仰，双手不停地划水，以节省体力。她没有一丝惊慌，而是静静地等待救援人员的到来。

救援人员很快来到了出事地点。就在李霞卿被冻得牙齿打颤时，她听到了海军预备队水陆两用飞机驶近的声音。不一会儿，飞机在她头顶盘旋，准备在海上着陆。好事多磨。那位飞行员可能是因为发现了李霞卿而高兴得过了头，不知怎么就把飞机的起落架卡着了，浮筒无法放下来。飞机只好飞回基地，剩下李霞卿继续泡在冰冷的海水里，她开始感到绝望。

在冰冷的海水里，她无法自由地活动四肢，刺骨的海水不断地往她的鼻子、眼睛和耳朵里面灌，她的意志开始松懈。她意识到自己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由于在海水中浸泡了一段时间，她的四肢开始麻木，体力感到不支。不过，李霞卿还是准备作最后的一搏。天知道过了多久，第二架洛宁水陆两用飞机离开基地，朝李霞卿所在的地点飞来。这一次，飞行员顺利地放下了浮筒，浮筒坠落在李霞卿旁边的海面上，溅起了一阵浪花（章末注12）。此时距李霞卿坠入大海已经过去了20多分钟的时间，她已经四肢麻木，彻骨的寒冷沁入全身。但是在救援人员展开救援时，她使出了全身的力气，奋力抓住了浮筒。她紧紧抓住浮筒，直到海军预备队员将她拖到里面去。当救援人员把李霞卿救上来时，他们都被眼前这位湿淋淋的美人鱼震惊了。他们没有想到坠入大海的飞行员是个女人，而且还是一个来自中国的女人。更让他们吃惊不已的是，这位浑身湿透的幸存者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两件让她感到遗憾的事，一是她觉得有点冷，二是她的一只鞋丢了。



1935年5月15日，李霞卿在旧金山湾实施紧急跳伞后被立即送往医院。

美国海军预备队救援人员载着李霞卿飞回了基地。虽然身体用毯子包裹着，但是她依然灿烂地笑着，一到基地，李霞卿就被救援人员送到了基地医院。经医生检查，李霞卿只是略微受了一点惊吓，其他身体状况良好。不过，为以示重视，医生还是让李霞卿住院观察。

李霞卿坠机入海的事情一时轰动美国，传为佳话。不少新闻媒体第一时间跑到医院对她进行采

访。美国媒体对她在事故发生后有惊无险、毫发无损给予了热情洋溢的赞许，称她是大海中诞生的爱与美之神维纳斯。事故发生的第二天，《旧金山观察家报》（*San Francisco Examiner*）就刊登了一张李霞卿的照片。只见李霞卿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脸上绽放着迷人的微笑。在镜头前，她的妆容是那样完美，根本看不出她刚刚经历了一场劫难。当然，如果这次坠机让李霞卿从此告别飞行，告别蓝天，那么也情有可原，但这只不过是一些记者的臆测罢了。当有记者问她是否对这次事故感到恐惧，她一脸轻松地答道：

“不，一点儿也不害怕。只是觉得刺激。”



李霞卿在飞往旧金山湾援救她的美国空军洛宁 Loening OL-8 型两栖双翼机前留影。

为了证实自己并不害怕，在事故发生的次日，李霞卿再次登上了同一架飞机，在旧金山湾上空作特技飞行练习。（章末注13）后来，李霞卿曾表示，在安全带松脱自己掉出座舱后，她的头脑一直很清醒，她没有马上打开降落伞的伞锁，而是享受了一段空中自由落体的惊险和刺激。事实果真如此，还是事后李霞卿为了逞强才说的这番话？可以肯定的是，那个在上海滩勇斗歹徒的女侠又复活了，她的沉着冷静、过人的胆识让她面对这一危难时，不仅从容不迫，而且还从中体会到无与伦比的乐趣。

李霞卿的英勇事迹在飞行界传为美谈，毛虫俱乐部（Caterpillar



李霞卿扮“木兰从军”剧照。

Club, 亦称“卡特皮勒俱乐部”) 因此吸收她为会员。该俱乐部是为那些在飞机遇险时实施紧急跳伞并成功逃生的人员而设立的专门组织。1935年6月12日, 俱乐部的发起者欧文降落伞公司 (Irving Air Chute Co. Ltd.) 向李霞卿颁发了一枚金质毛虫别针, 代表她正式成为俱乐部的一员。“毛虫俱乐部”的得名是因为当时降落伞的天篷是用蚕丝做的, 此外, 这一得名也是因为毛虫需要咬破自己的茧才能飞

出去自由生存。李霞卿因为成功实施跳伞而拥有俱乐部成员资格, 她因此成为该俱乐部会员中的第一位中国女性。(章末注14) 这是李霞卿职业生涯中的光辉一刻, 从此, 她在航空界崭露头角, 并逐步成长为一代女飞行家。

1935年11月5日, 李霞卿又创造了一个“第一”。这一天, 她以全优的成绩 (仅发动机制造一科为“良”) 成为美国波音航空学校毕业的第一位女学员。(章末注15) 在拿到毕业证书之时, 她也同时获得了美国的飞行执照, 号码为33654。(章末注16) 此时的李霞卿已是羽翼渐丰, 她的聪明和才智, 她的胆识和勇气, 经历了全面的考验, 她变得日臻成熟。如今, 她渴盼着回到中国, 通过飞行为祖国效力。是年12月, 满怀憧憬的李霞卿登上了驶往中国的巨型豪华邮轮“柯立芝总统号” (President Coolidge)。让她感慨的是, 在过去的近一年中, 她在波音航空学校经受了严格的学习和训练, 如今终于学有所成。然而她没有料到的是, 自己的满腔报国之志最初却遭到了冷遇。

注释

年在科因特林机场工作，驾驶着他那架单座高德隆 Gaudron-G3 (F-ABDO) 飞机往返于巴黎和日内瓦之间，寄送航空信件。1921年，他驾驶 F-ABDO 机降落在海拔 4650 米高的勃朗峰上并再次起飞，创造了一项世界纪录。参见来自瑞士梅林 (Meyrin) 的瑞士航空史学家让·克劳德·卡耶兹 (Jean-Claude Cailliez) 于 2005 年 11 月 26 日致本书作者的电子邮件。

李霞卿第二次乘坐并在之后用来学习飞行的虎蛾机可能是 DH 虎蛾双翼教练机 [de Havilland Tiger-Moth, c/n 5041 (CH-359/HB-OKA)]。卡耶兹于 2005 年 11 月 23 日致本书作者的电子邮件。

2 Inga Arvad, “Glamorous Flying Ambassadors at Home in Either East or West,” *Vancouver Daily Province*, March 13, 1943.

3 科因特林飞行学校配备了两名飞行教官，一位是“队长” (le capitaine) 马赛尔·韦伯 (Marcel Weber, 1896—1975)，他还负责管理日内瓦科因特林机场，一直到 1937 年。韦伯高大强壮，精力充沛，1927 年开始执教飞行。另一位教练是查尔斯·布拉奇 (Charles Bratschi, 1907—2004)，他后来接替韦伯成为科因特林机场的经理。布拉奇虽然个子矮小，却同样生气勃勃，他从 1932 年开始教授飞行课程。卡耶兹于 2005 年 11 月 23 日致本书作者的电子邮件。

4 李霞卿，打印演讲稿，无标题，李霞卿家人收藏。

5 程乃珊，“李霞卿：从著名影星到全能飞行员”，《上海 Lady》（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

6 《航空杂志》(Aéro-Revue)，1934 年 3 月。虽然李霞卿是第一位在日内瓦获得飞行执照的女性，但并非第一位在瑞士拿到飞行执照的女性。瑞士航空史学家让·克劳德·卡耶兹表示，在李霞卿之前至少有 3 位女性分别在 1913 年、1914 年和 1920 年代的某个时间取得飞行执照。卡耶兹于 2005 年 4 月 26 日致本书作者的电子邮件。

7 波音航空学校的教练机包括波音 203 和波音 81 教练机；斯蒂尔曼 J6-5 教练机；配置莱卡明 (Lycoming) 引擎的波音教练机和史汀生教练机；配置普惠黄蜂系列 (Pratt & Whitney Wasp) 引擎的波音 40-C 型和波音 B 型教练机；配置盲降系统的大黄蜂 (Hornets) 教练机；配置黄蜂发动机的汉密尔顿 (Hamilton) 八座单翼机，以及配备 3 个黄蜂引擎的福特三引擎运输机 (VFR, IFR)。William B. Stout, “Aviation Training at the Boeing School,” *Aero Digest* (June 1935): 23.

8 后来，李霞卿住进了基督教女青年会在伯克利的国际屋 (International House)，这里距奥克兰机场要近得多。李还表示，她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修过几门课程。Nina Varian, "Pretty Chinese Flyer Wins Boiseans' Hearts," *Idaho Statesman*, May 23, 1939.

9 格雷格是美国空军最早的飞行教官之一。早年时，他几乎飞遍了美国所有的空军机场。1916年，格雷格获得航空运输飞行执照。1923年，他在南加州的一家飞机制造厂担任试飞员，之后他重返飞行教学这一行，任教于波音航空学校。在指导李霞卿学习飞行后不久，格雷格就加盟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做了一名飞行员。

10 李霞卿最初表示，事故原因是她的安全带断裂或松脱，但是后来她可能承认是自己忘了系好安全带。"Chinese Girl Aviatrix Saved by Parachut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May 16, 1935.

11 同 10。

12 机长罗杰·特克斯·马利 (Roger Tex Marley) 和哈里·萨特里斯 (Harry Sartoris) 上尉负责此次的救援工作。

13 "Chinese Girl Aviatrix..."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May 16, 1935; and Elsie McCormick, "Notes on the Life Story of Lee Ya-ching," 未出版发行手稿，李霞卿家人收藏。

14 毛虫俱乐部 (Caterpillar Club) 的第一位中国会员可能是谭保慎先生。1933年夏，谭在杭州的中央航空学校进行飞行训练时，飞机发生故障，谭从旋转的飞机上成功跳伞逃生。 *Flight*, September 28, 1933.

15 李霞卿也是美国国家航空协会 (National Aeronautic Association) 的会员。

16 该飞行执照号以及它所代表的成就对李霞卿来说无比珍贵，正因为如此，李后来于1938年、1966年再度申请美国飞行执照时，都要求保留这一号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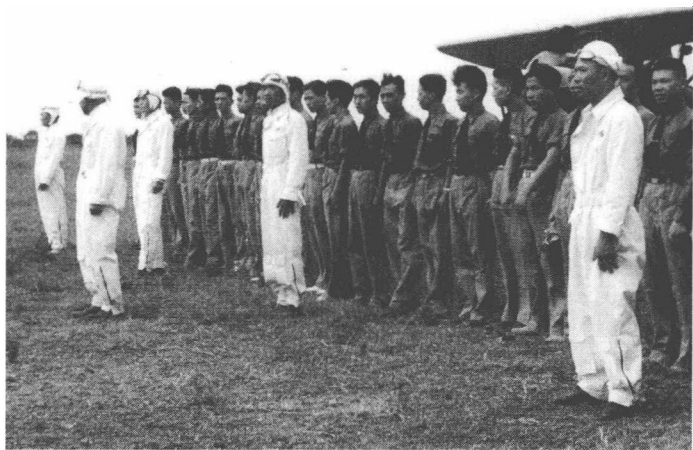
18. 学成归国

李霞卿先是取道香港，探望了在那里做生意的父亲。随后，她前往上海，看望了在那里的家人。此时，李霞卿的婚姻生活已索然无味，见到丈夫郑白峰不过是平添了痛苦和烦恼。

1936年春节前，李霞卿在上海定居了下来。踌躇满志的她一心想唤起国人对航空事业的关注，因此扎根上海这个全国飞行活动的中心是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而此前，上海在航空事业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全国性的民间航空组织就已经诞生。1921年5月1日，中华航空协会在北平成立，翌年10月加入国际航空协会。1931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各地民众激于爱国热情，纷纷创建提倡航空的爱国组织。1932年4月，上海各界人士发起组织中国航空建设协会，6月28日正式成立，即着手征求会员和捐款，拟定创办航空工程学校和航空制造工厂计划。1933年1月，在南京国民政府操纵下，又在上海成立另一组织——中国航空协会，并陆续在江西、浙江、福建、湖南、江苏、河南等省成立分会，在上海创办中国飞行社。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为了捐款需要，1933年5月20日又在南京成立全国航空建设协会。直至1936年7月，才统一国内外民间航空组织，改名为中国航空建设协会，并在各省、市建立18个分会和在国外建立36处支会。

全国航空建设协会成立后，即开展了全社会性的捐款、捐献飞机活动。捐献飞机活动始于海外的爱国华侨。辛亥革命之前，不少



上海飞行社^①的学生合影，摄于1936年。李霞卿是飞行社唯一的女教练。许多学生后来成为中国空军第一批飞行员参加抗战并为国捐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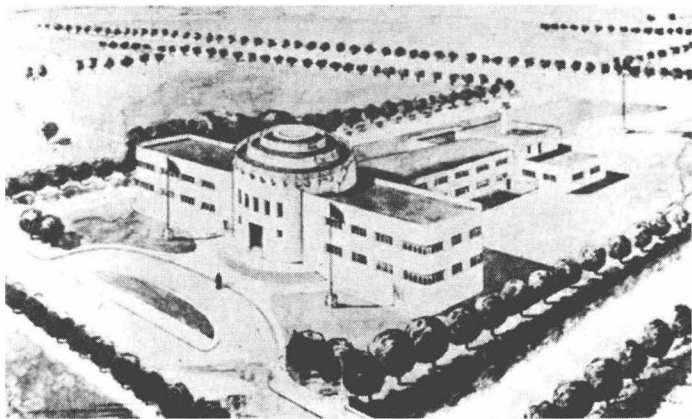
爱国华侨就捐款买飞机，赞助孙中山发展航空事业。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捐献飞机活动再度兴起。上海“一·二八”事变后，菲律宾华侨向英勇抗日的十九路军捐赠飞机30架。之后，南洋、美国等地华侨又陆续向祖国捐赠飞机60架。与此同时，国内各界爱国人士也纷纷响应，开展捐献飞机活动。在此形势下，南京国民政府于1933年决定在全国各地征收飞机捐，由全国航空建设协会统一负责。当时，各省、市借“航空救国”之名所收的捐税，名目繁多，花样百出。

全国航空建设协会从1933年5月至1935年9月，共收到全国各地飞机捐290万元以上，加上利息共有298万多元，这是公开发表的数字。至1933年年底，共买到飞机22架。其中上海市民众共捐机6架，分别命名为“上海号”、“沪工号”、“沪童号”、“沪校号”、“沪商号”和“宁波号”。

中国飞行社于1935年在上海成立后，下设总务、航行、研究3个组，配备“天厨副号”和“救国号”两架小飞机，一架是捷克

^① 上海飞行社，为李霞卿与友人发起并创办的民间航空组织，李霞卿亲自担任飞行教练。飞行社于1936年3月1日正式成立，当天在龙华机场举行了盛大的成立仪式，李霞卿在这天进行航空表演，轰动一时。——译注

容克斯 Junkers Junior A50 型教练机（为两座单翼机），一架是英国爱弗罗亚维安禽鸟式 Avro Avian 双翼教练机，分别为杜月笙和上海天厨味精厂所赠。因飞机不够使用，中国飞行社又向海军制造飞机处定购了两架 125 马力的弗力特式教练机，才于翌年 5 月公开招考学生。



建筑师笔下的上海中国航空协会总部大楼，形如一架双翼机。

上海中国航空协会成立后，着手规划总部大楼的设计建设。1935 年 10 月 9 日，上海市市长吴铁城为航空协会大楼奠基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盛赞航空协会提振中国航空事业的美好意愿。20 世纪 30 年代，当时新成立的国民政府拟定了开发江湾、建设“大上海”的规划，而作为新生事物的中国航空协会大楼也被列为新区规划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大楼的外观设计非常独特，酷似一架双翼飞机，设计者是著名建筑大师董大酉。1936 年初，大楼竣工，同年 5 月正式投入使用（令人好奇的是，1937 年 9 月日机轰炸上海，将江湾新区的许多高楼大厦夷为平地，唯独航空协会的这栋大楼几乎完好无损，也许是因为敌机飞行员在空中看到这栋建筑形似飞机而心生敬意，所以它才逃过一劫的吧）。

虽然作了一系列努力，但是普通老百姓对于发展航空事业的重要性以及飞行安全等问题依旧缺乏足够的了解。李霞卿急切地想通

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改变这一现状，回到上海的第一时间她就加入了上海中国航空协会，而协会也非常欢迎李霞卿学成归国，称其为“中国第一位女飞行员”。（章末注1）

虽然李霞卿踌躇满志，但是现实是残酷的。她发现，至少在官方层面上，她想施展自己的抱负将遇到极大的阻力，而这让她始料不及。当时的国民政府不会给一位女子，哪怕是像她这样的上流社会的女子发放飞行许可证，而且在其他方面李霞卿也得不到政府的支持。不过，李霞卿并没有因此而气馁。在美国波音航空学校的学习教会了她如何面对困难，面对逆境。最终，经过四处游说，当局表示考虑她的飞行执照申请，但是条件是必须成功完成一次试飞，南京政府将派一位空军飞行员对这次试飞进行考核。

也许国民政府的官员们觉得这一提议会让李霞卿却步，或者认为她根本达不到空军的测试标准而有意为之，不管是出于哪一种动机，他们都打错了算盘。李霞卿对此正是求之不得，而最终，她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所有的测试。在事实面前，政府里那些反对的声音终于沉寂了下去。李霞卿因此成为获国民政府颁发的飞行执照的第一位女性，不仅如此，蒋介石委员长还亲自为她颁发证书。有了这张通行证，她可以自由地翱翔在祖国的蓝天上。

之后，各种荣誉纷至沓来。政府不仅允许她使用一架飞机，而且还给她分派了一项特别的任务——检查全国各地民用和军用机场的整装情况。于是，从上海到南海之滨的湛江，从北平到天府之国的成都，都留下了李霞卿展翅碧空的身影，创造了当时中国女子国内长途飞行的最新纪录。有感于国内航空基础设施的落后状况，李霞卿撰写了一部20万字的《改革中国航空的建议》。在这本建议书里，李霞卿提到了国内航空地图不准确、气象报告有偏差、导航系统不健全等普遍存在的问题。关于遇到的问题，李霞卿这样描述道：

“有一次，飞机上的导航设备出了问题，为了不迷失方向，我不得不沿着一条蜿蜒曲折的河流飞行。只见两岸崇山峻岭，雾气蒙蒙。由于河流九曲十八弯，加上山高林密，我得十分小心地飞

行，否则飞机的翼尖很容易撞到山上。我不得不保持一定的飞行高度，因为雾大无法飞得更高，而江面狭窄也不可能低飞。”（章末注2）

虽然国家的航空事业十分落后，基础设施令人忧心，但是在执行任务期间，祖国的山川胜境和秀丽风光让她心潮起伏，流连忘返。那穿行在沙丘间的驼队，那一片片泛着波浪的稻田，那最偏远地区久被弃置的寺庙（从空中望去好似从地表冒出来的土墩子），都让她应物斯感，思绪万千。当飞机飞过当年拍摄《木兰从军》的外景地时，更勾起了她无限的回忆和遐想。从北至南，从东往西，李霞卿翱翔在祖国的万里长空，创造了3万多英里的飞行纪录。



李霞卿准备给学员上飞行课，1936年摄于龙华机场。

回到上海后，李霞卿立即着手协助中国航空协会创办中国飞行社，并亲自担任飞行教练，她也是飞行社唯一的女教练。1936年3月1日，上海中国飞行社正式成立，在龙华机场举行了盛大的成立仪式，有200多人参加了盛会，部分会员有幸乘坐飞行社的飞机绕上海飞了

几圈，体验了一把飞行的刺激和乐趣（章末注3）。飞行社成立后，民众响应热烈，入会十分踊跃，因此为缓解飞机不足问题，飞行社马上又订购了两架教练机。

此时，战争的阴影笼罩着中国大地，为唤起民众对航空救国重要性的认识，李霞卿知道她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为此，她牺牲了个人生活。1936年3月底，上海本地的英文周报《密勒氏评论报》刊登了一条爆炸性新闻：

“据悉，近期从美返沪的知名女飞行家李霞卿小姐，为投身中华航空事业之发展，已与丈夫郑白峰无条件离婚。”（章末注4）

虽然李霞卿满怀殷殷爱国之心和拳拳报国之心，但是因此要在媒体上披露自己的私生活也是需要非凡的勇气的。她的这种为国家而舍小家的高尚情操为民众所称道，而她的这一顾大家而弃小家之举也让老百姓们了解了发展中华航空事业的迫切性。而从个人方面说，李霞卿也希望借此声明来冲淡一下社会上对她的批评之声，在那个离婚属于异端的年代，作为一对年幼儿女的母亲，抛弃丈夫和孩子，自然会受到不少非议和责难。变被动为主动，将离婚这一不幸事件变成宣扬航空事业的一个手段和工具，不难看出李霞卿的智慧和机智，显然，她继承了父亲敏锐的经营头脑。

曾经的媒人，郑白峰的姑姑、大律师郑毓秀，对侄子的这段婚姻触礁颇有些伤怀。想当年，为了让婚姻自由的观念制度化，郑毓秀在南京国民政府立法会中首次提议，将妇女婚姻自主权写进法律条文之中。而如今，李霞卿正是拿着这一法律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利，而郑毓秀作为侄子的律师在两人的离婚文件上签字，这不禁让她感慨万千。而李霞卿也因此成为新法律下敢于摆脱不幸婚姻束缚的第一批中国女性（章末注5）。

在当时，离婚这种事本来就不光彩，加上闹得沸沸扬扬，人尽皆知，让郑白峰自觉颜面丢尽。他深知，家庭不和而且公开离异的消息将对他的仕途产生不良影响，因此，他对李霞卿公开离婚消息的这一举动非常不满。后来，无论何时有人提到李霞卿，他都会说“她死了”，从这一点来看，郑白峰对前妻高调宣布离婚一事积怨颇深。

正因为如此，在两人离婚后的十多年中，郑白峰一直设置障碍，不让李霞卿对儿女进行正常的探视，那极其有限的与儿女短暂共处的时间，也是李霞卿贿赂郑白峰家里的佣人而得来的。可以想见，作为一位母亲，无法见到自己的子女，无法对其尽养育之职，李霞卿该是多么的愧疚，她只好把那种人之常情的母性深深埋藏在心里。在孩子成人后，虽然探视他们不再受限制，但是李霞卿与儿女的交流也非孩子们所期望的那样无拘无束。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李霞卿久居美国，两地相距遥远，阻碍了亲情的

交流，而另一方面，李霞卿是个情感内敛之人，不善于在孩子面前表达那种强烈的母爱。李霞卿幼年丧母，母爱缺失的痛苦折磨了她的一生，岁月轮回，如今的她也无法给予孩子母爱和温暖，不禁令人唏嘘扼腕。

就在《密勒氏评论报》刊登李霞卿离婚消息的同一天，她还出席了在百乐门大饭店举行的中华女界联合会的年度慈善活动。在这次慈善晚宴上，李霞卿孑然一身，与一众上海名流同桌共饮，其中包括驻法大使顾维钧的夫人黄蕙兰，曾任中国驻英国伦敦总领事及驻欧洲中国特派员、时任世界通讯社社长的杨光泐及夫人，以及外交界的其他知名人士。这些人都是李霞卿的朋友，也是郑白峰的同事或朋友。从那以后，“著名女飞行家”李霞卿成了上海各大聚会的座上宾，她的名字也在各大报纸的社会版频频出现。这非但没能缓和与李霞卿与前夫的关系，反而更加深了两人之间的敌意。

李霞卿青春貌美，不乏追求者，不过有一位尤其痴情。还在美国波音飞行学校学习的时候，李霞卿就收到过一封来自这位叫杜彼得（Peter Doo）的情书，两人在欧洲相识，杜对活泼可爱的李霞卿一直念念不忘。1935年5月，杜在伦敦出差时给李霞卿写了这封信，信中提到了他风雨飘摇的婚姻。

“我们在一起一定会很快乐，因为我们有许多的共同语言。”他在信中情意绵绵地说。（章末注6）

几周后，当他得知李霞卿在旧金山湾上空发生事故实施紧急跳伞后，马上给李霞卿拍了一封电报，在表达关心担忧之余，还对李霞卿的成功脱险表示了庆幸。在这次事故发生后，杜先生非但没有力劝李霞卿就此罢手，而是继续鼓励、支持她，估计李霞卿对此十分感激。

在李霞卿与郑白峰离婚后，两人终于走到了一起。他们的关系维系了大约八年之久，而且大部分时间分隔两地。为了维护两人的关系，杜先生甚至和李霞卿的父亲李应生合伙做生意，有很长一段时间，两个男人奔波于内陆腹地，寻找矿藏（李应生当时已经拥有

两座银矿)，或是就有利可图的生意展开调研，抗战爆发后，两人还有生意上的往来。（章末注7）杜先生一片痴情加上生意头脑敏锐，似乎很得李应生的欢心。

有一次，杜先生在与李应生经过一夜倾心长谈后给李霞卿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你父亲说来日会在矿区为你我建一座漂亮的小屋。我们可以在那里过着神仙般的生活，骑马、打猎，尽情地享受新鲜的空气。你觉得怎么样？是继续在熙熙攘攘的南京路上生活，还是换个环境改变一下？”（章末注8）

这种田园生活看似美妙，但对李霞卿来说却不现实。她有一双巧手，可以熟练地组装飞机，可以轻易地驾机而上云霄，但她做不了家庭主妇，她的心里自有一番天地。

实际上，李霞卿一回国即马不停蹄地投入了她的航空事业。作为上海中国飞行社唯一的女教练，她除了带学生在龙华机场进行飞行训练外，还要在地面讲授理论课程。飞行社共录取学生36人，其中男生34人，女生2人（章末注9）。由于学生较多，学生分成两组，一组



李霞卿在上海飞行社唯一的女学员杨瑾瑜。

在虹桥机场上课，另一组则在龙华机场训练飞行。至1937年春，除5名男生、1名女生因身体不好而被淘汰外，其余30名学生全部毕业。“七七”事变后，国民党空军接收了中国飞行社。15名男同学被派到航空学校，插入第九期和第十期，继续学习军事飞行技术。仅杨瑾瑜1人因是女性，不予安排飞行，结果派到航空委员会，做了收发文件的职员。她不甘心放弃飞行，曾多方奔走，后来还学过滑翔，但始终未能实现飞行的愿望。

设协会。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上海市长吴铁城任协会总干事，以示对这一新成立机构的重视。至此，一个全国性的航空建设组织得以建立和发展起来，各省、市陆续建立了18个分会，国外建立了36处支会。1936年9月，李霞卿登上《中华》画报——上海最畅销的画报之一——的封面。照片中，李霞卿一袭当时最时髦的格子旗袍，手扶螺旋桨，巧笑倩兮，仪态万方。她与她唯一的女学生杨瑾珣的合影也被上海另一畅销画报《妇女生活》印上封面。

193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五十寿辰。由于这时蒋正积极充实军备、修筑国防工事，时任江苏省主席的陈果夫想出了一个发动全国各界人士向蒋介石献机祝寿的主意，得到了何应钦的赞同，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献机祝寿活动便在全国展开了。据台湾方面公开的历史资料显示，当时全国所定的目标是：一县一机，一架飞机标的捐款数额为10万元，此外，政府还发行航空建设奖券。这次献机活动，由于全国抗日气氛高涨，民众踊跃捐款，数量非常可观。献机祝寿当天，捐款购回飞机已命名者达50多架。（章末注10）

1936年10月24日，在蒋介石寿辰的前一个星期，“上海市民献机命名仪式”在龙华机场隆重举行。观者如潮，达15万人之众。由于交通堵塞，不少驾车者最后不得不弃车，步行到龙华机场。蒋委员长虽未亲自到场，但民众观礼的热情丝毫不减。在这次仪式上，上海献机共10架，均为美国柯蒂斯公司生产的霍克三式最新款战斗机。这10架飞机整整齐齐地摆放在龙华机场最显眼的地方，黄褐色的机身上漆涂着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

上海的达官显贵、商贾名流们（包括后来也成为飞行员的颜雅清小姐）坐在机场旁边搭建的一个观礼台上，观礼台上彩旗飘扬，上海市的头面人物将在此向前来观礼的民众发表讲话。在献机仪式当天还举行了飞行表演，民众雀跃欢腾，场面十分热烈。

当天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当属李霞卿独自驾机凌空表演，她精彩的花式表演引起轰动，现场掌声雷动，欢呼声震天。这一天也是李

霞卿从事飞行职业以来最重要的一个日子，作为中国第一位进行飞行表演的女飞行员，这一天将永载史册。在碧空之上，李霞卿尽情地施展着她在波音航空学校学到的所有特技，只见她一下子跃升直入云端，继而呼啸着向中心观礼台俯冲而来，在距看台上的嘉宾们仅咫尺之际时，李霞卿猛地拉起机头，陡然直入蓝天。观众惊呼着，尖叫着，整个龙华机场沸腾了。

这次飞行表演取得了圆满成功，它对唤起民众对航空事业的关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数月后，抗战爆发，这次表演无疑成为战前吹响的一次集结号。

在一番特技之后，李霞卿轻盈地落地了。当飞机稳稳降落在停机坪上，李霞卿以矫健的身姿站立在众人面前时，掌声、欢呼声刹那间响了起来。人们潮水般向她涌来，她微笑着向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但见眼前的这位巾帼飞鹰，头顶白色的头盔，胸前系着圆点图案的宽领带，两只手闲适地插在那套素净的连体飞行服中，脸上绽放出灿烂的微笑。付出了多少心血，经过了多少磨炼，作出了多少牺牲，才换来这一刻的荣耀。恐怕连记恨她的前夫也不得不为她的巨大成功而感到震撼吧。当然，在这一天，没有谁会比李霞卿本人更加热血沸腾，心潮澎湃。

当地英文报纸《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对李霞卿的飞行表演给予了高度赞扬：“李霞卿小姐当日的飞行表演简直太对观众的胃口了。”该报评论道，“在其他国家，妇女在发展航空事业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中国也在热忱地欢迎这位年轻女子开创中国妇女航空新纪元的伟大理想。”（章末注11）

就在这次飞行表演后不久，李霞卿与当时在外交部工作的颜雅清碰了面。两个女人决定一道努力，以唤起同胞姐妹对航空事业的关注。这两位上海滩的名媛、中国的新女性有不少相似之处。两人都曾在日内瓦工作或生活过，两人膝下都有一双儿女，两人都还离婚不久。两人同为追求独立和自由的叛逆女子，两人都有着自己丰富的内心世界。更重要的是，两人都有着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都坚信航空救国之道。

飞天名媛
sisters of heaven

就这样，李霞卿和颜雅清走到了一起。为使国人更加关注航空事业，鼓励年轻女性步入这一领域，两人紧锣密鼓地制订了一系列计划。李霞卿在一次采访中谈到了她们的宏图伟愿：“最近颜雅清小姐和我，还有其他人，发起创办一个女子团体，其目的是鼓励女性投身航空事业。所有有志于献身蓝天、成为飞行员者，均可入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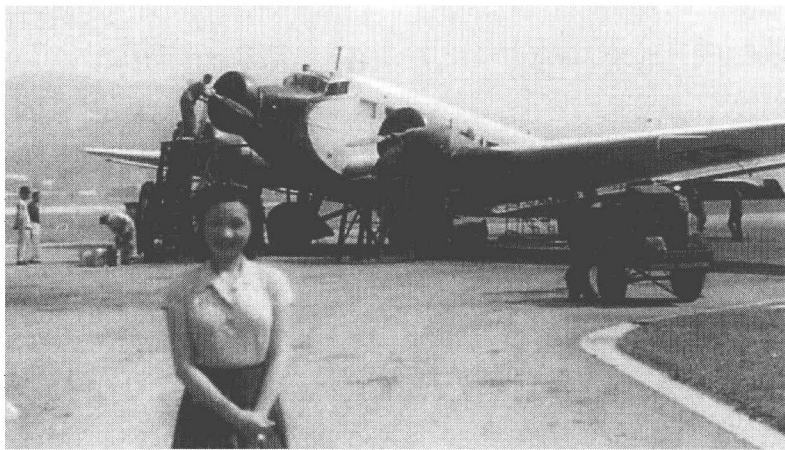
虽然满怀一腔热忱，李霞卿也坦言并非每位女性都适合飞行。“实际上，学习飞行绝非易事。它要求学习者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经济条件，否则难以实现飞行梦。”（章末注12）

1937年新年伊始，李霞卿加快实施她的航空救国计划。她决定写一本20万字的书，书名为《改革中国航空的建议》，计划当年秋天完成，用中英两种文字出版。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使全书内容更为翔实，李霞卿驾机飞往南京、洛阳、成都、西安、昆明、贵州、太原、北平等城市，在祖国的万里长空上留下了她的航迹（章末注13）。

李霞卿对于祖国航空事业的关切，从这本书的书名可见一斑。在一次接受访问时，李霞卿谈到了这本书，“本书旨在进一步推动国人对航空事业的关注。书中将介绍国际的先进经验和做法，描述中国民用航空事业发展的最佳模式，着重讨论中国航空事业的未来和前景，以及诸如商业运输、体育航空和滑翔、机场发展建设等与百姓切实相关的问题。”（章末注14）

李霞卿登上了欧亚航空公司的容克斯三引擎飞机开始了她飞行考察的第一站（章末注15）。在飞机上，李霞卿不是一般的乘客，而是获准与机长、欧亚公司经验最丰富的飞行员沃尔瑟·鲁茨（Walther Lutz）同乘驾驶舱。（章末注16）李霞卿在波音飞行学校曾驾驶过三引擎飞机，因此鲁茨机长同意由她来驾驶这架16座容克斯52型机。这架飞机装配精良，机上配有精密的无线电定向仪，在接下来的几天，李霞卿驾驶着欧亚公司的这架飞机飞往十余个城市（北京—太原—郑州—武汉—南京—上海；上海—南京—郑州—

西安—成都—昆明），飞行时间达到 20 小时。（章末注 17）凭借着满腔热情，李霞卿在祖国上空飞旋，创造了当时中国女子国内长途飞行的最高纪录。



李霞卿在欧亚航空公司^①（Eurasia Aviation Corporation）的容克斯 52 型（Junkers JU/52）三引擎运输机前留影，摄于 1937 年 1 月进行全国飞行考察期间。

临近 2 月底时，李霞卿回到上海，开始着手动笔写书。这时，西南航空公司著名飞行员刘沛泉来访。刘沛泉代表西南航空公司，邀请李霞卿回故乡广东作志愿运输飞行。西南航空公司是一家国有的小型航空公司，在中国西南地区开辟了四条航线，经营邮件和客运业务。西南航空公司也是国内唯一一家聘用中国机师的航空公司，虽然该公司规模小，仅有四架 6 座史汀生单引擎机，但是在西南地区发挥了重要的运输作用，其前景十分可观。不过，这家航空公司一直运气不佳。1936 年 3 月，该公司的一架飞机发生事故，后来虽经修复重新投入运营，但是 1937 年 2 月，该架飞机再次发生坠机，而这一次幸运之神不再庇佑。也许是为了重建公众对该公司的信心，刘沛泉此行特来邀请国内大名鼎鼎的李霞卿执飞（章末注 18）。

^① 欧亚航空公司（Eurasia Aviation Corporation），是继中国航空公司之后在中国成立的第二家航空公司，公司为德国人所筹组，飞机上漆有一个“亚”字，飞行北京、广州、兰州、四川及香港、越南河内等航线，1943 年改组为中央航空公司（Central Air Transport Co.）。——译注

李霞卿接受了邀请，在西南航空公司做了6个星期的志愿运输飞行员（章末注19）。在这期间，李霞卿的工作成绩受到各方的高度评价。5月初，李霞卿完成任务回到她在上海百乐门大饭店的临时住所。正如意料中的，李霞卿在南方的志愿运输飞行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上海《玲珑》女性杂志邀约李霞卿进行专访。前来采访的记者对李霞卿本人似乎比对这段故事更感兴趣，她在采访稿中花了大量笔墨向读者描绘了李霞卿的美丽和优雅：

“她的头发梳成了空心卷，这是1937年最新潮的发式。”女记者在文中记述道。“她身穿一套晚装，上装和长裤是灰绿色的，上有淡红色的花朵。这套装束与那条淡绿色图案的缎子披肩相互映衬。她的手指和脚趾精心修剪过并涂成了枣红色。她的皮肤细腻光滑，只有几个小雀斑。她美艳无比。她是那么的优雅，椭圆的面庞，菱角般的嘴，灿若樱桃的唇，略微上翘的眉毛，只要一见她，你就知道她是一个标准的广东美女。”（章末注20）

就是这样一位美若天仙的女子，在西南航空公司做志愿运输飞行一月有余，记者尚且不能将李霞卿美丽的外表与她作为一名飞行



1937年春，李霞卿在广东做志愿运输飞行，图为李霞卿在等待大雾散去之际在西南航空公司^①（SWAC）的一架史汀生（Stinson）单引擎机前留影。

① 西南航空公司（SWAC），1934年成立，飞行两广及云南航线。——译注

员所要面临的真实险境联系起来，更何况普通百姓了。

“当我在西南航空公司执行运输飞行时的时候，”李霞卿回忆说，“天气很糟糕，经常大雾弥漫，看不清下面的屋顶。西南地区多山，对飞行是个很大的考验。”

西南航空公司当时成立时间不长，但是由于天气恶劣，飞行事故和运输中断的情况时有发生，而李霞卿在不熟悉航线的情况下安全飞行了一个多月。在采访中，李霞卿向记者谈到了自己的理想。

“我希望能从中国飞到欧洲，”她表示，“这一经历将进一步提高我的飞行技能，它不仅能实现我的飞行梦想，而且还有助于推进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李霞卿继而表示飞行将是她一生钟爱的事业，“我希望此生能为中国的航空事业鞠躬尽瘁。另外，我还希望所有的中国人能对航空飞行有所了解，这样有助于增强国防力量。”（章末注 21）

在接下来的抗战爆发前的最后的和平日子里，李霞卿继续为推动中国的航空事业而奔走。5月底，她忙里偷闲去了杭州西湖度假，但这次短途旅行也成了她一段时间内的最后一次假期。1937年7月7日，驻华日军悍然发动事变，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抗日战争爆发，从此，中国人民开始了八年抗战。

抗战爆发之初，上海民众还能暂时安享和平。大暑后的几天，李霞卿还和杜先生一起出席了在某夜总会为前市长、如今调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的吴铁城举行的晚宴活动。这次晚宴在当时算是个例外，因为酷暑难挡，加上政治气氛紧张，许多正常的社会活动都被取消了。在接下来的几周，上海对战局保持观望态度，直到8月13日，战火烧到家门口，淞沪抗战爆发，上海中国驻军奋起抵抗，上海民众也迅速团结起来支持抗战，李霞卿亦被卷进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先后在急救站和难民营工作。

多少次，李霞卿幻想着自己能像花木兰那样驰骋疆场而苦于没有机会，而如今，大战当前，像花木兰那样报效国家、建功立业的机会终于来了。凭借着优秀的安全飞行纪录和国民政府内部一些行业官员的认可，李霞卿找到了驻南京的航空委员会，请求编入空军

中队，驾驶战斗机上天杀敌。为此，李霞卿做好了舍身成仁的心理准备。但是，令她吃惊和失望的是，她的请求被当即回绝。尽管她有着出色的飞行技术，尽管大战当前国家亟需飞行员，但她壮志难酬，原因就是她是一个女人。既然不能上天作战，李霞卿退而求其次，提出可否考虑让她当个运输机飞行员，但是她的这一请求也被断然拒绝。更糟糕的是，她听说抗战期间禁止私人飞行。（章末注 22）

一片赤胆忠心却无报国之门，满腔爱国热情却遭冷遇，李霞卿不禁黯然神伤，但是她很快调整了情绪，投入了地面的抗战活动。日军进攻上海的三天后，李霞卿在她位于地丰路的寓所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共有 50 位熟人和朋友到场，会议决定成立上海市民首家急救站。她的好朋友、辛亥革命与民国著名外交家陈友仁的儿子陈丕士当选为急救站站长，李霞卿担任副站长。

随后，李霞卿全身心地投入了急救站的工作。在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救济会的同仁及朋友的帮助下，李霞卿负责了离家不远、位于梵皇渡路（后改名万航渡路）上的红十字会第 24 急救站的工作。（章末注 23）这里原是一家饭店，后经李霞卿向业主晓以大义，才临时改为急救站。李霞卿对急救站的工作可谓倾尽全力，她还不时慷慨解囊，资助急救站的运作。在急救站的管理上，李霞卿也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从急救站的日常管理到组织医护培训，从救护伤员到手术室协助进行手术，事无巨细，李霞卿均亲力亲为。当急救站遭到日机轰炸时，李霞卿仍坚守岗位，不愿离去。为了尽可能照顾好伤兵，满足他们的膳食口味和需要，李霞卿和同仁们要费不少心思，做出几种风味不同的饭菜。（章末注 24）

李霞卿被急救站里收容的伤兵深深地感动着。每天晚上，当她调暗了灯光，从病房前走过的时候，她总是会被那些英勇的伤兵而感动和鼓舞，他们虽然身负重伤，但是仍强忍着痛苦，他们嘴里没有呻吟，没有抱怨，只有对医护人员的感激。伤兵们的顽强斗志激励着她，她更加卖力地工作，一刻也不愿停歇。除了急救站的工作，李霞卿还协助组建了一座难民营和一座孤儿院。为了从精神上

给予同胞以动力和信心，李霞卿还建立了一个电台，积极宣传抗战，号召同胞团结起来，同仇敌忾。（章末注 25）

尽管上海军民奋起抵抗，但是时至秋天，上海大部分地区已落入日军之手。11月11日，上海市长发表告市民书，沉痛宣告上海沦陷，此时，日军已武力占领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全部地区。自此，上海法租界和苏州河以南的上海公共租界中区及西区则开始了长达四年多的孤岛时期，这些地区也为那些不愿逃离家园的中国人提供了暂时的庇护之所。李霞卿也选择留了下来，并坚守到最后一刻。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她的抗日救亡计划逐步形成。为了拯救危难中的祖国，为了争取国际援助，李霞卿决定赴海外进行飞行募捐。

在租界避难之时，李霞卿继续在红十字会急救站工作，直到后来她听说自己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单。能被日本人盯上说明自己为国家做了点事，李霞卿这样想。不过，她也意识到如不尽快撤离上海，自己难免遭日本人毒手。李霞卿一直坚持到最后一刻，才乘汽船离开上海。

李霞卿搭乘“维多利亚号”内燃机船抵达香港，尽管旅途劳顿，但她还是不辞辛劳向当地媒体发表了一份声明。尽管她为自己在上海所做的一切感到骄傲和自豪，但政府的限飞令还是令她感到憋屈。这一次，她借香港媒体对国民政府航空管理部门表达了不满。李霞卿在声明中表示，如果给予女飞行员以报效国家的机会，那么她们将为捍卫祖国作出她们应有的贡献。她认为，女飞行员至少可以承担运输飞行任务，特别是在内陆地区，她们可以将药品等物资运送到亟需这些物品的战区，从而可以腾出人手，让男飞行员上天杀敌。

李霞卿在九龙何文田山道一号的家宅住了下来。稍事休息后，李霞卿又开始了她的抗战救济工作。虽然香港暂时未卷入战争，但她不顾周边地区硝烟四起，经常乘火车往返粤港两地。当时铁路线经常遭到日军空袭，每当遇到这种险情，李霞卿和其他乘客们不得不飞奔下火车，在铁路沿线的壕沟里卧倒藏好。虽然险象环生，但李霞卿依然往返两地，无畏无惧。她与同样流亡到香港的好友陈丕

士一道驾车赴广东农村地区，寻找适合安置难民之所。根据自己在上海红十字会的工作经验，李霞卿对考察情况作了分析和总结，并将结果上报广东当局，与此同时，李霞卿还协助广东有关部门进行药品在全省的运输工作。

尽管如此，李霞卿还是感到沮丧，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她恨自己没有更大的能力报效国家。在整个夏秋，她都在想一个问题，如何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和能力，为战火中的祖国更尽一份力。经过一番思忖，她想出了一个计划，利用自己的飞行技术以及漂亮的外表和亲和力赴美国各大城市进行募捐飞行表演，争取海外支持，为抗战作贡献。不过，李霞卿深知，她的这一宏伟计划必须得到官方支持才能有望成行。

这一次，又是李霞卿的爱人杜先生给予了她无私的帮助，他通过在政府的关系为霞卿的计划寻求官方支持。在这件事情上，他和霞卿共同的朋友施以了援手。1938年3月15日，杜先生写信给霞卿告知此事询问的结果。

“关于你提出的出国之事，派特森（Patterson）已与蒋夫人谈过，看是否能以政府的名义出国，这样你在海外的工作会有成效得多。”（章末注26）

如果蒋夫人玉成此事，那么李霞卿的计划就可顺利实施，凭借着蒋夫人在海外的影响力，无论李霞卿去到哪里都会受到热烈的欢迎和支持。但是一开始时，蒋夫人却不肯配合。她认为此事应该经过正常的审批程序，所以一直拖着没办。宋美龄之所以犹豫未决恐怕与她当时刚卸任国民党中央航空委员会秘书长一职有关，可能是她觉得自己在航空事务领域不再拥有实权因而审慎行事。

所以杜先生在信中继续写道：“遗憾的是，蒋夫人表示这件事最好交由外交部长王宠惠处理。我对派特森说，最好不要找外交部长，我敢肯定这件事到了那个家伙那里就没什么戏。”（章末注27）

恐怕这一次杜先生误会了王宠惠。虽然李霞卿自己也托了几位朋友游说政府官员，而家族旧交、时任外交部部长的王宠惠是国民政府中的一个关键人物，也是最有可能促成李霞卿计划的人。



李霞卿作为《中华》画报封面人物，飒爽英姿。

他们的共同努力最终赢得了宋美龄的全力支持。如今有了政府的支持，李霞卿不失时机地以一系列政府救济组织官方代表的身份安排了几次约会。李霞卿还向新闻媒体宣布了她的计划，并表示一俟完成在美国的飞行募捐活动，她将飞往包括欧洲在内的更远的地区，为国家争取更多的支持和援助。当然，李霞卿这个想法也是出于其他考虑。一方面，该计划对争取更多海外援助有益；另一方面，李霞卿也想借此机会实

现从欧洲飞回祖国的梦想。遗憾的是，一年后，欧洲战事爆发，李霞卿不得不取消了这后一个计划。（章末注28）

基础工作准备就绪，不过还有几个大的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位即将出现在美国各大城市上空的年轻漂亮的女飞行员真的能不负众望吸引到海外的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吗？她的这一举动会不会被海外民众认为是摆花架子、玩噱头？期待这位“中国第一位女飞行员”，不管她飞行经验多么丰富，在美国进行长途飞行募捐和演讲切实可行吗？试想，她要在不熟悉的领空飞行数千英里，然后面对簇拥的民众发表具有感召力的演说，随即马不停蹄而且安全无误地飞往下一站。有没有想过这一计划的巨大危险性，哪怕此行可能收获颇丰？李霞卿的这个海外飞行募捐计划涉及范围广，而且充满了不可预见的风险性。而此时，李霞卿已经迫不及待，跃跃欲试了。

注释

1 关于李霞卿是“中国第一位女飞行员”之说言过其实。实际上，在1920年代，即私人飞行已被允许之时，华南地区就有女子飞上蓝天，但

李霞卿肯定是中国最广为人知、飞行技术最高超的女飞行员。她也许是第一位获政府认可的女飞行员。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最早期的女飞行员包括飞行员鲍会秩的妻子，著名飞行家张惠长的妻子薛锦回，此外还有王桂芬、朱慕飞和权基玉等人（权基玉是朝鲜人，为中朝混血儿）。以上女性都在1920年代在中国驾机飞行。1919年，李安妮（Annie Lee）和顾维钧的夫人黄惠兰分别在加拿大的萨斯卡通市（Saskatoon）和欧洲学习飞行，而袁明君则在1930年末在欧洲学习飞行。1930年代中国最著名的女飞行员有在英国学习飞行的林鹏侠、杜露丝（Ruthie Tu，音译）、陈淑珍（Cheh Su-jen，音译）和杨瑾珣以及在法国接受训练并被媒体称为第一位获得军事委员会颁发的飞行执照的女飞行家黄外程（Huang Waicheng，音译）（“Chinese Women Aviator Secures Flying License,” *China Weekly Review*, February 16, 1935, 398）。另外参见，“Cantonese Aviators Welcomed in the South,” *North-China Herald*, February 16, 1929。此外，在1940年以前，还有十几位美籍华人女性在美进行飞行学习和训练。以下名单由关中人和本书作者整理，可能不太完整：卢左洽夫人安娜·彼·卢（Anna B. Low）、李培芬夫人欧阳英、官露丽、Louise Woo、爱士德胜（Aishi Desheng）、张瑞芬、Rose Lok、李月英、王桂芬、张倩英、Ruth Chinn、李凤麟、程天信、Hop Hee Dunne，以及玛格丽特·钟（Margaret Chung）博士。朱美娇（Maggie Gee）博士于1942年开始学习飞行。关中文编著，《中国妇女航空钩沉（1915—1949）》，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广东省妇女联合会、恩平县政协文史组，1988，1989，146—147页。关中人先生原本着手修订1988年版的《中国妇女航空钩沉》一书以行再版，但不幸于2004年逝世未竟此愿。

2 李霞卿，未出版打印演讲稿，无标题，第8页。

3 共有20人乘坐中国飞行社的“舰队号”（Fleet）和“救国号”（National Salvation）飞机在上海市上空体验了历时5分钟的飞行。《中国杂志》（*China Journal*），1936年3月。

4 《密勒氏评论报》（*China Weekly Review*），1936年3月21日。上海女性杂志《玲珑》关于李霞卿离婚一事的报道称，影星兼女飞行家李旦旦“已谈离婚……”，《玲珑》231（1936）：930。

5 参见本书作者于2005年3月2日对李霞卿之子郑柏士的采访记录。

6 杜彼得（Peter Doo）于1935年5月从英国伦敦写给时在美国加州

奥克兰的李霞卿的信，杜彼得手稿，李霞卿家人收藏。

7 杜彼得还经营一些利润颇丰的生意，例如在战时向美国销售用来制造炸药的树油。他和李霞卿合伙经营过不止一单生意。

8 杜彼得于1937年4月5日写给李霞卿的信（杜当时所在何处不详），杜彼得手稿，李霞卿家人收藏。

9 中国飞行社录取的第一位女生是杨瑾珣，第二位是22岁的陈淑珍（Cheh Su-jeñ），但是没有资料表明陈完成了她在飞行社的学习。杨瑾珣对飞行的热爱如痴如狂，飞行需要很好的平衡机能，她就每天早晨足蹬早冰鞋，在中国飞行社门前的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练习滑翔。1937年初，包括杨瑾珣在内的30名学生全部毕业。参见上海公共图书馆数字图书资料以及香港英文报《南华早报》有关文章：“Chinese Aviatrix: Second Woman Pupil At Shanghai Aviation School,”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uly 3, 1936.

10 中国习惯用虚岁计算年龄，即出生时为1岁，蒋介石五十寿辰过的是虚岁（他出生于1887年）。

11 “Shanghai Notes: China’s Air Effort,” *North-China Herald*, October 28, 1936.

12 “女飞行家：李霞卿访问记”，上海女性杂志《玲珑》291期（1937），1905页。

13 该书同名英文版书名“*Suggestions to Reform Chinese Aviation*”。

14 显然，《改革中国航空的建议》一书随后出版，中国之友会购买此书并免费分发给中国民众。

15 1931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与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合办欧亚航空公司，由中国政府控股，全称欧亚航空邮运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欧亚间的航空邮运业务。

16 机长沃尔瑟·鲁茨（Walther Lutz）是当时执飞中国的最负盛名的商业飞行员之一，李霞卿能有机会与之共飞想必也是受益匪浅。鲁茨在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飞行成就斐然，其载入飞行日志的里程达到38万公里。1931年，鲁茨担任新成立的欧亚航空公司机长，在中国执飞。1931年12月，他成功地完成了从上海到西北新疆边陲的一次试飞，开辟了一条新的航线。试飞途中，他从空中发现了一座消失并被埋葬达2000之久的古城。开辟该航线前，去往此地只能坐马车和火车，经3个月长途跋涉才能抵

达。数月之后，他驾驶同一架飞机试图开辟另一条飞往哈萨克斯坦塞米巴拉金斯克（Semipalatinsk）的新航线，但飞机不幸失事，所幸鲁茨本人并未受伤。1933年6月13日，鲁茨驾驶欧亚航空公司的另外一架容克斯Junkers W/34型飞机从柏林安全飞抵上海，开辟了一条欧洲和中国间历时7天的新航线。1935年，他回到德国，但次年又重返中国，驾驶欧亚航空公司一架新的三引擎容克斯52型（Junkers JU/52）运输机，经停雅典和印度抵达上海。正是这次飞行后不久，李霞卿获准与鲁茨共同驾驶这架容克斯52型机。1937年4月，鲁茨的飞行里程超过了100万公里（其中在中国的飞行里程为62万公里），被授予一枚勋章，并成为欧亚航空公司一个新成立的名为“飞行百万公里精英俱乐部”的首名成员。该俱乐部是为了表彰鲁茨的飞行成就而专门所设。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飞行变得异常危险，即使对那些本该免受战争之扰的商务机驾驶员也是如此。1938年9月，几架日本战斗机袭击了由鲁茨驾驶的欧亚航空公司的一架三引擎飞机，飞机的机翼和油箱被子弹打穿了几个洞。在一侧机翼油箱漏油的情况下，鲁茨不顾危险加大马力，甩掉了日机，他也因拯救了飞机和乘客受到嘉奖。1940年11月，也就是遭日机袭击的一年后，他驾驶的欧亚航空公司容克斯飞机再次遭到正对昆明实施空袭的三架日机的攻击，不过这次他的运气不太好。因为飞机着火，他被迫将飞机降落在一片稻田里，但是飞机依然遭到日机的猛烈扫射，飞机完全被毁，而鲁茨本人也三处受伤，其中一处伤在脸上。机组人员也受了伤。1941年1月，鲁茨回到德国疗伤。据闻他在二战中幸免于难，战后继续为汉莎效力。

194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盟军并且对德宣战，国民政府交通部接管了欧亚航空公司的德方股份，并改为国营。1943年2月，国民政府交通部与航空委员会合作改组欧亚航空公司为中央航空公司（Central Air Transport Company，简称CATC）。

17 “Gay Chinese Miss Daring Stunt Fliers,” *Toronto Daily Star*, September 9, 1941.

18 Ian D. Johnson, *China's First International Airline, the Southwestern Aviation Corporation; Shi Nan Hang Kong Gong Se: or The People's Aviation Company for the Five Provinces* (未出版, 2004), 21. 西南航空公司开通以下航线：

- (1) 广州—梧州—南宁—龙州—河内
- (2) 广州—雷州半岛—北海
- (3) 广州—梧州—桂林—柳州—南宁
- (4) 雷州半岛—北海—河内

19 在西南航空公司执飞时，李霞卿申请并获得港英政府颁发的飞行执照，执照号码为 84，颁发日期为 1937 年 3 月 30 日，她因此获准可在香港驾驶“各种类型”的英国飞行器。

20 “女飞行家：李霞卿访问记”，《玲珑》291 期（1937），1905 页。谢鼎译。

21 同上。二战爆发让李霞卿从中国飞往欧洲的梦想落空。

22 李霞卿的女学生杨瑾瑜也申请加入空军，也因同样的理由被拒。两名美籍华裔女飞行家，李月英和黄桂燕从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来到上海，请求加入中国空军为国效力，但也未能如愿。

不过在这段时间，李霞卿并未完全无所作为。她乘坐宋美龄的专机飞往国内各大城市，协助其呼吁国民支持航空事业。抗战爆发后，民用飞行被一律禁止。

23 中比镭锭医院（Sino-Belgium Radium Institute）为急救站配备了 3 名医生、6 名护士和一间手术室，红十字会则为急救站提供伤兵所需的药品和衣物。男女童子军和僧人抬着担架，冒着生命危险将伤员从前线运送到急救站。李霞卿忙着组织培训男人们照护伤员，为伤兵准备饭菜。急救站平均每天白天要接待并照看 200 名伤病员，晚上还要救治偷偷送来的另外 20 人。急救站位于公共租界内，由于该区域在政治上保持中立，所以所有伤病员都是偷偷被送进急救站接受治疗。李霞卿，未出版打印演讲稿，无标题，第 9 页。

24 2005 年 1 月 3 日，本书作者对侨居加州赫克力斯的李霞卿之子郑柏士进行了电话采访，参见采访记录。

25 Elsie McCormick, “Notes on the Life of Lee Ya-ching,” 未出版。

26 杜彼得于 1938 年 5 月 15 日写给李霞卿的信（两人当时所在何处不详），杜彼得手稿，李霞卿家人收藏。出生于加拿大的派特森（Patterson，人称派特“Pat”）是李霞卿的好朋友，两人在龙华机场相识。驼峰航线上的第一位中国机长陈文宽表示，在李霞卿获得飞行执照前，派特森曾多次载她飞上高空，并让她驾驶飞机。作为统一贸易有限公司（Consoli-

dated Trading Co. Ltd.) 的代表，派特森负责向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出售美国飞机，因而与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宋美龄非常熟识。派特森本人也是一名杰出的飞行员。1936年10月29日，派特森驾驶飞机在空中拖出大大的“寿”字，庆祝“Gimo”五十寿辰（“Gimo”即蒋介石，说英语的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昵称蒋中正为“Gimo”，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蒋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即“Generalissimo”的英文简写——译注），这是为两天后正式举行的庆祝活动进行彩排，这也是在上海进行的通过飞机放烟在空中写出文字的首次尝试。不过，郑柏士表示，“祝寿”的对象通常是亲人，特别是长辈，而中国发起这次全国性的为蒋介石庆生的运动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丑态。

27 王宠惠于1937年至1941年出任外交部部长，之后由宋子文接任。李霞卿之子郑柏士回忆说，王宠惠与他家的关系非常亲密，孩子们称他为“叔叔”。尽管杜彼得猜测王宠惠在李霞卿拟赴美进行抗战募捐一事上不会帮什么忙，但实际情况是，这位政治家终生都是李家所有成员的坚定支持者，对他们给予了极大的帮助。

28 “Chinese Aviatrix Leaves,” *Hong Kong Daily Press*, October 15, 1938.

19. 回归新世界

8月底时，即李霞卿启程赴美国之前，父亲李应生请女儿到夏威夷小度假。李霞卿需要放松一下，同时也是借此机会向父亲辞行。她搭乘飞行艇到了檀香山，在那里与父亲小处几日，随后精神饱满地回到了香港，为美国的飞行募捐作最后的准备。1938年10月14日，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日子，这一天，李霞卿前往启德机场赴美。当她登上泛美航空公司的飞行艇“中国飞剪号”（China Clipper）时，早已守候在机场的各大媒体纷纷上前拍照，记录下了这一历史性的瞬间。



1936年10月24日，李霞卿在上海龙华机场举行了第二次花式飞行表演，再次引起轰动，李亦成为在华进行花式飞行表演的第一位中国女性，图为享受成功喜悦的李霞卿。

对于此次风险未卜的美国之行李霞卿有没有过疑虑或退缩？答案是否定的。就在不久前，李霞卿还亲眼见到了中国航空公司“桂林号”飞机的残骸，这一经历让她深感震撼。“桂林号”是中国航空公司的一架道格拉斯 DC-2 型双引擎运输机，差不多两个月前被日本战斗机击落，其残骸置于香港启德机场，李霞卿有幸目睹了该飞机损毁的惨状。是年 8 月 24 日，由香港飞往重庆的中航班机“桂林号”，被 5 架日本战斗机袭击，迫降于珠江后，日机继续机枪对受伤之客机扫射，杀死在江中逃生游向岸边的机上人员 14 人，仅有 3 人死里逃生。这一事件也使“桂林号”成为有史以来第一架被敌机击落的民航机。（章末注 1）看着这架面目全非、弹孔累累的客机，李霞卿心如潮涌，义愤填膺，这更坚定了她的决心，当她坐上“中国飞剪号”飞往美国，她知道，她的抗战募捐飞行计划是完全正确的、正义的。（章末注 2）

“中国飞剪号”目的地为旧金山，全程 8000 多英里，为世界第一架越洋商业航班，1936 年，泛美航空公司开始飞越太平洋的客运服务。这架 M-130 水陆两用飞机飞行时间为 6 天，中途过夜经停关岛、维克岛、中途岛和檀香山，目的地为旧金山湾区阿拉米达水域。在这几天里，李霞卿有足够的时间再来回顾和规划她的美国之旅。（章末注 3）

李霞卿是个心思缜密之人，关于这次美国之行，她早已作了全面的安排和准备。她喜欢事必躬亲，所以为确保此次募捐飞行活动取得圆满成功，她把所有可能的细节都想到了。李霞卿的手里还持有一些驻华美国要人——其中包括银行和航空领域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的介绍信，在美如有必要，她将出示这些信件以获取美国民众的支持和信任。（章末注 4）另外，她也正式发函给在加州的朋友、著名美籍华裔影星黄柳霜以及社交名流伯纳迪恩·菲里茨夫人（Bernadine Fritz），请她们对她的美国之行给予帮助，为她介绍一些可能提供援助的人士和机构。她还寄希望于两人能帮她搞一架用于环美募捐飞行的飞机。

李霞卿在给闺中密友黄柳霜的信中这样写道，“如果你能帮我



李霞卿（中）与朋友在上海留影，左为第一位闯入好莱坞的华人女星黄柳霜，右为第一位在纽约开业的中国专业时装设计师张倩英。

搞到或借到一架飞机，那我就太高兴了，因为我准备独自驾机赴美国各大城市进行募捐演讲。”（章末注5）在给伯纳迪恩·菲里茨夫人的信中，李霞卿也说了类似的话。

李霞卿此次赴美进行募捐飞行的决心可从她自己的财务准备情况上窥见一斑。为了这次美国之旅取得圆满成功，李霞卿随身携带了价值超过7000美元的珠宝首饰，变卖这些珠宝首饰的钱足以购买一架私人飞机，如果募集的款项不够，也可以将变卖这批珠宝首饰的钱直接补足捐款。这批珠宝首饰包括耳环、戒指、手镯、项链、胸针、领针，都是上乘的玉石、珍珠、钻石或红宝石制品，其中不少富有中国特色，款式独特，绝无仅有。虽然李霞卿也喜欢用这些首饰来装点自己，但是它们对她来说没有什么情感价值。对李霞卿来说，它们的真正价值在于能卖出去多少钱，能有多大的购买力。（章末注6）

1938年10月20日，“中国飞剪号”抵达终点站旧金山湾，差不多三年半前，李霞卿正是在旧金山湾上空进行飞行特技训练时不慎坠机落海。不过，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此时的李霞卿完全变了

一个人，飞机抵达目的地后，只见一位衣着雅致、戴着手套、脚蹬当时最流行的双色低跟皮革鞋的年轻女子步态款款地走下飞机，她就是李霞卿。经历了婚姻的变故及战争的洗礼，李霞卿变得意志更加坚定，更加顽强。她一刻也不能忘记那些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同胞，忘记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使命。美国各大媒体相继报道了李霞卿抵美的消息，报道称，这位中国女子将以红十字会的名义进行环美募捐飞行。旧金山的华人对这位大名鼎鼎的女同胞的到来尤为兴奋，他们很快行动起来，为李霞卿提供各种可能的帮助。数日后，广州——许多美籍华人的故乡——失陷，这更激起了在美华人抗战募捐的热情。李霞卿的募捐活动进展十分顺利。

与此同时，李霞卿对自己携带的珠宝首饰进行了估价，因为价值不菲，所以她希望能用这批珠宝首饰抵押贷款租借一架小型私人飞机。另外，她还申请并获得了私人飞行驾照。不知是出于对原驾照号码的情有独钟还是有些迷信，或者兼而有之，李霞卿申请恢复使用原来在美颁发的飞行执照号码 33654，她的这一申请获得了批准。此时，她并没有立即着手实施她的环美飞行大计，而是进行了一次短距离的试水飞行，从旧金山飞抵洛杉矶，在洛杉矶开展募捐演讲活动。

国内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上海名媛、著名飞行家、爱国人士李霞卿小姐近期驾驶私人飞机飞抵洛杉矶。在洛城期间，李霞卿与负责抗战救国募捐的中华援助委员会（China Aid Council）的各成员进行了面谈。”（章末注7）

这次短距离飞行是李霞卿即将开始的环美万里飞行的一次绝佳预演，洛杉矶各大日报也在醒目位置对李霞卿的到访进行了报道。李霞卿在洛城逗留了一至两周，期间居住在伯纳迪恩·菲里茨夫人的豪宅，李与这位美国贵妇人多年前在中国相识，两人私交颇深。菲里茨夫人的丈夫切斯特（Chester）在上海与朋友合伙成立了一家股票公司名扬沪上，而菲里茨夫人本人也曾是上海滩上的名人，她热爱文学和交际，她在自家花厅举办的沙龙名声遐迩，华洋精英和文人雅士都爱在此聚会。为了确保李霞卿此次美国之行取得圆满成



李霞卿在一架伏尔提（Vultee）攻击机的驾驶员座舱内留影，右为试飞员吉尔·克拉克（Gil Clark），两人在一次搭乘宋美龄私人飞机时相识，1938年12月16日摄于加州唐尼（Downey）。

功，菲里茨夫人作了周密的安排。在她的鼎力帮助下，李霞卿差不多一到美国就投身到了当地的上流社会圈。11月底，在菲里茨夫人的陪同下，李霞卿出席了墨西哥著名影星德洛丽斯·德尔·里奥（Dolores Del Rio）在加州圣莫尼卡（Santa Monica）的豪华寓所举行的聚会。前来参加聚会的好莱坞明星荟萃，其中包括巴兹尔·雷斯伯恩（Basil Rathbone）、爱德华·罗宾逊（Edward G. Robinson）、克劳德特·科尔伯特（Claudette Colbert）、达利·扎努克（Darryl Zanuck）、瑙玛·希拉（Norma Shearer）、默尔·奥勃朗（Merle Oberon）、凯撒·罗梅罗（Cesar Romero）、金格尔·罗杰斯（Ginger Rogers）、埃罗尔·弗林（Errol Flynn）等。在社交场合，李霞卿可谓游刃有余，她的美丽优雅和谈吐举止给来宾留下了深刻印象，爱德华·罗宾逊夫妇当即邀请她出席接下来的周末在其府上举行的聚会。不少出席德洛丽斯·德尔·里奥的聚会的明星们也获邀参加了爱德华·罗宾逊夫妇举办的派对，而且这次派对的规格更高，出席的名人更多，包括著名导演约瑟夫·冯·斯登堡（Joseph von Sternberg）、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影星威廉·鲍威尔（Wil-

liam Powell)，旅居美国的英国著名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著名女演员康斯坦斯·科利尔（Constance Collier）等等。不过，据有关报章杂志的花边新闻称，当晚李霞卿才是真正的明星，她一袭闪亮的旗袍登场，艳压群芳。（章末注8）

数日后，新闻媒体又刊登了有关李霞卿的消息，这一次是洛杉矶最老的街、也是该市的发源地奥维拉街（Olvera Street）上的美籍墨西哥人邀请李霞卿作为嘉宾出席其传统庆祝活动——墨西哥中国公主卡特丽娜（Catarina）节。（章末注9）正如在好莱坞附近的富豪住宅区贝弗利山庄（Beverly Hills）举办的聚会上一样，李霞卿再一次成为公众的焦点，这位现代的中国公主受到了高规格礼遇，作为嘉宾出席各种相关庆祝活动，在墨西哥人聚居的各大街道频频亮相。虽然自己在这些公众场合显示了明星范儿，但是李霞卿丝毫没有忘记她此次赴美的使命，没有忘记她为自己谋划的宏伟志愿——那即将到来的环美万里募捐飞行。

她听说她的好朋友、同是来自上海的名媛颜雅清此时旅居纽约并在一家飞行学校学习飞行，她还听说后者的飞行学习接近尾声。尽管当初她们曾一起谋划成立中国女子航空俱乐部的这个想法现在看来已不现实，但是她们依旧怀着共同的梦想，那就是唤起世界对中国坚苦抗战的关注和支持，为难民和伤兵同胞尽可能多地争取国际社会的救济和援助，为此，她们制订了一个特别的协作计划。一俟颜雅清拿到飞行执照，两个女子就联手在美进行募捐飞行。



李霞卿（左）与张倩英（右）在中国航空公司（CNAC）DC-2“桂林号”运输机残骸前留影，“桂林号”为第一架被日军击落的民航机。

在此期间，李霞卿沿着加

州海岸巡访各大城市，出席各种活动，并有幸见到了美国著名女飞行家杰奎琳·科克兰。科克兰是一位传奇人物，为人类飞行史上创造最多人速度距离纪录的女飞人，其飞行成就连许多男飞行员也自叹弗如。当时，她刚刚赢得美国年度长途飞行竞赛本迪克斯飞越大陆锦标赛（Bendix Transcontinental Air Race）的桂冠，风头正劲。在这次飞行比赛中，科克兰驾驶一架民用型舍维斯基 Seversky P-35 型机，克服不利的天气条件，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美国国务院了解到李霞卿此次赴美飞行募捐是受中国国民政府所派，蒋夫人宋美龄对此事给予了大力支持，所以特派科克兰小姐协助李霞卿解决环美飞行的座机问题，具体来说就是说服美国比奇飞机公司（Beech Aircraft Corporation）赞助一架飞机供李霞卿使用。李霞卿搭乘由科克兰驾驶的舍维斯基飞机飞往东海岸，为环美飞行募捐做最后的准备工作（章末注10）。科克兰本人也慷慨地表示将为李霞卿的此次壮举提供赞助，而在此之前已有不少社会名流对李霞卿的这次爱国飞行募捐表示将给予支持。颜雅清顺利地完成了在飞行学校的学习并获得飞行执照，她和李霞卿再次相约纽约，最后敲定了联合募捐飞行的计划。有美国各地中华援助机构的鼎力相助，两人对飞行计划取得圆满成功满怀信心。

两人一致认为，以李霞卿 1939 年环美万里飞行拟定日程。

中华平民救济会的名义进行募捐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该机构总部设在首都华盛顿，由德高望重的天主教南京总教区总主教于斌担任会长，当时于斌新任命主教不久，1969 年 4 月，教宗保罗六世任命于

Tour of the UNITED STATES by
Miss LES YA CHING.

March 23	New York
" 23	Philadelphia - Charles Morrison - Public Ledger
" 24	Washington - John O'Rourke - The News
" 26	Boston
" 28-29	Richmond
" 29	Charleston
" 30	Jacksonville
" 30	Miami - Jack Knight, Publisher or managing editor - Herald
April 7	Jacksonville
" 8-9	New Orleans
" 10	Houston - A.C. Bartlett, editor, Bud Myers - The Press
" 11	Austin
" 11	Fort Worth - Dallas - Don Weaver - The Press
" 12	Oklahoma - Walter Harrison - Oklahoman
" 15	El Paso - Ed Pooley, editor
" 16	Phoenix
" 16	San Diego - Richard Chase, editor
" 17	Coronado - Jack Joung
" 19	Los Angeles
" 23	San Francisco - Wm. Burkhardt, editor, or Chris Lykke (News)
" 30	Sacramento - Charles Lilley - The Union
May 3	Portland, Oregon
" 7	Seattle
" 11	Vancouver, B. C.
" 14	Spokane
" 15	Boise
" 16	Salt Lake City
" 18	Denver - Lee Casey, Rocky Mountain News (editor)
" 7	Cheyenne
" 20	Camba
" 22	St. Paul
" 24	Des Moines - Henry L. Martin, Chas. Lounsbury (Register & Tribune)
" 7	Kansas City
" 7	St. Louis - Frank Taylor, editor, Star-Times
" 28	Chicago
June 4	Detroit
" 6	Cleveland - LB Seltzer, editor or Chas. Schneider - The Press
" 8	Buffalo - George Lyon - The Times
" 9	Pittsburgh - Bruce Horton or Wally Forster - The Press
" 11	New York

飞
天
名
媛

LES YA CHING

斌总主教为第二位华人枢机，5月1日在梵蒂冈举行了加冠典礼（章末注11）。抗战爆发后，于斌随国民政府西迁重庆，担任国民参政会议员，主持难民救济工作。抗战期间，他曾先后八次前往欧美国家，到处发表演说，争取国际上的同情和援助，此时他正在美国为那些因战争而无家可归的同胞募集资金。李霞卿认为，要想此次环美飞行募捐取得成功，于斌总主教和他的救济会是再合适不过的合作伙伴。在李霞卿的脑海里总是会闪现她曾经亲眼见过的那幅场景：一大队流浪儿倚靠在上海某孤儿院的门墙外，这家孤儿院已经人满为患，无力再收容这些可怜的孩子，他们只得站在门外，乞求过路的好心人收养他们。

1939年2月底，华人社区庆祝农历兔年新年。传统上认为，兔年运程较佳，这一年发展外交和国际关系比较有利。但是，事与愿违，这一年欧洲卷入战火，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美国人的注意力也因此由亚洲转到了欧洲战场。所幸的是，在二战爆发前，李霞卿和颜雅清凭借着一腔爱国热情、大无畏的气魄和精神以及自身的魅力获得了美国民众的广泛支持。

两姐妹的环美募捐飞行之旅定在1939年3月23日这天开始，在此之前，李霞卿又接连出席了几场公众活动，以赢得更多的社会关注。3月中旬，李霞卿驾驶着科克兰小姐为她搞到的座机——这是一架史汀生·瑞连特 Stinson Reliant SR-9B 型单翼机，机身漆涂了耀眼的红色并饰以艳黄色的边，该机起名为“新中国精神号”（章末注12）——飞往宾夕法尼亚州西南部城市匹兹堡（Pittsburgh），出席在那里举办的年度航空展。不出所料，李霞卿的这次钢铁重镇之行取得了圆满成功。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她在返航途中遇到了大麻烦。

3月17日，李霞卿离开匹兹堡的年度航空展会场飞回纽约，为即将开始的环美飞行作最后的准备。李霞卿计划经新泽西州第一大港口城市纽华克（Newark）飞抵纽约，该港市位于匹兹堡东部300多英里处。但是始料不及的是，李霞卿在返航途中突遇大雾天气，能力度极低，她很快迷失了方向。机舱外气温骤降，湿冷难耐，而

燃油也在耗尽，在此情形下，李霞卿依然勇敢地向前飞行并时不时地下降飞行高度，期望能够辨明方向，但是无果。就在李霞卿未能按时飞抵纽华克的3个小时后，当地空管部门发出了她失踪的警报。

就在形势开始变得十分危急之时，李霞卿终于在迷雾中找到了一个空隙，并借此辨明了方向，重归蓝天。她刚松了一口气，却又发现自己已经飞到了大西洋上空。所幸的是，她并没有飞离多远，东海岸恰好还在她的视线范围内，她看见了沿岸的一个机场并向该机

场飞去。就这样，李霞卿驾驶着燃油即将耗尽的飞机降落在位于纽约和波士顿中间位置的康涅狄格州的格罗顿（Groton）机场，补给燃料后，李霞卿随即飞往100英里外的纽约布鲁克林弗洛伊德·班尼特机场（Floyd Bennett Field），起飞后不久安全抵达目的地。

这次遭遇本来可能以一场灾难收场，但最后却峰回路转有惊无险，这一戏剧性的经历意外地收获了更多的公众注意力。有关李霞卿返航失踪的警报发出后，各大新闻媒体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当李霞卿脱险飞抵纽约布鲁克林的机场时，早已有大批支持者手捧鲜花欢迎女飞人平安归来，而新闻记者们也守候在那里，见证了英雄凯旋般的那一刻。美国各大报纸用大量篇幅报道了这一事件，就连中国国内的新闻媒体也没有放过这条颇具爆炸性的新闻，显然，这次劫后余生的返航让更多的美国民众了解了李霞卿，了解了她所承担的爱国使命，了解了中国正面临的困境。美国民众的关注和热情让李霞卿备受鼓舞，她向媒体慷慨激昂地表示，为了那些正与侵略



Miss Ya-Ching Lee 李霞卿
Girl Pilot on Mercy Flight over U. S. A. to Seek Funds for Chinese Civilian Refugees

为纪念李霞卿1939年环美慈善飞行发行的明信片。

者浴血奋战的同胞，面对困难和危险，她无所畏惧。末了，她还不失时机地为她即将开始的环美募捐飞行作了一番宣传。

“我希望此次能飞往 35 个城市进行募捐演讲，”李霞卿对《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Tribune)如是说，“要做的事情很多。首先，我们需要资金购买卡车。因为运力不足，药品等物资无法运抵抗战的最前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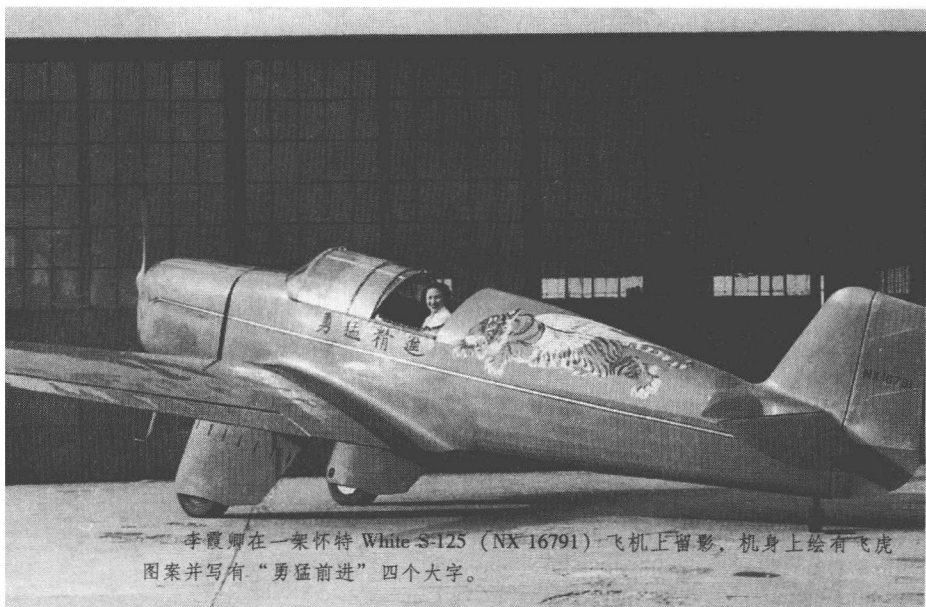
李霞卿还对战争的结果表示乐观。

“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她满怀信心地说，“但是，胜利来之不易，这将是一场持久战。”(章末注 13)

李霞卿承认这次返航迷途事件是一次绝好的宣传中国抗战的机会，这次能够幸运脱险对她即将开始的环美万里飞行来说是个吉兆。

1939 年 3 月 23 日星期四的清晨，李霞卿和她的联合飞行伙伴颜雅清来到机场，准备开始她们伟大的环美飞行之旅。费城是她们环美飞行的第一站，由于两架座机只到位了一架，为表示对伙伴的尊重和信任，李霞卿请颜雅清坐上了驾驶位。这一天，李霞卿身着一件款式新颖独特的外套，胸前绣着一架盘旋着俯冲而下的运动飞机，机尾拖着一条用缎子绣的飞行云。

两姐妹登上飞机，朝卡姆登机场飞去，卡姆登机场邻近费城，



李霞卿在一架怀特 White S-125 (NX 16791) 飞机上留影，机身上绘有飞虎图案并写有“勇猛前进”四个大字。

位于特拉华河河岸。抵达目的地时，两人受到了当地民众和新闻媒体的热烈欢迎。次日，两人同机飞往首都华盛顿，于斌主教代表救济会亲自前来接机。两人决定，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在首都及周边地区进行募捐演讲，并利用这个间隙等待颜雅清的座机到位。在公开演讲方面，李霞卿还是个新手，而同伴颜雅清则要老练得多，因此几场公开演讲都是由颜雅清扮演主角，李霞卿在一旁揣摩学习。4月3日，颜雅清的座机终于到位。这一天，李霞卿陪同颜雅清来到华盛顿机场，见证了飞机交接仪式。这架也取名为“新中国精神号”的轻型单翼机由美国王牌飞行员罗斯科·特纳上校专程驾驶抵华盛顿。大名鼎鼎的飞行家遇上了女飞行员，多少都会表现出那种高人一等的傲慢。这位特纳上校向李霞卿随赠了一张亲笔签名照片，照片上用潦草的笔迹写着：“致一位伟大的小飞行员。”

两架座机均已到位，自此，李霞卿和颜雅清将独自驾机开始各自的行程。这对李霞卿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她本是个独立之人，在驾驶飞机方面，她认为，越是能自我掌控就越意味着安全。尽管此行艰险可能不少，但是她非常享受这即将到来的长途公费之旅。不过，进行这样一次环美飞行募捐之旅代价不菲，尽管中国之友会早前承诺负责此次环美飞行的燃油费用，但是李霞卿的个人费用却要由其自己承担。所幸的是，李霞卿很快发现自己基本不用付吃饭的钱，因为她所到之处，茶会宴会都已经排得满满的，至于住宿，一些旅馆老板已经慷慨地表示，欢迎李霞卿小姐前往免费入住。

伟大的冒险之旅终于开始了，经过数月的精心准备，包括在国内以及在美国的周密安排，李霞卿终于可以将自己的计划付诸实施了。令她高兴的是，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进展得十分顺利，比她想象的还要顺利。而她也很快成为美国的大红人。

那些聚集在各大机场欢迎李霞卿到来的人们毫无例外地因眼前即将出现的是一位体态娇小的弱女子而大吃一惊。一位记者表示，“……在人们的想象中，承担这一艰巨任务的应是一位体态丰盈、看上去很强悍的女人，”但是事实却让人们大跌眼镜。一位来自爱达荷州首府博伊西（Boise）的女记者这样写道，当李霞卿款款走

出飞机座舱时，“在场的人无不惊愕”。这位极富英雄色彩的女飞行家是那样娇小，那样纤瘦，那样高贵优雅（章末注14）。这可与人们心目中的巡回飞行表演者那结实魁伟的形象大相径庭。

李霞卿的美貌也让众人惊讶不已。记者们对她的美貌无不倾倒，夸她惊为天人，美得可以去当电影明星。他们毫不吝惜其笔墨，大赞其笑靥如花，皓齿雪白，蜜色的肌肤宛若丝般柔滑细腻（章末注15）。

对那些认为李霞卿会穿着一身油腻的飞行服走出飞机的人来说，他们也同样吃惊不小。李霞卿那别致的休闲时尚装束令人印象深刻。她看上去就像一株薄荷，那样舒爽，那样清新。爱达荷州当地报纸《爱达荷政治家报》（*Idaho Statesman*）的一位女记者在新闻稿中这样描述道：“这位代表着新中国精神的女子穿着一条洁白的鲨鱼呢便裤。不是紧身裤，而是宽松的裤装。天然皮革的凉鞋，灿烂的笑容，美丽的黑色双眸，玫瑰花瓣似的柔嫩肌肤……”简而言之，她的丽质天成，她浑身上下的打扮，都是那么完美，那么妥帖，那么无懈可击。“李霞卿小姐的手指甲也精心修剪过，保持着一定的长度，”这位女记者继续写道，“手指甲涂上了时髦的颜色，与脚趾甲和口红的颜色相得益彰……她手拿一个大大的黑漆皮信封包，不过，她那一头秀发比那黑漆皮还要闪亮，还要有光泽。她在耳后别了一枝白色的康乃馨，有时她的打扮就像个高中女生。”（章末注16）

在耳后别一朵鲜花当时是中国女子的时尚之举，但是在美国，这成了李霞卿的标志性装饰；在公众场合，人们总是会见到李霞卿发间别着一朵绽放的白色花朵（这些花都是现成的，不过是从头一天的欢迎宴会上随便摘取了一朵）。每当李霞卿一袭长至脚踝的旗袍出席晚宴时更是如此。有一次，李霞卿身穿一件玫瑰色、上面绣有银色图案的旗袍出席晚宴，她一出场便艳惊四座，而那朵别在乌发间的芳香的百合更平添了她的雍容华贵。

不过有时，李霞卿会根据时间和场合来选择装束。在温哥华时，李霞卿陪同该市市长出席了五一劳动节的一个庆祝活动，这一

天，她穿了一件漂亮的旗袍，但是脚上却套了一双棉质长筒袜，看上去很不协调。那天酷热难挡，就算她光着腿不穿袜子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李霞卿正是通过此举来表明自己的立场。日本是丝袜出口大国，而出口全世界的丝袜利润被用来生产发动战争的枪炮弹药。如果抵制日本丝袜能让这场战争早点结束，那么李霞卿将非常乐意作出这一点点牺牲。

同样地，如果能够筹到钱帮助同胞，她也不惜牺牲一点色相。在迈阿密海滩时，李霞卿曾应邀在海边的木板路上拍摄写真，供媒体宣传之用。照片中的她只穿了一件泳衣，脚蹬一双鞋跟极高的鞋子，这一次她什么袜子也没穿，露出两条纤纤玉腿。

自然，人们对这位大美人的私生活非常感兴趣。所有的人都想知道她是否结婚了。每当问到这个问题，李霞卿只是报之一笑，声明自己仍是单身。

“自从在瑞士科因特林飞行学校学习飞行的时候开始，飞行就成了我毕业追求的事业。除了飞行事业我别无他好。”李霞卿对媒体们表示（章末注17）。在另外一个场合，李霞卿对一位记者调侃道，她喜欢“所有的男人，不过只是看看而已”。（章末注18）

李霞卿是那么年轻漂亮，清新可人，谁也想不到她离了婚而且还是两个孩子的妈。人们之所以认为李霞卿天真年少也是因为她飞行时总是带着两个填充玩具，据说那是她的吉祥物，一个是用粉红色棉布做的小猪，另一个是竖着耳朵、身穿格子花呢衣裳的小白兔。

当她拿着这两样小女孩喜欢的玩物在媒体面前微笑并留影的时候，她决想不到，她的前夫，重庆国民政府欧洲事务司的负责人，将两个孩子留在上海交由保姆照看，而当时上海已经沦陷。她不知道她的一双儿女，儿子郑柏士和女儿郑木兰，正四处躲避日本兵的猎杀，当时日本兵接到命令，对中国高官的子女一律格杀勿论。李霞卿此次美国之行是为了中国难民募集善款，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她自己的两个孩子也吓得东躲西藏，流离失所。

李霞卿并不知道发生的这一切，她的环美募捐飞行之旅按计划进行着。在飞行过程中，有些城市会派出飞机在空中列队欢迎她的到来。在飞抵温哥华时，一架政府派出的飞机和几架私人飞机在空中迎候；盐湖城还派出 15 架飞机在离该市 20 分钟航程的上空迎接，十分隆重，俨如国宾。

李霞卿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政要名流以及民众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款待，这其中包括当地政府要人、领事馆高官、各团体组织的负责人和当地华人领袖。前来机场迎接李霞卿的队伍十分庞大，大家群情激昂，兴奋异常。李霞卿驾驶着那架非常显眼的红黄两色“新中国精神号”从空中降落，那些费尽心思来到机场准备一睹李霞卿芳容的人是一定不虚此行的。当欢迎的人群望见李霞卿座机机身上漆涂的中美两国国旗时，现场顿时掌声雷动。

不过也有运气不佳的时候，这让李霞卿颇为恼火。在圣地亚哥，飞机降落不顺利，事后李霞卿红着脸对前来迎接的人群说，“今天的落地很糟糕，非常抱歉！”在飞抵加拿大时又出现了同样的状况。当时李霞卿在侧风中降落温哥华机场，但是飞机并没有平稳着陆，而是弹跳起来好几回。在场的 300 名迎候者都屏住了呼吸。李霞卿陷入困境了吗？那倒没有，只见她向众人挥了挥手，以示自己一切安好，然后她拉起机头复飞，在机场上空盘旋了一下，之后来了一个漂亮的三点着陆，飞机稳稳地停在跑道中央。

虽然李霞卿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政要名流前来接机，鲜花簇拥，风光无限，但是她从来没有给人留下恃宠而骄的印象。她代表着中国，因此，她有责任维护她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每到个城市，她都将其视为整个行程的第一站，无论去到哪里，她都始终保持着最佳的状态，尽情施展自己的个人魅力和外交才干，不骄不躁。在航程进行到中后段时她依然如此。在飞抵爱达荷州首府博伊西后，她被介绍给了该市市长，她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外交辞令技巧。

“您是我见过的最年轻的市长，”她脱口而出，“我引以为傲。”

当她在—队警察摩托车队的护卫下乘车进城时，她不忘打趣

道：“我真高兴能坐在警察开路的车上，而不是警察在后面追我！”
(章末注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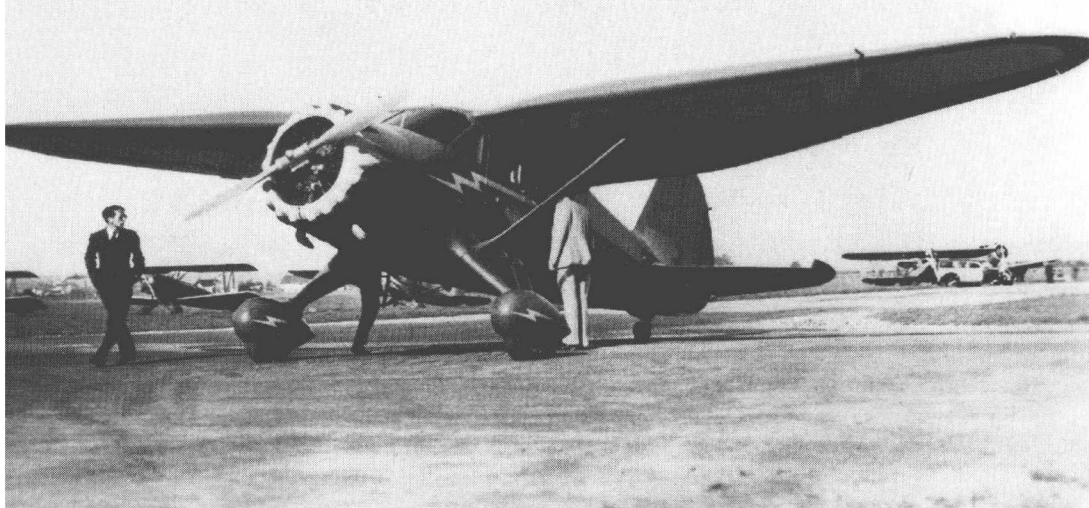
正是李霞卿的这种个人魅力和高超的外交智慧让她每到一处都备受欢迎。很快地，她获得了北美各大城市市长颁赠给她的“城市钥匙”。在现存的那些纪念颁赠仪式的照片中，见过大世面的市长们在向李霞卿颁赠象征着成为这些城市荣誉市民的这一物件时，望着眼前这位光彩照人的靓丽女子，他们脸上的表情一个个都是目瞪口呆，怔在那里。

李霞卿非常关注天气变化对行程的影响。她有很多城市要巡访，她不愿意让那些在机场苦苦等候她的人们失望，但是安全考虑必须是第一位的。于斌主教自然知道李霞卿的行程安排得满满的，也只有他最清楚李霞卿所面临的兑现那些承诺的压力。为确保安全起见，他嘱咐秘书告诫李霞卿不要为了行程安排而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冒险飞行，他还托秘书转达推迟行程并不要紧，因为救济会方面会通过电报通知有关城市她延期抵达的消息。

于斌主教还不时对李霞卿予以表扬和鼓励。他的秘书曾以他的名义给李霞卿写过一封关怀体贴的信：“主教对您报效祖国和人民所表现出的莫大勇气和严以律己深感欣慰，他对您不畏艰难困苦的抗争精神极为赞赏。主教深知，您一定会为了我们共同为之奋斗的崇高事业而努力工作，但是他也真诚地希望您多加珍重。”(章末注 20)

每到一处，李霞卿无疑都在当地的华人社会掀起了一股旋风。李霞卿的到来让那些身在异乡的炎黄子孙感到振奋和鼓舞，不管他们来自人口多么稀少的社区，也不管他们来自多么卑微的社会阶层，他们都以李霞卿这位巾帼英雄为傲(章末注 21)。在飞抵的各大城市的唐人街，李霞卿受到了来自云端的女神般的欢迎和拥戴，不过遗憾的是，那些狂热的欢迎场面在英文媒体中鲜有报道甚至没有报道。由于当时在海外的中文媒体也很少，所以我们很难想象李霞卿的到访在当地华人中引起了怎样的震撼，不过温哥华的《大汉公报》(*Chinese Times*)，一份从这一时期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日

飞天名媛
Sisters of Heaven



1939年5月，李霞卿驾驶史汀生 Stinson SR-9B (NC-17174) “新中国精神号”抵达温哥华。

报，对李霞卿为期11天的到访以及她所带来的轰动效应作了报道。不难想象，正如在温哥华一样，李霞卿也在北美其他城市的华人社会掀起了一股股热潮。

1939年5月12日，也就是抵达温哥华的次日，李霞卿出席了中国航空建设协会温哥华支会在华侨饭店为她举办的欢迎酒会。唐人街所有的团体组织都派代表出席了这次酒会。当李霞卿步入饭店时，各团体组织的代表们纷纷献上鲜花，在正式用餐前，主办单位安排了不少当地名流致热情洋溢的欢迎辞，此外还精心准备了欢快的表演节目，让现场的气氛达到最高潮。酒会结束后，李霞卿在这家隶属国民政府的饭店的会议厅发表了有关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航空救国思想的演讲。听众达三四百人，济济一堂，这是她在温哥华发表的第一场中文演说，那些挤不进会议厅的热心民众只好聚集在饭店门外的扩音器前聆听她的演讲。唐人街的4000居民，也就是在该社区生活的一半多人口，都聚集在饭店门外的大街小巷上。

在温哥华逗留期间，发表激情的演说，受到华人社区的热烈追捧成了李霞卿的家常便饭。只要她没有安排其他的演讲活动，华人社区各组织团体就争相邀请她出席酒会并发表演说。在抵达该市的第三天，李霞卿已成了当地炙手可热的新闻人物，1000民众涌进远东大剧院聆听她有关拯救大中华的演讲，而在剧院门外通过扬声器倾听她演讲的华侨更是超过了6000人。



李霞卿在温哥华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

“我经常在一天内得把同样的话说上好几次，”李霞卿表示，“这是因为在我的头脑中只有一个大的念头。那就是‘中国一定会赢得胜利’。”（章末注22）

李霞卿的这番积极表态对于那些身居海外、为祖国的前途命运

而忧心忡忡的华人来说是一种巨大的鼓舞，她的话抚慰着海外游子受伤的心，让他们振奋精神，重拾信心。让华侨们感到振奋和欣喜的不仅是李霞卿对祖国一定能战胜侵略者的坚定信念，而且还有她那优雅迷人的外表，侨胞们深信并以此为荣的是，李霞卿完美的外表与内在所代表的中国形象也给广大西方民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李霞卿向祝福的民众挥手致意，摄于1939年。

自然，李霞卿的美貌在好莱坞时也没有白白浪费。在访

问加州时，李霞卿千金一笑和美好身材的照片刊登在当地报纸的头版，结果连著名的米高梅电影制片公司（Metro-Golwyn-Mayer）也注意到了。正如 10 多年前被民新电影公司发掘一样，米高梅公司的代表与李霞卿接洽，问她是否愿意在好莱坞著名影星海蒂·拉玛（Hedy Lamarr）主演的影片《热带女郎》（*Lady of the Tropics*）中出演一个角色。他们告诉李霞卿她将在片中与这位被誉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同场出境。结果双方未能达成协议。不过，派拉蒙影业公司（Paramount Studios）此时也不失时机地向李霞卿抛出了橄榄枝。该公司高层认为李霞卿是其最新一部影片《歧路》（*Disputed Passage*）中一个角色的最合适人选，参演这部电影的明星包括阿吉姆·坦米罗夫（Akim Tamiroff）、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以及闻名遐迩的莎笼裙女郎多萝西·拉莫尔（Dorothy Lamour）。李霞卿最终同意出演。电影拍摄日期与李霞卿的行程恰无冲突，而且媒体刊登她的剧照也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她的人气，为此次环美募捐飞行带来更大的收益。李霞卿早前曾表示，她在美国的所有个人收入将全部捐给抗战难民救济会。

李霞卿参演好莱坞影片的消息迅速传遍了美国，但是没有一家媒体提到她是 20 世纪 20 年代末上海滩红极一时的电影明星，她对演艺界并不陌生。保持私生活低调是李霞卿的一贯作风，所以外界对她早年的生活并不知情。她对记者表示，面对镜头她一点儿也不紧张或是有什么顾虑（这没什么奇怪，她原本就是个电影明星嘛），不过她马上补充说，她不会考虑日后当个电影演员。正是人们对她之前的演艺生涯

上海大都會 RIALTO THEATRE
 Commencing Sunday September 29th, 1940.
 映演日期：自九月二十九日起
PROGRAMME
 Subject to alteration at the discretion of the Management—
 I OVERTURE
 II FEMALES IS FICBLE (Cartoon)
 III BLUE DANUBE WALTZ (Musical)
 IV PARAMOUNT PRESENTS
 "DISPUTED PASSAGE"
 THE CAST
 Audrey Hilton DOROTHY LAMOUR
 Dr. "Fubly" Forster AKIM TAMIROFF
 John Wesley Brown JOHN HOWARD
 Bill Anderson GORDON JONES
 Winifred Dane JUDITH BARRETT
 Dr. (Mrs.) Cunningham WILLIAM COLLIER, SR.
 Mrs. Cunningham ELIZABETH HILDON
 J. Merkle HILLY COOK
 Missie HEVELLE
 Awaiting LEE YACHING

映演(三、二期星) 自星期二一
 OCTOBER 1-2
 發文事件不命性中之做地間
 珊林爾格瑪《穿大小位六
 片日佳映公會社的影畫劇代代製

映演(六、五、四期星) 自五至日三
 OCTOBER 3-5
 衛要又了像一舟隻三隻障障透
 去舞身想又思談 ！午阿午時時演演

HELL'S KITCHEN
 小大位六
 以地第以第開列小
 ！主開活字不表現者

With The "Dead End" Kids
雄英獄地

With STAN Laurel & Oliver Hardy
"A CHUMP AT (X) O'RD"
 演演 映映
 演演 映映
 演演 映映
 演演 映映
 演演 映映
 演演 映映

上海丽都大戏院 1940 年 9 月上映影片宣传单上介绍了好莱坞影片《歧路》，李霞卿在剧中饰演一位飞行员。

不为所知，所以李霞卿在电影《歧路》中的戏份并不重，她在剧中饰演一位中国女飞行员，基本上是本色出演，不需要什么演技（章末注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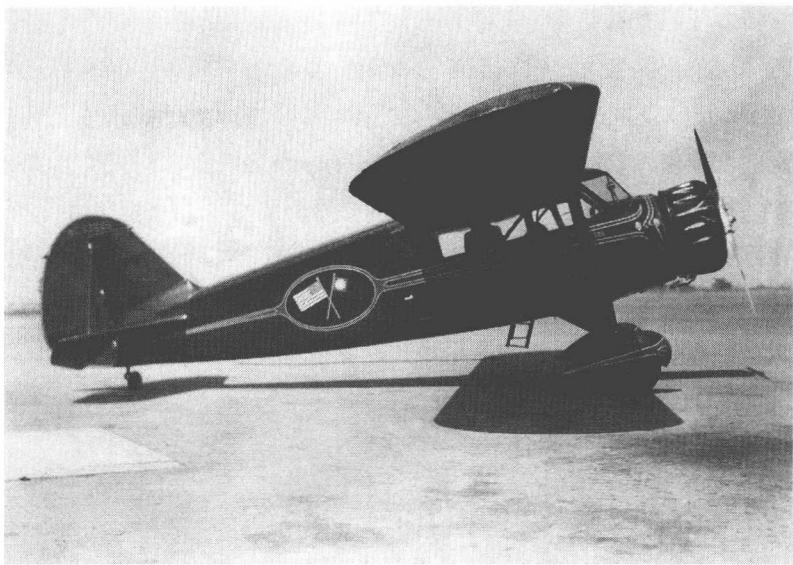
在拍完自己的戏份后，李霞卿继续她在加州的飞行募捐活动，加州低云的天气迫使她经常盲飞，尽管她非常努力地克服各种困难，保证募捐飞行按计划进行，但难免还是会遇到意想不到的情况。5月1日，李霞卿正在加州中部城市萨克拉门托的塞内特酒店（Senator Hotel）入住时，突然闻讯她的飞行伙伴颜雅清在阿拉巴马州的普拉特维镇发生飞行事故。令人不安的是，最初有关坠机的消息很简略。李霞卿非常担心朋友的安危，她给普拉特维总医院打了一个电话并留下口讯，请求主治医生发一封由收件人付款的电报到她入住的酒店，告知颜雅清的伤情。很快，李霞卿就收到了医生发来的电报，当时距事故发生还不到6个小时，医生尚未确定他的病人是否有严重内伤。

次日，李霞卿听说颜雅清的伤情并无大碍后终于松了一口气，但是这起事故给她的心理造成了一定的阴影。一个月后，当颜雅清康复并继续她的美国南部之行时（这一次她没有驾机而是乘车前往），李霞卿依然对这起事故耿耿于怀，她不停地向于斌主教的秘书打听这起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章末注 24）。李霞卿清醒地意识到，这种灾难在任何人身上都有可能发生，她希望能从颜雅清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以避免在自己的飞行中发生类似事故。不过，当她知道香港媒体误传消息后一定很闹心，由于信息闭塞，香港



李霞卿在对史汀生 Stinson SR-9B 飞机的莱康明（Lycoming）引擎进行调整。

飞天名媛
sisters of heaven



李霞卿驾驶这架史汀生竞速 Stinson Racer SR-5E (NC-13865) 飞机完成了她的环美募捐飞行之旅。

多家报纸错误地将坠机事故当事人说成是李霞卿并指她伤势严重。

当李霞卿飞抵芝加哥时，她的环美募捐飞行已近尾声，而就在这时她的座机出现机械故障。李霞卿请求飞机制造商沃尔特—比奇给她换一架新飞机，新座机型号为史汀生竞速 Stinson Racer SR-5E，李霞卿驾驶着这架飞机完成了她的环美飞行之旅。出于形象宣传的需要，李霞卿安排将这架飞机漆成了旧机的颜色，并也以“新中国精神号”冠名（章末注 25）。像上次一样，李霞卿用她的珠宝首饰做抵押借得这架飞机，另外，她还为这架新座机购买了一份价值 115 美元的保险。竞速机属老款机型，其发动机性能和飞行距离都不如瑞连特机，不过此时李霞卿已快飞抵东海岸，各大城市之间的飞行距离要比以前短得多。于斌主教的办公室根据情况的变化适时调整了李霞卿的行程安排。

不知不觉中，李霞卿很快就要结束行程回到始发地纽约了。6 月 15 日，李霞卿在匹兹堡开展募捐活动，根据行程安排，她将于当天飞回纽约，但是天公不作美。看来她的胜利返航不得不推迟了。她先是飞抵费城等待天气好转，不过意想不到的，天空突然

放晴，气温骤然上升。李霞卿跳上飞机，完成了最后的旅程。飞抵纽约纽华克机场时，纽约国际妇女航空协会（Women'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eronautics）的中美两国会员代表为她举办了一个特别的欢迎仪式。随后，李霞卿继续飞往纽华克以西 20 英里远的法拉盛机场（Flushing Airport），也就是她的终点站。当座机轻轻降落在停机坪上时，中国驻纽约总领事于焯吉一行已在现场迎候，庆祝她此次环美募捐飞行之旅圆满结束。这次长途飞行历时 3 个月，安全飞行近 1 万英里，共为中国难民筹集到美金 1 万元，中国法币 2 万元。

当李霞卿的座机停稳在停机坪上时，总领事于焯吉上前伸出一只手扶她步出机舱。只见李霞卿穿着那件标志性的白色鲨鱼皮呢飞行服，发际间别着两朵洁白的鲜花，显得格外清雅，佳人巧笑倩兮，摆出姿势供媒体拍照。前来迎接李霞卿“归家”的还有于斌主教和她的飞行伙伴颜雅清，这两人比其他任何人都清楚李霞卿圆满完成此次环美募捐飞行之旅的成就和意义。



1939 年，李霞卿结束环美飞行，中国驻纽约总领事于焯吉博士前来接机表示祝贺。

回到纽约后，李霞卿又马不停蹄地办了一些琐碎的事情。她参观了在该市举办的第 20 届世博会，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最后一次博览会。李霞卿向这届组委会主席赠送了一份象征中美友谊的签名卷轴。那不是一本普通的签名簿，而是李霞卿环美万里飞行的见证，卷轴上绘有中美两国国旗，上面是李霞卿北美之行所到各地参议员、市长和官方代表的密密麻麻的签名。而世博会主办方认

可李霞卿环美募捐飞行的非凡之举，同时也为感激她向大会赠送了一份不同寻常的礼物，特将她列为世博会嘉宾。

数日后，李霞卿再一次现身世博会，这一次她以个人身份陪同老友许肇堆博士前来参观。许肇堆为纽约著名华人医生，美国医药援华会（ABMAC）创始人之一，该机构在百老汇有多处办事处。由于正值抗日战争，国民政府无暇顾及世博会筹备工作而放弃参展，



李霞卿的宣传照。

不过在各方的赞助支持下，一座富有中国特色的喇嘛庙建了起来。李霞卿和许肇堆博士参观了这座有着翘起飞檐和大量红色梁柱的气势恢宏的寺庙。

许肇堆坦承，邀请朋友李霞卿参观世博会并非散散心那么简单。他可是“别有用心”，他想借此机会询问李霞卿是否有兴趣再作一次募捐飞行，这一次是以美国医药援华会的名义。由于环美万里飞行取得巨大成功，李霞卿备受鼓舞，因此她对这一提议表现出极大兴趣。美国医药援华会的工作富有成效，其影响越来越大（该组织当时正与中国红十字会合作，而红十字会是李霞卿最热衷的人道主义社会救助团体，淞沪抗战爆发后，她曾在上海梵皇渡路主持红十字会第24急救站的工作），不过她指出，刚刚结束的环美万里行几乎飞遍了美国的各大城市，“捐款疲劳”会影响再次募捐的效果。不过，既是许肇堆博士提出了这个想法，深以民族大义为重的李霞卿又怎能置之度外呢？

同时，为了继续扩大环美募捐飞行的影响，提高媒体曝光率，李霞卿对所有公开露面和演讲的请求一概有求必应。9月份，李霞卿随同中国驻美大使馆武官郭泰川中校及飞行伙伴颜雅清出席了在

克里夫兰机场举行的全美最著名的航空展——国家航空赛。正是在这次航空展上李霞卿见到了美国传奇女飞行家路易斯·萨顿（Louise Thaden），萨顿有句名言，“女人比男人天生更适合开飞机”。回到纽约后，李霞卿出席了国际妇女航空协会（李霞卿为该协会会员）为庆祝她环美募捐飞行大获成功而举办的舞会兼招待会，活动地点在纽约布鲁克林的博塞特酒店（Hotel Bossert）的屋顶舞厅。9月底，为救济中国难民，李霞卿与颜雅清及其他纽约社



1940年10月，李霞卿与几位美国著名女影星出席好莱坞的一次慈善活动，左起：李霞卿、罗莎琳德·拉塞尔（Rosalind Russell）、简·威瑟斯（Jane Withers）、玛丽·碧克馥（Mary Pickford）。

交名流一道共同组织了一场时装秀活动，该时装秀为一碗饭筹款运动的组成部分，李霞卿在时装秀中客串模特。李霞卿在时装秀中身着多款中国传统服饰亮相，另外还有一套由旅居纽约的上海著名时装设计师张倩英专门为她设计的飞行服，李霞卿和张倩英是旧交，早年在上海相识。在现存的有关这次时装秀的照片中，有一张是李霞卿的特写，照片中，她身着张倩英设计的晚装，立在一尊观音雕像旁，端庄典雅（章末注26）。

11月时，派拉蒙影业公司拍摄的《歧路》开始在全美上映，之前，李霞卿的各种宣传照频频出现在美国的各大媒体上。这些照片与李霞卿之前那些身着飞行服、步出机舱的照片截然不同。英国著名电影杂志《电影娱乐》（*Film Fun*）曾刊登一帧李霞卿的宣传照，《电影娱乐》专门靠登载热门女影星性感照片来取悦观众，照片中，李霞卿穿上了美国女影星多萝西·拉莫尔标志性的马来莎笼裙，这条超短裙尽显李霞卿的娇美身材，再配上她娴静雅致的微笑，更显得千姿百媚。



在一帧派拉蒙影业的宣传照中，李霞卿与美国女星多萝西·拉莫尔^①（Dorothy Lamour）合影，照片中拉莫尔穿上了李霞卿最爱的旗袍，而李换上了拉莫尔的标志性服装——马来莎笼裙 [刊于英国著名电影杂志《电影娱乐》（*Film Fun*），1939年11月]。

12月，李霞卿回顾了自己的环美募捐飞行之旅。在这一年，她共飞访美国42个州，募集捐款数十万美元。圣诞节时，李霞卿为自己庆祝了一番。她感念那些给予她无私帮助的热心人士，特别是美国著名女飞行家杰奎琳·科克兰，由于她的斡旋，确保了此次环美万里飞行所必需的座机“新中国精神号”及时到位，此外，科克兰女士还运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动员了美国一大批社会名流对这次募捐飞行予以了赞助和支持。



好莱坞影片《歧路》（*Disputed Passage*）^②宣传照——身着马来莎笼裙的李霞卿。

① 多萝西·拉莫尔（Dorothy Lamour，1914—1996），1931年选美获得“新奥尔良小姐”称号，1936年登上银幕，因为异国情调而成为知名影星，多萝西在影片中常穿马来莎笼裙而被称为“莎笼裙女郎”（*The Sarong Girl*）。——译注

② 《歧路》（*Disputed Passage*），派拉蒙影业公司1939年出品的一部以中国抗日战争为背景的影片，片中李霞卿饰演一位中国女飞行员，驾驶着有青天白日标志的飞机协助美国军方。——译注

李霞卿环美万里飞行的成就令人瞩目，在美国，莫说女飞行员，就连男飞行员也没有几个能与其项背。如果曾经有什么人认为李霞卿根本不可能完成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飞行任务，那么铁的事实已经证明，他们大错特错了。

注释

1 在遭到日机袭击后，“桂林号”飞行员驾机安全迫降于珠江，飞机一半停在江岸上，一半落在江水中，飞机开始下沉，飞行员命令机上的乘客马上逃离。虽然机上乘客安全逃离飞机，但仍遭到日机的疯狂扫射。据说，日本人之所以对这架飞机不惜施行此种残暴手段，是因为日本人打听到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将乘坐这架飞机。日军一直蓄意加害中国抗日要人，视时任立法院长的孙科为眼中钉，密谋除之。但实际上，孙科因故临时改乘另一航班而幸免于难。

2 与李霞卿同机的有英国空军大使馆专员、中国航空公司组织经理威廉·L·邦德（William L. Bond，人称邦迪‘Bondy’）的夫人凯瑟琳·邦德。她准备前往首都华盛顿看望一岁半的儿子。

3 几场台风在太平洋地区造成严重破坏，从而让这次飞行变得复杂难测。在关岛，李霞卿和同机的乘客们不得不改乘“菲律宾飞剪号”，继续前往加州阿拉梅达（Alameda）的行程。“菲律宾飞剪号”此前也遇到不少问题。在抵达关岛约400英里左右时，它的一个发动机失灵，这一突如其来的事故使飞机猛地跌向海面。机长A. E. 拉波特（A. E. Laporte）很快控制了形势，凭借剩下的三个发动机继续前行。“菲律宾飞剪号”在关岛检修了一周之久才再次搭载乘客。

4 这些介绍信包括香港汇丰银行总裁、飞机经销代表威廉·D. 波利（William D. Pawley）为她写的一封介绍信，一封致美国柯蒂斯—莱特出口公司总裁J. S. 阿拉德（J. S. Allard）的介绍信。李霞卿打算抵美之后拜访阿拉德，如有必要，将向他租借一架飞机。

5 李霞卿也向黄柳霜给予她的支持表示感谢。“你一直鼓励我在航空事业方面做些事情，”李霞卿在同一封信中写道，“并且你一如既往地支持我，我准备接受你的好建议，这次是为了我们祖国的事业。”显然，李霞卿将生长在洛杉矶的黄柳霜视为同胞。1938年9月6日李霞卿于香港九龙

致加州洛杉矶黄柳霜的信。李霞卿家人收藏。

6 李霞卿随身携带的珠宝首饰中有一件未估价，那是她父亲送给她的一条项链。它曾是一位印度王公的收藏品，链子的吊坠是一枚鸽子蛋大小的红宝石。战争期间，李霞卿无法归国，便抵押了这条项链，靠所得的钱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度日。后来这条项链被一家博物馆收藏。郑柏士，2005年3月2日本书作者采访记录。

7 “Men and Events: Miss Lee Ya-ching, Chinese aviatrix...” *China Weekly Review*, December 3, 1938. 但是，此次洛杉矶之行的驾驶员并非李霞卿，而是著名的加州飞行家、巡回演说家哈里·山姆（Harry Sham）。

8 “Robinsons Fete Visitor,” *LA Times*, December 4, 1938.

9 17世纪的中国公主米拉（Mirrah）（她很可能是中印混血儿或印度人，也可能并非皇室出身）被海盗劫持到马尼拉，并被当做奴隶卖给一个名叫米古尔·德·索萨（Miguel de Sosa）的船长。1622年左右，索萨将米拉带到墨西哥的普埃布拉（Puebla）侍奉他。主人索萨死后，米拉成了一位神父的仆人。随后米拉皈依了基督教并取名卡特丽娜（Catarina）。作为一名极其虔诚的女教徒，卡特丽娜不仅思想圣洁，还屡创奇迹。民间流传许多有关她的传说。卡特丽娜被认为是墨西哥“中国小女孩”（La China poblana）服装的灵感来源（卡特丽娜到墨西哥时只有十一二岁，她非常执着地一直穿她漂亮的衣服，并且自己动手用各种颜色的布缝制美丽的衣裳。她那五颜六色的服装被那些没见过世面的当地人当做是中国服装，所以都叫她“中国小女孩”（La China Poblana，普埃布拉的女人们也都模仿她，于是这种服装就流行起来——译注），也是墨西哥国旗、墨西哥帽子舞等其他民族标志的灵感来源。

10 杰奎琳·科克兰1965年8月23日于加州印第奥致亚利桑那州图森的比阿特丽斯·艾德格利（Beatrice Edgerly）的信，打印并付签名件。德州艾柏林（Abilene）艾森豪威尔图书馆，1932—1975一般文件卷宗之杰奎琳·科克兰文件档案。令李霞卿高兴的是，科克兰驾驶的这架飞机时速高达220英里。Helen Worden, “Hong Kong Girl Here Plans Flights Across US to Solicit Funds to Aid War Victims in China,” *New York Herald-Tribune*, March 18, 1939.

11 1946年，教宗庇护十二世（Pope Pius XII）任命于斌为南京总教区总主教，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于斌遵照梵蒂冈的命令，离开

南京前往美国，后到了台湾。由于于斌反对共产主义而被中共视为眼中钉，后被中共缺席判处死刑。1969年，教宗保罗六世（Pope Paul VI）任命其为第二位华人枢机。1978年8月，教宗保罗六世逝世，全世界的枢机都前往梵蒂冈参加丧礼并选举新教宗，于斌也是有资格当选为教宗的115名枢机之一。8月16日，于斌在梵蒂冈酒店房间里因心脏病猝发去世，未能参加新任教宗的正式选举。而新教宗约翰·保罗一世（John Paul I）也在继任仅33天后去世。关于新教宗之死谣言甚多，其突然去世颇为离奇，特别是死亡细节自相矛盾，数名意大利要人被相继暗杀之后，谣言更是尘嚣日上。有鉴于此，于斌之死被重提，虽然他被谋害之说频传，但始终未获官方证实。

12 这架史汀生飞机的注册号码为NC-17174，序列号#5155。该机配备一个245马力的莱卡明引擎，其飞行里程达610英里，是李霞卿开始环美长途飞行的理想之选。然而，她未能驾驶这架飞机完成环美飞行之旅。6月初，距环美飞行结束还有仅3周之时，因为飞机机械故障她不得不从飞机制造商沃尔特一比奇那里改换另一架飞机——史汀生竞速Stinson Racer SR-5E型飞机，并驾驶着这架飞机完成了她的美国万里飞行之旅。该机型号较旧，价格比之前那架史汀生便宜，飞行里程也较短。而这一次，李霞卿又是以自己的珠宝首饰作抵押换取这架飞机的使用权。

13 Helen Worden, "Hong Kong Girl Here Plans Flights Across US to Solicit Funds to Aid War Victims in China," *New York Herald-Tribune*, March 18, 1939.

14 O. Kathleen Kohan, "Flying Emissary," *Far East*. Vol. 3, no. 3 (March 1940); Nina Varian, "Pretty Chinese Flyer Wins Boiseans' Hearts," *Idaho Statesman*, May 23, 1939. 李霞卿提供的身高资料为5英尺4英寸。

15 "Chinese Woman Flyer Here," *Los Angeles Times*, April 20, 1939; "Petite Chinese Girl Flyer Reaches City," *Vancouver News-Herald*, May 12, 1939; Ruth Taunton, "China Girl Flier Arrives Here to Plead for Aid Against Japanese," *San Diego Union*, April 17, 1939; Nina Varian, "Pretty Chinese Flyer Wins Boiseans' Hearts," *Idaho Statesman*, May 23, 1939.

16 Nina Varian, "Pretty Chinese Flyer Wins Boiseans' Hearts," *Idaho Statesman*, May 23, 1939.

17 "Dainty Chinese Aviatrix Seeks Aid for China," *Vancouver Sun*, May 12, 1939.

18 Robert Reeds, "Pretty Chinese Girl Flier Likes All men—To Look At," *Toronto Daily Star*, March 25, 1939.

19 同 16。

20 西德尼·李 (Sidney Li) 1939 年 3 月 30 日于首都华盛顿致时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李霞卿的信，由于斌总主教私人秘书西德尼·李打印并签名，该信由李霞卿家人收藏。

21 5 月 6 日，当李霞卿飞抵俄勒冈州波特兰市时，美籍华裔女飞行家李凤麟到机场迎接，并向她表达衷心的祝愿，希望有一天两人能有机会一同翱翔蓝天。1939 年 5 月 11 日李凤麟于俄勒冈州波特兰市致李霞卿（当时所在地址不详）的信，李凤麟手稿，李霞卿家人收藏。

22 "Aviatrix Appeals to Salt Lake to Aid Chinese War Refugees," *Salt Lake Tribune*, May 24, 1939.

23 李霞卿在好莱坞影片《歧路》 (*Disputed Passage*) 中首次出演特技飞行员令人印象深刻。她扮演的这一角色自然要求她驾驶飞机，为此，她要在一个四面环山的小牧场上驾机拍摄。该牧场只有 800 英尺长、300 英尺宽，容不得半点纰漏。拍摄期间，李霞卿就在这块简易机场上起飞降落。虽然该拍摄地远未达到“落地起飞”的理想条件，但李霞卿并无怨言。开拍时，她娴熟地完成了任务，仅拍了 3 条便过关。

24 于斌总主教的私人秘书西德尼·李 (Sidney Li) 1939 年 5 月 31 日于首都华盛顿致时在芝加哥的李霞卿的信，西德尼·李手稿，李霞卿家人收藏。李秘书在信的一开头写道，“很抱歉，昨晚在电话里我没能告诉你颜小姐在阿拉巴马州发生飞行事故的确切原因，因为这个说来话长，几句话也讲不清楚……”

25 该机注册号为 NC13865，序列号为 9239A，参见 arefiles.com。

26 1938 年 10 月 7 日，就在李霞卿离港赴美的前一周，她作为模特客串了一次公众活动。她与其他社交名媛一道，出席了香港妇女国民救济会 (Hong Kong Women's National Relief Association) 在香港酒店举行的这次时装表演。表演按照年代顺序依次展示中国历朝历代服装，而李霞卿代表未来的装束成为当天全场的焦点。“当女飞行家李霞卿小姐身着一袭时尚新潮的礼服出现在舞台上时，当晚的气氛达到了最高潮。她穿着一件带有龙凤图案设计的勾勒身材的棕色礼服出场，艳惊四座。” Rosette, "Gorgeous Gowns Seen in Mannequin Parade," *Hong Kong Daily Press*, October 8, 1938.

20. 南美募捐之旅

1940年2月农历龙年，李霞卿制订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传统中国文化中的龙，祥云吐瑞，生机勃勃，而在中国历法中，龙年也被认为是最吉星高照、事得其成的年份。在征得了宋美龄夫人的同意后，李霞卿对外宣布，她将开始另外一场跨国募捐飞行之旅，这比上一次的环美万里行更富挑战性。这一次，李霞卿将以美国医药援华会（ABMAC）的名义赴南美洲各国进行宣传募捐。这次南美行计划飞抵16个城市，包括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海的主要城市和地区。（章末注1）

美国医药援华会由纽约著名华人医生许肇堆博士发起并担任会长，ABMAC为美国援华联合会（UCR）的团体会员，而UCR的名誉会长由权倾一时的宋美龄夫人担任。由于蒋夫人的参与，美国的对华援助开展得十分有效。抗战爆发后，宋美龄在全国建立了保育院体系，收容了数万名孤儿和难童，其胞姐宋庆龄也积极投身救助难童的事业，以其创办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名义，发动社会各界挽救这难民中的最弱势的群体。为捐助抗战，收容难童，美国援华联合会需要大笔资金。宋美龄曾给纽约美国援华联合会去过一份言简意赅的电报，其言辞之忧虑和恳切溢于言表：“难童营养不良，夜盲症、软骨病和贫血症等病症因此频发。”（章末注2）

李霞卿深知此次长达三个多月的南美飞行之旅成本高昂，期间她的食宿是一笔不小的费用，而飞机燃油更不必说。但是，南美洲是一块广袤的、还未开展抗战募捐活动的地区，李霞卿深信一定会

不虚此行。9年前，李霞卿的姑奶奶徐宗汉为了筹措贫儿教养院的经费，不顾自己体弱多病，远涉重洋，赴南美大陆向华侨募捐。当时徐宗汉的募捐活动取得巨大成功也是因为较之北美，南美大陆相对封闭，民众的募捐热情更为高涨。徐宗汉早就知道，踏上那块土地，向那里的热心民众求助，不会没有收获的。而现在，李霞卿相信自己也能像姑奶奶那样大获成功。

李霞卿说服慈善家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德·惠特尼（Cornelius Vanderbilt Whitney）将其座机比奇 Beechcraft Staggerwing C17R（NC-15833）双翼机借给她作为此次环飞南美之用。这架比奇公司出产的5座双翼机时速达200英里，其莱特发动机马力强劲，达到傲人的450匹，此外，飞机上还配备了氧气，以备飞越安第斯山脉时之用。该座机漆涂成黑底红边，李霞卿给其取西班牙名为“Estrella China”，意为“中国之星”。像往常一样，李霞卿向媒体宣布了她的宏伟飞行计划。一位采访她的记者对一个中国女子能够成为飞行员深表诧异，对此，李霞卿回应道：

“中国的女飞行员的确凤毛麟角，但是，作为中国空军的创建者，我们的第一夫人蒋夫人在抗战之初就担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一职……虽说她本人并不是飞行员，”李霞卿继续说道，“她将女性的印记铭刻在了中国航空史上。”

当这位记者追问李霞卿为何其家人不阻止她的这种危险之举时，李霞卿答道：

“……家父非常开明。事实上，正是他鼓励我学习并投身飞行。他是一位航空迷，他没有儿子，所以从小家父就把我当成男孩来养，并且让我成了一位飞行员。家父是那种认为女孩可以像男孩那样聪明有出息的人。”（章末注3）

为制造舆论，李霞卿像上次环美募捐飞行一样，摆出姿势供媒体拍照。一位娇美的弱女子，一次看似不可能完成的远征，李霞卿正是用这种鲜明的反差来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在媒体刊登的照片中，只见李霞卿倚坐在比奇双翼机的低翼上，双腿端庄地交叉着，一件价格不菲的皮外套裹不住她的曼妙身材，面对一众媒体，李霞

卿优雅地挥手致意，她看上去是那样娇小，那样柔媚，然而对于即将到来的冒险之旅，她却显得是那样淡定，那样从容。在公开见报的照片中，有一张用洋泾浜英语加注了这样的标题：“子曰：女子飞行则丧命者寡。”虽然这句杜撰之辞显得颇为拙劣，但是却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巾帼不让须眉，其振翅蓝天勇气可嘉。

李霞卿确实胆识过人。她从不莽撞行事，而是不惜花时间和精力将行程安排得妥妥当当。她喜欢挑战，越是惊险刺激的事情，越能激发她的高昂斗志。虽然她选择的线路远离容易迷途的亚马逊丛林（根据计划，李霞卿基本上沿着南美的海岸线飞行），但是她要飞越一个对她来说完全陌生的大陆，一个她不熟悉的语言环境（南美大陆主要通行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另外，李霞卿对南美航空设施的整体网络及分布情况知之甚少，这与她对美国的情况了如指掌不可同日而语。还有就是，这次的行程很紧，点与点之间停歇的时间很少，可以说，飞机基本上一直处于飞行状态。虽然环飞南美的时间是在秋季，但是靠近赤道的那些国家和地区一年四季都是夏季，湿热的天气不利飞行。

然而，李霞卿一如既往，做好了迎接各种挑战的准备。她记得，正是在四年前，她在国内独自驾机进行第一次长途飞行考察时，就曾见识过那种所谓的简易跑道，跑道极其简陋，连最基本的航空设施也没有，简直就比牧场好不了多少。但是即便如此，李霞卿依然应对自如，沉着冷静、英勇果敢助她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面对困境，她坚信自己能行。而她在美国波音飞行学校接受的严格的飞行训练也让她有信心应对可能出现的最为棘手的机械故障问题（要知道，她这次从大富豪那里借来的高性能比奇双翼机依然存在一些让人不满意的地方）。（章末注4）

在南美之行开始前，李霞卿向有关方面索要了一批她即将飞抵地区的大比例高清导航图，并且做足了功课。如今，这些导航图作为遗物保存在李霞卿的私人文件中，这也是她现存下来的仅有的航空影像数据资料，看着这些导航图，不禁让人遥想半个多世纪前这位英勇无畏的中国女子在南美大陆所进行的冒险旅程。

飞天名媛
sisters of heaven

1940年3月12日，李霞卿从纽约罗斯福空军基地起飞，飞往古巴首都哈瓦那，她的环飞南美行将从那里开始。（章末注5）四天后，李霞卿离开古巴飞回美国佛罗里达州东南部港市迈阿密，之后又飞往得克萨斯州与墨西哥交界的港市布朗斯维尔（Brownsville）。根据行程安排，李霞卿将从布朗斯维尔往南飞抵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然后飞越中美洲和运河区，继而飞往南美洲西海岸。此飞行途中，李霞卿不仅要在利马和圣地亚哥等南美大都市作停留，而且还会飞抵一些中等城市。随后，她将往东飞越安第斯山脉飞抵布宜诺斯艾利斯和里约热内卢，紧接着折回西海岸，再调头往北飞抵南美北部的哥伦比亚及委内瑞拉等国。之后，李霞卿将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往北经西印度群岛飞回迈阿密。这次远征将历时三个多月。

若说李霞卿的这一飞行壮举在南美人民当中引起轰动还只是最保守的说法。李霞卿所到之处无不掀起一阵狂潮，她在南美的轰动效应可从秘鲁之行窥见一斑。在秘鲁，她驾驶一架军用飞机进行了长达1小时的飞行表演，这在秘鲁航空史上前所未有的，她的精湛演技引起极大轰动，募捐活动取得巨大成功，创下了单次表演募得4万美元的辉煌纪录。秘鲁政府特授予李霞卿一枚航空金质奖章，并由航空部长亲自为其佩戴。（章末注6）

遗憾的是，李霞卿为期百日的南美大陆募捐活动共募集款项并未留下记录。但是从秘鲁飞行1小时募得4万美元的骄人成绩来看，这个数目一定十分可观（章末注7）。美国医药援华会所倡导的“人性至上”显然在南美人民心中激起了强烈的共鸣，但是，李霞卿的个人魅力以及她对这次募捐活动的倾情奉献同样值得大书特书。在环飞南美的那段日子里，李霞卿白天奔波于各地，忙于飞行表演，进行抗战宣传，而到了晚上，她还要频频出席各种晚宴酒会，尽情展现其个人魅力，为抗战募捐争取更多的社会舆论支持。出席晚宴酒会等公开活动时，李霞卿总是一身优雅的装束，一袭真丝旗袍，外罩一件时尚的毛披肩，闪亮的首饰更映衬出李霞卿的端庄秀丽。在各种社交场合，李霞卿显得应对自如，游刃有余，面对



1940年南美洲募捐飞行期间，李霞卿在利马举行的一次晚会上受到了秘鲁总统曼努埃尔·普拉多·乌加特切（Manuel Prado y Ugarteche）的亲切接见。

所到各国的社会名流和高官权贵，她不卑不亢，相反倒是后者为她的花颜月貌而倾倒。像上次一样，李霞卿本人并不收受捐款，而是由捐款人直接将钱款汇到美国医药援华会在纽约的办事处。

正如在上一年环美万里行中的一样，李霞卿在南美各国受到了各援华机构的热烈欢迎，抗战爆发以来，各种援华机构在南美大陆相继成立。如果说大都市援华机构的拥戴在情理之中，那么诸多毫不起眼、人口稀少的中国社区也掀起李霞卿热倒是有些始料不及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加勒比海地区，李霞卿结识了一些华人，他们是蔗农的后代，一个世纪前，他们的祖先迫于生计漂洋过海来到这里，在蔗园被奴役，受尽压榨和欺凌。在这一地区，李霞卿还见到了不少华裔新移民后代。（章末注8）

1940年7月，李霞卿完成南美募捐飞行之旅回到纽约。此次环飞南美大陆载入飞行日志的里程至少共18000英里，安全抵达南美14个国家中的9个，这其中还不包括中美洲的大部分国家以及3个加勒比海岛国。虽然这次南美行大获成功，其飞行里程几乎是环美万里行的两倍，但是李霞卿还是觉得美中不足。一些城市，特别是南美东北部的一些城市未能飞抵，让追求完美的李霞卿感觉好像遗漏了什么，让她心存不安，始终有种此行未竟完成之感。正因为如此，大约四年后，李霞卿再次踏上南美这块土地，飞访了第一次未

到达的地区，以了心愿。她的再度回访问接证实了第一次南美行取得了经济上的巨大成功。

是什么驱使着李霞卿不顾个人安危，冒着生命危险进行这种几近疯狂的长途飞行？她仅仅是为了唤醒更多民众对中国被蹂躏的关注和同情？当然这是她的初衷所在，但是也许还另有动机。除了满腔爱国之情，李霞卿也很喜欢冒险，而这种长途飞行跋涉正好将这两者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1940年3月，也就是南美之行开始前，美国《远东》杂志记者对她进行专访，问她驾机单独远飞陌生的地区是否是冒险的问题，李霞卿回答道：

“面对侵略，为了拯救中国于水火，我们必须忍受更苦难的考验。而这本身就是一种冒险。”（章末注9）

“冒险”是个关键词，它道出了李霞卿万里飞行的原因：这种冒险之旅对于一个无所畏惧的人来说有着巨大的诱惑力。不过，除了她一心报效国家以及追求惊险刺激外，她热衷这种挑战也许另有隐情。婚姻触礁、子女离散所带给她的心理创痛触发了李霞卿的一种潜意识需要，那就是她希望通过此举来向世人，包括她的前夫郑白峰，证明她的价值。

在南美期间，李霞卿参演的电影《歧路》终于在香港上映，虽然她在剧中戏份不多，其名字也因此排在演员表的底部，毫不起眼，但是当地媒体还是借机对她进行了一番炒作。9月底，该影片在上海丽都大戏院公映。当时仍留在沪上的李霞卿的亲朋好友争相到戏院一睹为快，欣赏李霞卿与那些美国影星同场竞艳。

1940年10月6日，李霞卿与好友、华裔好莱坞女影星黄柳霜参与组织了在好莱坞举办的某慈善活动。这次为美国援华联合会举办的慈善活动由女影星罗莎琳德·拉塞尔（Rosalind Russell）召集，地点在贝弗利山庄传奇巨星玛丽·碧克馥（Mary Pickford）的豪宅 Pickfair 举行，这位美国默片时代最受欢迎的女演员慷慨地将其豪宅出借给此次活动之用。居住在贝弗利山庄的明星们悉数到场，包括黄柳霜以及多萝西·拉莫尔在内的众多靓丽的女影星，黄



李霞卿在飞行之余，依然喜爱穿着旗袍。

柳霜和拉莫尔身着旗袍，为来宾们表演走秀。这次慈善活动的发起者还鼓动所有来宾带上礼物和收藏的珍贵小物件，这些东西在活动上进行抽彩出售，所得款项全部捐给美国援华联合会，作为救济抗战难童之用。明星们还在一本留言簿上留言，纷纷对中国的抗战事业表示鼓励和支持，李霞卿允诺把这本留言簿呈交给蒋夫人。

一个月后，李霞卿和黄柳霜参与组织了另一场慈善活动，这一次是为美国医药援华会募集捐款。两人共赴纽约，参加了在位于曼哈顿中心的华尔道夫饭店（Waldorf Astoria Hotel）举行的一碗饭运动年度庆祝活动。两人在庆祝活动中同场亮相表演。1940年12月2日，李霞卿出席了在康涅狄格州首府哈特福德（Hartford）举办的美国医药援华会募捐活动。在这次活动上，李霞卿将英国著名小说家、社会学家赫伯特·乔治·韦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时间机器》（*The Time Machine*）、《星际战争》（*War of the Worlds*）的作者，介绍给了现场的一位威尔斯的粉丝。李霞卿的到场为此次活动增色不少，不少来宾对这位最近飞越了西半球大多数地方的女飞行家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和好奇。

李霞卿觉得撰写一部自传的时机已到。尽管她只有27岁，但是她所经历的人生非比寻常，堪称传奇，她预料美国公众会对她的故事感兴趣。出书这件事引发的新闻效应自然也会让美国民众更多地关注和了解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抗战，而且李霞卿也愿意将出书挣的钱捐给难民同胞。她委托曾在上海担任驻华记者的埃尔西·麦考密克·唐恩（Elsie McCormick Dunn）为她立传，后

者悄无声息地着手此事（章末注10）。在收集有关自己的各种资料方面，李霞卿是个名副其实的囤积狂，无论东西有用没用，她都喜欢收藏起来。她曾经费尽心机地把募捐飞行过程中发生的大事分门别类地记下来，这些资料无疑对传记作者颇有价值。李霞卿收藏有好几箱个人物件，内有用作名片派发的印有照片的小卡片、各个时期的照片、与亲朋往来的信件、杂志访谈文章、机票，甚至那种粘贴在花束上的小小的心意卡她都保留着。李霞卿还专门聘请了一家从事剪报工作的机构，收集有关她募捐飞行的所有新闻报道。麦考密克·唐恩夫人对李霞卿做了几次访谈后，开始着手著书立传并很快拿出了一份初稿。

注释

1 在一份日期为1941年2月12日的讨论中国各紧急救援机构在美开展募捐活动的资料中，介绍了美国医药援华会（ABMAC）的情况：

“美国医药援华会由华人科学家许肇堆博士所创立，他将一半的精力都投入到该会的工作中。医药援华会董事会成员主要由美国医学界的名人组成。许博士积极开展筹款活动，所有活动都由他亲自操作，没有雇请人员组织筹款，所有活动参与者均为志愿者。许博士筹款的主要方式所谓的‘一碗饭运动’，这是在全美各大酒店和俱乐部举行的社会募捐活动。”

“小西奥多·罗斯福任医药援华会董事。据称，医药援华会与重庆国民政府有着半官方的联系，前者将所募集到的资金用来购买中国所需的医疗设备和药品，并通过滇缅公路将这些抗战物资运往重庆和其他地区。医药援华会在筹款工作上取得的成绩斐然，特别是在募集医疗设备和药品等方面卓有成效。医药援华会表示，迄今为止，他们已在过去的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里共募集了约80万美元。”

美国医药援华会公开信，打印稿，1941年2月12日；美国医药援华会，1940年12月至1941年6月有关资料；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希雷·G·马德图书馆美国援华联合会档案（United Service to China Archives, Seeley G. Mudd Libra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inceton, NJ）。

2 同上。“中国战争孤儿所需的维生素”一文，具体日期不详。

3 O. Kathleen Kohan, “Flying Emissary,” *Far East*. Vol. 3, no. 3

(March 1940).

4 美国著名女飞行员鲁丝·尼克斯 (Ruth Nichols) 表示, 在李霞卿之后, 她也借了这架高性能比奇双翼机用来开展她所倡导的空中救护服务项目, 她回忆称, 李霞卿“对这架飞机熟悉到有点不满意的程度……” Ruth Nichols, *Wings for Life: The Story of the First Lady of the Air* (New York: Lippincott Co., 1957), 273-274.

5 “李霞卿: 将作南美飞行”, 《香港华资日报》, 1940年3月27日。

6 关中人, “爱国女飞行家李霞卿” (潘仲明译), 见《中国妇女》英文月刊, 1990年7月号, 第40页。

7 美国医药援华会副会长许肇堆博士在1940年12月21日致美国援华联合会 (United China Relief) 执行副会长加塞德 (B. A. Garside) 的信中表示, 从1940年1月1日至1940年11月1日, 美国医药援华会共募集资金483255.31美元; 美国医药援华会, 1940年12月至1941年6月有关资料;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希雷·G·马德图书馆美国援华联合会档案。尽管“一碗饭运动”募集的资金占募捐总额的绝大部分, 但是估计李霞卿的南美募捐之行所筹集的善款也占了相当的比例。在美洲时, 李霞卿也积极参与“一碗饭运动”的各种筹款活动, 她的知名度和号召力显然更确保了这些活动的成功举行。

8 中国著名学者、外交家陈友仁是李霞卿的好朋友陈丕士的父亲, 他出生并在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长大, 回到中国前以律师为业。他虽然不懂中国方言, 但却在中国政界刮起了一股旋风。

9 同6。

10 埃尔西·麦考密克·唐恩 (Elsie McCormick Dunn), 美国诗人、新闻记者, 曾在上海生活过一段时间, 并撰写过几部有关中国的作品, 如《广角中国》 (*Audacious Angles on China*, 1923)、《上海宝贝日记》 (*Unexpurgated Dairy of a Shanghai Baby*, 1923), 其诙谐的文风赢得了不少读者的喜爱。为撰写李霞卿的传记, 唐恩夫人还与著名文稿代理人、组稿商巴斯勒德·弗里斯 (Barthold Fles) 签订了有关合作协议。

飞
天
名
媛
Sisters of Heaven

21. 空中救护服务队与美国援华联合会

1940年底，李霞卿为美国著名女飞行员鲁丝·尼克斯（Ruth Nichols）所推行的空中医疗救护服务运动助了一臂之力。尼克斯是美国历史上最早期的女飞行员之一，1929年8月，她参加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女子飞行比赛“首届女子飞行大赛”（First Women's Air Derby）并摘得亚军，之后，其飞行成绩一直骄人，在美声名赫赫。不过，作为贵格会（Quaker）^①信徒，尼克斯反对任何形式的战争和暴力，对苦难者怀有深切的同情。尼克斯曾在某次飞行事故中严重受伤，为了到某医院诊疗，有一次她不得不坐了很长时间的飞机，这次长途飞行让尼克斯深刻地体会到了什么是噩梦之痛。这次经历后，尼克斯决定组建一支空中医疗服务队，为伤病者提供高端、快捷的紧急救护运送服务。1940年5月，尼克斯成立了民间组织“空中救护服务队”（Relief Wings），尼克斯还成立了一个配套的募捐组织，向社会征集捐款，以确保服务队的正常运行。尼克斯的这个项目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其发展空中医疗救护服务的想法颇具现实意义，一旦美国卷入战争，空中的医疗救护就显得至关重要。尼克斯甚至还计划派遣一支分队到中国开展服务。

^① 贵格会（Quaker），又称教友派或公谊会，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教派。该派成立于17世纪，创始人乔治·福克斯，因一名早期领袖的号诫“听到上帝的话而发抖”而得名QUAKER，中文意译为“震颤者”，音译贵格会。该派反对任何形式的战争和暴力，不尊敬任何人也不要求别人尊敬自己，不起誓，主张任何人之间要像兄弟一样，主张和平主义和宗教自由。——译注

尼克斯说服慈善家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德·惠特尼将他的比奇双翼机（也就是李霞卿借来用作南美之行的那架飞机）借给空中救护服务队使用，但是尽管这位大富豪以及他人鼎力相助，到1940年冬时，空中医疗救护服务运动步履维艰，停滞不前。12月一个寒冷阴郁的日子，尼克斯和她的两位同事坐在冰冷的机库里瑟瑟发抖，正思忖着如何摆脱困境，这时“一位美丽的中国女子走了进来，只见她苗条的身材，精明干练，优雅地微笑着”。（章末注1）这位中国女子正是李霞卿。听说了尼克斯和她的空中救护服务队面临的困境，李霞卿特来施以援手，她脑子里满是新奇的主意，能够让空中医疗救护服务运动起死回生。尼克斯对这位新成员的到来满心欢喜，她曾经记述道，“她似乎带来了一股富有青春活力与自信的清新风”，显然，“这是一位绝对值得拥有的志同道合者”！（章末注2）

李霞卿的到来马上为项目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她认为，航空赛是一个绝佳的宣传推广机会，因此她建议将比奇双翼机漆涂成救护车一样的白色，然后飞赴即将开幕的迈阿密全美航空赛（Miami All-American Air Maneuvers）赛场，此举将招徕服务队亟需的免费的公众注意力。对尼克斯提出的各种疑虑，包括队员在此期间的食宿问题，李霞卿一一给出了解决方案：她认识迈阿密所有中餐馆的老板以及该市最豪华酒店的所有人，他们可提供免费的食宿安排。

最后，尼克斯和她的两位同事接受了李霞卿的建议，实际上，她们始终为李霞卿的雪中送炭心怀感激。1941年1月8日，四个女人在纽约弗洛伊德·班尼特机场登上了比奇双翼机，飞往迈阿密航空赛赛场。正如李霞卿所预料的那样，当她们驾驶着那架新涂成白色的飞机出现在赛场时，引起了全场25000名热心观众的强烈关注，她们甚至还受到了大赛嘉宾温莎公爵的接见。当天她们结交了不少新朋友，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迈阿密每日新闻报》（Miami Daily News）总编丹尼尔·马洪尼（Daniel Mahoney）。马洪尼深为李霞卿的个人魅力所倾倒，为帮助这几位勇敢的女子摆脱困

境，他向她们建议可由迈阿密的社会名流出面组织一场为空中救护服务队捐款的慈善舞会。马洪尼向她们打包票，他的报纸将负责所有的宣传造势工作，他信心满满地表示，这次舞会一定能吸引佛罗里达州那些腰缠万贯的慈善家参与并慷慨解囊。

2月7日，舞会在与迈阿密相邻的哈伦代尔（Hallandale）的科罗尼尔酒店 [Colonial Inn，这家酒店当时归美国黑帮大佬梅耶·兰斯基（Meyer Lansky）所有] 举行，这场舞会的确是一次不错的募捐良机。活动由首都的多萝西·李·沃德（Dorothy Lee Ward）夫人提供赞助，沃德夫人是迈阿密最有影响力的女人，她说服著名谐星歌手乔·路易斯（Joe E. Lewis）和苏菲·塔克（Sophie Tucker）免费出场为来宾表演助兴。舞会最后办得怎么样呢？据说“是那个季节举办的最闪亮、最成功的慈善活动之一”（章末注3）。

虽然李霞卿频频交际于那些富人中间，但她并不是一个贪图物质享受的人。

“我真的不喜欢出去应酬花钱，”她承认，“看到这里挥金如土、花天酒地，不禁让我想到祖国的同胞缺食少穿。”她坦承，如果有机会，她宁愿回到祖国。

“我渴望与他们同在，”她叹息道，“与他们同甘苦，共命运。但是家父，他非常开明，而且从一开始就是位坚定的革命者，是他从小教育我要首先想到如何报效人民而非个人的意愿。”（章末注4）

尽孝尽忠是李霞卿在美一系列冒险活动的主要动机，实际上，很早以前，李霞卿就下定决心，为了挽救民族于危难之间，为了拯救同胞于水火之中，她甘愿牺牲个人自由，不惜勇挑一切。

在李霞卿的帮助下，空中医疗救护服务项目得以顺利开展，而李霞卿也得以抽身回到了纽约。就在慈善舞会在佛罗里达举办的当天，美国援华联合会（UCR）在纽约正式成立了。之前，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发表一份备忘录，呼吁全美逾300家慈善机构团结起来。当时在全美独立运作的援华赈济机构共有八家，为响应罗斯福总统

的号召，美国《时代》杂志创办人亨利·鲁斯（Henry R. Luce）成立美国援华联合会，整合美国民间的几家支持中国抗战的救济组织，统一美国各地援华募捐活动和统一提供援华经费。一开始，整合不过是权宜之计，但是当联合劝募活动募得500万美金之时，美国援华联合会成为一个永久实体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章末注5）美国援华联合会正式成立后，李霞卿成为这家慈善机构的雇员，并一直工作到战争结束。在环美万里行期间，李霞卿遇到了成千上万热情的美国民众，她深切地感受到，美国人民对中国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热爱，但是个中原因他们未必了解。李霞卿感到自己肩负着一个特殊的使命，那就是巩固这种业已存在的情感纽带，并将之转化为对祖国切实的援助和支持。成为美国援华联合会的一员，利用这一平台更好地效力国家和人民，李霞卿甚感欣慰。

加盟美国援华联合会后，李霞卿不必像以前那样自己操持一切，她所有的公开活动都有专人负责安排。联合会演讲与娱乐部部长玛莉安·卡德瓦拉德（Marian Cadwallader）小姐负责她的日程安排。卡德瓦拉德小姐行事严谨，组织能力优秀，对部门员工的管理极其严厉。她打印出来的有关李霞卿的日程备忘，井井有条，一丝不苟，包括可能的突发事件都有列明，如遇不可控的突发事件，李霞卿也享有公众活动自主权而无需担心到下一站的行程安排以及何时何地何人来接她这些琐事。有了新工作，李霞卿安顿了下来，她在纽约第83街东25号一栋十分抢手的新大厦租了一处寓所。这栋公寓楼位于曼哈顿最富活力的住宅区上东区（Upper East Side），是纽约最早配备空调装置的公寓楼之一，距联合会设在百老汇的会址仅几英里路程。这栋公寓楼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步行可达中央公园、名牌一条街第五大道、公园大道以及麦迪逊大道等主要景点和商业区。

就在此时，埃尔西·麦考密克·唐恩已经完成了李霞卿自传的第二稿，1941年3月，唐恩宣布自传已交付出版商。不过，此事看来被搁浅，因为没有证据显示此书面世出版。也许当时出版商有意出版此书，只是推迟了出版时间，目的是将李霞卿继续开展的活动

补充进自传里，谁知这些活动看似永无休止。（章末注6）5月初，李霞卿与鲁丝·尼克斯及其同事一同飞往新墨西哥州中部大城阿尔伯克基（Albuquerque），为空中医疗救护服务项目做宣传。一周后，李霞卿帮时任美国对华急救委员会（China Emergency Relief Committee）名誉会长的美国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挑了一件旗袍，作为送给蒋夫人的礼物，李霞卿还作为模特向媒体展示这件旗袍。诸如此类高规格的活动本应写进自传里，由于李霞卿的日程一直排到了年底，她的自传也理应再作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

6月份，有关李霞卿的消息再一次见诸报端，这一次她不屑地宣称：

“日本飞行员没什么好怕的。”

接着她分析了原因。

“诚然，在编队飞行和精确飞行方面，日本飞行员是不错的，”李霞卿表示，“但是一旦我们在某个他无法直接按命令驾驶的地方截击他，他的弱点就显露无遗。”（章末注7）

李霞卿继续描述了虽然中国飞行员寡不敌众，中日飞行员人数对比仅为1:5，但是中国飞行员如何不畏强敌，在历次空战中想方设法给敌军造成更大损失之实。而李霞卿本人一直崇尚通过宣传抗日，通过向日本侵略者施加舆论压力来达到攻击敌人的目的，语言就是她的利器，而她会不失时机地擅用这一利器来攻击敌人。

1941年9月9日，李霞卿乘坐美国航空公司航班飞抵多伦多，准备在加进行募捐飞行表演，在多伦多期间，李霞卿受到了华人爱国者同盟（Chinese Patriotic League）的热烈欢迎。李霞卿此行是应加拿大红十字会的邀请，为中国难民募捐，一踏上加国的土地，她就马不停蹄地开始了工作。在派柏（Piper Cub）飞机公司飞行员杰克·吉布森（Jack Gibson）的陪同下，李霞卿驾驶着一架派柏单翼机驶离多伦多马尔顿机场，飞往安大略省汉密尔顿。在一年一度的加拿大航空巡演（Canadian Air Cruise）中，李霞卿驾驶着这架大红色的派柏机与其他39架飞机组成“V”形编队，飞往安大略省最大且最受欢迎的阿冈昆省立公园（Algonquin Park）上空，特别值

得一提的是，李霞卿驾机在编队中打头阵，轰动一时。

第二天一早，汉密尔顿航空巡演的组织者请李霞卿代表红十字会出席一系列公开活动。李霞卿当天的日程排得满满的。一大早她接受了某电台采访，之后到当地一家疗养院走访慰问，继而在华人爱国者同盟的某会议上致辞，然后对加拿大劳工联合会（Canadian Congress of Labour）与会代表发表



1941年9月，李霞卿搭乘美利坚航空公司（American Airline）的王牌飞机飞往多伦多参加红十字会的一个慈善活动，途中李霞卿对机长拉尔夫·多德森（Ralph Dodson）坦言：“我希望能飞上这种大家伙。”

演讲。当天晚上，李霞卿又转战汉密尔顿的皇宫大剧院，向观看《相遇在孟买》（*They Met in Bombay*）的影迷发表讲话，这部电影由李霞卿的熟人、好莱坞巨星克拉克·盖博和罗莎琳德·拉塞尔主演。随后，李霞卿又马不停蹄地赶往中国之友会的一场招待会，并应邀在招待会上致辞。这是漫长的一天，但是李霞卿丝毫没有疲惫之意。她对听众发表讲话说，她的飞行日志记录的飞行时间已累积约550个小时，她希望年底能够回到祖国的怀抱，能够驾驶航空医疗机或运输机为抗战效力。不过，虽然李霞卿梦想着回到祖国效力疆场，但却一直未能成行。她的战场在海外，她的使命在北美。

第二天，李霞卿搭乘加拿大国内航班回到多伦多，正好赶上参加红十字会组织的游行募捐活动，李霞卿作为嘉宾宣布活动正式开始，这次游行为中国救济基金会（China Relief Fund）共募集捐款10万美元。自李霞卿赴加以来，加国掀起了一股李霞卿热，就连安大略省省长米切尔·赫本（Mitchell Hepburn）也在这一天盛情邀请她在安省立法院发表讲话。这一天的活动到此还没有结束。晚上，

李霞卿应邀在唐人街表演了一出京剧。虽然久未登台，但是李霞卿还是同意出演。当她回到那遥远的角色中去的时候，或许她会想到她的祖母徐慕兰，想到这位革命先辈对京剧的痴迷。

“老太太非常喜欢京剧，”李霞卿深情地回忆着祖母徐慕兰尤其对情节紧张曲折的剧目情有独钟。“虽然剧目经常表演到凌晨四点钟，但是她一点没有要回家的意思，非要等到最后一个坏人被惩治才罢休。”

李霞卿透过舞台前面一排的脚灯向看台上望去，心里想着台下的观众会不会心猿意马，她的祖母有时看戏就会走神。

“她完全是根据自己的喜好来看，喜欢的她看得如痴如醉，不喜欢的她干脆做自己的事情，”李霞卿边回忆边吃吃地笑道，“幕间休息时，她会吃马蹄，和隔着几排座位的朋友大声唠嗑。戏院里人声鼎沸，小商贩的叫卖声不绝于耳，跑堂的向看客们抛递着热毛巾，当剧中的英雄人物昂首阔步走过舞台上，铙钹声骤然而起，就是在这异常的喧闹嘈杂中，祖母却能酣然入睡。”（章末注8）

不过，当李霞卿表演时，观众们个个精神饱满，毫无倦意。多伦多的唐人街因为李霞卿的到来而欢欣雀跃（章末注9）。

两三天后，在加拿大之行结束前，李霞卿参观了位于该市曼宁补给站（Manning Depot）的空军基地，观看了在那里举行的体育活动、空军部队补给以及为表示对中国抗战支持的升旗仪式。在为期5天的加拿大之行中，李霞卿不畏劳苦，为救济同胞奔走呼号，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无愧“亲善大使”这一美誉。虽然她是为了抗战事业而赴加，虽然她在此行中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但是当她拖着疲惫的身体乘坐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Canadian Pacific Airlines）航班回到纽约，通过拉瓜迪亚（La Guardia）海关时，她一定为美国向所有入境的中国公民征收8美元人头税这一歧视性做法而感到愤愤不平（章末注10）。

李霞卿回到了位于曼哈顿上东区的寓所，终于有机会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但是仅仅四天后，她又回到了工作岗位。铁面无私的卡德瓦拉德小姐给她安排了新的工作任务，这一次是代表美国援华联

合会赴美国东部进行募捐活动。就像一匹听从军号召唤的战马，李霞卿欣然受命，在这次漫长的东部之行中，她走访了俄亥俄、纽约、密歇根等三个州，足迹到达辛辛那提、克里夫兰、水牛城、罗彻斯特、锡拉丘兹（Syracuse）、奥尔巴尼（Albany）、本迪克斯（Bendix）等市。行程结束时，李霞卿从本迪克斯搭乘国内航班回到纽约拉瓜迪亚机场，在机场，李霞卿受到了众星捧月般的热烈欢迎，中国之友会的头面人物，包括纽约州州长赫伯特·亨利·雷曼（Hebert H. Lehman）、被誉为美国戏剧界第一夫人的著名女影星海伦·海斯（Helen Hayes）以及慈善家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三世（John D. Rockefeller III）皆前往机场迎接。置身于这些名流政要中间，李霞卿依旧是最抢镜的，这并不出奇，只见她又一次绽放迷人的笑容，星味十足地面对众媒体的闪光灯。

虽然这一年李霞卿基本上以乘客身份搭乘各商业航班前往各地进行募捐活动，但是很快，她又重掌飞机操纵杆跃上蓝天，埃隆卡



1941年9月，李霞卿驾驶美国援华联合会（United China Relief）的埃隆卡超级首领 Aeronca Super Chief NC 36631 飞机进行试飞。

飞机制造公司向美国援华联合会捐赠了一架稻草黄与红色相间的 Super Chief 单螺旋桨机，指定该机供李霞卿为联合会赴各地进行赈济募捐专用，捐机仪式在纽约法拉盛机场举行。（章末注 11）此次埃隆卡公司捐机毫无任何附带条件，因此联合会对这架飞机拥有绝对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埃隆卡公司的这一慷慨大礼显然进一步提升了联合会的社会知名度，董事会对此大喜。为新一轮目标为 25 万美元的募捐活动造势，联合会于 1941 年 9 月 30 日至 10 月 20 日在曼哈顿著名中心地标和名胜哥伦布环形街心公园（Columbus Circle）进行了为期三周的飞机展示，吸引了包括不少明星艺人在内的大量民众前往参观。展示活动结束后，飞机被送回法拉盛机场由李霞卿接管，当日她驾机进行了试飞（章末注 12）。李霞卿计划一次俄亥俄州之行，以示对埃隆卡公司的敬意，该公司总部即设在俄亥俄州的米德尔顿。11 月 4 日，李霞卿飞往港市托莱多（Toledo）。

相比起之前凡事亲力亲为的筹款募捐活动，李霞卿现在的行程安排完全交由联合会负责，所有安排，包括申请办理支付燃油的信用卡、购买意外险、飞行执照续期、撰写新闻稿、提交宣传照及文字说明等事务，均由联合会打理，李霞卿因此轻松不少。不过，对于这些飞行活动最重要的一环——飞机起飞前的检测工作——李霞卿坚持由自己完成，决不请他人代劳。不管什么时候，在李霞卿看来，飞行安全等同于拥有对飞行的绝对控制权。她每到一处，都会提前给当地的机场写一封公开信，要求机场给予她这一性命攸关的特权。在联合会，李霞卿的身份堪比会长道格拉斯·欧勤克劳斯（Douglas Auchincloss），因此，各地机场对她提出的请求均表示尊重和支持。

虽然由于天气原因李霞卿飞抵托莱多的时间比原定计划晚了一天，但她还是受到了当地官民的隆重欢迎。前来机场迎接的除了例行的官员，还有华侨华人代表，托莱多的华侨人口不多，仅为 140 人。一对华侨小姐妹，一个 7 岁，一个 10 岁，向李霞卿敬献鲜花，次日，这对小姐妹向李霞卿敬献鲜花的照片出现在俄亥俄州的主流报纸《托莱多刀锋报》（Toledo Blade）的头版。人们不禁会想，当

两个小女孩向李霞卿敬献鲜花时，她是否会触景生情想起自己的一对儿女，他们与这两个女孩年龄相仿，而此时，因为战火，她却不知道自己的孩子身在何处。但是，在那种场合，根本不可能有时间来回忆和遐想。一队警察骑着摩托车在前面开路，十几辆汽车护送着，警报器一路长鸣，李霞卿就这样风风光光地下榻该市最豪华的酒店佩里准将（Commodore Perry），休息并准备接下来的演讲活动。她在某饭店举行的欢迎仪式上对前来出席活动的基瓦尼斯俱乐部（Kiwanis Club）^①、托莱多俱乐部以及华人社区的代表发表讲话。之后，李霞卿结束在托莱多的行程，飞往费城和波士顿继续类似的活动。

美国援华联合会为李霞卿购买了保险有效期到当年年底的飞行意外险，所以李霞卿不必担心这方面的问题。11月底，李霞卿对新英格兰地区作了为期4天的访问。她从纽约飞往新罕布什尔州的纳舒厄（Nashua）和曼彻斯特，接着飞抵马萨诸塞州的洛威尔（Lowell）、霍利约克（Holyoke）和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等市。她还访问了缅因州，当飞越州府大厦时，她向下倾斜机翼，来了个“天女散花”，以示致意。

迄今为止，李霞卿在全美的飞行里程已达到约45000英里，这一飞行成绩在全美也是屈指可数，所以，对联合会来说，李霞卿本身就是一个活广告，依赖她可以吸引到更多、更有价值的捐款。

“李小姐对大捐助者特别有吸引力，”一位负责李霞卿募捐活动的组织者曾经这样写道，“我们认为，她的方法应该就是主要针对‘特别的礼物’。”（章末注13）

“特别的礼物”指的是联合会希望收到的大额捐款。虽然没有李霞卿为联合会募捐总额的记录，但从她与东部沿岸众多社会名流交往密切推断，她对联合会的贡献应该不小。

度过了繁忙的一年，到年底时，李霞卿的飞行保险有效期已届

^① 基瓦尼斯俱乐部（Kiwanis Club），美国工商业人士的一个俱乐部。——译注

满，而她的飞行执照也已过期，需要续办。或许李霞卿正好可以借此机会轻松一下。之后在各地举行的劝募活动，李霞卿只能乘坐火车和商务航班前往。不久，珍珠港事件爆发，李霞卿的美国抗战募捐飞行可以说画上了句号。（章末注14）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这次袭击最终将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在珍珠港事件的翌日，美国对日宣战，从此掀开了中美两国携手抗战的历史篇章。抗战全面爆发后，在美华人为了援助同胞更加努力地工作。在美国援华联合会，宣传中国人民疾苦的重担自然就落在了李霞卿身上。1942年1月，在众多媒体面前，李霞卿向美国著名的电台先锋记者沃尔特·温切尔（Walter Winchell）颁发了一本荣誉证书，感谢其对中国抗战难童的慷慨捐助，称他是中国孩子们“尊敬的祖父”。同月，李霞卿获邀赴新奥尔良参加红十字会的一次募捐活动，一同出席的有她的好友、好莱坞影星黄柳霜。

3月中旬，李霞卿飞往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Palm Beach），在机场受到热烈欢迎，在警察护卫队的护送下，参加了某华人抗战募捐表演活动。活动结束后，李霞卿急匆匆赶回纽约，开始了新英格兰地区各州及新泽西州的募捐之旅。后面的这一行程本来是上一年的活动内容，但由于李霞卿的日程排得太满而延后。虽然联合会要求李霞卿将工作重心放在募求“特别的礼物”上，但她对主流捐赠团体也绝不轻易放过。李霞卿在康涅狄格州、马萨诸塞州、新泽西州和纽约州积极开展演讲活动，听众对象包括劳工组织、教授俱乐部、战时服役委员会等团体组织，发行战争债券的各种公众集会也是李霞卿征求募捐的好机会。为了扩大听众群，尽可能多地吸引募捐，李霞卿先后接受新泽西州首府特伦顿（Trenton）的 WTTM、纽约州新罗谢尔（New Rochelle）的 WOR、新泽西州泽西市（Jersey City）的 WHN、纽约市的 WABC 和 WMCA 等多家电台采访。李霞卿还步入诞生仅三年之久的电视转播领域，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设在纽约洛克菲勒中心的演播室现身荧屏，利用这一新兴

的大众媒体进行募捐宣传。洛克菲勒中心被视为纽约的地标性建筑乃至美国财富的象征，中国驻美总领事馆就设在这里。

像往常一样，李霞卿的日程安排由联合会演讲与娱乐部部长玛莉安·卡德瓦拉德小姐负责。卡德瓦拉德小姐做事非常严谨，她给李霞卿的日程备忘录通常有好几页纸那么长，里面详细地列明了李霞卿要去往各州市开展募捐活动的有关信息。在尚存的有关李霞卿的资料中，有不少1942年的日程备忘录，其中最简洁的当属4月27日这一天的活动安排，有关记述如下：

“明早10点在大中央车站乘坐从纽约开往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和哈特福德的列车（根据上一条备忘录安排），11:30抵达纽黑文。纽黑文银行的哈罗德·韦尔奇先生前来接站，然后带您参加在教授俱乐部举行的由该市各界人士及偏远城镇镇长出席的午餐会。”

“下午乘坐2:25的返程列车，3:55回到大中央车站。威利·基尼先生前来接站，您此后的行程由他负责。您与之随后前往纽约州的阿兹利，晚上7:00在阿兹利乡村俱乐部举行的招待晚宴上致辞，作为嘉宾发表讲话的还有《纽约世界电讯报》的著名记者埃金斯先生，晚宴上还将放映电影《西线无战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

“4月29日星期三，您将前往康涅狄格州的斯坦福德，于中午12:15在达文波特酒店举行的基瓦尼俱乐部午餐会上致辞。注意，此次您将从纽约的宾州车站乘坐早上11:00开往哈特福德的列车，到站时间为11:49。当地联系人为达文波特山温都华的撒迪厄斯·海厄特博士（联系电话：哈特福德3-6185）。我们正准备写信给他，请他到车站接您。从哈特福德返回纽约的列车班次很多，您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选择最合适的一趟。”

“5月1日，您将前往长岛的曼哈西特。此行所有安排由查伯

兰夫人负责……”（章末注15）

1942年的炎夏，李霞卿基本是在纽约度过，尽管她的公众活动因为度假旺季而有所减少，但是她还是在酷暑难挡的7月出席了由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赞助的在时代广场举行的一次集会。一周后，李霞卿再次现身时代广场，代表美国援华联合会向聚众的路人发表演讲，出席这次活动的有众多好莱坞明星，包括莉莉·达米塔（Lili Damita）、纳内特·法布雷（Nanette Fabray）以及马科斯·肖瓦尔特（Max Showalter）。8月份，李霞卿还在继续工作，不过此时工作节奏稍有放缓，在缅因州进行募捐活动时她设法在那里度过了一个短暂的假期。

当李霞卿从缅因州度假归来时，她发现办公室里有一张卡德瓦拉德小姐留给她的记事帖：

“希望您最近的缅因之行过得愉快，愿您的身心得到了充分休息，准备好了更艰苦的工作。”（章末注16）。

事实正是如此。整个9、10月份，李霞卿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她不停地在康涅狄格州、新泽西州、马萨诸塞州和纽约州等人口密集、富有的地区开展劝募活动，为救济同胞奔走呼号，不辞劳苦。9月2日，李霞卿参加了在纽约长岛南安普敦县举行的一次抗战募捐活动，在活动现场，李霞卿向民众宣读了时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的约瑟夫·史迪威（Joseph Stillwell）中将发给美国援华联合会的电报。当时，华人社区的主要人物均身着传统服饰，表演了一出反映人间疾苦的传统折子戏。两天后，李霞卿回到纽约，在时代广场举行的某集会上向好莱坞影星艾琳·邓恩（Irene Dunn）赠送了一件旗袍。随后的日子李霞卿一刻也不得闲，这一点从卡德瓦拉德小姐给她制定的详细工作安排上可见一斑：

“9月18日，纽约市。您将对设在珀欣广场的民防志愿办发表演讲。该办在第42街航站楼的东侧、斜坡下搭设展台。该办邀请您作大约20分钟的演讲，内容涉及中国的民防问题，如果您不反

对的话，演讲结束后将安排听众提问环节。听众人数不少（今天他们组织了一场，约有500人到会）。会议于中午12:30开始，不过他们希望您能提前几分钟到会，以便就会议作一下简短的讨论。当然，这类集会的目的就是要增加活跃在民防第一线的志愿者，特别是妇女的人数。抵达会场后，请与负责会议演讲人协调工作的纳丁·萨奇斯小姐联系。安排此次活动的联系人为盟军内部情报中心的扎莫伊斯卡伯爵夫人。”

“9月21日，宾州费城。您将作为嘉宾出席在第11、12街斯内伦堡百货公司礼堂举行的茶话会。刚有消息传来说，他们已经安排费城KYW电视台于下午1:30转播对您的访谈。这是一次非正式采访，没有脚本。另外，他们还希望能在茶话会期间请艺术大师彼得·芬格斯坦先生为您塑一尊头像（章末注17）。他们表示，今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将展出芬格斯坦先生的两尊雕像，据说这位大师可在半小时内完成一个栩栩如生的作品。艾肯斯先生获悉了这一情况，他认为你也许会对此感兴趣。有鉴于上述额外的计划安排，建议您最好于早上11:30左右抵达费城……”

“9月22日，您将作为嘉宾出席于下午5:00在纽约洛克菲勒广场举行的一次活动。详细情况如下……”（章末注18）

就这样，李霞卿忙忙碌碌到了年底。她喜欢聚会，而纽约绚丽多彩的夜生活也让她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能够释放自己。虽然李霞卿从不贪恋杯中物，但她喜欢跳舞却是出了名的（特别是伦巴和探戈），一有时间她就会去夜总会放松一下。纽约八卦专栏作家莱昂纳德·里昂（Leonard Lyons）曾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撞见中国女飞行员“李小姐”出入高档餐厅夜店，这里的“李小姐”只可能是指李霞卿。里昂先生饶有兴趣地记述道，看见李霞卿坐在纽约生意最好的餐厅21俱乐部（21 Club）的一张桌子前，陪同她的是美国作家、编辑兼戏剧评论家乔治·让·内森（George Jean Nathan）。

之后又有不少名人过来落座，其中最知名的当属电影明星伯吉斯·梅雷迪思（Burgess Meredith）和著名演员兼导演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午夜时，李霞卿在威尔斯的陪伴下离开餐厅，两人先是到纽约知名夜总会斯托克俱乐部（Stork Club）跳舞，之后两人来到附近的蒙地卡罗餐厅宵夜。当事后有人追问起此事时，李霞卿耸了耸肩，找了个借口说：“真是奇怪，”她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道，“不过对我来说，所有的美国人看起来都很相像，我都搞不清他们谁是谁。”（章末注19）

1942年的圣诞节，李霞卿应美国著名女飞行家杰奎琳·科克兰之邀，前往后者位于加州印第奥（Indio）的家，度过了一个安静的节日，但是圣诞假期一过，李霞卿又马上回到了西海岸灯红酒绿的生活中。有人曾看见她在贝弗利山庄酒店与一位英俊的陆军中尉大跳伦巴舞。

李霞卿在美的知名度和社会认可可从她的卡通人物形象出现在这一年的泡泡糖纸上窥见一斑，该糖纸一面世即成为美国人喜爱的收藏品。（章末注20）李霞卿很高兴自己成为公众人物，她向发行方索要了几十张这种泡泡糖纸，准备回国时送给亲朋留作纪念，但是那梦萦魂牵的祖国对她来说依然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上海滩上那曾经的快乐时光如今看来是那么的遥远，背井离乡后自己又经历了多少折磨与

苦难。多少同胞颠沛流离，多少朋友撒手人寰。最近，李霞卿听说她的好友、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公法博士杨光泐在担任中国驻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总领事期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被日军囚禁并终被秘密枪杀的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杨光泐身为外交官却遭此极刑，其情之



在一张1943年的泡泡糖纸上印有纪念李霞卿抗战募捐飞行的漫画。

惨烈令人扼腕，而侵略者之残暴更令人发指。

1943年伊始，李霞卿继续马不停蹄地为抗战奔走呼号，她频繁出席各种公众活动，保持了很高的媒体曝光率。1月25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一档“美国系列”（Cavalcade of America）电台节目录制一期有关飞虎队的节目，李霞卿获邀作为嘉宾出席在节目现场。在节目中，她被誉为“中国第一位女飞行员”。一周后，李霞卿在美国犹太妇女大会（American Jewish Women's Congress）上发表演讲，《时代》杂志对此作了报道。2月17日，李霞卿在首都华盛顿发表演说，四天后，她又赶往水牛城，在某兵工厂的集会上发表讲话。

3月初，李霞卿邀请知名专栏作家英戈·阿瓦德（Inga Arvad）到她位于纽约第83街的寓所，接受这位金发美女的私人采访（当时阿瓦德正与未来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幽会）。阿瓦德也像其他记者一样，被眼前这位采访对象的高贵气质和迷人风采所震撼。

“当她在一个淡蓝色的巨型长沙发上坐下来时，”阿瓦德用细腻的笔触描写道，“她将头轻轻地靠在一只枕垫上，只见她有一双大而聪慧的眼，一对柳叶眉，一头乌黑的秀发，很难想象就是那双美目要数小时紧盯着飞机的仪表盘。而那双精心涂了指甲油的纤纤玉手曾经满是油脂污秽更是不可思议。”

李霞卿向阿瓦德倾诉说，很难获悉在香港敌占区的家人的消息，但她坚信他们一切安好。她还向记者表达了她履行其美国使命的情感动机：

“我希望，无论对祖国人民还是对家人，我的所作所为都是值得的，因为他们富有理想，因为我深爱着他们。”（章末注21）

同年，李霞卿成为一本以真实生活为题材的漫画书中的人物。在这本英文漫画书中，李霞卿被描画成传统的女英雄形象，高尚、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经受各种考验，竭尽所能拯救被战争蹂躏的同胞。事实正是如此。她的这种英雄气概在日军攻占上海时就已经显现出来了，当时李霞卿和一位男同胞为躲避日本人的杀戮隐蔽在一个散兵坑里。

“要是我们有更多的资金，我们就可以给日本人以更沉重的打击！”这位男同胞痛惜道。

“我的机会来了，”李霞卿，这位中国第一位女飞行员，斩钉截铁地答道，“我可以去美国募捐，你继续办医院救治伤员。”（章末注22）

不过，除了这些讨喜的出版物和如常的公开活动，1943年对李霞卿来说工作量明显减少，特别是与抗战全面爆发之初时相比更是如此。显然，李霞卿决定好好地喘息一下。



1943年，某英文漫画书以“为了抗战胜利而飞行”（Flying for Victory）为题，宣扬李霞卿抗战募捐飞行之壮举。

自从李霞卿1938年10月底抵达美国以来，她就像陀螺一样连轴转，这四年多来，她做了大量的慈善工作，这成为她一生的荣耀。没错，这就是一场历险，虽然李霞卿从拯救那些受苦受难的同胞的工作中收获了极大的幸福和满足，但她同时也牺牲了自己许多宝贵的私人时间。而这时，宋美龄正准备她那具有历史意义的美国之旅，这位已经赢得西方尊重的中国“第一夫人”将在美国掀起一股狂潮。李霞卿此时更愿意退居幕后。

宋美龄1943年初对美国的访问掀起了一股“宋美龄旋风”，其在美受到的高规格接待以及所引起的轰动效应堪称史无前例。而实际上，在宋美龄抵达美国前，有关她访美的盛大造势活动就开始了。3月2日晚，纽约，宋美龄出席了在麦迪逊花园举行的有两万余人参加的市民欢迎会。3月3日，蒋夫人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向各华人组织和团体发表演说。当时李霞卿也与联合会的其他同事一道出席了这次活动，当她在摩肩接踵的与会人流中奋力前行时，巧偶前来纽约公干的旧相识——被誉为驼峰航线“最伟大的运输机飞行员”的陈文宽。

陈文宽生于美国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自1933年归国后一直担任中国航空公司（CNAC）商务运输机飞行员。1942年，陈文宽执行了几次非常著名的飞行任务，其中最知名的当属载运美国空军中校吉米·杜立特（Jimmy Doolittle）出境。是年4月18日，16架北美航空制造的B-25米切尔由杜利特中校率领，对日本东京进行了一次扭转战局的突袭轰炸。杜立特在驾机轰炸东京后，其飞机在中国的农田中降落，中国政府辗转护送杜立特从昆明登机经驼峰航线出境飞往印度加尔各答，转送杜立特前往加尔各答的就是由陈文宽驾驶的飞机。陈文宽也因为这次飞行任务而创造了C47型飞机载运78人的纪录（该机型定额载人28人）。1942年10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kie）访问重庆，乘坐的也是陈文宽驾驶的飞机，为此，陈文宽还上了报纸的头版。陈文宽的这两次飞行任务，正如许多其他飞行任务一样，都是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进行的。陈文宽这次来美一来休整一下，二来参加一个在首都华盛顿举行的四引擎飞机业务培训。（章末注23）

李霞卿与陈文宽数年前在上海龙华机场相识，他乡遇故知，两人自然十分欣喜。第二天，两人在华尔道夫酒店的星光屋顶举行的宋美龄夫人欢迎会上再次相遇。之后的一段时间，两人在双方共同的朋友——其中大部分为飞行员——的陪伴下，经常出去派对玩耍。虽然李霞卿此时仍迷恋飞行，且三句话不离本行，但是陈文宽注意到，她看上去孤独寂寞，好像无所事事的样子。她没有工作，这种悠闲让她很不适应，也让她背上了沉重的心理负担。（章末注24）

三周后，李霞卿驾机出席了在芝加哥举行的一次联合国集会，在这里，李霞卿对外宣布其飞行时数已达600小时。（章末注25）不过，在这一年中，除了为数不多的几次露面活动，没有证据显示李霞卿有大的出行计划，直至9月底，她代表全国战时救济基金会到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及纽约州作了为期一个月的慈善飞行。11月时，她五年前申领的美国私人飞行执照终于过期。

注释

Hyde) 以及默西迪斯·奥姆斯顿 (Mercede Ormston)。Ruth Nichols, *Wings for Life*, 273.

2 同1。

3 同1。

4 Talbot Lake, "Miss Lee Seeks Funds in U. S. To Aid China," Hayward Daily Review [Hayward, CA], February 4, 1941.

5 美国援华联合会是由美国医药援华会 (ABMAC)、美国对华急救委员会 (China Emergency Relief Committee)、美国援华会 (China Aid Council)、中国战灾难童美国委员会 (American Committee for Chinese War Orphans)、美国教会对华救济会 (Church Committee for China Relief)、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美国委员会 (American Committee for Chinese Industrial Cooperatives)、中华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 (Associated Boards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ABCCC) 组成。

6 就其文风和体裁而言, 现存的李霞卿自传部分手稿与她前夫的姑姑郑毓秀那充满怀旧气息的自传的前几章颇为相似。这部名为《一位来自中国的女子——郑毓秀》(*A Girl From China, Soumay Tcheng*) 的自传由传记作家贝西·范·福尔斯特 (Bessie Van Vorst) 于1926年完成, 最初以法文写就, 后译成英文。

7 "Chinese Pilots Called Better Than Japanese," *Vidette-Messenger* [Valparaiso, Indiana], June 20, 1941.

8 李霞卿的传记作者埃尔西·麦考密克·唐恩的手稿, 第6-7页。

9 当时, 一位加拿大华裔小女孩观看了李霞卿的这次京剧表演并被深深陶醉, 这就是来自多伦多的帕特丽夏·李 (Patricia Lee), 长大后, 李也成了一名飞行员, 并加入了国际九九女飞行员俱乐部 (Ninety-Nin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Women Pilots)。李也是日后“希望航空” (HopeAir) 的志愿副驾驶。“希望航空”不是一般卖票运营的航空公司, 而是一个全国性的慈善机构, 它为需要离开自己的社区到外地治病但又买不起机票的加拿大人提供免费空运服务。参见本书作者于2003年1月9日对多伦多的帕特丽夏·李的电话采访笔记。

10 美国援华联合会演讲与娱乐部部长玛莉安·卡德瓦拉德 (Marian Cadwallader) 1942年1月19日致缪勒 (Mueller) 先生的备忘录。李霞卿1942年—1944年有关资料;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希雷·G·马德图书馆美

国援华联合会档案。

11 这架埃隆卡 65LB 型单螺旋桨机注册号为 NC-36631，序列号为 LB 16711，该机配备 65 马力的莱卡明引擎。根据工厂的生产日志，这架飞机于 1941 年 9 月 11 日下线。埃隆卡飞机制造公司的约翰·豪泽（John Houser）于 2002 年 8 月 30 日致信本书作者。

12 作为试飞的一个环节，李霞卿驾机飞到长岛米尼奥拉（Mineola）的米切尔机场（Mitchel Field），观看由蒙默斯堡（Fort Monmouth）和汉考克堡（Fort Hancock）两支部队之间进行的一场援华橄榄球赛。试飞前，李霞卿签署了一份免责文件，表明如驾驶这架埃隆卡飞机发生事故，美国援华联合会将不承担任何责任。

13 美国援华联合会备忘录。尼兰德—摩尔（Kneeland Moore）的罗伯特·哈米尔（Robert Hamil）于 1941 年 10 月 21 日致美国援华联合会加塞德先生和道格拉斯·奥钦克洛斯（Douglas Auchincloss）先生的信。埃隆卡飞机制造公司 1941 年—1943 年有关财务资料；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希雷·G·马德图书馆美国援华联合会档案。

14 李霞卿几乎不再驾驶这架埃卡隆飞机四处访问。战争期间，超过机库上空 50 英里以上高度的飞行不仅需要提交堆积如山的申请表格，还要购买价格不菲的航空保险。尽管这架飞机是慷慨所赠，但飞机的维修和存放成了一个财政负担。美国援华联合会决定出售这架飞机，将所得款项捐给中国的救济工作。4 月底，美国国民空中巡逻队（Civil Air Patrol）提出以 1100 美元购买此飞机，但遭到援华联合会的拒绝，因为李霞卿认为出价太低。在此期间，美国援华联合会继续支付高昂的机库租金和飞机维修费（有证据显示机库所有者向他们漫天要价），所以联合会可能后悔听取了李霞卿的建议没有把飞机卖掉。1942 年 12 月，泛美机场集团公司（Trans-America Airports Corporation）的埃德加·H·鲍曼（Edgar H. Bauman）以 1250 美元的价格购得该机。李霞卿在该机飞行日志上记录的飞行时间大约为 50 个小时。

15 玛莉安·卡德瓦拉德致李霞卿的打印日程表，1942 年 8 月 27 日。李霞卿 1942—1944 年有关资料；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希雷·G·马德图书馆美国援华联合会档案。

16 同 15。

17 这并非唯一一次艺术家为李霞卿塑像。鲁丝·叶芝（Ruth Yeats）

曾经用装饰艺术派（Art Deco）的风格用石膏为她塑了一尊头像，该头像在1942年1月波士顿举办的女艺术家作品展上展出。立陶宛裔美国雕塑家鲍里斯·拉维特—洛斯基（Boris Lovet-Lorski）也曾用白石膏为李霞卿塑过半身像。

18 同15。

19 Leonard Lyons, “Broadway Signboard,” *Washington Post*, August 29, 1942.

20 作为费城泡泡糖公司印刷的第101套二战泡泡糖纸的主题人物，李霞卿被誉为“中国第一位女飞行员”。糖纸上这样写道，“第一个获得中国政府颁发的飞行执照的女子是李霞卿小姐。她作为特别亲善大使来到美国，其使命就是呼吁人们援助中国的战灾难民。这位全名意为‘落日的余晖’、一头乌黑秀发的李小姐，从一个城市飞往另一个城市，讲述她的故事：中国有两百多万战灾难童，虽然已建成47所孤儿院，但仍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她那如火焰般的红色单翼座机名为‘新中国精神号’。她钦佩其伟大的领导者宋美龄，她甚至与蒋夫人有些相似。李小姐的下一个任务是作一次慈善飞行，将在美国所募集的医药用品运回中国内地。”

21 Arvad, “Glamorous Flying Ambassadors at Home…” *Vancouver Daily Province*, March 13, 1943.

22 “Flying for Victory,” *True Aviation Picture-Stories*, no. 3 (March/April 1943)。

23 在纽约期间，陈文宽还拜访了一位旧识，来自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美籍华裔飞行员陈瑞钿，“九·一八”事件后，陈瑞钿志愿回国加入中国空军，后在昆仑关战斗中，因座机油箱起火被严重烧伤。陈瑞钿其时正在哥伦比亚—长老会医疗中心烧伤科接受皮肤移植手术，陈能回美接受治疗也是得了蒋介石及夫人的关照。中国飞行员的圈子较小，李霞卿也认识陈瑞钿并去看望过他。

24 2005年2月28日，本书作者在加州希尔斯伯勒对陈文宽进行了采访，参见采访记录。

25 “No. 1 Girl Flyer: Miss Lee Ya-ching,” *Chicago Tribune*, March 30, 1943.

22. 二次南美行

历史的年轮翻到了1944年，李霞卿重整旗鼓，整装待发，准备为救济同胞再尽一份力。不过此时，由于美国已卷入战争，海外抗战募捐的形势发生了变化。李霞卿意识到，如果再在美国本土进行劝募活动，很有可能因为民众的捐款疲劳而导致效果不佳，她决定开辟新的疆土。南美洲对她来说依然具有巨大的诱惑力，而且1940年她首次南美募捐飞行也证明这是块福地，李霞卿决定再度造访。这一次，李霞卿决定访问第一次未到达的地区，包括加勒比海的几个岛国以及南美大陆东北部海岸地区。此次行程将非常漫长，从1944年3月起，至1944年12月回到北美，历时8个多月。

美国援华联合会为李霞卿准备了介绍信以及拉美各地的联系人清单，李霞卿将依靠这些联系人在南美各国开展抗战募捐活动，这些联系人包括联合会派驻南美各地的代表、美国各救济机构南美办事处的代表以及中国驻南美各国领事馆官员等等。联合会还向李霞卿提供了一份航线图。这次南美行李霞卿不是自己驾机，而是搭乘商务运输机前往各地。整个行程仅机票费用一项就超过1000美元，这笔费用对一个非赢利性慈善机构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但是考虑到李霞卿的“国宝”地位，中国政府和美国援华联合会不愿再让李霞卿冒着独自驾机长途飞行的危险。而且他们预计李霞卿的此次南美行定能大获成功，其旅行费用定能冲抵。与上一次南美行不同的是，此次行程的演讲活动，不仅代表美国援华联合会，也代表李霞卿本人。有几场演讲活动由纽约市的全国音乐会及艺术家公司

(National Concert and Artists' Corporation) 提供赞助，李霞卿返回北美时向该公司提供演讲票据报销即可。

这一年李霞卿 32 岁。经过岁月的历练，李霞卿已经从首次环美募捐飞行时美国人眼中的天真无邪的少女变成了成熟韵致的女人。筹备南美之行时，李霞卿拍了一系列肖像照，以备各种官方文件及申请签证之用，不过这些肖像照与标准的护照相大不相同。只见照片中一位时髦的女子，云鬓高挽，优雅迷人地定格在镜头前。立领旗袍宣告她以自己是炎黄子孙为傲，而胸前别着的那枚光彩夺目的飞机造型的钻石胸针则昭示了李霞卿对飞行事业的钟爱。（章末注 1）



李霞卿 1944 年签证照，照片中的她胸前别着一枚飞机造型的钻石胸针，为 1939 年环美募捐飞行筹资，李霞卿曾拿这枚胸针和其他首饰做抵押贷款。

来美 5 年，一直是镁光灯下焦点人物的李霞卿已经相当有好莱坞影星的范儿，她知道如何选取最佳角度，把自己最美的一面通过光和影展现出来。

相比起 4 年前第一次踏上南美这块土地，这一次漫长的筹款之旅要轻松许多，此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转变，美、英、法、苏、中等国组成的反法西斯联盟开始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阶段性胜利。1944 年 3 月底，李霞卿开始了她的南美之行，她搭乘泛美航空公司航班由迈阿密飞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拉瓜伊拉机场。（章末注 2）在三个星期的时间里，李霞卿将加拉加斯作为大本营，走访了包括西北部港市马拉开波（Maracaibo）以及北部城市巴塞罗那等在内的一些城市。结束在委内瑞拉的行程后，李霞卿前往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西班牙港，随后飞往巴西港市贝伦和里约热内卢。这一次，李霞卿终于到访了上一次南美之旅未能抵达的巴西东北部热带地区。

之后，李霞卿折回加勒比海地区，到访了荷属安的列斯群岛的库拉索岛（Curaçao）和阿鲁巴岛（Aruba），在此期间，李霞卿禁不住诱惑，搭乘荷兰航空公司（KLM）的一架洛克希德 Lockheed 12A（PJ-AKC）型双引擎机再次回访了这几个岛屿。随后，李霞卿飞抵古巴、牙买加、墨西哥，继而南下到访南美洲西海岸的秘鲁首都利马、智利的波特雷里约斯（Potrerillos）。

按原定计划，李霞卿应于6月底返回美国，但是考虑到自己的募捐工作颇见成效，李霞卿决定继续在南美洲的筹款活动。她乘坐巴西南方航空公司班机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飞抵里约热内卢，巴西南方航空公司（Serviços Aéreos Cruzeiro do Sul）总裁乔斯·本托·瑞贝罗·丹塔斯（José Bento Ribeiro Dantas）还慷慨地向李霞卿免费赠送了一次行程，这是一条新开辟的邮货航线，该航线纵贯巴西，途中经停西北部城市玛瑙斯（Manáus）以及中西部城市科伦巴（Corumbá）等地。（章末注3）一俟抵达里约热内卢，这位来自中国的亲善大使就在她下榻的科帕卡巴纳皇宫饭店（Copacabana Palace Hotel）的房间里接受了记者的采访。采访时，李霞卿向记者描述了她这次长达3000英里的南美之行给她留下的深刻印象，这次南美之行飞越了许多人迹罕至的亚马逊丛林地区。

“当飞机在巴西茂密翠绿的原始森林上空作漫长的飞行时，我非常感动。它让我深切地感受到这个国家是多么壮丽，多么广袤。”

李霞卿还向记者表示，她对里约热内卢的景致深感迷醉：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城市像它这样，天空如此晴朗，阳光如此明媚，城市与山海如此和谐地融为一体……”李霞卿兴奋地说。（章末注4）

李霞卿的这次南美募捐之行又取得了巨大成功。像上次一样，她这次的行程也排得满满的。接受电台采访、出席由华人社团召开的茶话会、在各影院发表演说，另外，她还遍访了巴西和委内瑞拉两国的炼油厂、飞机制造厂等工业基地。虽然此时李霞卿依然以中国难民代表的身份开展劝募活动，但是她的工作重心已然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她越来越多地扮演了一位民间商贸大使的角色，她更着

眼于未来战后中国与南美之间的商贸机会，她对两地之间工业及金融领域的合作发展颇有见地并且满怀信心，她在公众场合多次阐述了战后两地之间经贸合作的美好前景。出身于商贸世家，从小受到父亲、商业奇才李应生的耳濡目染，李霞卿有如此眼光丝毫不足为怪。在里约热内卢开展募捐活动时，当地媒体赞扬她“秀外慧中，不仅有靓丽的外表，而且有极其聪慧的头脑”，媒体还亲切地称她为“Luz de Crepúsculo”，葡萄牙语“晚霞”之意，意指“霞卿”之名。（章末注5）

8月1日，李霞卿飞往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以飞行员的身份向阿根廷移民局申请办理3个月有效的旅游签证，这样她就可以继续留在南美开展募捐活动。一个月后，李霞卿签证延期的申请获批，于是她在这个极具魅惑的港口之城安顿了下来，一直到是年12月她结束南美之旅回到北美。

12月，李霞卿的签证过期，12月3日，她搭乘泛美航空公司航班回到得克萨斯州的布朗斯维尔。这一次南美之行可谓漫长，历时8个多月。当她乘坐美国东方航空公司的班机回到纽约时，受到了美国援华联合会的官员们的热烈欢迎。这次南美募捐之旅大获成功，在募集的款项中，有几笔大额捐款。库拉索银行的所有者亚历克斯·库瑞尔（Alex Curiel）亲自写了一张100英镑的支票捐款，他还对李霞卿给予了高度评价：“你为了我们的共同事业的出色工作，应当受到我们所有同盟国人民的高度赞誉。”（章末注6）

虽然这次南美募捐没有具体的数额记录在案，但从此行的实际效果来看数目应非常可观。遗憾的是，这时中国货币贬值，物价飞涨，海外所募集的捐款根本无法填补因通货膨胀所造成的巨大财务亏空。更令人义愤的是，由于国民政府贪污腐败，地方官绅勾结，海外善款被截留挪用之事频有发生。

就在李霞卿于南美开展抗战筹款之时，国内报纸却登出一则消息，称航空女杰李霞卿赴南美洲宣传抗日飞机失事香消玉殒。关于李霞卿之死，至今仍有史料言之凿凿。然而这却是误传，可能是当

时信息闭塞，将李霞卿与另一位美籍华人女飞行员李月英混为一谈。李月英与李霞卿年龄相仿，1912年出生于美国俄勒冈州西北部港市波特兰的一个小康之家。1932年，20岁的李月英进入波特兰中华航空学校，学习驾驶飞机。1934年，波特兰中华航空学校包括李月英在内的首期32名学生毕业了，李月英成为第一位拥有飞行执照的华人女性。抗日战争爆发后，李月英虽身处异国，但心怀乡邦，她目睹祖国遭受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蹂躏，怒火满腔，为了报效祖国，她从波特兰中华航空学校一毕业，就马上回到祖国，前往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报到，希望能当空军飞行员，抗击日寇飞贼。尽管中国军队非常需要训练有素的飞行员，但由于当时空军拒绝女性执行战斗任务，因此，没有让她上战场，而是将她安排在航空委员会从事文职工作，先后担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的英文打字员、上海虹桥机场职员、杭州的航空署图书馆管理员等职务。后来，李月英回到美国，珍珠港事件后，她立即加入了美国空军，在空军第三大队担任运输机飞行员。1942年夏，李月英听说在休斯敦建立妇女飞行训练支队，她立刻报了名，后来妇女飞行训练支队和另一支女飞行员队伍合并，正式成立了美国妇女飞行队，这是世界上第一支妇女飞行队。1944年9月，由于李月英卓越的表现，她被送至得克萨斯州的战斗机飞行学院接受了多种单引擎战斗机的密集飞行训练。半年后，李月英与其他同时受训的6名女飞行员以及27名男飞行员一起毕业，返回美国空军第三大队，主要任务是驾驶新飞机由工厂飞到目的地机场。她又成为第一位华裔战斗机女飞行员，也是当时美国为数不多的为美军运送战斗机的几个女飞行员之一。战争期间，李月英与其他女飞行员共运送5000多架战斗机至蒙大拿州的大瀑布城（Great Falls）机场。1944年11月23日，李月英在执行一次战斗机运送任务时，在大瀑布城空军基地上空与另一架战斗机相撞，终因伤重不治两天后身亡。

李月英飞机失事遇难的消息传到国内，可能是因为她与李霞卿同姓，加之两人均在美国为抗战而飞行，所以导致“李霞卿飞机失事，不幸罹难”的死亡谣言。这个谣言一直传了几十年，或许也是

因为李霞卿的前夫坚称她已死，所以很少有人怀疑过该谣言的真实性。事实上，李霞卿一直活到86岁，直到1998年因急性肺炎死于美国南加州的渥仑市。

注释

1 在1939年与沃尔特—比奇（Walter Beech）飞机公司签订的一份合同中，李霞卿用这枚胸针连同其他珠宝首饰作为抵押借得环飞美国所需的座机。胸针在前一年已被估价，估价书中这样描述它：“白金镶钻，长形，飞机双翼镶嵌钻石，中间镶嵌1颗大钻石，周围环以10颗钻石，机翼上共镶有38颗钻石，老矿式切割。”这枚胸针估价为375美金。洛杉矶的弗格森（J. C. Fergusson），打印评估书，1939年11月28日。李霞卿家人收藏。

2 启程之前，她听闻祖母徐宗汉在1944年3月8日不幸逝世的噩耗。这位刚毅勇敢的女性也曾为了中国的利益赴中南美洲募捐。

3 李霞卿应该是乘坐巴西南方航空公司于1943年从美国购回的四架DC-3型飞机中的一架。此前，巴西南方航空公司是一家名为“神鹰”（Syndicato Condor）的德国航空公司。二战后，德国股东撤资，公司移交给巴西人。美国生产的DC-3型飞机适时取代了德国生产的容克斯（Junkers）飞机，但是许多人认为这不过是换汤不换药，人们怀疑该公司跟盖世太保有着密切的关系。

4 “Lee Ya-ching: Luz de Crepusculo,” *A Noite* [Rio de Janeiro], 11 July 1944. 美国作家、史学家西格雷夫（Seagrave）表示，1944年7月，宋美龄和她的姐姐宋霭龄也在巴西，她们在里约热内卢港的一个岛屿Brocoió岛上疗养。李霞卿可能在此期间前去拜会两人。Seagrave, *The Soong Dynasty*, 413。

5 同4。

6 委内瑞拉加拉加斯Morris E. Curiel & Son公司的亚历克斯·库瑞尔（Alex Curiel）致李霞卿的打印信，1944年5月3日。李霞卿1942年—1944年有关资料；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希雷·G·马德图书馆美国援华联合会档案。

23. 魂留蓝天

为使南美募捐之行取得最大成效，李霞卿将其在南美的签证申请延期了3个月，为此当她返回美国时还遇到了麻烦，美国海关只允许她在美临时逗留4个月的时间。1945年3月，李霞卿请中国驻纽约总领事于焯吉博士作为证明人向有关方面申请延长其在美国签证。她在申请理由中注明，家人均在中国，而自己的财务状况很好，几无可能成为难民或给这个国家带来负担。而熟悉内情的人也知道，光看她在香港九龙何文田山道一号的家庭住址便可知其家道殷实。李霞卿的签证延期申请顺利获批。

李霞卿在纽约第84街东114号找了一处寓所，这处寓所与她原在曼哈顿上东区的住所相邻。她继续在美国援华联合会工作，不过此时战争即将结束，而联合会也将完成它的历史使命。稍稍清闲下来后，李霞卿终于有时间考虑自己的个人感情问题，她与一位富有魅力的华人相恋了，怎奈天意弄人，这位华人有妻室儿女在国内。李霞卿后来表示，她并不了解这位男士的婚姻状况，并称与他在一起的时光很幸福。

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先后投下两颗原子弹，9月，日本签字投降，二战结束。终于盼来了期待已久的和平，李霞卿此时思乡心切。7年来，她在海外潜心地开展募捐活动，支援国内抗战，而如今，她心向祖国，希望能够重归故里参与战后的重建工作。但是她深知，经历旷日持久的战争之殇，华夏大地已是满目疮痍，百废待举。

李霞卿最为关注的是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现状。战前，李霞卿与那些航空先驱们一道，宣传航空救国，唤起同胞对航空事业的关注。而事实也已不言自明，保卫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需要建设一支强大的空军力量。如今战争已经结束，李霞卿迫切希望回到国内，调整工作重心，为发展通用航空事业摇旗呐喊。为尽快归国，李霞卿向美国空军航空运输司令部（U. S. A Air Force Air Transport Command）和美国海军运输航空处（U. S. A Air Naval Transport Service）提出了优先通关申请。

“李霞卿小姐是中国最著名的女飞行家之一，”给李霞卿签发通关证的官员如此表示，“她申请乘飞机返回上海，以重建国内的航空事业。”

在战争刚刚结束，业务工作极其繁忙的情况下，申请从美国飞回中国的通行证通常手续繁琐，而且获批的人数极少。但是，李霞卿的申请得到了批准，在批复文件中这样写道，李霞卿尽快归国“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符合重建遭到战争破坏的经济和其他活动的要求，立即开展和平时期的恢复重建工作是十分必要的”。（章末注1）

1946年5月初，李霞卿搭乘由旧金山飞往上海的商务航班回国。虽然在归国前她已对国内的情况有所预期，但当她重返家园，眼前的惨景还是让她措手不及。战争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太多的创痛，而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恐怕要属腐败滋生，它已深入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涉及到每一个阶层。战前，腐败现象虽然存在，但也只是个别，而如今腐败猖獗，民怨沸腾。黑市交易和物资供应短缺让那些曾经丰衣足食的人也陷于困顿。不过，李霞卿的回国至少给她那些沪上的女性朋友的生活带来了一点色彩和欣喜。离开纽约前，李霞卿专门到美容界女强人伊丽莎白·雅顿设在第五大道的旗舰店购买了价值200多美元的化妆品，准备送给国内的朋友。由于战后物资供应紧张，政府明令禁止进口化妆品，口红等化妆品价格高得吓人，一些人看到有利可图，便利用搭乘国际航班之机走私，除化妆品外，金条也经常被盗带。李霞卿这次回国购买了大量的口

红（总数有150多支），看来她除了送人还准备零售。

在上海稍作停留后，李霞卿即飞往香港与父亲团聚，并在香港定居下来，她原本帮助重建中国航空基础设施的美好愿望也就此搁浅。战前，她曾经不遗余力地宣传航空救国并且初见成效，而如今，中国的航空事业有强大的美国政府做后盾，因而显然不需要个人来染指。看清现实也让李霞卿松了一口气，过去的8年，李霞卿一直在为抗战募捐奔波劳碌，她就像个职业飞行员，过着飞人般的生活，而如今，她终于可以“退休”了。



1950年香港民航处颁发给李霞卿的飞行执照。

1949年新中国建立，李霞卿在香港的生活并未像许多留在大陆的人那样受到影响。她得以保留自己的生活习性和方式，而且她还可以继续飞行（1950年，她获得香港民航处颁发的私人飞行执照），不过在此期间，李霞卿重上云霄主要是出于娱乐目的，有时一时兴起她会驾机飞往新加坡、曼谷等地。1953年，美国著名女飞行家杰奎琳·科克兰抵港拜访李霞卿，李霞卿在宴请这位老朋友时坦承自己已不像以前那样将更多的精力放在飞行上。虽然李霞卿无法与这位仍活跃在蓝天之上、创造了人类飞行史上最多个人速度距

离纪录的女飞人相提并论，但她仍在继续飞行，整个东南亚地区都留下了她的航迹，哪怕这只是出于娱乐消遣。

1958年夏末，香港启德机场新跑道启用。该跑道为填海建造而成，从九龙湾一直伸延至维多利亚港，新跑道的启用大大提升了启德机场的国际航班承载力。在9月12日的启用典礼上，李霞卿获港英政府之邀亲自驾驶飞机作了示范表演，当年的香港报纸如《工商日报》均有报道，媒体尊称李霞卿为航空先驱、其他女飞行员的导师。（章末注2）

在港期间，李霞卿结识了一位成功的国际商人李颐祥。李颐祥比李霞卿年轻，他有个绰号“深水埗王子”。两人有许多共同爱好，旅行、打高尔夫、骑马（两人是跑马地马场的常客），可惜李颐祥乃有妇之夫。虽然李与妻子不睦，而李很想给李霞卿一个名分，但是一开始时李妻并不同意离婚。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香港经济低迷之时，李霞卿和李颐祥迁居经济环境相对繁荣的美国。他们在旧金山湾区的奥克兰找了一处寓所，距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不远，而大约30年前李霞卿在波音航空学校学习时的住地也在附近。李霞卿选择住在奥克兰机场附近绝非偶然。她的一个考虑是方便她申请美国飞行执照。1963年，李霞卿获得港英政府颁发的特殊目的飞行员驾驶执照，来美后，李霞卿向美国政府提出申请飞行执照，并将香港的这一执照作为辅助证明材料。尽管港英政府颁发的这本执照在其他英联邦国家通用，但却未获美国联邦航空局（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简称FAA）的认可。美国联邦航空局通知她，如果她希望在美飞行，就必须重新接受培训并通过考核。

1966年6月30日，年过半百的李霞卿，这位曾经在欧亚、南北美四大洲上空飞行数万英里并在各大机场起降的老飞行员，获得了美国联邦航空局颁发的学生驾驶员执照（证件号码为S-347502），由于该执照是飞行证书里最初级的飞行证，只颁发给初学飞行者，所以李霞卿还不得不遵守许多飞行限制。她在奥克兰机场开始了她的飞行训练。此时，李霞卿已经54岁，但看上去依然很年轻，身

材也保持得很好。在申请飞行执照时留下的个人资料中，李霞卿注明自己的身高是5英尺4英寸，体重为120磅。

考虑到李霞卿飞行经验丰富，有关方面对她在奥克兰机场的学习大行方便，她的培训过程相对较短，而且学习时间也比较弹性。到1966年9月27日，李霞卿通过了所有的书面和飞行测试，包括单飞测试。她完全符合申请美国飞行执照的条件。李霞卿申请用回她30年前毕业于波音航空学校时申领的飞行执照号码，这不仅仅是出于怀旧，那个号码对她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审核李霞卿飞行驾照申请的官员在她的资料中备注道：“申请人诚请用回她原来的私人飞行员执照号，原号码为33654，颁发时间为1935年11月5日。1938年11月16日，申请人获颁原号码飞行执照，有效期至1943年。”

不过这一次李霞卿未能如愿，由于编号体系更新，美国联邦航空局未同意她保留原飞行执照号码的申请，而是给她颁发了一个号码为1714300的临时飞行员证书。

重获美国的飞行执照后，李霞卿和爱人李颐祥觉得没有必要再住在奥克兰机场附近，他们搬到了旧金山湾另一侧的圣马特奥（San Mateo），此处距旧金山国际机场仅10分钟车程。1971年，有情人终成眷属，两人在美国定居下来，他们搬回了奥克兰，在距离机场大约6英里的小山上安了家。

人到中年的李霞卿仍然喜欢冒险刺激。有一天在加州的乡间游玩时，李霞卿看见农田里停放着一架喷洒农药用的飞机，在征得飞机主人的同意后，她驾驶着这架农用飞机飞上了天。她开着这架旧飞机在空中做了一系列复杂的特技表演，直到这架飞机的电机发出尖叫声，机翼摇摇欲坠。经过一番折腾，李霞卿将飞机稳稳地降落在农田，然后礼貌地向飞机主人任由她驾机表演表达谢意，而那几位飞机的主人早已被李霞卿的表演惊得目瞪口呆。（章末注3）

“无固定居所”是这对夫妻在未来几年生活的真实写照。李霞卿和丈夫李颐祥经常乘飞机到他们所向往的世界各地游历。李霞卿在欧洲著名的旅游胜地、国际名流社交集会之所法国戛纳购置了一

套公寓，夫妻俩将这套公寓作为他们在欧洲旅游的大本营。回到美国后，李霞卿继续过着闲适而活跃的社交生活，不时会会朋友，话话家常，打打麻将。

李霞卿与前夫郑白峰生的儿子郑柏土此时也住在旧金山，母子俩虽然互有走动，寻回曾经失落已久的亲情，但是两人的关系始终不那么亲密。李霞卿是个生活低调的人，她不愿意承认过去发生的许多事，她甚至不希望朋友们知道她在上一段不幸的婚姻中曾经育有两个孩子，她尽可能地隐瞒这一事实。（章末注4）

岁月无情流逝，李霞卿已是韶华不再，但是她心态依旧年轻。的确，她很少追思过去。她还是那么时尚优雅，整洁的装束，精致的妆容，名贵的鞋子手袋，依然娇好的身材。作为那个时代的人，李霞卿很“淑女”，娴雅矜持，举止得体。从来没有听说李霞卿高声说过一句话，也从来没有听说她谈起曾经的风发扬厉和辉煌灿烂。她不抽烟也不喝酒。她乐善好施，一直惦念着那些穷苦的人。

李霞卿与父亲情深意笃，当父亲1971年以84岁之龄辞世于香港时，李霞卿悲痛欲绝。父亲李应生是个了不起的人，他走过了不平凡的一生，曾经的革命者、先驱科学家、著名电影人、勘探家、珠宝商、工厂主、慈善家、香港战时消防委员，曾经的流氓大亨和鸦片吸食者。李应生虽是正直仁义之人，但也曾一度与上海滩青帮老大杜月笙过从甚密并深获其赏识。（章末注5）作为一个坚定的反君主制者，一个曾经为建立共和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志士，他却也为世界上最后一位专制君主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所赋予他香港战时的卫戍使命而乐此不疲。（章末注6）在不谙世事的青葱岁月，他曾经妻妾成群，而就在他离世之时，他依然有五六个女人为伴。他慷慨大度，把购置的房产都遗赠给了他的那些女人。

1993年2月，李霞卿的前夫郑白峰去世，李霞卿并未因此而感伤。婚姻不幸让两人相互怀有敌意和仇视，而且这种怨恨结了一辈子。二战后，郑白峰出任中国驻古巴大使，共产党当政后，郑辞官并在美国定居下来。此后，郑白峰先后在联合国、中国通讯社、西北航空公司等机构任职，而他最后服务的机构西北航空公司说起来

还颇有些讽刺意味，因为他的前妻李霞卿就是个狂热的航空飞行迷。郑白峰后来重组家庭，并且又生了两个孩子，但是他从未改变他前妻“已死”的说法。

1997年香港回归，李霞卿作为贵宾获邀出席回归典礼。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李霞卿与其他4000名出席回归典礼的嘉宾一道见证了那历史性的一刻。经历了百年沧桑，当香港终于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中时，85岁高龄的李霞卿发出了一声来自肺腑的欢呼声，整个会场欢呼声响彻云霄，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在她的一生中，她虽然结交了众多西方友人，虽然她最终将家安在美国，但是在她心底，她的根在中国，她一直以自己是炎黄子孙为傲。在香港回归祖国的庄严时刻，李霞卿百感交集，激动万分。“1997年7月1日这一天，将作为值得人们永远纪念的日子载入史册。”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交接仪式的这句话让李霞卿感同身受，深信不疑。

同年晚些时候，李霞卿乘船游历长江三峡，多年前，她曾经驾机飞过崇山峻岭间那蜿蜒曲折的江面。那一次，飞机上的导航设备出了问题，又遭遇雾锁江面，为了不迷失方向，李霞卿不得不降低飞行高度，沿着九曲十八弯的江岸而行，飞机的机翼几乎与岩石峭壁擦肩而过。不过，这次巡游注定不是一次她所希望的快乐之旅。许多同船者咳嗽个不停，等李霞卿回到奥克兰的家时，她也开始咳嗽。李霞卿的肺功能一直不太好，很容易感染呼吸系统疾病，不过她并不以为然。她不顾家人的反对，拖着病体在新年之初去了一趟欧洲。

没想到这个决定最终要了她的命。在欧洲时，她的病情恶化，她不得不提前结束行程返回美国。她被送进了奥克兰的凯撒医疗中心，这个时候她终于把自己交付给孩子们照顾。几天后，李霞卿终告不治。1998年1月24日，李霞卿因急性肺炎在医院辞世。她看上去没有痛苦，走得很安详。

李霞卿的遗体安葬在奥克兰山景墓园的哥特式礼拜堂。这处古老的墓园环境清幽，是不少旧金山名流显贵的最后栖息地。1998年的早春，李霞卿的遗体被安葬在墓园华人墓区的一块斜坡地上。生

前，李霞卿就为自己购置了旁边有四块墓地相邻的单位，她告知家人，死后要把她葬在最中间的那块墓地。这位矜持沉默的女人，这位多年来就连她的家人也把她视为一个谜的女人，即使在身后也拒绝与人为邻，而是选择独享那份孤离与清静。

从她安息之所的斜坡处远望去，旧金山湾若隐若现，60多年前，一位英勇的女飞行员像仙女一般从天而降，落进旧金山湾那冰冷刺骨的海水里。

注释

1 美国副领事奥德姆（J. H. Oldham）致美国空军航空运输司令部及美国海军运输航空处的打印并签名的优先通关证。1946年4月29日。李霞卿家人收藏。

2 “李霞卿女士：驾机表演”，《香港工商日报》，1958年9月12日。

3 本书作者对李霞卿之子郑柏士的采访记录，2005年3月2日。

4 李霞卿的女儿郑木兰嫁给了康涅狄格州的赫尔曼·沃尔夫森（Herman Wolfson）。

5 1949年共产党统治大陆后，杜月笙逃亡香港，但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召来李应生，叮嘱老友保管他的遗骨，待国民党重掌政权时，将他送回国内安葬。

6 有人曾暗示李应生，英女王将授予他骑士爵位，不过后来谣言有传他在战时勾结敌人而未能成真。香港沦陷期间，李应生像其他中国高官一样，被日本人游说与之合作，但作为一个赤胆忠心的爱国者，李坚决不从。尽管如此，谣言蜚短流长，李应生终究未能获得这一荣誉。本书作者对郑柏士的采访记录，2005年3月2日。



第三章

郑汉英：鹰击长空

zheng han ying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李白《静夜思》

24. 引子

1941年春，年方26岁的郑汉英出任中华民国驻加拿大温哥华领事馆外交官。很快，这位来自中国的女子就成了当地家喻户晓的人物。不管何时，当她脚蹬高跟鞋像一阵风一样出入位于黑斯廷斯街（Hastings Street）的领事馆办公室，身材娇小、若有所思的她总是引人注目。年轻漂亮让她赚尽了回头率，但她的魅力绝不仅限于此。在温哥华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身着清一色卡其制服的军人，而一身漂亮的中国空军制服——黑色开衩裙，饰以金质飞行徽章的亮红色束腰上装——打扮的郑汉英以其干练优雅和异域之风构筑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她是一位飞行员，当时女飞行员在中国已属凤毛麟角，而她更是中国空军唯一的一位女官。

这位不同寻常的中国女子集众多“第一”于一身：第一位在香港学习飞行的中国女性，第一位被派到加拿大任公职的中国女子，加拿大第一位持有驻伦敦皇家航空俱乐部颁发的国际飞行执照的女飞行员。她不仅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女外交官之一，而且还是一位语言大师，精通五国语言，巴黎大学法学博士毕业，热心慈善事业。

作为中国空军界的一位大红人（她与宋美龄私交甚厚，其姑父魏道明后出任驻美大使），郑汉英称得上是春风得意，令人艳羡，而她也注定成为一位让西方世界刮目相看的中国新女性。值得称道的是，虽然郑汉英一身光环，但她不事张扬，为人低调谦逊，因而令人肃然起敬。那些资深的记者们采访她时都会一改平日咄咄逼人

的文风，极尽笔墨描绘这位东方女子之美，赞其“肤如凝脂”，好似盛开的荷花娇艳欲滴，而她那银铃般的声音也是那样悦耳动听。一位记者深为郑汉英的美貌而倾倒，在他笔下，郑汉英就是“一位从象牙雕像基座上走下来的美丽公主……”（章末注1）

从那些美誉之词不难看出，郑汉英不仅有着非凡的人格魅力，而且功成名就，一时间成为加拿大颇具盛名的人物。无怪乎海内外民众对她28岁英年早逝深感震惊和扼腕痛惜。有关她去世的消息刊登在当地各大报纸的头版。她的葬礼，由加拿大皇家空军男女分队完全按军队的荣誉葬仪举行，这种高规格的葬礼，通常只有战功卓著的将军以及长期在任的总理才有资格享受。郑汉英何以成为女中典范？作为中国空军唯一的一位女飞行员，她在温哥华的第一要务是什么？她又如何年纪轻轻就撒手人寰？



郑汉英身着飞行服的宣传照，刊于《温哥华日报》（Vancouver Daily Province）。

注释

1 Blanche E. Holt Murison, “Hanyin Cheng of China,” *Saturday Night* (November 28, 1942), 30.

25. 显赫世家

关于郑汉英的生平，有几段空白，许多重要的细节时至今日依然是个谜。她那辉煌而短暂的一生，恰如天上的流星，光彩夺目却转瞬即逝，了解其生平者寥寥无几，而健在者更是难寻。郑汉英在私生活方面极其低调，正因为如此，她在事业如日中天之时怀上私生女一事也不为外界所知。关于她的身世，我们只知其出生于1915年1月17日，即中国农历虎年年末，广东宝安人。朋友们都称呼其英文名“杰西”（Jessie）。

广东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党人长期在广东进行革命活动，革命思想影响深远。广东也是中国航空事业的发祥地，粤籍华侨冯如是中国自制飞机和飞上蓝天的第一人，也是华侨带翅膀踏入故土的第一人。1911年3月，冯如从美国回到广州，筹设“广东飞行器公司”，从事飞机制造，开拓祖国的航空事业。

郑汉英出生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小小年纪的她得以在革命思想的浸淫下长大。别的孩子也许是听着童话故事长大，而小汉英则被那些推翻封建帝制的英雄人物所吸引。当同龄的女孩子可能在接受“三从四德”传统思想的灌输之时，小汉英却已立志要像花木兰那样顶天立地。

关于郑汉英家庭的史料甚少。她有一个哥哥叫郑云。郑云年长妹妹三岁，有资料称，郑家只育有兄妹二人，但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据郑汉英自称，她有四兄弟，一个效力中国空军（估计是指

郑云)，两个任职于政府部门，还有一个任驻美领事。还有证据表明，郑汉英有一个姐姐或妹妹。（章末注1）

郑汉英出生在广东广州府新安县西乡屋下村（今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镇乐群村）一个封建官吏家庭，其祖辈世代代都在清廷为官。有关这一史实，可从她的姑姑郑毓秀的生平资料中得到佐证。虽是出身官吏之家，但是郑家真正发迹应该是从郑汉英的曾祖父郑姚开始。

1840年，郑姚出生于乐群村的一户木匠之家，家境贫苦。当他还在襁褓中时，母亲不幸离世。望着嗷嗷待哺的儿子，父亲一筹莫展。最后，父亲只得挑着他走街串巷讨奶水喝，所以郑姚是吃百家奶长大的。（章末注2）

郑姚有一个绰号叫“界木姚”，他是“郑氏王国”的缔造者，是族人为之骄傲的一个“传奇”。由于家贫，十六七岁时，郑姚便替人家做工。子承父业，郑姚潜心拜师学木工手艺，凭着吃苦耐劳和聪颖机灵，学得一手技术精湛的木工活。因其手艺好，宝安（当时叫新安）县城所在地南头的街坊，凡盖屋娶媳妇、嫁女儿必请郑姚去打造所需的家具。久而久之，郑姚便得了“界木姚”的美称。渐渐有了一点积蓄后，郑姚投资做起粮食和木材生意，靠着聪明和运气迅速发迹，很快成为富甲一方的人物。19世纪40年代初，香港被英国统治，郑姚看准了香港变成商埠后，地产业将会大有发展。于是，他前往香港，将多年积蓄全部投入经营地产业，兴建了许多高楼大厦，成为长袖善舞的大商人。虽然这些财富在历史潮流的跌宕之下最终烟消云散，但是郑公因乐善好施、仗义疏财而名垂青史。发迹后的郑姚感恩图报，在乐群村，他每年两次大摆酒席，宴请族老乡亲。郑姚还曾赈济黄河水灾，受到慈禧太后的封赐。朝廷为褒奖他，赐予“乐善好施”牌匾一块。

清光绪十一年（1885），郑姚在乐群村创建“绮云书室”，占地3000多平方米，砖、石、木结构，单檐硬山顶，辘筒瓦屋面，抬梁式构架，是深圳历史上最大、建筑艺术性最好的私塾学校。建

筑物包括大门、围墙、前殿、中殿、后殿、东船厅、西书楼、明楼、花园、金鱼厅等，规模宏大、气势磅礴。与百米之遥的“郑氏祠堂”相比，无论从占地面积还是建筑规模都要气派不少，可见当年这个家族对教育的重视。该建筑的要雕、石雕、砖雕、灰塑工艺精湛、图案精美，有“深圳的陈家祠”之美誉。特别是所有木制构件均用粗大的红木制作，质地上乘，选料考究，为岭南地区所仅见。

作为一族之长的郑姚共娶妻七人，育有七子七女。老三郑文治，郑毓秀之父，郑汉英之祖父，在清廷户部任职。

郑文治娶清将刘昌华（音译）之女为妻，两人育有两子两女。郑毓秀的母亲虽出身大家闺秀，但长期受父亲冷落，婚姻可谓不幸。郑毓秀出生在乐群村，后随祖母及全家迁到广州，而父亲则与妾室长年留居京城。具有讽刺意味是，郑文治效忠朝廷，而他的子女们个个反叛忤逆，并成为后来推翻满清王朝的中流砥柱。郑文治的两个儿子，其中一位即郑汉英的父亲，姓名不详。大女儿叫郑雪案，小女儿即郑毓秀，她在家中排行老幺，因在女孩中排行第二，人称郑二小姐。郑毓秀，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民国女杰，注定了将对小汉英的成长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的确，在闭关锁国的旧中国，郑毓秀敢为天下先，女侠的快意恩仇与律师的冷静审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特质，却在她身上得到了完美的融合，她也因此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女性人物之一。

在姑姑的影响下，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小汉英从小就懂得了爱国济世的道理，而她的名字“汉英”，即“华夏英雄”之意，似乎也意寓了她将成为一代巾帼英雄，以一颗赤诚的中国心，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而奋不顾身，不畏艰险。

郑汉英的父亲也是一位革命志士，为推翻满朝王朝不惜抛头颅洒热血。郑汉英的大姑郑雪案，虽然没有像妹妹郑毓秀那样为革命党人运送炸弹，先后参与刺杀时任清廷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以及清末大臣、宗社党首领良弼，但是她也积极参与革命运动。而刺杀

良弼的功臣彭家珍正是郑雪案的恋人，为了革命事业，她仍然支持彭家珍的行刺行动，看着爱人慷慨赴死（章末注3）。不过，对郑汉英影响最大的还是要属小妹郑毓秀。这位拥有众多“第一”、可谓开风气之先的女中翘楚，与秋瑾、何香凝等人齐名，也是南京民国政府内声望仅次于蒋夫人宋美龄的女性人物。这位从小叛逆的奇女子，个头不高，擅长交际，无论走到哪里，这个“风度优雅、能言善辩”的中国女性，都是人们视线的焦点。



郑汉英的姑姑、一代女杰郑毓秀博士。

郑毓秀先后写过两部自传，其中一部为英文自传，名叫《我的革命生涯》（*My Revolutionary Years*）。她个性叛逆，“天生就有造反精神”（郑毓秀语）。与贤淑传统的大姐不同，郑毓秀从小就将“三从四德”的规训置之脑后。反对缠足，是她革命的开端。当时裹脚之风犹存，家人忧其不缠脚，将来大脚女难以嫁人，然而任凭家人软硬兼施，年仅五六岁的小毓秀死活不让缠脚，家人无计可施只好作罢。光绪三十年（1904），郑毓秀年方13，初涉人事，当她得知祖母在她年幼时就把她许配给了当时两

广总督的儿子而颇为不满，性格叛逆的郑毓秀竟提笔给曾家公子写信，坦率地表明自己的意愿，希望解除婚约。在她的坚持下，退婚终于成功。为此，她还惹了一场风波，只好离家出走。光绪三十一年（1905），郑毓秀进入了天津“崇实女塾”教会学校，接受西式教育。当郑毓秀获悉革命党人在日本的消息后，说服父亲同意，前往日本留学。在东京留学不久，经廖仲恺先生介绍，郑毓秀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党——同盟会。这一年是1908年，郑毓秀只有15岁。从此，郑毓秀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推翻满清王朝、打倒军阀统治的革命行列队伍中来。

孙中山主张共和制，主张用暴力和革命方式推翻清政府。为

此，同盟会发动了数次武装起义，但都相继失败。为挽救革命，同盟会组织成立“敢死队”，目的是暗杀清廷要员。郑毓秀也加入了“敢死队”，任务是乘火车由天津秘密运送炸药至北京。她利用自己是清廷官员女儿的身份，加上自身的机智勇敢和社交界的名气，以及一位法国外交官和几位外国朋友的掩护和帮助，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辛亥革命爆发后的一两个月，郑毓秀多次为革命党人秘密运送军火，传递情报。作为颇富传奇色彩的女性，郑毓秀两次参与了革命党人暗杀清廷要员的活动。第一次是刺杀袁世凯。时值辛亥革命爆发，清廷恐惧，为挽时局，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以镇压革命党人。于是，革命党人决定行刺袁世凯，郑毓秀是刺袁行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1912年1月15日晚，各刺杀小组已奔赴战斗岗位，准备于次日在预定地点同时向袁世凯投炸弹。在最后时刻，郑毓秀突然接到同盟会驻北京支部的紧急命令，指示放弃刺袁行动，因根据最新情报，南北议和的真正阻力并非来自袁世凯，而是来自良弼。郑毓秀连夜行动，根据平时的线索，通知了八位战友，但未及时接到通知的战友还是按计划实施了刺袁行动，结果未获成功。刺袁行动十几天后，郑毓秀又加入了行刺良弼的第二次暗杀活动。良弼是满人，掌握着一定数量的军队，是宗社党的核心人物。他仇视革命党，坚决反对清帝退位。郑毓秀等接到任务后，吸取了刺袁行动的教训，决定派一人先接近良弼，然后近距离炸死他。革命党人彭家珍自告奋勇，愿意承担这个有去无回的任务。1月25日，行刺前的一天，郑毓秀与彭家珍进行晤谈，场面十分感人。彭视死如归，大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英雄气概。尤其是郑毓秀的姐姐与彭正在热恋之中，生离死别，郑雪案伤心欲绝。郑毓秀也十分悲伤，但为了革命事业，仍然坚决支持彭家珍的行刺行动。由于郑毓秀等人的周密安排，刺杀良弼的行动终于成功。

活跃了几年的郑毓秀忽然发觉，救国救民，仅有热情还远远不够，必须具备先进的思想和技术，才能有真正的用武之地。再加上，她获知袁世凯有暗杀她的计划，于是在1914年，也就是郑汉英出生的前一年，她选择赴法留学。她的革命生涯暂告一段落。她

在巴黎取洋名苏梅，进入巴黎大学的前身索邦大学攻读法学专业。学习期间，郑毓秀依旧活跃于社交界，是巴黎华人女性的杰出代表。郑毓秀不但聪明好学，为人热情，且风度优雅，口舌如簧，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有一次，在法国大学成立中法协会时，她登台演说，面对数千听众，用慷慨激昂的语气，宣扬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以及爱和平、重信义的传统美德，使听众耳目一新。之后，欧洲各国文人、政府都向她了解中国的真相，郑毓秀也因此扬名巴黎。经过3年的刻苦攻读，她于1917年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巴黎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并继续攻读博士学位。1925年，品学兼优的郑毓秀终于取得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中国女性。同年，郑毓秀归国。1926年，郑毓秀与同学魏道明博士在上海法租界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开展律师业务，并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律师。同年，郑毓秀与魏道明结为伉俪。以后，郑毓秀利用自己的法律知识和人际关系，积极参与一些重大的社会事务活动，开始扬名上海滩。除了从事律师工作外，郑毓秀还在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里担任过多项重要社会职务。1927年，郑毓秀历任上海审判厅厅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江苏政治委员会委员、江苏地方检察厅厅长、上海临时法院院长兼上海发行院院长。1928年，郑毓秀出任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同时还任法制委员会与外交委员会委员。

在郑毓秀的人生经历中，特别值得称道的，一是她曾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巴黎和会”，二是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第一届立法委员（为最初的51名委员中仅有的两名女性之一，另一位是宋美龄），主持了民国《民法》的起草工作。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召开“巴黎和会”，中国作为战胜国也派代表出席了和会。郑毓秀因精通英、法两国语言，被任命为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成员，担任联络和翻译工作。郑毓秀当时还是留法学生组织的重要领袖，是组织留学生经常到中国代表团驻地游行、请愿，要求代表团拒绝签字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和会期间，给人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郑毓秀导演的“玫瑰枝事件”。郑毓秀“以玫瑰为枪”，阻止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团团长、北京

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在和约上签字，从而使中国政府保留了收回山东的权利。女侠的这一义举，成为当时街头巷尾的热议话题。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成立，次年1月即指定郑毓秀和傅秉常、焦易堂、史尚宽、林彬五人组成“民法起草委员会”，专门负责《民法》的起草工作。由此可见，郑毓秀丰富的法律实践经验和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在当时是屈指可数的。作为民法起草委员会的五委员之一，郑毓秀浏览了大量的欧美有关法律，汲取世界法律的精华，将其与中国国情结合，草拟这部中国民法典。她本着法国大革命人权宣言“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促使《民法》对旧社会组织以重大变革，规定未婚、已婚女子，与男子同享平等的继承权；承认夫妻彼此有继承遗产的权利；并规定家庭中未婚成年女子有权签订或废止婚姻契约；已婚妇女有权保留自己的姓氏，不冠夫姓，意即男女在家庭中地位平等。这部《民法》草案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郑毓秀努力维护女权的结果。

1926年，郑毓秀与巴黎大学的同学魏道明博士在上海法租界开设了“魏郑联合律师事务所”，次年，两人结为秦晋之好。两人的结合可谓珠连璧合，相得益彰。郑毓秀风风火火，敢作敢为，而魏道明中规中矩，老成保守。两人在事业上相互扶持、亲密合作。1942年，魏道明接替胡适任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郑毓秀成了大使夫人，协助夫君开展外交工作。1947年，魏道明改任台湾省主席，郑毓秀随夫赴台北。1948年，陈诚取代魏道明任台湾省主席，同年郑毓秀夫妇移居美国，从此淡出了政治舞台。

民国四年（1915），郑汉英出生于显赫的郑氏家族。从小，她就深受姑姑郑毓秀的影响，姑姑的坚忍不拔与奋发图强为小汉英树立了榜样，而郑毓秀也不断教育侄女，树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章末注4）

在姑姑和其他家人的影响下，30年代初，郑汉英一俟从香港某中学毕业后，就踏上了留学法国之路。法国是中国留学生首选的求学之地之一，究其原因，该国有着悠久的革命传统，1789年在巴士

底监狱爆发的一场革命推翻了该国的君主专制政体。郑汉英循着姑姑的足迹，进入巴黎大学攻读法学。受家人的影响，郑汉英立志做一名外交官，而攻读法学有助于她实现这一梦想。“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日益膨胀的侵华野心毕现，像许多热血青年一样，郑汉英深切地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妇有责”的道理。

巴黎大学是个求学的好地方。巴黎大学是一所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综合大学，其前身是建于1257年的索邦大学。它与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以及萨莱诺大学并称欧洲最早的三所大学，故被誉为“欧洲大学之母”。古老的校园，自由的学术气氛，深深地吸引着求知若渴的郑汉英。巴黎大学原址坐落在巴黎市第五区，是个知识密集的地区。因为13世纪的大学里以拉丁文传授知识和交谈，所以该区又称为“拉丁区”。长期以来，学界人士和青年学生不满足于课堂上的知识传授，而是热衷于课堂外的自由讨论，1930年代的巴黎更是大批怀有自由独立思想的文化精英的聚集之地。因此，除了刻苦学习，郑汉英也热衷社交活动，从校园外汲取给养。

郑汉英在灯城巴黎所感受到的自由民主之风与邻国集权独裁、不容异己的政治风气形成了鲜明对照。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上台，夺取政权的希特勒旋即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犹运动，犹太人的财产被剥夺，大批犹太人遭到逮捕和屠杀。意大利独裁者、法西斯主义的创始人贝尼托·墨索里尼对外煽动民族沙文主义，推行军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1934年12月5日，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毗邻意属索马里边界附近的瓦尔瓦尔蓄意制造边境事端，成为意大利大举进攻埃塞俄比亚的前奏。

德意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思潮泛滥，使原本宁静的校园也变得嘈杂不堪，在郑汉英求学的最后一年，巴黎大学法学院多次爆发学生骚乱。时任巴黎大学国际法学院院长的加斯顿·杰泽（Gaston Jéze）博士不仅是一位国际公法教授，还是一位著名的人权活动家。1933年至1939年间，杰泽博士担任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的法律顾问。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后，杰泽博士分别在海牙国际法庭和国际联盟为埃塞俄比亚辩护，谴责法西斯军

国主义，因而惹怒了包括学生在内的法国右翼民族主义者。这些激进分子在巴黎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杰泽博士辞职。在巴黎大学，右翼学生更是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用臭气弹搅乱课堂，叫嚣着让杰泽博士滚出校园去。更有甚者，有学生当众烧毁杰泽博士的相片。

有资料表明，郑汉英很可能见证了这场骚乱，并在这场学潮中表现冷静，不盲从。郑汉英虽出身于革命之家，关心政治，满怀爱国之情，但在这件事情上她能够明辨是非，坚决支持杰泽博士的立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的野蛮侵略让富有正义感的郑汉英义愤填膺，更让她联想到遭日寇铁蹄践踏的祖国。“九·一八”事变后的几年时间里，东北三省沦陷。中日民族矛盾日益激化，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国民政府既要抵御外侮，又要忙于国共斗争，内忧外患使中华民族置于水深火热之中。

远在异乡的郑汉英密切关注着国内局势的发展，与此同时，她尽情地享受着巴黎这座历史名城的熏陶和浸淫。雄伟壮观的各式建筑，时尚优雅的街头女郎，让这座城市充满了古典与现代之美。光荣的革命传统，以及有着强烈民族自豪感的人民，都让郑汉英对这座魅力之都油然而生一种敬意。而听到法国国歌《马赛曲》中的那两句“武装起来吧，人民！组成属于你们的军队！”，郑汉英不禁热血沸腾。法国大革命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也成了郑汉英的座右铭。郑汉英说得一口流利的法语，巴黎女人的那种时尚优雅在她的身上同样表现得一览无余。除了法语，郑汉英还学习意大利语、德语，为了提高英语水平，她时不时往返于英法两地之间。1936年，郑汉英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此时的她，已经出落成一位兰质蕙心、阅历丰富、受过良好教育、满怀理想主义情怀的新女性。（章末注5）在姑姑郑毓秀的影响下，郑汉英也成了一名坚定的女权主义者。几年的国外学习和生活，让郑汉英变得成熟练达，富有社会责任感。

注释

1 香港英文报《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报道称，郑

汉英和哥哥郑云“无其他兄弟姐妹，因此可以当之无愧地说，这一家中的两个孩子都献身于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Chinese Girl Flier; First to be Aviation Student in This Colony,” SCMP, February 6, 1937）。不过，郑汉英到加拿大后，至少在两个场合向记者公开表示她有四兄弟：“她的四个兄弟也在政府部门工作（其中一个在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任职），而且他们也表示会兢兢业业，恪尽职守。” [Ben V. Williams, “We Want to Go To China”, *Forward*, vol. 9, no. 11 (August 1942): 3]; 另据加拿大阿尔伯塔省莱斯布里奇当地报纸《莱斯布里奇先驱报》（*Lethbridge Herald*）报道称，“这位由蒋介石委员长亲自授予飞行中尉军衔的中国女飞行员有四兄弟，一位是中国空军飞行员，两位在中国政府部门任职，还有一位任中国驻美领事官。”（“Flt. Lieut, Hanyin Cheng Predicts Great Future for Chinese Women in Aviation,” *Lethbridge Herald*, November 30, 1942）。郑汉英的儿子郑柏士回忆说，1945年，他曾与一位在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任职、名叫郑保华（音译）的人见过面，但不知其人是否就是郑汉英的兄弟。郑汉英的姑姑郑毓秀在她的英文自传《我的革命生涯》（*My Revolutionary Years*）中描述抗战期间随国民政府西迁重庆时这样表示：“一些亲戚与我同行，其中包括我二哥的一个儿子。二哥数年前去世后，一直由我承担着照顾他的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的重任（这四个儿子中，有一个在上海大学法学院读书，直至上海沦陷，还有一个已在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工作了一段时间。）这位与我同时撤离到重庆的侄子从18岁时起就迷上了飞行。” Mme Wei Taoming, *My Revolutionary Years* (NY: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43), 225. 郑毓秀在自传中还提到，她的外甥女（指郑汉英）也像侄子郑云一样，在抗战爆发前成了一位商业飞行员并随后加入中国空军。除了郑毓秀在自传中提到二哥有两个女儿外，她有关二哥有四个儿子之说与郑汉英称自己有四兄弟的说法相吻合。按照中国传统习俗，估计郑毓秀的二哥，即郑汉英的父亲，有至少一房妾室，其六个子女非同母所生。

2 唐冬眉，《穿越世纪苍茫：郑毓秀传》（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4—7。

3 同上，353。1912年1月26日，京津同盟会暗杀部长彭家珍自告奋勇前往刺杀亲社党首领、晚清的保皇派良弼。良弼被炸断左腿，两天后死去。彭家珍因头部被炸，当即牺牲，年仅23岁。彭家珍刺杀良弼直接导致了清朝的覆亡。1912年2月12日，即彭家珍刺杀良弼之后半月，清

飞天名媛
Sisters of Heaven

宣统帝下诏宣布退位。彭家珍也被追认为革命烈士。Bessie Van Vorst (McGinnis), *A Girl from China* (Soumay Tcheng), (New York: Frederick A. Stokes Co., 1926), 138-141。

4 郑毓秀的确是一位颇具说服力之人。1920年，还在巴黎索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郑毓秀应教育家吴玉章的邀请，从法国回国，赴四川宣传男女平权，鼓励女生出国留学。同年12月，郑毓秀与张申府、蔡元培、陈大齐、刘清扬等同船去法国，临行前，郑毓秀成功说服四川女生张振华等6人一同赴法勤工俭学。郑毓秀不仅为其筹措出国旅费，还利用个人关系，为留学生解决学习期间的生活困难等问题。

5 关于郑汉英的学历有疑问之处，她在巴黎大学获何学位、回国后是否继续大学教育均不得而知。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1937年2月3日刊登的一篇文章称，郑汉英获得理学学士学位，但是当她开始加拿大巡回募捐演讲之时，有几篇报道称郑拥有文学学士学位，而且至少有1篇报道称其获得法学硕士学位。从现有的史料来看，郑汉英不可能有时间攻读研究生学历，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产生歧义可能是因为巴黎大学用“maître”或“master”（硕士）一词来指代其学士学位获得者。

26. 中国铁翼

郑汉英在法国求学之时，其父母迁居上海，学成归国的郑汉英遂来到上海与亲人团聚。姑姑郑毓秀此时已扬名上海滩，她与人共同创办了上海第一所法学院——上海法学院——并兼任院长，此外，她还在南京路开办了女子商务储蓄银行。素有“东方巴黎”美誉的上海，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经历了最鼎盛的时期，商业欣欣向荣，民族资本业也极为发达，这座城市的发展程度甚至超过当时的纽约、巴黎，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经贸中心。在这块生机勃勃、商机无限的土地上，郑毓秀大展身手，很快就名震沪上。在姑姑的引领下，郑汉英得风顺水地进入了上海滩的上流社交圈。

郑毓秀好交际，经常在她位于法租界海格路（今华山路）的“范园”家中聚朋会友。郑毓秀喜欢讲排场，所以家中经常高朋满座。近水楼台，郑汉英也因此结识了许多国内的大红人。虽然不过二十出头，但是郑汉英以其聪慧机智，在那帮达官显贵、贾商巨富甚至黑社会老大的交际中显得格外的从容自信和游刃有余。

郑汉英不愧在时尚之都巴黎生活多年，其着装打扮富有品味，华而不俗，这也使得她在那些名流云集的聚会中脱颖而出，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据说，有一次，郑汉英和姑姑一同出席庆祝上海著名时装设计师张倩英新店开张的茶会。上海滩上最富有、最漂亮的女人们几无例外都是一身华服、珠光宝气地出席这一活动，而郑汉英则以一袭饰以红黑缎子滚边的深黑色礼服亮相，简约不失庄重，

素朴不失典雅，其清新高贵顿时令妖冶俗艳黯然失色。（章末注1）巧的是，郑汉英姑姑的一位朋友——颜雅清小姐——也获邀出席了这一聚会，而她也将在不久的将来立志翱翔蓝天。

郑汉英的堂嫂李霞卿，这位被誉为“中国第一位女飞行员”的奇女子，也居住在上海。其时，李霞卿结束在美国波音航空学校的学习归国不久。1929年，在郑毓秀的撮合下，李霞卿嫁给了郑汉英的堂兄、时任国联秘书的郑白峰，才子佳人，成就一段佳话。然而，世事难料，此时李霞卿刚刚与郑白峰结束了这段姻缘。1936年3月，曾经令人艳羡的一对分道扬镳。按照媒体披露的说法，李霞卿与丈夫离婚是“为投身中华航空事业之发展”。

李霞卿的满腔爱国热情以及对航空事业的痴迷对郑汉英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正像那个年代的许多同龄女子一样，郑汉英也深深折服于那些女飞鹰的飒爽英姿和英勇神武，期待自己有一天也能插上翅膀。当她还在巴黎求学时，整个欧洲都在为法国著名女飞行家麦瑞斯·希尔兹（Maryse Hilsz）的飞行壮举而激动不已，1930年，希尔兹驾机从巴黎飞抵越南西贡（今胡志明市）并顺利返航，从而成为世界上第一位飞越欧亚大陆的女飞行员。无独有偶，1933年，希尔兹又进行了一次欧亚冒险之旅，不过这一次目的地改成了东京，结果希尔兹不仅再次挑战成功，而且还创造了新的飞行速度纪录。法国上下群情亢奋，纷纷以各种方式庆祝这位女飞人所取得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成就，几乎每个镇都会以希尔兹之名来命名一条街道。从那时起，郑汉英就对飞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她之所以向往翱翔蓝天，也是出于航空救国的抱负和理想。在巴黎，郑汉英甚至还初次体验了飞行。她的哥哥郑云醉心于飞行，在姑姑郑毓秀的资助下，郑云完成了系统的飞行学习，成为一名飞行高手，有那么一两次，他带着妹妹郑汉英坐飞机体验飞行。

“他经常跟我侃侃而谈飞行，”郑汉英数年后这样解释道，“偶尔他也会带我一起体验飞行。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也立志成为一名飞行员。”（章末注2）

不难设想，当郑汉英在上海与大名鼎鼎的女飞行家、曾经的嫂

子李霞卿重逢，两个怀有同样蓝天梦想的人会产生怎样的碰撞和火花。从美国学成归来的李霞卿刚刚在上海创办了中国飞行社并亲自担任飞行教练，迷恋飞行的郑汉英完全有机会与李霞卿，这位飞行社唯一的女教练，同机飞行。要知道，中国飞行社成立后，报名学习飞行的民众十分踊跃，李霞卿经常载着那些飞行爱好者沿着黄浦江两岸，在外滩一线的摩天大楼上空体验飞行。

1936年10月，为庆祝蒋介石五十寿辰，上海举行了盛大的献机仪式。仪式上，李霞卿表演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飞行特技，这是她第二次在龙华机场进行花式飞行表演，再一次引起轰动。整个上海滩万人空巷，争睹女飞人风采，郑汉英也很可能是其中的一分子。在这次飞行表演后，李霞卿、颜雅清等人组织了一个女子团体，旨在唤醒年轻女性对航空事业的关注，郑汉英当时也极有可能参与了这一运动。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李霞卿飞行表演后不久，郑汉英就决定投身祖国的航空事业。

1937年新年伊始，郑汉英告别在上海的亲朋回到香港，进入远东飞行训练学校学习。（章末注3）郑汉英之所以选择在香港学习飞行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来，香港是她的家，不过更重要的是，她的哥哥郑云已早她一年进入远东飞行训练学校学习。有哥哥的支持和鼓励，郑汉英可以更加无惧飞行学习之苦，更加坚定在飞行这一男性专属的领域闯出自己的天地。再者——或许这是最主要的原因——香港远东飞行训练学校是亚洲首间、也是首屈一指的飞行学校，师资力量雄厚，其教官由英国礼聘皇家空军退役



香港远东飞行训练学校（Far East Flying Training School）的招生广告。

人员至港任教。学校提供商业飞行执照、私人飞行执照、航空工程等一系列课程。由于师资力量强，资源配套齐全，二战前吸纳了不少侨居外籍人士、海外华侨和学生赴港留学，甚至连国民地方政府也派遣官费学生留学。

远东飞行训练学校位于九龙启德机场的西南端，不久前学校对飞行区和机库区进行了扩充。学校在招生资料中称，自1934年正式开办以来，其飞机飞行里程已达50万英里，从未发生严重的飞行事故。学校拥有两架英国爱弗罗 Avro 626 型多功能教练机以及两架爱弗罗 Avro 631 Cadet 双座中级教练机。此外，飞行学校还有两架教练机，一架是英国费尔雷“狐狸”（Fairey Fox）轰炸机，用于地面训练教学。稍后，学校又购置了一架英国德哈维兰虎蛾双翼教练机。与学校之前拥有的两架爱弗罗教练机不同，这架虎蛾教练机的飞行座舱为开放式，因此乘员必须戴上头盔和护目镜。此外，虎蛾教练机为双座双翼机，机身内空间较大，教官和学员坐在里面不会感到局促。

最值得称道的是飞行学校的师资力量，其教员中不乏响当当的人物，其中包括第13代汉密尔顿公爵之子马尔科姆·道格拉斯—汉密尔顿勋爵（Lord Malcolm Douglas-Hamilton），汉密尔顿勋爵曾服役英国皇家空军，他同时拥有商业飞行执照（章末注4）。其他教员，如飞行上尉史密斯（P. H. Smith）、飞行中尉朗菲尔德（G. P. Longfield），都曾是英国皇家空军的王牌飞行员。学校还配有中国教官，并安排了一位特别的联络官洪家铭（音译）先生，专门负责外籍教官与中国学员之间的联络。

飞行学校亦给香港义勇军航空部队提供训练和为香港皇家天文台收集气象资料。飞行学校不仅是香港境内唯一一个提供飞行训练的组织，而且也是英国皇家空军认可的一家飞行学校，同时它也是英国皇家空军在英国本土外创办的唯一一家以推广业余飞行运动为宗旨的训练学校。英国皇家空军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精锐的空军部队之一，能够在它所属的飞行学校进行学习意味着郑汉英将接受最好的飞行指导和训练。就在郑汉英入学的那一年，有6名英国皇

家空军预备役军官也进入学校，进行一年一度的飞行训练。学校为了满足他们更高标准的训练要求，对其中一架爱弗罗教练机的装备进行了更新换代，这样一来，郑汉英和她的同学们也就沾了光，他们因此有机会学习投弹、射击、航拍以及盲飞等飞行技巧（章末注5）。

启德机场在发展成国际机场之前就已经是客运业务十分繁忙的机场。1936年是香港航空史的重要一年，世界首家商业航空公司——英国帝国航空公司（Imperial Airways，即英国航空前身）——提供来往香港的客运服务。3月24日，第一班定期商业客运航班从槟城飞抵香港。此后，陆续有航空公司加入提供航班服务，包括：泛美航空公司来往旧金山，法国航空公司来往印度支那半岛，中国航空公司来往广州及上海，欧亚航空公司来往北京。此外，启德机场还建有一条特别的混凝土下水滑道，供水上飞机在九龙湾升降之用，往返旧金山的“飞剪号”水上飞机定期在此停泊。启德机场还拥有最先进的跑道灯光系统和安全系统，应急救援措施相当到位，如遇紧急事故，装备精良的救护车和救火车能够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远东飞行训练学校位于启德机场的西南端，新填地街与西贡街的交汇处，学校主楼距九龙城巴士站不远。主楼内设学员食堂、宿舍，甚至还配备一间女生更衣室。在开学说明会上，郑汉英了解到，学校正常的作息时间为平时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周六早上8点到下午2:30。飞行训练为全日制学习，除非特殊情况，学员一律不得缺勤。机场起降跑道不远处的迫降地面让郑汉英大感兴趣。飞行事故关乎人命，为以防万一，她很有必要掌握紧急着陆技术。

1937年2月2日，也就是她22岁生日仅两周后，郑汉英开始了在远东飞行训练学校的学习。她这一届新生共80人，分别攻读飞行和航空工程专业。虽然郑汉英并非入读该校的第一位女生〔第一位女生名叫吉恩·麦琪（Jean Mackie），她于3年前获得飞行执照〕，但她却是在该校学习飞行的第一位中国女子。（章末注6）

郑汉英的曾祖父郑姚正是在香港建立基业，所以她对港岛也非

常熟悉。不过，第一次翱翔在香港上空还是令郑汉英有种发现新大陆的感觉。如果说登上太平山顶俯瞰全城已经是美不胜收的话，那么从空中鸟瞰这个海港之城更是蔚为壮观。在沿着熙熙攘攘的维多利亚港作首次低空飞行时，郑汉英注意到，港湾两岸高楼耸立，鳞次栉比，仿佛蜿蜒着叠积在一起的岩层，楼宇与楼宇之间几乎没有任何间隙。那些狭窄的街道犹如黑色的裂缝，将楼宇间隔而开。那看上去经不起风吹雨打的登岸码头在薄雾缭绕的蓝色港池内伸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小船只在港内穿梭往复，川流不息。飞上蓝天前，郑汉英就立志航空救国，而飞上蓝天从空中领略祖国大地之壮美后，她的这种决心更加坚定，更加矢志不移了。

作为第一位、也是当时唯一的一位中国女学员，郑汉英的出现立刻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在郑汉英开始接受飞行训练的次日，香港《南华早报》的一位记者就赶到学校，试图对她进行采访。媒体的突然造访让郑汉英感到很难堪，因而她拒绝配合。在她看来，这种不请自来不仅侵犯了她的隐私，而且将她的一举一动曝光在公众面前有违其本意，她本来是想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学习飞行。

“要是我不及格毕不了业呢？”郑汉英未作明确表态，冲口说了一句。

不过，这位记者并不气馁，就算这位采访对象不配合，他也打算写篇文章好好夸夸这位年方23岁、美丽优雅的女飞行员。他想方设法搞到了郑汉英的飞行日志，并从中获得了有关这位美女飞行员的个人信息，包括体重（104磅），身高（5尺4英寸）。在当时，撰写有关年轻貌美的女子的文章都会惯例性地提及身高、体重这些个人信息，不过，郑汉英本人却对这些信息讳莫如深（她很在意别人知道她个子小，据说，她的细腰用双手就能箍住）。她对公开披露这些信息很不领情，可以说，这种不领情到了一种既难为情、又十分反感的地步，无怪乎从此以后，她坚决不向前来采访她的人提供任何有关她的个人信息。不过，郑汉英越是想捂住隐私，媒体们就越有兴趣挖掘那些“猛料”，然后抖搂给读者。

郑汉英订下的学习目标是，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拿到“A级”私

人飞行执照。为达此目标，她必须有数小时的单飞记录，而且必须通过两次飞行测试，测试内容包括完成翻转、筋斗、俯冲等各种飞行技巧。此外，郑汉英还必须参加一个关于航空法与空中导航的口试。整个测试过程极其严格，历时8小时至10小时之久。郑汉英的哥哥目前正在备考“B级”商业飞行执照。哥哥郑云称得上是飞行训练学校里最有实力的学员之一，有哥哥作榜样，汉英浑身充满了动力，她专心致志地投入学习。

每天早上，当学校的飞机在明媚的阳光下驶出机库，开往停机坪，郑汉英都会兴奋不已。学校的母公司，远东航空公司，正从英国进口各式飞机，这些飞机将运抵启德机场，并在交付给中国买家前在启德机场进行装配和测试。郑汉英借此难得的机会熟悉了许多不同款式的飞行器，其中最让人大开眼界的是1937年5月到货的西班牙产谢尔伐（Cierva）自转旋翼机。在那段日子里，除了日常的飞行训练，郑汉英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了研究新机型以及参加设在启德机场的香港飞行会组织的各种活动上（郑汉英为飞行会会员）。飞行成了她生活的全部。

郑汉英开始飞行学习的两个月后，李霞卿抵港，申办香港的商业飞行执照。这位大名鼎鼎的飞行家当时正在为西南航空公司作为期6个星期的志愿运输飞行。为了激起同胞对航空事业的关注，此前李霞卿已在国内作了两次长途飞行。正是因为李霞卿在西南航空公司执飞期间的出色表现以及她那种敢闯敢干的精神，给了学习初期的郑汉英莫大的鼓励和鞭策。

不过，对郑汉英来说，当年最值得一提的莫过于哥哥与同伴的历险飞行。1937年6月7日，郑云与何德生——郑汉英班上持私人飞行执照的同学——各自驾机起飞，进行当天的单飞训练。几个小时过去了，两人均未按时返回启德机场。郑汉英提心吊胆，生怕哥哥出什么事，而学校方面则对外声称，两人的飞行技术过硬，不会有什么问题。到了第二天，郑汉英悬着的心总算落下来了，迷途的哥哥和何德生分别在广东境内被发现，两人安然无恙。

事后，郑云讲述了当天的历险经过。起飞一段时间后，他发现



何德生莫名其妙地朝广东方向飞去，但他无法确定同伴的准确位置。事实上，何德生在飞离香港大约200英里时就已经完全迷失了方向，最后他只得在一条河岸边迫降。但未曾想河水猛涨，飞机部分被淹，无法再次起飞。而就在此时，郑云继续飞行，因为云层浓密也迷失了方向，最后迫降在广州机场，虽然迫降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但是燃油几近耗光。这两人这次可算是“私闯”中国领地，因为他们一没有大陆的准飞证明，二连最基本的文件也未随身携带，比如说飞行日志、飞机注册证明以及飞机耐飞性证明。这些都是严重违反航空法的行为，更何况当时正逢乱世，两位莽撞的年轻人因间谍嫌疑被拘留，他们所驾驶的飞机也被扣押。

不过，这对包括中英文报纸在内的当地媒体来说，无异于一条爆炸性新闻。有关民国风云人物郑毓秀的侄子郑云“私闯”中国领空的消息占据了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香港远东飞行训练学校派出一位教员乘火车赶往广州，开展积极的营救工作，由于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兼广东全省保安司令的吴铁城的及时斡旋，两位年轻人终获无罪释放。吴铁城调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之前任上海市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与郑毓秀乃旧交，此次事件最终顺利解决估计是郑毓秀在后台运作。这并非第一次，也非最后一次，郑家人在关键时刻得贵人相助。

两位年轻人在广州负责华南防御的第四路军军事法庭上受审，广东省政府及警察局的有关人员出席了审判。两人获保释当庭释放，广东当局责令其立返香港，并到九龙地方行政长官处报到。广东当局以违反多项航空法规为由，向两人课以罚款。此次事件正好一个月后，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始全面侵华。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即七七事变后，日本动员几乎全部军事力量，开始全面侵华，抗日战争爆发。起初，战火并未波及香港，但是形势很快发生了变化，当成千上万的难民从北方敌占区涌向华南和香港，战争的阴云也开始笼罩着港岛这块弹丸之地。还在飞行学校学习的郑汉英见证了这一时期由于难民潮所引发的各种

社会问题。

尽管战事一触即发，但是不少港人还是对港岛免受战乱之扰抱有幻想。就连郑汉英本人也相信，一旦战事爆发，英国驻军也有能力保卫港岛。英国驻远东军总司令、空军元帅罗伯特·布鲁克·波斐（Sir Robert Brooke-Popham）的一番有关“香港可能在数日或数周内沦陷的说法完全是一派胡言”的言论，更是让包括郑汉英在内的许多港人充满了信心。（章末注7）

就在时局动荡、情势不确定之时，郑汉英依然专心致志地学习飞行。国难当头，黎民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更增强了郑汉英学习本领、保家卫国的决心和信念。因战时航空管制，郑汉英和同学接获命令，不得在指定的防空火力上空一万英尺下飞行。此外，他们还必须严格遵守在启德机场上空半径不超过3英里的范围内飞行之规定。此时的香港虽说暂时风平浪静，但是难保飞机飞离其领空不遭到攻击。（章末注8）

就在外界纷纷扰扰，各种流言尘嚣而上之时，郑汉英利用学校能够提供的一切有利条件专心学习。1937年夏，郑汉英参加最后一门飞行测试。这次测试考查的是包括盲飞在内的特技飞行，特技飞行要求有过人的胆识和勇气，当郑汉英顺利通过考试之时，其自豪之情溢于言表。随后，郑汉英又通过驻伦敦的皇家航空俱乐部获得了法国国际航空联合会（Fédération Aéronautique Internationale，简称FAI）颁发的国际飞行执照。拥有FAI的国际飞行执照意味着郑汉英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飞行，这一资历无疑又让她向外交官的梦想迈进了一步。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不到一周后，满载着妇女和儿童的难民船陆续抵达香港。第一艘抵达港岛的邮轮“拉杰普达那号”（Rajputana）载着一千名乘客驶进维多利亚港，紧随其后的是“亚洲女皇号”（Empress of Asia）以及其他载有更多难民的巨轮。郑汉英在报纸上登载的冗长的乘客名单中搜索着熟人的名字，赫然发现许多熟人的名字在列，这些上海的老熟人，有国人也有洋人，如今都逃到香港避难。一时间，香港人满为患，赛马会、跑马

地马场以及其他能够作为难民安置点的地方都挤满了人。然后旋即，另一股难民潮不期而至，这一次是满载着广东难民的火车从广州陆续抵港。香港居民一方面全力救助那些需要帮助的难民，另一方面又为可能爆发的战事作自保的打算，整个港岛被一种紧张而恐慌的气氛笼罩着。

时局的发展让郑汉英十分担忧，她想做的不只是折绷带、织袜子，而是希望能为国家做更有意义的事。实际上，在卢沟桥事变后不久，郑汉英就向国民政府有关方面提出为国效力，上天杀敌，但是几个星期过去了，她的申请一直没有消息，她焦躁不安，心神不宁。终于等到8月的第三个星期，她收到了一封来自国民政府的电报，邀其北上为国效力。（章末注9）郑汉英大喜过望。国民政府派她到航空委

员会任职。航空委员会主管全国的航空事务，下设几个部门和委员会，包括航空训练、人事调配、空军基地建设、飞机制造以及空防等在内的各种与航空有关的事务都在其管辖范围之内。航空委员会同时也是中国空军的最高统帅机构，当时由挂中将军衔的宋美龄任委员会秘书长并亲自领导中国空军。

宋美龄与郑家是相交（她与郑毓秀曾共同出任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首届立法委员），郑汉英能够进入当时令人艳羡的航空委员会工作可能得益于这种裙带关系，但是客观地说，郑汉英本人也是该职位的最佳人选。郑汉英正是凭着自己良好的家庭背景、留法法学博士的头衔以及高超的飞行技巧，在航空委员会谋得了一份差事。估计她也沾了性别优势的光。宋美龄一直倡导年轻女性参与中国航空事业的建设，能有郑汉英这样一位高素质的人才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想必她是非常欣慰的。

女飛行員鄭漢英

日間北上

××××××××××

奉業於本港遠東航空
學校之女飛行員鄭漢
英女士、最近得接中
央當局電邀北上。×

××××××××××

記者據鄭女士友人稱
、鄭女士自離中央電
召後、本擬即日趕程
當可北上云。

北上參加、惟因料理
私務、故暫延遲、至
其行期、在短期間內
當可北上云。

1937年8月21日，《香港工商日报》刊登消息称郑汉英获中央当局电邀北上为国效力。消息中有关日本侵略和抗日的“敏感字眼”均被涂黑或用×号隐去。

郑汉英对飞行技术创新非常感兴趣，而且对这一领域有颇多研究，不过她在航空委员会的一项重要职责是公关工作。这部分的工作内容包括向民众宣传航空知识，大力宣扬“航空救国”之策。（章末注10）1921年，孙中山先生在他草拟的《十年国防计划》书中，集中阐述了他的“航空救国”思想。他以敏锐的眼光和科学预见，多次指出飞机在未来国防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并亲自实践。在他的领导下，中国有了最初的航空部队，创办了多处航空学校，培养了大批航空人才，在北伐战争和后来的扫荡军阀的革命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郑汉英是“航空救国”思想的坚定拥护者，她深信，只有通过发展航空事业，中国才能强大，才能抵御外辱。在工作中，郑汉英积极撰稿，并通过几家重要媒体宣传推广航空知识，唤起同胞对航空事业的关注。此外，她还代表国民政府飞往全国各地参加公开活动，大力宣扬航空救国之道。

郑汉英对于航空救国的热情以及她精湛的飞行技术深受蒋委员长赏识。1938年，蒋介石向郑汉英亲授委任状，任命郑汉英为中国空军飞行中尉，郑汉英因此成为中国空军史上第一位女官。郑汉英那身中国空军制服款式时尚而别致：立领亮红色的束腰上装，领口饰以金色和蓝色的穗带，下身是红色滚边的海军蓝过膝开衩裙。（章末注11）郑汉英身材娇小，气质娴雅，但是一穿上这套空军服，其精明干练的大将之风尽显无余。

郑汉英能成为中国空军史上的第一位女官难免让人心生疑窦。她得此荣耀难道又是因为她显赫家族的关系？对其他女飞行员来说，能够加入空军那可是梦寐以求的事。抗日战争刚爆发时，被誉为“中国第一位女飞行员”的李霞卿就提出加入空军，但遭到拒绝。论飞行经验和飞行技术，李霞卿比郑汉英有过之而无不及。另一位女飞行员杨瑾珣，李霞卿在上海飞行社唯一的女学员，毕业后虽然被派到航空委员会，但只是负责收发文件。她多次提出飞上蓝天，为国效力，但终究壮志未酬。希望编入空军上天杀敌的还不只她们几个。来自美国俄勒冈州的华人女飞行员李月英从波特兰中华航空学校一毕业就马上回到祖国，前往南京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报

到，希望能当空军飞行员，抗击日寇飞贼。尽管中国空军非常需要训练有素的飞行员，虽然李月英在美的不少华人男同学如愿以偿地加入了中国空军，但最终航空委员会没有批准她的申请，也只是安排她做文职工作。后来李月英回到美国，珍珠港事件后，她立即加入了美国空军，在空军第三大队担任运输机飞行员，也算是一偿夙愿。

那么为何郑汉英实现了他人无法企及的梦想？诚然，郑汉英的姑姑郑毓秀，国民政府内显赫一时的人物，可能为侄女心愿的达成起了推手的作用。但是，郑汉英能够成为中国空军的一分子，也全凭她自己的本事：拥有国外一流大学博士文凭，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英国皇家空军认可的飞行学校。此外，郑汉英还懂外交礼仪，并受过专门的训练。这些资历非他人能及，她也因此成为中国空军女官的不二人选。莫说郑汉英乃女中翘楚，论条件和资历，也令众多男飞行员汗颜。

抗战爆发激发了中国妇女界积极参与抗日救国的热情。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界妇女积极投身抗日斗争，以各种形式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妇女在抗战中的作用不可小觑，但只有结成全国妇女抗日统一战线，才能够发挥妇女界在抗战建国中的作用。

1938年5月20日至25日，宋美龄在庐山召开各界知名妇女谈话会，商讨妇女界抗日问题。这次为期5天的谈话会主要讨论了两个议题：一是建立全国妇女领导机构，二是制定全国妇女工作纲领。郑汉英和姑姑郑毓秀作为国民党代表出席了谈话会。

19世纪末20世纪初，庐山出现了英、俄、美、法等25个国家风格的别墅近千栋，西方传教士将庐山开发成了避暑胜地，在中国现代史中，庐山因扮演着军事指挥所、元首和高官栖息地、重大会议的会址而成为政治名山。20世纪30年代，庐山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夏都”。由于“火炉”南京夏季气温较高，因而每至炎夏之时，国民政府的党政头目们纷纷来此避暑。1926年至1948年间，蒋介石一共18次上庐山，主持召开了11次重要会议。位于庐山牯

岭东侧有一栋占地千余平方的英式别墅，这栋名叫“美庐”的别墅就是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庐山的夏都官邸（章末注12）。

暮春初夏的多雨季节，庐山飞瀑犹如发怒的玉龙，冲破青天，凌空飞下，雷声轰鸣，令人叹为观止。而此时，满山的杜鹃花盛开如艳丽的锦缎，把山峦群峰装点得分外妖娆。由于庐山山势险峻，当时不通车，出席宋美龄主持召开的谈话会的各界妇女代表们只得坐轿子上山。经过大约5个小时的跋涉，代表们终于抵达会址。也许是此处远离尘嚣的清静之所让代表们更加平心静气地思考，这次妇女谈话会取得了巨大成功。

对于这次会议，郑汉英永生难忘。来自国民党、共产党、基督教女青年会、救国会、社会名流、专家学者、地方团体工作者等各界妇女精英济济一堂，共商团结广大妇女共同抗日大计。各界妇女代表献计献策，会场气氛极其热烈。谈话会在庐山图书馆礼堂举行。会议召集人宋美龄任会议主席并致开幕词和闭幕词。

宋美龄致开幕词时说：“在许多方面，我们女子可以影响男子，要是我们女子能够精诚合作，以团结的精神来感应全国，我敢相信全国同胞就一定和衷共济，为国家利益共同奋斗了。”她希望全国妇女工作互相联系，“彼此听取报告，共同切磋”，“统一步调，共同前进”（章末注13）。

谈话会上，与会代表不仅分析了抗战形势，而且商讨了如何通过建立全国性的妇女工作机构，领导妇女同胞参加抗战建国大业。

郑汉英的姑姑郑毓秀作为国民党代表出席了谈话会。此次会议让这位见多识广的女强人也兴奋异常。想起与会代表的远见卓识，其抗战救亡之情之深切，郑毓秀激动万分，彻夜难眠。她在英文自传《我的革命生涯》中写道：

“作为一个积极热心的女权主义者，自少小时在北京投身革命以来，我一直梦想着有朝一日女性将在国家命运问题上发挥重要的作用，而今我意识到，这一天即将成为现实，就在我的眼前。倾听她们抗战救亡的谏言，我意识到中国发生了多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她们见多识广、沉着坚定、成熟自信，不仅如此，她们还怀有仁爱

之心，勇敢无畏。她们如此光芒四射，两百年来的社会发展似乎也不敌近二十年妇女变化所带给人们的震撼。”（章末注14）

在短暂的余生中，郑汉英也被庐山谈话会的精神激励着。她遵循着会议精神的足迹，积极进取，奋力拼搏，报效祖国。大约3年后，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成为一名外交官，代表中国在加拿大进行巡回募捐演讲，效力疆场，以尽匹妇救国之责。在募捐演讲中，郑汉英将向听众回忆这次庐山谈话会的成果，谈起全国妇女组织的总机构——改组扩大后的“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简称“妇指会”）——的诞生，抒发自己如何骄傲地成为“妇指会”的一员，畅聊宋美龄所确立的抢救和保育难童、伤病救护等抗战初期的主要工作及运作机制。她还会向那些急于了解中国抗战真相的海外民众介绍庐山会议上通过的《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中的具体内容，其中包括训练妇女。提高领导能力、政治素质、文化水平、战地服务技能和生产技术等，以充实其参加抗战建国工作的能力。

庐山会议结束后没几天，与会代表聚集的图书馆礼堂就遭到日机轰炸，所幸代表们已经离开。会议结束后，所有与会代表满腔热情地回到工作岗位，妇女抗战建国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不过她们也许没有料到的是，通往和平之路布满荆棘，她们需要以非凡的智慧、勇气和信心，战胜前进道路上无数的艰难险阻。

中国是个水患不断的国家，从神话到历史，关于洪水的记录与描述始终绵绵不绝。长江、黄河、淮河，这些中国的大川大河，若干年便要轮番狂袭一下，对国家财产、国民生命甚至政权统治都带来很大威胁，所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向来重视洪水之袭。1931年，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爆发的那一年，长江发生全流域特大洪水。持续暴雨造成河水上涨，并最终导致长江中下游江堤圩垸普遍决口。江汉平原、洞庭湖区、鄱阳湖区、太湖区大部分被淹。这次水灾被广泛认为是有记录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自然灾害，死亡人数超过350万。国民政府因灾情严重，于是年8月16日成立专门

的赈灾机关——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简称“国水委”），这次特大灾情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当时的国联和其他国际组织曾派专家和救助人员来华救援。

郑汉英曾于1938年在“国水委”工作过一段时间。这一年的6月9日，黄河决堤，不过这一次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为阻止日军南下，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队新编第八师在郑州花园口炸决黄河大堤。由于事前未动员人民迁移，致使89万群众淹死，1250多万人受灾，并造成河南、安徽、苏北一带连年灾荒的黄泛区。由于黄河决口，日军遂决定以主力沿长江、淮河西犯，进攻武汉。黄河决堤后，“国水委”为赈济灾民、缓解灾情竭尽全力工作。

黄河水灾后，郑汉英进行了募捐飞行，筹集救灾捐款和物资，她还亲自飞往受灾地区，勘察水情。在这一点上，郑汉英可谓继承了家族的优良传统，其曾祖父郑姚乐善好施、济贫帮困、慈心为人、善举济世，曾多次赈济黄河水灾，受到慈禧太后的封赐。虽然郑公创造的巨额财富在历史的烟云之下终究不在，但其兼济天下、仗义疏财的慈善精神却永留青史。祖辈慈悲和善的德行与爱心，伴随着郑汉英，也激励着郑汉英在抗灾赈济工作中殚精竭虑，勇往直前。

很快，战事升级，南京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面对上海战事的失利，1937年11月16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向全国发出了迁都重庆的通告，20日，国民政府发表了迁都重庆的宣言。宣布“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明令重庆为陪都。重庆城位于长江、嘉陵江两江交汇处，全城依山而构，临江而筑，市内坡峭路陡，楼房重叠错落，山和城融为一体，故曰“山城”。重庆挟长江天险且四面环山，此外还有浓雾蔽城，可谓易守难攻，因而成为战时陪都的首选。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数百家工厂及大批商业、金融、文教、科研机构迁渝，加上战时需要新建的大批工商企业及科教文卫单位，使重庆由一个地区性中等城市一

跃而成为中国大后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信息中心。郑汉英的不少直系亲属，包括她的两个姑姑郑雪案和郑毓秀，也迁居重庆。

郑汉英本人也随航空委员会迁往重庆。重庆是畅游长江三峡的起始点，在和平年代，乘船顺流而下游历神奇美丽的长江三峡，是一件非常赏心悦目的事情，而今，烽火连天，重庆已成为一座难民之城。当时国际援华物资须经最重要的国际交通大动脉——滇缅公路——到达昆明，然后送达前线 and 陪都重庆。重庆曾被谑称为世界的鼠都。二战期间，山城公共卫生环境恶劣，老鼠大量繁殖，其个大如海狸，一时间，鼠患凶猛猖獗，百姓不胜其扰。

迁都后，重庆一跃发展成为中国民用航空网络的核心，当时重庆的五座机场负载起了驼峰航线以及大量援华物资的运输工作。1938年，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迁渝后，以重庆为中心，相继开通了渝迪（迪化，今乌鲁木齐）、渝蓉（成都）、渝昆（明）、渝宝（鸡）、渝甘（兰州）、渝港（香港）等国内航线和重庆至仰光、河内及中印、中苏等国际航线，重庆成为大后方最重要的航空中心。重庆航运界还建立起沟通国内外的水陆空联运网络，为支持祖国的抗日战争和同盟国在东南亚抗击日寇侵略，作出了重要贡献。

重庆最早的机场，溪坝（沙坝）机场，位于江北嘴附近的溪坝（千厮门对岸），1931年建成。该处是嘉陵江边的沙滩，枯水季节，沙滩长达两公里以上，最宽处约300公尺。1931年，中国航空公司首次开通了武汉—重庆线，因无适当机场，遂将此地辟为临时机场。渝蓉试航的首日，也因无适合机场，暂借江北沙坝（嘉陵江水退时才出现）为临时机场。1933年，邮政飞机曾多次在该坝起降，由西向东降落，由东向西起飞。后来，为了提高这一临时机场的使用率，有关方面将实则为沙滩的跑道进行了加固，有的地方甚至用旧墓碑来铺垫，这一对祖宗不敬的权宜之举并非宋美龄授意。（章末注15）

在郑汉英眼里，重庆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城市。这座城市依山傍

水而建，建筑富有层次感，街道多为青石铺就，拥挤逼仄，此起彼伏九曲十八弯。吊脚楼、过街楼、步道满目皆是，构成了山城特有的景观文化。而另一方面，重庆自开埠以后，先后有英、法、日、美、德在渝设立领事馆。抗日战争时期，有30多个国家的大使馆陆续迁驻重庆。重庆，这个古今交汇、中西交融之地，在抗战期间承受了日寇大轰炸的残酷洗礼。1938年2月至1943年8月间，日本对战时中国陪都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据不完全统计，5年间日本对重庆进行轰炸218次，出动9000多架次的飞机，投弹11500枚以上。日本实施战略轰炸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制造大量平民杀伤，瓦解中国政府抗战的意志。虽然轰炸过后，景象惨烈，血肉横飞，尸横遍野，街道废墟一片，房屋大量被毁，但重庆人民压不垮，摧不毁。郑汉英多次亲眼目睹日机轰炸之惨状，但是英勇的重庆人民在遭到野蛮的蹂躏后又坚强地站了起来。抗战口号和标语在重庆街头随处可见，“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好男儿，当兵去！”

郑汉英很快发现，重庆冬暖夏热，冬春雨轻雾重，又号“雾都”。重庆雾日之多不仅冠于全国，就是世界著名的雾都伦敦也望尘莫及。重庆多雾是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形成的。山城重庆处于川东盆地的边缘，四面群山环抱，两江在此交汇，江水蒸发不易扩散，潮湿的空气处于饱和状态，易于凝结成雾。抗战期间，日本出动大批飞机对重庆战时首都实施长时间战略性的大轰炸，市内一切活动陷于停顿。人们盼望雾季到来，每年10月至翌年4月是重庆的雾季，雾季里大雾弥漫，浓雾给山城笼罩着一层天然的防空网，日机无法空袭肆虐。但是春季一过，天气好转后，日军又重新开始对重庆实施狂轰滥炸。

重庆市民善于利用当地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来进行自我防御。每当空袭警报拉响，市民带着家小，躲进附近的山里或防空洞中。重庆是山城，可以就近深挖防空洞作为掩体。重庆的防空洞因1938年—1943年的大轰炸而兴建，是人们躲避空袭灾难的主要场所，它广泛分布于城市的各个角落，曾经庇护过无数的生灵。当郑汉英抵

达重庆时，当地民众正在兴建一座大型防空洞，该防空洞可以容纳数万人避难，工人们昼夜不停地凿山开洞，那钻击声、锤打声，声声入耳，好似一首美妙的乐曲。

重庆的预报很准，空袭警报系统十分有效。警报拉响后，市民们可以有足够的时间躲进就近的防空洞。城郊还布有岗哨，监视敌人的一举一动，一旦日机来袭，便会向重庆城发出警报。悬挂气球是重庆抗战时期的日军轰炸警报系统之一，警报信号的意义是：悬挂红球一个，预告空袭，悬挂两个红球，是空袭警报，卸下两个红球是紧急警报，又悬两个红球是通告市民出洞休息。发布解除警报是悬挂绿色长条灯笼。警报种类是：空袭警报：敌机距离200公里—300公里，紧急警报：敌机距离50公里，解除警报：敌机离去200公里—300公里。紧急警报拉响后，市民们应已安然躲进防空洞避难，但是正如郑汉英所目睹的，那些裹脚的女人步履维艰，难以及时抵达洞口。

为便于疏散，每个市民都指派有固定的防空洞以躲避空袭，当然，市民无论走到哪里，遇见空袭就到附近的防空洞躲避，一般也不会受到阻拦。重庆的防空洞分三类。一类是政府给市民挖的，工程粗糙，设施也差，洞内阴暗而又潮湿，洞顶时有水珠滴漏，除洞口可自然通风外，没有任何通风设备，只有煤油灯照明；一类是银行家或资本家等阔人使用的，地势较好，进度较深，多在陡坡山岩旁凿成山洞，有的上面还复盖钢板，并大都备有小型发电机供照明之用；第三类是官家的，以官家大小各有不同。郑汉英曾在市民用的防空洞内躲避过无数次日机的空袭。防空洞内通常人满为患，洞内空气异常污浊。郑汉英得像其他人一样不停地打扇，以免自己因缺氧而昏厥过去。当炸弹频频落下时，一股股强大的气流将带着刺鼻硫磺味的空气冲进洞里，混合着升腾而起的尘土的味道，令避难者无不惊恐万状。

与其他避难者一样，郑汉英坐在防空洞边摆放的板凳上——这是防空洞内唯一的设施，遇到夜间空袭时也只能坐着——试图打个盹。由于日机轰炸频繁，百姓不仅白天得不到休息，到了夜里也不

得安生，于是重庆的大街小巷贴出了这么一条标语：“能睡就睡”。为争取时间休息，在明月高悬的夜晚，郑汉英会在晚饭后上床眯一会儿，因为这样晴朗的夜晚日军是不会轻易放过的，待到警报拉响，郑汉英与邻里们跑进防空洞后，那就意味着又是一个不眠之夜。躲在防空洞里，只听见外面爆炸声此起彼伏，自己的家园、生意在这次空袭中是否安然无损，人们毫不知情。那些在空袭中失去家园的人会揶揄称他们“中了航空彩票的头奖”，这种自嘲令郑汉英不无伤感。人们甚至还会打趣说，真得感谢日本人用毁灭性的炸弹解决了困扰重庆多年的鼠患问题。然而，玩笑归玩笑，人们何尝不知那些被夷为平地的房屋建筑又会给那些害虫提供多少生存与繁殖的温床。

在重庆遭到轰炸之初，不少市民因为对防空警报不予理会而造成了许多无谓的伤亡。黄包车夫与坐车的客人横尸街头，不幸丧命的还有那些不顾危险跑到大街上看热闹的看客。（章末注16）这种无谓的牺牲敦促当局出台强硬措施，规定市民在第二声紧急警报拉响后必须进防空洞避险，否则要被当地警察处罚。

当空袭来临时，郑汉英也会本能地逃生。“许多次死里逃生”，她后来在加拿大回忆起这段历史时表示。不止一次，当她刚到达防空洞口时，炸弹就已经精确地落下了。对于频繁的空袭，郑汉英已经习以为常，甚至还会幽上一默，称那些炸弹是“每天要吃的面包”。

“空袭时，我们被炸得四处逃散，”她耸了耸肩，“但是空袭结束后，我们又搬回了家。”（章末注17）

所以，在长达5年半的时间里，虽然重庆遭受了200余次轰炸，但是英勇的重庆人民并没有屈服于日本侵略者的淫威。日寇的轰炸越是疯狂野蛮，重庆人民越是坚毅顽强。每当警报解除，市民们会涌出防空洞口，自发地清理被炸现场，掩埋同胞的尸首。一场浩劫过去，第二天一早报馆照常开门，饭馆照常营业，政府部门恢复正常运作。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抗战中，重庆人民体现出了以中华民族利益为最高利益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精神以及压不垮、打不倒的

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

而与此同时，新组建的中国空军也在重庆浴血奋战。1934年，国民政府组建中国空军，宋美龄出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参与组建和领导中国空军，被誉为“中国空军之母”。虽然宋美龄很容易晕机，但她深知空军的重要性，并不遗余力地参与空军建设。宋美龄只接受过文学和社会科学的教育，为了中国的航空事业，她花了很多时间学习航空理论、飞机设计等知识，研究当时中国空军主要配备的霍克Ⅱ、霍克Ⅲ、波音-281型战斗机以及雪莱克A-12型攻击机，诺斯罗普2E、马丁139WC型轰炸机的性能构造，她还经常带着一行人到各地去参观检查飞机机械设备，亲自和外商谈判购买飞机。宋美龄从采购飞机、聘请外国专家和飞行员到参加战略会议和研究空军战术毫不懈怠，为组织空军抗战投入了很大精力。

“她（宋美龄）认识空军的每一架飞机和每一位飞行员，”美国女作家、《纽约客》杂志专栏作者艾米丽·哈恩（Emily Hahn，中文名“项美丽”）在其英文著作《宋氏姐妹》（*The Soong Sisters*）一书中如是说。“每当有飞行员出战时，她会亲临机场鼓舞士气，之后登上山顶亲自督战，战事结束后，她又回到机场，迎接壮士归来，如果他们还能回来的话。”（章末注18）

这些英勇抗击日寇的飞行员正是郑汉英在中国空军的同僚，她与其中的许多人一起长大，情同手足。这些不畏牺牲的飞行员大多出身富家子弟，其家族都在中国的工业、银行业、政治领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这些意气风发、敢于冒险的年轻人虽出身权贵，但身体里流淌着炎黄子孙的血。他们风华正茂，平均年龄只有20岁。他们中的许多人放弃了国外留学的优越条件，放弃了攻读外交、金融、法律或工程工业的锦绣前程，回到祖国，振翅蓝天，奋勇杀敌。郑汉英的哥哥郑云就是这样的一位蓝天飞鹰，抗战一打响，他就报名加入了空军。

抗战中，日本空军无论飞机的数量和质量，还是技术装备和空军人员培训，都较中国空军有很大的优势。抗战初期，日本人有数

千架精良的战机，而初生的中国空军在编飞机不足 200 架，能够作战的不足百架，且多为性能差的旧货。当时中国尚不能制造飞机，连燃油也依赖进口，损失一架就少一架，中国空军的将士们深知飞机的珍贵。战斗中，飞行员想得最多的是拼死保护飞机，被击伤或在座机发生故障时放弃跳伞，拼命驾机开回基地以图修复。不少飞行员就是在负重伤的情况下迫降或返航，虽然保住了飞机，自己却因失血过多而亡。

郑汉英遗憾自己未能直接参战，她在英国皇家空军下设的飞行学校接受的严格训练，应该能让她在空战中大展身手。她一定会为自己的一位亲属感到骄傲和自豪，她的姑姑郑毓秀曾谈到家族中一位空军卫士的英勇事迹，虽然她没有提及这位亲属的名字，但是此人很可能是郑汉英的哥哥郑云。

郑毓秀曾不无自豪地讲述她的侄子如何突破敌机重围、驾机安返的英勇故事。一天，她的侄子执行飞行任务，突遇不少于 7 架以上的日本“零式”（Zero）战斗机的围堵。“零式”战斗机是日军最新研制的战机，其速度、灵活性远远超过中国空军当时拥有的苏制、美制飞机。在交战记录中，中国空军飞机完全不敌这款日机，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在日机的围追堵截中，郑毓秀的这位侄子命悬一线，莫说正常装备下中国空军的飞机都无法与日本的“零式”战斗机抗衡，更别说他此时飞机上还没有配备武器弹药。这位英勇的年轻人临危不惧，使出各种飞行特技，跃升、盘旋、筋斗，试图摆脱日机的围堵，但是未能奏效，日机依然紧咬着并且向他不断开火。狭路相逢勇者胜，紧急关头，年轻人杀了一个“回马枪”，猛然作了一个直 8 字急转弯，冲入敌机群，然后一声呼啸着直线俯冲而下。

在俯冲至距地面只有 200 英尺的最后关头，这位英勇的年轻人猛地拉起机头，然后紧贴地面继续低空飞行。在经过一个狭窄陡峭而曲折蜿蜒的峡谷时，他以低空侧翼飞行的方式完成了一次惊险的、看起来绝不可能实现的穿越。而紧随其后的敌人对这种危险游戏没了兴趣，最终放弃了追逐。就这样，这位勇敢无畏、遍体鳞伤

的年轻人冒死飞回基地，并成功迫降。在这场险恶的遭遇战中，年轻人用自己的英勇果敢和沉着冷静得以自保并保全了飞机。虽然年轻人驾驶着座机成功返航，但机身上的弹孔也多达51个。（章末注19）

根据郑毓秀的说法，她的这位侄子此战后不久退居二线，担任运输机飞行员，负责抗战物资和人员的运输工作。

郑毓秀提供的有关这位年轻人的介绍与郑云的飞行记录十分吻合，后者也是先飞战斗机，后转为运输机飞行员，所以基本可以认定，这位与日机巧妙周旋并成功脱险的飞行员就是郑云。1943年，郑汉英深爱的哥哥郑云在兰州机场驾机起飞后失事，郑云重伤不治，令人扼腕。如今，在广东航空史志中，在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义赴国难而捐躯的海外华人名单中，还找得到郑云的名字。（章末注20）郑云以他的实际行动实现了当初在空军飞行员誓师大会上许下的誓言：“为了祖国，不怕牺牲。”

二战时期，国际援华物资须经滇缅公路到达昆明，然后经过滇黔公路运抵重庆和前线。滇缅公路，即中国云南到缅甸的公路。公路与缅甸的中央铁路连接，直接贯通缅甸首都仰光港。滇缅公路于1938年开始修建并于当年8月底通车。滇缅公路原本是为了抢运中国政府在国外购买的和国际援助的战略物资而紧急修建的，随着日军进占越南，滇越铁路中断，滇缅公路竣工不久就成为了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的运输通道。这是一条诞生于抗日战争烽火中的国际通道，一条滇西各族人民用血肉筑成的国际通道。滇缅公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滇缅公路，这条穿过了中国最坚硬的山区，跨越了中国最湍急的河流，蜿蜒上千公里的运输干道，对于中华民族的生存是一条不折不扣的生命线。滇缅公路修建之难，难在公路经过的80%的路段是崇山峻岭。此外，有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十分缺乏，机械设备严重不足，这使工程更加依赖于数以万计的劳工的手工操作。因为时间紧迫和战局恶化，最初的建设工程不得不用最原始的方法。在几

乎所有的路段上，劳工们都是用自己家里带来的背篓来搬运泥土和石块。1937年底，滇缅公路沿线近30个县的劳工约20万人被征集来到公路上。这些人中，有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和孩子，正是他们用双手在崇山峻岭间开凿出了埋葬日本占领中国的梦想的交通大道。

郑汉英曾参考察过滇缅公路的修建情况，她永远无法忘记那些劳工不畏酷暑，不惧敌机的轮番轰炸，历经艰险，用血肉之躯筑起这条中华民族生命大通道的感人场景。由于施工设备落后、生活待遇差、劳保缺乏、地势艰险、气候恶劣等原因，许多劳工或被滚石砸死，或跌入滔滔江水中溺亡，或染上恶性疟疾丧命，这其中有不少是妇女。

“我曾在滇缅公路上看见许多年轻妇女在修路，她们徒手挖掘和搬运着石块。”郑汉英在加拿大开展募捐演讲时回忆说。那些在炎炎烈日下用双手搬运石块的姐妹们，她们所表现出来的吃苦耐劳和顽强坚毅，无时无刻不在鼓舞和激励着郑汉英（章末注21）。

注释

- 1 “Fashion Show Tea”, *North-China Herald*, November 11, 1936.
- 2 “Flt. Lieut. Hanyin Cheng Predicts...”, *Lethbridge Herald*, November 30, 1942.
- 3 “Aviation Progress in Hongkong,” *North-China Herald*, June 27, 1934.
- 4 马尔科姆·道格拉斯-汉密尔顿勋爵（Lord Malcolm Douglas-Hamilton）并非第13代汉密尔顿公爵的长子。他的哥哥道格拉斯·道格拉斯-汉密尔顿勋爵（Lord Douglas Douglas-Hamilton）1940年3月继承父亲爵位，成为第14代汉密尔顿公爵。
- 5 香港英文商业报《孖刺西报》（*Hong Kong Daily Press*）报道称，其他学员也在香港远东飞行训练学校（Far East Flying Training School，简称FEFTS）接受英国皇家空军（RAF）所提供的专业飞行指导。1930年，桂系在中原大战失败后，退守广西建立空军，1937年中央航校西迁，广西航校改为柳州分校，不过一些军校生是在香港远东飞行训练学校接受的基础



飞行训练。“Canton Air Force: Demonstration of Latest Tactics,” *Hong Kong Daily Press*, September 11, 1934。

6 Hong Kong Historical Aviation Association, *Wings Over Hong Kong: An Aviation History, 1891—1998*, Cliff Dunnaway, ed. (HK: Pacific Century Publishers, 1998), 110.

7 “Hong Kong Defense,” *Flight*, January 9, 1941.

8 1938年，发生两起民航飞机遭日机攻击事件。1938年8月24日，中国航空公司由香港飞往重庆的道格拉斯DC-2型双引擎运输机“桂林号”在起飞后不久飞至珠三角上空时，遭到5架日本战斗机的袭击，飞机迫降于珠江后，日机继续机枪对受伤之客机扫射，杀死在江中逃生游向岸边的机上人员14人，包括两名妇孺和两名儿童，仅3人幸免于难。两周后，欧亚航空公司的一架客机亦遭到日机攻击，迫降于两广边界。所幸的是，这一次民航机被袭没有人员丧生。尽管遭遇了客机被袭，中国航空公司和欧亚航空公司并未停止客运业务，不过出于安全考虑，两家航空公司后来只在日落到日出的这段时间起降香港启德机场。月圆之夜，机师会等待云雾遮蔽之时起飞，以防不测。

9 摘自1937年8月21日《香港工商日报》“女飞行员郑汉英：日间北上”一文。这篇有关国民政府电邀郑汉英北上为国效力的报道用了不少×号或涂黑有关日本侵略和抗日的“敏感字眼”。国际著名记者、作家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1930年代末任职香港英文商业报《孖刺西报》（*Hong Kong Daily Press*）编辑，他对上述消息中出现的隐码作了如下解释：“……港英政府非常担心因言语不慎而惹怒日本，因此，港岛的中文媒体一律禁止使用有关日本侵略和战争暴行等字眼（新闻中出现的敏感字眼一律用×号隐去）。”Israel Epstein, *My China Eye: Memoirs of a Jew and a Journalist* (San Francisco: Long River Press, 2005), 115.

10 摘自1939年6月2日香港《大公报》“女飞行家：郑汉英”一文。

11 郑汉英身着的这套中国空军制服上衣为半紧身式，长度及臀，红色华达呢毛料质地，垫肩设计，上衣钉有6枚金质纽扣。上衣没有肩章，不过在两边的肩袖位置缝有黑底白色“中国”字样的袖章。在胸口位置钉有金线饰边的翼形章，中间绘有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下身配海军蓝短裙和透明长筒袜，或者黑色过膝开衩裙和黑色长筒袜。郑汉英的夏装制服为

剪裁讲究的白色及臀夹克衫，一般郑汉英内着旗袍，外罩这件夹克衫，脚蹬一双黑白双色的皮鞋。夏装的夹克衫同样绣有“中国”字样的袖章，钉有金质纽扣和金线饰边的飞行章。当郑汉英开始环加募捐演讲之时，她身穿一件海军蓝及膝厚毛料大衣，大衣饰有金质纽扣，袖子为衩口设计，钉有金质袖扣。郑汉英喜欢在大衣的左领处别上一枚中国空军飞行徽章。

12 解放前，庐山曾一度被称为国民政府的夏都，美庐别墅则成为了事实上的“总统官邸”。解放后，毛泽东也曾多次住过这里。美庐是国共两党最高领袖都住过的唯一别墅。上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蒋介石长期住在美庐别墅，其主要活动就是指挥剿共和内战，毛泽东则在此研究制定包括“大跃进”在内的建国后的经济发展计划。

13 Mme Wei, *My Revolutionary Years*, 214.

14 同上，215页。

15 1943年，驻纽约的泛美航空公司公共关系总监范·杜森（W. L. Van Dusen）先生在温哥华的一次采访中谈到了重庆机场跑道用旧墓碑来修建加固的情况。杜森先生解释了重庆虽遭日机数百次轰炸但机场依然得以运营的原因：“其奥秘就在于机场跑道是用墓碑修固的。机场（指溪坝机场）位于嘉陵江上的沙滩上，每逢涨水季节，机场跑道都会被江水淹没。后来一位老华人提出用墓碑修固跑道，因为墓碑质地坚硬，能够经受江水的冲刷。第一批用来修固机场跑道的墓碑为每方（约100平方英尺大小）11墨币（或称‘墨洋’，鸦片战争后大量流入中国的墨西哥银元。币面图案为一鹰。1920年代，1墨币大致相当于中国银元1元，美元0.5元。——译注），抗战一年后，其价格升至每方17墨币。杜森表示，到1941年抗战正酣之时，出于夜间飞行需要，机场跑道在原有的基础上加长了250英尺，使跑道总长达到2400英尺，此时加长跑道所用的墓石价格攀升至每方240墨币。”后来，机场跑道再次加长，所用墓石价格飙升至每方1334墨币，后经讨价还价，以每方1260墨币成交（Jack Meek, “Skylines,” *Vancouver Sun*, April 6, 1943.）。此后不久，四川省政府责成有关方面在距重庆市中心约17英里远的巴县白市驿修建一个更大规模、更永久的军用机场，抗战时期，该机场为美国驻华空军司令部驻地。

16 “Chungking Bombed Daily”, *North-China Herald*, June 5, 1940.

17 “Chinese Airwoman Tells of Country’s Crying Need,” *Toronto Daily Star*, February 4, 1943.

18 Emily Hahn, *The Soong Sisters* (NY: Doubleday, 1941), 263.

19 Mme. Wei, *My Revolutionary Years*, 225 - 7.

20 Guan Zhongren and Patti Gully, ed., *Overseas Chinese from the Five Counties and Chinese Aviation*, vol. 1, 368. (关中人、帕蒂·哥莉编,《五邑华侨与中国航空》第一卷,谢昂译,2003)。

21 “Pretty Chinese Girl Flier Working Hard for Victory: Flight-Lieut. Hanyin Cheng Has Title of ‘Ambassador at Large’: On Speaking Tour,” *Toronto Daily Star*, February 5, 1943.

27. 不羁的罗曼史

1938年，郑汉英调往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驻香港办事处工作。从日机轰炸频繁、生命时刻受到威胁的重庆来到暂时风平浪静的港岛，郑汉英一下子颇不适应。

一年前，当郑汉英离开香港时，这个弹丸之地还没有受到抗战爆发的太大影响，而一年之后，当她重返故地，内地中日激战正酣也让这个繁华的自由港笼罩上了一层战争的阴云。此时的香港，可谓冰火两重天。一方面，到处可见各种慈善机构在进行抗战募捐，而另一方面，那些达官显贵、商贾名流们依然歌舞升平，宴会不断。为了备战，当局在夜晚进行高射炮演习，但此举也遭到不少港人抨击，称其扰民。抗战爆发后，全国各地掀起了广泛的抵制日货运动，但在香港这块殖民地上，各种奢侈品依旧摆满了商店的货架。难民们从内地潮水般地涌向港岛，但其中有不少人非富即贵。那些真正称得上是难民的人们寄居一隅，贫困交加，而就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那些为避战乱而从上海逃到香港的电影明星们却依然衣着光鲜、争奇斗妍地亮相跑马地马场，姿情享乐。在距启德机场仅50英尺远的地方，郑汉英看到一大群流离失所的难民拥挤在临时搭建的收容所里，生活条件极其恶劣。那些难民营用棕色粗麻布、白铁桶和做垫子用的编织材料草草围就，就是如此简陋的难民营收容了上万难民，周围污水横流，臭气熏天。这些肮脏污秽之所与紧邻的、现代化的启德机场形成了鲜明对照。

郑汉英加入了当地的几家慈善组织，为难民同胞提供尽可能的

帮助，不过，经历了重庆战火洗礼的她，心态发生了一点微妙的变化。郑汉英开始享受这难得的暂时的和平。像其他人一样，郑汉英积极地投身到各项社会活动中，而这其中不乏闲时的娱乐消遣。在香港，晚宴舞会是非常受欢迎的娱乐项目。每天晚上，在半岛酒店或是马哥孛罗香港酒店的醉翁轩都有这样的晚宴舞会，在现场管弦乐队的伴奏下，一对对青年男女们跳起了欢快的蓝伯斯舞（Lambeth Walk）。那一季有一首非常适合跳华尔兹的歌曲，名叫《深紫色》（Deep Purple），这首梦幻般的歌曲当时风靡港岛，人人都会吟唱。浅水湾附近的丽都酒店，是年轻情侣们喜欢光顾的另一场所。每当夜幕降临，情侣们相约至此，翩翩起舞直至次日凌晨尽兴而归，一路上，月光皎洁，道路两旁的凤凰木聚生成簇，鲜艳夺目，为那浪漫之夜增加了不少情调。郑汉英喜欢跳舞，她与堂兄佩里（Perry）一道，出席了不止这样的舞会。在一次下午举行的茶舞上，郑汉英靓丽的外表吸引了一位报界时尚批评家的注意，这位批评家评论说，巴黎大学法学博士毕业的女飞行员郑汉英小姐当天穿了一件全身印花的黑色丝绸连衣裙，风姿绰约，光彩照人。她那纤细的手腕上戴着的绿色珉琅手表，与其他人手上戴着的玉镯子相比，显得是那样富有个性、与众不同。（章末注1）



1939年6月2日，香港《大公报》刊登有关郑汉英获港英政府飞行执照的消息。

以前，媒体总是更多地关注郑汉英别致而考究的装束，而现在，他们也会大肆报道她作为中国空军第一位女官的职业成就。香港《大公报》的一篇文章高度赞扬了郑汉英在国内各地开展的飞行勘察调研工作以及在“航空救国”运动中所作出的卓越贡献。（章

末注2) 该报用大量笔墨宣扬了郑汉英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她对保家卫国所付出的无私努力，歌颂了她作为巾帼英杰的豪迈气概。作为公众人物，特别是拥有众多闪亮头衔的社会名人，其私生活总是备受好奇和关注，郑汉英也不例外。不过遗憾的是，我们永远也无法准确知晓郑汉英是在何时何地遇见了那个改变她人生轨迹的年轻帅气的男子——司徒炳通。

司徒炳通 1914 年 8 月 21 日生于加拿大温哥华，高大帅气，是家中的独子。1936 年前后，父母将其送到上海接受中式传统教育，希望儿子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增强对中华文化和作为炎黄子孙的认同感。



郑汉英曾经的爱人司徒炳通。

司徒炳通出身名门，家世显赫。他的祖父司徒方殷（音译）1860 年代初从中国移民旧金山，后来北上定居加拿大卑诗省维多利亚港市，在那里，司徒方殷的儿子，也就是司徒炳通的父亲司徒旄出生。司徒旄是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Canadian Pacific Railway，简称 CPR）汽轮航线代理，著名华商，为人谦逊有礼。加太公司经营的汽轮业务联通加拿大和远东地区，由于工作的关系，司徒旄从那些搭乘加拿大太平洋汽轮皇后系列号的乘客那里了解到不少移

民到温哥华的华人故居乡里的故事。司徒旄生性谦和儒雅，学识渊博，是当地公认的中华历史、艺术、语言和文化专家。尽管他从未踏上故土，但是工作关系让他有机会接触到来自祖国的各界精英，特别是大学教授、政客、外交官这些人丰富了他对祖国的了解和认识。司徒旄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亦十分浓厚，曾任加拿大皇家天文学会（Royal Astronomical Society of Canada，简称 RASC）副会长。此外，他还是一位水彩画家和书法家。

司徒炳通继承了父亲的许多优点，不过母亲对他成长的影响也

不小。司徒炳通的母亲出生于美国华盛顿州府奥林匹亚，她是从美国中学毕业的第一位华人。司徒炳通与父母、妹妹一家四口住在温哥华西区的家宅里。司徒一家人当时没有像其他绝大多数华人那样选择住在唐人街，而是住在市中心的西区，因而更容易融入当地的白人社会。（章末注3）

尽管司徒炳通的父母对儿子寄予厚望，希望他在国内学有所成，但是这位年轻人却并不那么热衷读书。上海滩及其他大城市丰富多彩的社交生活对这位在西方长大且当时无人管束的青年有着巨大的诱惑力。出身富贵之家，一身优雅得体的装束，加上高大英俊的外表（他身高6英尺，合1.83米），一时成为上海滩上流社交圈颇受欢迎的人物。善于交际的他混迹于那些洋行老板、商贾富族们中间，圆滑通融，游刃有余，而漂亮的女人们也十分乐于与之交往。司徒炳通喜欢骑马，人们经常可以在跑马场看到他脚蹬皮制马靴，纵马奔驰的飒爽英姿。不过，淞沪抗战爆发打碎了这种灯红酒绿的享乐生活。在一次日军空袭中，司徒炳通不幸受伤，这次经历让他猛然警醒，意识到这场战争的不义和自己在战时所应肩负的责任，他立即行动起来，加入了以保护公共租界侨民为名成立的外国侨民民兵武装——万国商团（Shanghai Volunteer Corps）。

数月后，上海战事吃紧，生活日益艰难，司徒炳通遂逃往香港避难。在港期间，司徒炳通有可能转到了当时因广州沦陷而迁往香港的岭南大学继续学业。很快，他就适应了这块殖民地的生活，并成为各种社交场合的常客。通过加入一些兴趣团体，司徒炳通结识了许多新朋友。万国商团前队员举行的晚餐会，广东籍学生和加籍华人参加的各种社交聚会，以及抗战救济人员组织的各种慈善活动，都可以见到司徒炳通的身影。司徒炳通还加入了中国青年救护团（Chinese Youths' Medical Relief Association，简称CYMRA），通过这个组织，为抗战伤员和难民募捐。通过CYMRA组织的各种慈善活动，司徒炳通结识了港岛各界名流、名媛以及岛上最富有的年轻一代。他的济世善举，他在淞沪抗战期间所表现出的英勇气概都让他成为社交场合中备受欢迎的人物。司徒炳通积极投身CYMRA组

织的各种募捐活动，包括募捐日的捐款活动以及筵席后有舞会的慈善晚宴。1939年3月，CYMRA组织上演了一部美国戏剧《初出茅庐》(A Debutante Goes to Town)，演职人员全部为华人。该剧在皇后剧院上演，大获成功，被誉为港岛有史以来上演的最成功的一部由业余演员出演的音乐喜剧。在剧中，司徒炳通饰演一位诈骗者的忠实党羽，获得好评。(章末注4)

大约就在此时，司徒炳通结识了一位可爱的女子，她的梨涡浅笑，她的高贵优雅，她的清新脱俗，都令司徒炳通倾倒。这位让美男司徒炳通倾倒的女子就是郑汉英。除了优雅脱俗的气质和外表，吸引司徒炳通的还有郑汉英的飞行员身份。司徒炳通比郑汉英大5个月，也属虎，有涵养，性情儒雅，风度翩翩。他还是一位个性独立、热心公益的热血青年。这些优秀品质同样也吸引着韶华妙龄的郑汉英。两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就这样相恋了。郑汉英沉浸在爱河中，但是她始料不及的是，她很快发现自己珠胎暗结。

郑汉英一时不知所措。未婚先孕不仅会让郑家蒙羞，而且也可能让她丢掉在中国空军的军职。为何郑汉英最终选择不顾一切风险、不惜放弃得来不易的地位和荣誉生下这个孩子不得而知。也许这样做是为了在那段紧张而压抑的抗战生活中释放自己。也许她是为了爱情。不过，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作为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郑汉英深知，堕胎是一种罪恶的行为，是要坚决反对的。为了未出世的孩子着想，司徒炳通理应娶郑汉英为妻。尽管郑汉英做出生下这个孩子的大胆决定肯定有宗教诫命上的考虑，但是，我们也完全有理由认为，她这样做是出于真爱、真情。如果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感情投入，一个女人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决定的。

我们不清楚的是，孩子的父亲司徒炳通何时知晓郑汉英的处境，不过他似乎对郑汉英决意生下孩子的想法并不支持。他所做的就是，预订了一张回加拿大的船票，然后安然无恙地回到了温哥华。

也许他认为这就是他应该做的。

诚然，“奉子成婚”自古有之，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婚姻的主动权并不掌握在孩子的母亲，而是掌握在孩子的父亲手里。此时，郑汉英与爱人天各一方，她不愿意接受自己可能被遗弃、将独自面对困境的事实。她马上决定飞往加拿大，去找寻她的爱人。

郑汉英的到来让司徒炳通措手不及，也让司徒一家陷入难堪。她找到司徒家，义正词严地提出自己的要求，一定要司徒炳通承认自己肚子里的孩子是他的。想想她可是大名鼎鼎的女权主义者郑毓秀的侄女。虽然外表文静柔美，但内心却十分刚烈，决不委曲求全。郑汉英上门讨说法的这一举动在唐人街引起了各种反响，司徒家的这点丑事成了当地公开的秘密。司徒炳通的父母为这件事深感头疼，而当地的不少人认为郑汉英此举有违传统礼教，特别是对她对司徒这一当地颇有名望的家族不依不饶表示不满。

不过，也有一些人同情郑汉英的处境，对她争取自身权益的行为表示敬意。据该事件的见证者、温哥华华裔善长李氏夫人（Peggy Lee）回忆称，在当时妇女权益刚刚觉醒的年代，她和她的同胞姐妹们都为郑汉英争取女权、执意说服自己的男人承担责任的做法感到振奋和鼓舞。以郑汉英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她这样不顾颜面地争取自己的权益，也折射出身为名人的她所面临的困境。（章末注5）每个人都饶有兴致地静观这出戏如何收场。

事与愿违，司徒炳通最终没有迎娶郑汉英。当时，他刚从中国回到加拿大，没有工作，与父母同住，经济不独立，无法承担养育家庭的重任。当意识到所有的期望终成泡影，郑汉英心如刀绞。这段恋情就这样随风而逝，而她注定要成为一个未婚母亲。不过，司徒炳通终究还是一个敢于承担责任的人。他表示，作为未出生孩子的父亲，他愿意承担责任。这句承诺多少让郑汉英感到安慰。

郑汉英赴加找情郎讨说法的经过便是如此。不过，事后郑汉英向公众提供的说法却是另外一个版本。在这个版本中，郑汉英没有提及昔日的恋人司徒炳通，更没有谈到自己未婚先孕。她只是说，

受中国外交部的委派赴加公干。

她表示，1940年，奉外交部之命，她赴加向中国驻渥太华总领事馆汇报有关事宜。因为精通加拿大的两大官方语言——英语和法语，再加上她在航空飞行领域所取得的杰出成绩，所以这一外交任务非她莫属。加拿大国土辽阔，搭乘飞机也是为了出行方便。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能够赴加执行这一任务让她备感自豪。抵达加国后，她将对外一律称“汉英”而非英文名“杰西”。因为使用自己的中文名可以让那些与她打交道的人明白，她以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为荣，而这样做也将提醒她自己，牢记职责，不辱使命。“汉英”，华夏英雄也。

郑汉英解释说，外交部安排她搭乘飞机赴加。战争期间，平民百姓搭乘飞机飞越太平洋是受到严格限制的，不过，鉴于郑汉英的军职和外交官身份，她拥有搭乘武装部队的飞机飞越太平洋的优先通关权。郑汉英不无自豪地表示，这次飞行让她有资格成为远航俱乐部（Short Snorter Club）的首位华人女性，远航俱乐部会员由乘坐轰炸机飞越过太平洋、大西洋等大洋的人组成。（章末注6）1940年夏，当郑汉英抵达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之时，她又创下了一个“第一”——第一位被中国政府派到加拿大任公职的中国女子。同时，她还成为加拿大第一位持有驻伦敦皇家航空俱乐部颁发的国际飞行执照的女飞行员，拥有国际飞行执照意味着郑汉英可以在中、美等地自由飞行。

抵达渥太华后，郑汉英出席了一次有关加拿大政治形势以及中国抗战局势的情况介绍会。自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加拿大政府一直在密切关注欧洲战场的战事情况而对亚洲战场上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日缺乏足够的兴趣。加拿大政府官员可能对来加求援的中国使团表示同情，但不会提供切实的援助。加拿大对中国政府提出的立即停止向日本输送废铁——用来制造侵略中国的武器的原材料——的请求也置若罔闻。一方面，加拿大政府辩称，该国亟需这笔外快来补贴对德之战，而另一方面，又担心向日本实施禁运会惹怒日本。不过，无视中国政府的请求也并非只有加拿大一

国。美国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该国甚至允许每天向日本输送约5万桶原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向日本慷慨输送原油却没有好报，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可谓美国助纣为虐，自食其果。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驻加使馆官员除了继续争取援助，把中国反共、反日本帝国主义作为争取外援的政治筹码外，没有什么作为。

鉴于加拿大政府只关心欧洲战事而对远东战场不闻不问的冷漠态度，中国政府决定改变策略，直接向加国民众求援。这个想法值得一试。如果加拿大人民对中国抗战抱同情和支持的态度，那么民意有可能迫使政府改变对华战略。但是，遗憾的是，加拿大媒体对中国抗战的报道十分有限，大多数加拿大人只关心他们在欧洲战场上浴血奋战的亲人同胞，而对跨太平洋的战争知道甚少，也关心不多。中国官员所面临的挑战就是改变加拿大的对华态度，争取国际援助。中国官员们自己可能也没有想到，在他们中间，将出现一位影响加拿大民众对华态度的英雄人物，她就是刚刚抵加的年轻外交官、飞行中尉郑汉英。

注释

1 Rosette, "Tea-Dance Season Re-Opens: Beautiful Frocks," *Hong Kong Daily Press*, October 3, 1938.

2 摘自1939年6月2日香港《大公报》“女飞行家：郑汉英”一文。

3 2005年1月26日，本书作者在温哥华对司徒炳通的儿子司徒雷进行了采访，参见采访记录。

4 几篇香港报道公布了该剧的朗诵演员名单，其中有“Jessie Chan”之名。根据时间推算，此时郑汉英正在香港履职，港媒提到的“Jessie Chan”可能就是郑汉英。估计郑汉英和司徒炳通因戏结缘。“Splendid Show at Queen's: A Debutante Goes to Town,” *Hong Kong Daily Press*, March 2, 1939; “Another Good Performance: Charity Play is a Distinct Success,” *Hong Kong Daily Press*, March 3, 1939. 香港英文商业报《孖刺西报》(*Hong Kong Daily Press*)对郑汉英的姓氏前后用了几种不同的拼法(包括

Cheung, Tsang, Tcheng), 甚至该报的中文版也把她的姓误写成“陈”。

5 2005年1月24日, 本书作者在温哥华对郑汉英就孩子问题到司徒炳通家里讨说法一事的见证者、温哥华华裔善长李氏夫人 (Peggy Lee) 进行了采访, 参见采访记录。

6 远航俱乐部 (Short Snorter Club) 也许与英国军方有些渊源, “short snort” 原意是指喝酒时“一饮而尽”。该俱乐部由飞越过太平洋、大西洋等大洋的人组成, 入会者须持至少两名以上会员签名的到访国家的纸币, 实际上, 远航俱乐部的会员证就是这一有会员签名的纸币。可见, 拥有的签名纸币越多越荣耀。而会员们也喜欢把纸币粘接起来, 叠成一叠。有的会员因到访的国家和地区很多, 所拥有的签名纸币展开有数英尺那么长。在酒吧里, 任何人都可以要求远航俱乐部会员出示他们的“会员证”, 谁的会员证最短, 谁就要给在座的每个人买酒喝。一般来说, 同机飞越太平洋、大西洋等大洋的乘客签名的纸币也可作为远航俱乐部入会的凭证。



飞天名媛

sisters of heaven

28. 扬名温哥华

以上便是郑汉英对自己当年来温哥华的说明。

抵加数月后，郑汉英离开依然冬雪飘飘的渥太华，来到西海岸已是早春时节的温哥华。二战后期出现的住房紧缺问题当时还没有爆发出来，所以郑汉英很容易地在伯爵府便利酒店（Earlscourt Hotel and Rooms）找到了一处合适的套房。酒店位于瑟劳岛的西乔治亚街，经私人宅第改造而成。酒店房间租金不贵，面积虽然不大但家具齐全，非常适合郑汉英这样的单身女子居住。当外交官有这么一句格言，“轻装上阵”，个人物品要尽可能地少，以便随时奉命出行。

伯爵府便利酒店是西乔治亚街北端排式建筑中规模最大的一座。战后，这些年代久远的排式建筑被高楼大厦所取代，不过，在那个年代，西区依然保留了一批数量可观的、几乎是村野风情的古建筑。尽管这种维多利亚风格的、曾经的私人豪宅被改造成寓所，让这一地区显得颇为破败，但是这里的自然景观却是无可比拟的，蓝蓝的大海，茫茫的雪山，还有那令人叹为观止的落日余晖，都让人流连。

郑汉英的住处往西是斯坦利公园（Stanley Park）大海环绕的雨林，往东是市中心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和酒店，她的住所正好处在东西的中间地带，地理位置十分优越。自从二战爆发以来，绿树成荫的街道渐渐失去了往日的闲逸。战争的阴云已经笼罩了这个国家。离郑汉英的寓所没多远，就是加拿大政府的军械厂。战时，军



时任中国驻温哥华总领事馆专员的郑汉英，刊登于《温哥华太阳报》(Vancouver Sun)，1942年7月18日。

械厂自然投入军用，而为了方便起见，附近的几栋建筑也改造成了供士兵住宿和娱乐消遣的场所。身着军服的士兵在这里往来穿梭，人数比当地的老百姓还多。

郑汉英的住所往西，在乔治亚街上，最引人注目的建筑是波音公司的组装工厂。工厂毗邻高豪港 (Coal Harbour)，距斯坦利公园门口不远，十多年来，该厂一直在生产波音飞机及零部件，而现在，更是加大产能，以满足战争的需要。在郑汉英来温市之时，该厂正在为英国生产菲尔利战争式 (Fairey Battle) 轻型轰炸机。作为一名经验老到的飞行员，郑汉英用她专

业的眼光来观察工厂的生产情况，而曾经在南京航空委员会任职的她也深知，初创的中国空军最大的问题就是飞机少，所以旁观波音工厂一架架飞机的出产让郑汉英既羡慕，又忌妒。

沿着乔治亚街往东方向上行，坐落在格兰维尔岛 (Granville) 一角的古老的温哥华酒店称得上是这座城市的军事神经中枢。这个原本空荡荡，而且因为乔治亚街和巴拉德街的交界处一家同名新酒店的兴建而显得多余的地方，如今作为卑诗省的武装部队主要征兵处和兵营所在地而重新焕发生机。战争期间，酒店更名为温哥华兵营。身着各同盟国军服的士兵在兵营外的大街上来来往往，不过郑汉英一眼便注意到，那些士兵是清一色的男人。郑汉英抵达温哥华之时，联邦政府尚未宣布在武装部队中增设妇女辅助部队，这可是几个月以后的事。可想而知，郑汉英在当地的出现一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因为作为中国军方的代表，而且还是中国空军的受衔军官，她在清一色的男兵队伍里显得独一无二。即便后来部队允许招收女兵，但她们也只是被编入“女子辅助军团”，那些进入加拿大皇家空军 (RCAF) 的女兵最终也没有机会飞上蓝天，为她们的国家效力，尽管她们中有一些是经验颇为丰富的飞行员。RCAF 女子

辅助军团恪守的格言是“为男飞行员服务”。实际上，在整个二战期间，加拿大皇家空军都不招收女飞行员。

这就是郑汉英抵达温哥华的大致情况，只要有人问起，她都会这样解释，的确，这些都是实情，不过在她的故事中，她避谈曾经的爱人司徒炳通，更没有提及她未婚先孕的事。她生下了孩子，是女儿，她给女儿起名贝弗利·安·司徒（Beverley Ann Seto）。女儿长相酷似母亲。女儿出生后不久，郑汉英就把她留在了她父亲和祖父母那里，而她自己立即投身到了为国抗战募捐的伟大事业中。郑汉英诞下孩子，可想而知温市唐人街会有怎样的反应，同情郑汉英的遭遇义愤者有之，旁观看笑话的亦有之。司徒炳通的父母司徒旄夫妇想必当时也承受了巨大压力，二老承担起了照顾小孙女的责任。

一生完孩子，郑汉英就加入了温哥华当地的几个组织：加拿大红十字会、法语联盟（L'Alliance Française）、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航空俱乐部（Aero Club of British Columbia）。郑汉英古道热肠，常怀济世之志，抗战爆发后，她作为国际红十字会会员在国内做了不少慈善工作，因此对战时加拿大红十字会的运作也不会陌生。无论何时，温哥华红十字会都是最忙碌的志愿者组织，二战期间，为了赈济海外伤兵和难民，该组织的工作量增加了两三倍。中国红十字会温哥华分会有可能就是在郑汉英的倡导下成立的。

创建于1883年、总部设在巴黎的法语联盟是一家致力于语言文化推广的机构，一所传播法国语言的优秀学校。它是一个非盈利性组织，旨在传播法语及法国文化。法语联盟在世界各地建立起了法语中心，20世纪初，北京、上海、广州和天津先后成立了法语联盟委员会，随后福州和青岛的法语联盟委员会也相继成立。法语联盟上海委员会的开办非常成功，其教学设施完备，阅览室藏书丰富。法语联盟温哥华法语中心的规模虽不及上海委员会，而且也没有上海委员会那么红火，但同样吸引了不少人。通过参加法语中心定期举办的各种讲座，郑汉英结识了不少当地的法语群体和法国



身着中国空军飞行服的郑汉英（胸前绣有飞行章，右臂缝有袖章）。

迷，并为之共享她所钟爱的法国文化。

不过，相比而言，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航空俱乐部是郑汉英最热衷的组织。通过该俱乐部，郑汉英不仅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者，而且还认识了一些专门从事飞行租赁业务的人士。该俱乐部是加拿大成立最早的飞行俱乐部之一，1941年春，当郑汉英加入俱乐部之时，它已经变成了一所为二战培训飞行员的官方飞行学校。学校的教官均为加拿大皇家空军现役飞行员，他们被派遣到飞行学校训练临时飞行员。二战爆发后，英国通过了一个叫做英联邦航空培训计划（British Commonwealth Air Training Plan，简称 BCATP）的计划，在英国本土和英联邦国家大规模训练飞行员。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航空俱乐部也参与了这一计划，战争期间训练了数量可观的飞行员，直接为联邦政府节约训练开支达 75 万美元。

根据 BCATP 计划，英国皇家空军的 200 多个飞行学校（含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英联邦国家的飞行学校）每年能训练出近 5 万名飞行员，其中加拿大 2 万名。建造 BCATP 训练基地的飞机跑道所耗费的水泥足以用来修建一条从温哥华到渥太华的高速公路，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称该计划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个主

要因素，或许是决定性因素。”（章末注1）在卑诗省的低陆平原地区，温哥华、三角洲边界湾（Boundary Bay）以及阿伯茨福德（Abbotsford）的机场都纳入了BCATP计划。1940年春，当宣布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航空俱乐部也纳入这一计划时，不少温哥华的团体和个人不失时机提出为俱乐部提供包括行政、地勤在内的志愿服务。到了夏天，俱乐部开展飞行员训练更是获得了加拿大国防部的支持下，此时的俱乐部实际上不再是一个私人机构，而是在整个二战期间扮演了一个兄弟会和社会组织的角色。

加入航空俱乐部后，郑汉英结识了不少当地的女飞行员，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贝茜·弗拉赫蒂（Betsy Flaherty）夫人。贝茜·弗拉赫蒂时年59岁，被公认是世界上年纪最大的女飞行员，她是俱乐部的董事会成员，同时也是温哥华著名的7人飞行俱乐部（Flying Seven）的先驱之一。7人飞行俱乐部成立于1936年，由7位航空女先驱发起，旨在加拿大妇女中推广航空飞行事业，乃加拿大首个正式的女飞行员团体。虽然其会员人数在不断增长，但7人飞行俱乐部之名一直沿用（章末注2）。为欢迎中国空军首位女官的到来，贝茜·弗拉赫蒂夫人以7人飞行俱乐部的名义，为郑汉英举办了一场午餐会。当时只要是在温哥华的女飞行员，不管是当地居民



7人飞行俱乐部的7位女先驱，左起：让·派克（Jean Pike）、托斯卡·特拉索利尼（Tosca Trasolini）、贝茜·弗拉赫蒂（Betsy Flaherty）、阿尔玛·高卓·吉尔伯特（Alma Gaudreau Gilbert）、艾莲·罗贝热（Elianne Roberge）、玛格丽特·费恩（Margaret Fane）、罗利·摩尔（Rolie Moore）。

还是到访者，也无论是持照者还是学生飞行员身份，都获邀出席了在乔治亚俱乐部（Georgian Club）举行的这一聚会。有的获邀者来自加拿大东部，也有的来自美国，1941年4月21日为郑汉英特意举办的这场欢迎晚宴，有可能是当时加拿大历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次女飞行员聚会，出席聚会的女飞行员共12人。（章末注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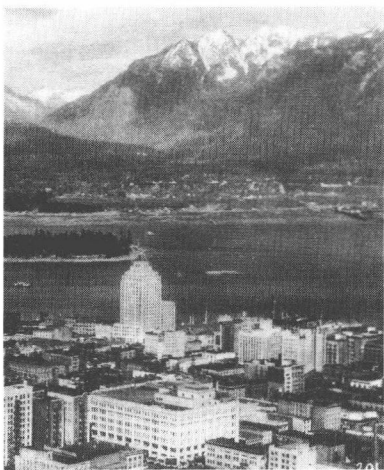
那一天，郑汉英成了午餐会上的焦点人物，一袭别致的旗袍更让她充满了异域风情，出席聚会的女飞行员们都对这位来自东方的同行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自然，在她们眼里，这位“中国女飞行员”出类拔萃，别具一格。郑汉英在欢迎宴会上表示，飞天的梦想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女子来说是可望不可及的事，而一旦她们真的有此念头，传统保守的父母们也可能会横加干涉。不过，她不无自豪地表示，自己出身于革命之家，家里人对她的飞行事业非常支持。她还表示，她一直梦想着为国效力疆场，不过目前有更紧要的事情要做。

“大量的工作等着去做，”她叹了一口气说，“我当然想此刻就飞上蓝天，但是祖国需要我去做更重要的事情。”（章末注4）

郑汉英并没有提及这些“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她也没有解释为何到温哥华来。她只是承认，自己在这个城市逗留了数月之久。不过，她越是在这个问题上避而不谈（也许她是有意隐瞒自己怀孕生女的事实），就越是让人猜测中国政府派她这样一位飞行员来加是为了执行某种特殊使命。

7人飞行俱乐部的会员们对这位肩负着特殊使命的东方同行的到来异常兴奋，她们纷纷邀请郑汉英同机飞行。几天后，郑汉英陪同她的几位新朋友来到机场，她一袭白色飞行服，胸前别了一枚中国空军飞行徽章，煞是抢眼。就这样，她做了到加拿大以来的第一次飞行。7人飞行俱乐部的女杰们邀请她加入这一飞行团体，郑汉英欣然应允。此后，只要工作允许，7人飞行俱乐部成员出席的会议和午餐会，都能见到郑汉英的身影。（章末注5）

中国在温哥华设有领事馆，地址位于喜士定西街（West Hastings Street）510号斯丹达楼内。这栋15层楼高的建筑位于温市当



航拍温哥华港及北岸山脉（North Shore Mountains）。

时的商业中心区。如今，这座楼宇的大理石建造的大堂已被修缮一新，与战时富丽堂皇的模样相差无几。楼内大堂曾经的内设与现在一样，几座镀金的大时钟一字排开悬挂在墙上，包括香港和东京在内的世界主要城市时刻一目了然，非常抢眼。显示香港和东京两座城市时间的挂钟紧挨着，每天，当郑汉英步入大楼上班时，听着时钟的滴答声，看着这两座紧邻的时钟，想必都会不

自觉地想起受邻国日本欺凌的祖国。为了抗日救国事业，郑汉英珍惜每一分每一秒，倾情奉献，不遗余力。

有31个国家在温哥华设立了领事机构。在外行看来，这些领事馆的外交官们似乎以享乐为生，他们的生活就是应接不暇的宴会、茶会以及午后的各种社交活动。诚然，这是事实，但是这些社交活动本身也是开展外交、进行游说、宣扬本国政策的极好机会。关于郑汉英在温哥华领事馆的具体职责，我们不得而知，每当媒体问及她的职责和使命，她总是会耸耸肩，用一种含糊其辞的语气回答说，“没别的，我就是喜欢在这里工作。”（章末注6）。中国驻温哥华领事馆的职责涉及方方面面，想必郑汉英和她的7个同事一直忙得不可开交。促进两国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关系，加之后来宣传抗战，争取海外支持，中国驻温哥华领事馆发挥了本国政府与东道国之间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中国驻温哥华领事馆还有一项不同寻常的职能，那就是代表华人与当地各级政府打交道。当时华人备受歧视，许多华人在这个国家出生，或者拥有永久居民身份，他们没有公民权却要承担有关义务。华人被认为是“难以同化”的异族，他们没有选举权，因此实际上是被剥夺了公民身份，身处困境的他们只有求助于本国领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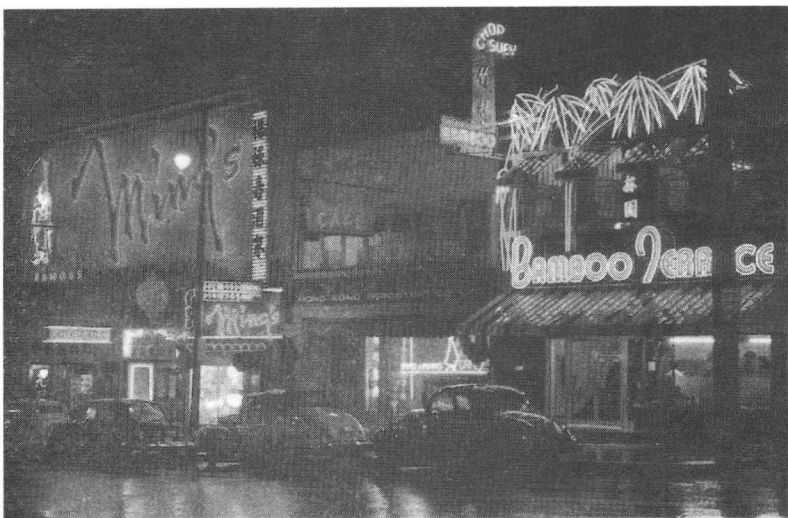
馆。中国领事馆的领事们实际上扮演了一个中间人的角色，他们与东道国的各级政府官员们打交道，为本国公民争取合法权益，中国领事馆的这种职能可谓由来已久。（章末注7）

二战爆发后，加拿大华人中的许多年轻人自告奋勇，志愿为抗击纳粹德国及其盟国提供各种服务。他们这种不计个人得失的磊落胸怀，令人赞赏，值得赞颂。要知道，他们在加拿大没有公民权，无生存权和自由民主权可言，而1941年2月温哥华市议会讨论的议案更加剧了种族偏见和歧视，使华人的社会地位受到进一步挑战。当时，温哥华市议会的议员们集会，商讨禁止华人在白人区置业，认为华人在白人区居住会使那里的物业贬值。当议员们就这个议案展开讨论之时，适逢郑汉英抵达温市。巧合的是，这一议案的提起与司徒家不无关系。

司徒炳通的姐姐杰拉拉丁（Geraldine）嫁给了唐人街赫赫有名的商人雷钰堂，雷氏家族当时在华商中颇具名望。多年后，雷钰堂成为加拿大规模最大的商业帝国的掌门人，他的成就得到加拿大社会的认可，曾获得加拿大勋章、卑诗省勋章，卑诗大学名誉法学博士等诸多荣誉。在1941年结婚前，雷钰堂就与未婚妻在温哥华的上流社区西区购置了一套房产，成为走出华埠、进入温市中心白人地区的第一批华裔。鉴于当时华人社会地位低下，居民区周围的白人都不愿与之为邻，许多人向市政厅提出抗议。他们上呈了一份请愿书，“要求采取行动，禁止东方人进一步渗入温市上流居民区。”作为响应，温哥华市议会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考虑起草地方法规，“限制东方人在承认的东方人居住点以外的任何地方拥有或占有物业。”（章末注8）一位议员更是大放厥词，称既然华人无公民权，那么对这一决定他们理所当然没有法律申诉的权利。（章末注9）

郑汉英的顶头上司、总领事鲍春豪（Chunhow H. Pao，音译）对温市拟定的这一排华政策义愤填膺，他当即致函市长柯奈特（Cornett）表示抗议，称这一草案“充满了歧视和偏见，整个就是司法不公，”不禁让人“思考中国的国家尊严何在”。（章末注10）

四月初，雷钰堂和未婚妻成了婚。在婚礼上，一对新人向媒体自豪地宣布了他们的新住址。结果，市政厅反对该法案的有识之士占了上风，限制温哥华华人搬迁的地方法规最终没有出台。



温哥华唐人街多彩的夜生活，摄于1940年代。

在绝大多数华人的生活圈仅限于唐人街之时，司徒一家早已在温哥华的白人社区购产置业，他们认为自己已经融入了当地的白人社会。郑汉英也认为，自己未受到任何种族歧视。身为外交官，而且又是富贵之家的金枝玉叶，郑汉英可谓养尊处优，她在白人世界里自由行走，无论到哪里，都会受到尊重和热烈欢迎，这种礼遇是众多温哥华华人不敢企及的。

很快，郑汉英就适应了温哥华的新生活。当时，抗战正酣，国内传来的消息让她喜忧参半。1941年7月，郑汉英欣喜地得知，她的姑姑郑毓秀和姑父魏道明将乘船经旧金山前往欧洲，姑父魏道明由行政院秘书长一职调派驻法国大使。而就在前一个月，6月5日，重庆发生了震惊中外的防空洞惨案。当晚，日军再一次空袭重庆，仅能容纳四五千人的较场口防空隧道里挤进了一万余人。由于拥挤和缺氧，造成数千名进入隧道躲避空袭的重庆市民死亡。得知惨案

的消息，郑汉英痛心不已。

只要有条件，郑汉英都会找点娱乐来释放自己。她是个京剧票友，在国内时，她喜欢逛戏园子，坐在黑暗的角落里看戏，一边听着锣鼓铙钹敲打的声音，一边嗑着西瓜子儿。令郑汉英高兴的是，温哥华唐人街的京剧开展得有声有色，大陆和香港来访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偶尔也会在此搭台唱戏。有一次，温市华人戏剧社的几位年轻的女社员怂恿郑汉英出演一出将在当地电台播放的京剧，郑愉快地答应了请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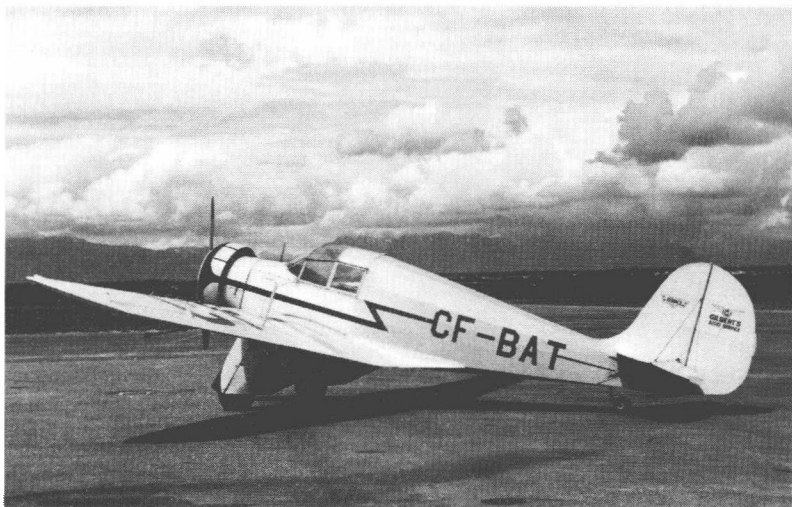
通过加入加拿大红十字会、法语联盟以及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航空俱乐部这三个社会团体，郑汉英结识了许多来自各行各业的朋友，积极投身慈善事业、广泛的社会交际也使她很快成为当地的知名人物。在众人眼里，郑汉英，这位新近来自中国的外交官，青春靓丽，气若幽兰，时尚前卫，舞艺卓群。不过，令人不解的是，郑汉英因其杰出的成就以及热心慈善的义举被当地主流媒体频频报道之时，华媒对她却绝少提及。而就在一年多前，李霞卿进行环美募捐飞行来到温哥华，在当地华人社会掀起了一阵狂潮。当地中文报纸《大汉公报》（*Chinese Times*）连篇累牍地报道了李霞卿的迷人优雅以及她高超的飞行技术。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郑汉英抵达温哥华却没有受到这样的礼遇，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之后的任何时候，其在华语媒体中的关注程度一直不高。究其原因，温市唐人街是一个由关系、利益编织而成的大社区，郑汉英未婚先孕一事让司徒一家颜面扫地，出于对这个当地的名门望族的尊重，当地华媒对郑汉英采取了冷处理的态度。

不过，在温哥华的白人世界，郑汉英可是一个备受欢迎的人物，她的雍容华贵，她的傲人成就，无不为主流媒体所称道。这也许是因为，她与备受推崇的7人飞行俱乐部的几位航空女先驱们有许多共同之处。这7位先驱中，有一位是阿尔玛·吉尔伯特（Alma Gilbert）夫人。阿尔玛于1934年获得私人飞行员执照，当时正在努力考取商业飞行员驾照。这位加籍法国人来自魁北克，所以除了对航空飞行的共同爱好，她和郑汉英还能用法语交流，虽



7人飞行俱乐部（Flying Seven）^①，其成员均佩戴有此徽章的胸针。

然阿尔玛带魁北克腔调的法语让郑汉英适应了一段时间。阿尔玛和她的丈夫在温哥华机场经营一家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航空服务公司，提供飞机租赁业务。他们拥有一架亮黄色的埃隆卡 LC（CF-BAT）轻型单翼机，郑汉英经常向夫妇俩租用这架飞机（章末注 11）。这架飞机名叫“蝙蝠”，因为机身上有显眼的“CF-BAT”几个字母，7人飞行俱乐部的会员经常租借这架飞机飞行。1940年6月，她们就曾租用这架飞机在温哥华上空散发有关“粉碎纳粹”、支持本国政府提出的强化制空权政策的传单（章末注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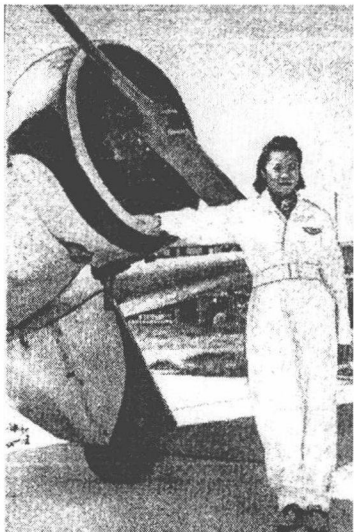
驻温哥华机场吉尔伯特航空服务公司（Gilbert's Aero Service）的埃隆卡 Aeronca LC CF-BAT“蝙蝠”轻型单翼机。

7人飞行俱乐部的会员们积极支持反法西斯战争。就在头一年，俱乐部主席托斯卡·特拉索利尼（Tosca Trasolini）还向媒体宣布，

① 7人飞行俱乐部（Flying Seven），1936年由玛格丽特·费恩（Margaret Fane）等7名加拿大女飞行员组成，故名。——译注

“我们或者飞往法国，向敌人投掷炸弹，或者留在加拿大测试飞机。事实上，只要有利赢得战争的事情，我们都会去做。”（章末注 13）遗憾的是，对于俱乐部提出的种种直接或间接参战的请求，均未获加拿大政府的同意。不过，郑汉英的到来似乎给俱乐部的会员们增添了不少动力，她们比以往更加努力地投身到反法西斯的战争中来。就在贝茜·弗拉赫蒂夫人主持举办欢迎郑汉英来温市的午餐会的一个月后，7人飞行俱乐部向新闻界宣布，她们将开设飞行地面基础课程，为培养更多的女飞行员服务。她们当时就预见到，政府将在武装部队编制中招收女兵，因此，她们计划向那些有志加入加拿大空军的年轻女子提供有关飞行基础课程的指导。不过，她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女人也能像男人那样上天杀敌。1941年6月底，加拿大政府宣布，皇家空军（RCAF）征招女兵，但是政府同时否决了女飞行员能够驾机上天之说。

虽然7人飞行俱乐部的会员们对空军女飞行员不能驾机上天深表遗憾，但是她们依然继续开课，向那些感兴趣的学员教授降落伞折叠、无线电操作等地面基础课。与此同时，她们继续游说政府，允许女飞行员驾机，为国效力疆场。俱乐部的另一位主席艾莲·罗贝热（Elianne Roberge）亲赴渥太华，向中央政府提出这一请求。她还借中国空军飞行中尉郑汉英这一实例说明，加拿大政府完全可以仿效中国的做法，但是最终，7人飞行俱乐部提出的驾机报效国家的提议未获政府批准。（章末注 14）



身着中国空军飞行服的郑汉英在埃隆卡蝙蝠（Aeronca BAT）轻型单翼机前留影，摄于温哥华机场，刊登于《温哥华日报》。

注释

1 *The Canadians at War: 1939/45* (Montreal: Reader's Digest Association, Canada, 1976), vol. 1, 85-88.

2 7人飞行俱乐部 (Flying Seven) 的7位女先驱是：贝茜·弗拉赫蒂 (Betsy Flaherty)、阿尔玛·吉尔伯特 (Alma Gilbert)、罗利·摩尔 (Rolie Moore)、让·派克 (Jean Pike)、托斯卡·特拉索利尼 (Tosca Trasolini)、玛格丽特·费恩 (Margaret Fane)、艾莲·罗贝热 (Elianne Roberge)。不清楚郑汉英是否见过当时在美国加州阿罕布拉 (Alhambra) 机场工作的让·派克，不过她认识其他的6位创始人。该俱乐部于1936年创立，成员均为女飞行员。1935年，玛格丽特·费恩与美国著名女飞行家艾米莉娅·埃尔哈特 (Amelia Earhart) 在加州的伯班克 (Burbank) 共进午餐，席间费恩提出加拿大女飞行员请求加入埃尔哈特创立的国际九九女飞行员俱乐部 (Ninety-Nines)，但是未获同意，原因是后者认为加拿大女飞行员人数太少且过于分散。遭到拒绝的费恩回到加拿大后即在温哥华着手组建7人飞行俱乐部，到1941年时，该俱乐部会员已经拓展到其他省份。二战后，7人飞行俱乐部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此时加拿大的女飞行员人数可观，申请加入国际九九女飞行员俱乐部 (Ninety-Nines) 不再是个问题。

3 出席在乔治亚俱乐部 (Georgian Club) 举行的欢迎郑汉英抵加午宴的7人飞行俱乐部的创始人员有：

——艾莲·罗贝热小姐 (Miss Elianne Roberge, 1930年10月18日于魁北克省获私人飞行执照；1932年10月27日于魁北克省获商业飞行执照)；

——伊丽莎白·弗拉赫蒂夫人 (Mrs. Elizabeth Flaherty, 1931年12月19日于卑诗省获私人飞行执照)；

——巴雷特夫人 (Mrs. D. Barrett, 即罗利·摩尔·巴雷特·皮尔斯, Rolie Moore Barrett Pierce, 1935年10月7日于卑诗省获私人飞行执照；1939年7月19日获商业飞行执照)；

——阿尔玛·吉尔伯特夫人 (Mrs. Alma Gilbert, 1934年4月7日于卑诗省获私人飞行执照；1941年9月26日于卑诗省获商业飞行执照)；

出席欢迎午宴的7人飞行俱乐部的其他成员有：

——贝里尔·阿姆斯特朗小姐 (Miss Beryl Armstrong, 1940年10月21

日子卑诗省获私人飞行执照)；

——帕特·格雷小姐 (Miss Pat Gray, 1941年9月25日获私人飞行执照)；

——贝蒂·沃勒小姐 (Miss Betty Waller, 来自温哥华)；

其他出席人员：

——玛格丽特·艾克尔小姐 (Miss Margaret Ecker, 温哥华记者)

——维克多·约克夫人 (Mrs. Victor York, 来自温哥华)

——罗哈玛·李小姐 (Miss Rohama Lee, 来自洛杉矶)

——维克多·福克斯夫人 (Mrs. Victor Fox, 来自多伦多飞行俱乐部)

——郑汉英 (来自香港飞行会)

“Social World”, *Vancouver News-Herald*, April 24, 1941; “Women Flyers Are Luncheon Guests,” *Vancouver Daily Province*, April 22, 1941.

4 “Chinese Girl Pilot Visiting Vancouver,” *Vancouver Daily Province*, April 22, 1941.

5 “Girl Pilots Ask Ferry Job to Aid Air Training Work,” *Toronto Daily Star*, August 25, 1941.

6 “Flying ‘Diplomat’ Makes Her First Speech Today,” *Vancouver Sun*, October 29, 1941.

7 自19世纪末华工和淘金者抵达加拿大后，加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限制华人移民的法案。其中包括：《保护妇女及女童法案》(Act for the Protection of Women and Girls, 1919)、《选民资格和登记修订法案》(Act to Amend the Qualification and Registration of Voters, 1871/1875)、《限制和规范华人移民法案》(Act to Restrict and Regulate the Immigration of Chinese, 1885)、《规范华人、日本人就业法案》(Act to Regulate the Employment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1897)。以上法案只是加国政府出台的 restrict 华人移民、居留和发展的法案的一小部分。1923年，加拿大国会通过了《华人移民法案》(Chinese Immigration Act)，俗称《排华法案》(Exclusion Act)，完全禁止了华人移民，1947年，加拿大政府迫于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压力而废除了该法案。

8 参见1941年2月3日温哥华市政规划和园区委员会特别委员会 (Civic Planning and Parks Committee's Special Committee) 有关“东方人在高档社区置业”会议的会议纪要。温哥华市档案馆 (City of Vancouver Ar-

chives, Vancouver, BC.)。

9 “Orientals Protest: Chinese Would ‘Feel Badly’ About Restriction, Says Consul,” *Vancouver Daily Province*, February 4, 1941.

10 参见中国驻温哥华总领事鲍春豪于1941年2月4日写给温哥华市长柯奈特(J. W. Cornett)就有关限制华人在高档社区置业的抗议信。温哥华市档案馆。雷钰堂和妻子的新居位于温哥华海伯利街(Highbury Street) 5810号。一对新人均毕业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在购置新居一事上,他们获得了女大学生俱乐部(University Women’s Club)的支持,后者致函温哥华市政厅,阐明根据种族限制居住地的做法是不明智、不公平,也是偏执排外的。“Women’s Club Objects to Zoning Chinese,” *Vancouver Sun*, February 11, 1941.

11 这架埃隆卡 LC 型(Aeronca LC, CF-BAT, C/N 2046)并排双座轻型下单翼机,由埃隆卡公司1936年—1937年制造,以对悍波音 P-26 型战斗机。该机有着亮黄色的涂装和漂亮的轮子设计,是当时温哥华机场十分受欢迎的一款飞机,战后这架飞机继续在温哥华机场服役多年。航空史学家道格拉斯·安德森(Douglas E. Anderson)在介绍这架飞机的历史时描述了他第一次见到这架飞机的情形:“那时我还年轻,有一次我去温哥华机场看飞机,我倚靠在绿色的尖桩篱栅上,就在这时,只见一架亮黄色的单翼机在停机坪上滑行,螺旋桨在慢慢地转动,那‘巨大的’子午线轮胎与蔚蓝的天空相映成趣。此景不禁让我心头一震。毫无疑问,比起那些红黄相间的飞机,那些亮银色的勒斯科姆(Luscombes)飞机以及蓝黄、绿黄、黑黄相间的埃隆卡上单翼机,这款飞机显得十分特别。”1955年,这架飞机在一起地面事故中遭到严重损坏,后捐赠给卑诗省伯纳比的奥卡拉监狱(Oakalla Prison),供学习航空机械的服役犯实训使用。Douglas E. Anderson, “Poor Man’s P-26: The Aeronca LC,” *CAHS Journal*, vol. 14, no. 4, 126.

12 遗憾的是,根据规定,女飞行员飞行高度不得低于3000英尺,加上有强风,所以她们散发的传单很多被吹进海里(“Vancouver Woman Flyers Drop ‘Pamphlets’ on City,” *Vancouver Sun*, June 20, 1940)。温哥华市档案馆存有一份这样的传单。1939年9月15日,7人飞行俱乐部致函有关部门,表达了利用一己之长为国效力的意愿。7人飞行俱乐部在信中表示,她们有两位成员拥有商业飞行执照,其他成员均拥有私人飞行执照。她们

提出，除了执行其他的任务，她们还可担任飞行教官或海岸警卫队员。10月7日，首都方面回应称正认真考虑她们的提议，但是据说，当政府得知7人飞行俱乐部为女飞行员俱乐部时，当即否决了她们的请求。不过，在俱乐部结束其历史使命之前，其成员一直利用自己的飞行特长为国服务。

13 “Flying Seven: Vancouver Women Pilots Offer to Go Over France—Bomb Enemy,” *Winnipeg Free Press*, June 15, 1940.

14 “Women’s War Work: Girl Pilots Ask Ferry Job to Aid Air Training,” *Toronto Daily Star*, August 25, 1941.

29. 初试登台

1941年中，郑汉英来到加拿大已有数月，不过这期间她尚未开始抗战募捐飞行和演讲。这种情形很快发生了改变。我们无从知晓，郑汉英进行抗战募捐飞行演讲是在执行命令，还是她自己决定在加拿大民众中争取对华援助和支持，不过，她开始这一举动的时间似乎与姑姑、姑父抵美的时间十分吻合。当时，新任驻法大使魏道明携妻子取道美国赴法上任。他们刚一到达美国，就发生了日本占领印度支那南部事件。而在上一年的9月，日军乘法国败降，入侵法属印度支那北部。日本入侵印度支那南部，控制了西贡和金兰湾，将印度支那作为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基地。鉴于局势的发展，魏道明夫妇推迟了赴法行程。他们在美国小住下来，等待政局的明朗化。（章末注1）估计郑汉英趁此机会赴美与姑姑、姑父团聚，并从姑姑郑毓秀那里接受了来自国内责令她在加拿大开展抗战募捐活动的指示。

为了宣传中国抗日，争取海外援助和支持，郑汉英也像李霞卿、颜雅清一样，准备先期开展演讲，向加拿大民众介绍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一开始，她将向温哥华市内的各俱乐部和团体进行演讲，待适应后，再拓展到卑诗省和美国西北部地区。最终，她会将中华民族抗战正义的声音传到加拿大东部。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左右，郑汉英忙于制订和完善这一计划。她准备了一个资料袋，里面放有英法两种语言的详细个人介绍，此外还有几张个人小照。她准备在每次演讲前把资料袋发给有关媒体，

这样就能省去一一面对媒体，特别是媒体对她的私生活进行刨根问底的麻烦。郑汉英事先准备了三个她认为适合不同类听众的有关中国抗战的主题，并将演讲稿打印在黄色的宣传纸上。必要时，她会根据演讲对象所属的机构的性质，对演讲内容进行专门的修改，根据时事变化及时更新有关内容。（章末注2）再往后，郑汉英会在原来提前准备好的几个演讲题目的基础上增加一些额外的讲座，待适应了面对公众，她会时不时将既定的三个演讲题目中的一个抽掉，换成即兴演讲，事实证明，她后来的即兴演说总是能达到意想不到的轰动效果。

像李霞卿、颜雅清进行环美飞行募捐演讲一样，郑汉英现在也需要一架自己可以支配的飞机，最好是某飞机制造商捐赠给她使用。为表示对反法西斯战争的支持，美国派柏飞机公司（Piper Aircraft Company）有意赞助加拿大红十字会于1941年组织的募捐筹款活动，并同意捐赠一架血红色的“幼兽”（Cub）单螺旋桨轻型飞机供红十字会使用。派柏公司还表示，很乐意将这架飞机捐赠给中国红十字会温哥华分会使用，条件是只要有人能将这架飞机从安大略省汉密尔顿的机库开走就行。也许本来是郑汉英飞往东部，开回这架飞机，但是不知何故，她未能成就此行。最后是7人飞行俱乐部先驱之一的罗利·摩尔·巴雷特（Rolie Moore Barrett）夫人玉成此事。罗利夫人拥有商业飞行员驾照，她同意帮忙将“幼兽”机开回温哥华。不仅如此，她还同意于返程途中在西部的每座大城市停留，为中国抗战募捐作宣传。

1941年9月9日，罗利乘商务运输机飞往汉密尔顿，这一天，恰逢来加进行募捐飞行表演的李霞卿也抵达这座城市。李霞卿此行是应加拿大红十字会的邀请，驾驶这架“幼兽”单翼轻型机为中国难民进行几场募捐飞行表演的。一个月后，《温哥华先驱新闻报》（*Vancouver News-Herald*）有报道说，罗利夫人终于取回了这架飞机，并“在返回温哥华的沿途一路开展募捐宣传活动”，其目的是为中国抗战赈济之友会（Friends of the Chinese Relief Campaign）募集10万美元捐款。

“作为加拿大红十字会运输部门的第一位女飞行员，布雷特夫人希望能够向足够多的人宣传介绍支持中国抗战的好处，以募集资金。”文章这样写道。（章末注3）

这篇报道最终言过其实了。因为末了，中国红十字会和派柏飞机公司未能达成协议，在罗利夫人离开温哥华赴汉密尔顿的三个月后，她回到温市，但却没有如愿以偿地开回那架“幼兽”轻型机。（章末注4）所以后来，只要是到温哥华以外的各大城市进行募捐演讲，郑汉英都只能租用吉尔伯特夫妇的那架亮黄色的“蝙蝠”轻型单翼机。

在温市发表首场演讲的前夕，郑汉英有些紧张，承认从未在大庭广众之下发表演说。不过此前，她从演说家宋美龄那里有意无意学到了不少演讲技巧。在国内时，郑汉英有不少机会聆听宋美龄的演说，而作为助手的她，不仅会留意她这位顶头上司的辞令口才，而且还会关注她的仪态仪表。她曾说，尽管蒋夫人私下里喜欢穿洋装（特别是能凸显其娇小身材和年轻外表的法国时装），但是



郑汉英的演说颇具宋美龄夫人之风，1943年宋美龄访美并在国会演讲引起轰动，图为宋美龄。

在公众场合，她无一例外都会身着旗袍。这一长及脚踝、剪裁得体、两边开衩的传统服饰不仅代表着中国，而且也更衬托这位第一夫人的雍容华贵。

出席晚会或非正式的聚会时，宋美龄可能选择印花旗袍，而在公开演说场合，她一律身穿深蓝或黑色这种深色旗袍以示庄重。作为完美主义者，宋美龄非常清楚，深色衣服能将她象牙色的肌肤衬

托得完美无瑕，而且还能将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她的脸和声音上。通过衣料的质地和剪裁手工，加上名贵珠宝的配衬，宋美龄总是能将这种看似简朴的服装穿出品味、穿出贵气。而在她的旗袍上，也总是别着一枚中国空军飞行徽章。作为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对空军情有独钟，她数十年来最喜欢佩戴的胸饰就是空军飞行徽章。

郑汉英对宋美龄的演讲风格也十分关注。宋美龄似乎有将听众置于股掌之间的能力，她非常擅长通过不断地调整音量来增强演讲的戏剧效果。演讲开始时，宋美龄总是会使用较低沉的音量，低到刚刚能听得到——这样做的好处是，不管听众有多少，都能让他们屏气凝神——而随后，当听众的注意力转到捕捉每个微弱的音节时，她会慢慢提高音量，直到最后用响亮、激昂的音调发表演说，正是这种音调的抑扬顿挫牢牢抓住了听众的注意力。

郑汉英在演讲中也大量应用了这一诀窍，不过她同时也融入了自己的风格。她在进行抗战募捐演讲时，语气十分真挚而热烈，每到高潮之处，她会提高音量，满怀激情。这种音量的巧妙调节总是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她的演讲具有极大的现场感染力，能让听众迅速产生共鸣，在动情激烈之处，让观众不由自主潸然泪下。此外，她的演讲颇具丘吉尔之风，偶尔的俏皮话因为辞藻华丽而让人过耳不忘。要是换了在别的时候，那些措辞可能听起来像是在表演舞台剧，但是在那个战火纷飞、群情激昂的年代，那些震撼人心的话语显得再合适不过了。

在个人仪容仪表方面，郑汉英是无可挑剔的。她年轻貌美，衣着考究，气质高雅，极富个人魅力。在她的衣橱内，有不少适合演讲穿着的深色旗袍。不过到了后来，郑汉英几乎无一例外身着中国空军制服发表演说，这套别着一枚飞行徽章的亮红色束腰制服，给郑汉英的演讲以神来之笔，其现场感染效应不可小觑。与宋美龄不同，郑汉英刚开始演讲时不戴名贵的珠宝首饰，不过后来，她也自己掏腰包购买一些贵重物件，让自己在演讲时更富吸引力。（章末注5）这其中最抢眼的是镶着贵重宝石的耳环。郑汉英喜欢一身空

军服，再佩戴这对亮闪闪的耳环。在中国，军人一身戎装时一般不允许佩戴首饰，而且浓妆艳抹也是不相宜的（郑汉英喜欢略施粉黛），不过在加拿大，郑汉英的身份更偏向于外交官多一些（外交官加空军军官的双重身份让郑汉英独占花魁，绝无仅有），正因为如此，她不受军队那些禁令的限制。

郑汉英买来珠宝是为了让自己在演讲时更加神采奕奕，还是借此来彰显自己是中国的代言人？如果是后者，那么她可是白白浪费钱财了。（章末注6）因为结识郑汉英的人都认为她本人就是中国的化身，如此高的评价自然有利于郑汉英在加开展抗战募捐活动。一位有幸聆听郑汉英演讲的温哥华市民为这位东方女杰所倾倒，演讲结束后，他迫不及待地想多了解这位东方女性。于是，他盛情邀请郑汉英与他和他的妻子共进晚餐。

“当我们在乔治亚酒店大堂等她的时候，”这位温哥华市民回忆道，“那不过就是温哥华一个普通的周五的夜晚。然而，就在这时，‘中国’突然走了进来。想不出形容郑小姐的其他词汇了，那天晚上和她在一起，这种感觉愈加强烈：她就是中国的化身。”（章末注7）

1941年10月，加拿大女子俱乐部（Women's Canadian Club）邀请郑汉英向其会员作一场演讲。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当她走进温哥华酒店，只见会议厅里人头攒动，座无虚席，约两千名妇女济济一堂，等待聆听郑汉英的首场演讲。对于初次登台的演讲者来说，这个阵势很是吓人，但是郑汉英丝毫没有胆怯紧张之意。走上一边放着大英帝国红船旗、另一边放着国民党党旗的演讲台，郑汉英闪亮登场。一袭旗袍裹身，舞台的中心，众目睽睽的焦点，郑汉英用触动听众心灵的诚挚语言慷慨激昂地讲述着中国的艰苦抗战。

郑汉英谈到，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所表现出来的顽强意志，谈到为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政府、工业企业和教育机构实行内迁。她特别提到一所大学内迁时有500名学生远行千里的感人事例，她还谈到重新安置两万农民家庭这一浩

大工程所付出的艰辛。正如宋美龄在庐山各界知名妇女谈话会上所期望的那样，郑汉英也盼望着一个战后繁荣的世界的到来。

“中国的工业合作精神，包括道路建设、重新造林等方面体现出来的合作精神，就是生长成战后一个新的、繁荣的工业体系的种子。”

与代表其他国家来加寻求援助的人士所作的演讲不同，郑汉英不是无情揭露敌人的残暴行径，而是强调中国人民在抗战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她不是一副摇尾乞怜的姿态，而是生动地描绘了一个“有作为”的民族克服困境、争取胜利的感人图景。似乎是为了有意提起听众的兴趣，郑汉英在演讲中将中国与饱经忧患的英国作了类比。

“如今，我们中国人民正在用过时的装备奋力保卫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郑汉英慷慨激昂地说道。“正如英国是大西洋地区最后的民主前哨一样，重庆就是太平洋地区民主的象征。”她总结说，“中国正与英国的小店主们并肩战斗。”（章末注8）

尽管事实是，中国实行的“民主”要比丘吉尔政府的“小店主之国”^①所享有的民主极权许多（蒋介石已经承认，即便在战争结束后，他也不会将公民权赋予他的子民），但是听众们并不计较郑汉英的这种自我贴金的说法。她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的表达方式，以及她所讲的东西能在听众的记忆里保存多久。两年后，一位曾经聆听郑汉英演讲处女秀的女士，对郑汉英那晚激情澎湃的演讲依然记忆犹新。

“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每双眼睛都紧盯着硕大讲台上那个娇小的身影，”这位女士回忆道，“每双耳朵都认真地聆听着一位曾在巴黎索邦大学学习法律的、操着一口法语腔的英语的中国女子那悦耳、动情的声音；当她在讲述完她的祖国经历了六年艰苦卓绝的抗战，慷慨激昂地宣告，中国从未、也绝不会屈服时，每双眼睛都

^① “nation of shopkeepers”，小店主之国，商人的国度，英国绰号。这一短语出自亚当·史密斯的《原富》（*The Wealth of Nation*）。——译注

热泪盈眶。”（章末注9）

郑汉英从此开始了她的演说家生涯。初次登台大获成功，温哥华各组织团体的演讲邀请纷至沓来。这其中包括用法语向法语联盟的成员以及向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简称UBC）的法裔学生发表演说。在唐人街，郑汉英用粤语向同胞们宣传航空救国的理念，呼吁同胞响应驻温哥华加拿大华侨救济祖国伤兵难民筹捐处（Chinese War Refugees Relief Committee）的号召，为抗战慷慨解囊。（章末注10）不过，郑汉英主要还是用英语向白人发表演说。最有意义的一次是向驻温哥华杰里科军事基地（Jericho Station）的加拿大皇家空军官兵发表演说。在演说中，郑汉英向她的国外同行介绍了她在英国皇家空军下属的香港远东飞行训练学校所进行的严格的飞行训练，谈到她作为中国空军军官在国内各地进行飞行考察的经历。这次演讲让郑汉英与加拿大皇家空军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倾听这次演讲的加拿大皇家空军的官兵代表们，无论男女，都视郑汉英为不可多得的精英同仁，给予了她高度的评价和认同。

處捐籌民難兵傷國祖濟救僑華大拿加華高雲駐		
Chinese War Refugees Relief Committee		
108 Pender St. E.	P. O. Box 249	Vancouver, B. C.
中華民國廿____年____月____日 Date _____ 19____		
茲收到_____先生捐助救濟祖國傷兵難民		
Received from M _____		
Address _____		
Donation for The Chinese War Refugees Relief Fund		
The Sum of _____		Dollars
Chinese War Refugees Relief Committee		
Thank You N ^o : 902		By _____
經手收銀人		

驻温哥华加拿大华侨救济祖国伤兵难民筹捐处捐款收据。

加拿大幅员辽阔，西濒太平洋，东临大西洋，素有“太平洋门户”之称的温哥华位于西海岸，与其他地区，特别是东部省份地区多有不同。欧洲战场牵动着温哥华人的注意力，也正是欧洲战事让这个国家举倾国之力。不过，温哥华人也密切关注太平洋局势的发

展。日本穷兵黩武，太平洋战争一触即发，如果敌人从海上进攻，那么卑诗省将成为加拿大的第一道防线。

战争的担心和恐惧终于成为了现实，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当日晚，加拿大对日宣战。随后，美、英等20多个国家相继对日宣战。中国事后表示，对加拿大第一个发起对日宣战心怀感恩，其患难情谊永难忘怀。（章末注11）

以加拿大为首的西方同盟国家全体对日宣战，全球局势立刻明朗化，中国不再孤独，温哥华的华人难抑激动兴奋之情，唐人街沸腾了。欢呼雀跃的人群涌向街头，聚集在《大汉公报》报馆前，迫不及待地阅读着张贴在橱窗上的有关战事的最新消息。“现在日本恶有恶报了！”一位华人兴奋地高叫着。整个华埠到处都是欢歌笑语，好一派热闹的场面。整整有四年的时间，加拿大华侨无不牵系着自己的祖国，惦念国内的亲人，并为他们的前途和命运忧心忡忡，寝食难安。而现在，形势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希望来了。

在加拿大对日宣战的当晚，整个城市保持高度戒备，谨防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爆发的两天后，为防日本突袭，温哥华进行了灯火管制，空袭警报响彻全城。心惊胆战的市民们纷纷抢购手电筒、遮光窗帘以及遮挡汽车前灯灯光的遮光罩。“这是有史以来生意最好的一天”，某五金店的一位店员忙得气喘吁吁地说，“所有货品销售一空！”中国驻温哥华领事馆所在的办公楼为钢筋结构建筑，其地下室被政府征作防空掩体，地下室门口挂了一块红字大标牌，上面写着：“请注意！防空掩体，请按箭头指示方向前行。”战争的阴云也给郑汉英所在的社区带来了变化。就在离她的寓所仅一个街区的乔治亚西街上，架设了一口高射炮，炮口朝天，随时待命准备发射。

一夜之间，日本人成了加拿大人的公敌，日货被抵制。日本驻温哥华领事馆被全天候监视，而卑诗省妇女委员会（B. C. Council of Women）也在调查标签上注明“中国柑橘”的橘子是否实为日本货（章末注12）。而温市著名的斯坦利公园的园长则坚称，公园一

直引以为傲的日本樱桃树其名称是个误解，那其实是中国树种。温哥华市政府给每位华侨发了一枚别针纽扣，上书：“我是华人”，以免被误作日本人。看来日本入侵，或者至少是空袭不仅不可避免，而且随时有可能发生。就连尊至卑诗省省长的伍德沃德先生也断言，“请辨明敌友。我们这里将遭到轰炸，如果不是在三个月内，那么肯定会在半年内。”（章末注 13）有些人甚至谣传，政府已经考虑将卑诗省维多利亚市的议会大厦炸掉而不是等着敌人来占领。（章末注 14）

曾经经历过重庆大轰炸的郑汉英一定不会对温哥华这个城市突然之间的云波诡谲、近乎歇斯底里的兴奋和谣言满天飞感到陌生，让她释然的是，这个国家如今终于切身体会到了她的祖国所经历的创伤和痛苦。出于这个原因，中国突然“大热”，驻加领事官员遭到“炮轰”，焦头烂额地回答各方提出的有关抗日的问题。众所周知，中国驻温哥华领事馆有关于远东局势的最新消息（这些消息通过电缆传送，由旧金山的短波广播传至中国领馆），所有人都想及时掌握敌人的兵力调动部署情况和其作战意图。

中国服饰和发型也突然时髦起来。专业彩妆品牌蜜丝佛陀（Max Factor）的创始人、好莱坞最具天赋的彩妆大师蜜丝佛陀先生改良的中国发型开始在西方女子头上流行开来，加拿大对日宣战不到一周，《温哥华日报》（*Vancouver Daily Province*）妇女版就刊登了有关飞行中尉郑汉英的配图文章，标题为“中国女飞行员生活丰富多彩”。这是一篇积极的文章，对中国的抗战事业也是一次极好的宣传，不过郑汉英看到报纸上对她身高和体重的猜测一定皱眉蹙额。（章末注 15）好在这篇文章的确考虑到了主人公个人隐私中最重要的内容，丝毫没有提及郑汉英曾经的情人司徒炳通和他们的私生女。

1941 年圣诞节这一天，香港沦陷，这给对战争抱乐观态度的加拿大人以重重一击。启德机场，郑汉英曾经学习飞行的地方，成为日机轰炸的首轮目标。当时机场停有 5 架英国皇家空军的战斗机，一轮空袭后，其中的 3 架连同 7 架民用飞机被炸毁。魁北克皇家步

枪团（Québec Royal Rifles）以及温尼伯掷弹兵团（Winnipeg Grenadiers）两支军队是加拿大首批派往国外加入盟军上阵的队伍，没有充足的军训，作战经验不足，原定只是增援港岛的驻军，结果被卷入抗战。由于盟军在1941年圣诞宣告投降，两支军队残余近两千加国将士也逃不过沦为战俘的厄运，在港度过一段不为人道的黑暗日子，部分战士自此永别家园。香港沦陷，令加拿大举国上下对战争形势的发展更加焦虑不安。

就在1941年的最后一天，温哥华市民纷纷打开收音机，调到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新年前夕节目，广播一面哀悼战争中的死者，一面盛赞蒋介石坚持抗日的勇气和决心。当渥太华和平塔零点报时，一曲《友谊地久天长》奏响的时候，人们纷纷祈祷来年有个好光景。

遗憾的是，1942年的新年并没有像人们祈祷的那样福瑞祥和，不幸和灾难仍在继续上演。刚开始时，来自中国国内的消息颇为振奋人心。1941年12月下旬至1942年1月中旬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日方称为第二次长沙作战），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盟军方面获得的第一个胜利。就中国战场而言，此战是以武汉会战结束为标志的战略相持阶段中，至1945年5月国军方面获得的最大战役级别的胜利。围攻长沙城的日军仓皇撤退，国军乘胜追击，此时已有美国飞行员加盟的中国空军更是让溃敌抱头鼠窜。但是好景不长，到2月15日这一天，也就是中国农历新年，新加坡向日本投降，战争形势进一步恶化。战争形势的发展令加拿大的宣传机器高速运转，媒体利用各种手段鼓舞国人士气。反映中国抗战的纪录片《中国抗战实录》（*Inside Fighting China*，该片获1943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在各影院上映，这部纪录片由绰号为“厄运之声”（Voice of Doom）的加拿大演员罗恩·格林（Lorne Greene）配音，罗恩·格林早年曾在加拿大的广播电台当过播音员，因其声线低沉适合播报严肃的新闻而出名。在《中国抗战实录》中，他用一贯严肃低沉的语调叙述道：

“十余年来，中国成功地抵挡了日军的铁蹄。在敌人疯狂的打

击下，她英勇顽强地抗争着，她撤退过，但是绝不会言败。游击战术的巧妙运用使中国在成功牵制敌人的同时，积聚力量，准备把侵略者赶出去。”

如今中国和加拿大成了盟友，中国不失时机地派出一些举足轻重的人物赴加争取更多援助。珍珠港事件爆发后，蒋介石即任命尚在美国的妻舅宋子文出任外交部长。1942年2月，宋子文利用周末之机对加拿大东部的几家军需品厂进行了考察。宋及随行的军事要员给加拿大的政客和商界领袖留下了积极的印象（章末注16）。2月20日，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博士抵达温哥华，帮助启动第二期胜利公债（Second Victory Loan）的发行，胡适的个人魅力进一步推进了加拿大的亲华态度。胡适在加方举办的



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博士（1938年—1942年在任）1942年2月访问温哥华。

的欢迎宴会的致辞中这样表示，他之所以取消所有活动安排，不惜三千里之途来到温哥华，就是因为加拿大“不仅是中国的老朋友，而且还是中国的第一个盟友。”（章末注17）在某国家级的电台广播中，胡适特别提到，加拿大向中国输送布朗轻机枪和飞机，这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盟国向中国输送的首批战争物资，胡适高度赞扬了加国对中国抗战的贡献。胡大使在出席中国驻温哥华领事的一次私人宴会中，给郑汉英带来了有关她姑姑、姑父的最新消息，两人当时仍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逗留。

1942年3月8日，为庆祝国际妇女节，加拿大广播公司（CBC）在广播节目中播放了15分钟的宋美龄讲话。在发表于重庆的这次广播讲话中，宋美龄先是对极权政权在妇女权益一事上所表现出来的一贯的不能容忍进行了贬损和驳斥，随后，她话锋一转，描绘了中国妇女对抗战所作的积极贡献。认真聆听着这位

老上司的讲话，郑汉英随手记下了许多供自己日后演讲使用的新素材。

此时，请郑汉英发表抗战演说的邀约不断，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忙碌。一次，她获邀赴温哥华岛对加拿大女子俱乐部维多利亚市分部的成员发表了题为“中国在前进”的演说，600名俱乐部成员聚集在皇后酒店（Empress Hotel），聆听她的慷慨陈词。在演讲中，郑汉英用一种无比自豪的语气，描述了就在香港沦陷前，数架救援机如何将250多位老百姓安全转移的感人事例。她满怀信心地表示，航空飞行事业将扭转祖国目前遭遇的困境。

“中国铁翼”，她疾呼道，“将把世界带到我们的家门口，把自由带给我们的天空！”（章末注18）

在远东战事趋于白热化之时，中国驻加外交使团突然出现重大变化。国民政府任命刘师舜为驻加拿大大使，3月20日，中国驻加总领事馆由首都渥太华迁至温哥华。中国驻加外交使团升格这一变化反映了加拿大西海岸对越来越危险的太平洋地区局势的担忧。1938年始任驻渥太华总领事的时昭瀛也随迁至温哥华，改任驻温哥华总领事。（章末注19）外交使团的升格，让郑汉英一下子站到了中国驻加外交运作的中心。

此时，郑汉英受温哥华妇女委员会（Vancouver Council of Women）之邀又作了一场重要的演讲。这一次，各大媒体又对这次演讲作了广泛报道，称“当她发出‘齐心协力，胜利就会更快属于我们’的呼吁时，没有一双眼睛不饱含热泪，没有一颗心不激情澎湃。”郑汉英用深情而激动的声音向热泪盈眶的听众们讲述了她的同胞“尽管遭受着无法忍受的痛苦，但是从未想过妥协或投降。”当她义正词严、斩钉截铁地高呼“中国将向敌人发起反攻，把他们永远赶回到海那边他们的小岛上去！”时，听众无不激动得难以自抑。（章末注20）

7月14日，法国国庆日，郑汉英在自由法国（Free French）^①举办的一个庆祝活动中发表精彩演说，据说博得满堂喝彩。德国占领法国后，自由法国在温哥华组建了一支武装部队，部队战士通过英联邦航空培训计划（BCATP）在温市接受了飞行训练。就像郑汉英一样，这些飞行员的未来充满了未知，他们远离正在遭受纳粹铁蹄践踏的家乡，远离亲人、战友，但是，郑汉英用他们钟爱的母语——法语——发表的激情洋溢的演讲，给了他们无穷的勇气和力量。这位中国女飞行员激昂地表示，与历史一脉相承的是，法国大革命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如今再一次等待在座的热血男儿去践行。

“今天，自由法国，在座的你们，正肩负着同样的使命，”郑汉英对他们热切地说。“你们的勇气和信念赢得了整个同盟世界的赞许。”（章末注21）

郑汉英的话刚落地，整个会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口哨声不绝于耳，掌声经久不息。

几周后，她又应温哥华青年贸易委员会（Vancouver Junior Board of Trade）的邀请为其会员作了一场震撼人心的演讲。此前，还没有女性享此殊荣。她以“日本——最脆弱的链条”为题，在这个新话题中，她提出了一个新的假定，如果同盟国向中国输送亟需的抗战物资和战斗机，那么她的祖国必能力挽狂澜，扭转太平洋战局。她表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将对解除太平洋航道的封锁产生积极作用。这一胜利可以缓解联合国的作战压力，使其集中兵力投入欧洲战场，此举必定能加速结束敌对状态的脚步。她的演讲逻辑缜密，令人信服。

次日各大报纸就此发表评论说，“这位身材娇小、容貌俊美的中国女子——在青年贸易委员会发表演说的首位女性——她那符合

^① 自由法国（Free French），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人于1940年在其本土军事失利后组织起来继续抵抗德国的运动。戴高乐以英国为基地组建一支“自由法国”的武装部队。1942年，自由法国武装部队在法国地下抵抗运动的增强和驻扎在北非的大多数维基法国军队向自由法国倒戈而取得权力。——译注

逻辑的推理以及对中国过去五年艰苦抗战所作的图景式的描述，极富感染力，高潮迭起，掌声一浪接一浪。”（章末注 22）

她再一次用真情打动了现场的听众，不少七尺男儿也感动得热泪盈眶。青年贸易委员会会长事后总结说，郑汉英的演讲给听众以强烈的情感共鸣和心灵震撼，“并非那些事实而是她的真诚如此震撼人心，那种强有力的情感爆发力，给那些堂堂汉子、年轻的思想以强大理性情感的冲击，使其心灵受到震颤，令其情不自禁。”（章末注 23）

这一年，郑汉英还作了多场其他演说，均大获成功。演讲对象包括全国民权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for Democratic Rights）、大学女子俱乐部（University of Women's Club）、温哥华女子公民教育学校（Vancouver Women's School for Citizenship）以及远至美国西海岸的不少团体和组织（章末注 24）。不过，尽管她的演说十分精彩，而且所到之处均受到热烈欢迎，但是有时她表现得有些褊狭，像个机器人。面对辛勤工作的赞许和鲜花掌声，郑汉英表现得十分淡然。

“我没有兴趣为自己做这些事，”她一再强调。“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祖国和人民。”（章末注 25）

一位记者撰文称，在他眼里，郑汉英是一个优雅迷人、富有魅力的女人，但是她又有点顽固呆板，或者说，有点令人不悦的是，她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国家在政治基础设施建设上有任何失误。她就像个经验老到的政客，总是机智地避开他提出的有关中国恶性通货膨胀的问题，而且对有关国共内战一触即发的问题也不予置评。

这位记者报道说：“从外交上来看，郑小姐是完美、无懈可击的。对于我提出的二三十个主要问题的回答，她是审慎的，有分寸的。”

让这位记者感到有点沮丧的是，他总是无法让郑汉英绕开中国亟需海外援助这个话题。一开始，他认为，将她比作一尊象牙雕像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不过到后来，他发现她终究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这位记者和他的妻子邀请郑汉英看电影（郑汉英曾提出想看

《忠勇之家》(Mrs. Miniver)，这位记者注意到，当郑汉英在观看开场前的动画片时，她那平时一本正经的面孔终于绽放出了笑容，“她像我们一样开怀大笑……”（章末注26）。

这位记者只知道，郑汉英是位独居的单身女性，她最亲的亲人，一个哥哥，在数千里之外的旧金山中国领事馆任职。郑汉英从未向他透露，她有一位更亲的亲人——她的女儿——就生活在同一个城市。

注释

1 二战期间，法国投降后成立了亲德傀儡政府——维希政府（Vichy Government），因政府所在地迁至法国中部小城维希而得名。在当时，究竟是维希政府还是戴高乐领导的流亡英国的自由法国政府为法国合法政府还是个问题。魏道明夫妇之所以滞留美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两人在美国小住下来，在此期间，魏道明在驻美大使馆做些力所能及的事，直到1942年9月，胡适突然被免去驻美大使一职，该职位由魏道明继任。

2 郑汉英事先准备的三个演讲题目是：“中国在前进”（China Marches On）、“中国的抗战与重建”（Resistance and Reconstruction in China）、“中加两国：两个伟大的民族，一个共同的目的”（China and Canada, Two Great Peoples, One Great Purpose）。最后一个演讲题目有时会改成“中加两国：民主政治的保障”（China and Canada, Bulwarks of Democracy）。后来，郑汉英又增加了一个颇受欢迎的演讲题目：“日本——最脆弱的链条”（Japan—The Weakest Link）。

3 “Day by Day: Aviatrix,” *Vancouver News-Herald*, October 11, 1941.

4 Joyce Spring, *Daring Lady Flyers: Canadian Women in the Early Years of Aviation* (Porter's Lake, N. S.: Pottersfield Press, 1994), 100.

5 郑汉英佩戴的这些珠宝总价为1975加元。直到她去世时，购买这些珠宝的钱尚欠1033.75加元，外加利息89.5加元。

6 1943年6月，宋美龄对加拿大作了为期三天的访问，受到了高规格的礼遇。各大媒体对这位中国第一夫人大肆报道，包括对她的穿着打扮以及佩戴的首饰都极尽详述。1943年6月15日的《渥太华公民晚报》（*Ottawa Evening Citizen*）报道称，“蒋夫人的行头包括一对外圈镶钻的黑玛

瑙耳环，她的右手上戴了一只同款的手镯。”几天后，也就是6月18日的该报又刊登一篇消息称，“她的衣领处别了一枚闪亮的钻石领针，手上戴着一枚硕大的蓝宝石戒指，只要她挥挥手，就可以看见那枚戒指在空中画出的美丽弧线。”媒体喜欢连篇累牍地报道那些有身份的女性的衣着打扮可能对郑汉英产生了一些影响，以致她在后来的环加募捐演讲中不惜花巨资购买珠宝首饰装点自己。

7 Williams, "We Want To Go To China," *Forward*, 3.

8 同上, "Consul Attaché Speaks on China," *Vancouver News-Herald*, October 30, 1941.

9 Mamie Maloney, "In One Ear," *Vancouver Sun*, September 14, 1943.

10 加拿大援华委员会 (Chinese War Relief Committee) 是加拿大响应美国援华联合会 (United China Relief) 而成立的华人抗战慈善组织, 该机构在加拿大各大城市和主要城镇均设有办事处。该机构所募集的捐款通过驻纽约的中国银行以英镑汇至国民政府财政部 (后来, 为避贪污之嫌, 海外捐款由财政部转汇到宋庆龄创办的基金会)。参见加拿大援华委员会卑诗省弗农分会邝生 (G. Kwong) 于1945年1月5日写给弗农市 (Vernon) 布尔曼先生 (Mr. T. K. Bulman) 的信函。打字并签名手稿, 该信函副本为本书作者收藏。

11 当时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在温哥华发表广播讲话, 盛赞加拿大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革命情谊, “加拿大是第一个对日宣战的西方大国, 这是历史事实。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当天, 加拿大即对日宣战, 比美国还早了大半天。”“No Doubt of Ultimate Victory Dr. Hu Shih Tells Canadians,” *Vancouver Daily Province*, February 20, 1942.

12 1942年5月4日, 加拿大皇家骑警 (RCMP) 押解驻温哥华魁森路 (The Crescent) 3351号日本驻温市领事馆领事川崎一郎 (Ichiro Kawasaki) 及其家人和领事馆全体随员登上了一列驶往纽约的火车。一行人再从纽约乘船经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到达目的地非洲, 在那里, 加拿大皇家骑警将用这些人换回战后一度被扣留在日本的加拿大领事馆一众官员。

13 "Woodward Flays Complacency in Board of Trade Address," *Vancouver Sun*, March 21, 1942.

14 Gwen Cash, *A Million Miles from Ottawa* (Toronto: Macmillan,

1942), 35.

15 这位记者估计郑汉英身高5英尺2英寸, 体重110磅。“Chinese Girl Pilot Lives Colorful Life,” *Vancouver Daily Province*, December 12, 1941.

16 1942年5月18日, 由同盟国所有国家派代表参加的渥太华航空训练会议(Ottawa Air Training Conference)召开, 会议为期一周, 中国也派出了航空代表团并在会上精彩亮相。当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驻美代表、驻美空军代表沈德燮少将起身发言时, 来自14个国家的与会代表全体起立鼓掌。沈德燮少将在会上表示, 尽管中国已经建立了不少空军基地, 具有从基地起飞、轰炸东京的实力, 但是中国空军最大的问题不是缺少飞行员, 而是飞机严重不足。

17 “Dr. Hu Shih Speaks Here: Canada China’s First Ally,” *Vancouver Daily Province*, February 20, 1942.

18 “Courage, Suffering of Chinese Outlined by Visiting Speaker,” *Victoria Colonist*, March 4, 1942. 1918年3月, 郑汉英的姑姑郑毓秀也曾到访加拿大卑诗省会维多利亚市。当时, 她正前往法国出席巴黎和会,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 郑毓秀上演了一出为世人称道的“以玫瑰为枪”的精彩好戏。加拿大各大媒体均报道了郑毓秀到访维多利亚市的情况。

19 刘师舜任中国驻加拿大首任公使, 后升任大使, 而多伦多领事馆领事方嘉胜(Fong Gat-shun, 音译)也是中国首位驻外领事。中国驻多伦多领事馆的业务后来逐渐拓广到美国东部沿海地区。

20 “China Speaks—and Vancouver Women Thrill to Her Story,” *Vancouver Sun*, April 14, 1942.

21 “Chinese Girl ‘Steals the Show’ of the Fighting French,” *Vancouver News-Herald*, July 15, 1942.

22 “Sound Strategy to Beat Japs First...,” *Vancouver News-Herald*, July 31, 1942. 郑汉英的此番论述并非本人观点, 而是引述宋美龄对罗斯福的贴身顾问亨利·霍普金斯(Henry Hopkins)的一番讲话: “对德和对日这两场战争终将取得胜利, 但是要达此目标需要我们全力抗日。”Robert E.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NY: Harper & Brothers, 1948), 660 - 61.

23 Williams, “We Want To Go To China,” *Forward*, 10.

24 “Chinese Girl Flier To Speak in East,” *Vancouver Sun*, November

24, 1942.

25 “Chinese Girl Pilot Lives Colorful Life,” *Vancouver Daily Province*, December 12, 1941.

26 Williams, “We Want To Go To China,” *Forward*, 3. 记者威廉姆斯先生回忆采访郑汉英的情况时这样说道：“我们问到有关中国正在发生的恶性通胀问题，但是郑小姐却不以为然地耸了耸肩，她表示，通货膨胀只发生在大城市，并未对抗战产生实质影响，中国人民需要援助。当被问到有关国共缺乏合作甚至怀有敌意这一更重要的问题时，郑小姐表示，国共团结一致抗日，中国依然需要援助。问及对中国国内声势浩大的抗日游击队的看法（联合国希望游击队发扬光大，因为这种战术才能体现中国的作战优势），郑小姐反问中国人是否该赤手空拳作战，她依旧强调中国需要武器和装备。”



飞天名媛

Interview by
Sisters of Heaven

30. 环加飞行募捐演讲

郑汉英喜欢挑战，现在是为了祖国进行一次大冒险的时候了。这次挑战需要她付出所有的精力、勇气和个人魅力。

1942年9月初，胡适离任驻美大使，该职由郑汉英的姑父魏道明继任。为此，郑汉英专门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阐明了自己与新任驻美大使的家庭关系，并向媒体透露，她姑姑曾表示，希望她与丈夫在晚春的某个时候访问温哥华（章末注1）。

郑汉英还兴奋地向媒体宣布，在未来的几个月，她本人将作为“亲善大使”赴加拿大东部进行为期四个月的巡回演讲。此次巡回演讲将在她以往在本地进行的抗战宣传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影响，为祖国的抗战争取更多援助和支持，将“促进中加两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共同贡献的友好理解”。她表示，希望此行到访的城市包括美国首都华盛顿，以便能够拜访寓居双橡园中国大使馆的姑姑和姑父，不过她说，她对姑姑郑毓秀再了解不过，如果此次访问成行，也肯定不会是一次轻松的假期，姑姑很有可能为她安排额外的演讲活动。之后的几个月会相当忙碌，但是她没有怨言。

“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她斩钉截铁地说，“我还将在纽约发表演讲，也许是以美国援华联合会的名义。不过我所做的这些都有助于同盟国争取战争的胜利。”（章末注2）

要离开女儿四个月是漫长的，不过郑汉英已经习惯了这种不在女儿身边的日子。一出生没多久，女儿就交给祖父母抚养照顾，可怜的老司徒夫妇，为孙女的成长付出了不少心血。对郑汉英来说，

在祖国命运未卜的关键时刻，国事是第一位的，亲情退居其次。她是郑汉英，华夏英雄也，祖国需要她。

除了进一步宣传中国抗战，她的巡回演讲之旅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目的。正像舞台剧中主要演员上场前先要有个暖场表演以调动观众情绪一样，郑汉英此行是为宋美龄访美作准备，这位第一夫人计划于来年访问北美。1943年2月底至6月，宋美龄对美国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访问，其足迹遍及美国诸多大城市，其间，她还顺道对加拿大作了短暂造访。宋美龄访美掀起了一股旋风，她以自己的美貌、风度、才智、口才和人格魅力征服了美国，数次被美国《时代杂志》选为封面人物和年度风云人物。

郑汉英此行费用不菲。在美国，中国之友会赞助了郑汉英的两位飞行同仁颜雅清和李霞卿环美飞行募捐演讲的费用，郑汉英也可能获得该组织的赞助，毕竟中国之友会在加拿大也非常活跃，不过，最有可能的是中国驻温哥华总领事馆承担了这笔费用。而郑汉英的身份本身也可以节省一些开支。作为同盟国国家的外交代表，加上还是一位飞行中尉，郑汉英有时可免费搭乘加拿大政府的飞机旅行，而这将为她长达数月的旅行节省一大笔开支。不过，郑汉英满怀信心地希望，此次巡回募捐演讲取得巨大成功。

她尽可能轻装上阵。她的旅行箱里只装了一件袖子上印有“中国”二字袖标的黑色羊毛军大衣、大衣保暖长靴、一套新购买的首饰、几件中国服饰，不过此次出行最必不可少的衣服就是她的中国空军军服。她将穿着这套军服参加每一场演讲活动，这套漂亮的军服让郑汉英更加英姿飒爽，郑汉英身着这套军装亮相来宣传中国抗战、争取海外援助总是能取得预期的戏剧效果。此次巡回募捐演讲，她会像上了发条一样紧张，因为她每到一地每天都安排有两三场演讲，不过，无论她去到哪里，都会受到热烈欢迎，享受贵宾式的待遇。听众的热情反过来又会激发郑汉英更昂扬的斗志。她对白人组织团体发表的演讲主流媒体通常会大肆报道，而对华人机构的演讲一般不会吸引主流媒体的注意，所以我们无从知晓郑汉英在华人团体中开展募捐演讲的具体情况。不过，认识郑汉英的加拿大华

侨无不为其的成就感到自豪，对她轻松融入白人社会深感钦佩。

1942年11月28日早上6点，郑汉英搭乘环加拿大航空公司（Trans-Canada Airlines）从温哥华飞往首都渥太华的航班，开始了她的旅程（章末注3）。出发前，她宣布，除了到访首都，还会抵达蒙特利尔、魁北克、哈利法克斯、多伦多以及其他东部城市。她还提到，她希望自己的足迹遍布马尼托巴（Manitoba）、萨斯喀彻温（Saskatchewan）、阿尔伯塔（Alberta）等草原诸省（Prairie Provinces）的各大城市。对于赴草原诸省的愿望，后来郑汉英提前实现了。在几小时的飞行途中，飞机飞越了洛基山脉，正准备前往阿尔伯塔省莱斯布里奇（Lethbridge）的凯尼恩机场（Kenyon Field）作15分钟的加油经停。但就在这时，天气突变，乌云压顶。飞机迫降在离莱斯布里奇约28空里的麦克隆军堡（Fort Macleod）。麦克隆机场是一个飞行训练基地（No. 7 SFTS），加拿大空军新兵就在这里驻扎。当空军联队指挥官布朗听说郑汉英不期而至，他急急忙忙前来接机，并将郑汉英领到基地军官食堂，请让她在那里休息，等待天气好转。郑汉英愉快地接受了布朗的盛情邀请，确实要感谢这位指挥官的果决，因为飞机最终在该地滞留了数小时。作为来自盟国

的空军军官，估计郑汉英在食堂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与基地那些新兵飞行员相比，郑汉英可是一位经过严格的飞行训练、有超过250飞行小时纪录的老兵了。

几个小时过去了，天气转晴，飞机再次升空，并按计划降落在附近的莱斯布里奇机场加油。当地新闻媒体早已

TRANS-CANADA AIR LINES TRANSCONTINENTAL SERVICE					
Miles	EASTBOUND Read Down	Time Zone	Trip No. 2 Daily	Trip No. 4 Daily	
0	LY VANCOUVER	PST	8:00AM	5:00PM	
469	At Lethbridge	MST	9:30AM	8:30PM	
	At Lethbridge	MST	9:50AM	8:50PM	
836	At Regina	MST	11:55AM	10:55PM	
	At Regina	MST	12:05PM	11:05PM	
1169	At WINNIPEG	CST	2:55PM	2:00AM	
	At WINNIPEG	CST	3:15PM	2:15AM	
1836	At SASKATOON	EST	7:35PM	6:35AM	
	At SASKATOON	EST	7:45PM	6:45AM	
2104	At North Bay	EST	9:25PM	
	At North Bay	EST	9:35PM	
2291	At TORONTO	EST	10:55PM	9:20AM	
2656	At NEW YORK	EST	1:30AM	12:35PM	
2291	At TORONTO	EST	11:15PM	9:35AM	
2519	At Ottawa	EST	12:45AM	11:05AM	
	At Ottawa	EST	12:50AM	11:10AM	
2614	At MONTREAL	EST	1:35AM	11:55AM	
	At MONTREAL	EST	1:45AM	
3058	At Moncton	AST	5:10AM	
	At Moncton	AST	5:20AM	
3176	At HALIFAX	AST	6:15AM	

郑汉英搭乘环加拿大航空公司（Trans-Canada Airlines）飞机由西至东作横贯加国大陆的飞行，此时间表列明了计划飞抵的城市。

获悉机上有一位重要人物，一家报纸的记者匆匆赶到机场进行采访。在飞机起飞前，郑汉英接受了这位记者的短暂采访。她展望说，战争结束后，随着航空运输新业务的开展，中国女性将在航空飞行事业上大有作为。此外，飞行器将成为连结各地人民的重要交通工具。

“这种迅捷的交通方式不仅有助于中国的发展，”她预言到，“而且也作为一种理解和友谊的纽带将各地人民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说完这番话，郑汉英一脸神采地向这位记者简单介绍了她的这次募捐巡回演讲。

“这是我的首次环加之行，”她直言不讳，“加拿大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国家，人民善良好客，我有宾至如归之感，一点儿也不觉得陌生。”

接下来的行程只会加深郑汉英的这一印象。她即将展开的募捐巡回演讲将在加拿大人民中引起巨大反响。

在离开温哥华约 18 小时后，已是十分疲惫的郑汉英才抵达首都渥太华，受到了中国驻加公使馆同仁的热烈欢迎。自 6 月份以来，公使馆在渥太华最漂亮的官邸格兰斯米尔（Glansmere）办公。这里曾是加拿大前首相罗伯特·波顿爵士（Sir Robert Borden）的住所，它坐落在已经结冰的丽都河（Rideau River）两岸，四周风景如画。郑汉英在这个几乎是田园风光之所休整了一天，第二天，她就投入了工作。她在渥太华的首场演讲安排在加拿大女子俱乐部渥太华分部（Ottawa Women's Canadian Club）的午餐会上。她对活动组织者表示感谢说：

“加拿大是 27 个同盟国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中国的国家，”她真诚地表达感谢说，“我们引以为傲。浩瀚的太平洋，不是阻挡两国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的天然屏障，而是将两个国家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纽带和桥梁。”（章末注 4）

午餐会上，郑汉英在贵宾席就座，与她同排就座的有第 12 任加拿大总督宾恩勋爵（Lord Byng）的夫人以及加拿大最高专员的夫

人。演讲结束后，加拿大皇家空军女子辅助军团空军中队军官维拉·沃克（Willa Walker）向她表示感谢。沃克当晚还陪同郑汉英赴洛克克里夫（Rockcliffe）机场的空军总部，与驻扎在第7号兵站的女子辅助军团的军官们进行了会谈。在军团食堂与那些军官们一起用餐过后，郑汉英又应军官们之请用英法两种语言给驻地的女飞行员作了一次演讲。演讲者与听众形成了鲜明对比，一边是济济一堂、身着加拿大空军服却没有机会飞上蓝天的加拿大女飞行员，一边是穿着别有中国空军飞行徽章军服、畅谈其飞行经历的中国空军军官。在首都渥太华的那个雪夜，郑汉英向那些女飞行员们讲述了她在香港远东飞行训练学校所接受的严格训练，回顾了她在战火纷飞的祖国进行驾机考察的经历。如果加拿大女飞行员将郑汉英的经历与自己处处受限制相比而感到羡慕嫉妒恨的话，那么她们也尽力克制着不表现出来。她们出神地聆听着郑汉英在英国皇家空军基地的飞行训练生活，共同感受着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争。而郑汉英也对加拿大皇家空军女子辅助军团给予了高度赞赏。

“你们能够进入加拿大武装部队知名的队伍之一，我对你们钦佩有加，”郑汉英这样说道，“为国家效力是一个非常崇高的理想，我知道你们在座的各位会以加拿大皇家空军之名为荣，不断前进。”

次日，在圣女贞德研究院（Institut de Jeanne d'Arc），郑汉英向战斗法国渥太华地区委员会（Ottawa Regional Committee of the Fighting French）发表演讲，她再一次向观众描述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不屈不挠的抗战精神。这一次，她完全用法语演说，算是一次暖身练习，因为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她将主要在法语区开展演讲。



Many notables gathered to see Lady Bowhill (centre), wife of Sir Frederick Bowhill, head of the R. A. F. Ferry Command, christen the "Princess Alice," first Catalina from the plant of Canadian Vickers. Sir Frederick can be seen to the left and behind Lady Bowhill. To the right are J. Edouard Labelle, Vickers' president, Flt. Lt. Hanyin Cheng of the Chinese Consulate and Ralph P. Bell, director of Aircraft Production, Ottawa.

1942年12月，郑汉英出席在蒙特利尔举行的首架加拿大产卡塔利娜两栖飞机下线仪式。照片刊登于《加拿大航空》（*Canadian Aviation*）杂志1943年1月号。

12月4日，郑汉英乘坐加拿大皇家空军的一架爱弗罗安森 Avro Anson Mk II 双发教练机离开渥太华洛克克里夫空军基地，飞往蒙特利尔郊外的圣胡伯特（Saint-Hubert）机场（章末注5）。她获邀出席一次特别的活动——在圣胡伯特的维克斯飞机公司（Vickers）工厂举行的加拿大产首架卡特利娜两栖机（Catalina Amphibian），被空军称为“坎索”（Canso）的水上飞机的下线仪式，包括郑汉英在内的海内外知名人士获邀出席飞机命名及试飞活动。郑汉英乘坐飞机来到基地，庆祝这架马力强劲的双发两栖机下线命名。此时的蒙特利尔寒风呼啸，气温降到了近十年的最低点，但是当郑汉英乘坐的飞机在大雪覆盖的跑道上滑行时，天空突然放晴，阳光明媚。飞机停稳后，郑汉英跳下机舱，与前来迎接的圣胡伯特第13所空军学校的指挥官斯科特上校亲切握手。

在此，郑汉英尊享贵宾礼遇。在她下飞机前，加拿大皇家空军女子辅助军团的一支仪仗队早已在寒风凛冽中笔直地矗立着，等待她的到来。郑汉英依旧穿着那套宽大的飞行服，在斯科特上校的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并不时停下来与队员亲切交谈，她气定神闲，架势十足，好像见惯了这种大场面。（章末注6）

当郑汉英还在城中逗留时，蒙特利尔中华妇女会（Montréal Chinese Women's Society）不失时机地邀请她向其会员发表演讲。加拿大皇家空军专门派了一辆专车和司机供郑汉英使用，她乘这部专车来到位于唐人街的蒙特利尔中华妇女会总部，鲜花和掌声一片，一条用中英两种文字书写的大幅欢迎标语悬挂在主席台前。妇女会的会员们将郑汉英领到主席台前就座，台上放



与英国维克斯（Vickers）飞机公司试飞员多宾（E. C. W. Dobbin）合影，郑汉英为参加两栖机下线仪式的驻加中国领事团唯一女代表。

置着英中两国国旗。她身后的墙上挂满了孙中山先生的肖像，还有不少军旗、党旗和彩旗。当郑汉英在色彩斑斓的背景墙前侃侃而谈的时候，听众们才愕然得知，原来这位来自祖国的亲善大使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她的飞行中尉军衔还是蒋介石本人亲授的。

第二天，郑汉英和加拿大皇家空军女子辅助军团空军中队军官维拉·沃克女士一同出席了新型“坎索”水上飞机下线命名仪式。加拿大皇家空军运输队的鲍希尔夫人（Lady Bowhill）主持了这一仪式，她打开一瓶香槟，喷洒在自己的军装上。维克斯飞机公司的机库里气氛一下子变得热烈起来，中国空军飞行中尉郑汉英的到场更让大家兴奋异常，要知道，她可是中国空军和驻加中国领事团出席此次活动的唯一女代表。她摆出姿势，愉快地接受媒体的拍照，与她合影的有航空业的巨头，此外还有新机试飞员，来自温哥华的著名飞行员多宾（E. C. W. Dobbin）。（章末注7）

置身于主要说法语的魁北克省，身处在同行们中间，郑汉英感到神清气爽，身心愉悦。通过与7人飞行俱乐部的好朋友、来自魁北克的阿尔玛·吉尔伯特的交往，郑汉英已经熟悉了魁北克的法语口音，她精通英法两国语言的这一优势让她成为各团体、俱乐部争相邀请莅临演讲的对象。在抵达蒙特利尔的两天后，她沿江而上，来到魁北克省首府魁北克城，进行其他的演讲活动。魁北克城旧城区古迹遍布，矗立的黑色加农炮，已是残垣断壁的古城墙，无不令郑汉英触景生情，想起祖国那些有古城墙的城市。魁北克城与她到访过的任何一个加拿大城市都不同，就连当地报纸上刊发的有关她的文章也用了与其他地方完全不同的称谓，称呼她为“Mlle. Hany-in Tcheng”（郑汉英小姐），这是她姓名的法语拼写，家里人都喜欢这么称呼她。

在魁北克城逗留时，郑汉英住在该城的地标芳堤娜城堡饭店（Chateau Frontenac）。青铜色的屋顶，配上红砖色的外墙，远远望去就好像是守护着圣罗伦斯河的中世纪城堡一般（9个月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加拿大总理麦肯奇以及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等盟国领袖将在此讨论诺曼底登陆计划，并召开联军会

议。)。郑汉英正是在魁北克这家最具代表性的饭店对加拿大女子俱乐部魁北克分部的会员发表演说。一如既往地，她穿上了中国空军军服，坐在主席台上，继续以“中国在前进”为题，熟练地用英法两种语言向听众讲述中国人民的抗战史，她诚挚的情感、论述的缜密，感染着在座的每一个人。聆听演讲的嘉宾有魁北克省省长尤金·菲塞特爵士（Sir Eugene Fiset）的夫人、未来的加拿大总督乔治斯·瓦尼埃（Georges Vanier）的夫人。演讲结束后，郑汉英与菲塞特夫人以及俱乐部的负责人合影留念，次日，一张题为“来自盟国的可爱使者”的照片出现在当地报纸上。当郑汉英与这些名流贵妇们相谈甚欢的时候，也许她会庆幸自己又花钱买了一些珠宝首饰吧。

结束了在魁北克城的行程，郑汉英匆匆赶回蒙特利尔，次日，她将作为演讲嘉宾，在蒙特利尔广告及销售主管俱乐部（Advertising and Sales Executives Club of Montréal）的午餐会上发表演说。该俱乐部早前从蒙特利尔中华妇女会那里借来了用中英两种文字书写的大幅欢迎标语，将之悬挂在主席台上。一身戎装的郑汉英坐在俱乐部主席斯坦纳德先生（W. C. Stannard）和加拿大皇家空军运输队的鲍希尔夫人的中间，鲍希尔夫人是她几天前在“艾丽丝公主号”（Princess Alice）两栖飞机下线命名仪式上认识的。郑汉英站起身，对在魁北克省受到的礼遇表示感谢：

“魁北克人民的魅力和热情好客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对此我深表感谢。”

接着，她用英法两种语言向听众表示，中国对加拿大在珍珠港事件后第一个对日宣战心怀感激。她满怀希望地说，在共同的敌人面前，这种战争情谊弥足珍贵，战后，这种友谊还将持续，而且对两国发展的积极影响不容置疑。

郑汉英的知名度滚雪球般迅速增大。突然间，她接到了另外一个邀请，这一次是在蒙特利尔的丽思卡尔顿酒店举行的晚宴上发表演讲。此次晚宴由国家社会同盟（League of Nations Society）主办，庆祝沃维克·齐普曼（Warwick Chipman）刚被加拿大政府任命为

智利的部长，由于郑汉英的外交官身份，宴会组织者特邀请她致辞。宴会上，郑汉英与蒙特利尔政界及教会的领导人同坐在主席台，她首先按照惯例对齐普曼先生的任命表示祝贺，当听众的注意力被调动起来时，她又情不自禁地谈到了中国的英勇抗战。她表示，正是那些倒下的士兵和老百姓的顽强抵抗，“才为成百上千万人创造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郑汉英坦承，她对同胞抗战到底的毅力和决心表示敬意，对他们精忠报国的拳拳之心无比骄傲和自豪。在宴会结束后的记者采访中，郑汉英解释了为什么她认为中国人民会最终赢得抗战的胜利。

“只要坚信中国将最终赢得胜利，中国人民就能忍受任何艰难困苦，”她这样宣告。“在某些地区，连生活基本物资都经常无法保障的情况下，中国人民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勇气和坚忍顽强旷世罕见，绝无仅有。”（章末注8）

le 23 décembre 1942.

Visite de Mlle Han Yin Cheng, Lieutenant dans le Corps d'Aviation Chinois.

Ft. Lt. Han Yin Cheng - Lieutenant dans le Corps d'Aviation Chinois.
 Lt. General
 T. D. Basin
 H. B. Basin

André Guin
 Versin
 V. Guin

J. D. Guin
 H. B. Guin

1942年12月23日，郑汉英参观蒙特利尔市政厅并在留言簿上留言。

12月23日晨，郑汉英在市政厅接受了市长阿德玛·莱诺（Adhemar Raynault）的亲切接见。莱诺市长视郑汉英为贵宾，给予了高规格的接待。两人用法语亲切交谈，一同出席会见的还有市议会议员、蒙特利尔中华妇女会的负责人以及青年贸易委员会的代表。莱诺市长像对待其他来访的尊贵客人一样，邀请郑汉英在市政厅的留言簿上签名，这一幕被记者拍下，照片出现在次日法文大报《新闻报》（La Presse）圣诞版的头版。总之，郑汉英在这个被称为“美丽省”（La Belle Province）的魁北克被媒体高度关注，如今，没有什么人不知道中国在艰苦抗战，亟需海外援助的了。

没有记录显示，这天以后直到当年年底的一个星期郑汉英都安排了哪些活动。不过，我们大可以认为她利用这一稍稍喘息的机会

飞往美国首都华盛顿，于姑姑、姑父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内共度圣诞节。而她的姑姑郑毓秀，这位被誉为华盛顿最受欢迎的中国大使馆女主人，肯定十分高兴亲人的到来。（章末注9）

1943年新年伊始，郑汉英回到渥太华，此时的首都因为荷兰王室添丁一事而十分闹腾。德国侵占荷兰后到加拿大避难的荷兰公主朱莉安娜（1948年9月登基，任荷兰女王）于1月19日，也就是郑汉英生日的早两天，生下了女儿玛格丽特。加拿大当时是英国的领地，在加拿大诞生者会给予英国国籍，但是荷兰并不承认双重国籍而且有“王位继承者限定要在荷兰领土上诞生”这样的法律，因此为了让玛格丽特公主不失去荷兰国籍和公主身份，加拿大议会特别通过特别法，让朱莉安娜等人的病房成为荷兰的法外治区，保护玛格丽特公主的权利。渥太华市民对荷兰王室开枝散叶一事津津乐道，对本国政府通过特别法以保护小公主的权利街头巷议个不停，不过，外交圈对此更是议论纷纷，他们关心的焦点是加拿大政府这样特事特办是否具备司法的严密性。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刘师舜也专门主持召开宴会，对荷兰王室的这一喜事表示祝贺。

这是首都不消停的一个月份。1943年1月28日，加拿大议会开幕，议员们齐聚渥太华。来自温哥华的记者玛格丽特·艾克尔（Margaret Ecker）也列席了会议，并在新闻报道中向读者介绍了会议的盛况。她特别提到，从众议院高高的新闻记者席望去，会场盛况尽收眼底，女议员们给会场增添了不少亮色，她们大多身着黑色衣服，似乎是有意借议院深红色的地毯烘托自己。当她环视全场，在一片深色素服的海洋中，外交使团席上的一抹亮红色突然映入她的眼帘。一年多前，艾克尔小姐曾获邀出席由7人飞行俱乐部在温哥华举办的欢迎郑汉英莅临该市的午餐会。当她一眼瞥见万墨丛中那一点红时，艾克尔马上意识到，那不是别人，正是“中国著名女飞行员”、中国空军飞行中尉郑汉英所着的军服。（章末注10）

郑汉英在众议院会议上给人的惊鸿一瞥乃有意为之，她是想借此提醒那些加拿大的政客们，谨记他们对远东盟国的责任和义务。果不其然，议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提到了中国。

“政府一直与那些与加拿大共同战斗的盟国保持密切的联系，”加拿大总督在开幕式上表示，“直接的外交交涉加强了加中两国之间的关系。”对总督在议会会议上提到中国，郑汉英深感欣慰和自豪。要知道，当她三年前初到这个国家时，加拿大人民对于中国的抗战既是陌生的，也是漠然的，但是经过她和同仁的不懈努力，加拿大终于成为中国的第一个西方盟国。在宣传中国抗日、争取海外援助的过程中，郑汉英是不卑不亢的，她既不会为了同胞在西方人面前摇尾乞怜，更不会将国人描绘成强大敌人面前的战败者。她四处奔走呼号，宣扬中国是一个满怀信心、物产富饶的国家，值得加拿大人民的尊重和支持。她的努力没有白费，她的游说终于有了回报。



在多伦多唐人街叹早茶。
刊登于《多伦多星报》(Toronto Daily Star)，1943年2月4日。

1943年2月3日，郑汉英再次踏上征程，赴多伦多开展新一轮的募捐演讲。郑汉英入住的多伦多久负盛名的豪华酒店爱德华国王酒店(King Edward Hotel)让她一扫旅途的劳顿，而多伦多人的热情好客更让她兴奋不已。(章末注11)抵达多伦多的这一天，恰逢中国农历新年，唐人街热闹非凡。而她那一身红色的空军制服此时更显得喜庆，预示着来年大吉大利，红红火火。

这一天，郑汉英走访了位于伊丽莎白街24号的加拿大援华基金会总部，与义工进行了亲切交谈，郑汉英的一举一动都被跟踪她的一位报社记者用镜头捕捉下来。在附近的一家中餐馆叹早茶时，郑汉英谈到了中国抗战的进展情况。她由衷地赞美宋美龄的爱民情怀。

“蒋夫人的心里装着她苦难的人民，”郑汉英动情地说。“每一位同胞的苦难都牵动着她的心。”

郑汉英呼吁多伦多人民敞开心胸，慷慨解囊，赈济她受苦受难的人民。

“所募集的捐款将汇给蒋夫人的基金会，”她承诺说，“然后她将这些钱用来救助难民、救护伤兵、赈济灾民、购买医药，总之有无数种用途。”（章末注12）

郑汉英还特别提到了抗日游击女英雄赵洪文国。赵洪文国，满族，夫姓赵，本名洪文国，辽宁省岫岩县哨子河乡红旗沟人，抗日英雄赵侗之母，人称“赵老太”，无党无派。抗日战争时期她屡挫屡战，参与组织创建了辽南“少年铁血军”、河北“国民抗日军”、河南“太行山光复军”以及“晋察冀游击纵队”，被誉为“游击队之母”、“民族之母”，民间称之为“双枪老太婆”（与共产党的“双枪老太婆”不是同一个人，只是名号相同），在海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1938年9月间，赵洪文国应邀赴广州、香港、南洋各地，从事抗日宣传和募捐活动，为抗日募集巨额经费和大批物资。在香港时，与宋庆龄、何香凝等妇女界名流组织火炬游行，宣传抗战，激发了海外华侨的抗日爱国热情，其场面壮观感人。当时旅居香港的郑汉英也有幸聆听了这位传奇老太的热血演讲。从那时起，郑汉英就把这位老人家视为杰出的女英雄，并利用一切机会和场合宣传这位有着顽强抗敌精神的女中典范。

在两个月的巡回演讲中，郑汉英学会了灵活处世，开始改变原来拘泥守旧的作派，更加轻松自如地面对新闻媒体。见多识广的她越来越习惯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而对于媒体提出的各种问题，她也不再外交辞令般的千篇一律，而是审时度势，灵活应变。也许劳碌奔波让她变得更多话了吧。她演讲的重点也由原来大谈伟大的“抗战事业”转到更人性化的内容上来，她会与听众分享她在国内的抗战经历，回忆在重庆躲避大轰炸时那些黑暗的日子，描述当年她乘坐那架震耳欲聋的轰炸机来加拿大时的情景。

她还谈到了自己对加拿大日益浓厚的感情。

“我想，”她凝视着眼前的一杯茶，肯定地说道，“我应该称之

为第二故乡。”

不过，尽管郑汉英这么说，但她并没有将自己对加拿大这个国家的情感袒露到暴露自己隐私的地步。是的，她在加拿大的土地上生下了她唯一的孩子，这种血脉亲情只会让她与加拿大这个“第二故乡”永远牵系在一起。也许她这么说是在暗示，战后她将在温哥华定居下来，也许她是在考虑养育孩子更多的责任。

离开多伦多前，郑汉英在多伦多莫尔顿机场公开亮相，在那里，她驾驶加拿大皇家空军的一架爱弗罗安森 Avro Anson II 型双发教练机进行了试飞。试飞结束后，一身飞行服、满面笑容的她与加拿大皇家空军的飞行员们合影留念。这是她最快乐的日子，只见她，略施粉黛，笑靥如花，那样优雅迷人。不过，由于连日劳碌奔波，黑眼圈已经开始出现在她那张漂亮的脸蛋上，还有就是，比起巡回演讲刚开始时，她更纤瘦了。面对还有两个月才能结束的演讲行程，她也坦承，“我一直在努力工作，现在我想我需要休息一下。”（章末注 13）



郑汉英驾驶加拿大皇家空军（RCAF）的爱弗罗（Avro）喷气式飞机在多伦多莫尔顿机场（Malton Airport）进行试飞。刊于《多伦多星报》（*Toronto Daily Star*），1943 年 2 月 4 日。

与此同时，在郑汉英的姑姑、驻美大使夫人、老朋友郑毓秀的陪同下，宋美龄开始了她历史性的访美之旅。1943 年 2 月 18 日，宋美龄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轰动一时。两天后，温哥华市长宣布，宋美龄夫人将应邀不日访问温市，温哥华华侨无不欢呼雀跃。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宋美龄终因身体原因取消了行程。郑汉英肯定也像其他华人一样深感失望，要知道，如果宋美龄此次成行，那么她姑姑也定会伴其左右了。不过，宋美龄此次美国之行无意将加拿大排除在外，她承诺，一待美国的行程结束，她将赴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作正式访问。

蒋夫人言而有信。1943 年 6 月 14



郑汉英的姑父、驻美大使魏道明（左一）和姑姑郑毓秀（右一）陪同前来美国访问的宋美龄，宋美龄身后是她的外甥孔令侃，摄于1943年。

日，宋美龄应加拿大总理邀请，乘火车自纽约赴渥太华作三日访问。6月15日，宋美龄抵达渥太华，当她迈下火车，脚蹬鱼口楔型鳄鱼皮鞋走上欢迎她的红地毯时，前来迎接的加拿大达官显贵无不为了她的“惊世之美”而震撼。来访前，宋美龄在加拿大已极负盛名，三天的访问更让这位中国第一夫人家喻户晓。宋美龄访加受到了元首级的接待。加拿大总督阿特隆勋爵（Lord Athlone）及夫人——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女、艾丽丝公主殿下，加拿大总理麦肯奇·金（Mackenzie King）等前来车站迎接。上千华侨挥舞着旗帜，热烈欢迎宋美龄的到来。郑汉英的姑姑郑毓秀以驻美大使夫人的身份陪同宋美龄访加，作为蒋夫人访加的随从之一，郑毓秀见证了宋美龄加拿大之行所受到的高规格礼遇。所有驻加中国代表，包括温哥华总领事馆的领事官员，全部前往渥太华，就加拿大形势向宋美龄汇报。鉴于郑汉英的外交官身份以及她与宋美龄、郑毓秀的工作和家庭关系，她与一众中国外交官赴首都参加这一历史性的会见本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但是没有记录表明她确有出席。

注释

1 魏道明夫妇从未到访温哥华。“Chinese Envoy to U. S. May Come Here,” *Vancouver Sun*, September 26, 1942.

2 “Chinese Flyer to Tour East,” *Daily Province*, November 25, 1942; “Chinese Woman Pilot Now Ambassador For Her Country,” *Daily Province*, September 26, 1942.

3 同上。这趟温哥华—渥太华的航班飞行时间为16小时—18小时，早晨6时起飞，次日12:35到达，票价220.4美元，外加15%的运输税。郑汉英乘坐的这趟航班可能是新款的洛克希德“北极星”Lockheed Lode-star 1808A型双发商用运输机。该航班经停莱斯布里奇（Lethbridge，阿尔伯塔省）、里贾纳（Regina，萨斯卡其旺省）、温尼伯（Winnipeg，曼尼托巴省）、卡普斯卡辛（Kapuskasing，安大略省）、诺斯贝（North Bay，安大略省）、多伦多（安大略省）等4省6市加油并搭载从经停点飞往目的地的乘客。当时，环加拿大航空公司（TCA）横跨东西两岸的航线开通仅几年时间。1939年4月1日，环加拿大航空公司开通温哥华至渥太华的航班，搭乘首航班机的首位女乘客是郑汉英的朋友、7人飞行俱乐部的伊丽莎白·弗拉赫蒂夫人。弗拉赫蒂夫人还是第一个购买该航班机票的乘客。首航班机为洛克希德14H2（CF-TCA）型十座双发运输机，该机最高时速为每小时210英里，最大飞行高度为17000英尺。飞机飞越洛基山时，乘客需要戴上氧气面罩。不过，弗拉赫蒂夫人乘坐的首航班机到达渥太华后因为大雪飞机延误，所有乘客不得不转乘火车前往下一站蒙特利尔。当郑汉英乘坐这趟航班开始她的环加募捐演讲之旅时，她先期只飞抵渥太华，之后到东部各市出席募捐演讲活动均乘坐加拿大皇家空军（RCAF）的军机前往。在温哥华杰里科军事基地（Jericho Station）向加拿大皇家空军官兵发表演说后，郑汉英即与加拿大皇家空军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加正式结盟更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关系。所以到后来，只要赶趟，郑汉英均可享受特权，乘坐加拿大皇家空军军机前往她要去的目的地。

4 “Chinese Girl Flier Impressive In Address before Ottawa Club,” *Ottawa Evening Citizen*, December 2, 1942.

5 该爱弗罗安森 Avro Anson 双发教练机的注册号为8401。

6 加拿大国家电影局 (National Film Board) 拍摄了郑汉英抵达圣胡伯特机场以及检阅仪仗队的情况。电影局还记录下了加拿大产首架卡塔利娜两栖机下线 and 命名仪式的盛况。这架水陆两栖机以加拿大总督夫人之名命名“艾丽丝公主号”(Princess Alice)。

7 郑汉英出席此次活动的照片刊登在《加拿大航空》(Canadian Aviation) 杂志 1943 年 1 月号以及 1942 年 12 月 5 日《多伦多星报》(Toronto Daily Star)。

8 “Only Woman in Chinese Air Force Visits Canada,” *Toronto Daily Star*, December 21, 1942.

9 郑汉英与姑姑、姑父共度了一个短暂的圣诞节。12 月 27 日，魏道明夫妇应邀飞往芝加哥，为该市的男女律师协会会员发表演说。

10 Margaret Ecker, “Fashion Spotlight on Hats as Parliament is Opened: Women Choose Black as Contrast to Rug,” *Globe and Mail*, January 29, 1943.

1945 年 5 月 7 日，德国法西斯在法国东北部城市兰斯 (Reims) 签署了投降和停战协定 (5 月 9 日，纳粹德国正式向盟军投降)，当时温哥华记者玛格丽特·艾克尔作为唯一的一位女性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艾克尔曾任《温哥华太阳报》(Vancouver Sun) 编辑，当时她以加拿大通讯社 (Canadian Press) 驻外记者的身份出席了签字仪式。据艾克尔报道说，纳粹德国签署投降书意义重大，它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欧洲战场的胜利，能够出席如此重大的活动，她“原来想都不敢想”。

11 “Pretty Chinese Girl Flier Working Hard for Victory,” *Toronto Daily Star*, February 5, 1943.

12 “Chinese Airwoman Tells of Country’s Crying Need,” *Toronto Daily Star*, February 4, 1943.

13 “Pretty Chinese Girl Flier Working Hard for Victory,” *Toronto Daily Star*, February 5, 1943.

飞天名媛

Sister of Han Ying

31. 如花凋零

宋美龄的加拿大之行本身更暴露了中国抗战所处的困境。宋夫人发表讲话说，在日本的全面封锁下，中国资金短缺，武器装备不足，粮食供应匮乏。她表示，西方世界不可能完全理解中国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了解中国抗战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由于战争连年不断，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更加困苦。随着缅甸于1942年初落入敌手，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所有来自海外的战略物资必须通过最困难、最危险的空中航线“驼峰航线”才能运到中国。

宋美龄短暂的加拿大之行收到了良好效果。为赈济同胞，加拿大援华基金会于1943年8月启动了一项特别活动——计划募集抗战捐款100万美元。为此，卑诗省还专门举办了一个启动仪式，领事官员及唐人街的头面人物出席了这一活动，在贵宾席就座的有司徒炳通的父母，不过没有证据表明郑汉英当时也在场。也许她是在有意回避司徒一家人，也许她只是不愿出席。

此次活动后不久，中国驻加使团再次出现重大人事变动。1943年8月中，温哥华总领事时昭瀛（1942年4月到任）调任南非约翰内斯堡总领事，温哥华总领事一职由来自渥太华公使馆的李超（音译）继任。

就在这一人事变动发生之时，郑汉英的健康状况开始困扰她。在国内时，她曾患过肺结核，一直未能痊愈，甚至在生下女儿后，女儿也一度被传染。肺结核，在中国称“肺癆”，是一种广泛传染的疾病，而且死亡率非常高，有“十癆九死”之说。有报道称，中

国高达70%的人口感染此病，特别是在难民聚集的城市，因瘧虫入侵、气血虚弱而致结核杆菌引起的这一慢性传染病十分猖獗。曾经感染此病的郑汉英来加拿大后由于工作劳碌，病情逐渐加剧。这一时断时续的慢性病很快全面爆发。她的两肺出现纤维硬化，这让她呼吸更加困难。病情发展到后来，连吃饭也难以下咽，这让本来就十分瘦弱的她愈发憔悴，尽管如此，有着顽强意志、一心想着祖国和人民的郑汉英不顾身体孱弱，继续四处奔波进行抗战宣传。

1943年8月26日，郑汉英应温哥华青年贸易委员会之邀为其会员发表演说。此时距她首次向该团体发表演说一年有余，而这一次，深受病痛折磨的她已不复往日的神采。尽管她出席了午餐会并在会上简短致辞，她解释因为喉炎无法长时间大声讲话，她表示希望日后还能有机会与贸易委员会的会员们交流。但是这个愿望再也无法实现。郑汉英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此时，郑汉英一定十分清楚自己的健康状况，但是，在她心里，祖国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温哥华总领事馆的办公台前，总是能见到她的身影，但是到了8月底时，极度虚弱的她已经无法再继续工作。9月6日，郑汉英出现急性呼吸衰竭，被立即送往温哥华的圣保罗总医院。（章末注1）对于郑汉英的病情，医院已是束手无策。当时，有效治疗肺结核的方法还处于试验阶段，而且就算能够应于用临床，郑汉英的结核病也是那种恶化极快的“百日瘧”，已经无药可治了。

入院的第二天，郑汉英自感时日无多，遂请来律师，口述遗嘱。即便在这一生死关头，郑汉英依然被坚定的信念支撑着。她没有什么积蓄，不过，她指示律师将她的所有个人财产，包括变卖衣物和珠宝首饰所得，全部捐献给在美乐村（Maillardville），温哥华市郊的一个法裔社区，经营儿童学校的修女们。（章末注2）

郑汉英口述的遗嘱要求把她所有的文件烧毁，只把她的飞行执照——代表着她最自豪的个人成就的文件——呈给中国空军。正是通过这一最后举动，郑汉英向祖国表达了支持抗战、与同胞同仇敌忾的意志和决心。郑汉英那不安分的灵魂，终于在远隔千山万水、

远离至爱亲朋的异国他乡得到了安息。1943年9月7日，郑汉英——中国空军之花——不幸凋零，死时年仅28岁。

在口述遗嘱中，郑汉英没有提及司徒炳通，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曾经的爱恋随风而逝，只留斯人独长嗟。但是，令人不解的是，遗嘱中也没有提到她的女儿。她没有给女儿留下任何遗物，而是把所有财产捐赠给了美乐村的修女。难道她给女儿留下了别的什么东西，还是她相信女儿在她父亲和祖父母那里定能得到很好的照顾和成长？郑汉英把这些问题的答案带进了坟墓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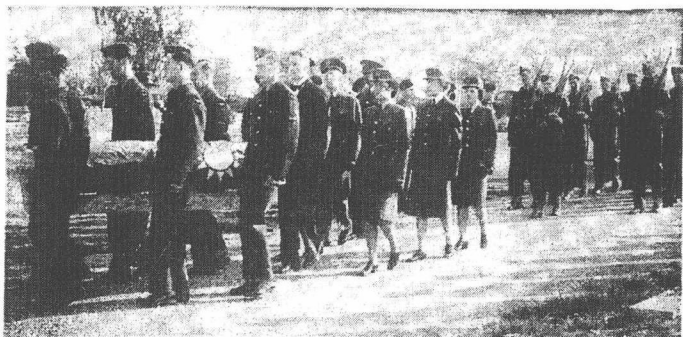
郑汉英在加拿大享有盛名，她去世的消息刊登在当地各报纸的头版。虽然旅居温哥华不足两年半，但是在这短暂的时间里，郑汉英广交朋友，向成千上万温哥华人发表演讲，宣传中国抗日，她的拳拳赤子之心赢得了许多人的尊重。就在周六清晨郑汉英辞世后不久，玫瑰圣母院（Holy Rosary Cathedral）举行了她的遗体告别仪式，大批民众、军方人士前往吊唁，凭吊这位有着不寻常人生经历、为祖国出尽最后一份力的中华女杰。

加拿大皇家空军也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在玫瑰圣母院的安息弥撒仪式结束后，郑汉英的灵柩覆盖着国民党党旗，由荣誉卫队抬着，通过几个街区，似乎在向这个她工作、生活过的城市作最后的告别。之后，卫兵将灵柩抬上一辆军用卡车，驶向伯纳比海景墓园安葬。下葬时，一个号手吹奏《最后的安息》，鸣枪队对空发射三响礼炮，向这位中国空军唯一的一位女飞行员致最后的敬意。（章末注3）

温哥华唐人街侨领黄宽先（音译）对郑汉英逝世发表正式讲话：“此地的华人为失去这样一位富有成就的女性而深感悲痛，”他

● 鄭漢英女士昨患病逝世
 鄭漢英女士·年廿九歲·乃中國空軍之唯一女飛行家·又為世界之第一名女子執有駐倫敦皇家航空俱樂部之國際航空文憑者·曾肄業於巴黎大學·領得法律博士畢業證·近日患病·直至昨星期二日一臥不起·聞者莫不惋惜·現定於星期六日上午八點鐘·在此間天主教堂·舉行殯葬儀式·查鄭女士自到雲埠後·向外宣傳頗竭力·其姑丈係駐美京中國大使魏道明云·

1943年9月10日，温哥华《大汉公报》（*Chinese Times*）刊登了郑汉英逝世的讣告。



In solemn procession, members of the Royal Canadian Air Force march behind the Chinese flag-draped casket of Flight-Lieut. Hanyin Cheng as the woman flyer was carried to her last resting place in Ocean View Burial Park, Saturday. Full military honors were accorded Flight-Lieut. Cheng, only woman pilot in the Chinese Air Force. While the coffin was lowered into the grave a bugler sounded "Last Post," and a firing party fired three volleys.

Photo by Western Air Command.

加拿大皇家空军为郑汉英飞行中尉举行隆重的葬礼，刊登于《温哥华先驱新闻报》（Vancouver News-Herald），1943年9月13日。

表示：“遗憾的是，她不能亲眼看到她为之努力奋斗的抗战的胜利。”（章末注4）

几天后，《温哥华太阳报》（Vancouver Sun）刊登了一篇郑汉英生前的记者朋友玛米·马洛尼（Mamie Maloney）撰写的悼文：

“是的，中国失去了一个好女儿，”她悲叹道，“而我们也失去了一位优雅迷人的朋友。但是，汉英未竟的事业将继续下去。她高举的火炬将传给前赴后继的中国女性，她们，像汉英一样，‘不知道何为放弃’，她们值得我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章末注5）

在郑汉英去世的三天后，加拿大援华基金会温哥华分会的组织者兴奋地向外界宣布，卑诗省为抗战募捐款额有可能比原定的10万美元的目标超出25%。实际上，全加拿大募集的



郑汉英之墓

救济善款已远远超出基金会的预定目标。抗战募捐活动的巨大成功一偿郑汉英的遗愿，也是对她生前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呕心沥血的最好回馈和纪念。

除此以外，没有关于郑汉英的其他东西可供后人缅怀。她在温哥华卫星城市伯纳比海景墓园的坟墓，没有墓碑，更无铭文。在这

个恍若置身美丽公园的墓地，绿草茵茵，一方方墓碑静卧草间。公墓位于一片山坡，站在坡顶环顾四周，近处的城市高楼，远处的雪山大海，尽收眼帘。郑汉英，这位为祖国和人民殚精竭虑的现代新女性，长眠于此。她一生用神秘将自己包裹，而这最后的悬念也被她带进了坟墓里。

注释

1 郑汉英入院后，由 Edward B. Gung 医生主治，他是当时在温哥华执业的三位华裔医生之一。

2 在草拟遗嘱之时，郑汉英已经记不起她希望接收其遗产的修女会的名字，后来才确定圣婴修女会（Les Soeurs de l'Enfant Jésus）为郑汉英的遗产受益人。遗嘱订立之时，郑汉英的律师托马斯·多姆（Thomas Dohm）和邻居路易斯·珀尔·福西斯夫人（Mrs. Louise Pearl Forsyth）两人在场见证。温哥华华裔善长李氏夫人（Peggy Lee）回忆称，郑汉英去世几周后，负责管理郑汉英遗产的一位英国人在唐人街走街串巷，变卖郑汉英的遗物，包括巴黎时装、做工精美的上海丝绸旗袍（其中可能有上海著名时装设计师张倩英设计的旗袍）等在内的不少质量上乘的物品，虽然不少人对那些时髦的衣服很感兴趣，但是大多数人发现那些衣服尺寸太小，她们根本穿不下。参见本书作者于2005年1月24日在温哥华对知情者李氏夫人的采访记录。

3 当时，加拿大皇家空军派出了由空军中尉威尔金森（A. B. Wilkinson）率领的荣誉卫队为郑汉英送行，荣誉卫队由59名官兵组成，其中士兵51名，军官8名，有3位女军官来自加拿大皇家空军女子辅助军团。“Air Force Funeral: RCAF to Honor Hanyin Cheng,” *Vancouver Sun*, September 10, 1943. 墓园位于温哥华卫星城市伯纳比。

4 “Chinese Woman Pilot Dies Here,” *Vancouver Daily Province*, September 9, 1943.

5 Mamie Maloney, “In One Ear,” *Vancouver Sun*, September 14, 1943.

32. 尾声

郑汉英去世后的几年，世界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终以同盟国的胜利而结束。郑汉英虽未能亲眼看到这一幕，但她也因此躲过一劫。抗战胜利后不久，中国再次陷入国共内战。在历经了辽沈、徐蚌（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1949年，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占领南京总统府，国民政府被迫离开南京退守台湾，但蒋介石仍怀抱梦想，一心想反攻大陆夺回江山。

1997年，郑汉英接受早期教育的地方——香港，终于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而郑汉英曾在那里学习飞行的启德机场——一个坐落于市中心、只有一条跑道、周围更是高密度楼房、空间非常狭小却曾是全球最繁忙的国际机场之一——于1998年被赤鱗角的新机场所取代。

在与郑汉英有关的主要人物中，蒋介石，中国国民党总裁，1975年4月因心脏病于台北去世。同年9月，身体状况欠佳、万念俱灰的宋美龄毅然决定去美国隐居。这位具有超凡魅力、激励了包括郑汉英在内的无数中国女性投身抗战救亡洪流之中的蒋夫人，晚年久居纽约，2003年10月24日在美逝世，享年106岁。宋美龄一生跨越三个世纪，见证了世界及近代中国的变迁，在权力、财富与魅力的交织中，她成为中国近代百年史上最具有争议与影响的女人。后人对其家族在抗战期间中饱私囊多有针砭，而对其争取国际援助支持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贡献以及她一生为提升妇女与儿童地位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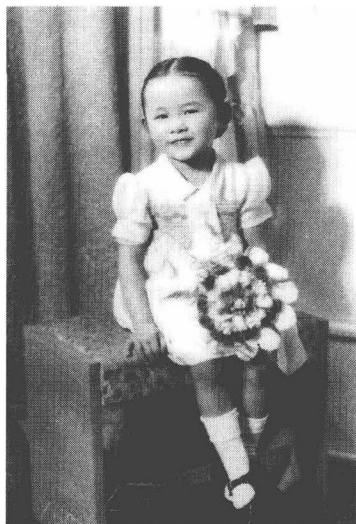
作的努力少有提及。

郑汉英的姑父魏道明，于抗战胜利后出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1947年4月，魏道明受命在台湾“二二八”事变后，接替陈仪，担任台湾省首任主席。魏道明主席就任1年零8个月后，于1948年12月被解职，由蒋介石的心腹陈诚将军接任台湾省主席。出于对国民党腐败政府的失望，加之对台湾前途渺茫，为求安身立命的魏道明夫妇遂赴素称“安乐世界”的南美巴西。夫妻俩在巴西约住了五六年，海外经营难有成就，他们深感南美非久居之地，于是复返美国，过着旅居生活。1954年，郑毓秀左臂被发现癌变症状，被迫切除左臂，这对一世英名的郑毓秀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客居他乡、倍感落寞的郑毓秀，晚年疾病缠身，度日如年，于1959年12月16日病逝于美国洛杉矶，终年68岁。根据郑毓秀的遗愿，死后她墓地的墓石朝向东方，以寄对祖国的思念之情。1954年，中华民国举行第二届总统选举，当时孔祥熙有意竞选副总统，魏道明受托从美国回到台湾窥察行情，但遭到蒋经国和陈诚强力否决，魏道明遂离台回美。1959年，魏出任台湾外交部顾问，1964年出任台湾“驻日大使”，两年后回台接替沈昌焕出任“外交部长”，担任部长期间，每年均亲往纽约联合国总部，为维护台湾代表权进行外交战。1971年辞去外交部长，转任台湾总统府资政。郑毓秀去世后，魏道明于1962年娶荣毅仁的妹妹荣辑芙女士为续弦。在郑毓秀逝世19年之后，魏道明于1978年因病不治，与世长辞，享年80岁。魏道明死后，按照他的遗嘱，遗体运往美国，合葬于郑毓秀墓穴，以遂生前心愿。

司徒炳通，郑汉英女儿的父亲，二战期间加入加拿大陆军，在郑汉英去世一个月后被派往欧洲战场。在部队开拔前，司徒炳通参加了一个告别舞会，舞会上认识了他未来的妻子，一位名叫帕特丽夏·卢（Patricia Lowe）的当地华人。司徒炳通被派往意大利作战，任瑟福斯高地团（Seaforth Highlanders）中尉，作战英勇，战友们称其“司徒兄”。不过，司徒炳通很快结束海外服役，回到加拿大，最终官至渥太华某部1团上尉。战争结束后，司徒炳通光荣退伍。

为庆祝加拿大华裔志愿兵对战争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司徒炳通与他人组织成立了加拿大唯一的加拿大华裔退伍老兵团体——海陆空退伍军人太平洋部队 280 分队（Pacific Unit 280 of the Army, Navy and Air Force Veterans）。（章末注 1）鉴于他对该团体的杰出贡献，1947 年 2 月 19 日，司徒炳通与其他 6 位来自卑诗省的华人加入加拿大国籍，成为该省获得加拿大公民权的首批华人。（章末注 2）

当司徒炳通在部队服役时，女儿贝弗利·安继续由他的父母照顾。战后，司徒炳通与帕特丽夏·卢结婚，夫妻俩搬到西区与父母同住。他们生了一个儿子，不过帕特丽夏·卢对郑汉英的女儿视如己出，疼爱有加。司徒炳通后来开了一家专门进口英国和日本高档布料的批发店，另外，他还开了一家高档男装定制店。1960 年，司徒炳通因心脏病去世，享年 45 岁，其遗体也葬在伯纳比的海景墓园。



郑汉英的女儿贝弗利·安·司徒（Beverly Ann Seto），5 岁左右。

父亲去世后，贝弗利·安继续与继母、祖父母一起生活。高中毕业后，她先后在多家当地企业做文职工作。1964 年，她入职祖父司徒旄曾经工作 40 载的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Canadian Pacific Airlines，简称 CPA）^①，成为这家航空运输企业的永久雇员。年届 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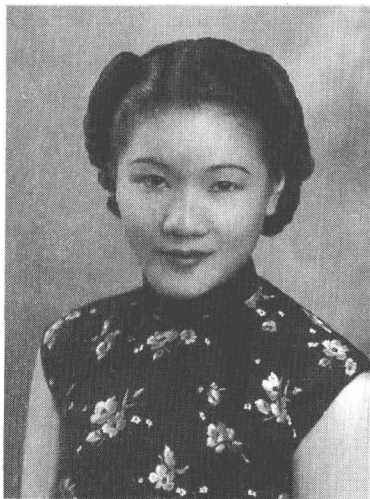
^① 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Canadian Pacific Airlines），是加拿大一间曾存在的航空公司。以温哥华国际机场为基地，于 1942 年到 1987 年间提供国内及国际航班服务，至 1987 年由加拿大国际航空（Canadian Airlines）并购。1940 年代初期，加拿大太平洋铁路于短时间内收购了 10 间荒野航空公司，在 1942 年收购西加拿大航空后，成立了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曾长时间与公营的环加拿大航空（即现在的加拿大航空）竞争。该公司当时是加拿大的海陆空交通集团 Canadian Pacific 的子公司，它在中国的名称是“昌兴轮船”，因此，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当时又被中国人称为“昌兴航空”。——译注

飞
天
名
媛
Sisters of Heaven

岁时，贝弗利·安移居蒙特利尔——她的生母曾于1942年风光造访的城市——在CPA蒙特利尔分公司担任行政秘书。1980年代末，贝弗利·安因多发性硬化症在蒙特利尔病逝。她终身未嫁。

如今，郑氏后人早已走出广东宝安西乡镇乐群村，在海内外开枝散叶。乐群村，郑氏家族的开创者郑姚缔造“郑氏王国”伊始的地方，那曾经恢弘气派的郑家大宅早已不再，惟留“绮云书室”在诉说着历史的沧桑。这座建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的私人书室，原是郑氏家族和乡邻后人的习艺之所，虽已历经120多年，但依然保存完好，辉煌依旧。与百米之遥的“郑氏祠堂”相比，无论从占地面积还是建筑规模都要气派不少，可见当年这个家族对教育的重视。大革命期间，绮云书室成为宝安县农民运动和共产党的革命活动中心。日占期间，日军大队将队部设于绮云书室，驻扎了数百日军，达数年之久。日军用家私当木柴来烧，大部分家私遭毁坏。1954年，乡公所为筹建乡粮所，向郑家借用绮云书室。将主殿两个天井加盖，西船厅、东书楼、围墙、大门及侧门被拆毁，所幸的是主殿及明楼部分得以保存，厨房仅剩部分基址，但两处水井得以保存。1966年，红卫兵等将“绮云书室”几个木刻大字及有关各种帝王将相的雕刻铲去。1989年，当地政府将其归还郑家。

绮云书室规模宏大，气势磅礴。整个建筑选材讲究，构思精巧。室内木雕、石雕、砖雕工艺精湛，图案精美，均代表了当时当地建筑艺术的顶尖水平。正是在这里，不仅留下了深圳宝安县第二区农民运动和革命活动的足迹，还培养出了有着中国诸多“第一”美誉、足以名垂青史的女中豪杰郑毓秀——中国第一位女博士、第一个女律师、第一位地方法院女性院长、第一位非官方



郑汉英于1937年4月12日获颁英国皇家航空俱乐部（Royal Aero Club）飞行执照照片。

奉派法国的女性外交特使、第一位女性立法委员……鉴于绮云书室具有较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1998年7月15日被深圳市政府公布为深圳市文物保护单位，并已进行了系统的修缮。

注释

1 司徒炳通报名参加了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加拿大军官训练团 (Canadian Officers' Training Corps, 简称 COTC)。COTC 的职责是，在大学生中培养预备役军官。1942年4月，司徒炳通提出组建一支派往太平洋战场的加拿大华裔军团，并为此奔走呼号，但是该提议因未获政府支持而最终作罢。1943年10月，也就是郑汉英去世后的一个月，司徒炳通中尉被派往驻意大利的温哥华瑟福斯高地团 (Seaforth Highlanders) 作战。不过，刚到高地团的时候，他的上司就告诫他，他手下的兵可能不愿意听从一个中国人的指挥，如果他想对战争更有贡献，他应该想方设法进入太平洋司令部 (Pacific Command)。结束海外服役后，司徒炳通回到温哥华，进入 S-20 日本语学校进修，1945年从该校毕业。后被派往渥太华，任某部 1 团上尉，负责日本无线电讯息的翻译工作。Marjorie Wong, *The Dragon and the Maple Leaf: Chinese Canadians in World War II* (London, ON: Pirie Pub, 1994), 72, 73, 91, 106, 107fn, 110. 根据本书作者于 2006 年 5 月 2 日在温哥华对司徒炳通之子司徒雷所作的采访记录。

2 Larry Wong, "February 19, 1947: First Chinese Become Canadian Citizens," *The Beaver*, February-March 2003, 49.

1. 颜雅清参与国际联盟 (League of Nations) 会议情况, 如以下会议纪要所述

国联大会第 16 次常会第一委员会 (宪法法律问题) 第五次会议纪要

大会时间: 1935 年 9 月 9 日至 10 月 11 日

分会时间: 1935 年 9 月 19 日

地点: 日内瓦

主席: 林堡 (M. Limburg, 荷兰)

议题: 讨论 1933 年 12 月 26 日美洲国家在乌拉圭首都蒙特维的亚 (Montevideo) 召开的有关审议和通过由起草委员会提交的《草案决议》会议之妇女的国民性问题专题会议所总结的妇女的国民性问题。

中国与代表颜雅清女士表示, 中国代表团完全赞同爱尔兰代表在之前的会议上提出的观点。作为来自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也最守旧的国家之一的与会代表, 颜女士向其他代表阐述了中国妇女地位的现状。

1927 年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承认并且宣布了有关妇女权利平等性的原则问题, 并且在是年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通过了一项就妇女权利进行立法的指导性原则的决议。这些保障妇女平等权利的指导性原则包括: 性别平等、妇女拥有平等继承权、妇女享有婚姻自主权、男女同工同酬。

根据上述决议所规定的这些原则, 国民政府立法院在过去几年颁布了有关法律, 同时修订了民法、刑法中的有关内容。1930 年颁布实施的中华

民国《民法》，对女性的家庭财产权作了重大改变，规定在享有和处置财产问题上男女拥有平等自由权。根据1928年最高法院的一项裁决，立法机关稍后对女性的财产继承权作了新的规定，确定了继承家庭财产时的男女平权，无论家中有无子嗣，女儿（无论婚否）都是法定的财产继承人。1931年6月1日公布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性别、种族、宗教、社会地位分别，全体公民享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

保障妇女平等权利，提高妇女地位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广大中国妇女在其社会地位发生欣喜转变的同时也及时应变，积极拥抱社会发展所赋予她们的新机会、新角色。许多妇女成为医药、法律、银行、教育等领域的职业女性，并且拥有较高的政治社会地位。国民政府立法院也有部分女性成员，法院亦有女法官。

以上就是中国妇女的法律地位现状，因为中国男性意识到，尽管男女有天生的性别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并不意味着低等或不平等。女性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以母亲的身份寻求保护，其他仅适用于妇女的出于人道以及保障权益的法律，只会让她们感觉到，她们受制于那些条条框框，而那些条条框框对她们可能的工作是不利的。人道主义法只有在这些法律适用所有人类时才具有保护性，才有所助益，也就是说，这些法律如果只是假借保护之名，却行偏袒某一性别并招致不公平竞争之实，那么这些所谓的人道主义法就丧失了应有的作用。

西方世界惊讶于中国妇女如今享有完整的法律平等权，不过，让当代中国更加诧异的是，在许多标榜自由民主的欧美国家，那里的妇女法律地位低下，或根本没有法律地位。尽管如此，颜雅清女士认为，男女平等的思想正在全世界范围内真正觉醒。诚然，有些国家在给予妇女同等权利方面不情不愿，有些国家甚至试图加以反对和阻挠，究其原因，他们要么惧怕女性参与竞争，要么就是传统的保守主义在作祟。颜深信，这种情形不会持久，因为妇女终将获得她们作为一个人、作为其子女监护人所应有的权利。

欧美国家应该认识到，主动自愿地将赋予男性的法律权利同样也给予女性，远比逼迫所有的妇女成为女权主义者、迫使其从男性那里夺取平等权更可取，也更亲切得多。世界不乏斗士，而妇女也许就是有效的和平缔造者。有了公平的机会，构成世界一半人口的妇女就有可能帮助改进当前

的态势，帮助达成国联确立的和平与集体安全的目标。

颜雅清女士代表中国代表团对爱尔兰代表团提交的草案决议表示支持，认为妇女地位问题应交由国联讨论和研究。如国联根据1933年签定的《蒙特维的亚国家权利义务公约》而开展任何国际行动，中国将一如既往地全力支持。颜相信，此次国联大会不仅让成员国更多地关注妇女权利问题，而且还会敦促与会国尽快达成一项确保妇女法律地位的两性平权公约。

摘自：

国际联盟国联大会第16次常会记录之《第一委员会会议纪要》，增刊第139期33-34页（1935年，日内瓦）。

League of Nations, Records of the Sixteenth Ordinary Session of the Assembly, *Minutes of the First Committee*, Special Supplement No. 139 (Geneva, 1935), 33-34.

国联大会第18次常会第五委员会 （人道主义与一般性问题）第四次会议纪要

大会时间：1937年9月13日至10月6日

分会时间：1937年9月18日

地点：日内瓦

主席：阿庞伊伯爵夫人（Countess Apponyi，匈牙利）

主讲人：颜雅清

议题：社会问题：关于在远东成立中央局的提案；讨论任命小组委员会名单

颜雅清女士希望代表中国代表团签署爪哇万隆会议上所提出的建议案。1937年2月中上旬，“东方国家中央政府关于打击贩卖妇女儿童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西部城市万隆举行，会议颇有成效，代表们提出了不少中肯的建议，其中一条就是，立即在远东成立一个中央局，监控妇女儿童非法买卖等性奴役问题。根据1932年调查委员会所作的一份报告，中国人口贩卖的受害者大多数是妇女儿童。一方面，中国有关当局之间的打击活动缺乏统筹协调，而另一方面，西方列强在华租界地以及公共租界上

盛行的卖淫活动虽有相关当局加以遏制，但依然形势严峻，这也使得中国政府打击非法交易、买卖妇女儿童的行动变得愈加困难，愈加复杂化。如果国联在华成立一个专门的中央局，定期发布有关信息，加强各国之间的联系与合作，那么上述困难和问题很大程度上便会迎刃而解。一旦中央局正式运作，上次会议所讨论的信息简报也有望以中文印发。

中国代表团认为，如果万隆会议上提出的其他建议将付诸实施，那么成立中央局就势在必行。这本身也是万隆会议的观点。社会问题顾问委员会对于这一提议表示赞同，颜女士认为，第五委员会也应就此达成共识。

关于中央局的设置地点，出席万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以及国联顾问委员会的中方代表一致认为上海乃最佳选择。在上海设立中央局，将大大有利于加强中国当局与租界地的西方列强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另外，从预算的角度看，上海也是不二之选。不过，中国代表团还是考虑了其他城市作为备选，至于最终选定在哪个城市，也取决于技术上的考虑。中国代表团认为，委员会当前面临的一个非常急切的任务就是，就在华建立中央局一事达成决议，并及时提请国联大会审议，以便万隆会议上提出的这一建议案能够尽快付诸实施。

摘自：

国际联盟国联大会第18次常会记录之《第五委员会会议纪要》第23页（1937年，日内瓦）。

League of Nations, Records of the Eighteenth Ordinary Session of the Assembly, *Minutes of the Fifth Committee*, (Geneva, 1937), 23.

国联大会第18次常会第五委员会 (人道主义与一般性问题) 第八次会议纪要

大会时间：1937年9月13日至10月6日

分会时间：1937年9月25日

地点：日内瓦

主席：阿庞伊伯爵夫人 (Countess Apponyi, 匈牙利)

议题：社会问题：关于在远东成立中央局的提案；讨论并临时通过小

组委员会报告

颜雅清女士表示，中国对成立国联远东局这一提议一直持支持态度。不过，出席万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认识到，这一机构应该置于国联机器的指导下。颜女士表示，出席万隆会议的其他国家的代表当时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中国对成立一个国际局的新提案尚不知情，颜认为，这其中必须要有中国的参与。

摘自：

国际联盟国联大会第 18 次常会记录之《第五委员会会议纪要》第 49 页（1937 年，日内瓦）。

League of Nations, Records of the Eighteenth Ordinary Session of the Assembly, *Minutes of the Fifth Committee*, (Geneva, 1937), 49.

2. 李旦旦（李霞卿）参演的民新公司电影

《玉洁冰清》，1926年，黑白默片，导演卜万苍

《和平之神》，1926年，黑白默片，导演侯曜

《海角诗人》，1927年，黑白默片，导演侯曜

《天涯歌女》，1927年，黑白默片，导演卜万苍

《西厢记》，1927年，黑白默片，导演兼编剧侯曜

《五女复仇》，1928年，黑白默片，导演高西屏

《木兰从军》，1928年，黑白默片，导演侯曜、高西屏

《再世姻缘》，1928年，黑白默片，导演高西屏

飞天名媛

Memories for Sisters of Heaven

大事年表

颜雅清（1906—1970）

- 1906 出生于上海江湾区，父亲颜福庆，母亲曹秀英。
- 1910 父亲从耶鲁大学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出任湖南长沙雅礼医院外科医师，全家迁居长沙。
- 1916 父亲于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进修，颜雅清入读纽约州私立贵族女子寄宿学校——拉伊学校（Rye Seminary）。
- 1917 就读上海中西女中。
- 1921 父亲赴哈佛医学院进修眼科，颜雅清随父母赴美。
- 1922 被全美最大、最负盛名的私立女子文科院校——史密斯女子学院（Smith College）——录取，进入1926届文化交流生班学习。
- 1924 离开史密斯女子学院，随父母回国。
- 1925 毕业于长沙雅礼大学，获学士学位。
- 1927 与陈炳章结婚，陈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的英文秘书。
- 1928 生下长子陈国伟；
加入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YWCA）、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全国儿童福利会等女界组织。
- 1932 女儿陈国凤出生。
- 1935 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女主人的身份陪同伯父、驻苏大使颜惠



庆赴莫斯科；

出席国联大会第 16 次常会并在国联第一委员会分组会议上就妇女地位问题发表首次公开讲话。

1936 与丈夫陈炳章离婚，回到上海；

在南京国民政府谋得一职。

1937 受南京国民政府派遣，任职于国联中国代表团某专家顾问团，负责调查非法贩卖妇女儿童问题；

出席国联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西部城市万隆召开的“东方国家中央政府关于打击贩卖妇女儿童会议”；

出席英国国王乔治六世在伦敦举行的加冕礼；

在上海，帮助李霞卿筹建女子飞行俱乐部；

在欧洲，就妇女儿童福利问题开展调研；

在罗马学习飞行并获单飞驾照；

驻华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

出席在日内瓦举行的国联大会第 18 次常会，讨论万隆会议后形成的一份建议案；

谴责日本军国主义暴行，呼吁国联制裁日本侵华；

上海沦陷；

赴纽约就美国妇女儿童福利状况进行学习和调研。

1938 开始在纽约罗斯福机场学习飞行，同年毕业；

旅居首都华盛顿和纽约市，投身各种公开演讲活动；

父亲颜福庆出任武汉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

出任各种救济团体及社会组织干事；

与李霞卿一道筹划环美抗战募捐飞行。

1939 驾驶波特菲尔德单翼机开始为期 3 个月的美国东部飞行之旅；

在阿拉巴马州普拉特维发生飞行事故，被送院救治；

改乘汽车继续在美国各地开展募捐演讲活动；

参与美国医药援华会（ABMAC）组织的各种慈善活动，参与“一碗饭运动”；

- 出席在弗吉尼亚海滨市（Virginia Beach）举行的第六届太平洋国交讨论会；
前夫陈炳章再婚。
- 1940 回到香港，其家人于早前从国内逃难至此。
- 1941 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于次日对日宣战，中美两国成为盟友；
香港沦陷，颜雅清困居港岛。
- 1942 被关进集中营，数月后，抓住机会逃往内地，后随宋美龄访美；
出席在加拿大魁北克蒙特朗布朗（Mont Tremblant）召开的第八届太平洋国交讨论会。
- 1943 询问飞行执照续办事宜，不过终未办理；
继续在美进行抗战募捐。
- 1944 为巴哈伊教人类一家的基本信条所感召而入教；
出席史称“布雷顿森林会议”（Bretton Woods Conference）的国际货币金融会议；
以中国官方代表团技术顾问的身份列席于敦巴顿橡树园（Dumbarton Oaks）召开的商讨联合国创立的美、英、苏、中四国会议。
- 1945 作为中方技术顾问列席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制宪会议；
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与联合国的创建。
- 1946 出任联合国公共信息部联络官；
代表联合国在全美各地组织讲座、发表演说，宣扬联合国的作用和职能；
积极推广巴哈伊思想和教义，热心宣扬世界新秩序。
- 1947 协助罗斯福总统的遗孀埃莉诺·罗斯福起草《世界人权宣言》。
- 1948 巴哈伊国际社团被联合国接纳为常驻国际非政府组织；
与来自新西兰惠灵顿的学者、联合国雇员约翰·吉福德·梅尔结婚；

儿子陈国伟与女儿陈国凤从中国来到纽约学习和生活。

1949 中国共产党执政，新中国成立。

1950 伯父颜惠庆病逝于上海。

1951 申请人读纽约社工学院（New York School of Social Work），
因超龄被拒；

担任巴哈伊联合国委员会观察员；

丈夫约翰因涉嫌非美活动被联邦调查局调查。

1954 颜雅清夫妇在康涅狄格州的南诺沃克安家。

1955 在费尔菲尔德州立医院（Fairfield State Hospital）做义工，任
治疗师；

申请就读哥伦比亚大学内外科医师学院（College of Surgeons
and Physicians of Columbia University）某高级课程班，再次因
年龄问题被拒；

游说修订《联合国宪章》；

颜雅清夫妇在新西兰北岛的马胡兰基港（Mahurangi Harbor）
购下一处占地不小的房产。

1956 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学历教育，主修图书馆学。

1958 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就职于纽约公共图书馆布鲁克林区分
馆。

1959 与约翰·梅尔离婚。

1970 3月18日，因动脉硬化闭塞症而引起的心肌梗塞辞世于纽
约。

李霞卿（1912—1998）

1912 4月16日出生于香港，小名“旦旦”，其家族成员多为革命
者；

随父母赴法国，父亲李应生在索邦大学（巴黎大学的前身）
求学。

1916 一家人从法国回到广东；

母亲因肺结核去世；

- 父亲再婚，旦旦与祖母徐慕兰在香港生活。
- 1918 在港接受早期教育，入读圣斯蒂芬教会学校。
- 1922 父亲李应生在上海经营珠宝生意，与“大耳杜”杜月笙过从甚密；
革命的老祖母徐慕兰病逝于上海；
旦旦入读上海最著名的贵族女校——上海中西女中（Mc-Tyeire School）。
- 1925 李应生与黎民伟共同创办上海民新电影公司。
- 1926 旦旦辍学成为民新电影公司影星；
出演《玉洁冰清》、《和平之神》两部影片；
在《海角诗人》中担纲女一号。
- 1927 主演《天涯歌女》；
在《西厢记》中扮演红娘。
- 1928 出演《五女复仇》；
主演《木兰从军》；
出演《再世姻缘》；
听从父命息影，赴英国深造；
此后改回原名“李霞卿”。
- 1929 与国联秘书郑白峰结婚。
- 1931 游历苏、法、德、意、瑞士等欧洲诸国；
生下儿子郑柏士；
“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入侵中国东北。
- 1932 回国探亲；
返回日内瓦，生下女儿郑木兰。
- 1933 进入日内瓦科因特林飞行学校（Cointrin-Ecole d'Aviation）系统学习飞行。
- 1934 获得瑞士航空俱乐部（Aéro-Club de Suisse）颁发的 Brevet I 级飞行执照，成为世界上在日内瓦拿到飞行执照的第一位女性。
- 1935 获得瑞士航空俱乐部颁发的 Brevet II 级飞行执照；

赴美深造，丈夫和孩子回到上海；
在加州奥克兰的波音航空学校（Boeing School of Aeronautics）
深造；
在一次特技飞行训练中掉出座舱，实施紧急跳伞坠入旧金山
湾；
因跳伞成功自救，成为“毛虫俱乐部”（Caterpillar Club）首
位华人女性成员；
成为波音航空学校毕业的首位女学员；
学成归国。

- 1936 定居上海，参与中国航空协会的工作；
获国民政府颁发的飞行执照，获准驾驶政府飞机飞行；
担任中国飞行社飞行教练，为飞行社唯一的女教练；
在上海进行花式飞行表演，成为在中国蓝天上进行飞行表演
的首位女性；
与颜雅清共同筹办女子飞行俱乐部。
- 1937 驾驶政府的飞机赴全国各地机场进行考察；
两次驾机在国内作长途飞行，为撰写《改革中国航空的建
议》一书收集第一手资料；
作为副机师驾驶欧亚航空公司的容克斯三引擎飞机；
为西南航空公司作志愿运输飞行；
创造国内女子远距离飞行纪录；
获得港英政府颁发的商务飞行执照；
抗战爆发；
淞沪抗战爆发，李霞卿负责红十字会某急救站的组织工作，
她不时慷慨解囊，资助急救站的运作；
上海沦陷，李霞卿因为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单而避难香港。
- 1938 筹划环美募捐飞行，赈济伤兵难民；
经常乘火车往返粤港两地，参与抗战救济，协助安置难民；
中国航空公司“桂林号”飞机被日本战斗机击落，十余名平
民乘客被射杀；



李霞卿乘泛美航空公司的水上飞机“中国飞剪号”赴美进行抗战宣传；

李霞卿用自己的珠宝首饰作抵押，以确保环美飞行之旅无虞。

- 1939 在从匹兹堡飞往纽约的途中，因大雾迷失3个小时；
驾驶史汀生 SR-9B “新中国精神号”轻型单翼机开始环美募捐飞行之旅；
出演好莱坞影片《歧路》，与著名影星多萝西·拉莫尔（Dorothy Lamour）同场竞艳；
闻讯颜雅清在阿拉巴马州发生飞行事故；
因机械故障，原座机在芝加哥改换成史汀生竞速 SR-5E 轻型单翼机；
胜利返航，环美募捐飞行之旅圆满结束，此次长途飞行近万英里，飞抵约40个城市；
出席在俄亥俄州克里夫兰举行的全美最著名的航空展——国家航空赛（National Air Races）；
与颜雅清一道出席纽约市的一碗饭筹款活动。
- 1940 驾驶比奇 C17R 5座双翼机“中国之星”飞往加勒比海、中南美洲；
南美安全飞行达18000英里；
出席在好莱坞传奇巨星玛丽·碧克馥（Mary Pickford）的豪宅举行的赈济中国难童的慈善活动；
与美国著名女飞行员鲁丝·尼克斯（Ruth Nichols）一道，共同推进空中医疗救护服务运动。
- 1941 积极筹款，帮助陷入困境的“空中医疗救护队”摆脱危机；
帮助美国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挑选旗袍，作为送给蒋夫人的礼物；
加盟美国援华联合会（UCR）；
应加拿大红十字会的邀请，赴加进行为期4天的募捐飞行演讲；

驾驶美国援华联合会的埃隆卡 Superchief 65 LB 轻型飞机赴美国东部的俄亥俄州、纽约州、密歇根州开展募捐活动；

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

1942 与好莱坞华人女影星黄柳霜一道，参加在新奥尔良举行的红十字会募捐活动；

马不停蹄地参加美国援华联合会为之安排的各种演讲和公开活动；

与好莱坞众多影星一道，参加在纽约时代广场举行的一次集会活动；接受美国多家电台采访，登上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电视节目，宣传中国抗日。

1943 出席各种公众活动；

李霞卿的卡通人物形象上了泡泡糖纸和漫画书；

宋美龄历史性的访美之旅；

秋季时，李霞卿对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及纽约州作为期一个月的慈善飞行。

1944 搭乘泛美航空公司航班赴南美、加勒比海进行抗战募捐；

第二次南美行由原定的三四个月延长至 8 个月；

南美募捐之行大获成功，返回美国；

中国爆发恶性通货膨胀，李霞卿的辛勤筹款付诸东流；

国内媒体称李霞卿赴南美宣传抗日飞机失事香消玉殒实为误传，飞机失事遇难者实为美国妇女飞行队队员、美籍华人女飞行员李月英。

1945 二战结束。

1946 向美国空军航空运输司令部（USAAF Transport Command）提出回国优先通关申请；

以“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为名”获准搭乘飞剪号水上飞机回国；

赴港定居，过上退休生活。

1950 获得香港民航处颁发的私人飞行执照；

在接下来的十年时间里，出于兴趣娱乐继续在东南亚一带飞

行。

- 1963 获得港英政府颁发的特殊目的飞行员驾驶执照。
- 1966 旅居美国，申请美国飞行执照；
根据美国联邦航空局（FAA）的规定，重修飞行课程并获颁美国飞行执照。
- 1971 父亲李应生辞世于香港；
李霞卿和丈夫李颐祥定居美国。
- 1993 前夫郑白峰在美国去世。
- 1997 作为贵宾获香港特区政府邀请出席香港回归典礼。
- 1998 1月24日，李霞卿因急性肺炎在加州奥克兰逝世，享年85岁。

郑汉英（1915—1943）

- 1915 1月17日，生于广东宝安；
民国女杰、姑姑郑毓秀是她的启蒙老师。
- 1920年代 在香港读书。
- 1933 赴法留学，在索邦大学（巴黎大学前身）攻读法学；
在英国攻读课程，进修英语。
- 1936 从索邦大学毕业，获法学博士学位；
学成归国，探访在上海的父亲及姑姑郑毓秀；
赴港学习飞行。
- 1937 成为在香港远东飞行训练学校学习飞行的第一位中国女子；
同在远东飞行训练学校学习的哥哥郑云作了一次“历险飞行”；
日本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
在重庆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任职。
- 1938 调往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驻香港办事处工作；
接受蒋委员长授衔——飞行中尉，成为中国空军第一位女官；
获得驻伦敦皇家航空俱乐部颁发的国际飞行执照；

出席宋美龄在庐山召开的各界知名妇女谈话会；
黄河决口后，参与“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简称“国水委”）的救灾工作；

参与红十字会组织的抗灾赈济工作。

1939 获得港英政府颁发的飞行执照；

与来自温哥华的留学生司徒炳通相识相恋。

1940 发现怀上了司徒炳通的孩子；

乘坐轰炸机飞赴加拿大，就孩子一事与司徒炳通对质；
因乘坐轰炸机飞越太平洋而成为远航俱乐部的首位华人女性会员；

成为第一位被派到加拿大任公职的中国女子；

生下女儿贝弗利·安·司徒（Beverley Ann）。

1941 任中国驻温哥华领事馆专员；

加入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航空俱乐部、加拿大红十字会、法语联盟等组织；

经常从温哥华机场的吉尔伯特航空服务公司租借埃隆卡 LC（CF-BAT）轻型单翼机用来练习飞行；

加入女飞行员俱乐部——7人飞行俱乐部（Flying Seven）；

帮助组建中国红十字会温哥华分会；

对加拿大女子俱乐部两千名成员发表首次公开演讲；

用法语向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的法裔学生和法语联盟的成员发表演讲。

1942 赴卑诗省维多利亚市，对加拿大女子俱乐部维多利亚分部的成员发表演讲；

英国《飞行》（Flight）杂志刊登了郑汉英的事迹和成就；

对加拿大妇女委员会及温哥华妇女委员会成员发表有关民主权利的演讲；

在法国国庆日，郑汉英在“自由法国”（Free French）举办的一个庆祝活动中发表精彩演说；

成为获邀向温哥华青年贸易委员会会员发表演说的首位女

性；

伯父魏道明出任驻美大使；

向温哥华女子公民教育学校学员宣传中国抗日；

向大学女子俱乐部成员宣讲妇女在战后重建中的作用；

乘坐环加拿大航空公司（TCA）航班开始为期4个月的环加飞行演讲；

在渥太华向各种妇女团体、自由法国、加拿大皇家空军女子辅助军团等发表演讲；

出席在蒙特利尔郊外的圣胡伯特举行的首架加拿大产卡塔利娜两栖机下线仪式；

在魁北克城用英法两种语言向有关机构、团体发表演讲；

在蒙特利尔向各团体发表演讲；

受蒙特利尔市长亲切接见，在市政厅的留言簿上签名。

1943 身着中国空军军服，出席在渥太华召开的加拿大议会开幕式；

赴多伦多开展新一轮的抗战募捐演讲；

返回温哥华；

宋美龄访问渥太华，随行人员包括郑汉英的姑姑郑毓秀；

哥哥郑云在一次坠机事故中丧生；

郑汉英以健康为由拒绝了温哥华青年贸易委员会请她为其会员再次发表演说的邀请；

9月7日，因肺结核病逝于温哥华；

加拿大皇家空军为郑汉英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其遗体葬在当地一墓园。

参考文献

一、档案资料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航空俱乐部 (Aero Club of British Columbia, Pitt Meadows, BC);

日内瓦航空俱乐部 (L' Aéro-Club de Genève, Genève, Switzerland);

美国埃隆卡飞机制造公司档案馆 (Aeronca Inc. Archives, Middletown, OH);

美国奥托加—普拉特维公共图书馆 (Autauga-Prattville Public Library, Prattville, AL);

新西兰奥克兰市立图书馆特藏部 (Auckland City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s, Auckland, NZ);

加拿大拉瓦尔大学图书馆特藏部 (Bibliothèque de l'Université Laval, Collections spéciales, Ville de Québec, PQ);

加拿大伯纳比公共图书馆 (Burnaby Public Library, Burnaby, BC);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档案馆 (British Columbia Archives, Victoria, BC);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人口统计局 (British Columbia Vital Statistics Agency, Victoria, BC);

加拿大华裔军事博物馆 (Chinese Canadian Military Museum, Vancouver, BC);

加拿大列治文市档案馆 (City of Richmond Archives, Richmond, BC);

温哥华市档案馆 (City of Vancouver Archives, Vancouver, BC);

艾森豪威尔总统图书馆 (Dwight D. Eisenhower Library, Abilene, KS)

有关美国著名女飞行家杰奎琳·科克兰 (Jacqueline Cochran) 1932 年—1975 年间的史料;

香港电影资料馆 (Hong Kong Film Archive, Hong Kong);

香港航空历史协会 (Hong Kong Historical Aircraft Association, Hong Kong);

加拿大欧文屋/新威斯敏斯特博物档案馆 (Irving House/ New Westminster Museum and Archives, New Westminster, BC);

加拿大援华委员会卑诗省弗农分会邝生 (G. Kwong) 于 1945 年 1 月 5 日写给弗农市 (Vernon) 布尔曼先生 (Mr. T. K. Bulman) 的信函。打字并签名手稿, 该信函副本为本书作者收藏;

李霞卿私人文件, 由李氏家人提供;

美国莫比尔公共图书馆 (Mobile Public Library, Mobile, AL);

加拿大国家档案馆 (National Archives of Canada, Ottawa, ON);

加拿大国家电影局 (National Film Board, Montréal, PQ);

联合国驻日内瓦办事处 (Office des Nations Unies à Genève, Genève, Switzerland);

美国费城公共图书馆 (Philadelphia Public Library, Philadelphia, PA);

美国盐湖城公共图书馆 (Salt Lake City Public Library, Salt Lake City, UT);

旧金山公共图书馆 (San Francisco Public Library, San Francisco, CA);

阿拉巴马州档案历史署 (State of Alabama Department of Archives and History, Montgomery, AL);

美国托莱多—卢卡斯郡公共图书馆 (Toledo-Lucas County Public Library, Toledo, OH);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希雷·G·马德图书馆美国援华联合会档案 (United Service to China Archives. Seeley G. Mudd Libra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inceton, NJ);

中国平民救济联合会 (United Council for Civilian Relief in China) 1939 年“一碗饭运动” (Bowl of Rice Campaign) 有关史料, 本书作者个人收藏;

美国联邦调查局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Washington, DC);

美国联邦航空局 (U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Oklahoma City, OK);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特藏部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Special Collections, Vancouver, BC);

美国华盛顿大学特藏部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pecial Collections, Seattle, WA);

温哥华公共图书馆特藏部 (Vancouver Public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s, Vancouver, BC);

蒙特利尔市档案馆 (Ville de Montréal Section des archives, Montréal, PQ);

加拿大西部航空博物馆 (Western Canada Aviation Museum, Winnipeg, MB);

耶鲁大学图书馆手稿和档案部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Manuscripts and Archives, New Haven, CT) “雅礼会” (Yale-China Association) 有关史料。

二、采访记录 (口述史料)

2002 年电话采访侨居纽约皇后区皇后村 (Queens Village, NY) 的颜雅清的女儿陈国风 (Doreen Chen);

侨居美国新泽西州伯克利—海茨 (Berkeley Heights, NJ) 的颜雅清的孙子陈克文 (Ronald K. Chen) 于 2002 年、2006 年致本书作者的电子邮件;

2005 年 3 月 1 日—3 日采访侨居加州赫克力斯 (Hercules, CA) 的李霞卿之子郑柏士 (Pax Cheng);

2005 年 2 月 28 日采访侨居加州希尔斯伯勒 (Hillsborough, CA) 的退休职业飞行员、驼峰航线上的第一个中国机长陈文宽 (Moon Chin);

香港电影制片人蔡继光于 2003 年 8 月 14、16 两日致本书作者的电子邮件;

香港航空历史协会的克里夫·唐纳威 (Cliff Dunnaway) 于 1999 年—2005 年间致本书作者的多封电子邮件;

新西兰奥克兰的詹尼斯·费尔本 (Janis Fairburn) 于 2005 年 8 月 13、17 两日致本书作者的电子邮件;

悉尼的科林·费尔本·巴斯 (Corin Fairburn Bass) 于 2005 年 8 月 17 日致本书作者的电子邮件;

飞天名媛
SISTERS OF HEAVEN

新西兰奥克兰的黛娜·霍尔曼 (Dinah Holman) 于 2005 年 8 月致本书作者的电子邮件及信函等邮寄资料;

英国的伊恩·D·约翰逊 (Ian D. Johnson) 于 2003 年—2006 年间致本书作者的多封电子邮件;

香港电影资料馆资深电影人罗卡于 2003 年 8 月致本书作者的电子邮件及信函等邮寄资料;

2004 年 9 月 26 日采访温哥华退役二战机师丹尼·李 (Danny Lee);

2003 年 1 月 9 日电话采访多伦多退役女飞行员帕特丽夏·李 (Patricia Lee);

2005 年 1 月、2 月间采访温哥华华裔善长李氏夫人 (Peggy Lee);

2001 年 3 月 2 日电话采访蒙特利尔的马邦基 (Albert Mah, 曾任中国航空公司机长, 2005 年去世);

侨居加拿大埃德蒙顿的马绍基 (Cedric Mah, 曾任中国航空公司机长) 于 2001 年—2006 年间致本书作者的多封电子邮件;

2005 年 3 月采访旧金山的芮妮·林·罗伯逊 (Renée Lym Robertson) 女士;

2005 年 1 月 26 日、2006 年 5 月 2 日采访侨居温哥华的司徒炳通之子司徒雷;

2005 年 3 月 2 日采访侨居加州赫克力斯的琳达·魏 (Linda Wei) 女士;

美国奥托加—普拉特维公共图书馆负责人金·威尔逊·欧文 (Kim Wilson Owen) 女士于 2002 年致本书作者的电子邮件及信函等邮寄资料;

温哥华加拿大华裔军事博物馆馆长王容伦于 2006 年 1 月 16 日致本书作者的电子邮件。

三、报纸杂志

《航空文摘》(Aero Digest)

《航空杂志》(Aéro-Revue)

《航空》杂志 (Aviation)

加拿大《贝维尔》杂志 (Beaver)

美国《伯明翰时代先驱报》(Birmingham Age-Herald)

《加拿大航空》杂志 (Canadian Aviation)

《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

《中国杂志》(*China Journal*)
 《中国邮报》(*China Mail*)
 上海英文报《密勒氏评论报》(*China Weekly Review*)
 日内瓦《中国画报》(*China illustrée*, 或为 *China illustriert/China illustrated*)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加拿大《大汉公报》(*Chinese Times*)
 香港《大公报》
 美国《肯纳贝克日报》(*Daily Kennebec Journal*)
 美国《达拉斯新闻报》(*Dallas News*)
 加拿大《前进》杂志(*Forward*)
 加拿大《法学》杂志(*Le Droit*)
 《蒙特利尔公报》(*The Montreal Gazette*)
 美国《格罗斯一波因特新闻报》(*Grosse Pointe News*)
 美国《格罗斯一波因特评论报》(*Grosse Pointe Review*)
 加拿大《哈利法克斯先锋报》(*Halifax Herald*)
 美国《哈特福德报》(*Hartford Courant*)
 香港英文商业报《孖刺西报》(*Hong Kong Daily Press*)
 香港英文报《士蔑西报》(*Hong Kong Telegraph*)
 香港《华侨日报》
 美国《爱达荷政治家报》(*Idaho Statesman*)
 俄罗斯《消息报》(*Izvestia*)
 法文《上海日报》(*Journal de Shanghai*)
 加拿大《莱斯布里奇先驱报》(*Lethbridge Herald*)
 美国《生活杂志》(*Life Magazine*)
 美国《利马新闻报》(*Lima News*)
 上海《玲珑》女性杂志
 《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
 美国《马利维尔每日论坛报》(*Maryville Daily Forum*)
 美国《莫比尔新闻报》(*Mobile Press Register*)
 美国黑人报纸《蒙哥马利广告报》(*Montgomery Advertiser*)
 美国《莫德斯托蜂报—新闻先驱报》(*Modesto Bee and News-Herald*)

飞天名媛

Wang Kang

《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Tribune*)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上海英文报《北华捷报和最高法庭与领事公报》(*North-China Daily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and Consular Gazette*)
上海英文报《字林西报》(*North-China Daily News*, 原名《北华捷报》)
《渥太华公民晚报》(*Ottawa Evening Citizen*)
美国影迷杂志《电影剧》(*Photoplay*)、《电影镜子》(*Movie Mirror*)
美国《流行航空》杂志(*Popular Aviation*)
美国《普拉特维前进报》(*Prattville Progress*)
俄罗斯《真理报》(*Pravda*)
蒙特利尔《新闻报》(*La Press*)
美国《电影—广播导刊》(*Movie-Radio Guide*)
《纽约世界电讯报》(*New York World-Telegram*)
中国《人民政协报》
《盐湖城论坛报》(*Salt Lake City Tribune*)
《圣地亚哥联合论坛报》(*San Diego Union*)
《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
《旧金山观察家报》(*San Francisco Examiner*)
《旧金山新闻报》(*San Francisco News*)
《西雅图每日时报》(*Seattle Daily Times*)
上海英文报《大美晚报》(*Shanghai Evening Post*)
魁北克市《太阳报》(*Soleil*)
香港英文报《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英国《泰晤士报》(*Times*)
美国《托莱多刀锋报》(*Toledo Blade*)
《多伦多环球邮报》(*Toronto Globe & Mail*)
《多伦多星报》(*Toronto Daily Star*)
《温哥华日报》(*Vancouver Daily Province*)
《温哥华先驱新闻报》(*Vancouver News-Herald*)
《温哥华太阳报》(*Vancouver Sun*)
加拿大《维多利亚日报》(*Victoria Daily Colonist*)

加拿大《维多利亚时报》(Victoria Times)

美国《维德特信报》(Vidette-Messenger)

美国《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

重庆《新华日报》

《香港工商日报》

《香港华资晚报》

上海《中华》画报

四、文章论著

“Aero Club of BC.” *West Coast Aviator Magazine* (April 1999), 8: 5.

Aerofiles, aerofiles.com

Anderson, Douglas E. “Poor Man’s P-26; The Aeronca LC.” *Canadian Aviation Historical Society Journal*, vol. 14, no. 4, 126.

Arvad, Inga. “Glamorous Flying Ambassadors at Home in Either East or West.” *Vancouver Daily Province*, March 13, 1943.

Association for Moral and Social Hygiene in India (印度道德与社会卫生联合会). *Notes on the Conference of Central Authorities in Far-Eastern Countries Convened by the League of Nations, at Bandoeng, Java, in February, 1937*. Delhi: Delhi Printing Works, May 1937.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Edited by Howard Boorman & Richard C. Howard.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

The British Columbia and Yukon Directory. Vancouver, B. C. : Sun Directories, 1941—43.

Cailliez, Jean-Claude. “Quand Lindbergh Alaquait à Genève.” *La Feuille Volante* 90 (novembre 2004), 7—9.

The Canadians at War: 1939/45. vol. 1. Montreal: Reader’s Digest Association (Canada), 1976.

Cash, Gwen. *A Million Miles from Ottawa*. Toronto: Macmillan Co. of Canada Ltd. , 1942.

Chen, Percy (陈丕士). *China Called Me: My Life Inside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79.

Chen, Lawrence M. “Aviation in China.” *In Information Bulletin*, May 1, 1937, by the Counci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55—274. Nanking: Counci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iii, no. 12.

Chen Leyda, Si-lan. *Footnote to History*. Edited by Sally Baner. New York: Dance Horizons, 1984.

程乃珊。“李霞卿：从著名影星到全能飞行员”，《上海 Lady》。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

Chennault, Claire Lee. *Way of a Fighter: The Memoirs of Claire Lee Chennault*. Edited by Robert Hotz.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49.

Chiang, May-ling Soong (宋美龄). *China in Peace and War*. With a preface by Charlotte Haldane (夏洛特·霍尔丹作序). London: Hurst, 1940.

_____. *China Shall Rise Again, by May-ling Soong Chiang* (Madame Chiang Kai-shek, 宋美龄): *Including Ten Official Statements of China's Present Progress*. New York and London: Harper & Bro., 1941.

_____. *We Chinese Women: Speeches and Writings during the First United Nations Year [by] Mayling Soong Chiang (Madame Chiang Kai-shek) February 12, 1942—November 16, 1942*. New York: John Day Co., 1943.

China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国民政府宣传部). *China Handbook: 1937—1943*. NY: Macmillan Co., 1943.

China Yearbook 1938/39 [英国在天津出版的英文《中国年鉴》，主编：英国人伍赫德 (H. G. W. Woodhead)]. Tientsin: Tientsin Press Ltd. (天津出版有限公司), 1939.

Chinese Year Book (中国学者编写的英文《中国年鉴》).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5—(vol. 1—7).

Choi Kai-kwong & Law Kar (编导：蔡继光、罗卡). *Lai Man-wai: Father of Hong Kong Cinema*. [《香港电影之父黎民伟》(DVD, 长篇纪录片)]. Hong Kong: Dragon Ray Motion Pictures, Ltd. (龙光影业有限公司), 2001.

Le Cinéma Chinois (《中国电影》). 导演：Marie-Claire Quiquemelle、Jean-Loup Passek, 编剧：Geremie Barmé. Paris: Centre Georges Pompidou (巴黎：蓬皮杜国家文化艺术中心), 1985.

The Diary of Lai Man-wai (《黎民伟日记》). 黎锡 (Lai Sek) 编订. Hong Kong: Hong Kong Film Archive (《香港电影资料馆》), 2003.

Eden, Anthony. *The Eden Memoirs: Facing the Dictators*. London: Cas-

sell, 1962.

Epstein, Israel. *My China Eye: Memoirs of a Jew and Journalist*. San Francisco: Long River Press, 2005.

Exley, David J. "John G. Male." *Association of Former International Civil Servants (New York) Quarterly Bulletin*, vol. xxxiv, no. 3 (July 2003): 31—32.

"Flying for Victory," *True Aviation Picture-Stories*. New York: Parents' Magazine Press, no. 3 (March/April 1943).

Gilkey, George R. *The First Seventy Years: 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La Crosse, 1909—1979*. La Crosse,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La Crosse Foundation, 1981.

Guan Zhongren (关中人). "Patriotic Aviatrix Li Xiaqing." (爱国女飞行家李霞卿) Translated by Pan Zhongming (潘仲明译). *Women of China* (《中国妇女》英文月刊), July 1990: 38—40.

关中文编著.《中国妇女航空钩沉(1915—1949)》.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广东省妇女联合会、恩平县政协文史组,1988.

关中人、帕蒂·哥莉(Patti Gully)编.《五邑华侨与中国航空》第1、2卷,谢昂译.中国航空史研究会、广东省恩平市政协文史委员会,2003.

Hahn, Emily. *China to Me: A Partial Biography*. Philadelphia: Blakiston Co., 1944.

_____. *The Soong Sisters*. New York: Doubleday, 1941.

Hart, Scott. "Feminine Bravery: Men, Women Share China's Combat Duty."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18, 1943.

Hauser, Ernest. "T. V. For Victory." *New Republic*, January 26, 1942.

Henderson's City Directory, Vancouver, 1941, 1942, 1943.

Hong Kong. *Report of the Medical Department for the Year 1937*.

Hong Kong Historical Aircraft Association (香港航空历史协会). *Wings Over Hong Kong: An Aviation History, 1891—1998*. Edited by Cliff Dunnaway. Hong Kong: Pacific Century Publishers, 1998.

Hoo, Mona Yung-ning. *Painting the Shadows: The Extraordinary Life of Victor Hoo*. London: Eldridge & Co., 1998.

Hume, Edward H. *Doctors East Doctors West: An American Physician's Life*

in China.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Inc. , 1946.

Jackson, Beverley. *Splendid Slippers; A Thousand Years of an Erotic Tradition*. Berkeley, CA: Ten Speed Press, 1997.

Jennings, Dean S. "The Fighting Chinese." *Popular Aviation*, vol. xxvi, no. 3 (May 1940).

Johnson, Ian D. *China's First International Airline, the Southwestern Aviation Corporation*. 未出版发行 CD, 2004.

Kohan, O. Kathleen. "Flying Emissary." *Far East*, vol. 3, no. 3 (March 1940).

Koo, Wellington, Mme. (顾维钧夫人黄蕙兰). *Hui-lan Koo: An Autobiography*. As Told to Mary Van Rensselaer Thayer. New York: Dial Press, 1943.

_____. *No Feast Lasts Forever*. With Isabella Taves. New York: Quadrangle/New York Times Book Co. , 1975.

Lake, Talbot. "Miss Lee Seeks Funds in U. S. To Aid China." *Hayward [CA] Daily Review*, February 4, 1941.

Lash, Joseph P. *Eleanor: The Year Alone*. With a foreword by Franklin D. Roosevelt, Jr. (美国小罗斯福总统作序), New York: Norton, 1972.

Lau, Theodora. *Handbook of Chinese Horoscopes*. Twenty-fifth Anniversary Fifth Edition (25周年纪念版第5版). New York : HarperCollins, 2005.

国际联盟 (League of Nations) 大会有关资料. 日内瓦, 1935.

_____. 国联大会, *Minutes of the First Committee* (《第一委员会会议纪要》). Geneva, 1935.

_____. 国联大会, *Minutes of the First Committee* (《第一委员会会议纪要》). Geneva, 1937.

_____. 行政院, *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League* (《国联工作报告》). Geneva, 1935—1938.

_____. 公报. Special Supplement No. 174. *Records of the Eighteenth Ordinary Session of Assembly ; Minutes of the Committees; Minutes of the Fifth Committee (Humanitarian and General Questions)*. Geneva, 1937.

_____. *Traffic in Women and Children*. Conference of Central Authorities in Eastern Counties, Bandoeng (Java), February 2nd to 13th, 1937.

(“东方国家中央政府关于打击贩卖妇女儿童会议”，荷兰政府于1937年2月2日至15日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西部城市万隆举办。). *Minutes of Meetings* IV. Social. 1937, IV, 10. Geneva, December 1937.

Leary, William M. *Dragon's Wings : The China National Corpor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Aviation in China*.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76.

Lent, Melba. “Many Chinese Women Hear Talk by Madame Chiang.” *Winnipeg Free Press*, June 17, 1943.

Leong, Karen J. *The China Mystique: Pearl S. Buck, Anna May Wong, Mayling Soo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Orientalism*.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Leyda, Jay. *Dianying: An Account of Films and the Film Audience in China*.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72.

Lin, Adet, Anor Lin and Meimei Lin. *Dawn Over Chungking*. New York: John Day Co. , 1941. Reprint, New York: Da Capo Press, 1975.

Lyons, Leonard. “Broadway Signboard.” *Washington Post*, August 29, 1942.

_____. “New Yorker.”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18, 1939.

Martin, Brian G. *The Shanghai Green Gang: Politics and Organized Crime, 1919—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McCormick Dunn, Elsie. “Notes on the Life Story of Lee Ya-ching.” 未出版发行手稿.

Meek, Jack. “Skylines.” *Vancouver Sun*, April 6, 1943.

Miller, Hope Ridings. “Mmes. McNary, Tydings Entertain With ‘At Home’: Miss Hilda Yen with Miss Wang.” *Washington Post*, 11 February 1938.

_____. “Mrs. Garner Steps Out To Southerners’ Tea.” *Washington Post*, April 29, 1939.

Nellist, George F. , ed. *Men of Shanghai and North China*. 2nd ed. Shanghai: The Oriental Press, 1935.

Murison, Blanche E. Holt. “Hanyin Cheng of China.” *Saturday Night*, November 28, 1942.

National Spiritual Assembly of the Baha'i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美加巴哈伊教大会). *The Baha'i World* (《巴哈伊世界》). 经巴哈伊教教主守基·阿芬第 (Shoghi Effendi) 同意, 并在美加巴哈伊教大会指导下准备的两年一度的国际档案. New York City: Baha'i Publishing Committee, 1926; 1968—1973.

Ng Wing Chung. *The Chinese in Vancouver, 1945—1980*. Vancouver: UBC Press, 1999.

Nichols, Ruth. *Wings for Life: The Story of the First Lady of the Air*. New York: Lippincott Co., 1957.

Pan, Lynn. *Sons of the Yellow Emperor: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New York: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94.

Perrault, E. G. *Tong: the Story of Tong Louie, Vancouver's Quiet Titan*. Vancouver: Harbour Publishing, 2002.

Pride, Harry. *Life with the Moores of Hart House: Pioneer Days on Burnaby's Deer Lake*. Burnaby, BC: City of Burnaby Community Heritage Commission, 2002.

Reeds, Robert. "Pretty Chinese Girl Flier Likes All Men—To Look At." *Toronto Daily Star*, March 25, 1939.

Render, Shirley. *No Place For A Lady: The Story of Canadian Women Pilots, 1928—1992*. Foreword by Punch Dickins (潘趣·狄更斯作序). Winnipeg: Portage & Main Press, 1992.

Rosette. "Gorgeous Gowns Seen in Mannequin Parade." *Hong Kong Daily Press*, October 8, 1938.

_____. "Tea-Dance Season Re-Opens; Beautiful Frocks." *Hong Kong Daily Press*, October 3, 1938.

Seagrave, Sterling, and the editors of Time-Life Books (时代生活出版社编辑). *Soldiers of Fortune*. Alexandria, VA: Time-Life Books, 1981.

Seagrave, Sterling. *The Soong Dynast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5.

Selle, Earl Albert. *Donald of China*. New York: Harper, 1948.

Sherwood, Robert E. *Roosevelt and Hopkins*. NY: Harper & Brothers, 1948.

Simmons, Beverley. "Keeper of the Curtains." In *Fairburn and Friends*, ed. Dinah Holman and Christine Cole Catley, 126—135. Dunedin, NZ: Cape Catley, 2004.

Smith, E. G. "China's Spirit Sets Example, Mr. King Notes." *Globe and Mail*, July 8, 1942.

Snow, Edgar. *Journey to the Beginning*.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8.

Song Meiling. "Wings Over China." *Shanghai Evening Post*, March 12, 1937.

Spring, Joyce. *Daring Lady Flyers: Canadian Women in the Early Years of Aviation*. Porter's Lake, N. S. : Pottersfield Press, 1994.

Stout, William B. "Aviation Training at the Boeing School." *Aero Digest* (June 1935): 23.

唐冬眉. 《穿越世纪苍茫: 郑毓秀传》.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3.

Taunton, Ruth. "China Girl Flyer Arrives Here to Plead for Aid Against Japanese." *San Diego Union*, April 17, 1939.

Tcheng Soumé (Wei Yü-hsiu, 郑毓秀, 法文名苏梅). *Souvenirs d'Enfance et de Révolution*. [Par] Soumé Tcheng, transcrits par B. van Vorst. Paris: Payot & Cie, 1920.

Tcheng Yulau. *La Collaboration Technique Entre La Chine et La Société des Nations*. February, 1935.

Thomas, Harry J. *The First Lady of China: The Historic Wartime Visit of Madame Chiang Kai-shek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43*. [NY]: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 , 1943.

Thomas, Lowell and Rexford W, Barton. *Wings Over Asia : A Geographic Journey By Airplane*. Philadelphia; John C Winston Co. , 1937.

Tong, Hollington Kong (董显光). *Chiang Kai-shek, Soldier and Statesman; authorized biography by Hollington Tong*. Shanghai: The China Publishing Company, 1937.

Van Vorst, Bessie (McGinnis). *A Girl from China (Soumay Tcheng)*. New York: Frederick A. Stokes Co. , 1926.

Varian, Nina. "Pretty Chinese Flyer Wins Boisean Hearts." *Idaho States-*

man, May 23, 1939.

Walters, F. P. *A History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Wei Yü-hsiu (Tcheng) (郑毓秀). *My Revolutionary Years: The Autobiography of Madame Wei Tao-ming*.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43.

White, Freda. "China and Spain Ask for Judgment." *Headway* (October 1937): 190-91.

White, Theodore Harold and Annalee Jacoby. *Thunder Out of China*. New York: William Sloane Assoc., 1946.

Wiethoff, Bodo. *Luftverkehr in China: 1928—1949; Materialien zu Einem Untauglichen Modernisierungsversuch*.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75.

Who's Who in China, 1918—1950; with an index. Compiled by Jerome Cavanaugh. Hong Kong: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1982.

[Williams, V. Ben.] "We Want to Go to China." *Forward*. Vancouver: Vancouver Junior Board of Trade, vol. 11, no. 1 (Aug. 1942).

Wong, Larry (王容伦). "February 19, 1947: First Chinese become Canadian Citizens." *Beaver*, vol. 83, issue 1 (February-March 2003): 49.

Wong, Marjorie. *The Dragon and the Maple Leaf: Chinese Canadians in World War II*. London, ON: Pirie Publications, 1994.

Woodsworth, Charles James, and the Chinese Canadian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anada and the Orient: A Stud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oronto: Macmillan, 1941.

Worden, Helen. "Hong Kong Girl Here Plans Flights Across U. S. To Solicit Funds to Aid War Victims in China." *New York World-Telegram*, March 18, 1939.

Wyman, Keith. *Aeronca, Inc.* (August 1, 2002).

谢其章,《梦影集: 我的电影记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

颜惠庆,《颜惠庆日记》,上海市档案馆译.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

颜志渊,“缅怀祖父颜福庆”,参见网站 <http://www.rwfd.fudan.edu.cn/spirit/xiren/yanfuqing.htm>,2005年3月6日访问.

Yee, Paul. *Chinatown: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in Victoria, Vancouver, Calgary, Winnipeg, Toronto, Ottawa, Montreal and*

Halifax. Toronto; James Lorimer & Co. , Ltd. , 2005.

_____. *Saltwater City: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Vancouver*. Vancouver; Douglas & McIntyre, 1988.

Yen Hui-Ch'ing (颜惠庆). *East-West Kaleidoscope, 1877—1946: An Autobiography*. New York; St John's University Press, 1974.

_____. *Stories of Old China*. Translated by W. W. Yen. Hong Kong : Commercial Press, 1974.

袁小娟. “第一个跨出国门的女影星”. 《人民政协报》, 2001年7月27日.

Zheng Hanying (郑汉英). *Actualites Canadiennes No. 24; Aviatrice Chinese*. (加拿大新闻 24 号: 中国航空). 录像带资料, 时长两分钟. 加拿大国家电影局 (National Film Board), 1943.



飞天名媛

致谢

本人在此诚挚地感谢以下个人和组织，没有他们的大力协助，这个研究项目根本无法完成。

首先，我要向记者章清表示深挚的谢意，感谢她为此书在中国内地出版所付出的孜孜努力。感谢花城出版社译文室主任林宋瑜博士，因为她的合作，此书中译本才得以问世，以飨中国读者。此外，我还要感谢本书译者张朝霞，感谢她为翻译此书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关于颜雅清生平部分，我要向金·C·威尔逊·欧文（Kim C. Wilson Owen）女士表达我最深沉的谢意，欧文女士是美国奥托加—普拉特维公共图书馆（Autauga Prattville Public Library, Prattville, AL）的负责人，她格外慷慨地给予我时间、给我资源，对我着手撰写颜雅清的生平提供了很大帮助。我还要感谢美国史密斯女子学院（Smith College）的桑德拉·斯科特（Sandra Scott）女士和艾米·E·布朗（Aimee E. Brown）女士；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坎卢普斯^①皇家内陆医院（Royal Inland Hospital, Kamloops, BC）的罗伯特·M·加利（Robert M. Gully）医生；联合国驻日内瓦办事处档案处（UNOG Registry, Records and Archives Unit, United Na-

^① 坎卢普斯（Kamloops），华人多称“甘碌市”或“锦碌市”；英属哥伦比亚省（British Columbia, BC），亦译作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加拿大第三大省，位于加拿大西部，华人多称“卑诗省”。——译注

tions, Geneva) 处长布兰迪恩·布卢卡茨·路易斯弗特 (Blandine Blukacz-Louisfert) 先生; 国际联盟驻日内瓦档案员伯恩哈迪恩·E·佩约维克 (Bernhardine E. Pejovic) 先生;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①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简称 FAA) 的哈罗德·K·埃弗雷特 (Harold K. Everett) 先生; 奥克兰市立图书馆 (Auckland City Library) 的手稿管理员凯特·德克希 (Kate de Courcy) 女士, 以及新西兰的大卫·埃克斯利 (David Exley) 先生和弗兰克·梅尔 (Frank Male) 先生。新西兰近代诗人费尔本 (A. R. D. Fairburn) 的女儿们也不吝时间, 向我回顾颜雅清女士生平, 在此对科林·费尔本·巴斯 (Corin Fairburn Bass)、黛娜·霍尔曼 (Dinah Holman) 和詹尼斯·费尔本 (Janis Fairburn) 深表感谢。

关于李霞卿生平部分, 我要感谢美国加州奥克兰的琳达·魏 (Linda Wei); 多伦多退役女飞行员帕特丽夏·李 (Patricia Lee);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希雷·G·马德手稿图书馆 (Seeley G. Mudd Manuscript Library, Princeton University, NJ) 特藏助理泰德·班尼科夫 (Tad Bennicoff); 瑞士航空俱乐部日内瓦协会 (l'Association Genevoise de l'Aéro-Club de Suisse, Geneva, Switzerland) 高山冰川飞行员布莱士·莫朗 (Blaise Morand); 退休航空工程师约翰·豪瑟 (John Houser), 以及美国埃隆卡公司^② (Aeronca Inc.) 财务总监约翰·D·弗尔贝 (John D. Furbay); 航空爱好者、历史学家比尔·拉森 (Bill Larsen); 加州大学圣塔克鲁兹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 CA) 美国研究教授杨月芳 (Judy Yung) 博士; 美国堪萨斯州阿比林艾森豪威尔图书馆 (Eisenhower Library, Abilene, KS) 档案专员琳达·K·史密斯 (Linda K. Smith); 香港电影资料馆 (Hong Kong Film Archive) 资深电影人罗卡 (Law

^①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位于俄克拉荷马州俄克拉荷马市 (Oklahoma City, OK)。——译注

^② 美国埃隆卡公司 (Aeronca Inc.), 位于俄亥俄州米德尔顿 (Middletown, OH), 为美国著名飞机制造公司, 其生产制造的飞机在二战美国飞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译注

Kar); 香港电影制片人蔡继光 (Choi Kai-kwong); 侨居加州希尔斯伯勒 (Hillsborough, CA) 的退役职业飞行员、驼峰航线上的第一位中国机长陈文宽 (Moon Chin); 温哥华退役二战机师丹尼·李 (Danny Lee); 加拿大圣婴修女会 (Sisters of the Child Jesus in Canada) 卑诗省会发起人吉尔伯特·潘乔 (Gilberte Painchaud) 修女;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麦克德莫特图书馆 (Mc Dermott Library,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特藏部资深馆员保罗·奥尔克拉格 (Paul Oelkrug), 以及美国佛罗里达州圣彼得斯堡的赖文祥 (Wen Hsiang-lai) 夫人。来自瑞士梅林 (Meyrin) 的瑞士航空史学家让·克劳德·卡耶兹 (Jean-Claude Cailliez) 先生, 非常慷慨地与我分享他所了解的信息, 感谢他的洞见和鼓励, 感谢他向我推荐介绍日内瓦航空先驱的网站 Pionnair-GE. com 和简讯《飞舞的树叶》(La Feuille Volante), 正是借助这两个不错的资料来源, 我才得以完善李霞卿的生平。

关于郑汉英的生平故事, 给予我帮助的人实在是数不胜数。感谢已故的宋美龄女士的帮助, 感谢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代表 C. J. Chen 博士。来自香港航空历史协会 (Hong Kong Historical Aircraft Association) 的克里夫·唐纳威 (Cliff Dunnaway) 和伊恩·D·约翰逊 (Ian D. Johnson) 对我的研究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 我还要对以下个人的友好帮助表示深挚的谢意: 温哥华加拿大华裔军事博物馆 (Chinese Canadian Military Museum, Vancouver, BC) 馆长王容伦 (Larry Y. Wong); 加华历史协会 (Chinese Canadian Historical Society, Vancouver, BC) 余全毅 (Henry Yu) 博士; 加拿大华裔军事博物馆 (Chinese Canadian Military Museum Society, Vancouver, BC) 会长李悦后 (Howe Lee);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航空俱乐部 (Aero Club of British Columbia) 的史蒂夫·埃文斯 (Steve Evans) 和彼得·奥利维耶里 (Peter Olivieri); 驻卑诗省伯纳比 (Burnaby, BC) 的加拿大军事记忆协会 (Canadian Military Remembrance Society, 简称 CMRS) 会长罗伯特·莫里森 (Robert Morrison); 欧文屋 (Irving House) 经理科林·麦克格雷格·史蒂文

斯 (Colin Macgregor Stevens) 和新威斯敏斯特^①博物档案馆 (New Westminster Museum and Archives, New Westminster, BC) 档案管理员凯利·斯图尔特 (Kelly Stewart); 加拿大皇家空军 (Royal Canadian Air Force, 简称 RCAF) 历史学家迈克尔·德斯马塞斯 (Michael DesMazes); 专门介绍中国航空公司^② (China National Aviation Corporation, 简称 CNAC) 在二战时期史料的网站 cnac.org 的编辑汤姆·O·摩尔 (Tom O. Moore); 国际航空联合会 (Fédération Aéronautique Internationale, 简称 FAI) 的蒂耶里·蒙蒂纽克斯 (Thierry Montigneaux); 加拿大蒙特利尔市政厅 (Hôtel-de-Ville, Montréal, PQ) 的文献档案管理员希尔维·格隆汀 (Sylvie Grondin); 香港飞行总会 (Hong Kong Aviation Club, 简称 HKAC) 的霍根·罗 (Hogan Loh); 英国皇家飞行俱乐部 (Royal Aero Club, London, UK) 的巴里·洛夫 (Barry Rolfe); 加拿大国家电影局 (National Film Board of Canada, 简称 NFB) 的泰斯尔侯爵夫人 (Marquise Tessier) 和瑞恩希尔德·迈尔斯基 (Ragnhild Milewski); 驻温哥华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资讯组组长彼得·陈 (Peter Chen); 英国皇家航空学会 (Royal Aeronautical Society, London, UK) 图书馆馆长瑞德 (B. L. Riddle); 来自加拿大新不伦瑞克省圣安德鲁斯 (St. Andrew's, New Brunswick) 的大卫·沃克 (David Walker); 温哥华贸易局 (Vancouver Board of Trade) 公关经理特里·哈德利 (Terry Hadley); 加拿大列治文市^③档案馆 (City of Richmond Archives) 档案管理员林恩·沃勒 (Lynn Waller); 加拿大西部航空博

飞天名媛

Sisters of Vancouver

① 新威斯敏斯特 (New Westminster),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历史最悠久的城市, 华人多称“新西敏市”。——译注

② 中国航空公司 (CNAC), 由美国寇蒂斯—莱特公司 (Curtiss-Wright) 1929年4月在中国成立, 是年10月21日正式运营 (与中国交通部合资), 抗战期间, 中航公司以受美军领导的一支商业航空公司的平民运输队的身份参加了著名的驼峰航线的运输任务, 被誉为“驼峰航线上的急先锋”。1933年, 泛美航空公司 (Pan American) 购买了中航的美方股份, 1949年中航公司在“两航起义”后解体。——译注

③ 列治文市 (Richmond),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一市, 亦译作“瑞其蒙”。——译注

物馆^① (Western Canada Aviation Museum) 照片档案管理员兼编辑贝弗·泰龙 (Bev Tallon); IBM 公司档案馆 (IBM Corporate Archives) 的保罗·雷斯维奇 (Paul Lasewicz)。我要把最真挚的谢意送给伯纳比^②乡村博物馆 (Burnaby Village Museum) 的项目协调员莫里斯·吉伯德 (Maurice Guibord), 他为我完成郑汉英的生平付出了许多心血和努力。

下列档案馆、图书馆和机构的人员及藏书、藏品对我的帮助实乃无价: 加拿大伯纳比公共图书馆鲍勃·普里特分馆 (Burnaby Public Library, Bob Prittie Branch); 伯纳比海景墓园 (Oceanview Cemetery, Burnaby, BC); 温哥华市档案馆 (City of Vancouver Archives); 列治文市档案馆;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档案馆 (British Columbia Archives); 加拿大国家图书馆 (National Library of Canada);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Library); 温哥华公共图书馆 (Vancouver Public Library); 加拿大拉瓦尔大学图书馆 (Bibliothèque de Université Laval); 美国国会图书馆 (Library of Congress);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希雷·G·马德手稿图书馆; 新西兰奥克兰市立图书馆 (Auckland City Library); 旧金山公共图书馆 (San Francisco Public Library); 华盛顿大学图书馆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y); 美国阿拉巴马州档案局 (Alabama Department of Archives); 美国盐湖城图书馆 (Salt Lake City Library); 美国费城公共图书馆 (Philadelphia Public Library); 耶鲁大学图书馆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手稿和档案部; 香港公共图书馆 (Hong Kong Public Library); 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以下个人给予了我最大可能的帮助, 对此我谨表示最深挚的谢意。

新泽西州法律博士陈克文 (Ronald K. Chen) 与我分享了许多

^① 加拿大西部航空博物馆, 位于加拿大马尼托巴省温尼伯市 (Winnipeg, Manitoba), 为加拿大最大的航空馆。——译注

^② 伯纳比 (Burnaby), 位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 亦译“本那比”、“比拿比”。——译注

关于他的祖母颜雅清女士的回忆，并向我提供了不少珍贵的照片。他对颜女士多彩而美好的回忆，让我对这位女性自由独立的个性印象极为深刻。颜雅清的女儿陈国凤（Doreen Chen）博士，也亲切地与我分享有关她母亲的记忆，在此我要对她的宽厚和耐心深表谢意。

李霞卿之子郑柏士（Pax Cheng）和他的妻子苏珊热情地邀请我到他们在加州赫克力斯（Hercules）的家，并允许我随意使用有关李霞卿的档案资料，包括文件、照片和印刷品等物，这些珍贵的史料曾经在香港埋藏数十载，如果没有这些宝贵的资料，李霞卿那富有传奇一生的大部分内容将不为世人所知。因为父亲郑白峰的关系，郑柏士先生还与郑汉英女士沾亲带故。尽管郑先生对姑姑郑汉英不甚了解，但他讲述了不少有关他的姑奶奶、民国传奇女杰郑毓秀^①博士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代女杰郑毓秀影响了无数热血青年，特别对她的侄女郑汉英影响至深。

尽管我对探访郑汉英女士的后人不算太成功，但是我还是要对温哥华华裔善长李氏夫人（Peggy Lee）表示深挚的感谢，她生动地回忆了郑女士的生平故事，为我提供了许多我不了解的信息。郑汉英曾经的爱人司徒炳通的儿子司徒雷（Leigh Seto）先生，非常热心地向我介绍了他所知道的郑汉英在他家族史中扮演的角色，他还很慷慨地提供了他父亲和他同父异母姐姐的几张照片。

感谢旧金山市芮妮·林·罗伯逊（Renée Lym Robertson）女士的大力帮助，感谢她对中国航空史料保护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她的支持和帮助以及她所提供的大量宝贵资料，使这本书得以顺利完成；感谢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马邦基（Albert Mah，2005年去世）和他在埃德蒙顿（Edmonton）的弟弟马绍基（Cedric Mah），两兄弟都曾效力中国航空公司（CNAC）并担任机长，他们向我介绍了第一手的有关中国抗战和中国航空发展的情况；感谢澳大利亚卡通巴

^① 郑毓秀（1891—1959），民国时期著名社会活动家、资产阶级女革命家和女权运动鼓吹者，中国第一位女博士、第一位女律师。——译注

(Katoomba) 的迈克尔·阿尔德顿 (Michael Alderton), 感谢他偶然发现的影印资料; 感谢加拿大查普林高地 (Champlain Heights) 培英中文学校 (Pui Ying Chinese School) 的校长、老师和学生们, 感谢他们的情谊, 我从他们身上获益良多; 感谢已故的广东恩平航空史学家关中人, 感谢他对这一项目的信任和支持。在此将我最深挚的谢意送给我亲爱的朋友罗德里克·王 (Roderick Wong) 博士夫妇, 感谢他们为我树立了榜样, 感谢他们在思想上、精神上和物质上给予我支持, 同时也感谢他们对凯文·科瓦尔 (Kevin Kowal) 的不懈指导。罗希·哥莉夫妇给我力量, 让我能够全身心地投入这个项目, 毫不松懈。真诚地感谢林燕娴 (Wendy Yin-han Lam, 音译) 医生, 感谢她在这期间给予我的无私帮助, 使我得以奋力图存。感谢已故的加恩·皮凯尔 (Garth Pickell) 和他的妻子安妮 (Anne), 他们不朽的爱和鼓励, 让我永生难忘。感谢我的编辑, 长河出版社 (Long River Press) 的克里斯·罗宾 (Chris Robyn), 感谢他的耐心、热情和宝贵建议。感谢谢昂 (Angelo Xie) 先生的不懈支持, 他以极大的热心给予我鼓励, 帮助我翻译了不少棘手的资料, 没有他的帮助, 顺利完成这个项目根本无法想像。

SISTERS OF HEAVEN

上世纪三十年代，世界战争硝烟四起时，三位年轻貌美的中国女子冲破禁忌，以超乎寻常的胆略振翅而上，成为中国第一代女飞行家。她们在美洲各地进行巡回演讲，募捐抗日，赈济难民。她们的美貌与胆识，打破传统、追求女性独立解放的精神，在亚洲和西方世界引起轰动。

这三朵航空之花是颜雅清、李霞卿和郑汉英。她们均出身名门，貌美如花，有极好的教育背景。颜雅清活跃于外交界，曾出任国际联盟中国代表；李霞卿被誉为“中国第一位女飞行员”，此前她是上海滩红极一时的电影明星，艺名李旦旦；郑汉英，法国索邦大学博士，中国空军第一位女军官，第一位派到加拿大任公职的中国女子。

加拿大女作家帕蒂·哥莉（Patti Gully）用七年时间撰写此书，通过大量研究重现这段几乎为世人所遗忘的历史，并向世人展现这三位中国最早的航空之花传奇的人生，特别是国难当头之时她们勇敢飞翔的壮举与爱国情怀。书中还揭秘她们不为世人所知的情感挣扎及私人生活……

《飞天名媛》（Sisters of Heaven）还原一段几近遗忘的航空史。是一本了解中国近现代航空史，特别是中国第一代女飞行家生平之不可多得的文本。



建议上架：人物传记、畅销

ISBN 978-7-5360-6341-9



9 787536 063419 >

定价：48.00元